

# 釐清真相 拒絕遺忘

反右運動六十周年紀念

新 編

## 五 七 右 派 列 傳

沙葉新序 申淵編著 武宜三校

### 新編五七右派列傳

#### 編著說明

- 1, 本書採用縱橫交叉的框架結構, 立體還原反右運動的真相。縱向的沙葉新先生《代序》、前言《中國右派知多少?》以及每一章前的《綜述》, 綜合敘述反右運動概況和各行各業的災情;
- 2, 橫向的第一章 死難烈士、第二章 抗暴自殺、第三章 勞改勞教、第四章 中國共產黨和反地方主義、第五章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六章 宗教界和少數民族、第七章 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第八章 文化藝術和新聞出版、第九章 科技和教育、第十章大中小學生及公務員則分別敘述 1588位右派、中右分子、內控右派以及具有代表性的右二代和右三代。
- 3、某些具有多種身份的人物或遭遇, 以他們的主要身份或遭遇進行分類。例如蔡鐵根大校, 中共資深黨員, 高級軍官, 右派, 慘遭槍決。本書將其列入第一章死難烈士, 而沒有列入第五章中國人民解放軍;
- 4, 本書也矚目右派中的告密者和毛澤東施展陽謀詭計的主要幫兇。但施虐者不得列入正傳, 只可進入第十一章施害者別傳, 告密者則列入第八章第三節;
- 5, 第十二章右派心理學試圖分析劃右後右派的心理狀態;
- 6, 參考資料和文獻列於附錄;
- 7, 本書以申淵原著《五七右派列傳》為基礎, 由沙葉新作序、五七學社申淵編著、武宜三校對, 馬文洋參與編寫。

### 序 反右六十年祭

沙葉新



沙葉新

反右運動已經過去60年, 幾多屈辱、幾多殘暴、幾多血淚、幾多冤魂!

據北京朝華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國“左”禍》一書中統計, 在反右時, 共有55萬2千9百73人被打成右派, 至該書出版時,

上述右派仍有96人未得平反。

為何不徹底平反，還揪住這96人的辮子？不可告人的目的是當局為了以此來證明中國確實有右派，因而反右是必需的，這個大方向也是正確的，只不過擴大化了而已。

這是什麼算盤？這是什麼邏輯？打了55萬2千9百多人，結果只有96個右派，“擴大化”了不是1倍、2倍，而是數千倍！這個所謂的大方向還能說是正確的嗎？這樣的自欺欺人，荒唐無稽，毫無絲毫道理，為的就是掩飾反右是有組織、有計劃、有陰謀的政治迫害，是曠古之罪！

以上的統計僅僅是民間的、是不完全的，如果根據後來官方公佈的相關數字，即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權威部門合編的報告，整個反右運動中，共有201萬3千3百餘人劃定為戴帽子的右派分子和不戴帽子的右派分子以及右傾分子。其中有7萬2千7百多人被判刑逮捕，自殺者、失蹤者，難以計算。如果加上當事人的家屬、親友、同學、同事等等莫名其妙被牽連、被冤屈的人，那就更是不知其數了！

必須指出的是，這高達201萬的右派分子，幾乎全是知識份子，而當年全國的知識份子只有500多萬，也就是說10個知識份子中就有4個是戴帽右派、不戴帽右派以及右傾分子，這麼高的比例實在觸目驚心！

誰都知道，發動和領導這場“偉大”的反右運動的領袖，是“偉大”的毛主席。他曾多次稱頌自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並寫詩規勸郭沫若：“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可見他力挺秦始皇，並支持焚書坑儒。當有人反對時，他立即反駁：“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八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了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概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的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大笑）

毛主席的這一番話，這一大笑，能不使在場恭聆聖諭者寒毛直豎，氣塞心顫？！

毛的理論家和史學家們，在論述執政黨合法地位時，總是說這是“歷史的選擇。”此論斷，至少在反右這件事上，是說對了；確實是歷史選擇了毛澤東，否則誰有這樣大的“魄力”和“韜略”發動如此巨大規模的反右，並死不要臉地把“陰謀”說成“陽謀”！

反右運動既是國家過錯，也有領導者逃脫不了的罪責，二者狼狽為奸，推波助瀾。如今反右60週年在即，不論當時國家的專制體制，還是那時主事的獨裁領導，都要接受歷史的審判，可他們無時無刻都企圖逃脫歷史的審判。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也沒有免責的罪行。所有的罪行，不是不報，而是時機未到；時機一到，統統報銷！

正當反右60週年，申淵先生《新編五七右派分子列傳》出版，共收入一千五百多名右派的姓名、籍貫、性別、年齡、出身和遭遇以及最後歸宿等資料；所列者大多數是籍籍無名者，是普通的知識份子，是小人物。作者能為之立傳，書諸歷史，眼界獨到，功莫大焉。其目的就是拒絕遺忘，記憶歷史；因為歷史並非只是帝王將相的“功勞簿”，更是億萬草民蟻族的“心酸淚”！

反右時，我年幼，未趕上，如早生，肯定右。雖然我非右派，但我是“右友”，有許多右

派朋友。我同情他，更敬重他們。《新編五七右派列傳》一書的作者申淵先生便是當年的右派，也是我的好友。我衷心祝賀他這本新著的出版，讓我們一起拒絕遺忘！

2016年6月15日 上海

## 前言 中國右派知多少？

1957-1958年中華大地到底揪出多少右派份子，中共官方和民間誰都說不清楚。當年揪右派份子揪紅了眼，從中央到地方基層，突破了政策底線，扔掉了法律的條條框框，以黨代法。工農商學兵一齊動手，層層訂指標，亂揪一氣。最後一場混戰，進入失控狀態，導致嚴重擴大化。不僅反右運動如此，中共建國後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最終都是這樣收場的。這也是中共製造大量冤假錯案的原因。毛澤東甯左勿右的極左機會主義路線，在他早期搞農民運動時已經形成。他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指出“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六十年來，各種右派統計人數不斷變化擴大，知情人中共自己則違莫如深。

右派隊伍不斷擴大

1957年6月29日反右運動才剛開始，中共中央文件《關於爭取、團結中間分子指示》中說“全國大約有右派四千人”。

1957年7月9日毛澤東起草的黨內文件《中央關於增加點名批判的右派骨幹份子人數的通知》中說：“準備的骨幹名單擴大了一倍，全國不是四千人，而是八千人。”

1957年9月，中共召開八屆三中全會，全國又劃六千二百名右派。當時估計有十五萬，中央向各地發出劃右百分比。

1958年毛澤東在漢口會議上說：“全國有右派三十萬人，把三十萬右派搞臭了。”

天津市第一結核病防治院整風鳴放中的大字報

1959年9月，中共中央《關於摘掉確實悔改的右派份子帽子的指示》中稱，全國揭發出右派份子四十五萬人。

1959年9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批發中組部和中宣部《關於右派份子工作的幾點意見的報告》中說：“.....在全國四十四萬名右派份子中.....。”

197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彙編的報告稱：“整個反右運動中，有二百零一萬三千三百餘人被定為右派份子.....，有七萬二千七百多人被捕，二萬二千一百多人自殺，有三千五百多人非正常死亡和失蹤。”

1978年9月，中共中央批轉中央五部門《關於繼續執行中央[1978]55號文件幾個問題的請示》，內稱：“.....至七月中旬，屬於錯劃已經改正的有四十九萬三千人，佔所劃右派份子的90%”。按此百分比推算，應為五十四萬八千一百一十一人。

1979年2月17日，時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顧問的劉瀾濤，在《改正右派經驗交流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當時共劃了右派五十四萬人，佔當時幹部人數九百五十三萬的5.7%。”

1989年葉永烈著《反右派鬥爭始末》提出，共有右派份子五十五萬多人，中右份子、反社會主義份子、株連家屬達數百萬之眾。

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指出：“五七年劃右派份子四十至七十萬”。

1991年香港九十年代出版社出版的丁抒著的《陽謀》中的數字是一百三十餘萬人。

1993年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和事件的回顧》，他說：“……錯劃了右派份子五十五萬人”。

1993年新華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左禍》一書中稱：“五七年劃右派五十五萬二千九百七十三人”。

1993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朱正著《1957年的夏季》轉引德國烏利-法朗茨《鄧小平——中國式的政治傳奇》中的資料為：“五七年劃右派八十萬，株連二百九十萬”。

2008年第七期《炎黃春秋》刊登李銳文章《毛澤東與反右派鬥爭》，關於劃右人數，他寫道：“現在公佈全國被打成‘右派’的共五十五萬多人，佔當時知識份子總數的11%。他們全被‘勞動改造’，有的還發配邊疆，一部分還被關進監獄。受打擊最多最重的當然是上層知識份子。此外，在農村幹部和小學教師中也打了不少‘右派’，估計人數也達五十萬；後來決定不在這類人中劃‘右派’，於是他們被戴上‘壞份子’或其他帽子，境遇同樣悲慘。”李銳在上世紀1980年代初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參與領導這次右派大改正工作，他的說法是比較具有權威性的。

以上這些不同資料的統計有一個發展過程。雖然反右運動在1958年底已宣佈“勝利結束”，但是中共的左傾冒險主義剝不住車，有些地方在1959、1960年還在揪右派，1960年中共中央不得不發出文件：“不經過省委批准，不得再劃右派。”所以各地私自劃的右派已經很難統計進去了，這也是中共搞階級鬥爭、政治運動的普遍規律。



根據1963年7月23日發布的中發(63)496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高等學校應屆畢業生中政治上反動的學生的處理的通知》和1964年2月10日中發(64)96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繼續處理高等學校中政治上反動的學生的通知》，至少在1963、1964年還在繼續反右。然而在實際上，進入文革後各地還在繼續大抓漏網右派和給已摘帽右派重新戴帽。所以自1957年一直到四人幫垮台的近二十年間，中共在持續不斷地用各種形式大抓右派。11

綜上所述，全國到底打了多少右派？比較集中的至少有四種說法，中共官方認定的五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七人、美籍中

中共中央關於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

國學者丁抒在《陽謀》中提出的一百三十多萬、197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彙編報告”提供的二百零一萬三千三百人以及2006年1月號香港《爭鳴》雜誌羅冰文章《反右運動檔案解密》中提出的三百十七萬八千四百七十人。

對於最後一組數字，恕再引用羅冰先生的一段原話：“1958年5月3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宣佈，反右鬥爭取得階段性勝利，定性為右派集團二萬二千零七十一個，右傾集團一萬七千四百三十三個；定為右派份子三百十七萬八千四百七十人，列為中右一百四十三萬七千五百六十二人；其中，黨員右派二十七萬八千九百三十二人，高等學校教職工右派份子一萬六千四百二十七人，高等學校學生右派二萬零四百四十五人，在運動中非正常死亡四千一百一十七人。”這一組數字經常有人引用，但亦有不少人提出質疑。

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這四組數字都有一定的依據，沒有必要去作分析比較，判定誰是誰非。然而對於這麼大的一場政治運動，打擊迫害了這麼多無辜的人。究竟劃了多少右派份子，中共官方始終噤若寒蟬，對於各種資料，既不肯定，也不否認。正如著名無黨派民主人士，劃為中右份子的張奚若教授指出的那樣，共產黨“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

### 右派人數應以知識份子總數為基礎

但是任何一組資料，都離不開當年知識份子總數這條底線。發表在2008年第七期《炎黃春秋》上的李銳文章《毛澤東與反右派鬥爭》一文指出：“當時界定的知識份子，包括大中專學校的教授、教師、作家，文學藝術界人士，新聞、出版界的編輯、記者、翻譯，科技界的科學家、研究人員，學者，理論工作者，工程技術人員，以及醫藥衛生界的醫生，專業人士和大學生等，全國約有五百萬人。”1956年周恩來在中央召開的知識份子問題會議上說，中小學教師以上的知識份子，約五百五十萬人。

由上可知，當年知識份子數量在五百萬至五百五十萬之間是可信的。1979—1980年右派大改正時官方統計出來的當年劃了五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七人雖經縮水，大致可靠，這個數字已佔當年知識份子總數的11%。然而該資料應當不包括中右份子、內控右派、擬右份子、漏網右派，工農中的壞份子，中等學校中的反動份子和反社會主義份子，也不包括受株連人員。如果把他們也統計進去，那麼後三組數字都是可信的，問題是每一組數字包括了哪一些人。此外，僅開除公職的右派配偶和家屬即達十六萬之眾。

### 現今尚有多少倖存者

香港《開放》雜誌總編輯金鐘先生經過分析統計，著文《關於右派的一項死亡統計》，發表在2007年6月號的《開放》。他說：“1957年被劃右派的數量尚無定論，官方宣稱的數字是五十五萬多人。五十年之後的今天，還有多少右派健在？死去的又有多少？”



最近，我們獲悉一個來自大陸內部未曾公開的數字。據說中共當局不久前作過調查統計，原右派份子，全國現有九千八百名，港澳臺四百二十名，歐美八十人。總共一萬另三百名。”

“換言之，五十五萬多名右派，五十年之後，尚健在者不到百分之二，九成八均已亡故，這個比例令人大吃一驚。”接著他進一步分析，如果當年全國右派平均年齡以三十歲計，至今已八十多歲，八十歲以上佔人口比例不到百分之十。至今又過去了十年，其間又有多少右派駕鶴西去！

自1957年反右開始至1976年文革結束，右派份

鳴放時的大字報

子因遭種種迫害而非正常死亡者，達六萬多人，包括槍斃處決、自殺、餓斃、批鬥毆打致死、勞改勞教中餓死虐待死。中國一代菁英，就此凋零了。

反右運動中第一個被槍決的右派是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生黨員黃宗奇。1958年春，以“現行反革命殺人罪”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最後一個槍決的右派是北京大學化學系學生張錫錕，1976年底粉碎“四人幫”文革結束後，以“企圖組織逃脫罪”，槍斃於四川北部的一個勞改農場。在文革中慘遭處決的尚有右派三大烈女，她們是北京大學中文系學生林昭、四川大學生物系學生馮元春、蘭州農校女教師毛應星。毛應星死後被追認為烈士。

在反右運動中自殺的第一人是中國人民保險總公司辦公室副主任俞彪文，1957年7月19日下午，於批鬥會間隙跳樓身亡。死後“追認”為“畏罪自殺的現行反革命右派份子”，時年才三十一歲。

### 右派年齡上不封頂 下不保底

中國最小的右派是十二歲未成年的“右童份子”張克錦，當時他正在四川省達縣上小學五年級；中國高齡百歲老右派已發現多人，其中有一位是寧夏回族自治區的吳德正大阿訇，他劃為右派份子時已經一百另七歲。另一位是佛教界的釋虛雲大師，他劃右派時年一百十八歲。百歲右派恐怕還有其人。

索爾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島》中所披露的蘇聯政治犯、思想犯的年齡介乎十四歲至八十歲之間。而中國右派份子的年齡，從十二歲至一百十八歲，整整跨越五、六代人的時空，中共開創了世界歷史的奇跡！

毛澤東把“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一人犯罪，滿門抄斬”的封建傳統帶進了中國共產黨內。反右運動中，出現了許多家屬右派。黃炎培全家出了七位右派；王伯祥一家六口右派；水梓一家六位右派。三代四代右派、夫妻右派、父子右派、母子右派、父女右派、母女右派、兄弟姊妹右派互相株連，比比皆是。

## 反右運動若干統計數據

### 一，全國

1957年小教以上知識份子總數：5500000多人；

官定右派總數：552877人；

包括內控右派、中右、反社份子總數：1300000人以上；

其中黨員 200000余人，行政13級以上高幹285案，省部級110人，29個集團性案件。

軍隊 30000餘人（含黨團員）。

民主黨派 9000多人，民盟5173人，佔民盟總數15.6%；上海民盟1500多人，劃右605人，佔1/3；

少數民族 5000多人，右派兼地方民族主義份子1500多人。

## 二，各省市自治區

北京市 人口401萬（1956年普查數，下同），右派127181人（包括中央機關、軍直總部、民主黨派中央）；

上海市 人口689萬，右派55000多人，佔官定右派總數1/10，上海人口佔全國1/80；

天津市 人口529萬人，右派5410人，中右8000多人；

四川省 人口7081萬，右派50279人，中右50000多人，各種反社、壞份子400000多人；餓死812萬，佔全省人口11%；

貴州省 人口670萬，右派6798人；

甘肅省 人口1255萬，右派54000多人，右派佔全國1/10；人口佔全國1/50；

陝西省 人口1803萬，右派7578人；

青海省 人口204萬，右派2594人；

廣東省 人口3593萬，右派36808人，其中右派兼地方主義份子1/3；

湖南省 人口4243萬，右派34352人；

湖北省 人口3603萬，右派42504人；

河南省 人口4840萬，右派78869人，佔全國官定右派總數15%，黨內右派23000人，佔全省右派15%；信陽地區右派8696人；

河北省 人口3670萬，右派29203人；

內蒙古自治區 人口610萬，右派4325人；

山西省 人口1586萬，右派10241人；

山東省 人口5373萬，右派34800人；

江蘇省 人口4182萬，右派13349人；

安徽省 人口3337萬，31472人，反社會主義份子7500多人；

浙江省 人口2503萬，右派13563人；中右7000多人；

福建省 人口1452萬，右派7200人；

江西省 人口1655萬，右派11416人；

遼寧省 人口2395萬，右派12500人；

吉林省 人口1248萬，右派10077人；

黑龍江 人口1478萬，右派1200人；

雲南省 人口1896萬，右派12500人；

廣西僮族自治區 人口2147萬，右派14740人；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人口422萬，右派2639人（包括民族地方主義分子）。

全國勞動教養右派150000餘人，占官方右派總數1/3-1/4。

### 三，高等學校及其他

當年全國大學生總數820000人，右派40000多人，中右40000多人，占大學生總數11%。

北京大學8000多人，右派716人，中右700多人，大學生總數15%強；物理系右派學生155人，占學右派總數9%；教職員工3%；槍斃9人(一人死緩于獄中)。

清華大學 右派學生571人；

西南師範學院大學生4000多人，右派800多人，佔學生總數18%；

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 師生右派157人，佔全院總數16%，其中學員12%，講師以上37%；

上海交大大學生4000多人，右派330人，佔學生總數7%；

北京地質學院大學生8000多人，右派407人，中右400多人，佔學生總數10%；

蘭州大學 師生右派195人，佔全校人數8.1%；學生右派127人，佔學生7.01%；

山東大學 右派149人；

華東師範大學 右派285人；

廣東師範學院右派216人；

武漢大學 右派430人；

吉林師範大學 右派700多人；

東北財經大學 右派126人；

中山大學 右派193人；

山西大學 右派157人；

重慶建築工學院 右派119人；



同濟大學黨委書記薛尚實以下2/3黨委委員劃右派；

四川省五八屆高中畢業生10000多人，劃三、四類(右、中右)3200人，佔畢業生總數1/3；  
成都市高中畢業生2657人，三、四類585人，佔22%；

上海電力專科學校(中專) 37名右派，未成年學生12人，3人自殺。

#### 四，右派年齡

全國最小右派：四川達縣十二歲小學五年級生張克錦(1946-)，勞動教養7年；

全國最老右派：1，寧夏吳德正大阿訇(1851-1959)，劃右時107歲；2，江西永修真如寺住持釋虛雲大師(1840-1959)，劃右時118歲。

## 目 錄

### 第一章 死難烈士 永垂不朽

綜述 神州多壯士 瀝血殉中華

#### 第一節 四大右派反革命集團案

中國馬列主義同盟

中國共產主義聯盟

煽動知青返城 企圖偷越國境

《星火》右派反革命集團

#### 第二節 三大抗暴女英雄

林 昭 他日若有凌雲志 敢笑黃巢不丈夫

馮元春 最早批毛的巾幗英雄

毛應星 死後追認為烈士

#### 第三節 反右運動中的五起小匈牙利事件

震驚中外的漢陽一中小匈牙利事件

毛澤東欽定的“兩仙”小匈牙利事件

轟動全國的上海動力學校大案

成都二師小匈牙利事件

#### 第四節 慘遭處決的右派

黃宗奇 遭誣陷的反革命殺人犯

劉文輝 血祭文革第一人

蔡鐵根 從老紅軍到死囚犯

沈 元 北大才子的最後日子

周居正 共產黨槍斃紅岩英雄

張錫琨 文革後被槍斃的右派

陳學詩 槍斃的志願軍偵察排長

柳 湜 獄中“殺人”的教育部長

朱守中 槍決的革命烈士

吳紀仁 獄中逼瘋的大學講師

顧文選 引渡回國 慘遭殺害  
遇羅克 因為他的父母是右派  
蕭也牧 打死在五七幹校的名作家  
黃嘉音 他在監獄里“蓄意殺人”  
劉奇弟 屈死的劉奇弟

## 第二章 抗暴自殺 雖死猶榮

綜述 勁松禦霜雪 寧折枝不彎  
俞彪文 三代親共 三代蒙冤  
石 揮 一代巨星的隕落  
傅 雷 民不畏死 奈何以死懼之  
黃紹竑 新賬舊賬一起算  
佟惠林 被革命吃掉的子弟兵  
丘 原 抗暴的巴蜀才子  
藍 珏 以生命維護做人的尊嚴  
安立綏 起義將領的命運  
向 達 慢性折磨而死的土家族學者  
李宗津 藝術大師的絕路  
石 盤 敢於退黨的馬列主義哲學教授  
賀永增 告密文化的犧牲品  
丁則良 楊振寧的家教老師  
徐季正 慘死在勞教場  
董時光 在饑餓中吃飽撐死  
黃啟風 一對苦人兒夫妻之死  
李春潮 莫須有的胡風集團骨幹分子  
胡思杜 胡適的叛逆兒子  
李長恭 同人辦報中圈套  
葉紹林 生命中的另一種壯烈  
陳 賁 慘死在戈壁灘的總地質師  
敖乃松 殉情的情聖  
蔡克誠 蒙辱自殺的總編輯

## 第三章 勞動改造與勞動教養

綜述 中國古拉格  
徐洪慈 成功沖出勞改營  
林 方 一顆真誠善良的心  
張強華 敢於把牢底坐穿  
王軼生 從棺材裏爬出來的人  
王鐵生自述 復活  
徐則文 社會邊緣人

林其鑾 歸僑夢的破滅  
 鐵 流 此案不雪 死不瞑目  
 蔣文揚 讀報讀出個右派分子  
 和鳳鳴 催人淚下的女右派  
 陸清福 他的苦難和執著  
 紀 由 鏗而不捨的維權先鋒  
 李泰倫 無辜勞教十九年  
 周惠南 周指南 夾邊溝的右派兄弟  
 尹福生 臨終前的夙願  
 楊少西 高幹子弟中的叛逆者  
 李才義 李鴻章的侄子是右派  
 沈秉強 從左派到極右派  
 李衍德 蘇州園林專家  
 何之光 妒嫉文化 禍起蕭牆  
 周志勳 一個沒有右派言論的右派分子自述  
 吳中琪 一個學生右派的自述  
 劉 武 棄如便屨的最可愛的人  
 仇艮山 三叩鬼門關  
 陳宣人 祖孫三代的乖戾命運  
 李文書 長壽湖逃亡記  
 楊 平 死囚逃生記  
 管正和 父子右派  
 劉振遠 年輕右派小醫生  
 郭振乾 夾邊溝倖存者  
 曹家同 煤窯勞改犯

#### 第四章 中國共產黨

綜述 清黨是反右運動的終極目標

##### 第一節 中共黨內十大省部級右派反黨集團

- 一, 以浙江省長沙文漢為首的沙、楊、彭、孫地方主義、宗派主義右派反黨集團
- 二, 以安徽省委書記李世農為首的李、楊、李、陳右派反黨集團
- 三, 以甘肅省副省長、省委常委孫殿才為首的孫、梁、陳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
- 四, 雲南省委常委、省委組織部長鄭敦、副部長王鏡如右派反黨集團
- 五, 廣西僮族自治區副主席、區黨委常委陳再勵為首的陳王駱王廖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
- 六, 以青海省長、省委第二書記孫作賓(極右分子)為首的青海省委右派反黨集團
- 七, 河北省委常委劉洪濤右派反黨集團
- 八, 以司法部常務副部長、黨組書記王翰為首的司法界右派反黨集團
- 九, 遼寧省委書記王錚、省委書記兼省長杜者衡為首的遼寧省右派反黨集團
- 十, 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

## 第二节 地方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

綜述 香火趕出和尚

### 第一節 地方主義分子

逢荊 海外赤子淪為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頭目

陳恩 陳恩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

歐 新 歐新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

陳 華 陳華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

古大存 廣東地方主義魁首

黃 榮 廣西地方主義黑後臺

王定等 廣東省劃為地方主義右派的幹部

益希朋措(藏族) 現行反革命右派分子

杜 圭(土家族) 在夾邊溝勞教的西藏軍區軍官

麥君素 生拉硬扯的地方主義分子

## 第二節 關於反地方民族主義分子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熱賽拉夫、常委伊敏諾夫為首的地方民族主義反黨集團

中共中央統戰部關於地方民族主義分子摘帽問題的指示

中共中央統戰部關於反地方民族主義鬥爭及其擴大化的說明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反右及反地方民族主義運動簡介

## 第三節 中共黨內右派分子

毛特夫 毛澤東宗親難逃陽謀

朱鎔基 朱鎔基的右派檔案

周 克 組織部長是右派

駱 明 廣西地方主義右派頭目

陳修良 中共三大紅色女諜之一

胡蘭畦 當代中國傳奇女傑

謝雪紅 從童養媳到二二八起義領袖

王 蒙 當初做官太傻太天真

白 石 從囚徒到省委書記

昌 滄 耀邦同志送別右派

劉賓雁 中國的良心

王若望 豁出老命的王若望

關維智 中共甘肅省委裏的第一位右派

李慎之 不願在刺刀下做官的人

顧 准 當代中國的普羅米修士

許良英 堅守知識份子良知

王季洪 新梁祝哀史

鐘惦斐 敲響電影鑼鼓的人  
張文澄 黨內民主犧牲品  
黃一龍 李井泉一言堂犧牲品  
杜 光 中央黨校裏的反右  
謝和賡 他和王瑩都是中共特別黨員  
楊延修 中共戰略特工  
嚴希純 接管和創辦中國科學院的人  
胡顯中 為胡風辯護的地下黨員  
譚顯殷 團派右派何其多  
賀惠君 四川學運領導者  
葉公琦 從右派到上海副市長  
陳緒宗 為妻子鳴冤叫屈的部長  
牟宜之 有功豈必書之碑  
王 定 中國首創“包產到戶”的縣委書記之一  
李雲河 中國首創“包產到戶”的縣委書記之二  
黃 源 中陽謀圈套的魯迅戰友和學生  
陳仁剛 毛澤東緊急剎車前的幸運兒  
陳炳南 究竟是改正還是平反？

### 三位大學黨委書記

袁永熙(清華) 學運先驅  
薛尚實(同濟) 地下黨裏右派多  
陳子谷(地質) 富貴於我如浮雲

### 黨內內控右派

項 南 改革開放急先鋒  
艾思奇 大眾哲學家

## 第五章 中國人民解放軍

綜述 鋼鐵長城並非牢不可破

陳 沂 左派將軍當右派  
范 明 六多將軍  
劉宗寬 代劉伯承受過的中將  
郭汝瑰 蔣介石身邊的中共臥底  
邵喜德 全國特級戰鬥英雄右派  
楊應森 革命吃掉自己的子弟兵  
沈力成 海軍反右受害者  
李 凌 空軍右派的泣血控訴  
彭荊風 昆明軍區裏的右派

聶毓禪 白衣天使  
張先癡 張先癡不癡  
白樺等六人 總政創作室裏的右派集體  
歐陽靜戈 軍隊右派的右派之家  
張述祖 中國軍工專家  
郭堡右派群體  
許慰萱 軍內另類右派  
朱席齋 因日記罹難的新四軍幹部

## 第六章 宗教界和少數民族

綜述 宗教界和少數民族在劫難逃

### 第一節 宗教界

劉齡九等五人 令基督教徒自己揪右派  
蘇潤生等八人 至高無上的梵蒂岡  
趙振亞 上帝高於一切的主教  
聶國屏 天主教大右派  
李景沆 夾邊溝虔誠的基督教徒  
澍培法師 佛門先賢  
馬震武(回) 受騙上當的世襲教主  
陳崇桂 愛國牧師 父子右派  
劉良模 他充當中共控制基督教的工具  
牛次封 牛次封居士的右派改造計劃  
定持法師 偷渡和尚

### 第一節 第一屆全國人大中的少數民族三大右派

馬松亭(回) 伊斯蘭教領袖  
歐百川(苗) 八一名將  
黃現璠(僮) 毋須揚鞭自奮蹄

### 第二節 少數民族右派

龍 雲(彝) 龍雲反蘇打入另冊  
蕭 乾(蒙) 郭沫若恨之入骨的文學大師  
魏啟功(滿) 皇族貴胄  
何 遲(滿) 相聲作家的悲劇  
馬三立(回) 相聲泰斗  
文徹赫恩(蒙) 滿族勇士  
馬少參(回) 回族科長中陽謀  
博繩武(蒙) 一個蒙族小右派渣兒的自述

## 第七章 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黨派

綜述 埋伏在民主黨派中的第五縱隊

章伯鈞 章伯鈞和劉少奇

羅隆基 書生從政

彭文應 要記住這個朋友

儲安平 “黨天下”的生死之謎

陳仁炳 他鬱鬱而終

冒舒湮 身陷拔舌地獄的京華名士

費孝通 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

陳新桂 右派理論家

章乃器 章乃器乃真君子

王造時 王造時反蘇真相

尚 丁 青海勞教死裏逃生

譚惕吾 反黨女先鋒

張 軫 黨外省長是擺設

李康年 不給定息給手銬

曾昭掄 章羅聯盟教育界代理人

張申府 周恩來入黨介紹人

何鳴鈞 反革命右派

畢鳴岐 工商界愛國名士

劉王立明 母子入甕

葛佩琦 他含冤九泉

馬寅初 馬寅初寧折不彎

康心如 工商鉅子康心如

黃藥眠 章羅聯盟參謀長

葉篤義 幾度沉浮葉篤義

陳銘樞 陳銘樞上書毛澤東

黃琪翔 北伐名將

馮欽哉 抗日名將

錢端升 主張司法獨立

羅翼群 追隨中山先生的民國元老

葉恭綽 民國元老和交大創始人

吳紹澍 中共如何對待親共國府官員

金志軒 赤膽忠心反被咬

羅忠信 他悔恨追隨共產黨

張奚若 周恩來赦免了他

## 第八章 科技教育界

綜述 海歸派的命運——三錢的故事

## 第一節 科學技術界

潘光旦 從三S到四S的一生  
吳景超 被世人淡忘的清華才子  
謝家榮 誰發現了大慶油田  
李溫平 修建滇緬公路的抗戰英雄  
李宗恩 一代醫學宗師  
陳占祥 首都規劃生死之爭  
華攬洪 晚年避居法國的建築大師  
任震英 中國規劃設計大師第一人  
傅作恭 他餓死在夾邊溝  
盧蒞蘭 右派母親  
馮秉偉 馮秉偉含辱歸天  
宋家模 共產黨以怨報德  
丁惠康 愛國醫學家 文物捐獻家  
蔣綏敏 戈壁灘上的政治賤民  
梅汝璈 中國第一大法官  
張思之 中國維權第一大律師  
梁文茜 梁實秋先生長女  
凌其翰 起義外交官的悲劇  
卓齊賢 落花流水春去也  
袁隆平 中國米神  
束星北 中國愛因斯坦  
常隆慶 攀枝花之父  
沈福彭 偉大奉獻的人體解剖學家  
湯仲明 中國愛迪  
瓜 匠 無名瓜匠

## 第二節 教育界

黃萬里 江河無情人有情  
雷海宗 右派史學教授  
徐仲年 老外幫他摘帽  
傅 鷹 毛澤東親自樹立的中右分子樣板  
孫大雨 六年冤獄  
張若名 周恩來初戀情人  
馮友蘭 是是非非馮友蘭  
龐熏栞 中國現代工藝美術教育奠基人  
巫寧坤 四海為家一滴淚



曹漢奇 替人頂罪的右派  
江豐 金冶 中央美術學院的右派反黨集團  
仇煥之 趙琦 吳明永 浙江美院三個冤魂  
錢基博 錢鐘書父親之死  
董守義 中國藍球之父  
陳楨祥 陳獨秀孫女因爺爺獲罪  
陳秋實 自投羅網的右派群體  
馮希勃 將門子孫 三代右派  
李淑嫻 自己入甕的右派  
陳碧笙 福州紅色店員總工會創始人  
陳振海 中國經濟學教育奠基人  
陳孝禪 死不抵頭的心理教育家  
蘇北海 新疆奇人蘇北海  
楊世元 毒草追查記  
葉光庭 逼上梁山  
徐璋本 清華園裏的現行反革命教授  
許 傑 天真無邪的世紀同齡教授  
鮑文蔚 中共忠實信徒的悲慘下場  
董每戡 親共右派教授  
水 梓 教育世家 右派世家  
張岱年 改正後加入中共的國學大師  
穆木天 敢於摸天的硬骨頭  
傅種孫 諤諤一士傅種孫  
陳承融 二次戴帽始末  
陳承融自述 青海頭 自古白骨無人收  
陸侃如 馮沅君 右派夫妻 校長教授(山大)  
陳時偉 左宗杞 右派夫妻 校長教授(蘭大)  
第三節 告密文化的犧牲品  
黃苗子 百歲老人的困惑  
馮亦代 無意憐芳草 人間重晚晴  
龍榆生 無間道國學家  
譚金水 神秘的臥底

## 第九章 文化藝術和新聞出版界

綜述 文藝和新聞是陽謀的重災區

### 第一节 文化藝術

馮雪峯 魯迅的親密戰友  
丁玲 陳企霞 莫須有的丁陳反黨集團

艾 青 丁陳反黨集團的詩人  
姚雪垠 毛澤東給他開綠燈  
吳祖光 吳祖光的小家族集團  
施蟄存 中國現代小說奠基人  
陳歌辛 他倒在白茅嶺勞改農場  
方 化 鬼子王方化  
項 堃 他在晚年加入中共  
許還山 表演藝術家  
郭允泰 中共培養的第一代電影演員  
吳 茵 東方第一老太婆  
房珊 張谷鳴 兒子眼中的右派父母  
姚水娟 越劇皇后  
梅 娘 淒苦的沒娘孩子  
葉盛蘭 京劇名伶葉氏三兄弟  
李萬春 原來孫悟空是個右派  
杜 高 一份出現在舊貨攤上的右派檔案  
謝梅奴 海內篆刻王神  
沈 默 為一幅漫畫罹難二十年  
丁 聰 美術界反黨頭目  
流沙河 《草木篇》風波  
劉紹棠 神童作家  
高曉聲 苦瓜兒作家  
董樂山 硬骨頭翻譯家  
陳學昭 文如男性的女作家  
鄧友梅 當代名家鄧友梅  
藍 翎 毛澤東捧出來的紅學家  
張賢亮 未死已知萬事空  
張酒公 留美生張酒公  
俞潤泉 悲慘的美術家  
高爾泰 美學家高爾泰  
秦兆陽 屢犯禁區的作家  
梅汝愷 波蘭文藝金質獎章獲得者  
李青萍 歸僑女畫家  
古子文 民間作家古子文  
舒 蕪 反胡風立功 反右派載罪  
張 權 土洋之爭受害者  
劉海粟 劉海粟與江青  
劉雪庵 苦難的樂章

### 第三節 新聞出版界

徐鑄成 徐鑄成戴帽真相  
戴 煌 九死一生話戴煌  
嚴怪愚 嚴怪愚的愚忠  
劉時平 反蔣英雄劉時平  
陸 詒 戰地記者中槍落馬  
朱啟平 二戰名記  
戈 揚 紅衣少女戈揚  
陸 鏗 不畏強暴的陸鏗  
浦熙修 能幹的女將  
章錫琛 開明書店創辦人  
殷 毅 一篇《迎春花》厄運二十年  
梅朶 姚芳藻 一對右派記者  
顧執中 老報人中計記  
彭子岡 中國新聞界三大女劍客之一  
陳銘德 鄧季惺 直立行走的夫妻  
黃雨川 民運先驅  
袁毓明 大公報四名總字型大小右派  
提鐘政 多才多藝的藝術家  
歐陽榕 我的煉獄  
汪 崗 一腔悲憤向誰說  
陳 模 胡耀邦賞識的總編輯  
陳 鈞 拒不檢討的總編輯  
祖丁遠 丹青難寫是精神  
曹德謙 早期海歸派的悲慘下場  
劉 冰 將門之後 不屈鬥士

## 第十章 大中小學生及公務員

綜述 誰奪走了他們的青春？

### 第一節 中小學生右派

張克錦（十二歲的右童分子）和李曰垓（十五歲的右童分子）  
佟信順（十六歲的右童分子）

### 第二節 大學生右派

林希翎 最後一位不予改正的終身右派  
沈澤宜 永遠《是時候了》

陳奉孝 學生右派的罪首  
吳弘達 終身獻給”勞改”事業  
馮國將 寧為玉碎 不為瓦全  
黨治國 黨治國反對一黨治國  
李蘊暉 一艘孤獨的帆船  
葉國榮 越南僑生葉國榮  
岑超南 一張大字報粉碎科學家夢  
張成覺 勤奮筆耕的張成覺  
李天德 乖戾的命運  
張德寰 清華化工奇才  
趙乃剛 吃蟹不忘育蟹人  
閻桂勳 平白蒙冤四十二年  
宋林松 北大“最幸運”的學生右派  
張效政 改正後入黨的北大物理系學生  
唐柱國 從極右分子到蔣經國秘書  
施建偉 以良知挑戰世俗諱言  
張景奎 校園反右雜記  
陶增烈 吞蠅自殺未如願  
燕遯符 走在維權索布路上不回頭  
沈志庸 復員軍人大學生的遭遇  
紀增善 長夜過春時  
俞慶水 顛沛流離的道路  
孫傳儀 在勞改中抵制選舉  
王書瑤 高度集權的批判者

### 第三節 公務員

劉博民 海外關係——湊數右派的唯一罪狀  
馬文蔚 不識廬山真面目  
崔玉振 左右之間一字之差  
任 眾 可笑的右派改正結論  
高尚斌 只因為他撞見領導搞破鞋  
王關仁 改正後的邊緣人群  
陸良敏 原來他是陳布雷親外甥  
方慶餘 文盲右派  
陳衛華 半文盲右派  
盛明華 勇鬥色魔的女右派  
張景影 小小打字員  
孔令朋 孔子後裔也會上當  
陳世楨 蘭州市建委的第一位右派

雲逢鶴 海南島上的右派

## 第十一章 施害者別傳

鄧小平與彭真 劊子手和法官角色錯位

柯慶施和李井泉 毛澤東在反右運動中的哼哈二將

周揚 文藝沙皇的悲劇

## 第十二章 右派心理學

附錄：參考資料和文獻

# 第一章 死難烈士 永垂不朽

## 綜述 神州多壯士 瀝血殉中華

### 慘遭處決的右派份子

林昭在接到死刑判決書以後，割破自己的血管，沾血書寫絕筆《歷史將宣告我無罪》。她寫道：

將這一滴血注入祖國的血液裏；

將這一滴血向摯愛的自由獻祭；

揩吧，擦吧，抹吧，這是血呢！

殉難者的血漬，誰能抹得去？

你知道嗎？在1957年劃為右派的知識精英中，有多少個像林昭一樣鐵骨錚錚、巍巍其人的壯士，仰首挺胸面對劊子手的屠刀，慷慨就義，把鮮血酒在神州大地上？

### 集團性的處決

遭中共處決的壯士中，有林昭、馮元春、毛應星三位巾幗英雄；有四大“右派反革命集團案”中壯烈犧牲的烈士；還有更多的無名英雄。四大右派反革命集團是：

一，四川四一五勞教支隊“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案，黨內右派周居正和軍內右派楊應森中尉英勇就義；中共黨員魏昭、陳仲偉、廖廉康等十七人分別判處死緩、無期徒刑；十四人判十年至二十年有期；另有四十六名案犯另行判決，他們全部都是右派份子。

二，大同“中國共產主義者聯盟”案，首犯徐關增、王汝強，主犯任大熊、劉世廣、曹介弘都是北京各高等學校的大學生右派，首犯、主犯十三人都遭槍決，另有二十三人處以死緩、無期、有期徒刑等各種刑期。

三，南京“煽動知青返城，企圖叛國投敵”案，遭槍決的主犯陸魯山、王桐竹、姚祖彝、孫本喬都是極右份子，在一打三反運動中以莫須有罪名慘遭槍決。

四，蘭州“星火右派反革命集團”案，蘭州大學右派學生張春元等串聯林昭出版地下刊物《星火》雜誌。僅出一期，第二期尚未出版，即遭破獲。張春元和涉案的中共縣委書記林映華、蘭州大學歷史系教授張師亮同被槍決。幾十名涉案右派學生被判重刑。

### 部分處決右派烈士名錄

被中共處決的部分右派烈士名單、他們的就義日期、處決原因，大致排列如下：

1．黃宗奇（?-1958），某些文章把他的名字又寫作黃申奇、黃宗義。北京大學哲學系調幹生，湖北省蘄春縣人，貧雇農出身，1948年參加革命並加入共產黨。在批判監禁中欲跳窗自殺，掙扎中誤傷看守他的學生。判為反革命殺人犯槍決。

2．陳學詩（1935-1959），志願軍偵察排長，劃右後勞教中，因饑餓偷食幹部食堂糧食打傷警衛，判處反革命殺人犯遭槍決。

3．張雨沛（?-1961），雲南政法大學畢業，劃右時為甘肅省檢察院幹部，劃右後送往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作順口溜“祁連山戴帽，勞教人員睡覺，苦難生活何時了，問誰誰也不知道”。同場勞教的右派積極份子欲告密，被他用鐵鏟打傷。他逃到酒泉，在酒泉汽車站被捕回，未經審判便遭槍決。

4．王格（?-1961），東北工學院冶金系講師，劃為右派後送往遼寧省凌原新生焦化廠勞動教養。他不服，多次書寫報告要求平反，但全部被勞教隊沒收，不予理睬。他極為不滿，一次在火車來拉焦炭時，他沖向火車頭自殺，表示抗議，不料僅軋去一條腿。勞教隊不予治療，批鬥只剩下一條腿的王格抗拒改造、畏罪自殺。王格不服抗辯道：“鳴放是毛主席號召的，我聽毛主席的話難道還有罪嗎？”不久勞教隊把他和其他三個犯人一起槍斃了。

5．周居正（1930-1964），中共地下黨員，紅岩英雄，劃為右派後在四川省公安廳四一五築路支隊勞教，被一名同隊勞教的姚姓右派告密，稱勞教的右派成立“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周居正和楊應森為主犯，他們於1964年3月遭槍決。

6．楊應森（1931-1964），瀘州步兵學校中尉教官，參加過抗美援朝，在瀘州步校劃為右派，開除黨籍軍籍，送四一五築路支隊勞教，與周居正同案判處死刑，於1964年3月槍決。

7．朱光瀾（?-1966），女，廣西博白縣縣中教師，與丈夫周信喬一起劃為右派，下放農村勞動。1966年文革開始後，廣西博白縣那卜公社金因大隊中共黨支部書記以批鬥五類份子（地、富、反、壞、右）和牛鬼蛇神的名義，命令不明真相農民用木棍、鋤頭將朱、週二位先行痛打，然後宣佈槍斃。

8．周信喬（?-1966）廣西博白縣縣中教師，與妻子朱光瀾一起劃為右派，又一起下放農村勞動。兩人一起在文革初期遭人痛打後槍斃。

9．劉文輝（1937-1967），上海市工人，在滬東造船廠因寫一張批評廠長大字報而劃為右派，開除團籍。文革開始，寫出長文批判“十六條”和毛澤東。在萬人公判大會後槍決。

10．林昭（1932-1968）女，北大新聞系學生，1957年在北大劃右後堅持不斷地批判毛澤

東、批判中共，多次判刑，在獄中繼續攻擊無產階級專政和文革，幡依基督教。在上海提蘭橋監獄服刑時遭槍決。

11．張春元（1932-1968），蘭州大學歷史系學生，入學前曾是志願軍坦克手、神槍手。在蘭州大學劃右後，繼續和林昭辦《星火》地下刊物。在文革中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誣以“密謀暴動越獄”罪被槍決。與張春元同時遭槍決的還有蘭州大學歷史系教授張師亮，他同情林昭 and 張春元辦的《星火》，為彭德懷鳴不平。批判毛澤東的“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反動歷史觀。同時槍斃的尚有中共甘肅省武山縣委副書記、地下黨員杜映華，誣告他和張春元一起在武山縣密謀組織“暴動越獄”。

12．林映華（?-1968），蘭州大學學生右派，發配農場勞動，參與張春元等右派同學舉辦的《星火》雜誌編輯工作，於1960年9月30日被捕，以“反革命”罪判刑五年，在收押重刑犯的甘肅省第三監獄服刑。刑滿後不得返回社會，留在第三監獄當工人，與犯人的唯一區別是有一定外出自由。1968年，甘肅省“革命委員會”誣指他與同案犯張春元“密謀暴動越獄”，為張傳遞消息，兩人均判死刑，立即執行。

13．沈元（1938-1970）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生，才華出眾。1957年劃右後分配至中科院歷史研究所，寫出大量震撼學術界的論文。1966年文革初期受到紅衛兵衝擊，掃地出門，無處居住。避入外國使館要求避難。被捕後在“一打三反”運動中以“叛國投敵”罪遭處決。

14．顧文選（1934-1970）北京大學西語系學生，肅反和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時均遭關押，嚴刑拷打。鳴放時組織控訴會，為此劃為右派。劃右後不服，逃回杭州母親家，抓回北京判五年徒刑，刑滿留場就業。文革開始又受衝擊，逃至蘇聯，被引渡回國，按上“惡攻罪”和“叛國投敵”二頂帽子，在一打三反高潮中與沈元、遇羅克一同槍決，同時宣判的有五十五人。

15．徐關增（1938-1970）浙江新昌人，學生右派，地主出身。1960年組織“中國社會主義自由民主黨”，判死刑，緩期執行。1962年改判無期徒刑。後誣為“中國共產主義聯盟”首犯，在“一打三反”中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同案二十三人，有十三人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16．王汝強（1932-1970）學生右派，曾因組織反革命集團判處十五年徒刑。與徐關增一起成為“中國共產主義聯盟”首犯，在“一打三反”中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17．任大熊（1932-1970）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助教，在校時劃為極右份子，“中國共產主義聯盟”主犯，在“一打三反”中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18．劉世廣（1934-1970）清華大學學生，極右份子，“中國共產主義聯盟”主犯，在“一打三反”中判死刑，立即執行。

19．曹介弘（1939-1970）北京鋼鐵學院（現北京科技大學）採礦工程系學生右派，“中國共產主義聯盟”主犯，在“一打三反”運動中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20．馮元春（1930-1970）女，四川大學生物系學生，極右份子，在1957年公開批判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和一黨專政。她貼出海報，二次對學生、市民和郊區農民演講，聽眾達數萬人。在獄中不服改造，繼續批判毛澤東，在“一打三反”運動中判處死刑，壯烈犧牲。

21. 毛應星 ( 1925-1970 ) 女，福建閩侯人，甘肅農校教師，極右份子。夾邊溝勞教四年。摘帽後下放寧靜縣農牧站。1970年4月14日因反林彪個人迷信，以“惡攻罪”判處死刑，槍決於寧靜縣城西八里橋。1981年民政部追認為烈士。

22. 蔡鐵根 ( 1911-1970 )，1936年12月參加工農紅軍，1939年加入中共。中共建國後授大校軍銜，行政十一級。曾任解放軍訓練總監部條令局副局長( 劉伯承為部長 蕭克副部長 )、南京最高軍事學院作戰訓練部長。1958年在批判資產階級軍事路線中劃為右派。開除黨籍、軍籍，貶至常州市工業局。文革中受人誣告，打為現行反革命份子。於1970年7月31日槍決。

23. 陸魯山 ( ?-1970 ) 北京農機學院學生右派，在“一打三反”運動中以“煽動知青返城，企圖偷越國境”罪判處死刑。

24. 王桐竹 ( ?-1970 ) 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俄文翻譯，右派。在“一打三反”運動中，以“煽動知青返城，企圖偷越國境”罪判處死刑。

25. 姚祖彝 ( ?-1970 ) 外貿部英文翻譯，劃右後判處勞動教養。1964年解除勞教。在“一打三反”運動中，以“煽動知青返城，企圖偷越國境”罪判處死刑。

26. 孫本喬 ( ?-1970 ) 北京工業大學學生右派。在“一打三反”運動中以“煽動知青返城，企圖偷越國境”罪判處死刑。

以上四人屬於四大右派反革命案之一的“煽動知青返城，企圖偷越國境”案。

27. 張九龍 ( ?-1970 ) 西北航空學院 ( 今西北工業大學 ) 學生右派，在“一打三反”運動中被槍決。

28. 蔣養毅 ( ?-1968 )，湖南長沙小學教師右派，劃右後判處勞動教養五年，1966年文革開始遣送回原籍湖南省道縣。湖南零陵地區道縣造反派成立“貧下中農最高法院”，二個月內濫殺地、富、反、壞、右五類份子四千二百九十三人。蔣養毅被人用扁擔活活打死。劊子手說：“他們家裏的老人和嬰兒悉數處死，靡有子遺。”

29. 馬雲鳳 ( ?-1969 ) 北京航空學院 ( 今中國航太航空大學 ) 學生右派，曾任中共學生黨支部書記。他早於1956年蘇聯出兵鎮壓匈牙利起義時，便張貼標語“反對蘇聯出兵匈牙利！”、“蘇軍滾出匈牙利！”。當時馬雲鳳的反蘇言行震動了毛澤東。毛談起馬雲鳳時說，馬雲鳳“有反動的思想，這個人後來開除了黨籍。但是還留他在那裏讀書。”反右時劃為極右，開除黨籍，被捕入獄。文革中遭槍決。

30. 張錫琨 ( 1934-1976 )，出身於四川貧困家庭。北京大學化工系學生。1957年整風時貼出“衛道者邏輯大綱”，打成右派遣送團河農場勞動教養。1969年又被送回原籍。他在勞動教養中還關心國家大事，1976年10月四人幫已經粉碎，他反而倒以“試圖組織反抗，逃離勞教農場”的罪名遭槍決。至今沒有平反。他是唯一一位在文革後遭槍決的右派。

31. 劉鳳翔 ( ?-1970 )，湖南農民報編委，1957年劃為右派，送酒泉夾邊溝勞動教養，1970年4月4日以“反革命集團”罪處死。1985年《湖南日報》為他平反說：“他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事業，為人忠誠耿直，是一位好幹部。過去強加於他的不實之詞，應予以徹底否定。



鑒於劉鳳翔同志1970年4月被處死刑，1984年11月，經省高級人民法院復查，決定撤銷原判，宣告劉鳳翔無罪。”其善後問題僅按死亡職工對待。

32．朱守中（?-1970），1943年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政治經濟系，1950年2月加入中共，1958年在寧夏打成右派，開除黨籍和公職，下放勞動。在文革中朱守中認為“劉少奇是政治家和優秀的共產黨員”、“林彪和江青有野心”、“林彪作為接班人寫進中共九大黨章，不符合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原則”、“教育革命不能光念《毛主席語錄》”、“大中學校的專業課、基礎課不可缺少”……1969年11月，因上述言論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1970年2月11日在寧夏遭槍決。

33．朱希（?-1970），1938年入黨的中共資深黨員，1957年劃為右派。文革中因批判林彪而打成現行反革命份子，備受拷打折磨，秘密判處死刑。因林彪叛逃，死刑來不及執行。1979年右派改正時，在檔案中發現死刑的判決，但無任何改正平反的文字材料。

判處死刑沒有執行的，此外尚有黨治國（1936-2008）、馮國將（1928-）、徐洪慈（1932-2008），此三人均已判死刑，但來不及執行。

34．刑松勁（?-1966），1937年在北京大學西語系當講師，1949年調至北京國際書店工作。1957年劃為極右份子，送茶澱勞教農場勞動教養。文革開始調京郊團河勞教農場繼續勞教。因怒罵江青，判以“惡攻罪”被處決。

35．儲安平（1909-1966），出身宜興望族，與羅隆基有師生之誼，創辦《觀察》雜誌。曾擔任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和宣傳部長。1957年提出“黨天下”，被迫辭去才當了二個月的《光明日報》總編輯，劃為右派。1966年文革開始，在紅衛兵掃四舊、抄家、打砸搶高潮中反復抄家，被毆至奄奄一息，紅衛兵將他架走後下落不明。他的死因有說給紅衛兵活活打死，有滔海而亡等。

36．張海輝（1927-1970）《湖南農民報》編委，中共黨員，1957年劃右，翌年按右派三類處理，降職降薪，開除黨籍，在文革“一打三反”中以“惡攻罪”遭槍決。

37．柳湜（1903-1968）湖南長沙人，中共烈士柳直荀（毛澤東《蝶戀花》中‘我失驕楊君失柳’即指他）之弟，1928年加入中共。1957年反右時擔任教育部副部長，被康生誣陷劃為右派，開除黨籍。1968年在“清理階級隊伍”中突然給人抓走，殘酷毆打，逼他承認叛徒。直至打死，他都沒有承認。

38．黃嘉音（1913-1961）文匯報副刊主編，劃右後關押在青海的一座監獄，受刑事犯欺侮，他奮起反抗。獄方誣陷他“蓄意殺人”，將他槍斃。

39．黃繼亮（?-1966）河南滑縣會計，其弟黃繼忠在北大任教師，在單位裏對人說“我弟弟一向努力工作，他怎麼會是右派？”替右派弟弟鳴不平，黃繼忠也劃為右派，勞動教養三年。結束教養送回原籍江西吉安種田。文革開始，五類份子都是國民黨殘渣餘孽，他被抓到公社嚴刑拷打，被造反派活活打死。

40．王建國（?-1957）湖北省漢陽縣一中副校長，1957年6月12日該校學生因對升學政策

不滿而罷課，遊行示威，衝擊中共縣委、縣政府。當局立即宣佈為“反革命暴亂事件”，替右派份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助威壯膽，立即逮捕幾十名反革命右派份子。判處副教導主任楊松濤等四人有期徒刑。其中“幕後黑手”副校長王建國和教師鐘毓文、民盟成員楊煥堯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十八年後平反，已無文字記載。

41. 鐘毓文（?-1957）漢陽一中語文教學組組長。

42. 楊煥堯（?-1957）漢陽文化館圖書館管理員，民盟成員。

43. 陳民國（1930-1966），原四川鹽務管理局幹部，劃右後在四一五築路隊勞動教養，涉“中國馬列主義者同盟”案判十五年徒刑。不服改造，不讀《毛主席語錄》，在煙紙上亂塗亂寫。文革開始被琪縣“無產階級專政組”亂棒打死。

44. 傅汝舟（1928-1968）原四川城市規劃設計院工程師，劃右後送四一五築路隊一〇一支隊勞動教養。涉“馬盟”案後判刑。獄中出名的“反改造份子”。獄警問他：“我們共產黨好不好呀？”他冷笑道：“好啊，比希特勒進步一點。”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中被殺。

45. 吳紀仁（?-1970）北京外語學院講師，在勞改中繼續攻擊毛澤東和無產階級專政，獄中逼瘋，一打三反中槍斃。

46. 海默（1923-1968）上海電影製片廠導演。執導的電影《海簫橫吹》被康生點名為大毒草，攻擊中共領導，劃為右派，1968年在文革中打死。

47. 吳思慧（1932-1970）四川榮縣人，北京大學物理系研究生。劃右後分配去洛陽工學院。1959年底因“抗拒改造”而勞動教養二年，勞教期滿，在洛陽街頭設攤修鞋為生。1965年犯“盜竊罪”判刑十年。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中，被同牢犯揭發咒罵毛澤東和江青，犯下“惡攻罪”，由河南省革命委員會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48. 黃立衆（1936-1970）安徽無為縣人。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生。因在1958—1959為家鄉農民說話，開除團籍。1960年劃為反動學生，開除學籍，遣送原籍勞動。回無為縣原籍後，串聯當地農民和幹部，組建“中國勞動黨”，於1970年7月判處死刑。

49. 遇羅克（1942-1970）遇羅克本人不是右派，但他的父母都是右派。他受株連不准考大學。文革初期憤而寫出《出身論》，批判毛澤東的階級成份論，轟動一時。1970年以“惡攻罪”與沈元、顧文選等右派一起遭處決，年僅二十八歲。因他是右派子弟，故也將他列入本名錄。

50. 袁植芬，北京大學物理系學生。著名畫家司徒橋女婿。1957年畢業後去香港探親。北大於十月份藉口畢業分配將他騙回學校，旋即替他戴上右派帽子。他不服，逃跑二次，欲偷渡國境被抓回。以“叛國罪”判死緩。服刑期間患肺病死於獄中。

51. 鄭介農（1935-1969）山東大學中文系學生，因寫《千士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而被劃為極右，在勞動中被人告發判有期徒刑十年。在廣饒縣五一農場服刑期將滿時，又被人告密“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於1960年10月28日執行槍決。

## 血腥的階級鬥爭

毛澤東在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不久，於七月間在青島舉行的省委書記會議上說：“資產階級反動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資產階級的右派是反動派、反革命派。不這樣叫，而叫右派，一是為了便於爭取中間派，二是為了分化右派。”同時他又反覆強調政策，說要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來處理右派的敵我矛盾，“批判從嚴，處理從寬”、“一個不殺，大部不抓”。他在《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中假惺惺地說：“不論錯誤大小，除嚴重違法亂紀者外，一概不給組織處分。”

毛澤東從來是個二面派，耍陰謀和陽謀的高手。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生，中共黨員黃宗奇是反右中第一位遭槍決的祭品。殺害右派的高潮出現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前後，即從1962年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發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號召以後、1967年至1969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和1970年至1971年的一打三反運動（打擊現行反革命破壞活動、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最為集中。

如果說1955年的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開創了以言論治罪的先聲，那麼文革開始後的清隊和一打三反又開創了以思想治罪的屠殺政治犯、思想犯的殺戮運動。右派日記中的片言隻語、枕邊情話、醉後失語均可作為量刑依據。在清隊和一打三反中，至少判處了四十萬政治思想犯。其中就包括1957年已劃為右派份子的中國知識精英。本卷所列五十一位處決的右派和右派子弟中，有八位是北大學生，北大不愧為中國的民主堡壘。

青年學生，尤其是右派學生思想活躍，對中共的各項政策多持批判態度。四大右派反革命集團性大案中遭槍決的右派大都是青年學生。中共對於青年學生和中共自己人下手特別狠毒，毫不心慈手軟。對自己人狠，符合中共內鬥的規律，蔡鐵根大校、楊應森中尉、周居正烈士原來都是革命功臣，最終成為中共刀下之鬼。

被處決的右派絕大多數是青年學生和所謂的基層右派，他們都是社會最底層的賤民，本來都已受到勞動教養或勞動改造的懲罰。共產黨的政策向來是“懲下護上”。鎮反、肅反殺的都是小人物。當時民間有句順口溜：“反動頭子進人大，小八臘子坐監獄。”傳作義和平起義，軍級、兵團級作為統戰對象進入人大政協，團級以下按歷史反革命遭到懲處。1959年十年大慶首次特赦了大戰犯。為10%的知名大右派摘了帽子；1975年早春，全國人大根據毛澤東在世時的提議，在中共執政時期，大赦最後一批縣團級以上的戰犯，“特赦全部在押戰爭罪犯和原國民黨縣團級以上人員”。可是縣團級以下人員仍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中共的這種統戰政策也適用於右派份子。所以遭極刑處置的右派大都是青年學生一類的弱勢群體。

蘇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索爾仁尼琴在他的名著《古拉格群島》中寫道，史達林集中營把驅使囚犯從事艱苦勞動並創造財富作為最高目標，通常不干涉囚犯的思想和靈魂。也就是說“它讓犯人們的心靈自由地遨遊”。索爾仁尼琴本人在集中營裏寫出了不朽名著《古拉格群島》的初稿。毛澤東的勞改營和勞教營，不僅把犯人當作廉價的奴隸，而且不准右派犯人思考，把右派們日記中的片言隻語、飯後茶餘、蹲坑拉屎時的閒聊都作為定罪依據。毛澤東比他的前輩史

達林和希特勒更上一層樓。

## 中共的告密文化

我們在查找四大右派反革命集團大案的材料時，驚人地發現，這幾個案件幾乎都是由同場勞教的右派告密而造成的冤案。四川“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由同場勞教的原四川南充地區公安處法醫、右派姚某打小報告彙報上去而釀造出來的冤案；大同“中國共產主義聯盟右派反革命集團”案，則是由一名同場勞教的同性戀男犯白亞明的告密而暴露的；北大《廣場》冤案是臥底右派譚金水的出賣；軍中右派蔡鐵根大校由阿諛奉承的小人、常州五金公司文書巢而谷告密遇害。

告密文化是中共黨文化的一個特色。中共把卑劣的告密行為合法化、合理化、制度化、道德化、神聖化。古今中外都把告密行為視作叛徒行徑和道德敗壞的象徵。唯有到了共產黨手中，不論是蘇共、中共、東共、朝共、古共都把告密作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手段。黨團員積極向黨團組織告密是對組織忠誠老實、黨性強的表現；大義滅親就是六親不認；每週一次的黨團員組織生活成為匯總告密材料的集會；打小報告和告密已經制度化、合理化。告密成為共產黨員修養的一條準則，美其名曰“反映群眾思想動態”。在反右、文革以及歷次政治運動中，告密文化釀成了多少血案和冤假錯案。

本書輯錄的僅僅是眾多處決的右派中的一部分，許多壯烈犧牲的右派往往連姓名都無從查考。一九五七年北京醫學院有一名學生，姓名不詳。在劃為右派、開除學籍後，身縛土炸彈，欲炸領導反右運動的中共北醫黨委書記曲正。曲正沒有被炸死，那位學生被槍斃了。

## 劊子手的酷刑

1948年，上海楊樹浦發電廠中共地下黨員王孝和在槍決前押赴刑場的路上，經過上海鬧市區一路大呼口號，為中共向圍觀的群眾作最後一次宣傳鼓動；被史達林無辜殺害的布爾什維克可以在臨刑前高呼“烏拉！史達林”；季米特洛夫在審判中被允許在納粹法庭為自己公開作長篇申辯。而一貫吹噓“代表全國人民最高利益”的中國共產黨，居然毫無人性地用世界上最殘暴、最野蠻、最獸性的中世紀刑法不許就義的右派烈士發出最後的聲音。我們在彙集右派烈士的資料時，也順便收集了中共劊子手為了不許遇難者發出最後的聲音而採用種種駭人聽聞的法西斯野蠻行刑毒招。

1．麻繩法：特點是簡單易行。麻繩勒喉管：江蘇省常州市工業局的蔡鐵根是南京高等軍事學院的訓練部大校級部長，1958年反右時劃為右派撤職，開除軍籍下放常州。文革初被抄家，發現他的日記裏有為彭德懷鳴不平的話，即被揪出。到此時已被關了三年多。1970年3月11日，獄方用麻繩將他捆綁後宣讀《逮捕令》。緊接著便對他宣讀判決書：死刑，不准上訴。他剛要申辯，獄卒便勒緊已套在脖子上的麻繩，使他說不出話來。接著就把他拉到刑場當眾槍斃了。

2．竹筒法：特點是具有地方特色。竹筒塞嘴：廣東海南島白沙縣槍決女醫士宮明華前，用

一節竹筒塞進她嘴裏，穿上鐵絲，紮在腦後，使她發不出聲。

3．竹簽法：特點同上。江西在槍殺黎九蓮和鐘海源時，用的是竹簽，將上下顎串起來固定在一起。

4．壓舌法：特點是直截了當。壓舌板：寧夏銀川市槍決“共產主義自修大學”成員吳述森、魯志立、吳述樟前，使用了一種“壓舌板”，使其在臨刑時無法喊叫；貴陽市建築公司女技術員馬綿珍處決前已絕食兩個多月，虛弱得站不起來，當局還是害怕她呼喊反動口號，在她嘴裏塞進了壓舌器，外面再扣上一隻口罩，以免革命群眾見了心存異議。

5．割喉法：特點是高技術，需要外科知識。割喉管：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洪恩因塗寫《毛主席語錄》，在一打三反中判處死刑，押往刑場前喉管被割斷。甘肅靜甯縣農牧站女技術員毛應星被槍斃前，也被劊子手割斷了喉管。張志新在處決前，瀋陽監獄當局割她喉管時不施麻藥，直接把張志新的頭按在磚塊上，殘忍地割斷她的喉管。

6．縫嘴法：特點是需要點裁縫技術。東北一工人許雲峰以反革命罪被處死時，用針線把他的嘴巴縫起來。

7．脫臼法：“中國共產主義者聯盟”案主犯徐關增、王汝強、任大熊等人在槍決前遊街時，劊子手把他們的下巴弄脫臼，使他們喊不出聲來。

至於處決的方法除槍斃外，還有亂棍打死、鋼釘戳死、水中溺死等方法，中共行刑方法集古今劊子手之大成。然而他們對付的都是自己的同志、朋友和親人。

## 第一節 四大右派反革命集團案

### 中國馬列主義同盟

四川省“中國馬列主義者同盟”案是發生於1964年4月的第一起右派反革命集團大冤案。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縣團級以上幹部七千人大會，承認大躍進失敗。毛澤東退居二線，劉少奇得到黨內多數擁戴。毛澤東不甘心失敗，當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月全會上，毛澤東重提“階級鬥爭”，發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號召。稍有鬆馳的階級鬥爭之弦又給毛澤東繃緊了。

四川省勞改局四一五勞教築路支隊集中了幾百名開除公職、勞動教養的右派分子。自1958年起經歷大饑荒年代，受盡饑餓、勞役、凌辱、虐待之苦，其中許多人到了1962年摘掉右派帽子解除勞教。但他們不能回歸社會，與家屬團圓。他們作為“三類人員”（勞改、勞教、就業）留場繼續當“二勞教”，強行發配到四川省永川縣的新勝茶場當茶場工人，新勝茶場實際上是一座變相勞改營。

大約在1962年1月，四一五築路支隊留下幾名解教人員在廣（元）旺（蒼）鐵路沿線處理

善後退賠工作。中共地下黨員、紅岩英雄周居正和職三隊留隊就業的魏昭等五人派到薛家橋，維修築路時損壞的民房。閒中休息聊天，邊抽煙邊烤火。談話內容漫無目標，扯到哪里是哪里。

他們談各自錯劃右派後的冤屈和妻離子散各處一方的慘景；他們談大躍進、公共食堂、大煉鋼鐵和餓死人；他們也談廬山會議大整彭德懷反右傾以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鐵托的南斯拉夫馬列主義者聯盟。那時蘇共召開二十一大，共產國際重新接納鐵托和南共，不少人贊同南共路線。有人隨便說了一句“要是中國也走南斯拉夫的道路就好了”。

言者無心，聽者有意。有一個解教的右派、原四川省南充地區公安處法醫姚某立功心切，將右派們在飯後茶餘、蹲坑拉屎時的談話拼湊起來，扯出個“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右派反革命集團”案。涉案的右派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多。居然有總書記、部長等數百餘人。

抓捕幾百人後，管教人員認為升官發財、光祖耀宗的機會到了，大搞逼供刑訊，讓被捕的右派互相亂撕亂咬。毛澤東善於用世界上最華麗的詞藻包裝世界上最醜惡的猶大行徑。告密者亂打小報告、捕風捉影無中生有、斷章取義上綱上線。打手們在毛澤東“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下，用盡十八般武器，屈打成招，泡制了這個右派反革命集團第一大冤案。

經過一年多的刑訊逼供，嚴刑拷打，“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反革命集團案”結案。周居正和軍中右派楊應森中尉判處死刑，立即執行。1964年4月19日，周居正在永川新勝茶場、楊應森在四川灌縣（今都江堰市）岷江河邊分別執行死刑。周居正的罪名是自任“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總書記，在他的筆記中拼湊出《新民主社會主義論》反動綱領；楊應森主張武裝暴動，其實都是無中生有捏造出來的。

民間作家鐵流當年也是“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重要成員，曾與臨刑前的楊應森關押在四川省公安廳看守所梓潼監獄同一間死囚室，渡過了多少個日日夜夜。在英雄們就義的那一天，擬好了這首詩的腹稿，在出獄後記錄下來作為永久的紀念。

梓潼千載仰風高，壯士須死志未消；  
牆外芙蓉牆內血，紅染錦水浪更高。

中共黨員、南下幹部，原重慶九龍區政府衛生科長魏昭，原重慶西南設備安裝公司技術員陳仲偉、原間陽機磚瓦廠醫生廖廉康三人判處死刑，緩刑二年；原健為縣糧食局會計彭恢榮、原重慶炮校參謀兼教員楊全松、四川什邡縣幹部朱文安、長壽縣小學教師冉茂涵等四人判處無期徒刑；原中共銅梁縣委農工部長彭福志等十四名右派判處十年至二十年徒刑。另有四十六名案犯由各地分別判處。

1979年右派大改正後，“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涉案的右派都改正了，可是這一亙古奇案至今沒有平反，成為千古懸案。當年經辦此案的立功受獎、升官發財者頂在那裏，藉口鄧小平對反右運動下的結論，即反右是必要的、及時的，堅持“維持原判，不予平反”。

在中國還有良心未泯的共產黨員。原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刑庭庭長、離休幹部吳明，正氣凜然地向周居正和魏昭的家屬義務提供法律支援。他化了多少時間，自費跑遍四川省不少地方，走訪健在的當事人或見證人，以律師身份調閱檔案卷宗，進行全面復查。吳明先生最後得出的

結論是：所謂周居正反革命集團案，完全是沿襲反右派擴大化錯誤路線，強加于周居正、楊應森、魏昭等人身上的莫須有罪名，此案不平天理不容！原判認定周居正、楊應森、魏昭等人的犯罪事實多屬刑訊逼供、誘供和指明問供的供詞，全案查獲的唯一“鐵證”就是周居正筆記本上的那篇題為《新民主社會主義論》，其實是用筆記本上的片言隻語，拼湊而成。此案完全是徹頭徹尾的冤案錯案。

許多參與此案審理的檢察員、法官，均認為“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的組織不論存在與否，均構不成反革命罪，所謂“政治綱領”更不具有政治目的。周居正當年蹲國民政府監獄的難友，地下黨的老戰友孫鋼、杜文博、劉德彬、郭德賢、傅伯雍等人曾聯名給最高人民法院和胡錦濤寫信要求復查，如石沉大海。周居正、楊應森仍含冤九泉。

楊應森尚未成家立業，可是周居正的家屬備受株連。妻子曾昭英老師在文革中戴高帽子遊街示眾，批鬥毆打。古稀之年貧病纏身，靠微薄的教師退休金度日。長子周復生、次女周復甦下放四川邊遠地區當知青。周復生不堪凌辱用鐮刀割喉自殺；小兒子周復天經不住精神折磨，於1968年投嘉陵江自盡。

“中國馬列主義者同盟”案中的另一名案犯陳民國（1930-1966），四川培陵人，原為四川鹽務管理局幹部，劃右後判動教養。在勞教中涉案“中國馬列主義者同盟”判處十五年徒刑，他一直不服，在文革中不讀《毛主席語錄》，在煙紙上亂塗亂寫，判以“惡攻罪”，在1966年被琪縣“無產階級專政組”亂棒打死。

傅汝舟（1925-1968）也是“中國馬列主義者同盟”涉案人員。四川漢源人，原為四川省城市規劃設計院工程師，劃右後開除公職，送省公安廳四一五築路隊一〇一支隊勞動教養。始終不認罪，抗拒勞動，出工不出力，是出名的“反改造分子”。涉“馬盟”案後判刑。文革中獄警問他：“我們共產黨好不好呀？”傅冷笑著回答：“好啊，比希特勒進步一點。”於是在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中被殺。

## 中國共產主義聯盟

“中國共產主義聯盟”（簡稱共聯），原由一名同在大同大青窯煤礦勞改隊、因犯同性戀被捕的刑事犯白亞明告密引起。獄方當局不問青紅皂白，將徐關增、王汝強、任大熊等關進禁閉室，長期嚴刑拷打，搞逼供信。冬天將他們扒光衣服，一遍遍澆冷水。他們沒有屈服，背誦林肯的“不自由，毋寧死”和“自由的代價是高昂的”拼死抵抗。

1970年3月28日，徐關增等十三名“首都支部”成員集體槍決。行刑前，他們被五花大綁在大同市區遊街示眾。每個人的下巴都弄“脫臼”，防止他們呼喊口號。寫著本人姓名的標牌從脖子後面直插進肉中，鮮血淋漓。這些才華橫溢的中國知識精英被號稱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施以中外法西斯暴君都不敢想像的凌辱酷刑，最後十三人均倒在血泊之中。這時大同上空烏雲密布，狂風大作，一場大雷雨即將來臨，上蒼似乎也在哀悼英雄們的離去。

在十三位槍決的政治犯中，為中共當局注明右派身份的右派分子至少四人，他們是首犯徐

關增（1938-1970）、主犯任大熊、主犯劉世廣、主犯曹介弘等人。由於年代久遠，當局更以“惡攻罪”和“防擴散”為藉口嚴加保密，這些政治犯的真實面目和犯罪背景已無從查考。主犯徐關增在哪個學校劃的右派、其餘處決的九名政治犯中還有哪些人曾經是右派，已經難以查證。希望知情人能挺身而出，讓這些右派英靈有出頭伸冤之日。

主犯任大熊（1932-1970），浙江杭州人，舊職員出身，其兄于1949年去臺灣。他於1955年在北大畢業，畢業後留校擔任數學力學系助教。1956年在北大圖書館的讀報欄上，逐日貼出一段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大的秘密報告《個人崇拜及其後果》內容。赫魯雪夫的秘密報告在當時只有十三級以上的高幹才允許閱讀。北大的教師、職工和學生是無權閱讀的。任大熊在教師閱覽室看到英國的《工人衛報》刊出的全文後，便同中文系學生陳奉孝和數力系另一位助教陶懋欣（女）逐段把它翻譯出來，貼在讀報欄上給大家閱讀，引起全校的轟動。

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任大熊和陳奉孝、陶懋欣一起劃為極右分子，陳奉孝因去某外國使館尋求政治避難未果而被判十五年徒刑，陶懋欣處分最輕，留校察看，工資降為三十二元。三十二元一直領到1978年改正。2000年因肺癌去世。

任大熊是身高一米七五以上的南方人，很瘦，人很聰明，沒有結婚。任大熊因翻譯赫魯雪夫秘密報告劃為極右分子，與陳奉孝一起送去勞動教養，1960年據當局說他與十三位一起勞教的北京青年教師和學生組織一個反動組織，有綱領、有組織地反對以正統自居的中國共產黨，企圖叛國投敵，判處無期徒刑。1970一打三反運動中又以“死不悔改、叛國投敵”罪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主犯劉世廣（1934-1970）山東邑人，地主出身，清華大學學生。打為右派分子後，判處十三年有期徒刑。在勞教農場改造時，曾是“中國共產主義聯盟”的發起人，也是“共聯”與“科學共產主義”合併的策劃人。

主犯曹介弘（1939-1970）江蘇武進人，家庭成分中農，北京科技大學（原北京鋼鐵學院）採礦工程系學生右派。1958年因組織“中國青年反法西斯同盟”判刑十五年。

## 附錄 1970年3月28日十三位犯人的死刑判決書

最高指示：堅決地把一切反革命分子鎮壓下去，而使我們的革命專政大大地鞏固起來，以便將革命進行到底，達到建成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目的。

（70）軍刑字第29號

現行反革命暴亂集團“中國共產主義聯盟”簡稱“共聯”，是以在押犯徐關增、王汝強為首，於1967年3月份正式成立的。以“首都支部”為核心領導，行使最高權力，下設五個活動小組和一個越獄突擊組，共網羅罪犯二十六人。召開反革命會議三十四次，先後通過了反革命綱領、路線、組織原則、組織紀律、成員條件，監內外聯繫方法和反革命暴亂計劃。在反革命綱領裏狂妄地叫囂，要推翻“元首主義”、“元首黨”、“元首政府”，公開承認南修綱領和蘇修路線。預謀在蘇修挑起反華戰爭時，煽動犯人進行反革命暴亂。與帝、修、反裏應外合，



顛覆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為實現其罪惡陰謀，大造反革命輿論，先後書寫反革命文章六十五篇、反革命詩詞三百多首、反革命書信一百七十九件，從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惡毒地攻擊、誹謗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極其瘋狂地誣衊、咒罵偉大領袖毛主席和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其反革命活動十分猖狂，氣焰極為囂張。

“中國共產主義聯盟”是一個有組織、有領導、有綱領、有目的、有行動計劃的現代反革命暴亂集團。為了全面落實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批示“照辦”的《一·三一》指示，堅決鎮壓反革命破壞活動、加強戰備，保衛祖國，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根據黨的政策和廣大革命群眾要求，報請山西省革命委員會核准，特依法判決如下：

一、首犯徐關增，男，三十二歲，地主出身，學生成份，右派分子，浙江省新昌縣人。1960年因組織反革命集團“中國社會主義自由民主黨”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1962年改判無期。

徐犯頑固堅持反革命立場，誓與人民為敵。1966年8月親自策劃組織反革命暴亂集團“共聯”，自封總負責人，“首都支部”主要成員。多次主持反革命會議，制定反革命綱領，發展反革命成員，封官委職，預謀搶奪我保衛人員武器，進行反革命暴亂。在禁閉室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反革命氣焰極為囂張。實屬死心塌地與人民為敵到底的反革命分子。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二、首犯王汝強，男，三十五歲，資本家出身，學生成份，北京市人。其父系留美學生，其母、兄、姐均在美國和新加坡。該犯1958年任英國記者駐京辦公室翻譯，因向英帝記者提供我國政治、經濟情報，攻擊、污蔑我黨和政府，被判十五年徒刑。王犯與徐關增狼狽為奸，同惡相濟。1966年8月親自策劃組織現行反革命集團“科學共產主義”（簡稱“科共”）。1967年3月和徐犯合併，成立“共聯”，系總負責人，“首都支部”主要成員。多次主持反革命會議，發展反革命成員，親自泡制反革命綱領“向馬列主義戰士提出的二十二個問題”和反動文章八篇、詩詞十二首、信件二十九封，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窮兇極惡地叫囂要推翻“元首主義”、“元首黨”。反動透頂，罪惡昭彰，實屬死心塌地與人民為敵到底的反革命分子。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三、主犯任大熊，男，三十八歲，舊職員出身，學生成份，右派分子，杭州市人。其兄1949年逃往臺灣。任犯1967年4月積極參加反革命集團“共聯”，任小組長。參加制定反革命綱領，發展反革命成員，預謀搶奪我保衛人員武器。先後書寫《時事評論》等反動文章九篇，極其惡毒地誣衊、攻擊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在禁閉室挖穿獄牆，與主犯常瀛清訂立攻守同盟，妄圖負隅頑抗。反動透頂，倡狂至極。罪惡累累，死有餘辜，民憤極大。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四、主犯劉世廣，男，三十六歲，地主出身，學生成份，右派分子，山東昌邑縣人。該犯1958年組織反革命集團“中國人民社會黨”，被判處十三年。劉犯首先提出在大青山建立反革命暴亂集團“共聯”，任小組長，“首都支部”成員。積極發展反革命成員，親自制定反革命綱領，預謀搶奪我保衛人員武器，進行反革命暴亂。親自書寫《梅花論綱》等反動文章四篇，

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反革命氣焰極為囂張。該犯是“科共”、“共聯”發起人之一，兩個反革命組織合併的策劃者，積極擴充實力，罪大惡極，民憤甚深，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五、主犯鮑明，男，二十八歲，偽官吏出身，學生成份，天主教徒，重慶市人。其父鮑克系國民黨中央委員。該犯1959年組織反革命叛國投敵集團，被判刑二十年。鮑積極組織反革命集團“共聯”，任小組長，“首都支部”成員，在監內積極傳遞反革命信件，發展反革命成員，親自制定反革命綱領，書寫反革命文章四篇，惡毒攻擊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誣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多次提出搶奪槍枝武裝暴亂，上大青山為匪，與蘇修裏應外合，妄圖依賴帝修反武力，實現其反革命陰謀。罪大惡極，十惡不赦，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六、主犯常瀛清，男三十歲，職員出身，學生成份，河北省撫寧縣人。1962年因策劃搶劫槍支、銀行、向英帝駐華代辦處投寄反革命信件和貪污盜竊罪被判刑十年。常犯積極獻策成立反革命集團，陰謀武裝暴亂，擔任三人突擊小組組長，“首都支部”成員。積極發展反革命成員，傳遞反革命信件二十餘份，制定“組織紀律十一條”，提出從監獄突圍出去到太行山、大青山建立反革命根據地。與蘇修裏應外合，為實現其反革命陰謀，還準備了逃跑用的便衣和大量藥品。禁閉後與主犯任大熊訂立攻守同盟，企圖頑固到底，將偽造領章、帽徽燒掉，毀滅證據。罪大惡極，民憤極大，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七、主犯任宗正，男三十二歲，地主出身，學生成份，江蘇省豐縣人。土改時其家被鬥，其祖母被判刑。該犯在1958年組織反革命集團“社會民主黨”和“社會主義青年聯盟”被判無期徒刑。任犯是反革命組織“共聯”的發起人之一，“首都支部”成員。積極發展反革命成員，擴充反革命實力。準備便衣預謀武裝暴亂，反革命氣焰極為囂張。罪大惡極，民憤極大。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八、主犯白微錄，男，四十三歲，地主出身，舊職員成份，貴陽市人，其父被我鎮壓，該犯曾充當蔣匪軍政要職。1951年兩次混入革命隊伍，被開除、勞教。1961年因組織反革命集團，企圖叛國投敵，判刑十五年。白犯與我黨有殺父之仇，系“首都支部”成員，積極發展反革命組織，親自擬定反革命綱領，書寫反革命文章，惡毒攻擊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我黨。傳遞反革命信件，反革命氣焰極為囂張，罪大惡極，民憤極大。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九、主犯陳威權，男，三十歲，地主出身，學生成份，瀋陽市人。該犯曾因搞流氓活動，被開除學籍。1960年向南修駐華使館投遞反革命信件和到該使館叛國投修，判刑十五年。陳犯積極組織反革命暴亂集團，是“共聯”發起人之一，任小組長，“首都支部”成員。積極書寫反動文章，攻擊我社會主義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傳遞反革命信件二十余封，並親自觀察地形、路線、規定逃跑暗號，預謀武裝暴亂，罪惡累累，民憤極大，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十、主犯曹介弘，男，三十一歲，中農出身，學生成份，右派分子，江蘇省武進縣人。1958年因組織現行反革命集團“中國青年反法西斯同盟”被判刑十五年。曹犯積極組織反革命暴亂集團“共聯”，任小組長，“首都支部”成員。準備便衣預謀反革命暴亂，書寫反革命文章四篇，惡毒攻擊我社會主義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反革命氣焰極為囂張。非殺不足以平民憤。判

處死刑，立即執行。

十一、主犯吳國延，男，二十八歲，偽職員出身，學生成份，遼寧省寬甸縣人，1962年因組織反革命集團“中國勞動黨”被判刑七年。吳犯首先和徐關增合謀組織反革命暴亂集團“共聯”，任小組長，“首都支部”成員。參與制定反革命綱領，預謀武裝暴亂，積極傳遞反革命信件，發展反革命成員。當首犯王汝強被禁閉，其還向同犯打氣：“堅定信心鬥爭到底”。反革命氣焰極為囂張。罪大惡極，民憤極大。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十二、主犯湯福璽，男三十歲，商人出身，學生成份，山東蓬萊縣人。1958年因組織反革命集團“衛國軍籌備會”判刑二十年。湯積極參加反革命暴亂集團，系“首都支部”成員，為“黑流水”地區負責人。曾觀察地形，崗哨、製作領章、帽徽、發展反革命成員，預謀武裝暴亂。並大量書寫反動詩詞，惡毒攻擊我社會主義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咒罵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反革命氣焰極為囂張。非殺不足以平民憤。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十三、主犯關煥章，男，四十五歲，小業主出生，偽職員成份，北京市人。1948年曾受蔣匪河北省特務外圍組織“幹訓團”訓練，1960年因組織反革命集團“民主自由保衛同盟”被判刑十三年。關犯參加反革命暴亂集團，任小組長，積極進行反革命活動，搞反革命串聯，預謀反革命暴亂。反革命氣焰十分囂張。認罪態度極壞，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十四、同案犯馬日新，男，二十七歲，城市平民出身，學生成份，天津市人。1963年企圖搶奪武器，投修叛國判刑八年。馬犯參加反革命暴亂集團，任小組長，三人突擊小組成員，私藏軍火，製作帽徽、領章、觀察地形和預謀反革命暴亂，活動猖狂，氣焰囂張。判處無期徒刑。

十五、同案犯魯少山，男三十三歲，富裕中農出身，學生成份，北京市房山縣人。1957年因組織反革命集團“全民黨”被判刑十七年。魯犯參加反革命集團，任小組長，系三人突擊小組成員。預謀殺害我管教幹部，武裝暴亂，書寫反動文章兩篇，反動詩詞多首，惡毒攻擊我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罪行嚴重，判無期徒刑。

十六、同案犯孟源，男，三十三歲，中農出身，學生成份，山西省清徐縣人。1963年因組織反革命集團投敵叛國被判刑十二年。孟犯積極參加反革命暴亂集團，書寫反動文章和詩詞九十多首，進行反革命宣傳，大造反革命輿論。氣焰囂張，罪行嚴重，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連同原判合併執行二十七年）。

十七、同案犯王作先，男，二十七歲，地主出身，學生成份，河南省尉氏縣人。1962年因組織反革命集團“複中會”被判刑十年。王犯參加反革命暴亂集團，任小組長，積極進行反革命活動，罪行嚴重。判處有期徒刑十年（連同原判合併執行二十年）。

十八、同案犯張久常，男，三十歲，富農出身，學生成份，河北省興隆縣人。1963年因企圖殺害我公安戰士被判刑十五年。張犯堅持反動立場，參加反革命暴亂集團，預謀越獄暴亂，觀察地形、崗哨。罪行嚴重，判處有期徒刑十年（連同原判合併執行二十五年）。

十九、同案犯楊喜法，男，三十歲，中農出身，店員成份，河北省行唐縣人。1963年因組織反革命集團，被判刑十年。楊犯在服刑中，不接受改造，參加反革命集團，積極進行反革命

活動，任小組長。罪行嚴重。加刑七年（連同原判合併執行十七年）。

二十、同案犯郝祥龍，男，四十六歲，貧農出身，工人成份，北京市人。1962年因書寫散發反革命傳單被判刑八年。該犯參加反革命暴亂集團，為反革命暴亂集團獻策，舉辦刊物進行反革命宣傳，統一反革命思想，罪行嚴重。加刑五年（連同原判合併執行十三年）。

二十一、同案犯趙志強，男，四十四歲，貧農出身，工人成份，山東蓬萊縣人。1961年因組織反革命集團被判刑十三年。趙犯參加反革命暴亂集團，積極進行反革命活動，觀察地形、崗哨，預謀暴亂，罪行嚴重。加刑五年（連同原判合併執行十八年）。

二十二、同案犯畢複英，男，三十一歲，小業主出身，學生成份，山東威海市人。1960年因組織反革命集團“中國民主自由黨”被判刑十年。該犯參加反革命暴亂集團，進行反革命活動，罪行嚴重。加刑三年（連同原判合併執行十三年）。

二十三、同案犯馬辛未、萬維鈞、章鷗、吳淦修，參加反革命暴亂集團，系一般成員。尚能坦白交待、檢舉揭發，有悔過表現，不予加刑。

對查獲犯罪實物（見附錄）全部沒收，上繳國庫。

此判

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八日

### 煽動知青返城 企圖偷越國境

1970年春節前，在一打三反的高潮中，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貼出佈告，要在節日以前槍斃十幾個現行反革命犯。他們的反革命罪行是“企圖偷越國境，煽動知青回城”。1962年五月，北京市公安局把經過兩年多大饑荒存活下來的幾萬名正在勞教的右派分子，從各個勞教單位集中到北京團河農場。

本案處決的右派陸魯山、姚祖彝、王桐竹、孫本喬等人都關在那裏面。他們在1962年前後解除勞教。一直秘密準備逃往國外，曾在雲南邊境試探過，文革開始趁亂逃出勞教隊。後來陸續來到南京，在南京被捕。姚祖彝、陸魯山、王桐竹、孫本喬逮捕後按上莫須有的“煽動知青返城，企圖偷越國境”的罪名，公開槍決。南京市軍管會分兩批槍決現行反革命分子，每批二十四人，其中有兩三名刑事犯，其他都是“現行反革命分子”。先在五臺山體育場召開萬人“公審大會”，一一宣判後，二十四名犯人分別押上十二部卡車，每部押兩名，開赴沿江東門刑場。卡車一路行進時，每台卡車前方兩側各架一挺機槍，後面是一、二十位全副武裝的軍人，兩名犯人立在後邊，面朝車尾，掛牌遊街示眾。

事前，南京市革委會當局已經嚴密組織沿途各街道委員會，劃分了各自組織群眾觀看遊街的地段。被通知觀看遊街的群眾必須出席，且需自帶板凳，端坐街道兩側等候遊街車隊，接受活生生的“階級鬥爭教育”。從五臺山體育場到江東門的刑場，沿途安排的觀眾竟有百萬之眾。死刑犯都用麻繩勒緊脖子並使下巴脫臼，防止他們呼喊“反革命”口號。槍聲響起，二十四名

熱血青年倒臥在血泊中，街道革委會隨後組織知青和革命家長進行討論、批判和聲討。

在槍決的二十四名熱血青年中，有據可查的右派分子是陸魯山、姚祖彝、王桐竹和孫本喬等四名為首肇事分子：

陸魯山（？-1970），北京農機學院學生，1957年劃為右派，1960年處以勞動教養。1970年在南京以“煽動知青返城，企圖偷越國境”罪判處死刑。

中央黨校右派杜高回憶陸魯山時寫道：

“1961年冬天，我們在清河農場的一個叫‘五八四’的分場勞動，每到接待親人的日子，總可以看見一個圍紅巾的姑娘從遠處走來。那年冬天雪下得很大，姑娘的紅圍巾在雪地裏顯得格外耀眼。這是陸魯山的戀人，北京一個工廠的女工。陸魯山戴上右派帽子後下放到工廠勞動，這位姑娘愛上了他。勞動教養後，陸魯山多次提出同她斷絕來往，姑娘堅決不同意，以身相許，等待他早日自由。每到探視日，她從北京一早就坐車趕到茶澱農場，帶著自己省下的糧食，辛辛苦苦走幾十里路來看他。因為沒人來看我，我只能從監舍門口遠遠眺望那些從北京來的家屬們的身影，也就沒有機會看清這位姑娘的面容。但我想她一定非常美麗，姑娘的故事強烈地感動著我們這些被社會鄙棄的右派分子的心。”

姚祖彝（？-1970），外貿部英文翻譯，1957年被打成右派，處以“勞教”，1970年以“企圖偷越國境，煽動知青回城”的罪名槍斃。中央黨校右派杜高回憶姚祖彝時寫道：

“當時的右派裏，他算得上是一個衣著最整潔的人。他穿一套工作服，套著一雙長統雨靴，每天把糞挑到菜田裏去。姚祖彝沉默寡言，同組裏任何人都不交談，廁所打掃完了就獨自靠在地鋪上看書。有一天上午，風和日麗，大隊出工了，院子裏很安靜。我到院子裏曬太陽，看見他把糞桶沖洗乾淨了，靠在牆邊上休息，他從上衣口袋裏掏出一本很小的書看起來，我走過去問他看什麼書，他把書遞給我看，是英文袖珍本《傲慢與偏見》，我們愉快地談起這本小說，我這才知道他是1948年燕京大學英語系的畢業生，他的姐妹都在香港。我們同在一個組的半年裏，交談僅僅這一次。他因為遵守紀律改造表現好，不久便解除勞教，離開右派隊，調到職工隊去了，我同他也就沒再見過面。”

王桐竹（？-1970），馬恩列斯著作翻譯局俄文翻譯。他的父親是中共早期黨員，打成托派開除出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判處勞動教養。解除勞動教養後，留場成為“二勞教”。後來處以“企圖偷越國境，煽動知青回城”的罪名槍斃。中央黨校右派杜高回憶王桐竹寫道：

“王桐竹是我在教養隊裏的一個好朋友。他很年輕，很有才氣，是中共中央馬恩列斯編譯局的俄文翻譯，他長得很英俊，娶了一位新疆姑娘，但打成右派後，家庭破裂了。我們彼此很信任，經常交談對形勢的看法，深信他不會出賣誰。我們也談文學。我們在麥田裏鋤草時，兩人並排往前走，他抑揚頓挫地用俄文朗誦普希金的詩《致凱恩》：‘我回憶起那美妙的一刻，在我的面前出現了你……’如果我們不是囚徒，如果那裏不是勞改農場，那情景可以說是相當浪漫的。王桐竹1963年解除教養，留場就業。他離隊的那天同我約定，下個星期天的晚上九點，他將一包食物從廁所旁邊的鐵絲網下面偷偷遞進來，藏在草叢裏。那天晚上我假裝上廁所，在

草叢中果然發現了一包烙餅，我躲在被窩裏把它們吃掉了。這是相當冒險的行動，只有王桐竹才對我這麼好，我真從心裏感激他。”

孫本喬（？-1970），北京工業大學學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0年被處以“勞教”。以“企圖偷越國境，煽動知青回城”的罪名槍斃。中央黨校右派杜高回憶孫本喬寫道：

“孫本喬是一個自尊心很強的青年，遵守紀律，積極勞動。他寧願忍受饑餓，從不偷吃地裏的農作物，幹活時也從不偷懶，從不說一句牢騷怪話，在隊長面前保持著一個知識份子尊嚴，他很聰明，在一起勞動的大學生都很佩服他。大學生們幹活時常討論一些數學題，他總能很快地用心算，找出答案。他是一個很優秀的青年。這一天，我站在南京街頭，擠在看熱鬧的人群中，看著開赴刑場的卡車從我身旁駛過，即將被判決的犯人都捆綁著插一塊牌子，垂著頭，在短短的幾秒鐘裏，我一下認出站在車前頭的姚祖彝，我想找王桐竹，再看他一眼，我還沒有看清楚，車便駛過去了。”

### “星火”右派反革命集團

1958年反右運動結束後，蘭州大學把部分右派送往農村勞動改造，三十六名學生右派，兩名研究生和化學系講師胡曉愚共計三十九人，發送武山、天水兩縣的農村。當地農村極端貧困落後，十三、四歲小姑娘光著屁股沒有衣服穿，有些公社餓死人近三分之一。

學生右派雖已淪為政治賤民，他們還是關心國家大事，他們被眼前的慘像震怒了，共和國十週年大慶居然餓殍遍野，人畜爭食。由蘭大歷史系學生張春元發起，學生右派不顧個人安危，創辦刊物《星火》雜誌。兩名物理系研究生顧雁和徐誠是南方人，他們兩人在上海曾與林昭相識，志同道合，觀點相仿。而張春元在1958年已經在北京認識林昭了。經過聯繫，決定與林昭合作，共同編輯《星火》雜誌。

武山縣的右派學生湊錢買了一台油印機，自己動手刻蠟板，印成首期《星火》，共三十多頁，林昭的長詩《普魯米修斯受難的一日》就發表在《星火》創刊號上。《星火》僅在少數可靠的自己人內部傳閱。這一期有篇文章專談彭德懷，讚揚他為民請命的大無畏精神。在《當前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一文中指出，共產黨已經腐朽，需要再來一次革命。他們寄希望於體制內的黨員幹部，希望他們組織“中國共產黨革命委員會”，糾正錯誤的政策。

中文系女學生右派譚蟬雪是“蘭大的林希翎”，廣東開平人，1960年曾打算偷渡香港爭取外援。1960年4、5月份，張春元和原物理系團總支副書記、右派學生苗新久赴蘇州、上海，打算同林昭聯絡。1959年底林昭咯血經北大校長批准由母親領回上海養病。可是林昭早已在當局的嚴密監控之中，張春元、苗新久剛同林昭聯絡便被誘捕。他們被捕後，林昭也於十月在蘇州被捕。原來讓林昭自由活動是當局設下的一個圈套。

張春元等在7月份被捕。他們沒有合法證件，曾私刻蘭州大學黨委和天水地方政府公章偽造介紹信。當局在逮捕了張春元、譚蟬雪、苗新久後化了幾個月的時間才弄清他們的真實身份，才知道意外地破獲了又一個右派反革命大案，其成員大部分在甘肅省。這時《星火》第一期尚

未寄出，第二期正在編輯中，登有右派學生向承鑒寫的《食母記》，記敘兒子偷食母親屍體的駭人聽聞的真人真事。自1960年9月30日起，在武山、天水農村勞動的右派學生全部被捕，同時被捕的還有數十名不滿中共，支持學生的當地農民。

由於年代久遠，當局又銷毀封存大量的歷史資料。所以五十年後的今天，我們對四大右派反革命大案之一的甘肅《星火》案的涉案人員知之甚少。

張春元（1932-1968）是首犯，蘭大歷史系學生，有史料記載他在入學前曾是志願軍的坦克手、神槍手。他短暫而光輝的生命曾經像林昭一樣閃爍出耀眼的光芒。

蘭大學生右派林映華是蘭大發配武山、天水地區農村勞動的三十九名右派之一。他參與《星火》編輯。1960年9月30日被捕後判刑五年，關押在收押重刑犯的重慶第三監獄，刑滿留在監獄當工人，不准返回社會。與犯人的唯一區別是有一定的外出自由。他在獄中又同張春元串聯，當局指他為張春元“密謀暴動越獄”通風報信，與張春元等人一起槍決。

苗新久等人因參與創辦漳縣化工廠，同中共武山縣委副書記杜映華（1927-1968）有所接觸，這一位杜映華很有正義感，與這些右派學生的思想觀點有所共鳴，也一起被捕。

杜映華出生於甘肅省隴西縣文峰區土店子村一戶貧苦的農家。念過私塾，1948年畢業於陝西師範學校，同年7月加入中共，以小學教師身份參加中共地下遊擊活動。他在中共武山縣委副書記任上對大躍進、農村人民公社、大煉鋼鐵、虛報浮誇而造成農民的痛苦多有批評和不滿，於1959年打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照毛澤東的說法，全國三百八十萬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與右派只差一步之遙了。

他被開除黨籍到漳縣化工廠參加勞動。這時與蘭大右派學生有了接觸，看到《星火》雜誌。他認為學生們說的都是實在話。他的觀點被好事之徒打了小報告。因此也被牽連進全國“第四大右派反革命集團”案。1961年他雖然已摘去右傾機會主義帽子，正待調到天水地區工會主席任上，便被逮捕，1962年11月23日武山縣人民法院判他五年徒刑。送甘肅省第三監獄服刑。同案犯還有中共武山縣委委員、縣委農村工作部部長羅宋志，也被判刑。杜映華在獄中與張春元等人有所接觸。獄方誣指他與張春元沆瀣一氣，策劃越獄。

甘肅省發生了夾邊溝農場等地大量非正常死亡事件，中共中央監委副書記錢瑛曾帶去一個中央工作組赴甘肅調查，撤了中共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的職，號召全省緊急動員起來起來搶救人員。據說錢瑛曾過問“星火反革命集團”案，建議從寬處理。但由於當時毛澤東號召大抓階級鬥爭，收緊全國在七千人大會後剛有所放鬆的階級鬥爭之弦，幾十名涉案人員都判了重刑。

譚蟬雪、胡曉愚、何之明各判十五年，中文系學生楊賢勇十年，生物系學生陳德根七年，化學系學生向承鑒十八年，苗新久二十年，顧雁、徐誠均十年以上。當地農民劉武雄判了十二年。

張春元原判無期徒刑。1968年上海當局在處決林昭前後，甘肅省革命委員會忽然誣指張春元與杜映華和蘭大教師張師亮“密謀暴動越獄”，一起把他們槍斃了。

## 第二節 三大抗暴女英雄

### 林 昭 他日若有凌雲志 敢笑黃巢不丈夫

烈女林昭（1932—1968）是當代中國反抗暴政最慘烈的鬥士之一。1958年劃為右派分子後，在獄中八年堅貞不屈。她那“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英雄氣概，使她視死如歸，震撼了獄中秘密處死她的劊子手。

林昭的父親彭國彥在國民政府時期經過考試在當地二度出任吳縣縣長，曾留學英國，嚮往英美的民主。林昭母親許憲民早年追隨兄長參加大革命，是蘇州最早參加革命穿上軍裝的女生。她當過國大代表，抗戰時期是抗日遊擊隊上海淞滬三區專員，被日本憲兵司令部和汪偽特務逮捕。林昭押在上海法院作為人質，那年她才七歲，已經機智機敏、會沉著應付了。母親在中共掌權後擔任蘇州市政協委員、民革蘇州支部成員。大舅在1927年參加中共革命活動，於中共江蘇省委青年部長任上被殺。如此良好的家庭背景對她的成長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她從小愛好文學，喜愛古典詩詞，想當作家。



聖女林昭

中學時代她在中共外圍組織大地圖書館工作，一度曾為中共地下黨發展對象。1949年上了國民政府城防司令部的黑名單。那一年她在蘇州景海女中高中部畢業時才十七歲，滿腔熱情投入社會，考進具有培養中共幹部性質的蘇南新聞專科學校，不顧父母希望她讀大學的願望離家出走。在蘇南新聞專科學校培訓班畢業後，隨即加入蘇南農村工作團參加土改工作。1952年到常州民報工作，任副刊編輯，她的專欄《史達林的故事》擁有廣大讀者。

1954年她以江蘇省最高分考進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由於她具有古典文學的深厚功底和寫作能力，深得北大遊國恩等著名教授的賞識，擔任《北大詩刊》的編輯和北大學生刊物《紅樓》的編委。

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徹底改變了林昭的人生軌跡。1957年五一九學生運動是北大學生對中共的整風運動自發而直接的回應，是1919年五四運動、1931年的一二九運動和1948年反饑餓、反迫害運動的承傳。當沈澤宜和張光勳貼出了第一張大字報長詩《是時候了》的時候，左派們對他們群起圍攻。林昭挺身而出，為他們反駁左派們的攻擊。她在自由論壇上提出“組織和良心的矛盾”。她為所謂反動學生刊物《廣場》寫稿。

1958年初的反右補課運動中，她被指責為《廣場》的幕後策劃者，劃為右派，勞教教養三年。因她體弱多病，經常咯血，被留校在苗圃勞動。1958年北大中文系新聞專業合併到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林昭和劉少奇前夫人王前和另一位青年右派甘梓在人大新聞系資料室監督勞動。1959年底因咯血加重，經校長批准由母親領回上海養病。



1958年在北京經人介紹，林昭認識了蘭州大學學生右派張春元，他和另一位右派顧雁於1960年在上海同林昭聯絡商討編一本命名為《星火》的雜誌，林昭在雜誌上發表了《海鷗之歌》和長詩《普羅米修士受難之日》。她因此以反革命罪於1960年10月在蘇州被捕。

林昭遭逮捕後，輾轉關押在上海靜安區公安局、第一看守所和提蘭橋監獄。1962年保外就醫。在保外就醫階段，宣稱“要以最後一息獻給戰鬥”。她遇到右派分子黃政，起草了《中國自由青年戰鬥聯盟》計劃、《給北大校長陸平的信》和其他幾篇文章，交給外僑帶到國外去發表。同年12月再次被捕，直到1965年5月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一個月後父親彭國彥憤而自縊身亡。因為他始終認為林昭是他們家最進步的，林昭的再次被捕使他覺得“我們全家都完了”。



林昭墓後面上方的白色監視器

在獄中林昭先後三次給《人民日報》上書、寫血書、絕食抗議，寫了《思想日記》、《牢獄之死》、《提蘭橋的黎明》等一百多篇文章；在獄中高呼反動口號，煽動在押犯人暴動。她遭受的非人待遇和折磨，令人髮指，罄竹難書。林昭在獄中皈依了基督教，填補了她在失去馬列主義信仰後的信仰空白。她寫道：“作為一個人，我為自己的完整、正直而乾淨的生存權利而鬥爭那是永遠無可非議的。作為基督徒，我的生命屬於我的上帝——我的信仰，為著堅持我的道路，或者說我的路線，上帝僕人的路線，基督政治的路線，

這個年輕人首先在自己的身上下了慘重的代價，這是為你們索取的卻又是為你們付出的。”

據林昭妹妹彭令范在美國透露，林昭在1962年保釋回家時曾經說過，毛澤東和柯慶施親自審過她。彭令范絕不相信這是林昭的“幻覺”或“妄想”。但是有關林昭的材料，包括她在獄中寫的血書，僅在上海市靜安區公安局就堆滿了一間房間。這些材料有待解密。也有人說這些材料已經“轉移”到了浙江山區，據說林昭的材料屬於國家高度機密，至少要塵封五十年。所以毛澤東、柯慶施親自審問林昭的真實情況至少要等五十年以後才有可能真相大白。

林昭在獄中受到多次批鬥，警方組織全體犯人收聽拉線廣播。林昭在批鬥會上堅貞不屈，同批鬥者抗辯。最使當局鬧火的是獄中犯人每天早晚兩次必須向“偉大領袖”“早請罪晚請罪”（即社會上的“早請示晚彙報”），每當這個“神聖”的時刻林昭都去上廁所“方便”。1968年4月29日林昭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她被從監獄醫院裏的床上拖起來，直接送往刑場。劊子手們對這個弱不禁風的女子害怕到絕點，在她的脖頸上勒緊繩子，嘴裏塞進橡皮塞，生怕她就義時喊口號。

過了一個多月，公安局派人到她家裏問她母親索取五分錢的子彈錢。這便是林昭所說的“二十世紀最殘酷的制度”。母親許憲民精神失常，為尋找愛女躑躅街頭，一頭栽倒公車站，搶救無效身亡。

1980年8月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經覆查以精神病為由對林昭宣判無罪。1981年12月上海市最高人民法院再次覆核後宣告林昭無罪。林昭被暴政虐殺至今已有了四十年了。她的戰鬥精神永遠活在人們心中，她在獄中所作的《悲憤詩》是寄給蘇南新專和北大同學、右派分子單華榮的，此時他正在勞改。詩中寫道：

埋骨何須是北邙，  
銘幽寧叫筆低昂。  
半生磊落魏奇氣，  
化作清風意更長。

她的小舅是1938年加入中共的老幹部，不顧當局阻撓，會同林昭妹妹和林昭在北大、蘇州新專的同學，將她和父母一起安葬於故鄉蘇州木瀆鎮靈岩山南麓的安息公墓老區最高層左端。墓碑上寫著“林昭之墓”。背後刻著她於1964年2月寫下的詩句：“自由無價/生命有涯/寧為玉碎/以殉中華”。

林昭在鬱鬱蒼蒼的林木叢中，俯瞰著她為之獻身的故鄉大地。“清明時節雨紛紛”，每年4月29日林昭就義的日子前後，前去掃墓的人陸續不絕。以至當地農婦守候在路口，為之引路，並賺一些小費。光陰荏苒，不知不覺中已過去了四十個年頭。林昭所期盼的自由民主的新中國何時到來。

### **馮元春 最早批毛的巾幗英雄**

由於馮元春是四川省二十六名不予改正的右派分子中的第一名，自1957年劃為極右判刑入獄，直至1970年槍決，都在獄中渡過。她是惡攻犯，官方嚴禁她與外界接觸，四川省公安廳至今不准公開她的材料；而且馮元春性格內向，平日沉默寡言，連她入學前的情況也鮮為人知，譬如她的籍貫有三種說法，都江堰、灌縣、永神縣。她的出生日期，按1957年為二十五歲計，應為1932年；若按1970年犧牲時四十歲計，應為1930年。

然而可以肯定，馮元春於1957年春天助黨整風時，已經尖銳、深刻、全面、系統地從理論上、實踐中，公開反對毛澤東、批判毛澤東思想、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中共一黨獨裁，敢於與成千上萬人公開辯論，毫無懼色。她的犧牲也比林昭更加壯烈……。她們三人堪稱五七抗暴三烈女，萬世留芳。

過去在中共的階級鬥爭和政治運動中，每逢“五一”、“七一”、“十一”中共的這些節慶日子，各地都要召開萬人公判大會，處決一批現行反革命分子、壞分子或其他刑事犯罪分子，為無產階級專政製造聲勢，宣耀階級鬥爭的成果。1970年7月1日，正值文革中的一打三反運動高潮，四川省南充市南郊火花公社廣場，萬人聚集、人頭攢動，四週密佈武裝民兵和軍警。當地的農民、幹部和學生翹足引領，等候公審和槍決三名現行反革命。

不久開來三輛解放牌敞篷大卡車，第一輛車上押著一位因妻子與人通姦而殺死妻子的縣武

裝部長；第三輛車上押著一位戴眼鏡的為“蘇修”說話的留蘇斯文學生；中間第二輛車上馮元春衣衫破爛、五花大綁，背上插著一塊三角尖形白色木板，她的名字上打著大紅叉叉。她的喉頭勒著二道細麻繩，使她不能喊叫，因血脈不通，青筋畢露，十分痛苦。但見她圓睜雙目，眼中噴出憤怒的火花，威武不屈地挺起胸膛，環顧四週。

在公審大會以前，他們已經經過遊街示眾，不明真相的市民向他們扔石頭、磚塊、髒物、雞蛋，早已臉青鼻腫，遍體鱗傷了。當公審大會批判她的反對偉大領袖、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滔天罪行時，引起革命群眾的滿腔義憤，不明真相的農民們掄起鋤頭、鐵鍬和採石用的鋼釘，打她、戳她直到鮮血淋漓、奄奄一息，最後民兵補上一槍。馮元春遭受到比中世紀更殘酷的凌遲處死，捍衛真理的巾幗英雄倒在紅色恐怖的血泊之中。

馮元春(1930-1970)四川省青神縣人，出身貧苦農民，自幼聰穎好學，由姑媽接濟生活，靠助學金唸書，1953年考入四川大學生物系。有人說她入學前做過三年小生意，也有人說她已婚，育有子女。她中等個兒，相貌平常，梳短頭髮，衣著樸素，口才並不好，不瞭解她的人以為她是農村婦女。可是“螺絲有肉在肚皮裏”，人是不可以貌相的。

1957年6月初，馮元春在川大公開舉行鳴放辯論會，題目十分可怕：“毛澤東是偽馬列主義，共產黨是三大主義武裝的最巧妙、最殘酷的剝削集團”。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聞訊通知省委宣傳部，組織了上千名省級機關幹部參加辯論會，擺開陣勢，要與她展開辯論。

馮元春在會前作了充分準備，查閱了各地大量的報刊雜誌，認真閱讀北京友人寄來的安娜·路易絲·斯特朗著的《史達林時代》，並與觀點相同的人交換意見，其中有一位女性的黨支部書記。

那天參加學生會組織的鳴放辯論會的人特別多，校內外有二、三千人，連隔河的中學生也趕來參加。她神態自若地站在主席臺上，身邊圍著一群支持者和反對者，不時發生爭論。大會開始，馮元春不疾不徐地用平心靜氣的語調說：“在馬克思的著作裏，根本沒有無產階級專政這一詞，全是毛澤東的杜撰和引申。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用暴力奪取政權後，由統治階級組成的政府。他們借用軍隊、警察、監獄去鎮壓老百姓，不給人民任何民主自由的權力，也不遵循法律去依法辦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所制定通過的憲法，僅是一紙空文。毛澤東要想怎麼幹就怎麼幹，想打倒誰就打倒誰，想關押誰就關押誰，這絕不是馬列主義者，是徹頭徹尾的獨裁！”

馮元春講到這裏，引起臺上、台下的喧鬧紛亂，有贊成的掌聲，也有反對的吼叫，會場亂成一團，但是馮元春很鎮定，清了清嗓子繼續根據事先準備好的講稿往下說。當她提出幾個不容置疑的事例後，會場終於平靜下來。她舉的事例是“高饒反黨集團”和“胡風反革命集團”。她說：“根據已發表的材料觀察，高饒的罪名是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請問，黨中央和毛主席有缺點有錯誤，難道不能反對嗎？這不是個人崇拜是什麼？”

對於胡風事件，她提出質疑說：“毛主席經常說：‘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為什麼胡風先生公開向共產黨中央上書三十萬言就成為罪人了呢？而且還把胡風及朋友之間的私人信件公

佈出來，說是反革命罪證。這是毛澤東公然破壞法律，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毛澤東主席的特權思想，和歷史上一切統治者的特權思想一模一樣，毛澤東是中國再次出現的劉邦。”她歸納道：“從毛澤東把高饒稱為‘反黨聯盟’，和把主張言論自由的文學家胡風指為‘反革命集團首領’這兩件事，可以看出毛澤東是個偽馬克思主義者。”

台下的聽眾都為她捏一把汗，但是也不得不佩服她的大無畏精神。她繼續說道：“我們再來看看共產黨，這個集團對工人農民的剝削是最巧妙、最殘酷的。工人加班不給工資，美其名曰‘奉獻’；農民辛辛苦苦種出的糧食自己不能支配，大部分給國家統購去了。家無存糧，要是發生災害農民便會餓死。再看共產黨的各個單位都豢養了一大批不務正業，專門監視別人思想、言論、行動的政治工作人員，美其名曰改造別人思想，實際是些狗屁不通，只會扣帽子的共產黨員。他們就這樣靠吸取別人的腦汁而生活，他們對待老教授是那樣橫蠻、無理，是最卑鄙的一種人。”

會場頓時響起一片掌聲，反對者的吼叫很快便給掌聲掩蓋了，可見多數人是贊成她的。待掌聲平息了，她又繼續講了川大忠厚老實的湯教授的遭遇。留美的湯教授因為不肯違心地批判美國貧窮落後，歌頌共產黨的英明偉大，在肅反中被誣陷為反革命分子、美國間諜。此時有人跳上講臺奪走她手中的話筒，臺上臺下亂吼亂叫，會再也開不下去了，便不歡而散。

沒過幾天，《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撰寫的社論《這是為什麼？》，陽謀結束，“蛇”都給毛澤東引出了洞，便展開了大轟大嗡的反右派運動，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立即指示川大當局組織圍攻馮元春，每天大會鬥小會批；成千上萬張大字報把馮元春淹沒了。省市報刊發表批判專欄，《人民日報》也點名批判，馮元春瞬即成為四川省和成都市的眾矢之的。

她劃為現行反革命極右分子後，判刑十五年，關押進四川省公安廳梓潼巷看守所。不久送簡陽平泉勞改農場強迫勞動改造。勞改期間她不服改造，繼續不斷地批判毛澤東、批判毛澤東思想和共產黨一黨專政。於是便加判無期徒刑，轉送南充市的四川省第一監獄服刑。

加刑後馮元春依舊堅貞不屈，不肯低下倔強的腦袋。1969年4月1日，中共召開“九大”，劉少奇被誣為叛徒、特務、工賊，永遠開除出黨。這樣的頭等大事，犯人們也要學習，也要表態，作為改造好壞的表現。獄吏要馮元春表態，她冷笑著回答：“我稱他是殺功臣的劉邦、朱元璋，豈妄言哉？”此時正值一打三反運動，馮元春遂以“惡攻罪”（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宣判她死刑、立即執行的是南充市公、檢、法機關軍事管制委員會，軍管會既不是檢察部門，又不是執法部門。不經審判，沒有律師辯護，更無需經上級法院批准，就可以輕易執行一個人的死刑，這便是紅色恐怖時期的中國社會現實。

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弱女子，用大無畏的精神，在“殘夜將盡風更緊，寒冬欲雪天更寒”的紅色恐怖年代、挑戰強大的國家機器，最後用自己的鮮血和生命，為光輝燦爛的短暫一生劃上完美的句號。

今天有一批學者如鐵流、冉雲飛等人，都在深入挖掘馮元春等烈士的材料。可惜由於中共

當局對於馮元春和其他一切反右的材料，一律採用封鎖、銷毀、篡改、欺騙、捏造的對策，使馮元春和其他殉難的五七烈士可歌可泣的史跡難以重見天日，這也是“轉型正義”工作在中國無法開展的原因。林昭的材料由於偶然的因素“開放”了一小部分，而馮元春的材料還全部塵封在四川省公安廳某個陰暗的檔案庫內。看來要到中共專制政權解體之後，才有可能公諸於眾！

## 毛應星 死後追認為烈士

神州大地上又一個林昭、馮元春式的巾幗女英雄毛應星（1925-1970），生於福建省閩侯，出身貧寒。1942年家裏無錢供她讀書，只好輟學去做工，備受壓迫與剝削。這個時候她與中共地下黨有了接觸，參加中共領導的活動，冒著生命危險掩護過中共地下黨和地下工作人員。在一位以記者身份作掩護的女中共黨員的影響下，她在一些進步報刊上發表雜文和詩章；在一首小詩中把自己比作一片荒蕪的凍土上生長的“一朵青色的小蕊”。

中共掌權後，搞過工會工作，到農村參加過土改運動，後來考進西南農學院。1955年從西南農學院畢業，分配到黃土高原的蘭州農校園藝專業作了教師。很快以其辛勤的工作，獲得師生的好評。為備好課，節假日從不休息，常常工作到深夜。曾向蘭州農校中共組織寫了三萬五千字的入黨申請書。



毛應星

1957年因為在紅與專問題上，說出了自己正確的看法，被劃為極右分子，開除公職，送到酒泉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1961年中共中央西北局蘭州會議作出搶救人命的決定，她死裏逃生回到了蘭州農校。毛應星原來清秀矯健，瞬息間變成了一位頭髮斑白、瘦骨嶙峋、面膚黑黃的老太太。中共甘肅省農牧廳黨組審查了她的材料，認為劃右依據不足，給她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

摘帽後，她與有著相同命運的李如璋組成了家庭。李如璋江西人士，畢業於北京農業大學，為響應中共支邊號召，來到蘭州。在鳴放中他沒有發言，但以不發言是表示對黨不滿而劃成了沉默的右派，送往夾邊溝勞動教養。之後他們倆一同被調往靜甯縣農技站，而李如璋又被調往平涼農校，在離縣城五十里的一個公社種胡麻。中共不信任摘帽右派，不准他們重執教鞭，返回教師崗位；而且狠毒地把大齡新婚夫妻硬生生地拆散兩地，毫無人性可言。

她被派到良種繁殖場改行種小麥，實際上只是當一個農民工。也去農村駐過隊，為揭不開鍋的人家奔跑要回銷糧。從自己三十五元的菲薄收入中擠出一點點錢，給營養不良的社員孩子買吃食。她一直苦思冥想，為什麼“解放”多年後農村還這樣窮，社員生活還這樣苦？日思夜想，這個問題一直縈回腦際，無法丟開。

1966年十年浩劫開始，到處一片紅色恐怖，知識份子成了牛鬼蛇神，領導幹部成了叛徒、

特務、走資派。她徹夜難眠，痛苦思索，對文革初期的混亂場面萬分憤慨，氣憤地說：“如果說這樣做是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我看這些揪人的人，他們的思想更符合資產階級奪權的需要。”

1968年良種繁殖場突然闖進一夥人，把她反剪雙手揪到縣城廣場，進行殘酷批鬥。批鬥的罪名是“妄圖變天的反革命分子”，還誣指她是“國際間諜”。鬥爭會後，她憤慨地寫道：“踢打幾里路，拉著頭髮跑，這是二十世紀1960年代最文明的階級鬥爭。”

造反派宣佈她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嚴酷的生活為她帶來清醒的思考。白天挨鬥，晚上忍著拳打腳踢留下的傷痛，奮筆疾書，向中共中央連續寫信：“文化大革命積極因素的反動，表現在對毛主席個人極端迎捧和諂媚，謂之突出無產階級政治，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現在蘭州各地都貼忠字，我認為分明是唯心論，所謂重視動機否認效果的表現，是經不起時間考驗的。”；“忠，豈不陷於唯心論裏去嗎？忠不是封建的思想體系嗎？……忠於毛主席而不忠於人民，就不是無產階級的路線。”；“我既不為名，也不為利，就是希望大家都生活得很好，生活得合理。提出一些意見，的確是為人民，也是愛護毛主席。我就是要犧牲自己，不管我這個人多麼吃虧，把自己的一切輸光，我仍然堅持把我認為正確的想法反映上去，正確的總會起作用的，客觀規律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

她還打算去北京上訪，但半路上很快被抓回拘留。關進看守所後，多次受刑，受盡極其殘酷的折磨。1969年正式逮捕，判處五年徒刑，押送到平涼監獄服刑。入獄後頭腦更加清醒，“這就把人治了？這樣就叫人屈服了？”，“縱然對我再加任何壓力，我這種思想立場觀點，一點也不會改變”，“如實地反映客觀情況的就是反對毛主席？就是反革命？”。一篇篇文章，一封封抗辯信，從鐵窗遞出。獄方認為她抗拒改造，被拉到犯人中間批鬥，單獨關押，雙手戴上了鐵銬。

她依然從早到晚俯身在土炕邊上，在自訂的大小奇形怪狀的各種本子上無休無止地寫：“我們應該真心實意，實事求是地愛護毛主席，而不應該採取資產階級嘩眾取寵的捧場欺騙人民。捧場者投革命之機，受損失的還是革命事業。”，“林彪的《人民革命戰爭勝利萬歲》或九大報告，給人一種資產階級趣味的政治宣傳感受。”，“現在就是一些捧場的小人將毛主席包圍了，康生、陳伯達其實是不學無術的老學究。”

在得知林彪選定為接班人時，急忙寫了一封急電交給管教人員：“毛主席：我意：接班人應是周恩來。”在遞交電文時還說：“怎麼選了一個奸臣！”於是電文成為她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新罪證。1970年在一打三反的高潮中，經甘肅省革命委員會批准，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她死刑。

她不作申辯，在最後一個小本子上寫道：“我最擔心的是替蔣介石培養接班人！”她在留下最後一篇文章《為鞏固為發展無產階級專政而戰鬥》中寫道：“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是什麼呢？都是欺騙人的一套手法，靠的是主觀隨意性。”臨刑前劊子手殘酷地割斷她的喉管，不許她呼喊。4月14日清晨，毛應星被五花大綁，押往靜寧縣城西八里橋畔一塊農田裏含笑就



義，年僅四十五歲。

她丈夫李如璋在她第一次判刑後，即奔走申訴，也以現行反革命罪被逮捕，判處十二年徒刑，押往靖遠寺兒坪勞改農場。他壓抑著內心巨大的傷痛和冤屈，默默奉獻，年復一年地為農場小麥品種的改良嘔心瀝血，直到平反出獄。

1980年，民政部在《關於批准毛應星同志為革命烈士的決定》中寫道：“毛應星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堅持真理，不畏強暴，對林彪、四人幫陰謀奪權的罪惡活動，進行了勇敢的鬥爭，致被判處死刑，情節確實壯烈，值得人民學習。毛應星烈士永垂不朽。”她被中共甘肅省委追認為中共黨員。她的骨灰被安放於蘭州華林山烈士陵園，《甘肅日報》為此於1980年12月3日發表社論，還裝模作樣地號召全省人民都來向她學習。

直到1978年改正，李如璋才知道八年前妻子已遭處決。出獄後他東奔西跑，呼號申訴。在落實了他的政策後，李如璋又先後將一百多份要求復查平反毛應星的材料寄給中央、省委、省政府和有關部門。然而，較長一段時間沒有回音。張志新、董之秀的冤案平反後，李如璋仍在到處呼號，寫信給廖承志副委員長和國務院僑務辦公室。1979年11月8日，僑務辦公室致函甘肅省外事辦催促辦理。

在全國大量冤假錯案得以平反的情況下，1980年4月，毛應星的冤案終於得以昭雪。11月29日，甘肅省政府在平涼舉行了“毛應星平反昭雪大會”，宣佈撤銷對毛應星的錯誤判決，恢復名譽。1981年7月15日，民政部批准毛應星為革命烈士。在被中共處決的右派分子中，毛應星是二位被當局追認為烈士的右派之一，另一位是朱守中。

### **第三節 反右運動中五起小匈牙利事件**

#### **震驚中外的漢陽一中小匈牙利事件**

1957年4月，在小小的湖北漢陽縣城發生了一起“小匈牙利事件”。所謂“小匈牙利事件”，說穿了不過是一些中學生對升學和就業前景不滿而發起的一次小規模抗議。事件發生在湖北省漢陽縣第一中學。1957年4月上旬的一天，一位姓李的女教師在批評有些初一的學生學習不用功時透露說：“我們全校一千零一名應屆畢業生，今年能升入高中的指標只有五十個。要發奮學習啊，不然到時就耽誤一年，後悔莫及！”這番話很快就傳到了初三學生當中，全校九個畢業班的學生湧出課堂，在操場集合。他們高呼口號，要求校長出面解釋。當聽說校長不在時，他們向縣教育局遊行，沿途高呼口號，引來很多人旁觀，有的人加入了遊行。

湖北漢陽的這場學生運動雖然僅僅是為了升學名額而起，但卻有著更廣泛的社會背景。共產黨奪取政權後，逐步縮小就業自由，並把全部教育制度都控制在自己手裏。初中生只有很少部分人能升高中，高中只有很少部分能上大學，不能升學的人中有一部分上各種中專學校，剩下的全部歸由國家統一分配工作，很多人只好下鄉勞動。

當時城鄉差距已經擴大，農民受歧視，唯一的出路就是通過不斷升學，跳龍門進入城市。在這樣的政策背景下，城市學校的招生指標主要分配給城市居民的子女，當時湖北省百分之九十五的招生指標分配給了武漢市和少數幾個專區直屬市，縣以下的地區只有百分之五的指標。這樣，農民的子女永遠只能留在農村，無法改變自己的農民身份。在這樣的情況下，初中生能否上高中就成了生死攸關的大事，往往決定了將來是在城市享受城市居民尚算有保證的物質生活，還是在農村苦一輩子，跟泥巴打交道。

4月13日上午，幾百名學生來到縣政府，要求澄清事實，並拉縣長韓茂林去省裏反映情況。縣政府調來警察，扣留了幾個學生，這就引起了學生更大的憤怒。有人向縣政府扔磚塊，並喊共產黨自己提出的口號“反對學生運動的人沒有好下場”。在學生鬧事後，縣一中副校長王建國為了息事寧人，趕到縣政府去交涉，要求釋放被扣的學生，但被縣政府拒絕。這時鬧事的學生人數又有增加，把縣政府圍牆推倒。縣政府不得不調來幾百名工人保護自己，控制事態。不久，那些被扣押的學生被釋放，家長們也紛紛趕來帶走自己的子女，風波基本平息。

象這樣一場沒有直接政治動機的學生鬧事，在今天的中國可以說屢見不鮮，參加和被捲入的人也不見得就會受到嚴厲的懲罰。但在六十年前，這場小規模的學生鬧事卻被稱為“中國的匈牙利事件”，造成了三個人被槍斃，十多人被判刑的悲慘後果。

當學生回家後，中共縣委書記韓茂林在向上面彙報時說這是一起“反革命事件”。於是中共地委迅速抽調近百名幹部進駐漢陽縣一中，發動了一場大規模的人人揭發、個個坦白的運動。千方百計要找出這起政治事件的幕後黑手。

副校長王建國（1925-1957），年僅三十二歲。1950年從湖北革命大學畢業後分配到漢陽縣工作。1952年調任縣一中副校長，主持全校工作。因為向縣委要求釋放學生，成為調查的首要對象。王建國出身富農家庭，父親參加過國民黨的所謂的還鄉團，他本人有三青團的歷史問題。雖然在中共建政初在革命大學受過教育，但入黨申請始終沒有被批准。當時擔任縣一中校長兼黨支部書記的是一個姓韓的土改幹部，因為他不懂業務，教師們有事常常找王建國彙報，因此正副校長之間本來就有隔閡。這樣一來王建國註定了要被當作反革命右派揪出來當替死鬼。

有了一個反革命右派還不夠。語文教學組長鐘毓文平時有愛眨眼的習慣，他在批鬥王建國的會上也一個勁兒地眨眼，校黨支部書記立刻彙報說，這是鐘毓文向王建國使眼色，向王建國打暗號傳遞消息。於是將鐘打成同夥，宣佈隔離禁閉，列為集團骨幹分子。

更加荒唐的是光在學校內抓反革命還不過癮。反右運動開始後，“小匈牙利事件”還必須與社會上的民盟掛上鉤，才能具有深刻的社會背景，因為民盟是反右的重點對象。一位學生的檢查材料，使中共當局如獲至寶。這位學生交代說，學生們上街遊行，經過縣文化館，向圖書館管理員楊煥堯討口水喝。楊稱沒有開水，只有冷水。又向楊借電話打，楊稱打電話要去郵局。因為楊是民盟成員，追查楊便可揭開背景。恰巧武漢民盟曾經派他來過漢陽一中，想在學校發展民盟成員。

這件往事馬上被調查組抓住，楊煥堯定為小匈牙利事件的軍師，和當時民盟的大右派掛上



鉤。楊煥堯莫名其妙也成了這起反革命事件的策劃人之一。正好湖北民盟主委馬哲民被打成右派。這樣，從民盟中央到地方省市再到基層漢陽一中，連成一線，一幅完整的“反革命聯絡圖”就清楚地呈現出來了。調查組這樣給這起學生鬧事定性，聳人聽聞地說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一起罕見的反革命事件，是國民黨殘餘勢力和右派分子精心策劃的地方性奪權鬥爭，有著深刻的社會與政治背景。

這樣，一起普通的學生鬧事就給很多無辜者帶來了悲慘的後果。王建國、楊煥堯、鐘毓文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九位教師和一名學生被判處兩至十五年徒刑，另有三名教師被定為“壞分子”，還有三個被勞動教養。十一名教師和十九名縣政府幹部、縣直機關和政治機關幹部受到紀律處分。三十三名學生開除學籍、團籍和勒令退學。

當時全國大小報刊和電臺都把這起事件稱為“中國的小匈牙利事件”，在歡呼它的破產的同時也用它作為“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企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的典型案列，要人們提高所謂階級鬥爭的警惕性。

這起冤案直到二十七年後，1985年才被中共湖北省委平反。但王建國、楊煥堯和鐘毓文早已成了槍下冤鬼，其餘受迫害的人也多數年近花甲，最年青的學生也年近半百。幾十個人的生命就這麼平白無故地被一個殘酷的專制制度毀滅了。而這個事件，只不過是毛澤東時代無數悲慘的政治迫害事件的一個縮影而已。到了1960年代和文化大革命期間，類似的慘案可以說是數不勝數了。

## 毛澤東欽定的兩“仙”小匈牙利事件

### 一、仙游（福建）小匈牙利事件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5月初中共福建省委要求全省各地、縣立即開始整風。晉江地區仙遊縣於5月5日開始鳴放，5月下旬轉入小組討論，縣委態度曖昧，指示鳴放意見限於組內，不得外傳。有人不滿，見縣委缺乏決心，便貼大字報劃漫畫。6月3日部分黨內幹部和黨外人士要求召開機關鳴放大會，形勢一觸即發。

中共晉江地委在擴大會議上批評了縣委，縣委便在6月4日和6日分別召開全縣鳴放動員大會和全縣各中學鳴放動員大會，掀起鳴放高潮。首先被提出來的是地下黨歷史問題，仙遊是老根據地，1927年建黨，許多地下黨員出生入死，解放後地下黨籍得不到承認，南下幹部到達後形成華東局和閩中地委兩套班子。地方出身的領導幹部，有的被擠出大門，有的降職使用。在這個有20多年革命歷史的老區縣，只承認4名黨員。南下幹部還把不少地下黨和打遊擊的幹部打成叛徒特務，有的被迫自殺，老區人民心中不服。

這些受打擊的老革命及其子女家屬心中有氣，整風開始後向縣委提出要求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平反糾錯，恢復黨籍、職務、生活待遇。有人上訪省委和中央，提出五項要求：一，先恢復黨籍後審查；二，收回參加地下革命所有幹部；三，恢復地下黨員原職原級；四，平反歷史冤案；五，讓地下黨參加各級領導班子，追認迫害致死者為烈士。

同時有人以南下幹部的生活作風為突破口攻擊南下幹部，鳴放出如下問題：一，農村政策偏左，強迫入社，假增產，生活水準降低；二，幹部沒文化，政策有偏差，歧視知識份子，肅反擴大化；三，不執行民主集中制，假選舉，人代會形式主義；四，中蘇關係。

縣委保持沉默，短短幾天，機關學校、廠礦企業出現混亂，工人、學生和群眾鬧事16起，6月10日自行車工人發生路權糾紛，準備械鬥。120名工人向縣委請願，包圍縣委一天。學生揚言如不錄取和安排工作也要鬧事，事態從縣城擴大到農村，互相呼應，“形成一股反革命浪潮”。

縣委慌了手腳，不知如何應對，正好此時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轉陽謀為反擊。縣委立即轉守為攻，將正確意見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攻擊南下幹部就是反黨。縣委認為群眾鬧事是出現匈牙利事件前兆，據此上報地委，8月中地委彙報省委。省委確定這是階級敵人勾結機關學校裏的地富反壞，進行反革命復辟，定性為小匈牙利事件。福建省委一面向中央彙報，另一方面派員親臨仙遊指導平息，6月16日地委擴大會議決定縣以下停止鳴放，轉入反右。

定性為小匈牙利事件產生了嚴重的不良影響，首先是反右嚴重擴大化，作為重災區的中等學校在6月就劃定18名教師為極右分子，縣委錯誤地作出估計，以為全縣隱藏大批企圖復辟資本主義的右派和反革命，第一批就確定右派134人，占機關人員總數10.54%，學校工廠農村右派帽子滿天飛，“打鉤定右，手都劃酸了”。共打出右派182名，極右134名，反革命右派33名。壞分子13名，自殺1名，人數比例列全省之首，是全省乃至全國的重災區。

其次，小匈牙利事件使黨內人士蒙受不白之冤，造成許多冤假錯案。黨內外親共分子打成右派，下放勞改勞教。30名黨員打成反黨分子，15名放逐邊遠山區，9名開除公職，1名逮捕法辦。第三，形成地方主義錯案，凡地方幹部對南下幹部有意見者均以地方主義論處。毛澤東說過，地方主義分子就是右派分子，屬敵我矛盾，黨內民主作風破壞殆盡。

## 二、仙居（浙江）小匈牙利事件

從1957年1至5月浙江省仙居縣發生18起農村哄鬧退社和縣城罷工罷課請願事件，一共有5400人參與。仙居全縣33個鄉鎮，共有302個農業社。經此一鬧，302個農業社中，完全解體116個，部分解體55個，10000多人退社，入社農民由95%降至16%。

至6月下旬，大小鬧事事件急劇惡性發展到279起，震動了中央。浙江省急派副省長楊心培和台州地委常委張兆萬組成工作組赴仙居調查，不久寫出《關於仙居縣群眾鬧事問題報告》。中共浙江省委書記江華在看了報告後，於8月中親赴仙居處理，發現群眾鬧事肇因係由幹部作風粗暴引起。

農村幹部在合作化以後，隨意吊打農民，扣工分，抄家屢見不鮮。在251個鄉幹部中，有74個吊打過人；在1117個黨員幹部中有48人貪污，占4.7%，充分說明幹群矛盾十分尖銳。

然而當時正值反右運動的高潮，江華使用階級鬥爭的方式處理群眾鬧事事件，令仙居縣政法部門組成聯合辦公室，逮捕9人，拘留42人；凡是消極生產、瞞產、退社、打牲口、不交公糧的農民，一律載上右派分子帽子，一時間，右派帽子在仙居城鄉滿天飛。

江華也是毛澤東手下的極左路線幹將之一，將仙居事件當作他反右的偉大成果，他宣稱平

息了一起小匈牙利事件，得到老毛的肯定。

毛澤東善於小題大作，他在當年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聳人聽聞地指出：“福建和浙江發生的小匈牙利事件，是中國爆發匈牙利事件的前兆，與會同志千萬不可掉以輕心。”

## 轟動全國的上海動力學校大案

葉思九教授（1921-2011）任教于上海動力學校（上海電力學院的前身，為中等專科學校）。1957年有師生員工三千多人。鳴放期間，葉思九副教授貼出大字報《官僚主義害死了何乃祺》。頓時得到三千幾百多張大字報回應，大字報之多，立刻成為上海教衛系統大字報之冠。何乃祺為該校數學教師，家住甘肅，因夫妻分居家境困難得不到解決憤而自殺。

毛澤東視察上海時，柯慶施報告了此事。市委責令學校抄錄所有大字報呈閱。毛於1957年9月17日晚在柯慶施、陳丕顯、馬天水的陪同下，接見了校長兼黨委書記仇啟琴。他向校長頻頻指點哪些大字報要注意，卻沒有點到葉思九的大字報。毛澤東的好學生、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兼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秉承毛澤東的指示，從此開始了一場圍剿。《解放日報》、《文匯報》、《新聞報》三大報組織全市投入批判。葉思九曾持校長的介紹信去報社要求糾正不實之詞。先後有數百名師生員工受迫害，三十七人劃右（包括內控右派）。其中有十二名學生和六名教師。這起不起眼的事件之所以成為全國唯一一起中等專科學校反右運動中的大冤案，還有四個特殊原因。

首先，上海動力學校的鳴放是在1957年的九月份才開始的，當時社會上的反右運動已經轟轟烈烈如火如荼。葉思九的大字報純粹為了向黨提意見，絲毫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意圖。運動中打出這麼多的右派，完全出於完成指標。其次，全國中等專科學校沒有像這樣大抓右派的，這是一起毛澤東、柯慶施製造的冤案。第三，這起冤案株連了這麼多人，有三位優秀學生自殺。例如二年級學生曹立生，不到十八歲，工人家庭出身，共青團員，批鬥中投黃浦江自盡；另一位學生跳進小河自溺，一位墮樓。同學們說：“海、陸、空，小右派死路一條。”更有幾位學生在發配勞動教養時自殺或失蹤。這種血案在反右運動中實屬罕見。

第四，打擊矛頭直接對準校方領導。筆者曾採訪過以後為這次反右冤案“改正”的黨委書記。他說，反右時的黨委書記兼校長仇啟琴是1941年上海交大的地下黨員，因為替葉思九寫了去報社的介紹信而被判為“右傾”和“包庇右派”，受到“黨內警告”處分，逐出學校。接任校長徐振聲是1948年浙江大學的地下黨員，他在北京參加學習班“向黨交心”時，對反右運動這麼搞法有所懷疑而被定為“嚴重右傾”和“為右派翻案”，停止黨內職務。文革中成為“漏網右派”，打斷四根肋骨。

葉教授沉浸在回憶中，心情沉重。他特別懷念反右中為他的大字報而冤死的學生：“他們才十多歲，思想單純。誣陷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人簡直狗彘不如。”

上海動力學校打成右派的教師有：

葉思九 1921年出生於江蘇靖江，曾參加一二九學生運動，1946年畢業於原中正大學。1951年評為副教授，任上海動力學校理論力學教研室主任。民盟成員。為那張大字報打成極右份子，送安徽勞動教養。1962年解除教養摘帽，遣送原籍農村種地，達十五年之久，1979才獲改正。歷經磨難，九死一生。編寫多種教材，著有記載自己經歷的《生死沉浮》。

倪維熊 工程力學教研室主任，民盟盟員，在葉思九大字報上簽名支持。撤職戴帽。金山農村勞動二年後返校任圖書館管理員。1979年後任圖書館主任，民盟上海科技諮詢部主任，1993年逝世。

張家齊 同濟大學畢業，汽輪機教研室主任，戴帽後勞動教養二年，脫帽後打掃學生宿舍廁所二十年。

李家驥 電工學教師，民盟盟員，1979年改正，任上海吳淞冶金專科學校教師至退休。

施蕊初 熱工學教師，震旦大學畢業，妻子離婚，1979年改正後任自控專業教師，退休後病逝。

陳基礎 南京工學院畢業，戴帽後留校工作，改正後任教師。

學生右派共有十二人。學生右派賀步陶是解放軍幹部子弟，共青團員，開除學籍團籍後青海勞動教養，下落不明。數百名學生上了黑名單，材料進入人事檔案，例如胡繼巨分配長沙，文革中自殺身亡。蔡新益不滿十八歲，不能劃右派，但檔案中塞進反黨反社會主義黑材料，陪伴終生。

倖存者有責任為歷史保存真實的記憶，尤其是那些毛澤東稱之為“祖國花朵”的少年學生，他們的生活才剛開始，便橫遭毛澤東、柯慶施之流的摧殘，幼小稚嫩的生命便早早夭折了。這是誰人之過？

## 成都二師小匈牙利事件

1957年4月的一天，培養小學教師的成都第二師範學校（現名鹽道街小學）的閱報欄前，圍著一群十六、七歲的學生，《文匯報》上刊登的關於安徽省某鄉幹部扣刻小教工資，並毆打常白金老師的報導，引起未來教師們的共鳴和公憤。他們頓時群情沸騰起來，在報紙上批起字來。

“此事與我們四川無關……”班主任、教導主任勸說無效，學生舉出無數的四川例子，甚至比安徽還嚴重。他們要求校方和市政府聲援常白金，而且要見報。他們的要求被拒絕後，學生進而聯絡全川師範生，共同調查並制止再發生此類事件。

這時省教育部門通知師範學校每年只發放9個月的伙食費，扣除三個月假期。這二件事聯繫在一起，五八級學生徐航發起書寫《告全市人民書》，晚餐後學生湧出校門，立即被守在門外的“市民”堵住，“市民”手持木棍，自稱工農代表，咒罵學生“忘恩負義，白吃人民的飯，白拿人民的錢”，暴徒沖進學校，警鈴響起，全校學生趕來增援。

學生撿起棍子追打，工農代表鬥不過學生，退至派出所。但派出所空無一人，工農代表也消失不見。6、7百學生狂呼亂叫返回學校。反右開始，當局小題大作，上綱上線，將其提升為

“反革命暴亂”，上報市委和中央。

成都二師為全川培養小學教師，是用八國聯軍時的庚子賠款興建起來的，巴金、艾蕪、沙汀畢業於此，思想活躍。帶頭學生徐航效仿梁啟超的《少年中國》，在校內辦起《蓉城少年報》。

市里派來一位新任副校長，他原來是區公安局副局長，派公安局副局長來當學校領導的目的明眼人一看便知。副校長上任，二話不說便成立“二師事件處理工作組”直接對中共成都市委宣傳部長葉石負責，由團市委學生工作部、教育局、公安局、學校保衛科派員組成。工作組的任務是發動群眾，清查隱藏在學生中的階級敵人和具有反社會主義情緒的其他分子，上報處理。

在實習結束後，校方宣佈57級300多名學生在分配工作單位前，先參加東城區小學教師整風反右學習班，自帶行李，住進磨子橋七中和成都空軍基地。封閉式學習班不准回家、不准外出、不准打電話、不准寫信；動員大會，學習討論，人人表態，相互告密，爭相揭發。20多天腥風血雨，大搞逼供信，每天至少要揪出2-3個各類“分子”來。“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站出來！”、“揭發參加二師暴動，衝擊無產階級專政機關的滔天罪行！”的口號聲響徹雲霄，未經世面的學生娃娃個個心驚肉跳。

學習班七挖八揪，居然挖出個莫須有的反革命“大同黨”來，成果輝煌。運動進入第二週，全體學生列隊返校，參加“逮捕反革命大同黨及其同夥大會”。大同黨首犯和主犯被士兵押解上臺，拳打腳踢，有二人打昏倒地。10多個大同黨都是58、59級少年學生，1958年4月底東城區教育局在錦江川劇院召開“慶祝反右鬥爭勝利大會”，57級15歲插班生吳紅獲寬大處理，僅劃內控右派。

全校1000多名學生劃右100多人，大都是不滿18歲的未成年人。絕大部分開除學籍，放逐西昌大涼山勞教，一去20年不復返。劃為極右分子的徐航在勞教中饑餓難熬，撿了爛番茄吃，被民兵發現按在地上用鵝卵石砸死；駝背鋼琴家不久活活餓死；餓死打死的學生娃娃不知有多少。

熬到1978年右派改正時，許多人拿不到改正通知書，父母找不到子女；有2人拿到改正通知書時，發狂大笑不止，倒地不起，發瘋而死。學生中的無名右派詩人作詩《祭友》歎息道：

少年望北斗，壯歲作楚囚。笑傲南冠幾多秋？歲月水東流；

人非物依舊，青塚恨幽幽，淚灑空吟聞笛賦，日暮風雨愁。

世事變幻，出人意料。窮兇極惡的副校長、原公安局副局長徐某，在運動後期被劃為右派；甚至領導成都市反右運動的中共成都市委宣傳部長葉石也被打成右派，他們的罪名都是混入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

## 第四節 慘遭處決的右派

### 黃宗奇 遭誣陷的反革命殺人犯

2009年4月，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生導師張翼星教授前來香港參加北大校友會成立二十週年的慶祝活動。張教授是當年北大哲學系的學生右派，他是北大哲學系著名右派教授張岱年的高足，師生右派，名師出高徒。

在張翼星教授離港回京的前夕，他應邀參加了香港五七學社的聚會。在回憶北大反右運動的情況時，張教授幾次提起哲學系的同學黃宗奇。黃宗奇是個又紅又專的優秀青年，是共產黨根正苗紅的接班人。僅僅因為他在反右領導小組組長任上反對粗野的鬥爭方法，被隔離審查，最後遭到槍斃，成為反右運動中的第一個祭旗人。

黃宗奇（1930-1958），亦有文章寫作“黃宗羲”、“黃中奇”，河北省滄縣人。家庭出身貧雇農，1948年參加革命並加入中共。1954年以調幹生身份進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習。他雖年齡偏大，但刻苦讀書，學習成績優秀，受到老師同學的好評。

反右運動開始，由於他是哲學系的學生黨員幹部，出身貧雇農，是中共理想的接班人。所以中共北大黨委指派他擔任哲學系反右領導小組組長，領導哲學系的反右運動。馬列主義哲學是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意識形態的重要陣地，哲學系理當站在反右運動最前列。由此可見中共北大黨委對他寄予的厚望。

隨著反右運動的深入發展，打擊面愈來愈擴大，鬥爭方式也越來越粗野。那些階級立場堅定的衛道士爭先恐後表達自己堅定的階級覺悟，說理鬥爭的右派言論批判會，變成了動手動腳的鬥爭會；動嘴不動手的批判，變成了嘴手並用，甚至動手不動嘴的全武行。有的進行人身攻擊，有的專暴隱私，有的更深挖祖宗十八代。

黃宗奇作為反右領導小組組長，挺身而出，反對這種甯左勿右的機會主義做法。他是地下工作出身的有八年黨齡的中共黨員，家庭成份過硬，根正苗紅，無所畏懼。他反對往右派分子身上潑髒水，主張說理鬥爭；他反對人身攻擊，挖隱私；允許批判對象申辯，不准剝奪人家的發言權；他反對動手動腳，不准搞變相武鬥。

他的思想觀點有悖於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不利於調動革命群眾的鬥爭積極性。當然更與中共北大黨委的指導方針相抵觸。反右領導小組其他成員秉承北大黨委指示，指責他思想右傾，同情右派。黃宗奇不服氣，與其他成員發生了爭執。可是在當時階級鬥爭的高壓下，他的這些正義主張在中共黨內處於少數，勢單力薄。他被指“同情右派，思想右傾”，清除出反右領導小組。

清除出反右領導小組後，他繼續堅持真理，處處與中共黨內正統的極左機會主義路線唱反調。中共北大黨委決定掃除這顆運動的絆腳石，初衷是讓他靠邊站，給他個自省的機會，把他爭取過來，還是把他當作自己人。

北大黨委指令哲學系黨支部先派人把他看守起來，限制他的活動範圍，讓他冷靜下來，改過自新，挽救回來，因為他畢竟是中共自己人。他被軟禁在教學樓，派幾位身強力壯的同學全天輪流看守他。1957年還沒有發明“隔離審查”這個階級鬥爭的專有名詞，當時叫作“促使受審查者深刻反省，認識自己的錯誤”，實際上是防止受審者抗拒逃跑或自殺。

黃宗奇自然不屈服於這種違反人道的強制性措施，自參加革命以來從來沒有遭受過如此屈辱性的待遇。他氣憤不已，趁午餐時間，只留下一位同學看守，其他學生吃了午餐再帶飯菜給他們兩人。他便推開窗戶，準備跳下樓去，以死相拼。

看守他的學生是北大藍球隊員，身高體壯。那位同學想把他從窗臺上拉下來。兩人動起手來。黃宗奇自忖不是對手，急中生智，摸出口袋裏隨身攜帶的一把折疊式小洋刀，亂舞一起，不小心在拉扯他的同學臉上劃出一道口子，微微滲出血來。

那時反右運動正處於白熱化階段，衛道士們鬥紅了眼，似乎到處都是階級敵人。中共北大黨委不失時機地把這起事件作為階級敵人對抗運動的新動向。黃宗奇頓時從革命左派變成反革命右派，所以這起事件也被定性為“反革命右派分子的階級報復”。

北京市公安局按現行反革命右派分子罪正式逮捕了黃宗奇，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不經審判核實，便以“現行反革命右派分子殺人罪”判處他死刑，立即執行。全然不顧他的家庭出身和個人光榮革命歷史。中共是實用主義者，階級分析法和出身成份論用起來隨心所欲，時而指鹿為馬，時而指馬為鹿。維護正義的不屈鬥士被當作階級敵人被中共祭旗了。

黃宗奇槍斃那天，中共北大黨委和中共北京市委組織北京市各高等學校學生到場觀看，進行血淋淋的階級教育。押赴刑場前，劊子手允許黃宗奇和妻子見上最後一面訣別，這種“待遇”到了文革完全取消了。

黃宗奇對他年輕妻子說：“我死後你不要守著，要另找一個人家，好好教育孩子，永遠跟著黨、跟著毛主席走社會主義道路。”可憐黃宗奇至死還執迷不悟，正是那個“黨和毛主席”把他這個無辜的中共黨員，送上了斷頭臺。他臨刑前的這句話被獄警記錄下來備案，雖經文革動亂，依舊保存至今。

1978年中共中央五十五號文件下達，開始右派改正。北京大學落實政策辦公室派人到北京中級人民法院查閱了黃宗奇的檔案材料，發現這顯然是一樁冤案。那年和他拉扯的同學也如實地證明互相拉扯的情況，黃宗奇根本沒有故意殺人的動機，那位同學僅僅劃破皮肉，沒有留下疤痕。

北大落實政策辦公室派人到河北省薊縣找到黃宗奇的妻子，她已改嫁，不願再提當年辛酸事。又找到在唐山市當架子工的兒子，賠給他二千元，算是落實了政策。共產黨真是草菅人命呀！

## 劉文輝 血祭文革第一人

文革浩劫中有不少仁人志士為了反對毛澤東的暴政、堅持真理而被中共以言治罪、以思想治罪、遭到專政機器殘酷的鎮壓。林昭、劉文輝、張志新三位烈士就是他們中間的代表人物。劉文輝更是血祭文革第一人。劉文輝烈士（1937—1967）江蘇無錫人，他剛滿三十歲便倒在中共罪惡的槍口底下。

劉文輝兄弟姐妹共有九人，父親劉宗漢，曾經是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職員，國民政府撤離上海後，他留下做留守工作。中共中央華東局工業部長汪道涵和副部長程望了解到劉宗漢當年不當漢奸、不去臺灣、押送救濟物資去解放區等事蹟，很器重他，讓他負責總務工作。後來又安排到船舶工業局工作。1950年代初，鎮反、肅反、三反五反，政治運動不斷，有人翻查出劉宗漢在國民政府上海救濟總署當過科長和一度當過專員的歷史，成為抹不掉的歷史污點，翻來覆去受到審查。劉宗漢有自知之明，識相地退職回家。到街道里弄，擔任街道掃盲班義務教員，並任校長。過了幾天，好事之徒又去揭發他“在國民黨裏當過專員大官”。如此這般，把他定為“歷史反革命分子”，在街道里弄就地管制改造。



劉文輝—血祭文革第一人

一家子十多個人斷了收入，生活頓時發生困難，劉文輝便在十六歲那一年綴學進入上海滬東造船廠當學徒工，掙錢貼補家用。他排行第三，老大去東北工作，老二當兵，是中共黨員，去朝鮮打過仗。因此只有他留在家裏獨挑重擔，照顧眾多兄弟姐妹。

劉文輝進廠後積極工作，1956年7月加入共青團，不久擔任車間團支部書記。1957年中共開展整風運動，號召職工大鳴大放，暢所欲言地幫助黨整風。劉文輝年青有為、血氣方剛，在座談會上挺身而出。公開向廠領導的官僚主義作風提出意見，並批評黨委書記“生活作風腐敗”，貼出了大字報。當父親戴上歷史反革命分子帽子時，他在徐匯區法院刑事庭上為父親辯護，表露對父親判決不公正的抗議，與法官頂撞。

反右時期，劉文輝攻擊黨的領導和公然藐視社會主義法律這二條已足夠右派分子的條件。雖說當時規定工人農民不劃右，但是領導為了完成右派指標心切，便把這個剛滿二十歲的小青年打成右派。接著把他調到浙江省舟山群島嵎泗列島的造船基地。他在小島上勤奮好學，博覽群書，很快掌握各方面知識。有了知識，便會思考，會了思考便會形成自己的思想觀點。在階級鬥爭的年代，獨立思考是最危險不過的事。嵎泗列島緊臨太平洋，進出上海港的外輪都經過這裏，有時候就泊在嵎泗列島附近，等候進港。這裏收聽敵臺又不受干擾，劉文輝可以自由地接觸外部世界。

探索陌生世界的好奇心，促使他和島上幾位志同道合的青年打算偷渡出去闖闖世界，尋求政治避難。四清運動中知情者出賣了他們，劉文輝獨自把責任承擔了下來。1965年底當地法院判決“劉文輝系一世仇分子，思想本質極端反動。組織叛國集團，妄圖投靠美帝，背叛祖國。戴上反革命帽子。判處管制三年，交群眾監督勞動。”他被押回上海。七十歲的歷史反革命父親和二十多歲的現行反革命兒子一起在日暉四村街道里弄打掃街道衛生，清理廁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發。

文革開始，他們家首先作為反革命家庭受到抄家批鬥的衝擊。八年多的右派和現反兩頂帽子並未壓垮劉文輝。反而激勵了他敏銳的洞察力。他寫出了《冒牌的階級鬥爭和實踐破產論》以及《通觀五七年以來的各項運動》二本小冊子，並在此基礎上奮戰四個晝夜，寫了《駁文化



大革命十六條》三十萬言書，復寫了十四份，由他和他九弟劉文忠分頭投寄十四所著名高等學校。在那狂熱的個人崇拜年代，敢於批判毛澤東需要多麼大的勇氣呵！可惜他們做得並不慎密，不久東窗事發。1966年11月17日，中共把這一案件列為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和偉大領袖”的頭號大案，開動專政機器，動用全國警力和偵察手段，迅速偵破，兄弟兩人被抓捕了進去。

兄弟倆人在獄中受盡刑訊迫供，劉文輝咬緊牙關抵死不認罪，與審訊人員據理抗辯。最後被判處死刑。1967年上海發生了安亭事件，張春橋姚文元一手策劃了“一月風暴”，王洪文領導的工總司奪取了中共上海市委的大權，毛澤東指示成立革命委員會，以接管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黨政大權。在這個時刻需要發動群眾，調動群眾的積極性。於是在1967年3月7日于上海文化廣場召開了一個“堅決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嚴厲打擊現行反革命分子”的萬人大會，以實際行動慶祝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成立。劉文輝等十多個反革命分子被押上了寬大的舞臺，當即宣佈死刑，立即執行。事後上海市檢察戰線革命造反委員會和上海司法戰線革命造反委員會大張旗鼓地公告上海全體市民，宣告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勝利。

劉文輝在臨死前寫了一份二千字左右的血書，機警地縫在被子裏，他相信他的衣物會被家屬領去。果然他母親去領取遺物，折洗被子時發現了它。他用自己的鮮血寫下的遺書道：“此遺書一定要保存好，讓我死得明白。我說它是私黨並不污蔑它。我將死去，我為什麼被害，因為我寫了二本小冊子：《冒牌的階級鬥爭和實踐破產論》、《通觀五七以來的各項運動》，此稿被紅衛兵抄去。另一本是傳單《反十六條》……此傳單是忠弟投寄出了事故，也正是我被害的導火線，你們瞭解我的情操，它可以用詩概況之：從誣反、右、壞、修、資，非資非奸非乖暴。反右幸嘗智慧果，抗暴敢做普魯米。鎖國應出土玄裝，焚坑猶落揭石子。今赴屠場眺晨曦，共和繁榮真民主。”

最後他寫道：“我將死而後悔嗎？不！決不！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從來暴政是要用烈士血軀來摧毀的，我的死證明毛政權下有義士。我在毛的紅色恐怖下不做順民，甘做義士！”

劉文輝用自己三十歲的年青生命成為血祭文革的第一位烈士。（根據劉文忠供稿編寫）

## 蔡鐵根 從老紅軍到死囚犯

1970年3月11日清晨，春寒料峭。江蘇常州西門外召開萬人公判大會。隨著幾聲沉悶的槍聲，五花大綁、身穿退色軍服、喉嚨被一根粗大的麻繩勒住的蔡鐵根大校應聲倒在他畢生為之拋頭廬灑鮮血的土地上。臨死前他悲憤地說：“這樁怨案總有昭雪平反的一天。”

蔡鐵根（1911-1970）於1911年12月5日出生於河北蔚縣塔頭村，曾用名蔡委心、蔡澤生。他出身貧寒。曾就讀廈門大學，1936年12月參加工農紅軍，1939年加入中共。作戰勇猛，曾隻身深入敵陣，虜敵無數，多次立功受獎。

蔡鐵根曾經擔任八路軍一一五師政治部宣傳部幹事，中共冀熱察挺進軍第九團政治處副主

任，華北軍政大學第一總隊副隊長。中共掌權後，獲大校軍銜，行政十一級（十三級以上為高幹）。起初擔任劉伯承為部長、蕭克為副部長的解放軍訓練總監總部條令局副局長。後調入南京最高軍事學院（劉伯承兼任院長兼政委）任作戰訓練部長、學術史教授會副主席、戰史教授會主任。



蔡鐵根

他給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當過秘書，也是劉伯承的愛將，又是朱德的老部下。就憑這些關係，他敢於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為老師劉伯承大膽仗義執言。

1958年，當社會上的反右運動進入補課階段的時候，毛澤東在軍隊內部發動一場反對軍事教條主義的運動，矛頭針對劉伯承和蕭克。毛澤東躲在幕後指揮，彭德懷當時主持中央軍委的工作，這場運動便由彭德懷出面領導。所以有些人說，這是一場元帥反對元帥的鬥爭。劉伯承年老多病，唯一的一隻眼睛也幾乎失明。運動開始時，正住院治療。陳毅到醫院去探望他，忿然不平地對他說：“你有什麼好檢討的，要檢討寫一百多個字就夠了。要寫我替你寫。”

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的劉伯承批判大會上，劉伯承的檢查被與會的一千多位將軍三次鼓掌打斷。臨走時全體起立歡送，主持會議的彭德懷氣不打一處來。立即召來幾百位大校、上校增加批判會的火藥味。蔡鐵根也在應邀之列。當時批判劉伯承負責制訂的《共同條令》是修正主義軍事路線和右傾機會主義的產物、修正主義大毒草、反對毛澤東的革命建軍思想和軍事路線。蔡鐵根大校個性倔強，不畏強暴，在會上挺身而出，為劉伯承、李達和蕭克辯護說：“共同條令是經彭總修改，軍委例會通過和毛主席親自批准的。學習蘇聯建軍經驗是毛主席提出來的，一定要先學……”。

話音未落，彭德懷惱羞成怒，一拍桌子，令人把蔡揪上臺來，當場撕去領章帽徽，讓人對他拳打腳踢，撕爛軍服。他頓時成為劉、李、蕭的替死鬼。會後舉辦了大小批鬥會無數次。由於軍內反右補課尚未結束，他遂被打成右派分子，正好補上了軍內右派的一個名額，開除黨籍軍籍，行政降為十五級，下放到江蘇省常州市工業局當巡視員。這是一個有職無權、相當於科級的閒職，實際上把他卦了起來。

妻子不明真相，受不了刺激同他離婚，留下三個孩子離家出走了。他由南京去常州報到時，懷抱六個月的小兒子、手裏挽著二歲的女兒、背後跟著三歲的大兒子扯著他的衣服，景況淒涼。在三年災荒期間，工資維持不了生活，除掉勞動又無所事事，因此經常借酒澆愁。

許多人見他是個老紅軍，在中央軍委當過局長，他又珍藏著同朱德、劉伯承、彭德懷合影留念的照片，慕名而來拜訪聊天。他一概熱忱接待，坦誠相交，毫無戒備之心。

其中有個名叫巢爾谷的常州五金公司文書，下放宜興丁蜀鎮後還有書信來往。1962年5月因參加當地教師組織《青年學社》被當地公安局傳訊。他立功心切，供出蔡鐵根的十九封書信和酒後失言牢騷話。蔡發牢騷說過對現實不滿的話，批評毛澤東。遊覽宜興善卷洞時，出於軍人

本性，說過“此地適宜打遊擊”。言者無意，聽者有心。巢爾谷統通彙報上去。但僅憑這些言行還不足以構成現行反革命罪。

文革浩劫開始，常州工業局保衛科長夥同紅衛兵來他家抄家掃四舊，搜出四十多本日記和一把繳獲的日本指揮刀。蔡當場聲明：“這日記沒給任何人看過，你們把內容擴散了我不負責。”日記中批評了黨內軍內不正常的政治生活，對某些政策的不滿，特別是對毛澤東的批評。巢爾谷又幾次來回常州綜合了他的材料，上綱上線，對他極盡污蔑造謠之能事。這個小人徹頭徹尾墮落成為一個告密的奸細。

在極左路線指導下，以造反派為主的常州市革命委員會於1966年9月成立了“蔡鐵根專案辦公室”，拘捕了他和週圍接近他的一百多人，辦起了有牽連者的學習班。抄家所得的信和日記自然成為他的主要罪證，他在落難中廣交朋友的仗義行為被說成是搞“反革命串聯組織活動”；蔣介石反攻大陸時，在善卷洞中出於軍人本能而隨便說的“此地適宜打遊擊”的話被誣贗為“要成立反革命遊擊隊，察看地形，陰謀推翻毛澤東和共產黨”。

在獄中他表示了極大的憤慨，曾經三次絕食，進行抗爭。蔡鐵根決定第三次越獄，進京上訪申冤。第一次越獄是在參加中共紅軍以前。他在青年時代加入過張學良的東北軍，在部隊開拔前去剿共時，他串聯了三十多位士兵準備攜槍投共。事敗洩露，被捕入獄。他趁一個風雪交加的夜晚，隻身逃脫，幾經周折，找到紅軍。第二次在七七事變以後，他赤手空拳策反了一支土匪武裝。可惜因部隊驕變身陷日寇監獄，飽受酷刑。他大義凜然地說服難友，組織暴動，越獄成功，回到八路軍。

然而共產黨的監獄要比國民黨和日偽的監獄狡詐和殘暴得多。第三次越獄失敗了，手銬之外，釘上腳鐐，罪加一等。1970年7月31日凌晨，有人叫他起床吃飯，向他宣讀了事後補發的逮捕證和未經審判的死刑判決書。蔡鐵根憤怒地喊叫：“你們無權判我死刑，我要上訴。”可是那時正處於無法無天的紅色恐怖的高潮之中，無人理會他的合法申訴。

臨刑前他對判死緩的同案犯說：“你們看過古裝戲《搜孤救孤》沒有？活著的，要把這個官司打到底。”

可憐他三個孩子，最大的才十歲，成了無依無靠的孤兒。豈料公安局還上門向孩子們索取子彈費，每顆五角錢。孩子們沒有錢，他們靠吃救濟糧過日子。喪心病狂的警察叫照顧他們的鄰居老太太書寫證明，證明他們付不出子彈費。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以老大蔡金剛為首的三個孩子進京替父告狀，歷經千辛萬苦，不知吃了多少白眼和苦頭，最後通過陳沂 - 黃克誠 - 胡耀邦這條線，才取得一紙改正通知書。上面寫著：“……蔡鐵根同志對向蘇軍學習有些看法，向中央領導同志寫信是合乎組織原則的，不應視為向黨進攻……蔡鐵根同志的所謂包庇蕭克反黨宗派活動理應予以否定……據此蔡鐵根同志的右派分子屬於錯劃，應予糾正。”

三個孩子回到常州又為父親的現行反革命案繼續奔走呼冤。女兒受刺激太深，得了精神病。等到蔡鐵根徹底平反、恢復名譽、召開追悼會的那天，他已經有了孫子外孫，子孫滿堂了，足

以告慰他的地下之靈。

他的日記和書信保存在他孩子們的手中，終有一天會重見天日。那時我們才能看到蔡鐵根大校的真知灼見和對毛澤東的批判。

## 沈元 北大才子的最後日子

1970年4月18日，北京郊外的早晨春寒料峭，刑場上一字兒跪著十多位執行槍決的犯人。他們之中有現行反革命分子、強姦殺人犯、盜竊犯、壞分子、現行特務。排在最後的北大才子沈元的背上插著一根木板，上面寫著“叛國投敵分子沈元”。沈元的名字上打著大紅叉。用卡車拉來組織圍觀的造反派和革命群眾高呼口號，搖旗吶喊助威。隨著槍響，犯人尚未倒地，沖過來一群白衣戰士，把尚有餘溫的屍體拖上救護車，呼嘯而去。那是為了摘取器官，用來移植。

沈元(1938-1970)時年三十二歲。他出身書香門第，是個靦腆少語、循規蹈矩的白面書生。1956年當他還是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大學生時，憑著他的聰穎和智慧，翻譯了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大反對史達林個人崇拜的秘密報告。當時中蘇關係尚處於蜜月期，他那幼稚而魯莽的舉動觸犯了天條，遭受滅頂之災，反右運動開始，他是理所當然的極右分子，開除學籍，勞動教養。沈元在街道監督勞動，埋頭苦幹，表現良好，很快摘掉了帽子。

摘帽子後，沈元經姑母介紹，推薦給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負責人劉導生。劉導生又推薦給他屬下的近代史研究所的負責人、歷史學家黎澍，安排在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來研究所不久，沈元就在1963年第一期的《歷史研究》上發表了長篇大作《洪秀全和太平天國》。同年2月12日《人民日報》用整版篇幅刊載他的《論洪秀全》一文。中共建國後，《人民日報》第一次用這麼大的篇幅刊載學術論文。接著，在《歷史研究的第三期上》，又發表了他《急就篇研究》。這篇論文對漢朝的兒童啟蒙讀物《急就篇》進行社會文化研究，展示了沈元對史學、文字學和音韻學的深厚功底和新穎的視野。在階級鬥爭的年代，不啻在沉悶的學術界起到振聵發聵的作用。得到眾多老學者的稱讚。甚至連郭沫若都讚歎道：“這樣的文章我也寫不出來”。

樹大招風，沈元的成就招致了人們的非議，在學術界引發了一場“沈元道路”的爭論。在那個人妖顛倒的時代，右派分子摘帽後仍稱摘帽右派，換湯不換藥。在當時，右派分子是不准發表文章的。連艾青、聞捷這樣的大詩人都不准許，何況小小的沈元。復旦大學的周予同教授在課堂上公然宣稱：“我舉雙手贊成沈元道路”。而大多數人對沈元道路持批判態度。北大歷史系有人向中宣部控告說，沈元是右派，報刊這樣發表他的文章，公開宣揚白專道路，喪失了階級立場。中宣部副部長周揚親自發話要中科院學部就此問題進行調查。

被調查的對象是近代史研究所的老中青研究人員。凡被調查的對象幾乎都讚賞沈元的為人



沈元

和治學精神。歷史學家黎澍甚至喜不自勝地說：“近代史研究要有十個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觀。”一位大歷史學家能對一位晚輩作出如此高度評價，當時又處於階級鬥爭的年代，包庇右派要冒何等重大的風險呵！

調查結果可想而知，結論是“對沈元的使用完全符合黨的方針政策，沈元本人努力改造，工作積極”。隻字不提社會上反響最大、爭論最激烈的沈元道路，即白專道路。這是從中宣部科學處到哲學社會科學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的默契，參與調查小組的成員也樂於保護這樣一個難得的人才。在調查工作期間，沈元又寫成《馬克思主義和階級分析方法》一文。但是已不准用他本名發表，改用假名“張玉樓”，發表在《歷史研究》，後又由《人民日報》全文轉載。

然而這種妥協並未完全平息風波。某些人得知沈元又用筆名發表文章後，一狀告到毛澤東那裏。最後毛澤東秘書田家英向黎澍打招呼說，今後再也不要讓沈元發表文章了，才到此為止。告狀信避開文章本身，直接指向他脫帽右派的身分。當時毛澤東說過，右派分子是敵我矛盾當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一種特殊稱號。照理說，摘掉帽子意味著回到人民內部，享受人民的待遇，這條政策被譽為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創舉。事實並非如此，毛澤東早已把五十五萬多的右派知識份子打入另冊。在極左思潮盛行的年代，脫帽右派仍舊是右派。右派是終身制的，只要是右派，戴帽脫帽一個樣。而且帽子拿在革命群眾手裏，不老實隨時隨地可以重新戴上。

沈元的右派身份和這段歷史永遠記載在他的人事檔案袋裏面，永世不得翻身。不久，史無前例的文革大浩劫開始。雖然有好心人把那份包庇脫帽右派沈元的調查報告銷毀了，但是曾經為沈元說過話，同情過沈元的人，一個個受盡折磨，遭到批鬥。周予同教授被打得跪倒地上認罪；劉導生、黎澍不知挨了多少批鬥。只有老奸巨滑的郭沫若又一次得到毛澤東的寬恕和保護。

作為文革首批衝擊對象的地富反壞右，沈元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文革開始時，他已結婚，寄住在親戚家中。紅衛兵運動一來，他首當其衝，一家人掃地出門。他們一家人東躲西藏，躲到哪里紅衛兵就追到哪里打到哪里。近代史研究所不敢接納他，杭州的姊姊自顧不暇，無法接待反革命弟弟。沈元和他的妻子找不到棲身之處，流離失所。這份痛苦、這份心酸是常人無法理解的。

在走投無路，呼天天不應、呼地地不靈的情況下，天真的沈元又犯了一次低級而幼稚的錯誤。他用皮鞋油塗黑面孔，喬裝打扮成黑人，試圖逃進蘇聯大使館避難，給轟了出來。上世紀1960年代初，毛澤東與赫魯雪夫翻臉，中蘇關係十分緊張，雙方互相視為敵國。沈元逃進蘇聯大使館尋求政治避難，造反派又進一步推理他可能有出賣情報之類的嫌疑，便被定性為叛國投敵。一個反革命右派分子叛國投敵應當如何量刑，在群眾專政的年代，公檢法便交給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眾去討論。

近代史研究所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眾認真討論“沈元叛國投敵案”。在高壓窒息的氣氛下，誰敢提不同的意見呢？全所上下一致同意“從重從快處以極刑”，連個緩期執行都沒有。在學術界向來敢說敢言的劉導生和黎澍也未有異議。他們違心地看著自己心愛的學生走上了斷

頭臺。

北京市公檢法軍管會的判決書寫道：“現行反革命叛國犯沈元，男，三十二歲，浙江省人，偽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中國科學院近代歷史研究所實習研究員。其母系右派分子，其兄因反革命罪被判過刑。沈犯頑固堅持反動立場，書寫大量反動文章，大造反革命輿論，並企圖叛國投敵，於1968年9月1日，化裝成黑人，闖入外國駐華大使館，散佈大量反動言論，惡毒攻擊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誣衊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他終於倒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槍口下，在當年北京市判決死刑的五十五名現行反革命分子中，沈元是首犯。

然而沈元之死使黎澍遭受錐心之痛。四人邦剛倒臺，他便首先提出為沈元平反的問題。在改革開放的初期，“叛國投敵”這一類敏感問題還是人們所不敢問津的。近代史研究所許多人認為沈元“罪不至死”，惋惜這位才子的早逝。幸虧劉導生已調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黎澍要求為沈元平反的建議很快得到劉導生的理解和支援。是他們兩人在沈元的逆境中發現了這位天才，又為他作了平反。劉導生把案件讓北京市公安局重新審定，做出了“罪不當死”的結論。

在文革黑暗的歲月，不少知識精英不堪凌辱，選擇了被迫出逃這樣一條出路，例如馬思聰、傅聰等人。沈元也選擇了這條道路。可惜他的命運不濟，英年早逝。四十多年過去了，如今沈元早已成為枯骨，我們再也看不到他才華橫溢、具有真知灼見的論文。沈元個人的悲劇即是中國一代知識份子的傷痛。

## 周居正 共產黨槍斃紅岩英雄

1964年春一個天高雲低的日子，近千名在四川永川新勝勞改茶場就業的摘帽右派正在給茶樹修枝打蟲施肥。忽然場部通知西山四大隊的全體職工在紅茶車間的大院裏開會。大院四週制高點的小山頂上架起了機槍，三步一哨，五步一崗。平時穿便衣的管教幹部腰間也別上了手槍，氣氛異常緊張。那些摘帽右派你看我我看你十分困惑，又不敢說話。

等各隊的人員到齊，宣佈召開四川省高等人民法院公判大會。法官宣讀了一個“反革命集團”及其成員的名單，有判有期，有判無期，有判死緩。最後武裝押上一位戴深度近視眼鏡、剃光頭、中等個子的中年男子。這位就是紅岩英雄周居正。他的罪行是組織反革命集團“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自任總書記。他親自編著反動組織綱領《新民主社會主義論》。念罷宣判書，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宣判完畢，周居正背後插上打紅叉叉的死囚牌子。不到十分鐘，他就倒在了生育他的大地上。

周居正（1930-1964）出生於四川合川，出身貧寒。1945年在武勝縣就讀師範專科學校時便參加中共和中共領導的地下組織活動，那時不到十六歲。1948年參與領導由中共組織的“反內戰反饑餓要自由要民主”的學生運動，策劃民變武裝。被國民政府逮捕關押在重慶的白公館監獄。與《紅岩》作者羅廣斌、中共重慶市委幹部杜文博等關押在一起。1949年重慶解放

前夜，他們在獄中縫製五星紅旗，做獄中看守的策反工作。在九死一生的越獄行動之中，周居正幫助難友背出一個四歲的孩子，表現得十分英勇頑強。可是羅廣斌後來在小說《紅岩》中張冠李戴，把周居正縫製五星紅旗的壯舉硬生生地移到了江姐—江竹筠的身上。

1957年反右運動時，二十七歲的周居正已是中共重慶市委黨校馬列主義教研室的教師，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深信不疑。大鳴大放時熱情洋溢地向黨交心。提出各種建議，熱忱地幫助黨整風，改進工作作風和思想作風。結果中了陽謀的圈套。在批鬥他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言論時他死不認罪，強頭倔腦地加以申辯，表明心跡。其結果是戴上極右帽子，開除公職、開除黨籍，押送四川省勞改局四一五勞教築路支隊勞教。

五年飽受饑餓的勞教生活，使他狂熱的頭腦清醒了下來。1962年雖然摘掉了極右帽子，但仍舊是個摘帽右派，無法回家同妻子兒女團聚。他作為解教三業人員（勞改、勞教、就業）強制發配到四川永川新勝茶場就業。周居正個性內向，熱愛寫作，喜歡研究文字改革，勞教期間寫出數萬字的《漢字改革方案》，寄送《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在勞動中，隊友們在休息的時候烤火、抽煙、閒聊、擺龍門陣。各自擺出錯劃後的經歷，也議論廬山會議打倒彭德懷、人民公社、大躍進、公共食堂和“三年自然災害”。這類飯後茶餘的聊天被私利小人彙報上去，無事生非，小事變大事。說有人攻擊三面紅旗，惡毒咒罵黨和毛主席，組織反革命集團，甚至有聲有色地說要進行暴動。憑空捏造出了一個“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右派反革命集團”，先後逮捕數百人。某些三業人員失去人性，相互撕咬，胡亂指供，目的為了開脫自己，邀功請賞。獄官們乘機大搞迫供信，正式逮捕了以周居正為首的六十九名現行反革命罪犯。



周居正死刑刑場記錄

一年多來的關押審訊，屈打成招。毫無根據地判定周居正是首犯，同另一位四川瀘州軍區中尉教官、黨員右派楊應森一起判處死刑，分別在永川和灌縣立即執行。另外六十多名案犯均是摘帽右派，三人判處死緩二年；四人判處無期徒刑；十四人判處有期徒刑十年至二十年不等。此一轟動四川乃至全國的亙古大冤案至今未獲平反。

周居正的家屬受到株連。長子周復生、次女周復甦下放四川邊遠山區當知青。周復生不堪凌辱用鐮刀割喉自殺。妻子曾昭英老師在文革中戴高帽子遊街示眾，批鬥毆打。身邊的小兒子經不住精神折磨，曾投嘉陵江自盡。曾昭英老師形單影隻，古稀之年貧病纏身，靠微薄的教師退休金艱苦度日，不堪回首話往事。



## 張錫琨 文革後被槍斃的右派

北大化學系四年級學生張錫琨（1934—1976）出生於四川，家境貧困。在1957年的鳴放中，他以犀利的文筆和深刻的分析寫就了二張大字報《衛道者邏輯大綱》和《人性的呼喚》。當年看過他寫的大字報的人都深感欽佩。

《衛道者的邏輯大綱》把當年的教條主義者刻劃得入木三分，至今仍有現實意義。大字報中說：“一，黨的錯誤是個別情況，對他的批評是反對全黨；二，民主自由是黨的恩賜，再要索取便是煽動鬧事；三，歌頌奉迎是一等品德，揭發錯誤就是否定一切；四，積極份子就是馴服工具，盲目服從就是擁護領導；五，萬事保密是警惕性高，若加思考就是立場不穩；六，政治必修是制度原則，若加考慮就是反對馬列；七，國家制度是早已完善，再加指責就是陰謀造反；八，政治等級是統治槓杆，取消等級就是製造混亂；九，蘇聯一切儘管搬用，誰說教條主義就是挑撥蘇中……‘三害思想’也合人情，誰若過敏就是別有用心。”

《在人性的呼喚》中他寫道：“人在形成過程中，人性亦隨之形成。但從人類進入階級社會起，人開始有了階級性，加上種種階級仇恨的教育，人性就在階級矛盾的掩蓋下，被沖淡了。被忽視了！到了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時期，本應使人性得到更多的尊重，但恰恰相反。如不准休息、吊打……以及其他肉體摧殘。與此同時，官僚主義對人身進行了無形的迫害。由於法制的健全，所以這些惡劣現象在社會上未被有效制止，所以社會風氣開始敗壞，兒子可以對父親任意漫罵，甚至將其捆綁、鞭打……學生開始以無人性的方法，以得到領導對其階級性的信任。無人性成了得到信任的強有力的工具！於是扣大帽子之風盛行了，每逢一人，就迫不及待地千方百計地將他證明為反革命，所以把一切生活瑣事以及開玩笑的話，都搬來作為口實，將其推向反革命的邊緣。朋友，想想吧！不要再出賣良心，不要再屠殺自己的兄弟。回到人性中來。”

在階級鬥爭的年代裏，人們為了追求進步，甚至為了得到最起碼的生存條件，必須主動或被迫地與自己出身不好的父母家庭劃清界限，背叛自己的階級出身。為此沒有親情，沒有人性，沒有關愛；彼此鬥爭，相互揭發。共產黨提倡“階級感情”，培養“階級仇恨”，因此泯滅了人性。張錫琨這張大字報，點出了中共泯滅人性的根源所在。

《百花學社》成立後，原來由中文系的張元勳和沈澤宜創辦的壁報改為刊物《廣場》。送到《工人日報》去印刷時，稿件和紙張全部被扣押。張錫琨和同學們湊錢買紙張、油印機。張錫琨跟大家在一起，默不作聲地連續幹了四天四夜。

張錫琨是個忠厚老實、話語不多的人，喜歡埋頭苦幹，不愛表現自己。反右高潮時，他對形勢已有清醒的估計。他說：“形勢的發展看來對我們越來越不利，對我們來說，最後的結局可能是悲劇性的。不過任何政治運動總會有人做出犧牲，只要我們做到問心無愧就行了。”他喜歡背誦拜倫的一首詩：“愛我的，我致以歎息；恨我的，我致以微笑；無論頭上有怎樣的天空，我準備承受任何風暴！”



1958年他與大多數右派學生一道，送去北京團河農場勞動教養。1959年林彪下達林副統帥第一號通令，走資派、四類分子、右派都被送出北京，疏散到外地。勞教分子遣送回老家，交給群眾專政。張錫錕遣送到四川北部的一個勞改農場，繼續勞教。他已失去自由二十年，不堪忍受無休止的勞教生活，試圖組織反抗，逃離勞改農場。

1976年底粉碎四人幫後，被中共的專政機關以“企圖組織逃脫”的罪名被槍斃了。他的遺體由其妹妹領走，掩埋在四川盆地一個不知名的地方，就此在人間蒸發掉了。張錫錕的妻子後來改嫁了，現在他的女兒已有五十多歲。他的女兒是他唯一的直系親屬，但她沒有提出洗刷冤案的要求，旁人無法替代。因此張錫錕的冤案有待全體右派徹底平反那天才得以昭雪。

### 陳學詩 槍斃的志願軍偵察排長

陳學詩（1935-1959），雲南省瀘西縣人，出身貧民，家居縣城東門外。他從小念書只念到初中。1949年初十來歲的時候，聞知本地要組織親共的華定周遊擊隊，他萌生了打遊擊幹革命的念頭。他瞞著父母找到華定周大隊長，撫摸著華定周佩帶的駁殼槍愛不釋手。他提出要求為大隊長扛槍當馬夫，當勤務兵，反正只要讓他參加遊擊隊，幹什麼都可以。在他苦纏蠻攪下，大隊長不得不收編他為遊擊隊員。

參軍後隨軍開赴滇西，不久整編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參軍當年只有十餘歲，但長得高大，超過同齡人，所以也不十分引人注目。1950年11月，毛澤東決定出兵朝鮮，挽救搖搖欲墮的金日成獨裁政權。陳學詩參加中國人民志願軍開赴朝鮮前線。中國人民志願軍實際上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換了一塊牌子，蒙混國際視聽。陳學詩在朝鮮前線奮勇作戰，多次深入敵陣，摸取情報，立下戰功，擔任了偵察排長。他身高一米七八，高大英俊，率領偵察排無數次完成上級指派的偵察任務。

朝鮮停戰後，志願軍於1953至1955年間分批回國，說是休整，實際上是進行審查，最可愛的人也逃不過政治審查的命運。中共黨支部要求每一個志願軍戰士交代自己的家庭出身和社會關係，以量“德”錄用，安排工作。陳學詩從小離家出走參加革命，他根本不知道土改時家庭劃了什麼成份，所以他對自己的階級出身說不清、道不明。

1955年復員回家，回到瀘西老家，才知他家劃為工商業兼地主。家產房屋遭沒收，父母雙亡，姐姐遠嫁昆明。他忽然變得舉目無親，無處存身。多次到縣政府人事科，要求安排工作，人事科遲遲不作答覆。他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痛斥了縣政府人事科長。人事科長是縣委書記的夫人，他不知道自己已經捅了馬蜂窩。雖然最後分配他到瀘西師範附屬小學當了一名小學教師，卻因得罪了縣委書記夫人而埋下了以後的災難禍根。

1957年八月學校放暑假，瀘西縣中小學教師集中進行反右整風學習運動。中共縣委書記親臨現場作動員報告。年輕無知的陳學詩根據縣委書記動員報告的精神，針對各級領導實際存在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三害”現象，寫出了不少大字報。當時社會上已經進入反擊資產階級右派倡狂進攻階段，一些有社會經驗的教師早已擔驚受怕，生怕反右反到自己頭上

來。也有好心人為陳學詩捏了一把汗，悄悄提醒他注意分寸，適可而止。可是他全然不顧，反而理直氣壯地認為自己光明正大，助黨整風，幫助黨改進工作作風，毫無懼色。

果然不出某些好心人之所料，當助黨整風轉入反右階段，陳學詩成為小學教師中第一個揪出來受批判的人。“初生之犢不怕虎”，小組開始批判他時，他自持是志願軍偵察排長，是最可愛的人，公然提出：“小組會批判不過癮，要批最好在大會上批。”領導接受他的要求，把他放到大會上去批鬥。在大會上他態度十分傲慢，藐視衛道者們的批判，認為那些無限上綱的批判言詞空洞無物。興奮之餘，把雙腳高高地翹到桌子上去，傲視積極分子。他拒不承認自己是右派分子，不畏強權，不懼個人安危，敢於堅持真理。

中秋節晚上，開完批判大會之後，他在激動之餘，抒發自己的感情，在宿舍里拉起手風琴，邊拉邊唱，吸引了不少聽眾。那些人白天大會批判他，晚上又圍著他聽他自拉自唱。可是陳學詩的自信和樂觀畢竟抵擋不住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機器。他給判定為極右分子和階級報復分子。為整風反右中拒不認錯、敢於頂撞、據理頑抗而定為極右分子；為辱罵縣政府人事科長、縣委書記夫人而定為階級報復分子，因為他的家庭成分是工商地主。所以他是雙料階級敵人，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

一個志願軍英雄，一個最可愛的人，瞬息之間變成階級敵人，全縣中小學教師為他鳴不平。但是在那種階級鬥爭的年代，誰敢鬥膽挺身而出為他說話呢。1958年9月整風反右運動剛結束，陳學詩即被瀘西縣公安機關逮捕法辦，判處五年有期徒刑，送曲靖陸東煤礦服刑。他在武裝獄警押解之下，含憤接受強制勞改，一方面一再向獄方提出申訴，向管教人員陳述自己的冤屈。犯人不滿判決，提出上訴，照理這是屬於正常的法律程式。可是在那階級鬥爭的特殊年月，犯人上訴成為不服管教、抗拒改造的表現。陳學詩成為不服管教的特殊犯人，處處受到制脅。

勞改隊裏勞動強度極大，勞動時間長，吃不飽。1958年下半年，已經開始了由人民公社、大躍進造成的人為饑荒。年青力壯的陳學詩耐不住饑餓的折磨，一天深夜偷偷溜進管教人員的食堂抓飯吃。吃飽了飯跑出門口，被警衛人員發現，槍口抵住他的腦袋叫他“不准動”。他掙扎著怒吼道：“你這支槍為什麼不對準美帝國主義卻要對準我呢？”

盛怒之下，一拳打倒了警衛。其他警衛聞聲趕到現場將他團團包圍。給他打倒的警衛說：“這個犯人太不平凡了，廚房大門鎖得牢牢的，不知他如何進去偷飯吃。”那些警衛不知道陳學詩是經過特殊訓練、富有戰鬥經驗的志願軍偵察排長。偷進食堂，小菜一碟。他即刻戴上手銬，另一名警衛怕他逃走，用刺刀對準他大腿刺了一刀，也不給他治傷上藥。

陳學詩被當作特殊重刑犯押送曲靖專區監獄監禁起來。他腿上的傷口化膿潰爛，生出蛆蟲來了，臭不可聞。他以對抗改造罪判處死刑，立即執行。1959年歲末，大雪覆蓋大地，寒風刺骨。在哀鴻遍野，餓殍萬里的雲南東南部陸東煤礦，陳學詩被執行槍決。附近地區的右派分子和其他壞分子都傳喚到場，觀看執行抗拒改造右派的死刑，以示警告。

他忍受著巨大的傷痛，掙扎而起，昂首挺胸，從容走向刑場，含冤就義。那一年他年僅二十四歲。志願軍英雄陳學詩長眠在曲靖東山的紅土坡上，他沒有後代，也沒有親人，唯一姐姐

遠嫁他方，沒有親人為他申冤。雲南瀘西縣共劃六十一名右派，十三位屈死在勞改農場，槍斃的只有陳學詩一人。

二十年後，陳學詩得到改正，中共縣委書記沈同安在接見改正右派時流著淚說：“陳學詩同志是志願軍偵察兵的排長，在朝鮮戰場上美帝國主義的槍彈沒有把他打死，卻被我們共產黨的槍彈把他射死了。”

## 柳湜 獄中“殺人”的教育部長

柳湜（1903-1968）乳名克立，化名辰夫、乃夫、方直、羅斐、楚士。湖南長沙人，少年時就讀於長沙第一高等小學堂和徐特立首創的長沙第一師範。五四運動後，受其兄柳直荀和進步同學影響，閱讀了許多社會主義書刊。1921年後義務為湖南自修大學附設的外文補習班教授語言，1924年赴北京半工半讀，1926年因病返湘。



柳湜

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8月在中共安徽省委工作時被捕，在獄中精讀了《資本論》（第一卷）等馬恩著作。1933年4月底出獄到上海，在《申報》流通書館工作，並在《申報》辟《讀者指導》專欄。次年該專欄被查禁，柳被解職，遂與李公樸等另組《讀書生活》半月刊，後又創辦讀書生活出版社。

1936年參加鄒韜奮《生活日報》的編輯工作，主編《生活日報週刊》（原名《星期增刊》）。此間，與沈鈞儒等發起成立上海救國會，後受中共組織指派赴漢口創辦《全民週刊》，曾主編《戰時社會科學叢書》。1938年7月參與主編《全民抗戰》三日刊，武漢淪陷前隨刊移重慶。

1941年初到延安，以救國會中央執委身份出任陝甘寧邊區參議會參議員。在隨後召開的邊區第一屆參議會第一次會議上，被選為陝甘寧邊區政府委員，任教育廳長。他主持制定的《1942年教育工作計劃大綱》，確定了邊區教育工作的三項主要任務，一是建立正規的教育制度；二是提高各級學校的教育品質；三是繼續推行新文字、掃除文盲。在1942年的整風運動中，柳是邊區政府學委會的委員之一，同年三月三十一日還參加了《解放日報》改版座談會。

1944年10月，柳湜主持召開邊區文教代表大會。毛澤東親臨大會，作了題為《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戰線》的講話，闡明了中國共產黨的文化工作方針。柳在大會總結中根據黨的文化工作方針，提出了培養知識份子，開展了群眾運動的邊區教育方針。他特別強調，群眾教育的最終目的是消滅邊區的文盲。

1945年7月13日，柳和范長江等代表解放區新聞記者協會，出席了在延安召開的中國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籌備委員會，並被選為籌委會常務委員。次年一月，他出席邊區教育廳召開的有邊區七個中學校長、教導主任及教員代表共三十五人參加的中等教育會議。指出：有計劃地

培養邊區知識份子與提高現任區鄉幹部的文化，是今後中等學校的總任務。

1947年3月在胡宗南大舉進犯延安之前，柳離開邊區，東渡黃河前往晉察冀解放區，同年五月任冀中行署教育廳廳長。北平易幟後，任北平市教育局局長，負責教育界的接管工作，為恢復建立學校的教育管理秩序而操勞。

1949年3月，中共上海地下市委情報委員會書記吳克堅，經李維漢介紹，通過柳湜與國民政府中央航空公司副經理查夷平的親戚關係（查為柳的姨夫）對中國、中央兩航空公司進行策反工作。柳向查做了說服動員，堅定了查策動“兩航”起義的決心和信心。4月，中共地下組織通過查把國民政府首席和談判代表張治中將軍的家屬秘密送往北平。又經五個月的策劃，國民政府中央、中國兩航公司部分員工終於在香港宣佈起義。在兩航起義工作中，柳湜為中共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勞。9月，柳作為中華全國教育工作者代表會籌委會代表，在北平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柳湜先後出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長、教育部視導司司長、《人民教育》總編輯、教育研究所所長、教育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機關黨委書記等職。是中共八大代表，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1958年柳湜被康生加上莫須有的罪名劃為右派分子，撤銷了黨內外一切職務，開除了黨籍，接著是無情的批鬥和懲罰性的勞動改造。柳始終對中共忠貞不貳。他說：“就算是戰場上無意中被自己人打中了吧。只要是黨的事業繼續前進，個人的成敗得失算的了什麼？”表現了他高尚的道德品質。1961年6月之後，中共黨組織安排他在教育研究所當研究員。他沒有怨言，繼續以飽滿的熱情工作，撰寫了各個歷史時期的教育史與教育專著多部。

1968年4月12日，他被一夥人突然抓走，幾天後即被嚴刑拷打，逼其承認自己是叛徒，被打得皮開肉綻，大腿折斷，腦漿迸裂，於4月22日離開人間。人們在他的棉被裏發現一張小紙條，寫下他留在人世間的最後幾個字：“政治迫害，毒打取供，我非叛徒，為我申冤。”江青反革命集團被粉碎後，1979年6月14日，柳湜得到平反昭雪。遺著有《柳湜論文選》等。

## 朱守中 槍決的革命烈士

1978年在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時的全國性糾正冤假錯案的高潮中，有幾位槍決的右派分子和文革中犯“惡攻罪”的人士，被中共當局追認為烈士，他們之中有毛應星、朱守中、李九蓮、王申酉、張志新。然而和他們一樣壯烈抗暴、英勇就義的一大批右派壯士如林昭、馮元春、劉文輝、周居正、楊應森、黃宗奇等等為什麼享受不到中共的烈士待遇呢？他們同樣犯的是“惡攻罪”，中共為什麼要厚此薄彼呢？其中不可告人的界限是有沒有公開反毛。只反對林彪、汪青，以及不太明顯地公開反毛者，可追認為烈士；既反林、江又反毛，衝破了批毛的底線，對不起只好靠邊站，沒有資格當烈士。

朱守中（1920-1970），原籍江蘇省金山衛（今上海市金山區），農村出身。從小勤學苦讀，中學畢業後於1938年考進上海復旦大學讀政治經濟系。復旦大學政治經濟系畢業後，進入

上海市重點中學復興中學任教。1949年5月，中共剛進入上海，他便參加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並擔任復興中學教工團支部書記，1950年參加中國共產黨。先後擔任上海市教育局視導員、上海市初等教育師資訓練班副主任、上海市第一速成師範學校（原址今四川北路1844號）副校長等職，在上海市的中等教育界曾經是紅極一時的左派。

1957年他在反右運動中主動向組織反映自己思想中的疑慮，作為學校反右運動的領導人，質疑右派是不是劃的太寬？他立即被斥為政治上動搖退卻。1958年因同情右派，而動搖了共產主義信念。包庇同情右派與右派同罪，他被劃為右派，遭開除中共黨籍、撤去副校長職務的處分。接著被調往寧夏回族自治區，任中衛中學數學教師。他不准教政治、歷史、語文等社會科學課程，只可教數理化。因為右派分子總是異類。但他教學認真負責，成績出眾。

他對於自己劃為右派、遭受如此嚴重的處分始終不服，耿耿於懷。因此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後的平反甄別浪潮中，不斷提出申訴，要求甄別。可是在1965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即四清運動）中又被定為地主分子和壞分子，下放鹽池農村勞動。

1968年他又被押往寧夏賀蘭縣勞改農場勞動教養。朱守中是個敢於獨立思考、堅持真理、敢於亮出自己思想觀點的人。即使在如此險惡的逆境中他也認為劉少奇是政治家、優秀共產黨員；林彪、江青有野心；林彪作為接班人寫進中共九大《黨章》不符合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原則，教育革命不能光念《語錄》，大中學校的基礎課、專業課不可缺少等等。他的言論在當時紅色恐怖中，非但是離經叛道的反革命言論，而且替劉少奇說話，攻擊林彪、江青更犯有“惡攻罪”。1969年他以現行反革命分子罪判處死刑。1970年在寧夏被槍決，時年五十歲。

1980年，中共寧夏回族自治區委員會為他平反昭雪，恢復黨籍，追認為革命烈士，並向全自治區發出《關於學習優秀共產黨員朱守中同志模範事蹟的通報》。朱守中是被槍決的右派分子中少數幾個能享有“烈士”稱號的人，他身後留下的遺族亦可享有終身受用的優厚撫恤待遇。

## 吳紀仁 獄中逼瘋的大學講師

1969年春天，原來親如手足的中蘇兩國，突然之間翻臉成為你死我活的仇敵，爆發了珍寶島爭奪戰。中共軍方好戰成性，以為中蘇之間勢必爆發一場惡戰。當年10月18日蘇聯談判代表團，乘飛機到達北京首都機場，中國軍方估計會有一支蘇聯特種兵衝鋒隊沖出飛機佔領首都機場，然後蘇軍空降兵源源到達。但是飛機艙門打開，走下幾位文質彬彬的外交官，打破了中國軍方的預測。中蘇大戰沒有發生。但中共窩裏自己先亂了套，作出戰備動員。庸人自擾，自討苦吃。

可是備戰準備已經全面鋪開，林副統帥下達了一號令。北京大規模疏散人員，從死不悔改的中共高層走資派，如鄧小平、彭真、薄一波之流，直到監獄裏的犯人紛紛分配到全國各地緊急疏散。毛澤東在湖南長沙積水洞，林彪去蘇州，劉少奇押送河南，北京只有周恩來留守。

北京在押的政治犯、刑事犯和未判決的疑犯，都轉移出北京。北京市第一監獄的犯人全部轉移到河北邯鄲東部的曲周縣和大名縣，年輕力壯者送往北場，五十歲以上者送往南場。關押

在南場的絕大多數犯人是政治犯，又可區分為歷史和現行兩大類。歷史反革命主要是留用的國民政府軍政官員，包括起義的、投誠的、俘虜的；現行的則為現行反革命、右派反革命。這些犯人中的知名人士有錢學森同學、清華大學一級教授徐璋本、原總工會頭頭、行政八級高幹黃理文、新華社國際部高級記者鄒震以及北京外國語學院法語系講師吳紀仁等。

吳紀仁（1924-1970）原為北京外國語學院的講師，1957年因鳴放獲罪，判處勞動教養。疏散來邯鄲勞改農場後，不論在公開的小組會或私下的議論中從不認罪服罪。他在為自己的辯護過程中，毫無顧忌地評論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方面的敏感問題，在犯人大會中多次遭到嚴厲批判。他的反動言論幾乎涉及自1957年至1970年所有重大的政治事件，而且都同中共當局唱的反調。犯人們都為他捏一把冷汗，背後說：“吳紀仁活膩了！”

經過反復批鬥，吳紀仁精神不正常，已經有些瘋癲。他被關進重刑犯的單人禁閉室裏。路過的人都能聽見他在小號裏一個人大聲的宣講，反復強調他的觀點立場，聲嘶力竭，慷慨激昂。可是獄方說他是裝瘋賣傻，思想反動，故意搗亂。

1970年一打三反的高潮中，獄方處決了三十多名現行反革命分子。吳紀仁亦是其中之一。吳紀仁槍斃的那天上午，勞改農場沒有出工。下午午休後召開犯人大會。會上宣讀邯鄲地區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的判決公告，處決三十多名現行反革命分子。吳紀仁劃右後不服改造，繼續全面的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犯有“惡攻罪”，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在同牢犯人聽到這個判決書的時候，吳紀仁講師早已命歸黃泉，身上的器官已經移植到不知什麼人的身上去了。

獄方趁機殺一儆百，宣讀書念完後，點名叫出二十幾位不服改造、調皮搗蛋的犯人。點到名的人站出來到前面示眾。其中就有瘦小的徐璋本教授。

1979年中共外語學院黨委僅僅宣佈為吳紀仁改正平反。一位才華橫溢的講師就此人間蒸發掉了。

### **顧文選 引渡回國 慘遭殺害**

1970年在文革高潮中的一打三反運動中，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於1970年2月11日春節前夕發出告示：

為了加強對一小撮反革命勢力的專政，狠狠打擊現行反革命破壞活動，進一步搞好首都革命秩序，最近再公審宣判一批現行反革命分子。現將顧文選等五十五名罪犯的材料發給各單位，請各級革命委員會，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組織革命群眾認真討論，提出處理意見，速告市公檢法軍管會。

此材料只供內部討論，不准張貼。

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

一九七〇年二月十一日

下面便是顧文選等五十五名反革命分子的名單和罪行。同一批遭處決的還有北大歷史系學

生、右派分子沈元和批判毛澤東出身成分論的遇羅克。顧文選名列第一名：

現行反革命叛國犯顧文選，男，三十六歲，浙江省人，系反革命分子，北京市清河農場勞改就業人員，因反革命罪被判過刑。

現行反革命周鴻東，男，三十七歲，遼寧省人，資本家出身，系反革命分子，北京清河農場勞改就業人員，因反革命罪被判過刑。

顧、周二犯頑固堅持反動立場，經常散佈反動言論，惡毒攻擊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刑滿就業後多次策劃叛國投敵，並出賣了我國重要情報，被引渡回國。

顧文選和周鴻東判死刑的主要罪名是“惡毒攻擊”和“叛國投敵”。這二條罪名都屬於“惡攻罪”，凡涉及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和“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都屬於防擴散性質，材料不予公開。即使在五十年以後，這種材料還是屬於封存、銷毀、篡改、刪節的範圍。顧文選短暫的一生都在勞改農場和監獄渡過，不可能結婚成家，留下子嗣。因此直到今天，我們對顧文選知之甚少，僅靠當年的同學和難友回憶一二。

顧文選(1934-1970)浙江杭州人士，家庭出身貧民。中共掌權前曾在杭州警察局當過差，是公安局的留用人員。他從小酷愛文學，特別喜歡詩歌，所以非常欣賞胡風的長詩《時間開始了！》為此在鎮反、肅反時在杭州市公安局內部受到審查，遭受嚴刑拷打。1956年以社會閒散人員身份考入北京大學西語系，1957年時為西語系英語專業二年級學生。

1957年5月25日，北大西語系講師黃繼忠主持召開控訴大會，兩卷本《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中有一段關於顧文選的記載：

(1957年)5月25日下午

一些學生以西語系英三班和團支部的名義在辦公樓禮堂召開了一個“反三害”的控訴大會。該系學生顧文選和周鋒捏造了許多聳人聽聞的事實，控訴“黨的三害的罪過”，當晚，校黨委書記、副校長江隆基在東操場電影晚會後向全校同學講話，譴責了這個控訴會，並警告這些人，不要越出整風範圍。

1949年後，顧文選參加了革命，加入共青團。可是在肅反運動中，突然鬥爭了他，誣指他“誣衊打擊領導，拉攏小集團，文藝思想反動”。他據理力爭，遭到毆打，繩索捆綁後解送杭州市監獄。

在控訴會上，顧文選用講道理、擺事實的方法講述了自己的親身遭遇，講到激動處，不禁痛哭出聲。當時聽眾中有不少人同情他，同聲譴責“三害”——宗派主義、官僚主義、主觀主義的危害性。

顧文選劃為右派分子後十分不服，又無處申冤。便逃回杭州老家，在母親身邊躲了起來。給學校發現了抓回北京。判處五年徒刑，押去清河勞改農場強制勞動改造。五年後刑滿釋放，無處可去，便留在清河勞改農場留場就業，當了個二勞教，永遠不能重新融入社會。

文革開始後，勞教農場的犯人遭到比社會上更兇猛的衝擊，顧文選感到前途無望。某天他去看望了在同一農場改造的原先主持控訴大會的北大西語系講師黃繼忠，對黃說：“我以後恐

怕不能常來看你了。”

顧文選想方設法溜出了勞教場，中途經過無數曲折，偷越國境逃到蘇聯。另一種說法是逃往朝鮮。當時中蘇交惡，雙方不時指責對方背叛共產主義，但蘇方對於逃出中共魔掌的人卻毫不同情和留情。蘇聯邊防部隊將顧文選像牲口一樣裝入麻袋運到莫斯科審問他是否是中共間諜，因為那時確有中共間諜假裝逃避文化大革命偷越國境進入蘇聯。蘇方沒有把顧文選投入阿莫爾河（黑龍江）淹死，還算客氣的。

審問不出什麼結果，又把他押回遠東引渡回國。一打三反運動中，除了給顧文選按上“惡毒攻擊”和“叛國投敵”二頂帽子，還給他加了個“出賣我國重要情報”罪。他在勞教農場改造，連張《人民日報》也看不到，能知道什麼“國家重要情報”呢？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 遇羅克(右二代) 因為他的父母是右派

1970年3月27日北京工人體育場，在文化大革命一打三反的高潮中，因寫作《出身論》的二十七歲優秀青年遇羅克倒在中共罪惡的槍口下。與他同時倒在槍口下的還有北京“中國共產主義者聯盟”案的十七位右派大學生。中共在紅色恐怖年代集體屠殺革命青年學生的一筆筆血債，總有清算的一天。

遇羅克出生於1943年，反右運動時他不過是個小學生。照理他不應該列入遇難右派的列傳。然而他的父母親都是右派，他兄弟姐妹四人成長在一個典型的右派家庭裏。他們家二代六口人，有四人六次蹲在同一座共產黨的監獄——北京市半步橋看守所。這是中共創造的又一項基尼斯世界紀錄。他又與一批北京右派大學生同時遇害。所以我們在徵求了各方面的意見以後，還是把他與他的父母親一起放入右派列傳。

由於遇羅克是右派仔子，雖然他是一個品德兼優、全面發展的優秀學生，而且他對中外哲學，如馬克思、黑格爾、康得哲學，中國古代先秦諸子哲學，孔、孟、墨、老哲理思想都深有研究。他研究了馬克思的《資本論》後，寫出了《工資論》；研究了階級與階級關係後，寫出了《出身論》；他寫出過《人民需不需要海瑞》、《從海瑞罷官談歷史遺產繼承》那樣的歷史評論；他在《北京晚報》、《大眾電影》連續發表小說和評論，在文藝界已嶄露頭角。可是連續三次高考，均是因為右派家庭出身而名落孫山。



遇崇基、王秋林夫婦與四位子女，左起遇羅文、遇羅克、遇羅錦、遇羅勉



他在文革中主編《中學文革報》，1967年初他逆風而上，在《中學文革報》上刊出了三萬多字的《出身論》，說出了人們想說又不敢說的話。登時洛陽紙貴，人們爭先恐後地搶購，一版二萬份，再版六萬份，供不應求。這種景況給予他和兄弟姐妹極大鼓舞，也引起當局的嚴重注意，終於向他伸出罪惡黑手……。



遇羅克塑像

他的父親遇崇基(1915-1988)，山東營口人，大富人家出身。因為打官司打得一貧如洗，所以他讀中學只能報讀鐵路中學，畢業後好找工作。辛而考取公費留日，上了早稻田大學土木工程系。因貧窮靠寫作助學。他寫的《日文報紙譯讀法》稿費豐厚，解決了他留學的生活困難。此文用的筆名是羅茜。羅的正體字為羅，四維的意思。因此他為四個子女都以此取名：長子遇羅克、女兒遇羅錦、次子遇羅文、幼子遇羅勉。

中共進城前後，他是北平的私營營造商，中共進城後他被北京市基建局錄取為工程師，後調至水利電力部直屬華北電力管理局擔任高級工程師(四級)。四級高工相當於正教授，工資一百九十八元。他發明用竹筋代替鋼筋建造居民住宅取得成功，每平方米造價僅四十元，受到嘉獎，評為有“有貢獻的工程師”。竹筋樓使用五十多年仍完好。

在三反五反運動中，他被控偷稅漏稅十多億，超過他的營業額幾十倍，顯然是誣告。他被第一次關進半步橋看守所，審查幾個月，把他當老虎打，查無實據，不得不把他放了。他本來膽小怕事，他算過命，相書上曰，他的命相，不是汪洋大盜，膽大包天；便是膽小如鼠，奉公守法。經過如此一打，他更加膽戰心驚了。為了不連累家人，他在1952年與妻子離婚。待三反五反過去，於1954年重婚。有人對此舉不以為然，認為是演戲。可是卻反映了知識份子的戰戰兢兢的恐懼心態，夾緊尾巴做人。

母親王秋林(1918-1984)河北省南宮縣人，是大家閨秀。其父親在北平當學徒出身，家庭貧寒。經過努力拼搏，成為營造大戶。她父親承建的北平長安大戲院，寬敞的觀眾廳沒有一根立柱，一時傳為佳話。她好學習，事業心強，性格開朗，善於交際。留學日本學的是工商管理，回國後便繼承父業，很快成為北京知名女實業家。1950年代初是理研鐵工廠廠長，公私合營後是北京機床附件廠副廠長，北京市人大代表。

在公私合營中，在六十五中上學、積極要求進步的遇羅克勸他媽媽王秋林把全家居住的大四合院繳公，獻給國家，然後再付租金向房管局租住，這就叫“割資本主義尾巴”。王秋林聽從了兒子的意見，那年國慶夫妻雙雙上了觀禮台，女兒遇羅錦代表少先隊獻花。這是一家人最春風得意的時候。

反右開始，災難便降臨到遇家。遇崇基批評中共基層組織的打小報告彙報制度(告密)，說：

“人與人，冷冰冰”。更要命的是指責他1952年10月，在參加北京市基建局工作的時候，隱瞞了歷史上當過漢奸、特務和資本家身份。前者的根據是他在日本讀過書和在日本洋行工作過。他以後不禁問道，《紅燈記》裏的李玉和給日本人提過燈、做過事，難道他也是漢奸、特務嗎？

由於他既有“現行”，又有“歷史”，所以評為極右分子，開除公職，只發生活費，勞動教養。他前後勞動教養了七年，去過良鄉、賣店、茶澱、北苑、延慶、興凱湖，像球似地給人踢來踢去。大饑荒中，餓得沒法，用瀝青鍋洗乾淨後煮野菜吃，吃死了二個人，遇崇基僥倖活命。1964年解教後回到北京，失去工作，打臨時工為生，在科技情報所當臨時翻譯。曾流浪去東北，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文革中造反派責令他清掃大街。

1957年王秋林在北京市工商聯學習的時候，曾表示同情章乃器，遭到《北京日報》的點名批判。遇羅克陪病中的母親去工商聯檢討。在母親戴上右派帽子後，送她去密雲水庫勞動。

在三年人為的大災難中，全家失去了一百九十八元工資和六級以上高級工程師“糖豆幹部”的待遇，僅靠王秋林七十六元錢生活，其艱難程度難以置信。

遇羅克被捕後審訊八十多次，他的罪行，不僅是《出身論》，還有在抄家時抄出的八十多本日記，裏面詳盡地記下了他的思想動態。大部分屬於防擴散的“惡攻”，即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所以給他上手銬、腳鐐、背銬，大小便吃飯都不能自理。在一打三反中，中共開創了以“思想治罪”的先例。

他靠著信念堅強地活著。他用1966年8月26日日記中的話來激勵自己：“我想，假如我也挨鬥，一定要記住二件事：一，死不低頭；二，開始堅強最後堅強。”

遇羅克留下大量浚智而富有遠見卓識的文章，1980年給他徹底平反後，已有整理出版。他妹妹遇羅錦也因書寫“反動日記”而坐過牢，經歷過勞動教養。1986年移居德國，潛心寫作，著有《冬天的童話》等。

大弟遇羅文二次坐牢，在獄中度過二年另四個月。著有描述全家經歷的紀實體小說《我家》，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在2000年出版。他是位機械工程師，與學電子的弟弟遇羅勉一起發明了《前滾式水切刀》，填補了國內技術空白。而遇羅勉下鄉插隊落戶，在農村度過漫長歲月。

遇羅克案件在當年株連過很多無辜青年。六十五中中學生鄭曉丹精心抄寫和保存了遇羅克的《出身論》全文，被查出後活活折磨而死；當年共同編寫、出版《中學文革報》的中學生們，都受到殘酷的迫害。

遇崇基直到1979年才趕上最後一批摘帽，他已超過了退休年齡。因此在摘帽的同時，辦理了退休手續。可是沒有恢復他一百九十八元的四級高級工程師的工資待遇，莫名其妙地按一百三十二元七級工程師計算。膽小如鼠的遇崇基就此忍氣吞聲，自忍吃啞巴虧。

王秋林個性與丈夫相反，為人精明強幹，待人接物靈活。因此她受的處分較輕，摘帽也早一些。1979年改正後，擔任了幾屆北京市政協委員。她病逝於1984年，享年六十六歲。多災多難的丈夫逝世于1988年，享年七十三歲。

遇羅克一家兩代六口人的不同遭遇，是那個時代中國知識份子的縮影。正如遇羅克贈給友人詩作所寫：

攻讀健泳手足情，遺業艱難賴眾英；  
未必清明牲死鬼，乾坤特重我頭輕。

### 蕭也牧 打死在五七幹校的名作家

蕭也牧（1918-1970），原名吳小武，浙江吳興（今湖州）人，筆名吳犁廠、黃河。從小就與文學結下不解之緣。小學五年級時在上海《小朋友》雜誌發表描寫轎夫生活的小說《駝子》，高小畢業後考入東吳大學附中（今湖州十二中）。後到杭州電業學校繼續讀書。畢業後到上海浦東洋涇鎮益中瓷電機製造廠當裝配工人。

1937年起投身抗日救亡活動。湖州淪陷後，同幾位進步學生一起翻山越嶺，徒步走到長沙。經徐特立介紹，考入山西民族革命大學。後進入晉察冀邊區，擔任編輯、演員、記者。1945年8月加入中共。

中共掌權後，擔任張家口鐵路分局工人糾察隊副政委。他的成名之作是小說《我們夫妻之間》。後來把它批判為“歪曲幹部形象”低級趣味的大毒草。他進入中國青年出版社擔任編輯室副主任後，一掃“文人相輕”的習氣，積極扶持青年作家，主編《紅旗飄飄》叢書，精心修改、編輯、出版《紅旗譜》、《紅岩》、《李自成》等名著。

蕭也牧身材又高又瘦，皮膚黝黑發亮，笑時露出一排白牙，人們喜稱他“黑人牙膏”；又因那他彎腰曲背、長期埋頭爬格子的身軀，人們也稱他為“甘地”或“高爾基”。他毫不動氣，與他人和睦相處。蕭也牧坦率善良，才華橫溢，不僅擅長寫中、短篇小說，也擅長寫散文和報告文學。他的作品樸實無華，語言乾淨洗煉，所敘故事看似平談無奇，卻又真實感人。主要作品有《秋葵》、《連綿的秋雨》、《識字的故事》、《我和老何》、《鍛煉》、《山村紀事》、《地道裏一夜》、《難忘的歲月》、《海河邊上》、《攜手前進》、《我們夫妻之間》等，彙集成《蕭也牧作品選》。

《我們夫妻之間》早在反右運動以前就已受到過批判。蕭也牧在歷次運動中被中央報刊點過名，他平時喜歡談論軼聞趣事，說長道短，妙趣橫生，咀巴沒遮攔。反右運動開始便把他揪了出來。他反正經常檢討，成為人家心目中的檢討專家，成了名符其實的老運動員。有人在批鬥了蕭也牧後，挑逗性地問他：“當你被批得無地自容的時候，你是否想到香港和其他什麼地方去？”

“我什麼都想過，但我沒有條件。”蕭也牧老老實實地回答道。此人在下次批鬥會上，聳人聽聞地給他上綱上線：“蕭也牧曾經想偷越國境，背叛祖國。”捷克斯洛伐克電影《好兵帥

克》中有個情景，有一個奸細在咖啡館裏專門偷聽別人的談話，用鉛筆記錄在自己襯衫的衣袖上，回去向當局邀功請賞。反右運動和歷次政治運動中，也不乏這一類奸細。在階級鬥爭的年代，這種告密行為形成了中共獨特的“告密文化”。

蕭也牧就此被打成右派分子，開除黨籍，撤銷一切職務，被迫離開自己熱愛的編輯崗位。在接連遭受打擊後，他本來微彎的腰彎得更厲害了。他不再高談闊論了。他的笑聲消失了。即使在兩年以後，摘掉了右派帽子，他依然謹小慎微，膽小怕事，連樹葉掉下來也怕砸著腦袋。他想夾著尾巴做人，回避和任何人爭論任何問題，不敢發表自己的主張，更不敢堅持自己的正確意見。他變得唯唯諾諾，對有時交給他的明知是吃力不討好的事，如接受一部不經重寫不能出版的作品，他也只好勉力為之。他枉有一腔熱血，但無獻身之處。他委曲求全，忍辱負重，希望能讓他像一個普通人那樣活下去，希望能把他的知識和力量，包括他的一顆美好的心獻給人民。

就在這樣熱切的期待中，在戰戰兢兢、擔驚受怕的生活中，迎來了文化大革命，文革一開始，蕭也牧弄不清這次運動要整什麼人，只見出版社滿院的牆壁上貼滿了大字報，點的名都是什麼漏網右派，牛鬼蛇神、文藝黑線……這些字眼都使他心裏發顫。他噤若寒蟬，真希望有個洞穴能讓他躲進去。他害怕歷次政治運動，這次運動能夠躲過去嗎？

1967年2月10日，重慶傳來消息，《紅岩》作者之一羅廣斌給造反派誣指為叛徒，活活打死了，蕭也牧聽說後義憤填膺。他彎下的腰重新挺直了起來，他與同事們編輯《紅岩戰報》為羅廣斌伸冤。江青知道此事後，一反過去讚揚《紅岩》的態度，無理指責華瑩山上下來的人都是叛徒特務。矛頭指向為《紅岩》鳴不平的中青出版社《紅岩戰報》。中青出版社一百六十多人，有四十多人以種種罪名趕進了牛棚，蕭也牧以“沒有改造好的老右派”罪名送進這個黑窩。他被迫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

不久，他隨大隊牛鬼蛇神來到河南黃湖五七幹校，說是五七幹校，實際上是勞教農場。蕭也牧再也挺不住了，他以病弱之軀，飽受摧殘。1970年不幸作為現行反革命，活活打死在五七幹校。臨死前，景像淒慘。他的下體被造反派踢傷，大小便失禁，又不給他醫治。他的床上、衣褲和衣服全被屎尿泡濕。死後埋葬在亂葬崗上，連標誌也沒有，惶論墓碑了。

1979年改正昭雪後，家屬去收屍。墳已空，屍骨無存。但是他身後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財富和高貴的道德品格，值得後人永久瞻仰。

### 黃嘉音 他在監獄裏“蓄意殺人”

黃嘉音(1913-1961)，著名翻譯家，筆名黃詩林，福建晉江縣人，生於1913年1月31日。1933年至1937



黃嘉音  
HUANG CHIA-IN  
Chairman (Second Team)

年在上海聖約翰大學讀書期間，主修歷史，副修新聞學、心理學。1936年與胞兄黃嘉德及林語堂合辦西風社，自任編輯兼發行人，出版《西風月刊》、《西風副刊》、《西風精華》等三種刊物。1946年至1953年經營“家出版社”，任《家》月刊主編兼發行人，期間兼任《大美晚報》副刊編輯、上海《申報》副刊《自由談》編輯。1951年加入上海翻譯工作者協會。1954至1958年出任上海文化出版社編輯兼第五編輯室主任，又兼上海《文匯報》副刊彩色版編輯。

1956年他在上海參加民盟，做了幾天上海市政協列席代表。鳴放時，他向上海市委建議開設心理治療診所，以應付日益增多的精神病人。他的罪行還有曾與林語堂合辦《西風》等雜誌，進行反蘇反共反人民宣傳，吹捧美國的洋奴哲學；1940年提倡優生學，主張為心理不健全遺傳者強迫絕育，繼承了希特勒衣鉢；作為一個性教育工作者，他主張進行“兒童的性問題”和“醫生對新婚的一夕談”教育。在鳴放中又說過“人事檔案是一堵牆”、主張“開放人才市場”、“民主黨派和共產黨的地位應該一致”，提倡“要內行、沒有黨員照樣工作得很好”。他在反右開始後被人誣指為“企圖把第四編輯室變成反黨民主基地”。

黃嘉音對中共的革命事業是有所貢獻的，1999年八十四歲高齡的著名漫畫家華君武對《科技文萃》記者說：“黃嘉音就是推薦我看《西行漫記》並支持我去延安的人。”華老所講述的黃嘉音的故事，也許是那一代左翼青年人生遭際的某種時代縮影。他並不是共產黨員，甚至連地下黨的外圍組織也不沾邊。這個聖約翰大學歷史系畢業的大學生，在當時的青年華君武眼裏是位既深沉又謙和的兄長。他的家庭是基督教徒，吃飯前要禱告；他有個哥哥黃嘉德當教授，研究蕭伯納；他與林語堂似有世誼關係，曾把華君武帶到愚園路林語堂家去；他主辦介紹各種西方文化生活的《西風》雜誌，在寫文章、編書之餘也劃點漫畫，簽名處從不署名，而是劃只小鳥，暗喻“嘉音”之意。

華君武喜歡和黃嘉音在一起，不僅因為他的家庭有濃厚的文化氣氛，更由於他們不是那種吃喝玩樂的朋友，而是經常談論讀書、社會和做人的理想。“人人都該為社會發一分光”，基於這樣的人生信條，黃嘉音欣然支持華君武去陝北共區，並給了華君武一筆數目不小的盤纏。他請唐納寫了一封信，唐納據此又給周恩來、博古和王明寫信介紹華君武。華君武1937年10月到達武漢八路軍辦事處時將信交給李克農，李克農遂寫信介紹華君武到八路軍西安辦事處找林伯渠。“我最終走上革命道路，黃嘉音給了我很大的幫助，我是把他當作人生知己的。”華老充滿感情地說，黃嘉音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啟蒙者與知音。

據著名作家何滿子（本名孫承勳，1919年生，浙江富陽人，系三國時孫權後裔）回憶：“1958年9月，我與當年《西風》雜誌的主持人黃嘉音有一次奇怪的約會，地點在上海新雅酒店。何滿子回憶道：

“黃嘉音和我都是右派分子，但我不認識他。當時號召右派分子到寧夏邊疆參加建設，說白了是謫戍去改造。其實柯慶施要把社會渣滓統通趕出上海，美其名曰‘支援邊疆’。名單當然是內定的，我很識相地報了名。一天，黃嘉音忽然通過李小峰（或孔另境）轉告，要約我一

談。我與他素不相識，我想不通約談的原因。心想一定是乃兄黃嘉德有什麼話要轉告，嘉德原是聖約翰大學的文學院長。我們在解放初共同參加過四、五個月的學習，那年的夏天我到過青島，嘉德在1952年院系調整後在山東大學外文系任教，我去青島時也曾會晤。除了這層關係，黃嘉音和我渾身不搭界，絕無約見之理。當時右派之間打交道是有顧忌的，他約我到新雅酒店一見。

我是大會上批評過的，出版系統無人不識，但我卻不認識他。是他在新雅門口等我，自報家門的。原來並非乃兄黃嘉德有什麼話帶給我，而是他也要去寧夏，見面的目的是，詢問我全家西遷，傢俱之類應該怎麼帶法？

他帶了兩大卡車東西去，一架斯特勞斯牌的三角大鋼琴，也聽領導的話帶去了充實那邊的文化。當天他還特別問我鋼琴該不該帶，說明他是猶豫的。後來，正是這架鋼琴害了他。到那裏後，他分派在六盤山區的固原地區教小學，學生常到他家去。那邊的孩子幾時見過鋼琴這樣的新鮮玩意兒？於是一個衙內式的學生，當地最高官員的兒子亂敲亂打琴鍵。在那邊，是壞了也沒處修的，黃嘉音於是喝阻。這個小皇帝就回家哭訴，說老師欺侮他了。你想後果會如何？黃嘉音被下放到鄉間，去充實邊疆文化的鋼琴就不再屬於他了。此後，在文革慘死，自殺他殺不明。當然這是後話。

旅美學人丁抒教授在《陽謀》中，引用一名同囚的勞改犯的話，對黃嘉音之慘死作了以下描述：獄中傳出的消息說，黃嘉音是被槍斃的，罪名是“蓄意殺人”。由於中共一貫將政治犯與刑事犯關在一起，利用刑事犯欺侮凌辱政治犯，而刑事犯也樂於以虐待政治犯為榮，並以此向當局邀功獻媚，黃在獄中總是受流氓的氣。有一次吃飯時，一個流氓又欺侮他，他忍無可忍，將飯碗朝那流氓扔去，雖未擊中那人，但監獄當局卻說他“蓄意殺人”，“依法”槍斃了他。

黃嘉音的譯作有《大地的歎息》（1940，上海西風社）、《得意書》（1940年，桂林西風社）、《廣島被炸記》（1946年，桂林西風社）、《阿達諾之鐘》（上海西風社）、《希臘羅馬神話故事集》（1956年，上海文化出版社）以及《迷宮》、《流犯餘生記》、《矛盾》、《實用育嬰問答》等。此外，在《大美晚報》、《申報》和《文匯報》發表過不少譯文和漫畫。

## 劉奇弟 屈死的劉奇弟

北大物理系四年級學生劉奇弟（1934—1963）湖南人，鐵路工人子弟，與譚天榮同班。

劉奇弟在北大讀書期間曾二度為胡風鳴不平。在1954年由揭發“胡風反革命集團”而引起的肅反運動中，他為胡風鳴冤叫屈，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在北大遭到批鬥關押，並被人綁在窗櫺上。譚天榮在反右中雖然後來劃為極右分子，但肅反時他是共青團員，負責看管劉奇弟。北大的肅反同全國一樣，搞得非常恐怖，人人自危。有一位東北同學說了一句“蘇聯紅軍在東北強姦中國婦女”就被打成反革命，開除團籍。劉奇弟在關押期間，曾與胡風呆在一所牢監裏。

1956年中共忽然又對肅反運動進行甄別，劉奇弟摘去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繼續留校學習。



經過這次衝擊，他心情比較壓抑，在學生宿舍用小提琴拉一曲《牧羊姑娘》、《塞外組曲》等哀怨的曲調。他是個多才多藝的人，會拉小提琴、會作曲、會指揮。愛好讀外國文學名著，俄國的托爾斯泰、屠格涅夫，法國的巴爾紱克、雨果、左拉、大仲馬、小仲馬，英國的莎士比亞、狄更斯他都喜愛。

1957年春天整風鳴放，他突然貼出一張大字報《胡風絕不是反革命分子》，為胡風招魂樹白幡，並附有一副對聯“鐵窗鎖賢良，天昏地黑；忠臣血撒地，鬼哭神號。”因為那時傳說胡風已死在天津的監獄裏。這張大字報不啻是扔了一顆炸彈，把北大炸開了。這是他第二次為胡風鳴冤。他說：“怕什麼？我已經被打成過一次反革命了。根據報紙上公佈的材料，胡風根本構不成反革命罪。1949年建國時，是胡風第一個寫長詩《開始了》來熱烈歌頌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取得成功。這首詩我至今還能背到，這樣的人能是反革命嗎？絕不可能，胡風已經死了，他是屈死的。每個有良心的人，難道不應該為他鳴怨嗎？”他在大字報中說，當局以胡風和友人的通信作為定罪依據是“斷章取義，牽強附會，毫無法律根據。它把閒人聊天，候寶林說相聲的邏輯搬進了法庭。”

劉奇弟提出要參加陳奉孝等人發起成立的《百花學社》，但未獲批准。因為《百花學社》那些同學認為他的言論太激烈，會引起當局反彈，影響《百花學社》的生存。招來麻煩。

果然，他貼出那張大字報後，受到全校左派的圍剿。對他的圍剿與眾不同。批判其他右派還比較和風細雨，唯獨對他的批判異常猛烈，低頭彎腰，推推搡搡，直截了當呼其為“反革命分子劉奇弟”。他個性倔強，不服氣。剛一開口，便有人上去煽他嘴巴。

劉奇弟曾經得過肺病，已經鈣化了。遭受連續不斷的批鬥和折磨後，他的肺病又復發了，不斷地咯血。反右運動愈演愈烈，劉奇弟成了過街老鼠，不論他在哪里，都會受到圍攻和辱罵。一天晚上，高音喇叭突然在校園裏響起，狂叫極右分子劉奇弟打人，要求同學們到大飯廳參加鬥爭會。劉奇弟被人追打到臺上鬥。他不賣賬，便被公安人員押走，判處了十五年徒刑。那個時候，右派分子不經審判，可以直接判刑。

他先在北京團河農場勞改，1961年調到黑龍江省興凱湖農場。在中國的東北角，黑龍江以南、烏蘇里河以西，有一片未曾開墾的處女地。一百多年前俄國人掠走了黑龍江以北的大片土地，剩下的這塊面積為五萬七千多平方公里的處女地即北大荒。自1954年起，首批中共軍隊的轉業官兵來到這裏開荒，一年後建立八五〇農場。1955年，周恩來批准在中俄邊界的興凱湖旁建立了興凱湖農場，用來接收北京送去的勞教、勞改犯，歸北京市公安局管轄。1958年反右運動後，這裏就像夾邊溝一樣成為北京右派的集中營。

到了興凱湖農場後，劉奇弟病得很厲害，整天咳血。他死活不肯認罪，受到了各種刑罰，經常被吊起來毒打。後來他被折磨得瘋掉了，神志不清。管教把他塞進了像狗籠般大小的小籠子裏，高僅一米，頭上還要頂個尿盆子，像劉奇弟這樣的個子坐著伸不直腰；寬八十公分，長一米五，躺又躺不下。還要戴腳鐐手銬。在零下三十多度的冬天，又凍又餓，沒有幾天，劉奇弟就被折磨死了。他在冤死時還不到三十歲。

陳奉孝和他同是北大的同學，一起判刑，一起到團河農場，後來又一同去興凱湖。他們二人感情深厚，陳奉孝穿著劉奇弟送給他的舊毛衣，度過了十五年的囚徒生活。這件破毛衣偶然被人燒掉，陳奉孝為此同這位“二勞改”大吵一架。

1980年，陳奉孝已經改正，結了婚。他在睡夢中經常夢見劉奇弟被打得滿臉是血。二個打手拖著他往小號裏塞，他一邊喊一邊掙扎。陳奉孝驚醒後把被子蹬到地上，他太太嚇了一跳，問他是不是又做惡夢了。陳奉孝掉下了眼淚，二十多年的勞改生活，像一場噩夢般揮之不去。

右派改正時胡風尚未平反，所以劉奇弟不能改正。待到胡風平反了，劉奇弟的反革命案又沒人管了。他家裏還有什麼人別人也說不清楚。劉奇弟是個不起眼的小人物，他死後逐漸被人淡忘了。他的冤案究竟如何處理，知道的人就更不多了，最終似乎不了了之。

## 第二章 抗暴自殺 雖死猶榮

### 綜述 勁松禦霜雪 寧折枝不彎

#### 殘酷的階級鬥爭

民盟中央委員、著名的右派份子陳新桂在他的鳴放材料《對過去幾陣暴風雨的批評和建議》一文中，對歷次政治運動中的自殺者做出他的評價。其中第五條建議說：“在運動中自殺的人，應該指出罪在哪里，當時都被說成是‘畏罪自殺’，這是很不公平的，應該深入調查。如果畏罪，應指出罪在哪里。如是威逼、威門自殺的人，政府應恢復其名譽，照顧其家屬生活。”

中共在掌權以前和掌權以後，在政治生活領域，都以階級鬥爭和政治運動作為其維持統治的基本手段。按照通俗的說法，是把階級鬥爭和政治運動當作其生存的看家本領。內鬥如此，外鬥亦如此。每次運動事先定出運動對象的百分比和指標，由於甯左勿右和邀功請賞思想的作怪——左在別人身上，右在自己頭上，所以每次運動整治的對象比之原先設定的百分比和指標，只有過之，而無不及。為達到指標不惜大搞逼供信、告密誣陷，製造出大量冤假錯案。前幾次運動來不及甄別平反，後幾次運動又在層層加碼。積累的階級敵人愈來愈多，株連的家屬親友也愈來愈廣。

“士可殺而不可辱”是中國士大夫所遵循的傳統道德中一條重要的原則，中國現代知識份子亦是如此。中共搞運動、搞階級鬥爭的手法遠遠背離了中國人的道德概念，這便是在反右運動中以及在反右運動後，特別是在文革中有大量右派抗暴自盡的根本原因。

“親情”、“友情”、“溫情”是中國傳統道德文化的另一條重要準則。中共用“殘酷鬥爭”、“大義滅親”、“告密文化”取代傳統的“親情”、“友情”、“溫情”和“家庭觀念”，突破了中國傳統道德底線。運動中的受害者只能用抗暴自盡的辦法，捍衛中國人的傳統道德理念。

中共出於階級鬥爭的需要，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一律把自殺行為稱為“畏罪自殺”，不分青紅皂白地冠以現行反革命份子帽子，死後鞭屍，家屬頓時成為反革命家屬。黨團員一律開



除黨籍團籍。中國科學院院士、地質部總工程師謝家榮、吳鏡儂夫妻不堪凌辱，抗暴自殺。其家屬子女唯恐成為反革命家屬，將二老匆忙火化，對外宣稱病故。直到1979年改正後才敢公佈死亡真相。

自殺並非是一種懦弱的行為，自殺是社會生活中一種常見的現象。抗暴自殺、不甘受凌辱而自殺、為疾病解脫痛苦自殺（包括安樂死）、拯救親人或他人而自殺，更高尚的還有把生的權利讓給他人而自殺，如此等等，更有深層次的宗教、遺傳、道德、倫理、信念、信仰、族群等等內涵。而在中共執政年代，在某一個相對集中的歷史時期如肅反、反右、文革，發生如此廣泛而大量的自殺現象，尤其是在知識份子中的自殺行為，絕非尋常。難道僅用“平反”、“改正”二字可解脫得了的嗎？難道是“必要的，正確的”嗎？對於那些反右前後被無辜迫害致死的人，中共是負有血債的，負有刑事和道義責任。這筆歷史賬一定會清算的，因為歷史歸根結底是人民書寫的。

### 抗暴自殺者分類

我們把因反右運動而抗暴自殺的人歸納為三類，第一類是反右期間和反右以後，在時間上延伸至1966年文革前夕，共輯錄八十五人；第二類是文革中甚至文革後發生的右派抗暴自殺者，文革中的清理階級隊伍和一打三反把受盡凌辱的右派，又一次作為階級敵人揪出來批鬥，許多右派不願吃二遍苦、遭二茬罪而抗暴自殺，共輯錄六十九人；第三類是為自己的親人劃為右派而自盡的父子女，共輯錄八人。這也是中國傳統道德文化的特有現象。如楊萬才的父母為兒子劃為右派而自盡，周居正烈士二位兒子、彭文應的小兒子、宋林松教授新婚二月懷有身孕的妻子，都因親人劃右、不堪忍受凌辱而自盡。

由於中共封鎖、銷毀、篡改大量檔案材料，以及年代久遠、親人斷絕等因素，五十多年來抗暴自盡的右派名單我們僅僅收集了一百多人。而且更多的餓死、病死、折磨而死者尚不包括在內。反右運動後受到勞動教養處置的右派便有十五萬之眾，他們中的相當部分人有去無回，甘肅夾邊溝、北大荒、興凱湖、北京茶澱、青海恰卜恰、四川沙坪和四一五築路隊、安徽白茅嶺等勞動教養的右派份子中，餓死、病死等非正常死亡的人員，已經無從統計了。

反右運動中自殺現象甚至引起了中共官方的注意和震動。他們在內部定期印發1957年自殺行為的通報中，提醒各級領導採取防範措施。這是中共統治者前所未有的舉措，可見這個問題的嚴重程度和在社會上引起的強烈反響。我們也摘錄一部分通報內容予以公佈，以供參考。

#### 第一類 反右中和反右後自殺的右派

1. 俞彪文（1926-1957）原中國人民保險公司辦公室副主任。1957年7月，在召開批判他的右派言論會的前夕，於中午在休息時在家跳樓身亡。

2. 範永壽（1936-1957）出身於孤兒院，北京鋼鐵學院學生，因傳播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大秘密報告受到批判。擔心戴上右派帽子，在學生宿舍裏自殺。

3. 湯非凡（1914-1958）中國著名生物學家，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在反右後不久的1958年的拔白旗運動中自殺。

4. 丁則良（1915-1957）東北人民大學（現吉林大學）歷史系主任，在鳴放期間正在蘇聯開會，自然沒有反黨言論。捏造出了一個“俞（瑞璜，物理學家）丁（則良）徐（理治，數學家）反黨集團”，把他定為右派。丁返國後投身北大校園內的未名湖自殺。



同與永壽範的白內市右反

5. 湯汝光（1910-1957）雲南昆明紅色資本家、雲南省政協委員，本以為自己是響噹噹左派，聽黨的話，積極批判右派，黨就會信任他。不料消息傳出，他也可能定為右派，於是痛不欲生，跳河自殺。

6. 江鳳英（1933-1957）福建師範大學中文系女學生，該校第一份大字報《黨委在幹什麼？》二十二位署名人中的第一位，因此成為全校“鬥臭鬥垮鬥倒”的頭號右派目標。她被連續鬥了三天，昏倒在臺上，噴幾口冷水弄醒再鬥，直到倒下後，噴水不靈為止。他被抬回宿舍後，當晚就跳樓自殺。

7. 石揮（1915-1957）著名電影演員，反右時被批判、鬥爭兩天之後，登上自上海至寧波的輪船，跳進吳淞口外的揚子江，年僅四十二歲。

8. 胡思杜（？-1957）胡適留在大陸的兒子，河北唐山鐵道學院的講師，《人民日報》在發文報導該校機械系主任孫竹生、胡思杜兩人“使用卑鄙手段妄圖奪取學校領導權”時，特別指名是“反動學者胡適的兒子”，故憤而自殺。

9. 王志忠（？-1958）廣東某縣年輕的小學校長，在全區右派指標尚缺一名時補入名單湊了數。他的處分是留校察看，撤職當教員，但不能教政治、歷史、語文，只能教不涉及意識形態的數學及做雜工。工資取消，每月僅得十五元生活費。他養不活妻子小孩，還要忍受批鬥及辱罵，終於尋了短見。死後，縣廣播站向全縣宣佈：“右派、特務、反革命份子王志忠畏罪自殺，死於汽車輪下。”

10. 黃倩（？-1958）廣州水利水電設計院女技術員，是黃金榮的堂侄孫女，哥哥又在臺灣，只因寫了一份大字報，希望領導“對目前的知識青年的取捨、培養、使用和鑒定，不能再死死抱住其家庭出身，而應著重從他們具體的思想動態和工作表現去觀察、鑒別和評價……”，而被定為右派。一連幾天幾晚的鬥爭，鬥爭之餘又打掃廁所。這位剛從大學畢業不久的年輕人受不了折磨，上吊自殺了。但第二天，設計院卻掛出了橫幅：“批判黃倩右派謬論大會”。在黨委安排下，大會對死者批判道：“用死來軟化群眾博取同情，用死來威脅黨，用死來否定黨的反右的正確性和必要性，用死來洗脫自己見不得人的醜惡……”

11. 張若名（1902-1958）女，雲南大學法國文學教授，周恩來初戀情人，1920年代中共

早期黨員之一。1958年在雲南大學劃為右派，在上午開完批鬥會後，聽說下午的批鬥會還要加溫。在中午憤而投入學校後門的盤龍江溺死。

12. 楊剛（1905-1957）女，作家、記者，與彭子岡、浦熙修並稱為中國新聞界三大女劍客。江西萍鄉人。1928年加入中共，從事中共地下活動。中共掌權後曾任總理辦公室主任秘書、《人民日報》副總編輯。1957年10月7日反右高潮中跳樓自殺。她的死因眾說紛紜，胡喬木說她遺失了一個重要筆記本，“在精神極不正常情況下離開人間”，有人稱她前幾天參加“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批判大會深受刺激，也有人認為理想主義的幻滅是她自殺的深層次原因。

13. 曹立生（1939-1957）上海電力專科學校學生，工人家庭出身。反右時揪出批鬥，投黃浦江而死，不足十八歲。

14. 新民（1930-1959）河北高揚人，北京市公安局偵察員。反右時回家探望病重的父親，回京後向人訴說農民缺糧的情況。給人彙報上去，趕上最後一批右派，送京郊房山縣造林大隊勞動教養。他女朋友來探望，管警不讓見，還說他壞話。他氣憤至極，某天上山植林，他走到山崖邊縱身跳下，死時不到三十歲。

15. 江顯良（1930-1964），上海文匯報記者，極右份子，寬大處理安置在上海郊區農村勞動，早出晚歸，休息時間改造思想。盼不到出頭日，跳樓自殺。

16. 劉玉良（?-1961）河北阜平縣中學教師。劃右後先送煤礦採煤，後又關進監獄，在獄中自縊身亡，留下遺書“我死後請把我埋在阜平這塊土地上”。

17. 賀永增（1929-1960）北大西語系學生，極右份子判五年徒刑，入獄不久在獄中自殺。

18. 張恕一（?-1957）北京圖書館專家，極右份子，1957年7月22日自殺。

19. 丁景才（?-1958）江西省農業廳副廳長，在中央黨校學習時劃為右派自殺。

20. 陳友偉（?-1958）華東師範大學中國革命史教研組長，在中央黨校學習時劃為右派自殺。

21. 楊庚（?-1958）通俗出版社副社長，在中央黨校學習時劃為右派自殺。

22. 黃茂蘭（?-1958）北京大學氣象系二年級學生，湖南人，劃右後在北京玻璃廠勞動，受人誣陷偷雨傘，在廣渠門外鐵道線上臥軌自殺。

23. 王少桐（?-1958）光明日報記者，奉命採訪鳴放，劃為右派，家破人亡，憤而投江。

24. 李春潮（?-1957）廣西僮族自治區文教廳長，早年參加中共，留學日本，抗戰後赴延安在抗日軍政大學任教。他的詩集由胡風份子賈植芳介紹出版，李也受株連。反右時劃為右派，投河自殺。

25. 陳益勇（?-1957）廣東師範學院的學生，因同宿舍調幹生丟了錢，受懷疑被拘捕。同學集體到公安局和省委抗議，廣州各大專院校有學生加入聲援隊伍。中共廣東省委書記陶鑄出面安撫才返回學校，是當年有名的廣州“陳益勇事件”。陳益勇與廣東師範學院二百一十幾人劃為右派，他憤而從教學樓頂跳下，被樹幹勾住，瞎了一隻眼睛。

26. 林自力，北京大學物理系學生，在北京市機織印染廠勞動。摘了帽子不准他回校繼續

讀書，幾度自殺。

27. 張仁和（?-1957）清華大學電機系學生，父親在肅反中被捕，母親和姐姐一同自殺。留有遺書給他。張仁和劃為右派後，決心隨他母親和姐姐而去，跳樓自盡，可惜落地未死，僅受幾處傷，圍觀人員高呼口號“抗拒改造，死路一條！”。送去勞教。

28. 梅煥藻（?-1958）《文匯報》管理部主任，《文匯報》總編徐鑄成劃為右派後，梅煥藻公開表示“徐鑄成成為右派，我思想有些想不通。”他遭到批判，批判會上受到圍攻。他當時沖出批判會場，跑上屋頂跳樓。據徐鑄成回憶《文匯報》遭殃者十多位，其中最使他終生負疚的是梅煥藻，“他是《文匯報》第一個壯烈犧牲者！”

29. 戚學毅（?-1957）《中國青年報》編輯，戚並不是右派，他不願違心地批判同事劉賓雁，在批判會場，突然站起來，沖向視窗魚躍而下。生前曾對作家韋君宜說：“帶著鏽損了的靈魂而活下去是沒有意思的。”死後追封“抗拒改造、畏罪自殺的反革命右派份子。”

30. 烏寒冰（?-1957）著名作家，曾被毛澤東點名批判。反右時發現自己名字從出國代表團中劃去，以為要劃右派，憤而自殺。

31. 林澄（?-1959）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學生右派，發配到北大荒興凱湖農場勞動教養，因學醫為農場幹部治病。用手術刀割開自己腿部動脈，死在興凱湖畔。

32. 郭可宏，北京司法局幹部，與在上海的妻子均劃為右派。郭去勞動教養前與妻子約定每週通一次信。妻子在上海開煤氣自殺，農場扣留妻弟發來電報，派人看守他。他估計妻子出事，在鴨棚裏自縊身亡。

33. 鄭光弟（?-1963）北京大學學生右派，在北京團河勞動教養。他聽信中共謊言“改造好了回到人民隊伍裏來。”因勞動表現好於1963年國慶日前夕摘帽，國慶前夕向隊部請假回北京城觀看煙火，遭隊部訓斥。他感到絕望，國慶之夜溜回北京，自北海公園橋上投水而死。

34. 黃德瑜（?1957）《新湖南報》編輯，該報社五十名右派中第一個自殺，在一次批鬥後，只穿著短褲出走，當時是夏天，出走後下落不明，就此失蹤。

35. 朱學達（?-1957）北大中文系優秀畢業生。開完批鬥會後他趁人們都去午餐，五樓上僅有一位看管他的女同志。他便藉口請假上廁所，將新婚妻子送的手錶取下放在窗臺上，縱身從五樓跳下。

36. 吳雲軒（1932-1962）上海普陀區光新路一小教師，退伍志願軍人，1957年因向領導提意見劃右。1962年摘帽後跳樓自殺，不足三十歲。

37. 周金聲（1924-1960）江蘇省人，上海市繼光中學化學教師。劃右後發配青海省共和縣恰卜恰鎮勞動教養，不久慘死獄中，死時三十六歲。妻子兒子滯留青海。

38. 周覃藻（1920-1960）江蘇人，上海市繼光中學歷史教研組長，劃右後送去青海省共和縣恰卜恰鎮勞動教養，1960年腹瀉不止慘死。

39. 徐大綱（?-1957）第一機械工業部汽車拖拉機局職工，反右中上吊身亡。

40. 曹作仁（1933-1959）輕工業部二十二級辦事員，劃右後送八一〇農場勞動教養。1959

年10月15日在農場投井身亡。

41·黃操良（?-1958）人民日報國際部副總編，1938年加入中共，1958年在反右補課運動中服安眠藥自殺。

42·王光浩，北京新華書店職員，劃右後在八五〇農場勞動教養，在開挖排水溝工地爆破時炸死。

43·華德高（?-1957）雲南昆明師範學院學生，1957年反右中自殺。

44·穆國發（?-1957）雲南昆明師範學院學生，1957年反右中自殺。

45·戚學義（?-1957）北京日報社記者，1957年7月在批鬥會上，奔至四樓跳窗，摔死在麻線胡同水泥地上。

46·佟靄成，河南人，一機部子弟小學校長，劃右後北大荒勞動教養，妻離子散，用腰帶吊死在一顆小樹上。

47·方玲達（?-1957）女，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學生，批鬥中喝毒藥自殺。

48·李都華（?-1961）北京礦業學院助教，劃右後發配至北京最遠的木城澗煤礦勞動教養，1961年返校後精神壓抑，又受嫉妒。當年冬天跳入北海自殺。

49·郭道宏（?-1961）清華大學電機系學生右派。1957年提出“人都是自私的，毛主席亦不例外”、“黨員有黨性而無人性”、“現在和中世紀封建社會沒有兩樣”。劃極右份子，送勞動教養。因饑餓爬電網逃亡，觸電身亡。

50·湯遠烈，筆名老丁坎，四川人民出版社副總編，因作漫畫《衣冠內是草》諷刺史達林的話“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製成的”而劃右，送四川省公安廳四一五築路支隊勞動教養，性格剛烈，撞崖而死。

51·張羽高，四川自貢市文聯主席，曾是大學教授，劃為極右份子後“抹光一切生活”，便在市政府對面大茶館門口擺桌子“下里巴人代書處”為人代寫書信，生活清淡，又被取締。領二十三元錢打掃廁所為生。年過花甲，昏倒廁所倒斃而亡。

52·證光和尚，成都大慈寺和尚，反右時“畏罪自殺”。

53. 冉瑞竹（?-1959）四川省開縣教師，劃右後四一五勞教支隊勞教，卒死於鹽津灘頭放炮工地。

54·焦立民（?-1962）河南葉縣人，成都基督教聖公會牧師，上海聖約翰大學神學系畢業。其四弟焦若愚曾任中共瀋陽市委書記、駐朝大使。劃右後處處受肘，1962年自縊于成都伙房街聖公會教堂。

55·孟和（?-1957）中共成都市郊區黨委幹部，反右中自殺於郊區黨委辦公室。

56·陳其炯（?-1957）四川省水利廳幹部，水文專業。曾向郭沫若挑戰，劃右後自殺，“追認”為現行反革命份子。

57. 孫學文（1930-1957）甘肅蘭州十中教師。1955年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1957年劃右後跳樓自殺。

58·傅軍（?-1960）蘭州文化局幹部，劃右後夾邊溝勞動教養，餓極食毒蟾蜍中毒身亡。

59·安立綏（1900-1960）甘肅景泰人，甘肅省政府參事，民革社會聯絡委員會副主任。1927年清華大學畢業後留學美國康乃爾大學和西點軍校。1929年在紐約加入中共，從事工人運動。返國後在甘肅平涼和青海任軍界要職。1957年劃為右派。1960年在絕望中投水井自殺。

60·李學斌（?-1958）《長春日報》記者，曾發表《應聲蟲——東北人民大學胡顯中右派言論破產始末》一文，批判右派份子胡顯中。但自己也中槍落馬，劃右後在大連跳海自殺。

61·姜福海（?-1957）安徽省淮北公路運輸分局職工，批鬥他右派言論當晚投淮河自殺。

62·張僕，曾任冶金部副部長，李井泉的抗日挺進縱隊參謀長。犯錯誤貶至四川嘉陵江機械廠，任中共廠監委書記。批評中共黨委書記有家長式作風，遂被打為右派。他不承認，多次返京向老領導申訴，下放車間勞動不服管教，再送四一五勞教支隊，精神失常死亡。

63·王彬（?-1957）重慶市東林煤礦生產科長，1939年曾加入國民黨，1941年加入中共。妻有殺父仇恨，在肅反中為肅反對象鳴冤叫屈，聲言不與共產黨同處一個世界。劃右後自殺。

64·胡漢讖（?-1957）中共黨員，中共重慶市委宣傳部幹部。在市委宣傳部召開佈置反右鬥爭的會議後二個小時，用自備小洋刀在頸項左右動脈戳了五刀。事後宣佈他“畏罪自殺”。

65·李銀凱，中共黨員，原重慶唐家沱派出所所長。劃右後送四一五勞教支隊勞動教養，背炸藥包上山，在五十米高的危崖上摔下而死。

66·陶澤群（?-1958）重慶國營軍工廠車間主任，中共黨支部委員。鳴放中提出“外行不能領導內行”、“書記廠長不懂業務”而劃右，送四一五勞教支隊勞動教養。在處理啞炮時炸得粉身碎骨。

67·畢長林（?-1957）武漢大學物理系教授，1957年與校長同赴廬山休養。反右時被點名批判。返校後有一教師探望他時告訴他這個消息，便惶惶不安，於點名當晚十時上吊身亡。

68·林自力，北京大學地質地理系教師，劃右後因患肺結核，經不住重體力活，服安眠藥自殺。

69·彭先（1934-1957）中南財經學院經濟系學生右派，1957年投江自殺。

70·陸采夫（1905-1958）又名澤芹，湖南臨澧人，湖南水利廳副廳長。曾參加南昌起義，任中共湖南省軍委秘書，入黃浦軍校第三期。1928年被捕獲釋後脫黨。曾任中國遠征軍司令部美軍顧問組少將組長。劃右後於1958年自殺身亡。

71·趙樹濤（1929-1959）雲南賓川人，中學教師。劃右後送賓川太和農場第四生產隊監督勞動，因偷吃花生，被中共支部書記和生產隊長吊打拷問。自知生不如死，上吊自殺。

72·王震之（?-1957）原劇本創作所所長，電影《內蒙春光》編劇。1957年擔心自己劃為右派，臥軌自殺。

73·張友白（?-1958）上海新滬中學教師，反右補課中自殺身亡。

74·武兆發（?-1958）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反右運動中自殺。

75·張來楨（?-1964）四川省西昌女中校長，1948年由張拱介紹同時加入中共和民盟。西

昌“解放”時，為中共做過好事，但張拱只申報民盟不申報中共黨員身份，使其成為假黨員。劃為右派後做零工雜活。1964年四清運動中自殺。

76·李伯雍（?-1964）四川省西昌師範校長，1948年張拱介紹同時加入中共和民盟。西昌“解放”時為中共做過好事，但張拱只申報民盟不申報中共黨員身份，使其失去黨員身份。劃為右派後做零工雜活，1964年四清運動中自殺。

77·楊匯川（?-1957）民盟四川成都支部成員。1957年劃右後下放冕寧農村，育有三個子女，生活困難，跳水自殺，屍體無存。

78·苟文純（1921-1959）四川綦江人，西南師範學院學生。但在入學以前已經在解放前擔任過某銀行行長。四九年後改任副行長，行長是不懂業務又很蠻橫的中共黨員。三、五反時誣他為貪污份子。賬雖然查清，副行長卻撤掉了。他憤而辭職，回綦江農村老家。1956年考入西南師院外語系，已有三十五歲。與小青年有鴻溝。“向黨交心”時他說：“有必要嗎？何必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憂之呢？”反右時劃為右派，與一百多位師院學生送往農村勞動，他長期在銀行工作，無體力勞動技能，饑荒中身體迅速垮掉，臥床不起。學校當局怕他死在學校，令他回鄉。二天后倒斃在回鄉路上。

79·徐季正（1917-1960）湖南常德人，1949年後擔任重慶市食品公司財務主管。1957年向“三害”提出批評，判為極右份子，送四十五築路支隊勞動教養。1960年7月29日因公砍柴摔死山崖。

80·黃啟風（?-1957）安徽省無為縣農業局，舊政權留用人員，膽小怕事。1957年抓右派高潮中，他太太買菜，遇到同事家屬偷偷告訴她：“你丈夫已內定為右派了，明天就要開他的批判會。”當晚太太告訴黃啟風，黃卻反應冷淡。半夜三更他出去跳井。太太也隨後自殺。遺下一個七歲的孤女。

81·章鵬，北京大學物理系復員軍人大學生，被他哥哥揭發檢舉而劃右，自殺於獄中。

82·朱家玉（?-1957）女，北京大學民間文學教研室教師。才貌雙全，跳渤海而死。

83·張顯良（?-1964）上海記者，1964年在農村自殺。

84·董時光（?-1960）西南師範學院教師。1960年在勞改中吃飽撐死。

85·浦厚生，上海市虹口區某銀行辦事處副主任。妻子金力平也是右派。浦厚生在肅反運動中檢到一張肅反對象名單，說了句這是張黑名單。他是留用的舊職員，劃為歷史反革命右派，判刑四年。青海勞改，死不見屍。

## 中共內部通報

1957年中共官方內部通報過的二十九起自殺事件，發生的時間前後約兩個月。1957年在反右運動中發生的大量自殺事件從來沒有公開報導過。這些都是作為內參上報的案例，也只是其中極少的一部分。在這二十九起自殺事件的報導中，因正常社會問題引起的只有兩起，其餘全部是因為反右等政治運動所致。下面是摘自1957年反右運動中，中共內部通報的部分內容：

1957年2214期第13頁，《清華大學學生“放”的勁頭不足》：認為最近學生中陸續發生的六起自殺事件，作為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者的團組織有不可能推卸的責任。

1957年2215期第27頁，“武漢醫學院被迫停課情況”：對在運動中自殺身亡的學生劉卓勳應做出結論，如是冤屈而死，應做好善後工作。

1957年2216期第52頁上的一篇報導中說：兩百多名歸國華僑學生，反右中鬥爭了80%，已有一個歸國的華僑跳樓自殺。

1957年2218期第13頁，《天津大學掀起了大字報風潮》：有一個叫周樹仁的女學生自殺，在運動中投河自殺了。

同期另外一篇文章中說：黨員秘書丁猛一口咬定是某某公務員偷竊的，逼得那個公務員自殺，被救後變成了神經病。

1957年2219期第12頁，《天津大學許多學生貼出大字報追查於逢自殺事件》，其中提到在運動中：于逢先生的人格被污辱被損害了，……于先生終於被迫自殺了。

1957年2220期第13頁，《天津高等學校的“鳴”、“放”普遍活躍》，文章中提到河北師範學院也開始了活躍的情況：許多大字報提到了“李奎順自殺事件”。

同期新華社記者李正傑的文章《南開大學“程京事件”基本平息；天津大學繼續在肅反問題上糾纏》，文章說到：鑒於天大揭發的肅反中幾個事件的情況，南大黨委顧慮相同類似事件也會在南大引起波動（南大有兩個教授、一個教師在肅反中自殺）。

1957年2223期19頁，《山東師範學院“鳴放”情況》：化學系有一教授崔永福自殺，他不是運動對象，是被嚇自殺的。

1957年2224期第13頁，《南京高等學校“鳴”“放”情況》，提到江蘇醫學院的情況時說：陳少伯教授為何自殺？

1957年2149期第180頁，《上海電機製造學校因追查反動標語引起一學員跳樓自殺》：1月25日，上海電機製造學校因追查反動標語，引起師資訓練班學員陳君豪跳樓自殺（未死）。原因是懷疑陳在廁所裏寫了“打倒共產黨”“消滅共集團”的反動標語。

1957年2150期第208頁，《內蒙古復員軍人中發生多起自殺、被殺和烈屬、軍屬被奸案》。1957年2252期第26頁，《重慶市反右派中連續發生自殺逃跑事件》：重慶反右派中，最近連續出現自殺或偽裝自殺及逃跑、躲藏事件。其中提到中共重慶市委宣傳部派在四川人民藝術劇院“鳴”、“放”的黨員幹部胡漢懺2日晚八點三刻左右在該院自殺身亡，自殺行為發生在他參加市委宣傳部召開的一個佈置反右派鬥爭會議後的兩個小時內。根據重慶市公安局檢驗證明，胡系用自備小型洋刀在頸項左右動脈戮了五刀後死的。……胡本人有問題未徹底交代可能是自殺的原因，而反右派鬥爭的壓力則促成了這次自殺。文章還提到：西南農學院的右派份子李友霖6月底曾囑其妻準備後事，表示要自殺。

1957年2254期11頁，《武漢高等學校反右派鬥爭中發生自殺事件》：武漢高等學校在反右派鬥爭中的第一個高潮中有一人自殺，一人自殺未遂。……自殺的是中南財經學院經濟系二



年級學生彭先贊。彭是共青團員，湖南人，二十三歲。他看到反右派鬥爭聲勢較大，就在7月1日投江自殺。這一情況該院已向湖北省委書記彙報了，省委書記許道琦指示該院不能因此影響反右派鬥爭的進行。院方已將此事向全院宣佈，並進一步揭露彭的右派言論，團委會還宣佈了開除彭的團籍，據說學生中反映還好。

1957年2256期28頁，《上海外國語學院在反右派鬥爭中有兩人自殺、兩人逃跑》：上海外國語學院在7月5日至8日四天中，有兩人自殺，兩人逃跑。

該院一年級七班學生陸立時（女，二十一歲）於8日中午自殺身亡。經過情形是這樣的：當天上午班裏開會批判其右派言論，因陸態度強硬，激起了同學們的憤怒，曾高呼“只有老實交代才有出路，繼續抗拒只有自絕於人民”等口號，這時陸承認有反黨言論，並表示願在下午交代。會議結束後，校方為防止發生意外，曾派兩名女同學注意她的行動，吃飯時她趁那兩個女同學沒有留神，隨即奔回宿舍，寫了一封簡短的絕命書，隨即用剪刀剪斷喉管自殺，發現後，經校醫急救無效，死亡。另一個自殺的是工友施永豐（未死）。

1957年2256期31頁，《湖南各地中等學校醞釀鬧事》：最近，有些地方由於政治思想工作沒有跟上去，已發生學生自殺或企圖自殺事件。

1957年2263期29頁，《安徽省右派份子呂蔭南畏罪自殺》：安徽省右派份子、民革安徽省委常委兼組織處處長、省文史館呂蔭南畏罪自殺。原因是他不承認對他的批判，7月12日夜服安眠藥自殺。

1957年2274期7頁，《最近陸續發現有右派份子逃避鬥爭、自殺和逃跑現象》：截止7月20日，安徽一個專區發生自殺死一起，死者為淮北公路運輸分局董福海。他在第一次鬥爭會議被提名為右派份子並責令繼續交代以後，當晚即投淮河自殺。文章分析原因說：但從思想領導上檢查，主要缺乏警惕，沒有注意掌握右派份子的思想動態，有的已表現了緊張情緒亦未引起足夠注意；同時對右派份子只一味強調鬥爭，而沒有進行啟發誘導等勸降工作，亦未交待政策。

1957年2281期11頁，《湖南中小學畢業生發生自殺失蹤事件七起》。

1957年2281期15頁，《重慶市反右派鬥爭中發生自殺事件六起》：重慶反右派鬥爭期間先後發生自殺事件六起，死六人，未遂二起，傷二人。

死者除一人系小孩被父母自殺前殺死外，有黨員四人，共青團員一人。按職別：處長一，科長一，一般工作人員三。自殺未遂之二人，一為一般工作人員，一為學生。

自殺者一般都有政治歷史問題。如東林煤礦生產科長王彬1939年參加過國民黨，194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平時他有一系列的反動言論，大“鳴”大“放”期間，他又竭力為肅反對象“鳴冤”：其妻有殺父之仇，因此他們以全家三口自殺表示“不與共產黨同處一世界”。文章又說：“據瞭解，自殺事件大部分發生於反右派鬥爭初期，可能是因來不及全面交待政策所致。”

1957年2289期15頁，《北京市有些未考上學校的中、小學畢業生思想波動很大》文章說：“目前已發現未考取學校的學生自殺的有三起。”

1957年2304期55頁，《河南省農村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發生畏罪自殺案件多起》：河

南省農村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發生地主、富農份子畏罪自殺事件多起。據初步瞭解已有十八人自殺身亡。如信陽專區發生自殺事件六起，死五人。其中屬於地主、富農、反革命份子畏罪自殺者四人，農民二人。

1957年2307期18頁，《吳縣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發生三起自殺事件》：吳縣在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後，群眾的社會主義覺悟普遍提高，發揚了正氣，壓倒了邪氣，但有部分基層幹部和群眾卻隨之產生了偏激情緒，以致在運動中出現了亂扣政治帽子、查糧、抄家、打人、綁人等情況，最嚴重的是在8月中旬，六天內竟因此先後發生了三起自殺身死事件。

本期還有一篇文章，《山東省農村在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連續發生自殺事件》：山東省農村在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個別地區發生重點批判面過寬、亂點名、亂鬥爭、翻糧食。乃至打人、捆人、罰跪、遊街等現象，有的因此造成了自殺的嚴重事件。截至9月5日的統計，已發生自殺事件五十七起（內未遂九起）。

1957年2320期9頁，《青海農業區在大辯論中十二天內有十一人自殺身死》：青海省農業區在大辯論中，從本月12日到25日已有十一人自殺身死，其中藏民二人，漢民九人，地主一人，上中農八人，下中農一人，貧農一人。死者大多數是思想落後，沒有破壞活動；少數有破壞活動，也不夠法辦程度。文章分析原因：“總的來說是對不法地主、富農和反革命份子的打擊鬥爭和對富裕中農資本主義思想的說理批判沒有嚴格分清，工作方式簡單粗暴，把土改時鬥爭地主的方式用於社會主義大辯論。

1957年2322期9頁，《武漢高等學校在反右鬥爭中一週內發生自殺、逃跑事件十五起》：近一週來武漢各高等學校在反右派鬥爭中發生自殺、逃跑事件十五起，其中自殺的有五人（一人得救未死）。文章分析原因說：“經過開學前的批判右傾思想後，開學後的反右派鬥爭聲勢很大，右派份子和中右份子感到壓力很大，驚慌不安。如華中工學院死了一學生，原來是劃做中右，他在大鳴大放時只偷偷寫過一張大字報，反右派鬥爭開展後也沒有跟任何人談，開學後思想鬥爭很激烈，一時轉不過彎來就自殺了。武漢大學物理系教授畢長林是一名右派份子，上學期末點他的名，暑假中他還和李達校長等一同去廬山休養，回來後也還未動他。上星期有一天晚上物理系一個教師到他家閒談，談到物理系開會時對他意見頗多。畢長林聽了後惶惶不安，晚上八點談的，十點即上吊死了。

1957年2234期14頁，《遼寧省各民主黨派反右派鬥爭的情況》：有些右派以死威脅。如吳潤芝（民進大連市委秘書長）表示“活著沒意思”。姜陟庭（民建遼陽市工商聯主委）已經服毒自殺。

1957年2332期11頁，《河北省農村在社會主義教育中發生許多自殺事件》：河北省各地農村在整風和社會主義教育中，發生許多自殺事件。據不完全統計，五十三個縣發生一百零五起，死九十五人。據七十九起自殺事件統計，有地主、富農、反革命份子；壞份子五人；頑偽人員一人；富裕中農四人；中、貧農十九人；軍屬二人；村、社幹部三人。文章說：這其中“畏罪自殺的十二起”。另外，在社會主義教育中對黨的政策宣傳不夠深透，使一些有問題的人，

摸不著底，恐慌自殺的三十八起。還有一個原因是，由於鬥爭方法簡單生硬，甚至採用打、拉等辦法，使被鬥對象感到無路可走，造成自殺的十四起。

1957年2361期3頁《黨內右派份子、大眾日報總編劉建畏罪自殺》。黨內極右、中共山東省委候補委員、《大眾日報》總編劉建10月28日晚自殺身亡。年三十九歲。山東省委認為劉是畏罪自殺，其中也有自愧成份。《大眾日報》根據省委批示召開各種會議，並通過大字報，聲討劉建罪行，肅清影響。

## 第二類 文革中自殺的右派

1·薛壽虎（1937-1967）男，華東師大中文系畢業，在校時成為學生右派，其父也是右派。但因其態度較好，且右派言論不重，仍然分配在上海工作，但不能教語文，只能教體育。薛長得很英俊，也很有才華，美術很好，學校的宣傳畫、美術字常常由他包辦。他太太是上海護士學校畢業（中專），分到貴州，不習慣當地生活，回到上海一直沒有工作。與薛結婚後，生了兩個兒子。馬鞍山煤礦到上海招工，在辦薛的調動時，馬鞍山知道薛是右派，連他妻子一併退回，薛只好仍回北郊中學教體育，僅靠五十六元工資生活。1967年下半年，薛虎被工宣隊在大會上點名，說他至今還沒有一張大字報，上竄下跳，是扒手式人物。薛自知難逃批鬥，上午點名後，中午回家，即在家中廚房開煤氣自殺，用毯子堵好門縫，其妻與兩個四歲和六歲的兒子一起自殺，從現場看他是最後死的。他自殺後單位認定他自絕於人民，還在校內開了批判會。薛成為右派與其父是右派有關係。因此他要兩個兒子一起死，以免以後也成為右派。

2·安大強（1938-1968），清華大學學生右派，十九歲清華畢業送往農村勞動。摘帽後分配到天津電器研究所工作。因是摘帽右派始終未結婚。文革開始多次被批鬥和毆打。1968年夏天在該所傳動樓跳樓自殺，死前為自己買了一塊豬頭肉餞行。

3·程應銓（1919-1968）清華大學土木系講師，主張保留北京舊城和古城牆，因而在1957年劃為右派，妻子離婚，二個孩子隨妻子。住單身宿舍。在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中，逼迫他交代歷史問題，在當年12月大冷天在清華大學游泳池中溺死。他會游泳，可見不是墮水溺死的。

4·黃必信（1925-1966），黃炎培的兒子，他與大哥黃萬里等七人一家出了七名右派份子。1957年在大連工學院無線電工學系擔任講師時劃為右派。不准講課，工資減半。1960年摘帽後重上講臺。學生中有調幹生，考試不及格。批鬥他打擊工農幹部。他的小女兒在1966年失蹤。黃在當年6月14日文革開始不久在家中上吊自殺。他的妻子俞啟運是同校物理教師，於1968年黃必信逝世二年後隔離審查時，在牛棚中自殺身亡。

5·胡明（?-1966）北京師範大學俄語系教授，1957年劃為右派後撤銷系主任職務。1966年文革開始不久，在北師大主樓北宿舍樓上跳樓自盡。

6·金志雄（?-1966）女，上海市復興中學歷史教師。1957年劃為右派後，降至圖書館擔任管理員。文革開始遭學生紅衛兵毆打污辱。學生用純剪刀剪去她的頭髮，撕下她一塊頭皮。

又被毆打致重傷。回家不久追打到她家。金志雄聽到砸門聲，不堪再受凌辱和毒打，立即上吊，自殺身亡。

7·雷愛德(?-1968)原為醫生，因愛開玩笑於1957年劃為右派，曾任天津醫科大學教材科科長。文革時關進牛棚受迫害，吞服安眠藥死於牛棚。

8·李長恭(?-1966)在《新湖南報》工作時劃為右派，該社共劃了五十四名右派，送往湖南坪塘新生水泥廠勞動教養。1966年文革開始，他被打為該廠反黨反社會主義三家村成員，跳崖自殺。

9·陸家訓(1925-1966)江蘇海安人，西安交通大學理論力學教研室教師。1957年劃為右派。1966年文革開始，因是“沒有改造好的右派份子”和有“中統特務嫌疑”而被批鬥，1966年8月27日跳樓自殺。

10·陸進仁(?-1966)北京農業大學昆蟲學教授。1957年劃為右派。1966年8月揪出在大會批鬥、罰跪、坐噴氣式、掛牌遊街。1966年9月1日與妻子呂靜貞一起在農大教工宿舍七號樓上吊自殺。陸進仁夫妻安分守己，老實忠厚。

11·孫曆生(1934-1968)女，北京第三女中教師。孫曆生在1949年在第三女中讀書時已成為中共黨員。1952年高中畢業留校擔任教師。反右中因批評領導而劃為右派，開除黨籍。懷孕期間被迫離婚，送往天堂河強迫勞動。1966年揪回學校批鬥，遭紅衛兵野蠻毆打，1968年關進學校的牛棚“隔離審查”，7月12日在牛棚中自殺。時年三十四歲。

12·孫明哲(?-1968)原為北京地質學院政治教師，1957年劃為右派後勞動。摘帽後在學校總務科工作。文革中再度揪出，誣為“三家村反黨集團”，另二位成員是右派教師吳鴻邦和李錦才。1968年8月工宣隊進校不久自殺身亡。

13·孫哲甫(1932-1967)上海位育中學(五十一中學)教師，1957年劃為右派，文革開始又遭殘酷批鬥，因為他還戴著右派帽子，比其他教師受到更嚴重迫害。1967年他母親從鄉下到上海來看他，他送母親登上回鄉的小船後便跳河自殺，連屍體都沒有找到。

14·王鴻、薛挺華夫妻，均為北京地質學院1955年畢業生，留校當助教。1957年夫妻兩人同時劃為右派份子。文革中又被指控為“右派反黨集團”再遭迫害，夫妻倆雙雙自殺，留下兒子王磊，由親戚扶養成人。

15·吳迪生，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工作人員。1957年劃為右派，原為俄語教師。1966年8月4日遭到紅衛兵野蠻毆打，他們把以校長、黨委書記常溪萍為首的一百九十多名教職員工從家中揪出戴上高帽子，脖子上掛著寫有“黑幫份子”、“反動學術權威”、“死不悔改的走資派”等牌子，然後迫他們跪在學校共青廣場上批鬥。1966年9月，他與擔任銀行職員的妻子安排好後事，把領養的女兒送到外婆家，錢都取出來放在抽屜裏，吃一餐最後的晚餐，換上乾淨的衣服，準備兩條毛巾，毛巾繫上繩子，夫妻倆人穿得乾乾淨淨，各吊死在一扇窗框上。

16·吳興華(1921-1966)北京大學西語系教授，1957年劃為右派份子。1962年摘帽後留在西語系工作。1966年8月3日在北大校園勞改時，紅衛兵強迫他喝下水溝裏從附近化工廠流

出的污水，中毒昏倒，說他裝死。當天夜裏，痛苦地去世。

17· 喻瑞芬（1916-1966）女，北京師範學院附中生物教員。1957年附中的三個生物教師都劃為右派份子。1966年8月下旬在學校裏遭紅衛兵毒打，並被沸水澆燙。死後還被鞭屍。

18· 蘭鈺（1919-1966）1938年赴延安，加入中共。曾任新華社新疆分社社長、新華總社地方新聞部副主任、通俗讀物出版社副總編。劃右後送北大荒勞動。不畏強暴，自殺身亡。

19· 周鋒（?-1966）北京大學西語系極右份子。與同系學生極右份子顧文選一起主持控訴會。他也劃為極右份子，送去監督勞動。四年後修完學業分配到北京大學附屬工廠勞動，文革後他在北大的牛鬼蛇神隊勞動，黑袖套上寫有“右派周鋒”的字樣。後又進入“黑幫大院”，即“監管大院”。他天天挨打，身體已經垮掉了，不久便死去。

20· 傅雷（1908-1968）中國著名翻譯家，1957年中陽謀圈套劃為右派份子。文革中又受殘酷迫害。傅雷性格剛烈，於1968年9月3日凌晨與夫人朱梅馥一起自殺。

21· 黃紹竑（1895-1966）國軍上將，著名愛國將領。歷任政務院政務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民革中央常委、副主席兼秘書長。因提出“以黨代政”理論劃為右派。文革初期受到殘暴衝擊，二次服毒自殺未遂，第三次用剃刀刎頸自殺。

22· 陳夢家（1911-1967）國學大師、考古學家、新月派詩人。1957年因反對文字改革運動和批評中共的三害而劃為右派。文革中受到更大衝擊。他最後的遺言是“我不能再讓別人把我當猴耍”。1967年在住所自縊身亡。



老舍與宗 陸夢家

23· 謝家榮（1898-1966）地質學家、地質教育家、中國礦床學奠基人、地質部總工程師、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玉門油田、大慶油田、大港油田的發現者。1957年與他的長子謝學錦一起劃為右派（謝學錦亦為中科院院士）。1966年因不堪忍受造反派的凌辱和折磨，與夫人吳鏡儂服安眠藥自盡。

24· 浦熙修（1910-1970）女，中國著名新聞三大女劍客之一。民盟中央委員。1957年因毛澤東“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受到批判”一文影響劃為右派，當時她擔任《文匯報》駐京辦事處主任。1970年不堪造反派的凌辱和污蔑，憤然謝世而去。

25· 施永佑（1936-1966）上海市人，上海交大大學生右派，紅衛兵抄家時自三樓跳樓自殺。

26· 馮鬱華（?-1968）上海交大渦輪機專業右派學生，改正後分配到新疆水利廳機械廠，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時受衝擊，上吊自殺。

27· 章信舫（?-1968）上海交大物理專業右派助教，發配新疆勞教，改正後分配至石河子醫專，文革中整死。

28· 黃小痕（1936-1966）上海交大船舶製造系學生，新疆勞動教養，文革上吊自殺。

29· 蕭小塵，上海美術學院學生，批評簡體字而劃右，新疆勞動教養時人間蒸發。

30· 胡繼宏（1937-1967）上海電力專科學校學生，中右份子，分配長沙電工技校，文革

中按漏網右派揪出批鬥遭毆，自縊身亡。

31·孫國盈（1935-1967）上海復旦大學數學系學生右派，改正後在同濟大學當教師，文革中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自殺。

32·朱先煌（1903-1966）山西人，山西農校教務長，劃右後留校。1966年文革開始後被紅衛兵打死。

33·郝常磊（1935-1966）山東大學學生右派，文革開始後上吊自殺。

34·胡平（?-1966）《人民日報》國際部編輯，劃右後勞動教養，文革開始自殺。

35·林安平（?-1966）《人民日報》圖書館管理員，劃右後在唐山柏各莊農場勞教，1966年文革開始上吊自殺。

36·李宗津（1916-1977）江蘇武進人，名畫《東方紅》、《飛奪瀘定橋》作者，醫學界最大右派、協和醫科大學校長李宗恩之弟，劃右後不准作畫，1977年上吊自殺。

37·許世華（1920-1966）福州人，北大黨委副書記兼宣傳部長，1939年在南平入黨，畢業於西南聯大和北大歷史系。1950年畢業後留校工作。1957年劃右後降職降薪。1966年文革開始後又受衝擊，在西苑投水自盡。

38·吳道生（?-1970）北京外國語學院英文系講師。畢業於中央大學和華北革大，劃為極右份子後北大荒勞教。五年後返校，妻子離異，獨自帶小兒子住單身宿舍。1970年八三四一部隊進駐北外，勒令他交代問題。1970年在湖北沙坪五七幹校上吊自殺。

39·林墨蔭（1929-1968）北京地質學院講師，1952年北大地質系畢業。曾參加地下黨活動。1957年因有托派嫌疑不斷受審。劃右後在北京清河農場勞動教養三年。摘帽後在北京地質局實驗室工作。文革中揪回地質學院批鬥，不堪折磨自殺。

40·盛荃生（?-1966）北京女三中教師。1953年北師大畢業，曾是黃藥眠研究生。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中批鬥三十多次，迫瘋而死。

41·沈巧珍（1934-1966）女，黑龍江清江人，北師大中文系畢業，共青團員。鳴放中因廚房伙食不好，寫了一篇五、六百字的章回小說《李壯士打狗孝子》。諷刺湖南藉總務長嗜食狗肉，食堂管理員拍馬屁打死進校偷食的野狗孝敬他。劃右後勞動教養，只有二十元生活費。1960年摘帽。1966年關牛棚，剃鴛鴦頭戴高帽子遊街，皮鞭抽打，不堪虐待自溺身亡，遺下一男一女。

42·石盤（?-1966）北師大馬列主義教研室主任，教授，曾任陸定一秘書。1958年交心運動說他假交心，成為批判重點，劃為右派，關進北苑收容所。文革中又成為眾矢之的，因為他是陸定一秘書、右派，又自命清高。跳樓自殺身亡。

43·向達（1900-1966）湖南溆浦土家族人，著名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北大圖書館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劃右後留校。1966年文革後又被揪出，晚上屋門反鎖不准上廁所，因有腎病，尿毒癥發，不准搶救送醫院暴斃。

44·蕭光琰（?-1966）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研究員。1950年舉家從美國歸來。

1957年劃為中右份子，成為內控右派。1966年文革開始，工宣隊把他送進牛棚。經不起批鬥在牛棚中自殺。工宣隊張貼“特大喜訊”，稱其自殺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勝利”。把正在農場勞動改造的蕭妻甄秦輝拉回來繼續交代，甄請假回家與十五歲女兒一起服安眠藥自殺。

45·陳雲從（?-1966）汕頭中學教師，曾帶領學生到廣東揭陽中共遊擊隊參加革命，告訴學生“世界上沒有一個主義比共產主義更合理想的了。”1957年劃為右派，1966年文革開始後服毒自殺。

46·田保生（?-1966）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翻譯。原來在中華民國駐聯合國辦事處工作，經北京政法學院院長錢端升教授動員回國。田保生與錢端升一同劃為右派，1966年8月28日，田保生和妻子雙雙自殺身亡。

47·蔡克誠（1924-1966）《新湖南報》編輯，1957年劃為右派，1966年文革中誣陷他翻案，嚴刑拷打，凌辱至死。

48·蕭其中（?-1966）北京大學西語系學生右派，自殺於北京團河農場。

49·邱原（1928-1966）筆名邱漾，四川井研人，四川省文聯創作輔導部專業作家，劃為右派，開除公職，自謀出路。1966年文革開始又受衝擊，他用磚頭磨尖筷子插入動脈而死。

50·胡正華（?-1979）四川省銀行職員，湖北人士，志願軍轉業軍人，劃右後勞動教養。摘帽後分配在省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至退休。1979年改正後因痼疾纏身跳樓身亡。

51·金勝利，原籍上海，原為孤兒，六個月被人領養。成都電訊工程學院學生，反右後勒令退學，下放農村。潛回上海，改名換姓參軍新疆服役。加入中共，任連級幹部。文革中寫標語反對毛澤東、林彪，案發自殺身亡。

52·陳賁（1914-1966）湖南長沙人，清華大學和西南聯大地質系畢業，1941年加入中共。曾任燃料工業部總地質師，肅反和反右中為錯批的肅反對象和右派說話，劃為極右份子，開除黨籍公職，青海勞動教養。文革開始，又被批鬥凌辱。憤而自盡在戈壁灘上。

53·敖乃松（1934-1973）北大圖書館管理系畢業。在北京圖書館因向領導提意見劃為右派，勞動教養。強迫與新婚妻子分手。在北京團河勞教農場，他將自己和妻子生離死別的愛情故事寫成小說，給場部抄走。絕望中於1973年投河自盡。

54·褚松村（?-1966）蘭州大學地理系右派學生，1966年文革開始跳樓自殺。

55·童俊亭（?-1966）鄭州師範學院教師，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劃右後下放學校圖書館勞動。1966年文革開始，校內貼出要求“將童俊亭遣送回原籍”的大字報，閱後從學校文科樓跳樓自殺。

56·王秀敏（?-1966）鄭州師範學院歷史系主任，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劃右後下放學校圖書館勞動。1966年文革開始，校內貼出要求“將王秀敏遣送回原籍”的大字報，閱後跳樓自殺。

57·王開澤（1935-1966）八一電影製片廠工會文娛幹事。劃右後送北大荒勞動教養，任右派隊副隊長。摘帽後留八五〇農場成為“二勞教”。文革開始在五分場旁新華大隊自殺。

58·劉友乙(?-1966)海軍軍事學校管理部中尉參謀，劃右後送郭堡水庫勞動，1966年上吊自殺。

59·陳元橙(?-1966)四川省西昌中學校長，1948年由張拱介紹同時加入中共和民盟。西昌“解放”時為中共做過好事。但張拱只申報民盟不申報中共黨員身份，致使其成為假黨員。劃為右派後做零工雜活，1966年文革運動中自縊身亡。但驗屍員對其女兒說：“你爸爸死得冤枉，是被紅衛兵打死後才掛上繩子的。”

60·盧賢軍(?-1966)北大新聞系學生，爺爺破落地主，父親國民黨軍官，他是二房同居太太所生。因出身不好劃為右派，下放青海人民廣播電臺。文革開始不久被揪出，跳樓身亡。

61·王季洪(1928-1977)中共成都鐵路局黨委宣傳部長，鄭州大學文學系畢業。出身書香門弟。其新婚妻子被情敵、成都鐵路局副局長看中而遭迫害。劃為極右，送四一五築路隊勞動教養。涉案“中國馬列主義者同盟”，加重處分。妻子被情敵霸佔，1977年摘帽後與妻子和兒子見面，深受刺激，突發精神分裂癥而亡。

62·佟惠林(?-1966)十四歲參軍後一直在中共軍隊裏服務。反右時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保衛部大尉協理員。向領導提意見劃為右派。郭堡水庫勞動。文革中又被揪出批鬥，身掛八十斤重的鐵牌遊街，不堪受辱，跳入自己建造的郭堡水庫淹死。

63·帥學立，軍中右派，郭堡水庫建成後留在水庫工作。文革中遣送回老家貴州農村，因出身不好挨批鬥，返回山西郭堡，往返三次，身無分文，不得安身，投水自盡又淹不死。回到岸上找塊石頭綁在身上，從橋上滾入水中淹死。

64·徐秀圃(1932-1966)女，西南師範學院歷史系學生，已婚育有兒女。與師院一百多位右派學生送往農村勞動。勞動隊解散後，繼續回校讀書，1963年畢業。分配到江津地區江北縣。即叫她參加四清工作隊搞四清。她努力工作、能說會道，招來別人嫉恨。四清工作團長亦遭到“重用階級敵人”的攻擊。文革開始，把她當作“階級敵人”活靶子，便抹喉自殺。

65·水枏，水梓三弟，甘肅省工業專門學校校長，1958年8月20日劃右後留下遺書“士可殺不可辱”離家出走。

66·陳天國(?-1968)上海電影製片廠演員。政治上長期不受信任，愛發牢騷，劃右後貶至攝影棚打雜工。1968年隔離審查，在鍋爐房燒開水。1968年去杭州靈隱寺，在一顆千年古樹上吊死。

67·張羸(?-1966)復旦大學中文系二年級學生。劃右後發配邊遠地區。1966年議論林彪，打為現行反革命份子。在勞動中跳進煙囪自殺。

68·楊煥洲(?-1966)上海交通大學原教學行政科副科長，右派。1966年臥軌自殺未果，又跳樓自殺。妻柴慧敏上海中學俄語教師，1966年跳樓。

79·葉紹林(1934--1967)浙江江山人，上饒師範附小教師。劃右後農場勞動。摘帽後任農場管理員。與隔鄰農場工人妻發生曖昧關係。文革後該工人當上造反派頭頭。其妻揭發了他。葉先殺死她後再舉刀自殺。



### 第三類 因本人劃右導致家屬自殺

家屬為親人自殺是中國傳統道德觀念引起的特殊社會現象。中國人歷來看重家庭觀念，本人劃為右派，引起親屬自殺。右派的親屬擔心親人受苦受難，願為親人承擔災難。例如彭文應的次子彭志平二次自殺，年僅十九歲；周居正烈士的長子周復生用鐮刀割喉自殺，小兒子周復興投嘉陵江自盡。

本類家屬自殺案例中，尚應包括夫妻雙雙一起自殺的情況，例如傅雷朱梅馥夫婦、謝家榮吳鏡農夫婦、黃啟風張蘭芝夫婦、薛壽虎夫婦連同二個兒子、北農大教授陸進仁呂靜貞夫婦、北京地質學院王華薛挺華夫婦、華東師範大學吳迪生夫婦、外交學會田保生夫婦、東林煤礦生產科長王彬全家三口、北京司法局幹部郭可清夫婦等。

1·楊萬才（1938-）上海市人，出身貧苦，父親拉黃包車。1957年剛考入復旦大學新聞系。因寫信給素不相識的華東師大中文系主任許傑教授請教學術問題，受株連劃為右派。拒不認罪又劃為極右，發配新疆伊犁勞動教養。他父親絕望了，憤而自殺，隨後母親也服毒自殺。

2·吉世林，原為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謝覺哉秘書。鳴放期間，奉謝覺哉之命寫信給中國人民大學學生林希翎，謝在家中接見她。接見時吉世林在場。林希翎成為大右派後，吉因此事劃為右派，送回老家農村監督勞動，妻子離婚帶走孩子。母親見此狀況，憤而自殺。

3·蔣維喬（?-1957）又名因是子，中國有名氣功師，著有《因是子靜坐法》。反右時他的兒子回家告訴他已劃為右派。他當即氣憤地說，我不想活了。旋即上了練氣功的小樓。待他兒子醒悟過來奔上樓去，老人已死去，時年八十多歲。外界不知他的死因，以為是他的氣功不靈光而死。

4·黃祖德，同濟大學校醫，1957年是上海第一醫學院學生，因同情右派同學，而在檔案裏記上一筆。是內控右派。因不堪凌辱在校門口撞汽車而死，其父母聞知先後懸樑自盡。

5·甄秦輝，中科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研究員蕭光琰之妻，1950年舉家自美國返國。丈夫劃右在文革中自殺。造反派逼令她交代罪行，攜十五歲女兒一同自殺。

6·柴慧敏，上海交大原教學行政科副科長楊煥洲之妻。楊為脫帽右派，1966年文革中跳樓自殺。柴聞訊後也隨之跳樓。

7·俞啟運（?-1968），大連工學院教師黃必信妻。黃自殺後二年工宣隊令黃妻、同校物理教師俞啟運回校交代罪行，俞自殺，女兒失蹤。

8·馬宛琴（1940-1968）蘇州市第二十九中學女教師，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宋林松（原北大物理系學生右派）新婚二個月的妻子，剛懷有身孕。新房是供新婚夫妻專用的蘇州網師園“小姐樓”。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宋林松又被造反派無端揪出，宋林松憤而抗暴切頸動脈自盡，因頭垂下壓住動脈傷口，致失血不致過快，而且同室起床小便發現及時搶救了回來。造反派反而認為他是“畏罪自殺”一家有罪。為挖掘他的罪行，派二人去蘇州威逼馬宛琴，故意隱瞞宋已搶救回來的事實，惡毒地說“宋林松自絕於人民，與人民為敵，你要劃清界線，交代

他罪行。”馬宛琴聞知，以為宋已亡故，悲痛欲絕，當晚毅然投井自殺，她已懷有身孕，造反派害死兩條人命。

宋林松當時生死未卜，他曾留有已簽字的離婚協議書，保護妻子免受株連。自盡前又留下遺囑，說他既無罪可畏，更與新婚妻子無關。馬宛琴迫害致死，牽涉二條人命，年僅二十八歲。每當提及此事，宋教授仍無限追思，唏噓不已。

宋教授十分痛恨逼死馬宛琴的兇手。五十二年後懷著悲憤的心情回憶道：“逼死吾妻馬宛琴的有二個人，其一是姜惟誠。1958年與我同入中科院物理所。不過姜畢業于南開大學，學的是無線電專業。我們在同一科研小組，他是左派，我是右派。他做電子儀器工作，我從事物理研究工作。此人城府很深，對於1963年我的考核成績遠高於他，因而是否耿耿於懷我不清楚。憑著他的政治表現，到1979年他已高我二級，又很快入了黨，升高級研究員職稱，擔任國家磁學重點實驗室副主任，雖然他對磁學一竅不通。另一個逼死無辜的馬宛琴的兇手名叫張守訓，黨員復員軍人，業務上是姜惟誠的徒弟、助手。”

### 俞彪文 三代親共 三代蒙冤

俞彪文（1926-1957）出身於知識份子家庭，上海市人，祖籍江蘇太倉。早年受家庭影響，思想進步，崇尚民主，隨父參加社會活動，認同和擁護共產黨。1946年起，在上海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中央信託局從事保險業，同時就讀上海滬江大學國際貿易系，1948年畢業；1949年沒有隨國民政府去臺灣和香港，留在上海；由中共派往北京參加創建中國人民保險總公司，參加開國大典；擔任保險總公司辦公室副主任，行政十四級，副處級待遇。



1955年反右前夕俞彪文全家，（左起：俞彪文、岳母、

其父俞頌華（1893-1947），無黨派民主進步人士，上海復旦公學畢業，留學日本法政大學、德國柏林大學；1919年擔任上海《學燈》雜誌主編，曾在刊物發表青年毛澤東的文章。1920年時年二十七歲的他是中國第一個考察蘇聯採訪列寧、托洛斯基、莫洛托夫的記者，亦是中國第一位駐外記者，由二十歲的瞿秋白隨行擔任俄文翻譯。

俞頌華在擔任《申報》總編輯期間，於1937年到延安採訪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張國燾等中共領導人，並在上海《申報週刊》作連續報導，宣傳進步思想。1945年應周恩來之約，俞頌華攜子俞彪文到重慶曾家岩中共辦事處與周恩來會面約談。在國民政府時期，瞿秋白等秘密住過他家。俞頌華父子二人經常幫助和掩護中共領導人，為中共地下組織活動立下過汗馬功勞。

1957年5月18日，俞彪文身為保險公司中層幹部，響應中共整風鳴放的號召，在財政部副部長胡立教主持的座談會上，提出了改進保險工作的意見，未談及政治，根本沒有任何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卻劃為右派分子。1957年7月19日下午，保險公司要召開批判俞彪文的大會，年青氣盛的俞彪文冤情無法釋懷，悲憤難平，當日中午，從保險公司宿舍北京月壇北小街五號院住家的五樓陽臺，跳樓自殺，年僅三十一歲。

俞彪文跳樓後，躺在烈日燒炙的地上垂死掙扎，周圍無人關注。後來被送往阜外人民醫院，全身綁著白色綁帶，母親在一旁悲傷地啼哭，這種場景是留在年幼的俞梅蓀腦海中唯一的父親印象。俞彪文以畏罪自殺、對抗運動的罪名戴上反革命右派分子的帽子，開除公職。

時隔五十年，著名詩人北島在回憶北京舊事時著文《三不老胡同一號》，文中寫道：“同公寓的另一戶人家的男主人跳樓自殺了。那天中午聽到這消息，我懵了，好像是個猜不出的燈謎。他身後留下寡婦，還有一個小我幾歲的男孩，叫俞梅蓀。那留在歷史深處的哭聲，除了在黑暗中支起耳朵的我，又有誰能聽見？多年後得知俞梅蓀為民請命的故事……”

俞彪文的母親錢梅先也是親共人士，是國民政府上海中央銀行業務骨幹；中共接管上海時，她擔任接管委員會和肅反委員會委員，後為上海市人民銀行黃浦區辦事處業務骨幹。俞彪文被劃為右派自殺後，兒子株連母親，被迫退休，工資減半。

同在保險公司工作的俞彪文的妻子鄭珍，在丈夫自殺後攜帶四歲的大兒子俞梅蓀和一歲的小兒子俞頌蓀回到上海長寧區江蘇路四百八十弄七十六號老宅，投奔老年喪獨子的婆婆。隨後她又作為畏罪自殺的右派家屬，勒令返回北京，送往農場接受改造。兩個年幼的孩子交付祖母撫養。她多次徘徊在故宮護城河邊要投河自盡，想到遠在上海年幼的兒子不忍心拋下他們而作罷。

1979年4月，中國人民保險總公司為俞彪文冤案作改正。公司人事處處長對俞梅蓀說：“你父親過去犯了錯誤，現在能獲得政府寬大處理就算不錯了。”經過俞梅蓀查找資料，根據1957年5月下旬《人民日報》的會議記載，據理力爭，才把結論改寫為“含冤去世，平反昭雪”，成為突破中共中央對右派分子只“改正”不“平反”的一個例外。俞彪文骨灰遂移葬於八寶山革命公墓。

## 石揮 一代巨星的隕落

1959年4月間，在一個春雨綿綿的黃昏，上海市南匯縣的灘塗上，被潮水沖上一具腐爛不堪的屍體，面目已經完全不能辨認了。屍體裹在一件棕灰色的呢大衣裏。經公安局驗屍後，法醫確認為已失蹤達十七個月之久的極右分子石揮（1915-1957）。上海市公安局原以為他已叛逃出國了。

1957年12月的一天早晨，石揮新婚不久的妻子、出身京劇世家



一代巨星石揮

的京劇名演員童葆苓奉命接待外賓。出門前，石揮十分反常地熱吻了她。過後不久，石揮穿上棕灰色的呢大衣也離開了淮海路的家，匆匆趕往上海電影製片廠，參加批判他右派言行的第二次批鬥會，接受領導和革命群眾的“幫助”。

中午，步出火力兇猛的批鬥會場，石揮的心情非常沉重，自言自語地說：“一個人如果打成了右派，那連蹬三輪的都不如，要被人看不起的。”他首先去陝西南路的一家銀行，給母親匯出一筆錢。石揮是出名的孝順兒子。然後他問同行的好友、也是上影廠的導演沈寂道：“沈寂，怎麼樣？看樣子情況不大好吧。”沈寂安慰他說：“不會怎樣，頂多批判會開一下就完了。”石揮很敏感：“不，至少以後不能演戲了，完了，完了……。”他慢騰騰地走開了，漫不經心地走到十六鋪碼頭，登上了他拍最後一部電影《霧海夜航》用的道具船民主三號輪。他久久地徘徊在甲板上，思考著，腦海裏在劇烈地翻江倒海。夜幕降臨，他的身影逐漸隱沒在黑暗中……

他弄不清楚，為什麼他演的他導的每一齣戲每一部電影都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解放前的作品且不去說它。解放後的作品，出一部批一部。自編自導自演的得獎大作《我這一輩子》歪曲了勞動人民的形象；《關連長》把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連長資產階級化，哪里有解放軍的連長跑到少奶奶家裏去彈鋼琴的；《霧海夜航》醜化了黨的領導，污蔑黨的幹部。如此等等，令他困惑，百思不得其解。

不過他又是倔強的，他的藝術責任感促使他拍電影，批了再拍，拍了再批，永不放棄，永不言悔，從來未曾低頭屈服。就在這個陰冷的傍晚，他裹緊棕灰色的呢大衣，縱身躍入混濁的黃浦江，一顆耀眼的巨星，很快被冰冷的江水吞噬了。在黃浦江底足足沉睡了十七個月，才浮出水面。

1915年，石揮作為津門八大家之一的石家第二門正廉堂的後代，出生于天津楊柳青運河南岸，原名石毓濤。他家道中落，早年喪父。後隨母遷居北平，入讀北平和平門外北師大附小。在1927年的畢業遊藝會上，小學生石毓濤的表演轟動全場。後來他當過牙醫學徒、進過陸軍學校、養過蜂、做過電影院雜役和售票員。但無一成就。最後經老同學蘭馬的介紹進了劇團。他參加過明日劇團、中國旅行劇團、苦幹劇團。

從1940年起，石揮演過話劇《大雷雨》、《家》、《正氣歌》、《蛻變》、《大馬戲團》、《秋海棠》、《樑上君子》、《林冲》、《金小玉》、《亂世英雄》、《夜店》、《雷雨》等，寫過劇本《雲南起義》，被評為“演劇皇帝”。同時從1941年拍了第一部電影金星影片公司《亂世風光》起，總共主演或導演了《假鳳虛凰》、《太太萬歲》、《天仙配》、《豔陽天》、《母親》、《我這一輩子》、《姊姊妹妹站起來》、《雞毛信》、《宋景詩》、《關連長》、《霧海夜航》等二十多部影片，所以又同趙丹一起被封為“電影皇帝”。然而石揮一人獨得“演劇皇帝”和“電影皇帝”兩個稱號，因此他又被奉為“雙棲皇帝”。

他的同時代藝術家黃佐臨稱他為“稀有的表演藝術家”；法國著名影評家米特里說：“我參加了中國電影回顧展，發現了中國電影，也發現了石揮。”；日本影評家佐藤忠男說：“作為一名導演，石揮是第一流的。”

石揮生性幽默，開朗樂觀，好開玩笑。可是他對於藝術和生活卻是嚴肅認真的。當年黃宗江剛到上海，同石揮住在一起。黃宗江說：“石揮呀，說實話，我原本不想同你一塊兒住，你這個人哪，太，太冷……”。石揮冷冷地回答：“我剛到上海的時候，一個好朋友告訴我，‘人人都是王八蛋！’”。黃宗江回答：“人……總有好人吧？”石揮慢吞吞地說：“那也要先把他當王八蛋……你也是王八蛋，我也是王八蛋！”說完在吉他上蹦蹦跳跳連彈幾下。

石揮曾經是周璇生活中難以忘懷的伴侶。由於周璇幾次被人玩弄，對婚姻抱著絕望的態度。兩人虛虛實實，真真假假，周璇對愛情既興奮又恐懼，而石揮對這一段情卻是認真的。1946年在周璇去香港前，在依依惜別中互相吐露了真情。周璇在香港拍了兩部電影后回到上海，第一次合作拍電影《夜店》，同時訂立了婚約。那個時候，輿論媒體對周璇的負面新聞和八卦消息層出不窮。當周璇再次回到上海後，兩人平靜地分手了。像電影《飄》中白瑞德同郝思嘉分手的那一幕一樣。

有一次，周璇在病中到新華電影院看了電影《光輝燦爛》。在銀幕上又見到了石揮。不禁在日記中寫道：“好久不見石揮了，他的演技永遠使人喜歡，好些話都讓觀眾拍手遮過去了，一點也沒聽出來。也不知道他人在上海還是在北京，因他告訴了我要同童葆苓結婚了呢！很使我難過。對於我們的友誼之交永不改變。總之，只有我自己對不起人家，沒有別的話好說，永遠回憶著，自己難過吧，活該！”不久又發病了，1957年7月22日周璇死於腦炎。石揮沒有參加追悼會，他忙於接受批鬥，搜索枯腸地撰寫著檢討。



周璇

童葆苓是在1954年同石揮結婚的。她比石揮小得多，童家起初反對這段婚姻。婚後三年來分居兩地，聚少離多。五七年童葆苓剛調來上海，他們計劃生個小孩，石揮是個很愛孩子的人。童葆苓後來與馬彥祥結婚，移居紐約。2007年石揮逝世五十周年和中國話劇誕生一百周年，她回國參加紀念活動，深情地告訴記者，說石揮最後說過這樣一句話，“沒有死過的人是不知道死的快樂在哪兒，同樣，也只有活著的人，才明白活著是多麼的痛苦。”

其實領導早已定下石揮“政治上反黨，思想上反動，生活上腐化”的調子。中共上影廠黨委為他編織了許多駭人聽聞的罪狀。譬如為了證明石揮是“政治上的老右派，社會中的壞分子”，竟然把周璇在病情發作時被一個在上影廠當美工的折白黨（即上海話中的“白相人”）誘姦、導致周璇精神更加失常的事實，強按到他的頭上。在當時那個瘋狂的年代，這樣的事情最容易把一個人搞臭。

在大鳴大放的時候，石揮中了毛澤東陽謀的圈套。他抱著向黨提意見改進工作的誠懇態度積極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在報紙上發表了《東吳大將說假話》、《重視中國的電影傳統》、與趙丹等人共同發表的《我們的建議》等文章。他在《東吳大將說假話》中寫道：“幹部看到了上級，卑躬屈節，前面的衣襟長了二寸；幹部見了下級，昂首闊步，後面衣襟長了二寸。”

原先上影廠的導演石揮、白沉、謝晉、沈寂和徐昌霖五人，為了切磋技藝，組成了自由結

合的《五花社》。現在也成為石揮的右派罪行。他的好友趙丹反戈一擊，同瞿白音於1957年12月在文匯報發表長篇批判文章〈石揮的‘滾’的藝術和他的‘才能’〉。批判他充滿沒落階級的感情、自我吹噓挑撥投機、賣弄低級趣味、歪曲人物形象以及“給正面人物鼻子抹白粉是他慣使的拿手好戲”。

石揮僅僅走完了四十二年的人生旅程。最後一部影片《霧海夜航》剪輯完成後的第二天，領導通知他交代問題。待第二次批鬥會結束，他的內心深受傷害，他的理智無法解釋鋪天蓋地的指責和污蔑不實之詞。他踏上了一條不歸路。用他的代表作《我這一輩子》中的結束語：“哎喲，我這一輩子啊！”來為他的短暫一生劃上扭曲而又不圓滿的句號。

二十二年後的1979年3月2日，上影廠宣佈為十四位右派改正。唯獨中國話劇、電影史上的奇才和怪才石揮沒有屍骨，沒有墓地，沒有墓碑。他給後人留下了他為話劇《日出》譜曲中的一句話：“太陽已經升起來了，黑暗留在後面，但是太陽不是我們的，我們要睡了。”

今天，《石揮的藝術世界》一書已被中國電影學院列為教材。他的表演藝術和導演藝術已被當作經典。

## 傅雷 民不畏死 奈何以死之

嚴復曾經說過，翻譯要做到“信、達、雅”。然而真正能做到“信、達、雅”的中國翻譯家並不多見，傅雷是其中之一。他所翻譯的法國文學家羅曼·羅蘭、巴爾紮克、雨果等人的巨著，既傳神，又忠於原著。

翻譯家、文藝評論家傅雷（1908—1966）上海市南匯縣人，字怒安，號怒庵。因為他生下時哭聲中帶著怒氣，所以在取名時帶一個“怒”字。四歲時父親傅鵬榮因冤獄而死，二個弟弟和一個妹妹也先後夭折。母親李欲振便對獨子有一種病態的期望。幼年時對他的管教十分嚴厲，幾乎不近人情。兒子逃課，她準備先殺兒子，然後再自殺。這種殘酷的非理性的管教方式養成了他獨特的性情，待人接物嚴謹認真，一絲不苟，性格內向。

1927年傅雷告別嚴厲的母親，赴法國留學。他學的是美術和藝術理論。在法國他觀摩世界級藝術大師的作品，提高了他的藝術修養和造詣。1931年與劉海粟夫婦一同歸國，未取得學位。回國後曾任教於劉海粟先生的上海美專，1932年同朱梅馥女士結婚，1933年母親病故。

他因不願從流入俗而離開了上海美專，一心閉門譯書，幾乎譯遍伏爾泰、羅曼羅蘭、巴爾紮克、雨果等大師的重要作品。由於他有扎實的中國文學根底和駕馭法文的能力，傅雷數百萬字的譯作成為中國翻譯界推崇備至的範本，形成了“傅雷譯文語言”。他文理兼通、博學多才，在文學、音樂、美術等方面均顯示出獨特的高超的藝術欣賞力。但是他從來不問政治，拒客閉



手捧骨灰盒的長子傅聰，  
手持傅雷畫像的是次子傅敏

門，埋頭譯作，沉浸在稿紙堆中。

1957年3月3日，正在譯稿中的傅雷忽然接到中共上海市委的通知，邀請他作為中共宣傳工作會議的特邀代表赴京開會。3月6日和12日他在中南海懷仁堂二次聆聽了毛澤東充滿甜言蜜語的報告，受到極大的鼓舞。當晚便給遠在波蘭留學的大兒子傅聰（1934--）寫去熱情洋溢的信，讚賞中共和毛澤東對知識份子的“溫暖”，卻不知自己已經中了“陽謀”圈套。

回到上海後，他積極回應中共的號召，幫助黨整風。他在一篇短文中批評那些假積極分子逢迎吹拍，離間群眾，領導偏聽偏信。他又發出七千字的長文，要求徹底改進現有的出版制度，尊重作家，改變領導外行一意孤行的局面。

在反右運動中，他以抗拒中共領導和親美反蘇的罪名，受上海作家協會批判幾十次。他始終不承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名。在1958年反右補課運動的一次批判大會上他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當他心情沉重地回到家裏，對夫人說的第一句話便是：“如果不是阿敏還太小，尚在念書中，今天我就……”性格倔強的傅雷決不低頭認罪。甚至在反右開始後，他仍公開發表文章：《識別右派分子不易》。中共上海市委書記石西民找他談話，向他暗示，只要承認一下錯誤就可以不戴帽子，被他斷然拒絕。

1966年那場史無前例的恐怖浪潮席捲中國的時候，傅雷似乎已預感自己在劫難逃。他對來家探望的周煦良教授說：“如果再來一次1957年那樣的情況，我是不準備再活的。”8月份，造反派和紅衛兵砸破了他的家門，他遭到四天三夜的查抄、罰跪、辱罵、毆打。紅衛兵搜出他朋友存放的一面鏡子背後有張蔣介石肖像；一張舊報紙有宋美齡照片。便責罵他私藏“變天賬”，嚴加拷問。他向夫人和女傭喃喃自語：“我快要走了，我要走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他表現了中國士大夫的“士可殺但不可侮”的大無畏精神。

9月2日夜晩和9月3日凌晨，五十八歲的翻譯大師，不堪忍受紅衛兵的侮辱毆打，坐在自己的躺椅上吞服了巨量毒藥，輾轉反側，痛苦而亡。他的夫人朱梅馥在二小時後從一塊浦東土布做的被單上撕下二條長結，打成圈後，擊在鐵窗橫框上吊死，尾隨夫君而去。她在遺書中寫道：“像我們這種來自舊社會的渣滓早已應該自動退出歷史舞臺了。”

女傭周菊娣按時起床為他打掃房間時，發現平日的生活像鐘錶一樣刻板的傅雷沒有起床。在書桌上留下了一個火漆封固的小包，上面寫著：“此包由XX路XX弄X號朱人秀會同法院拆開。傅雷。”裏面有幾個裝著錢物的信封以及一封由工筆小楷書寫的遺書。朱人秀是朱梅馥的胞兄。傅雷的反黨罪證僅是一面小鏡子和幾本舊畫報。

當女傭周菊娣失魂落魄地將夫妻二人雙雙自殺的消息告訴派出所的時候，幾位態度傲慢的民警草草把二人火化了事。一代翻譯巨匠告別了罪惡的世界匆匆離世而去。

信封裏的錢物是他們夫妻二人未交的9月份房租、欠女傭的工資、退還人家的借款單和夫婦二人自己的火葬費。

傅雷有二個兒子，傅聰和傅敏。傅聰是世界著名的鋼琴家。批判他的人說：“傅聰的培養靠誰？靠黨的培養還是靠父親的鞭子。”1980年傅聰寫道：“我在波蘭聽到了很多關於他的傳

說（指傅雷被劃為右派分子）。1958年12月，我留學畢業，如果我回來，勢必是‘父親揭發兒子，兒子揭發父親’，可是我和父親都不會這樣做。當時我是被迫上梁山的。當然，對我的走我是內疚的……”

次子傅敏在1966年時是北京第一女子中學英文教師，與校長和其他教師遭受紅衛兵的野蠻攻擊，他不堪侮辱，在學校附近投水自殺，幸而未死。為此，哥哥傅聰還有半句刪掉的話：“對我的走我是永遠內疚的，因為我沒有和大家一起受苦。”

傅雷夫妻死後，有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年輕姑娘，出於熱愛傅雷的譯著和崇敬他高尚的人品，安葬了他們的骨灰。直到上世紀1980年代，傅雷夫妻的骨灰才移葬到上海宋慶齡陵園。傅雷的譯作和美學理論著作被後人奉為經典。

### 黃紹竑 新賬舊賬一起算

民國著名愛國將領、新桂系三巨頭之一的黃紹竑上將（1895-1966）廣西容縣人，字季寬，又名紹雄。1912年入武昌陸軍第二預備學校，1914年入讀保定陸軍軍官學校。1916年畢業後，在廣西陸軍歷任排長、連長、營長、支隊司令等職。1923年孫中山委任他為廣西討賊總指揮。配合粵軍第一師夾擊沈鴻英部，進佔廣西梧州，成立廣西討賊軍總指揮部，所部擴編為三個團。

1924年5月，趁廣西軍閥陸榮廷、沈鴻英交戰之際，與李宗仁部聯合作戰，採取各個擊破的策略，殲滅陸、沈所部，佔領南寧。黃與李宗仁組成定桂討賊聯軍，任副總指揮，佔領桂林。接著擊退桂滇軍唐繼堯部，實現廣西統一。成為新桂系首領之一。



黃紹竑上將

1926年桂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七軍，黃紹竑任黨代表，廣西省政府成立，任省政府主席。1927年後追隨國民政府，兼任十五軍軍長，堵截南昌起義軍。以後又反蔣。中原大戰中，反蔣聯軍在衡陽大敗。引起李宗仁不滿，便去南京投蔣，任國民政府內政部長，1934年起歷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和湖南省政府主席。1937年被授予陸軍中將領上將軍銜。在他的前半生，曾經有過一段反共的歷史。

抗戰爆發，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第一部部长、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指揮娘子關戰役，在抗戰中立有戰功。1947任國民政府監察院副院長。1949年4月為國民政府和談代表，和談破裂後去香港，通電脫離國民政府。應中共邀請參加全國政協。中共政權成立後歷任政務院政務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民革中央常務委員、副主席兼秘書長等職。

1957年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民主黨派人士的座談會上，民革中央常委黃紹竑發言說：“成績是主要的，偏差錯誤是個別的，已經成為工作報告中的一道公式。任何工作報告都套上



這個公式。我認為這樣會意味著強調成績掩蓋錯誤，造成更多錯誤的危險，個別錯誤即使僅僅是百分之二三，也不能用百分之九十七的成績來掩蓋它，忽視它。”

接著，黃紹竑話鋒一轉，提出了當時被認為黃紹竑的經典右派理論-“以黨代政”理論，儘管以後的歷史證明他的理論是完全正確的。他用嚴密的邏輯表達自己的思想：

“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是由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也必須有中國共產黨英明的堅強的領導，這是毫無疑問的，如果有人懷疑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權問題，那就與憲法規定違背了。”在這個大前提下，黃紹竑展開了他的觀點：

“但是，領導手法是可以研究的。我所以提黨政關係問題，絕不涉及黨的領導權問題，而是領導方法問題，我覺得過去某些地方某些工作上，沒有通過人民、通過政府，而是直接向人民和政府發號施令……”他舉例說：“各地方或機關黨委五人小組在肅反運動中直接處理案件，如黨和政府共同發佈決定而沒有把黨對各級黨委的批示和政府對於人民的指示分開來，這樣就可能導致人們或某些黨員認為黨的領導方法就是直接向人民發號施令，這樣對於動員和團結全國人民完成國家過渡時期總任務是有妨礙的，這樣會造成很多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問題，希望在整風中對黨政的關係檢查一下，並且明確地把它規定下來。”

黃紹竑的這一段話，被《人民日報》用標題以《黨不應該直接向人民發號施》十分醒目地刊登出來。除了黃紹竑“以黨代政”的經典右派理論外，還有一件使他悔恨終生的憾事。

中共對民主黨派採用“打進去拉出來”的辦法進行控制。在各民主黨派的領導崗位上或在民主黨派負責人的身邊都安插了內鬼——中共特別黨員。中共利用民革中央常委、副主席兼秘書長黃紹竑喜好女色的特點，安插中共特別黨員、半老徐娘的葛琴作他的秘書。她把黃紹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記錄在案。在她打的小報告裏，不乏黃紹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言論。

黃紹竑劃為右派分子後，被剝奪了一切政治權利和職務，賦閑在家。1966年文革初期，又一次遭到殘暴的衝擊，他痛不欲生，兩次服毒自殺未死。1966年8月31日在北京的陋室用剃刀刎勁自殺。1980年民革中央為其改正，恢復名譽。他生前曾把自己一生曲折的經歷寫入《五十回憶》一書。

## 佟惠林 被革命吃掉的子弟兵

一位從小在紅旗下長大，十四歲參軍參加革命參加中共，終生擔任用自己的生命保衛中共的軍隊保衛幹部，最後反而被他所保衛的中共吞吃掉了。中共這個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又吞吃了一個赤膽忠心的兒子。

誕生在河北平原一個貧苦農戶家庭的佟惠林（？-1966）上面還有一位哥哥，自小缺衣少食，唯讀了幾年小學。那時內戰爆發，河北平原開展了廣泛的遊擊戰爭。幼小的佟惠林十四歲就參了軍，身長還不如槍桿子高。自此之後便以部隊為家，加入了中共，並一直從事部隊中的保衛工作。中共軍隊中的保衛幹部，好似美軍中的MP（Military Police）或國軍中的憲兵，

都是選拔部隊中的精英、忠誠於中共的鐵杆保皇派來擔任的。

中共掌權後，他進入中共軍隊的核心部門擔任保衛工作，1957年整風反右時他是中共中央軍委所屬總政治部保衛部的助理員，軍銜大尉，相當於副營級。正當他風華正茂，事業有成的時候，總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上將作整風動員報告，發動總政幹部響應黨中央和毛澤東號召，抱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精神投身整風運動，向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猛烈開炮。最後他居然風趣地說：“意見儘管提，罵娘也可以，但不要開槍打人。”

佟惠林聽得熱血沸騰，他抱著幫助共產黨改正工作，克服缺點的精神，積極投入整風運動。以往他響應共產黨的每一次號召，聽共產黨的話，跟著共產黨革命到底不回頭。對於這一次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他更要義無反顧地積極投入。

毛澤東對於自己的親信，對於自己的盲目崇拜者也要施以“陽謀”詭計，引蛇出洞。當佟惠林還在熱情地助黨整風的時候，不知不覺中已中箭落馬。部隊對自己子弟兵的處罰比社會上更加嚴厲。佟惠林和他的上級周宏達中校一樣上了軍事法庭，當場撕掉領章帽徽，開除軍籍、開除黨籍，劃為右派，發配山西郭堡水庫勞動。

不久他與三百多位中央軍委直屬單位、軍事院校、各兵種的軍隊右派分子一起發配到郭堡水庫勞動。周宏達中校同他編在同一個勞動大隊。他積極勞動，他天真地認為是“母親”冤枉了他這個孝順兒子，“母親”遲早會醒悟、會後悔的。他期盼著回到母親溫暖的懷抱，在勞動中不顧自己的安危，搶救過工地的民工。

一年後郭堡水庫建成，大多數右派都調走了，他留在水庫工地。上世紀1950年代，中共部隊中有個流行的說法，經濟上最好過的是大尉，最難過的也是大尉。如果是個無牽無掛的單身漢，大尉軍官的經濟收入就很可以；如果已經成家，則會比較拮据。佟惠林已經結婚成家育有二個子女，劃為右派，工資連降四級。他的困難便可想而知。

佟惠林在郭堡水庫，忍受著歧視和白眼，夾緊尾巴忍氣吞聲地做人。轉眼到了文革，他承受了一場更大的摧殘。文革開始後，他雖然已作為地富反壞右、牛鬼蛇神揪出示眾。但運動初期，毛澤東“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打擊的矛頭針對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和一切死不悔改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揪鬥牛鬼蛇神僅僅作為發動群眾的手段而已。可是當時的水庫領導生怕引火焚身，施了個金蟬脫殼之計，將群眾的鬥爭鋒芒引向“死老虎”佟惠林，誣衊他在擔任管理員的時候帳目不清，有貪污行為。他是個公私分明、財庫兩清的君子，為人一向清廉。受此冤屈，當然矢口否認。

他遭到連續幾天、晝夜不分的圍攻揪鬥。遊街時所掛的大鐵牌是用鋼筋和鋼板焊死的，重達八十多斤。還讓他戴上幾十斤重的搗米石臼做的帽子，在烈日下艱難掙扎，造反派更伺以皮鞭木棍。但是他始終不屈不撓，沒有承認，也沒有亂供。這更加激起了“革命群眾”（造反派）的憤怒，而真正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卻逍遙法外，躲在一邊看熱鬧。

對於佟惠林的死因至今沒有大白於天下。施虐者說佟惠林是畏罪自殺，趁看守他的造反派不備，自己跳進水庫溺死。而他的哥哥、妻子和最瞭解他的戰友都懷疑這個結論。佟惠林是個

勇敢堅強、襟懷坦白的人，不畏強暴，不懼虐待。他必然會抗爭到底，不會輕易走上絕路。他的死很可能是他殺。

在反右和文革中，像佟惠林這一類的冤案太多了，殺人兇手為了推卸自己的罪責，把受害者輕易按上個畏罪自殺的罪名，有的甚至毀屍滅跡，不讓家屬看上最後一面。由於中共至今對反右運動及其受害者沒有做出正確的結論，對受害者和他們的材料一概採用毀屍滅跡的手法，可能有些沉冤，事隔多年已永遠不會重見天日了。

像佟惠林一樣的中共忠誠的兒子，在反右運動和文革之中被自己的“母親”吞吃掉成千上萬個。

## 丘原 抗暴的巴蜀才子

“天下未亂蜀先亂”，自古以來這是中國人對四川民心的評價。巴蜀位處中國內陸，物產豐富，人傑地靈。幾千年來出過多少名人才子。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從四川的護路運動開始，巴蜀始終站在自由民主運動的第一線。

五十多年來，人們已經熟知了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和儲安平的“黨天下”三大右派理論，以及林昭、林希翎、譚天榮等人的右派言行。每當提起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言行，往往首先會想到他們這些人。

然而當年在官方認定的五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名右派，以及數以百萬計的官方不認定的民間右派、疑似右派、內控右派、中右分子中，還有著更多的右派精英及其精闢絕倫的右派言論。譬如三大巾幗女英雄之一的馮元春就是巴蜀才女，她最早起來批毛；又如四川文聯創作輔導部的丘原、茜子和流沙河、黃澤榮（鐵流）等人，他們的思想觀點早已衝破中共的思想牢籠，領先於中國的思想界。只是由於五十年前資訊尚不夠發達，在社會上沒有造成轟動效應而已。

丘原（1928-1966）筆名丘漾，四川井研人。博學多才，聰穎過人。他又是個出名的孝子。自己節衣縮食供弟弟讀四川音樂學院作曲系。丘原很早就顯露了他的文學才華，他寫的电影文學劇本《青蛙少年》曾被收入《四川優秀戲劇集》。他在四川大學文工團團長任上調入四川省文聯，擔任四川省文聯創作輔導部專業作家。由於他能詩能文，能編能演，被譽為四川省最具才情的作家。流沙河曾說過：“眾多稱吾師者，皆逐名之輩耳，而吾文學引路啟蒙者，唯年少所交丘原也。”

丘原為地道的巴蜀人，身材魁梧，絡繹大鬍子彰顯陽剛之氣，外表看去，倒有些像北方大漢。他確實具有北方大漢的豁達剛直、交遊廣闊的習氣，常常酒酣放言，毫無忌諱，因而在反右中被誣為“四川省文聯貝多菲俱樂部”成員，劃為極右，開除公職，自謀出路。

說他是“貝多菲俱樂部”成員倒是名副其實，他的右派言論具有綱領性、系統性的特點，對於毛澤東的評價，他說：“毛主席本來就是個帝王，他自己寫的《沁園春》就表白得十分清楚。他獨斷專橫，指鹿為馬。說高、饒是反黨集團就是反黨集團，說胡風是反革命就是反革命。”

對於中共的體制，他也有精闢的見解。他說：“官僚主義產生於無產階級專政制度本身，

不是作風問題。社會主義國家的終身領袖制度，是個人崇拜的根源。布達佩斯的知識份子到貝多菲俱樂部去，原是出於迫不得已。因為在拉科西統治下知識界一片荒涼，又不准自由討論，逼得他們去那裏，因為只有那一小塊地方才有民主自由。”他又說：“文學沒有黨性，只有人性。黨性強化教條，人性孕育藝術。《三國》、《水滸》、《紅樓夢》是靠黨性寫出來的嗎？我認為黨報上刊登的那些光明面全是假的，陰暗面是今天整個社會的真實。領導無論作什麼報告總是說，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次要的，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1955年肅反整錯了那麼多好人，成績還是主要的。共產黨最大毛病是錯了不認錯，耍霸道。”

對於文學藝術，他批評道：“文學藝術創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始于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如果不打破這個框框，中國永遠不會有創作自由和真正的文學作品。文聯和作協本應是作家藝術家的群體組織，不是上下級關係，更不是埋葬思想自由的地方。而現在的作協、文聯是共產黨的衙門，是整人和強制改造人的思想的地方。思想是不能改造的，是人類生而俱有的東西，就像天賦人權一樣。”因此他提出“黨委要退出文學創作藝術部門，讓作家藝術家自由自在地創作，想寫什麼就寫什麼。”

丘原給文聯掃地出門，生活無著。不得已在成都鹽市口開了個印製小店，給學校印講義、刻蠟板、給單位印食堂飯票。他慷慨地收容生活困難的右派分子，引起公安局注意，視為“反動集團”。他的立場觀點和所作所為與中共的專制社會水火不相容、格格不入。

與他在省文聯創作輔導部共事的作家茜子因犯反革命罪判處了十年徒刑。刑滿強制就業不准回家。1973年遷回成都，痛哭流涕地對丘原說：“我們這一生何曾反對過共產黨，共產黨卻往死裏整我們。老子現在真的要反對共產黨了，我要跑到國外去寫文章揭露共產黨的殘暴與黑暗。”

丘原在編輯部當編輯時有一個他幫助發過稿的作者，文革中大造其反，當上了新疆某造反派組織的頭頭，邀請丘原到新疆去。丘原謝絕後他留下二張空白的介紹信，隨時供他來新疆時使用。他送了一張介紹信給茜子，另送一百多斤糧票和數百元人民幣作路費。茜子去新疆後無法出境，又轉到上海打算泅渡到公海爬上外國貨輪，失敗之後潛入山西一處小煤礦挖煤渡日。公安局向全國發出紅色通緝令，將他抓捕歸案。

丘原作為“叛國集團”的成員和策劃人被捕入獄。公安局對他大肆逼供信，威脅利誘他只要交出同案犯，可以立即釋放；拒不交代，死路一條。丘原不為所動，拒不交代，據理力爭，被關在監獄的小籠子裏。

他像一頭怒獅囚困在獸籠裏面；他像一頭蒼鷹拔去了羽毛，無法在藍天翱翔。獄警收去了牙刷、褲帶、繩子。牢中每隔二、三小時有人巡視，看守得十分緊。他留下一根吃飯用的筷子，偷偷地在磚地上磨尖，磨得像針一般尖利，在一個風雨之夜，對準大腿上的動脈血管，狠狠地戳去，然後再用力地攪動，直到鮮血湧出，才倒頭蒙被睡去。次日早晨獄警才發現他仰臥在血泊之中，悄然離世。

他妻子張天秀領回遺物，那床血被重達幾十斤，家裏沒有自來水，張天秀拿到錦江裏去洗，

居然染紅了半邊江水。

丘原用自己的生命抗拒交代，保護朋友。茜子也是巴蜀有名的作家，任《草地》文藝雜誌編輯。1957年支持流沙河的《草木篇》而列入“七人反黨集團”，以反革命罪被捕，先後判刑二十年，改正後回原單位恢復工作。

### 藍鈺 以生命維護做人的尊嚴

新聞出版是意識形態的敏感地區，因而新聞出版界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是重災區，挖出了許多右派；同時也湧現了許多不屈的抗暴志士。藍鈺便是其中一位官位級別較高者。

藍鈺（1919-1966）四川瀘州人。1937年在戰亂頻仍的年代，畢業于省立成都中學高中部，回到家鄉瀘州農校工作。他是個富有正義感的熱血青年，強烈希望奔赴抗戰最前線，聽從了共產黨的宣傳，於1938年離別家鄉，進入延安中央組織部訓練班學習。當年加入了中共。按照流行的說法，他是中共的三八式幹部。

學習結束後，參加了中共宣傳口的工作。從此成為他的終身事業，歷任中共晉綏邊區黨委宣傳部科長、中共邊區黨委機關報《戰地烽火》主編、陝甘寧邊區隴東分區《救亡報》編輯、延安《邊區群眾報》編委、西北《群眾日報》采通室副主任、《新寶雞日報》副社長兼總編輯、西北新聞局辦公室副主任、新華社新疆分社社長、新華總社地方新聞部副主任，最後擔任通俗讀物出版社副總編輯，行政十一級，享受高幹待遇。

藍鈺曾經長期在中共的喉舌新華社擔任領導工作，他在新華社工作的時間，漸漸形成了自己獨立的世界觀和對新聞出版事業的非凡認識，新華社地方新聞部副主任藍鈺和國際部副主任李慎之是新華社內著名的思想超前分子，後來他們各自揭出義旗，成為中共體制內部的黨內民主派。

1957年助黨整風，他滿懷熱切的希望，試圖改變僵化的意識形態模式，改變宣傳工作中只准許有一種聲音、一種模式、一種主義的狀態，大膽地提出出版管理改革方案，其要點是：

一，國務院設立的出版管理機構只管出版的方針政策和協調出版社之間的關係。成立群眾性組織出版協會，讓出版界自己管自己的事；

二，國有出版社“壓縮一批，裁並一批”，開放自由市場，允許私人出版社競爭。

這個方案的實質是推行社會事業的自治化和推動出版事業的市場化。在上世紀1950年代敢於向共產黨的計劃經濟模式提出挑戰，大膽引入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機制的只有顧准和藍鈺二人。在當時社會實屬大逆不道，被視為洪水猛獸、離經叛道式的異端邪說。這二位中共黨內高層市場經濟的先行者卻成為盜取聖火的普魯米修斯，在反右運動中均劃為極右分子，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藍鈺的工資從行政十一級二百多元急劇降為三十二元。

1958年文化部召開所屬單位的右派分子大會，中共文化部黨組書記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向右派分子舉行臨別前的訓話。要他們好好勞動，認真改造，早日回到人民的隊伍裏來。會後藍鈺發配到北大荒勞動教養。在北大荒勞改分場，分場政委（即中共黨支部書記）警告右派不許

亂說亂動。來往信件必須拆封檢查。除了饑餓、寒冷和艱辛的勞動，還要禁錮你的思想。

北大荒已靠近北極圈，冬天是漫長的黑夜，夏天又是漫長的白夜，凌晨三點鐘天色已大亮，晚上九時仍光亮如白晝。一天要從事十三、四個小時的勞動。他的身體瘦弱，承受著與刑事勞動犯一樣的苦役。終於熬到摘帽，回到了北京。摘帽右派和戴帽右派僅一字之差。他感到北京的政治空氣令人窒息，與其忍受那種歧視、輕蔑，不如到北大荒勞動。

藍鈺的異見與正統的中共高幹早有分歧。在延安大樹特樹毛澤東的絕對權威時，曾出現過短暫的自由思想空間，一些人辦的《輕騎隊》壁報著重針對延安的官僚主義和等級制度，藍鈺即在《輕騎隊》上發表過文章；1955年由批判胡風而轉入肅反，各單位成立肅反五人小組。黨委書記請他參加五人小組，領導整人的運動。他想起延安的搶救失足者，便斷然拒絕了黨委的決定。

經過北大荒的勞動教養，他的思想非但沒有改造好，而且向著離經叛道越滑越遠。文革一開始，他單位裏的領導人齊速就宣稱：“你說我反對毛澤東思想，對！我反對過，寫檢查，立字據，都可以。運動嘛，不要頂，運動過後就會給你平反，好漢不吃眼前虧！”大家向他提出了一些意見。藍鈺也對他的領導作風、裝腔作勢和對業務不懂裝懂提出批評。可惜藍鈺忘記了自己的摘帽右派身份，立刻被這個政治扒手抓住了把柄。他像一匹惡狼，棄其他提意見者於不顧，拼命抓住藍鈺撕咬。他惡狠狠地說：“別人提意見還可以，你是右派，我還沒有找你算帳，你倒在太歲頭上動土了，你也不掂量掂量！”

藍鈺遭此奇恥大辱，他覺得自己的傷口又給這個政治流氓撕開了，血從傷口裏噴了出來。他的自尊心受到嚴重傷害，他的尊嚴被絞碎了，他咽不下這口氣，自縊身亡，以自己寶貴的生命維護人的尊嚴和自尊。死時年僅四十七歲。

## 安立綏 起義將領的命運

1957年反右運動中，起義的國軍將領和國民政府要員也是劃右的重點對象，即使他們沒有參與鳴放，未曾發表過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言論，亦可以僅憑他們歷史上的反共污點劃為骨子裏反共的右派分子。如果新賬舊賬一起算，更可劃為歷史反革命右派分子。

國民政府時期西北軍政要員安立綏便是這一類人物的典型。安立綏（1902-1960）字靖候，甘肅景泰人士。早年在北平念中學，積極參加五四運動，與幾位同學一起被捕，他們的照片懸掛在天安門城樓示眾。1927年畢業於清華高等學堂後即留學美國，先進康乃爾大學歷史系學習，再轉入美軍西點軍校，中國人很少有留學美國西點軍校的。1929年經朋友介紹在紐約一度加入中共，在美國從事過工人運動。

1930年回國後便脫離了中共，在西北地方歷任國民政府的黨政要職。旋回國即擔任國民革命軍陸軍暫編第一旅參謀長。1932年1月出任陸軍新編第九師軍事顧問和青海省南部邊區警備司令部軍事顧問。1932年10月份起擔任北平正聞道通訊社青海分社社長。1934年擔任甘肅學院總務長。1936年9月出任甘肅省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兼天水縣縣長。1938年4月赴南京出任

軍令部二廳外交聯絡處處長、學兵縱隊參謀長兼炮兵第十五團團長。抗戰時期回內地繼續擔任軍政要職。

1949年9月在甘肅酒泉參加起義，投向中共，擔任過彭德懷的解放軍第一野戰軍司令部高參、甘肅省人民政府參事、民革甘肅省社會聯絡委員會副主任等閒職。

由於他在鎮反、肅反時反復遭受審查，因此在1957年整風鳴放期間十分小心謹慎，不輕易發表自己的觀點，不寫大字報，盡少參加座談會。但是他的右派帽子早在運動以前已經劃定，若要戴他的帽子，在平時言談中挑出幾句符合毛澤東六條香花毒草標準的反動言論便易如反掌了。

當時社會上議論較多的是流沙河的《草木篇》，短短幾萬字的文章沒有一句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通篇比較隱晦、暗澀。安立綏在整風座談會上作了替《草木篇》辯解的發言。他與《草木篇》的批判者大唱反調，從正面理解白楊、藤、仙人掌、梅的含意。僅僅抓住他的這幾句話，便足夠按上為大毒草《草木篇》辯解的罪名。

在這個基礎上再追根溯源，挖出他為國民政府效命，反對共產黨的反共歷史，順理成章地劃為極右分子。可是還不夠，在極右分子之前再加上一個形容詞“歷史反革命”，安立綏便成為“歷史反革命極右分子”。《甘肅日報》發表批判文章《安立綏反對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頓時成為甘肅省級大右派。

對於歷史反革命極右分子的處理當然要從重從嚴。他被抹去一切虛銜，取消各種津貼，本應送去勞動教養，顧念他年老體衰，又老淚縱橫地包攬了一切強加於他的罪行，認罪態度尚可。因此沒有送他去夾邊溝勞改農場，僅送到敦煌棉花農場勞動。

安立綏咽不下這口氣，他感到委曲、感到冤枉，一輩子親共，早年加入過共產黨，在關鍵時刻又舉起了義旗。這些功跡一筆勾銷還不算，如今又淪為階下囚，誰都可以對他吆五喝六，謾罵污辱，指使他幹最髒最累的活兒。他年老體弱，又忍饑挨餓，承受不了如此沉重的體力勞動和精神負擔，常常神志恍惚地一個人自言自語：“我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我的問題都交代清楚了。”

他一時氣急，思想轉不過彎來，在1960年一個月黑風高的中秋寒夜，投井自盡了。

## 向達 慢性折磨而死的土家族學者

向達（1900-1966）男，湖南省溆浦縣人，土家族人，為土家族少數知名學者之一。他又是中國享有國際聲譽的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北大圖書館館長、歷史教授。1924年東南大學文史地部畢業後，考入商務印書館任臨時暑期編輯，憑著文史與英文優異成績，得以留任英文見習編輯。1930年任北平圖書館編纂委員會委員。

1933年已嶄露頭角，發表《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拓枝舞小考》，出版了《中西交通史》。1934年被北京大學歷史系特聘講授《明清之際西學東漸史》。1935以北平圖書館交換館員前往英、法、德等國圖書館、博物館進行學術考察，把在外國的敦煌卷子、石窟壁畫、唐

人寫本、《太平天國文書》等重要文獻抄錄或拍照帶回國。

1938年抗戰爆發，他擔任遷至廣西宜山的浙江大學史地系教授和北大研究所中西交通史導師，同時兼任西南聯大歷史系教授。1941年，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約，赴敦煌考察莫高窟和安西萬佛峽。發表《論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連帶的幾個問題》，提出千佛洞應收歸國有，交學術機關管理。1943年呼籲政府及學人支持，在他的努力下，敦煌藝術研究所終於成立了。同年率中央研究院西北科學考察團歷史考古組，再赴敦煌考察塑像和壁畫藝術，並開始發掘敦煌南沙山，從此成為《敦煌學》權威之一。

1945年抗戰勝利後回到北平，是《保障人權宣言》的發起者的十三名教授之一。積極參加反內戰活動，秘密保護學生運動領袖。胡適多次勸促他去臺灣，都遭他嚴詞拒絕。他參加了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北大護校委員會，擔任北大圖書館長。

1949年中共掌權後，他歷任北大圖書館長、歷史系教授、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二所副所長、學部委員、北京大學校委會常委、《歷史研究》和《考古學報》編委。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全國政協委員，成為一名知名的親共教授。1951年參加第一屆赴朝慰問團，同時仍進行中西交通史、西域史、敦煌學及南海史方面的研究。

1957年他在反右運動中劃為右派分子之前，曾在助黨整風運動中響應中共號召，對中外歷史的研究和教學工作提出許多立場鮮明的意見，不為中共所容，他受降級降薪留用處分。

1966年文革開始，他肉體和精神備遭嚴重摧殘，毒日頭下跪在辦公室二樓陽臺平臺上挨鬥，隨後和歷史系其他牛鬼蛇神一起押到昌平縣太平莊勞動，晚上寢室門反鎖，夜間不准出門上廁所。他有腎臟病，排不出尿，全身浮腫，得了尿毒癥，卻不准送醫院救治，等於把他慢性折磨而死。當年含冤去世，終年六十六歲。

向達的著作具有很高的學術研究價值。主要著作有：《西域考古記》、《敦煌藏經過眼錄》、《西征小記》、《莫高、榆林二窟雜考》、《張儀潮補傳》、《兩關雜考》、《敦煌藝術與西域的關係》、《校注鞏珍西洋番國志的序言》、《兩種海道針經序者》、《鄭和航海圖序》、《中外交通有關重要史籍叢刊整理緣起》、《鄭和航海圖序》、《西域見聞瑣記》等。譯作有：《高昌考古記》、《印度現代史》等。

### 李宗津 藝術大師的絕路

李宗恩、李宗津兄弟出身江蘇武進的書香世家、名門望族。書香世家、名門望族多出右派。李氏一門出了三名右派，一門三傑。李宗恩是中國醫學界最大的右派，北京協和醫科大學校長；弟弟李宗津是中國美術界的大右派；妹夫程應鏐教授是中國史學界大右派。

李宗津（1916-1977）生於江蘇省武進縣，北京電影學院教授，中國知名畫家。他的油畫曾掛在人民大會堂。1934年就讀於蘇州美專。1937年畢業於蘇州美術專科學校。從李毅士、顏文梁、呂斯百、戴秉



抗暴自殺的畫家李宗津



心等名家學習西洋畫。1940年任教於貴陽清華中學。1943年創作《女童》，在中國美術界開始嶄露頭角。

在作畫的同時，自1946年起在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清華大學藝術系先後任講師、教授。創作了《北海風情》系列寫生作品和《老農肖像》。1947年創作大量表現北京平民生活的寫生作品，完成《平民食堂》等作品。李宗津受到正統文化薰陶，自幼表現出超凡的藝術天賦，徐悲鴻先生很愛惜他的才藝，買下他的《北海公園》，長期掛在院長辦公室。

1951年創作油畫作品《強奪瀘定橋》，被中國美術館收藏，奠定了他在中國美術界的地位。1952年起任中央美術學院油畫系教授，並創作宣傳畫《學習蘇聯先進生產經驗》。1954年油畫作品《東方紅》、《雙喜》參加第二屆全國美展，作品《春遊》、《鞍鋼的黎明》發表在《美術》雜誌上。1956年為紀念魯迅先生創作油畫作品《夜談》，並發表於《美術》雜誌上。

經過不懈的努力，在創作上刻意求新，李宗津成為中國早期油畫界的代表性人物。他的藝術遵循現實主義的手法，造型縝密傳神，色彩絢麗大氣，他的畫卷具有一種特殊的人文書卷氣和銳意進取的藝術個性。無論是大型創作，抑或人物、風景、素描，都具有激動人心的魅力。他有一個與眾不同之處，他的油畫作品幾乎都沒有簽名落款。《中國早期油畫大系——李宗津畫集》收錄了七十一幅油畫、六幅素描。其中只有三幅早期作品有落款。

1957年他參加文化部文化代表團赴尼泊爾訪問，歸國創作了大量關於尼泊爾風情人物的油畫作品，藝術語言樸實，作品寫實。他沒有參加整風運動，埋頭於他的創作。可是他還是被打成右派分子了。他的右派名額早就替他準備好了，虛席以待。據說他的寫實主義技法有違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精神。

從此他的人生道路坎坷多乖。當了右派不能發表作品，長期封筆，藝術天才慘遭埋沒，對於一位創作欲旺盛的藝術家來說無疑是剝奪了他的生存權利。1966年文革開始，他又受到更大的衝擊，成為藝術界的“封、資、修”的代表人物，握畫筆的手長期揮舞鋤頭鐵鍬。李氏家族又成為右派之家，他感到絕望和無奈。於是在1977年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倒臺後，他卻上吊自殺了。

1979年右派改正後，人民美術出版社於1980年出版了《李宗津畫選》。他的代表油畫作品有《東方紅》、《強渡瀘定橋》、《科學家與老農》、《雙喜》等。

## 石盤 敢於退黨的馬列主義哲學教授

在中共黨內，有不少知識份子帶著資產階級自由民主的思想觀念參加進來的，他們在組織上入黨了，思想上並未入黨；與中共的鬥爭哲學和組織紀律格格不入，無所適從。他們不願盲目服從，做中共的馴服工具，最後必將遭到中共的唾棄。

石盤（？-1966）曾經當過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的秘書。陸定一的秘書行政級別不會低於處級，而且手中的實權遠遠高過他的行政級別。石盤儘管有極高的馬列主義理論水準，可是他體內與生俱來的自由民主細胞卻沒有泯滅，已經根深蒂固了。無

產階級思想、馬列主義理論改造不了他，共產黨鐵的組織紀律也約束不了他。

1953年隨著一浪接一浪的政治運動高潮，石盤以“本人性格自由散漫，受不了嚴格紀律約束”為由，要求退出中國共產黨。中共掌權後，共產黨成了執政黨，人們為了升官發財，趨之若鶩，一時洛陽紙貴；石盤卻反其道而行之，退出了中共。“退黨容易入黨難”。他輕而易舉地退出中共後，避居北京師範大學，安心當個馬列主義哲學教授，擔任哲學系馬列主義教研室主任。可是人們懷疑他真實的退黨動機。

當過中宣部長秘書的人，應當具有很高的馬列主義水準，教授馬克思主義哲學對於他理應是輕駕就熟的事，不費吹灰之力。可是石盤的馬列主義與眾不同，他的馬列主義哲學就是“用馬列主義對付別人，用自由主義對付自己。”

1957年反右旋風乍起，石盤精神亢奮，展示他馬列主義水準的機會來了。他奮起反擊，用馬列主義的理論批判右派分子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衝鋒陷陣義不容辭。不論大會小會，只要是批判右派的大會，石盤逢會必到。他的批判極有理論水準，上綱上線，層次清晰，脈絡分明。言必稱馬列、毛澤東。把形形色色的右派言論，什麼“黨天下”、“政治設計院”、“平反委員會”批駁得體無完膚，無藏身之地。石盤頓時又成為響噹噹的左派，紅極一時的風雲人物。

可惜好景不常，在1958年反右補課結束後，隨之而來的向黨交心運動中，石盤搖身一變，又從響噹噹的左派跌入右派的臭屎坑。原來在向黨交心運動中他的退黨原因又成為運動的重點了。大會套小會，大字報鋪天蓋地，人們指責他“假交心，交假心，就是不肯交退黨的真正動機。”

師生員工成群結隊，登門拜訪找他辯論，輪番疲勞轟炸。他的三寸不爛之舌頓時變成張口結舌。他的各種狡辯掩飾統通無濟於事，人們把他逼到了牆角，再無退路。他的馬列主義理論全然用不上，怎麼解釋都不行。人們都向黨交真心，爭相參加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像保爾·柯察金、吳運鐸那樣把一切獻給黨，做黨的馴服工具。而石盤卻受不了無產階級鐵的紀律約束，吊兒郎當、自由散漫，退出了中國共產黨。

人們憤怒了，在當時的時代氣氛之下，石盤經不起人們的窮追猛打，被迫交出真心：“我認為中國和蘇聯都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共和蘇共也都不是真正的馬列主義政黨。”石盤敢於亮出自己大逆不道的思想觀點，稱得上是真正的英雄。其結果可想而知，石盤趕上了末班車，成為北師大最後一名極右分子，而且是教授之中唯一享受勞動教養最高榮譽的人。

石盤和後來成為勞改基金會主席的吳弘達一起勞動教養。吳弘達在《昨夜風驟雨狂》中回憶了石盤在勞教中的情況。當年不論在什麼地方，迎接五一勞動節必須進行衛生大掃除。吳弘達回憶石盤的一段趣事說：“……但在勞教所裏有一個特別的清潔內容，就是抓蟲子。所以在那一天，收容所二千多個人都被趕到廣場上去。集合以後，有一個人名叫石盤，也是右派被勞動教養的，據說他原來是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的秘書，還是北京師範大學哲學系的教授。這個人雖然被勞動教養，但原來因為是共產黨內部的人，所以比較容易獲得幹警的信任。公安

幹部指派他為‘大值班’，就是在犯人中，他是一群值班中的領班。這個地位是相當於公安幹部跟勞教人員之間的特殊角色、中間橋樑。”

“他身高大約五尺，是個小個子，光頭，戴眼鏡，還是個跛子。常說個子越矮，嗓門就越大，他的嗓門震天高。那天他就像個總指揮那樣，安排二千多人應該怎麼做，按各個中隊和小組排成二個人一對的雙行隊伍。然後他宣佈，每一個人對另外一個人負責，身上一定要沒有蝨子。”

吳弘達沒有見過蝨子，更不會捉蝨子。吳弘達回憶道，石盤一看是我，戴一付眼鏡顯然是一個所謂的知識份子，他就一咧嘴笑了，說：“嘿！來！來！來！”把我叫過去，拉到廣場中央一個有三尺高的土臺子上站著，然後就嚷起來了：“大家注意！聽我講幾句話，現在我跟大家講一件新鮮事兒。這一位很明顯的是個資產階級出身的少爺，今天我們搞衛生，他連蝨子都不知道，你們有誰跟他上上課啦！”

他這麼一說，底下就有六七個人從身上抓了幾個蝨子，要拿來給吳弘達看。

石盤不虧是個馬列主義哲學教授，能屈能伸，能上能下。他上可以登上大學講臺講授馬列主義哲學，下可以教導勞動教養犯人怎麼捉身上的蝨子。

不久，陸定一幫他說了話，讓他回到北京師範大學去，課是不能再上了，在大學圖書館裏當了一名管理員。然而他最終沒有逃過文化大革命的劫難。陸定一已經揪出，成為“彭、陸、羅、楊反革命集團”的成員，再也無法幫他說話了。

石盤又被紅衛兵和造反派揪了出來，人們對他在五七年反右和五八年向黨交心的表現記憶猶新。對他的批鬥更上一層樓，石盤集反革命、右派、走資派、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於一身，是牛鬼蛇神的綜合性總代表。他的罪名歸納起來有三條，第一，石盤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極右分子；第二，石盤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陸定一的秘書和親信；第三，石盤目空一切，為人飛揚跋扈，自命清高，實際上是狗屎一堆，臭不可聞。

石盤受不了無窮無盡的折磨，噬臍莫及，憤而跳樓自盡了。

## 賀永增 告密文化的犧牲品

1957年在北大整風鳴放期間，北大西語系的助教周鋒和西語系德語專業四年級學生賀永增共同組織了一個控訴會。會上英語專業一年級的顧文選控訴了他在1955年肅反運動中在杭州公安局所受到的迫害。控訴會後，他動員顧文選與他自己一起參加學生文藝團體《百花學社》。為此賀永增在以後的反右運動中，被打成這次控訴會的幕後黑手。

賀永增（1929-1960）北京市人，家庭出身職員，1957年已經超過二十八歲了，在當年的大學生中年齡偏大，因而比較有社會經驗，分析能力也比較強。反右開始不久，他突然發現有大批佩戴北大紅校徽（當年北京高等院教職員工佩戴）和白校徽（當年北京大學生佩戴）的陌生人出現在北大校園。賀永增敏感地指出，他們是北京公安局便衣偵探，派來監視北大師生員工中的右派骨幹，為首組織《百花社》的陳奉孝同學也發現有個三十多歲戴眼鏡的人一直

緊盯著他。賀永增告訴陳奉孝現在形勢變了，不能再逆風而上，建議採取退卻的政策，保全實力。

《百花學社》和《廣場》編輯都是北大學生的主要學術團體。在當時都打成了反革命組織。陳奉孝決定逃跑，計劃逃入南斯拉夫駐華大使館。**1950**年代各國駐華大使館大部分都集中在東交民巷。只有南斯拉夫使館在後圓恩寺，賀永增是地道的北京人，他告訴陳奉孝這條大多數北京人都不知道的胡同的位置。

隨著反右運動的升溫，《百花學社》被定為“反革命小集團”，為首的六個學生數學系三年級的陳奉孝、東方語文系畢業生譚金水、數學系畢業生趙清、數學系畢業生林樹國和賀永增六人均被抓捕判刑。《百花學社》及其領導的《廣場》編輯部內情在判決時被檢察官掌握得清清楚楚。當時人們百思不得其解，而且還相互懷疑。事隔二十多年才真相大白，原來名列第二主犯的譚金水是中共北大黨委打入《百花學社》內部的臥底密探。他出賣了同學，自己卻安然無恙。陳奉孝在**2009**年第五期《開放》雜誌上揭露這個事件的真相，中共的告密文化無孔不入。

賀永增本來身體不好，疾病纏身，判刑後病情加劇。反右後毛澤東緊接著發動了大躍進。賀永增是一個思想敏銳，善於獨立思考的人。他意識到毛澤東的個人獨裁已經無可挽回，大躍進又餓死了這麼多人，他對國家和個人前途感到悲觀無望，**1960**年在北京監獄中結束了自己年輕的生命。

賀永增自盡後，住在劈才胡同的家人接到一個通知：“賀永增自絕於人民”，家裏人不敢打聽，不知道他自殺的細節。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賀永增是被叛徒出賣的。

附：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分院起訴書

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分院

起訴書

京檢（**58**）分反起字第**454**號

被告陳奉孝，男，二十二歲，山東省濰坊市人，家庭出身資產階級，捕前系北京大學數學系三年級學生。住北京大學宿舍三十六齋**121**號。

被告譚金水，男，二十四歲，湖北省，家庭出身小販，捕前系北京大學東語系畢業生，住北京大學宿舍二十四齋**102**號。

被告趙清，男，二十四歲，河北省清苑縣人，家庭出身富農，捕前系北京大學數學系畢業生，住北京大學宿舍二十二齋**209**號。

被告林樹國，男二十三歲，福建省福州市人，家庭出身職員，捕前系北京大學數學系畢業生，住北京大學宿舍二十二齋**113**號。

被告賀永增，男，二十九歲，家庭出身職員，捕前系北京大學西語系四年級學生，住北京大學宿舍二十七齋430號。

被告張元勳，男，二十五歲，江蘇省贛榆縣人，家庭出身資產階級，捕前系北京大學中文系四年級學生，住北京大學宿舍三十七齋110號。

本案由北京市公安局偵察終結，經我院審查認定被告陳奉孝等犯罪事實如下：

被告陳奉孝等思想極端反動，一貫仇視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1957年5月乘中國共產黨整風之機向黨發起了倡狂的進攻，並先後貼出了《是時候了》、《人之歌》、《數四為什麼不鳴》、《青年人，我們是北大的主人》等反動大字報。謾罵積極分子，誇大捏造事實煽動資產階級右派向黨進攻。同時被告賀永增、林樹國、譚金水等也先後提出“三害的根源在於制度”、“新封建比舊封建更嚴重”、“愛國者有罪”、“暴力統治”等，並聲稱要以生命衝破“黑暗”進行煽動。同時被告賀永增、譚金水、張元勳與右派分子沈澤宜又秘謀計劃寫信給全國各高等學校進行煽動，並威脅黨委停課。被告賀永增與反革命分子蔡中一併策劃組織了“控訴會”，使反革命分子顧文選在會上公開製造謠言煽動群眾。

被告陳奉孝、張元勳等為了使右派分子有組織的向黨進攻，便於1957年5月分別組織了《自由論壇》、《廣場》等反動壁報。後被告陳奉孝又勾結右派分子譚天榮、楊路等發起組織《百花學社》，隨即由被告趙清等抄錄右派分子貼出的最反動的大字報《教條主義產生的歷史必然性》、《白毛女申冤》等等以《百花學社》的名義油印成反動宣傳品。同時被告陳奉孝、譚金水、賀永增、趙清、張元勳等又勾結反革命分子劉奇弟、右派分子譚天榮等煽動群眾到清華大學、師範大學、石油學院、地質學院、礦業學院、農業機械化學院等高等院校及天津大學、南開大學等進行反革命宣傳鼓動，散發、張貼反動宣傳品，同時在師範大學與《苦藥社》等反動集團取得聯繫，企圖在中國煽動起“匈牙利事件”。被告陳奉孝、張元勳等為了使其反革命活動長期繼續下去，更有組織地進行反革命宣傳鼓動，又勾結了右派分子沈澤宜、崔德甫等人組織了反動刊物《廣場》，並將被告張元勳、反革命分子劉奇弟、顧文選等所寫的文章，大字報選輯成冊，企圖印刷一萬份在全國各地散發。同時被告陳奉孝、譚金水、趙清等還將油印和抄寫的反動大字報寄往上海、武漢、西安、山東等地進行煽動，企圖使其反革命活動“蔓延全國”。

上述被告由於有反對中國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等反革命的共同目的，在上述反革命活動中，有被告譚金水、趙清、林樹國、賀永增和顧文選（在押）等便結成了以陳奉孝為首的反革命集團。隨於1957年6月9日、11日有被告陳奉孝、譚金水、趙清、林樹國等參加先後在蔚秀園、長河秘密集會，在會上除一致表明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要改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政治制度的反革命目的外，還計劃學習“理論”、研究策略、發展擴大反革命組織以及利用《廣場》進行反革命宣傳等。

在北京大學開展了反右派鬥爭後，被告等見苗頭不對，為了掩蓋其犯罪活動將反動刊物《廣場》被迫宣佈解散。于6月25日被告陳奉孝、譚金水、趙清、林樹國、賀永增等又秘密集會，研究了當前形勢後，決定退卻，轉為更隱蔽的活動。並定出聯絡暗號，改為兩、三人的碰頭活

動。同時被告林樹國、譚金水、趙清等還出謀研究陳奉孝“過關”的方法。並由被告譚金水將被告陳奉孝和反革命分子劉奇弟、右派分子譚天榮等所存的反動信件、日記本轉移給林樹國保管。並互相訂立“攻守同盟”。同時被告譚金水與反革命分子劉奇弟又研究準備打入人民解放軍和兵工廠，企圖奪取武裝以達到其改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制度的反革命罪惡計劃。

1957年7月13日被告陳奉孝、張元勳被批判後又與李亞白（在押）在香山秘密集會。由陳介紹張、李參加其反革命集團。並研究準備逃出國外進行反革命活動及逃出國外的方法。同時被告陳奉孝到印度、南斯拉夫大使館及英國代辦處聯繫，企圖偷越國境逃往國外。被告張元勳、賀永增被迫交代了部分罪行後，於1957年12月又參加了蔡中一的反革命集團，並將香山集會時研究的出國方法向蔡作了傳達。

綜合上述事實，被告陳奉孝、譚金水、趙清、林樹國、賀永增、張元勳，組織或參加反革命組織，印刷反革命宣傳品，進行反革命宣傳活動，陰謀顛覆人民民主政權，實屬罪行嚴重。本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第七條之規定提起公訴，請依法懲處。此致！

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檢察員 王昭

1958年5月17日

### 丁則良 楊振寧的家教老師

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教授每當提起當年使他終身受益的家教老師丁則良教授都會感歎不已。楊振寧的父親是清華大學數學教授楊武之，他家教有方。楊振寧讀的是清華成志小學和北平崇德中學。初中一年級時楊武之先生為了平衡兒子的知識結構，據楊振寧後來回憶道：“他沒有找一個人來教我數學，也沒有找一個人來教我物理。他去找雷宗海教授（參見列傳第二卷12頁）。那個時候雷是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是我父親的好朋友，他跟雷先生說，你可不可以找你的一個學生，來教振寧《孟子》。雷先生就介紹了他的一個得意學生，叫做丁則良。”



抗暴自殺的丁則良教授墨蹟

那一個半暑期使楊振寧終生受益，《孟子》裏頭有很多關於儒家哲學，你可以瞭解整個中國的思想方法。楊振寧說：“對於我這個人的整個的思路有非常重大的影響，遠比我父親那個時候找一個人來教我微積分要有用得多。”（《楊振寧教授談教育》）

今天人們都知道楊振寧教授，但已很少有人知道雷宗海教授，更少有人知道丁則良教授。丁則良（1915-1957），他是清華大學歷史系抗戰前的畢業生。吳晗、周一良、孫毓棠等皆為

同學。曾在西南聯大、昆明師院、雲南大學以及母校清華大學任教。抗戰後赴倫敦大學進修和作研究。

1949年聽聞祖國“解放”指日可待，興奮不已，便毅然放棄博士學位返國。回國後任教於北京師範大學，並加入民盟，是國內公認的美國史研究創始人。1952年院系調整，他給分配到東北人民大學（現吉林大學）任歷史系主任。

丁則良的兄弟丁則民也是知名學者。兄弟倆一同調往東北。初到長春，趕上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的尾聲。初來乍到便受到衝擊。在思想上產生了芥蒂。他們被視為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僅能充當中共的同路人，中共對他們採用又改造又利用的限制政策。

1957年整風反右時，丁則良奉命派到蘇聯出席學術會議，沒有參加運動，談不上有什麼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無辮子可抓。回國後沒有返校，直接去了北京大學，參加教材編寫工作。可是原單位忽然捏造出了一個“三人反黨小集團”，丁則良是三人之一。丁則良聞訊十分氣憤，就在得到消息的當夜，投未名湖自沉。丁則良含冤而死，年僅四十二歲。歷史學界殞落了一顆年青的未來之星。

丁則良被指控為畏罪自殺，不准召開追悼會，只可開批判會。他的同學周一良教授在他停屍處繞棺一週，以示告別。周一良作為北大民盟支部負責人，反而要主持丁則良的批判大會。以後在全系大會上，有人批評他溫情主義和立場不穩。翦伯贊教授對周一良說：“你對丁則良還真有感情呀！”殊不料翦老在文革年代，也走上了丁則良的道路。

尼克森訪華後，楊振寧教授隨後回國參觀訪問，美國華人科學家代表團也隨之而來。代表團中有不少著名學者和科學家。周恩來宴請眾人，竺可楨作陪。席間有人打聽中國著名學者的情況，亦有人問及歷史學界的著名教授雷宗海、向達、丁則良怎麼銷聲匿跡了。周恩來只能支吾其辭，含糊以對，不敢道出他們死亡真相。

現代學人學成歸國者眾多，歸國後似乎都不能逃脫奔波動盪的厄運，像丁則良教授那樣會捨生取義、不畏強暴是最悲壯之舉。苟活者遭受的磨難並不亞于死者。弟弟丁則民在反右後又背上了“畏罪自殺的反革命家屬”的名義。反右後緊接著又開展“向黨交心”運動。丁則民被迫向黨交出三份“心”，順理成章地追補為“漏網右派”。

丁則良身後，周一良教授為他整理出版了《丁則良文集》。

### 徐季正 慘死在勞教場

徐季正（1917-1960）湖南常德人，出生在書香門第，自小受到祖父母嚴格規範的儒家教育。因學業優良，從小學免費升讀到省立三中，在湘西三十五所省立中學舉行的會考中獨佔鰲頭。他思想進步，推選為全縣學生聯合會主席。在一二九學生運動中，率領學生抵制日貨，組織三十五個縣的學生舉行抗日遊行，組織鋤奸團，打擊漢奸、惡霸。七七事變後離家出走，毅然投筆從戎，考入國民





政府的軍校。畢業後任重慶國民政府軍政部軍需署財務檢查官。

1949年，國民政府撤退往臺灣的前夕，徐季正在中共地下黨員汪至柔的影響下，放棄了飛往臺灣的飛機票，留在大陸。擔任國營重慶市食品公司財務主管，其妻子也在同一公司的秘書處工作。

徐季正1947年

徐季正靠近中共，要求進步，努力工作，參與建設了一系列重大工程。如嘉陵江邊西南地區最大的屠宰場、茄子溪肉類加工廠、化龍橋飼養場、劉家台轉運基地等。並開拓豬肉出口貿易，一年賺回黃金二十四萬兩。1956年3月《重慶日報》報導了徐季正的模範事蹟，享受勞動模範的待遇。

1957年春夏之交的那場暴風雨中，徐季正懷著赤膽忠心，向中共提出忠言，毫無保留地亮出自己的思想觀點。他說，黨的三害不是一、二個人的問題，也不是哪個地方的問題，而是由於黨的政策和制度造成的；他說人與人之間只有善惡之分，沒有階級之分，階級鬥爭是挑撥人與人之間鬥爭的學說。經過幾個運動，人與人之間都不願以誠相待、互不信任，這是階級鬥爭的結果。

他說，崇拜虛無主義，批孔子不是完人。知識份子思想改造不是以理服人。歷次政治運動是霸道不是王道。對知識份子應實行寬柔政策；他說胡風不是反革命，是文藝觀點之爭；他又說鳴放是放長線吊大魚。共產黨現在很被動，要批判右派，會影響放；任其氾濫，又不可收拾。章伯鈞、羅隆基的文章起了帶頭作用；章乃器說章伯鈞是投降將軍我很欣賞，史良揭發章伯鈞的私房話我覺得不應該。

徐季正的這些言論簡直是飛蛾撲火，自投羅網，頓時公司辦公室的大字報鋪天蓋地。在上千人的批判大會上受到圍攻，他的辯護無濟於事，強制搶走了他的話筒。他突然變得憔悴蒼老、疲憊不堪。他的這些言論，又加之歷史上在國民政府的軍政部門做過事，歷史加現行頃刻劃為反革命極右分子，開除公職，勞動教養，發給十八元生活費。

起先他在重慶市勞動。在長江邊的珊瑚壩河邊，偶然看到正在除四害的女兒，他用噙滿淚水的雙眼偷窺女兒，不敢相認。接著他給發配到臭名昭著的四川省公安廳四一五築路隊一〇一中隊，修築成昆鐵路，從自貢、宜賓、峨邊一直修到喜德。喜德縣位處涼山彝族自治州的腹地，瘴氣瀰漫、瘟疫流行，歷史上是蠻荒之地。1960年7月29日，他帶著饑餓、疲軟、瘦弱的身軀，上山砍柴，摔死在山崖之中。



徐妻王靖澳

單位裏的保衛幹事上門通知家屬，冷若冰霜地向他妻子宣佈：“徐季正摔死了，是因公死亡。你要同他劃清界限。”從此厄運降臨徐季正三十四歲的妻子和六個子女頭上，最小的女兒才三歲，他們受到株連、歧視和冷遇。妻子成了“右派寡婦”，六個孩子成為“右派崽子”。一個右派寡婦拖著六個右派崽子掙扎在社會最底層，其度日艱辛難以用言語表達。

他妻子出身名門，被誣為“反屬、臺屬”，扣上何應欽女兒



的帽子，迫得精神失常，幾次想扔下子女自殺。右派改正以後，他們全家乘火車來到徐季正葬身之地的四川喜德縣，那裏只有一個幾人合葬的土墳堆，尚依稀可認。

### 董時光 在饑餓中吃飽撐死

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位於成都市的西南師範學院正在大禮堂召開六千人的批判右派言論大會。批判對象董時光個子矮小瘦弱，深度近視眼，年屆中年。主持會議的學生會主席馬嫻華（陳希同案中畏罪自殺的副市長王寶森之妻）勒令董時光上臺交代罪行。

只見董時光不慌不忙，正氣凜然地登上主席臺上，清清嗓子，用鏗鏘有力的聲音開始檢討。他說本人1945年參加中國民主同盟，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與共產黨並肩作戰，為國民政府所不容，背井離鄉亡命美國。在美國留學，以躲避國府特務的追殺。1950年韓戰爆發（此時台下亂吼：‘什麼韓戰，是抗美援朝！’），我在美國報紙上寫文章譴責美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為，又為美國政府所不容，把我驅逐出境。

1953年毅然回到偉大祖國的懷抱，來到西南師範學院教書。我滿懷熱情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回應毛主席號召幫助共產黨整風，反對宗派主義，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因此我沒有任何反對共產黨的企圖……

說到這裏，台下的聽眾早已按捺不住，大吼大叫，“叫你作檢查，叫你低頭認罪，誰讓你醜表功！”大會主席馬嫻華奪過董時光手中的話筒叫道：“不許右派分子董時光放毒！董時光必須徹底交代反黨罪行！”接著台下齊聲高呼：“打倒右派分子董時光，董時光必須低頭認罪！”

董時光神聖不可侵犯地站在主席臺上，冷眼面對台下一片騷亂，嚴詞拒絕了中共黨支部要他檢討“反黨罪行”的威脅利誘。台下有些打手已經站起來準備沖上臺去。但是反右時期的批鬥會畢竟還沒有達到文革時期那種野蠻暴戾的程度。大會主席對董時光吼叫道：“你頑固堅持反動立場，絕不會有好下場！”隨即宣佈勒令董時光繼續交代反省，老實認罪。六千人的批判大會匆忙收場，董時光遂成為西南師範學院，乃至整個四川地區敢於捍衛自己尊嚴、不肯曲膝投降的右派分子。董時光的名字成為頑固不化的右派分子代名詞。

董時光（1918-1960）於1947年去美國留學的年代，美國正盛行麥卡錫主義，他毅然於1952年9月回國，抱著自由民主的理念到成都來教書。他在給毛澤東的信中說：“初解放時，知識份子都歡欣鼓舞，以為從此可以自由地想、自由地談、自由地寫、大膽批評、大膽陳述不同意見了。”

在給友人的信中開心地說：“以我們的經濟平等，加上政治上的民主，我們和資本主義社會比較起來，便不比他們差了。”董光是個理想主義的知識份子，對於共產黨，對於無產階級專政和階級鬥爭的學說，缺乏起碼的理解。況且他沒有參加過中共建政初期的鎮反、土改、肅反、三反五反、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那時他在海外，更加不知道什麼叫逼供信和隨意打人殺人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厲害。

1957年5月11日他在老教師座談會上發言說：“黨員領導們在思想改造中要打垮知識份子的尊嚴，正是覺得他們太驕傲了，看不起自己，就批判他們純學術觀點、純技術觀點、純業務觀點，從來不檢討自己的純政治觀點。其實純技術觀點、自高自大即使是真的，也絕不會嚴重到應該受到被批判的嚴重地步。”6月底他在《文科論壇》上又發言說：“思想改造難道必須用殘酷的肉體傷害嗎？純技術觀點、不問政治，難道也應該拿來鬥爭嗎？應該把人家關起來寫坦白交待，逼迫人家把自己罵得狗血淋頭，害得人家得精神病、自殺嗎？”

董時光具有中國士大夫的那種“士可殺不可辱”的高傲精神，他善於獨立思考，具有正義感。他的性格與中共的專制社會格格不入，難以接受中共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董時光曾經正氣凜然地喊出：“你共產黨有四百萬解放軍，我董時光有正義感。”他被開除教職，押送峨邊沙坪勞改農場勞動教養。

那時正值毛澤東的狂熱左傾幼稚病造成的全國大饑荒，董時光本來精瘦矮小的身軀更加佝僂了，走路低著頭。可是他仍在惡劣的環境中保持著尊嚴，身穿質地良好的美式服裝。來勞教時帶著不少錢。但他懂得“財不露帛”的道理，很少化錢買東西吃，雖然那時的糧食根本填不飽他本來並不太大的胃口。每次吃完飯，他都會用手指頭刮去碗底殘留的一點點米湯，洗碗時喝掉剩下來的泔水。獄警嘲弄地問他：“董時光，包谷糊糊好吃不？”他冷漠地回答：“好吃極了，比美國麵包還好吃！”不學無術的中共獄警聽不出董時光話中的諷刺口吻，自以為得意。

在勞改營裏，囚犯們都餓昏了，饑餓使囚犯們失去了人性。饑餓讓受過教育的人突破了道德底線。難友們互相偷竊鈔票、糧票。董時光也像有錢人一樣，把錢縫在自己貼身的棉背心裏，晚上睡覺穿在身上，白天套在身上隨身不離。可是即使這樣小心翼翼也給偷掉幾十元錢。

經過長年的饑餓折磨，董時光的消化吸收能力降低，腸子變細。他調到四川省公安廳勞改局四一五築路隊去修築成昆鐵路。饑餓使董時光喪失了理智。他將一件上等呢料服裝換取了老鄉的兩斤牛肉乾。那時囚犯們有一個共識：寧可吃一頓飽飯美美地撐死，也不願做一個冤鬼慢慢地餓死。

董時光一口氣吃光兩斤牛肉乾。牛肉乾在他的腸胃裏膨脹發酵，董時光頓時得了急性腸梗阻撐死了。“吃飽撐死”對於饑荒年代的囚犯們究竟是悲劇、喜劇或者悲喜劇，只有他們自己才知道！

## 黃啟風 一對苦人兒夫妻之死

安徽省無為縣地處長江和巢湖之間的一片平原沃野，河網密佈，良田萬頃。那裏是安徽省的產糧大縣，魚米之鄉。可是在大饑荒年代，這個百萬人口的縣，僅在冊人口就餓死了二十六萬，占全縣人口的四分之一多。魚米之鄉餓死四分之一人口，其中原因之一便是在反右運動中亂抓右派，使中共縣委領導到一般幹部都不敢說真話，大刮共產風、浮誇風、虛偽風、謊報大豐收的軍情。

無為縣右派之多，幾乎囊括了各單位的主要領導。中共無為縣委宣傳部長和二位副部長打

成右派；公安局長、法院院長打成右派。在農業局裏副局長打倒正局長和另一位黨外副局長後，自己也被打成右派；那位黨外副局長劃了右派後不堪侮辱，把自己悶死在二條麥攏之間不足五寸深的小水溝裏。反右反紅了眼，使共產黨失去人性，彼此嘶咬一番。

無為縣是個農業縣，農業局在無為縣與全縣的經濟緊密相連。然而右派也特別多，局長、副局長是右派，下面的基層右派更多。本文的主人公黃啟風（1923-1957）是該局一個十分普通的記帳員，只有初中文化水準，既無專長又無學歷。為此他很珍惜這份在政府部門謀得的差使，儘量保住這個可以養家活口的鐵飯碗。他為人膽小謹慎，忠厚老實。落下樹葉怕砸了腦袋，過獨木橋怕丟掉雞巴。他的膽小怕事一方面是性格使然，俗話說：“江山好移，本性難改”；另一方面他在舊政府做過事，他覺得這是他的軟肋，他的歷史污點。三反五反、鎮反肅反、沒有觸及他的歷史問題。可是他自己總是提心吊膽，低著頭走路，直不起腰杆子。

無為縣農業局的反右鬥爭，到了1957年的8、9月份逐漸升溫，掘地三尺，深挖埋藏地下深處的右派分子。話說黃啟風的老婆張蘭芝某天早晨上街買菜。局裏相熟的另一位家屬見到她把她的拉到一旁，神秘兮兮地悄悄告訴張蘭芝，她聽當家的說，你家那口子已內定為右派，明天就要開批鬥大會了。叫她回家告訴家裏那口子做好思想準備，先寫好檢查，不要臨時來個“上場昏”，嚇得尿了褲子。並再三叮囑，這是國家機密，千萬不要聲張。

張蘭芝聽罷，沒有心思買菜，慌忙趕回家去，即刻告訴丈夫。黃啟風聽了倒十分冷靜，他似乎胸有成竹，當右派是早晚的事。到了晚上，他平靜地對老婆說，你帶孩子先睡下，他要寫檢查。張蘭芝心中不安，他知道膽小怕事的丈夫恐怕躲不過這一關。眼見丈夫呆坐桌邊，沒寫出一個字來，妻子心急如焚，又束手無策。想著想著，迷迷糊糊睡著了。

待她睜開眼睛，丈夫不在桌邊，心知大事不妙。叫醒女兒出門找丈夫。她不敢聲張，只好低聲呼喚：“老黃，老黃，你在哪里呀？我和女兒等你回家，你可不能想不開呀，事情到了這一步，鬥就讓他們去鬥吧！”，“這機關不是人呆的地方，咱們到鄉下去種田吧！”母女倆一路走，一路哭，一路喊。

忽然她們隱約聽見有人在地底下呼叫：“蘭芝，蘭芝，我是啟風快救我上來。”母女倆循聲找到井邊，果然是丈夫投井了，可是沉不下去，死不成。母女倆使勁拉，人給井壁卡住，上不去又下不來。到了此刻，黃啟風求生的欲望超過了絕命的打算，他自己也拼命地掙扎。

蘭芝母女犯了個致命的錯誤，她們想不聲張，悄悄把黃啟風扯上來，不驚動周圍鄰居，只當此事沒有發生。她們知道“畏罪自殺”的後果，雖然黃啟風無罪可畏。折騰到天亮，還是被人發現了。幾個人合力將黃啟風撈起，已奄奄一息，氣若遊絲了。送到縣醫院來不及搶救便氣絕身亡。張蘭芝見狀，奔回家去，給七歲的女兒吃一個放了滅鼠藥的燒餅，自己上吊自殺。女兒沒有死，在醫院搶救回來了，她自己命絕黃泉。

黃啟風原來僅僅列為批判對象，並未正式確定戴帽，來不及推向群眾。這樣一來，倒成為名符其實的“畏罪自殺”的反革命右派分子了。妻子隨他而去，撇下的女兒成了可憐的孤兒，給親戚收養，終身背上反革命右派子女的帽子。

## 李春潮 莫須有的胡風集團骨幹分子

在早期抗暴自盡的眾多右派分子中，李春潮是一位中共黨內的高級幹部，他又是個黨內優秀的思想理論家、詩人、教育家和翻譯家。

李春潮（1913-1957）出生於陝西省戶縣澇店鎮馬營堡。又名李春芳、李春生、李春發、李春普、李滌生，筆名黎炎，排行老二。父親李乃倉，為人耿直，青年時代被村人推舉為村長。

1932年聰穎好學的李春潮畢業於北京大學和日語專科學校，那時還不到二十歲。他經常向《冷風》雜誌社寫詩寫文章，針貶時弊，揭露當政者的黑暗腐敗，遭到追捕通緝，便逃亡上海。1936年隻身赴日留學，先後進入早稻田大學和帝國大學讀書。在東京結識了賈植芳、王亞平、浦風等留日學生。他們思想進步、學習馬克思主義，志趣相投，結成《海外文藝社》，編印《文海》月刊。由於思想激進，出版二期困難重重就停刊了。

不久日本當局以“瘋人罪”的名義將他關進東京瘋人院。在日時結識的郭沫若等人多方設法把他營救出獄（瘋人院），出獄後歸國。深居家鄉渭河之濱的戶縣澇店鎮馬營堡閉門讀書，隱居多年。

七七事變後，抗戰爆發。李春潮重返江湖，去陝西涇陽縣安吳堡青訓隊擔任教師。1937年12月加入中共。1939年秋任學員班指導員，率領學員奔赴延安。在延安學習後進入陳毅的部隊擔任營教導員兼黨委書記，負責日軍戰俘的教育宣傳工作，配合反掃蕩鬥爭。

1945年1月調任山東建國學院（抗日軍政大學）中教科科長，培養青年幹部。待徐州易幟後，出任徐州市教育局長。1952年先調廣州，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宣傳部擔任負責工作。不久又轉去廣西僑族自治區，任廣西僑族自治區人民委員會（即政府）文教委員會副主任兼教育廳副廳長。他勤奮工作，成績卓著，受到《人民日報》的表揚。與此同時，他還從事詩歌創作，出版了《黎炎詩集》、《戰地之歌》，編輯《山歌聯唱》一、二、三集；從日文本翻譯《歌德詩選》、《雪萊詩選》。

李春潮與時任國務院秘書長的習仲勳是老同鄉、好朋友，相識于延安，以後保持著經常聯繫。1954年春天，李春潮到北京去開會，見到習仲勳，習告訴他，毛澤東下手令，要繼續批判胡風。當時正巧賈植芳也來北京，李春潮無意中把這個消息透露給了賈植芳。李春潮好心地說，你把這消息告訴胡風，讓他小心一些。

賈植芳去了胡風家，胡風問他，你的朋友多，聽到了什麼風聲沒有。賈植芳使用隱喻對胡風說：“衣服要穿厚一些，天氣冷了。”胡風聽罷就鬧火了，說：“我跟毛主席都講好了，怎麼還要批判我？”胡風十分氣憤，便寫下了舉世聞名的《三十萬言書》，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申述自己的觀點。

賈植芳被捕入獄，在獄中過了二十五年暗無天日的日子。李春潮雖然人在廣西，卻經常與賈植芳、蕭軍、蕭紅有交往，因而打成“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當時他擔任廣西僑族自治區教育廳副廳長、中共教育廳黨組書記。北京通知中共廣西僑族自治區黨委，李月潮向胡風

分子通風報信，必須進行嚴肅處理。中共廣西黨委給他的處分是開除黨籍和公職。反右開始後立刻又給他按上一頂右派分子的帽子。李春潮冤憤難平，投入水庫自盡，時年四十四歲。

賈植芳在出獄後，寫了一本《獄裏獄外》的書，他在書中寫道：“在東京燒烤店的三個青年人，李春潮最早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李春潮死後追認為“畏罪自殺，抗拒運動。”妻子張達曾任中共廣西省委宣傳部學校教育處長和南寧師範學院院長。受李春潮牽連，亦受處分。遺下二子二女，最大的十多歲，最小的才五、六歲，在以後的生活中均受到株連。

1980年7月1日中共廣西僑族自治區黨委為他改正昭雪，平反胡風反革命集團受牽連案，將其骨灰葬入南寧革命烈士墓。

### 胡思杜 胡適的叛逆兒子

胡適有二個兒子，胡思望和胡思杜。本來還有一女，早年夭折。胡思杜（1921-1957）出生於1921年12月17日，恰好也是胡適的生日，給兒子取名思杜，意即感激胡適的恩師美國著名哲學家杜威博士。為了教育二個兒子，胡適請來他的弟子羅爾綱駐家輔導。可是胡思杜早年得過肺病，又生性頑皮，廣交朋友，吃喝玩樂，不願讀書。在美國八年讀了二所大學均未畢業。胡適認為“豎子不可教也”。胡思杜遂於1948年回國，回到胡適身邊。胡有許多朋友給他介紹工作，都被胡適拒絕。安排在北大圖書館工作，讓他好好讀書。



胡適夫婦、胡思望與胡思杜（右）

當時中共解放軍已包圍平津，二城汲汲可危。胡適準備追隨國民黨撤退，但胡思杜卻提出：“我要留在北平，不去南方。”他說：“我是普通平民，沒有任何官職。再說我從來沒有得罪過中國共產黨，共產黨來了也不會對我怎麼樣的。”經再三勸阻無效，其母江冬秀非常傷心，不願扔下二十七歲的次子。她估計思杜受胡適影響，今後日子不會好過，再無相見之日，便給他留下許多金銀細軟，再三叮囑這是給他以後結婚之用。

國民政府執行搶救計劃，於1948年12月15日下午，一架國軍小型飛機在北平南苑機場降落，接走了胡適夫妻，胡適是國民政府的國寶，這是搶救國寶行動，蔣介石十分重視。在此之前，中共曾邀胡適不再離開北平，播出向“胡適先生的廣播”，許諾他繼續做北平圖書館長，中共地下黨對他做了說服爭取工作。胡適的反應冷漠，微微一笑說：“他們會要我嗎？”他決定南下，留下了思杜。中共與他更反目成仇，將他列為戰犯，雖然他從未與中共打過仗。

留在北京的胡思杜，被中共派遣去中國人民大學的前身——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名為學習，實為思想改造。中共掌權後，當時的青年都以進入“革大”為榮。胡思杜以戰犯兒子的身份，進入革大，自然非常感激，這是中共對他的器重。因此他努力改造思想，與

戰犯父親劃清界線，在學習中踴躍發言。他的同學中有他父親胡適的學生何思源，後來擔任北京市副市長。

胡思杜在1949年進入華北革大前，將一大箱母親留給他的金銀財寶寄放在他的堂舅、北大數學系主任江祖涵教授家中。1950年他在革大學習結業，更加靠近中共。他取回這箱財寶，他自我解釋道：“我要參加共產黨，黨員不需要金銀財寶，我拿去上交給組織。”後來他果真上交了，因為是他的東西，江家也不好說什麼。

1950年9月22日胡思杜在香港《大公報》發表了《對我的父親——胡適的批判》。言語尖刻，鋒芒畢露，矛頭直指其父。胡思杜寫道：“他是人民的敵人，也是我自己的敵人。”宣稱脫離父子關係。文章最後說明，此文是節錄他思想改造的第二部分。此文在香港、臺灣和美國引起很大震動和強烈的關注。胡適自己卻不以為然，他瞭解兒子的思想動態，實出於無奈之舉。他說：“我們早知道，共產主義國家是沒有言論自由的，現在更知道，連沉默的自由那裏也沒有。”

胡思杜分配到唐山鐵道學院馬列部工作，擔任文史教員。由於家庭成份不好，一直交不上女朋友，孤身一人過光棍日子。不過他為人樂觀，勤奮工作，努力爭取入黨。他積極投身中共歷次政治運動，1957年助黨整風亦不例外。他響應中共中央號召，主動向學院和部領導提出許多合理化的批評建議，他自以為這是向黨獻忠心之舉。

反右運動開始，中共學院黨委把他定為右派分子，批判的時候當然要抬出他的父親胡適和反動家史。指他為反動階級的孝子賢孫，國民黨殘渣餘孽。胡思杜精神徹底崩潰了，他百思不得其解，他一片真誠的赤子之心，不惜與鍾愛他的父母劃清界線，卻被中共誣為階級本性未改，視作敵人。在1957年9月二十1日上吊自盡。留下一封滿紙辛酸的遺書。

“……現在我沒有親人了，也只有你了，你來了我一定不在了。找我的一個同事，也會告訴你我的一些情況，你是我最親的人了。我死了，你不要難過。你能吃苦耐勞，我剩下的六百多元現金、債券二百多元，你的孩子如能上大學的話，供給他們上大學。一塊手錶也給你留個紀念。希望你們努力工作，你的孩子們好好學習，為社會主義立點功。”這封遺書是給他留在大陸的唯一親人堂兄胡思孟的。他在大陸的其他親人，都是中共幹部，早與他劃清界限了。

胡思孟趕到學校，看見院內貼滿大字報，有批胡思杜的，有批胡適的。批胡思杜說他是自絕於人民，與人民為敵，頑抗到底。胡思孟把他匆匆埋到郊外空地上，草草立了個小木牌，不久連小木牌也找不到了。

胡適始終不知道他的愛子在大陸已先他而去。他在1957年6月4日立下遺囑，把妻子立為第一財產繼承人，二個兒子為第二繼承人。1962年胡適在香港突發心臟病猝死。如果他們在地下相遇，不知胡適對胡思杜在大陸的遭遇有何感慨。

王可所著《我們那個年代》記敘了胡思杜那段歷史。

李長恭 同人辦報中圈套

李長恭（1930-1967）山東萊陽人，1948年因有兄弟在江西贛南工作，也去了贛南。1949年考入南昌新聞幹部學校，畢業後分配到《贛南日報》社，不久又調到江西《鎢礦工人報》社。最後於1954年再調《新湖南報》社，分配在工業工運部當編輯，尚未結婚。

1957年開展整風運動，報社總編輯宮健平一再動員職工要本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精神積極提意見，幫助領導克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宮健平態度誠懇地反復要大家打消顧慮，踴躍發言，並且囑咐詳細記錄。在工業工運部小組會上，李長恭是發言最積極的兩個人之一，另一個是鐘叔河。

此前毛澤東曾批評《人民日報》是“死人辦報”，主張另辦一報與《人民日報》唱“對臺戲”；又聽說在攸縣蹲點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譚震林也批評《新湖南報》是“死人辦死報”。天真的李長恭竟信以為真，跟唐蔭蓀、鐘叔河、朱純、鄭昌王等商量另起爐灶，籌辦一張以知識份子為對象、像解放初《民主報》那樣的民辦報紙，好與《新湖南報》一比高低，促進《新湖南報》改進。

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後，中共省委書記周惠便說：“《新湖南報》就是個‘小匈牙利’，抓右派不受比例限制，有多少抓多少。”商量辦報的五個人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同人報小集團”，李長恭由於發言積極，被劃為極右分子，受第二類開除公職、勞動教養的嚴重處分。

李長恭開除公職以後，送長沙麻園灣勞動教養集訓隊集訓，和周艾從等人再送到強迫犯人勞動改造的新開鋪新生電機廠幹體力活。後被該廠留下辦油印小報《新生快報》，其他人員則調到株洲白石港新生工程隊去了。他和周艾從調到技術組，學著繪製工程圖表，當了副組長。

1960年的一天，技術組因臨時加班要吃晚餐，食堂事務長已睡下，不願起床做飯，便反誣指他們聚眾鬧事。當時已進入大饑荒時期，糧食十分緊急。勞教幹警聳人聽聞地上綱上線，定性為“一起利用糧食困難的反革命暴亂，是罪上加罪。”他因是副組長，被判處十二年徒刑，組長彭一農更被判刑十五年。他們由新生電機廠押解到望城縣坪塘新生水泥廠勞改隊服刑。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到處抓“三家村”、“四家店”。李長恭、彭一農等在新生水泥廠勞改隊被當作“三家村”揪出來，遭狠批鬥。李長恭一再受到誣陷處罰，對前途絕望，於1967年在坪塘新生水泥廠跳崖自殺，年僅三十七歲。

## 葉紹林 生命中的另一種壯烈

1957年江西上饒師範共揪出二十多名右派分子，附屬小學也揪出三名右派。除掉一名免予處分，從輕發落以外，另外二名都判監督勞動，送往荒山開拓上饒師範自己的農場。這二名右派都姓葉，一名名叫葉金滿，江西廣豐人；另一位叫葉紹林，浙江江山人。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他們兩人在農場裏情同手足。葉紹林四肢發達，身強體壯，胸大無腦，個性耿直；葉金滿身單力薄，弱不禁風，多思善慮，見貌辨色。兩個人相輔相成，相得益彰。體力勞動，葉紹林幫助葉金滿，代他完成完不成的勞動定額；出謀劃策的拿主意事，則由

葉金滿代勞。

右派改造主要考察其勞動表現。毛澤東最高指示，勞動改造人們的思想。勞動表現得好，就意味著思想改造好了。這一條形而上學的觀點指導著右派摘帽工作。思想改造好壞，無法打開腦門檢查。只能依靠勞動表現這一條有形的物化指標了。

1959年大煉鋼鐵，葉紹林憑藉他的體力大獻身手，超額完成定額指標，受到領導表揚，在上饒師範二十多名右派分子中率先摘帽，恢復工資待遇，離開農場，回到學校當上了事務員。可是形同手足的葉金滿永遠完不成勞動定額，摘帽無望，只得領取二百七十五元退職金，退職回到江西廣豐老家，照顧長期痛風臥床的妻子。

葉紹林失去了葉金滿，等於丟掉了自己的腦袋，變得不太會思考了。1965年，學校調他去管理農場，同時調去校工占祥雲長住農場指導學生勞動。葉紹林光棍一條，占祥雲帶有家眷。他們比鄰而居，二間臥室僅一牆之隔，夜深人靜，葉紹林可以聽見隔壁的私房話和那種叫床聲音。

上饒師範教導主任鄭志彬也是右派，他評估占祥雲年輕的老婆說她有一雙色迷迷的淫眼，具有極大的殺傷力，看男人的眼神宛如兩條繩索，哪個男人心猿意馬，就會被她牽著脖子走。

光棍漢葉紹林孤身一人，三十出頭沒沾過女人邊。占祥雲老婆勾魂的眼神和輕佻的舉動使他衝動不已，爆發了積蓄已久的動物本能。倆人僅又一板之隔，乾柴烈火，一拍即合。那婆娘喜歡他強壯而兇猛的體格，以及農場管理員的地位。農場管理員享受幹部待遇，遠遠勝過自己老公低微的工人職位。

他那本來簡單的頭腦更加發燙，經不住婆娘在他耳邊嘀咕：“你是獨一無二的偉男子。如果你需要我，我會設法同占祥雲離婚，與你白頭到老。”也許這是真心話，也許這是翻雲覆雨、情滿意酬後的感歎。可是于葉紹林都是一帖舒心的麻醉劑。

天下事物，渾沌顛倒，陰差陽錯，預料不及。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席捲了上饒師範。原來地位卑下的農場工人占祥雲，搖身一變當上了“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造反司令，執掌上饒師範的領導大權，成為上饒市不可一世的大人物。

俗話說“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又說“老公行時，老婆舉旗”。那婆娘跟著老公也戴上了“工革司”的紅袖章，成為家屬造反派頭頭。當年忍氣吞聲的造反司令不甘心戴綠帽子。婆娘見狀，頓時把“愛情”拋在腦後，愛情變成敵情。夫妻雙雙揪出沒有改造好的摘帽右派，當作牛鬼蛇神一陣痛打。

婆娘當著老公的面，給他一記耳光，怒罵道：“右派分子膽敢在老娘身上動手動腳。”造反司令像狼一樣咆哮：“階級敵人膽敢強姦造反派！敢在太歲頭上動土，瞎了你的狗眼。你不投降，就叫你滅亡。”

這時葉紹林痛悔交加，悔不當初。他像染缸裏的白布，跳進黃河洗不淨。面對一群如狼似虎的造反派，只好違心地低頭認罪：“我坦白，我交代，我認罪！”

話雖這麼說，他簡單的腦袋瓜子並沒有轉過彎來。他受騙，他委屈，他憤怒，他被愚弄，



滿腔怒火無處發洩。時至今日，他想起了好兄弟葉金滿，有他在身邊出個主意有多好！可惜他不知身在何方。

他動足腦筋，想不出什麼抗爭的辦法，又不甘心低頭認輸。只好用最原始的以命相搏方法，一命博一命，來個魚死網破，同歸於盡。他磨快了一把菜刀，趁呈交認罪書的機會，突然拔刀砍殺了那個他傾心相愛的婆娘。造反司令嚇得混身索索發抖，跪地舉起雙手向他求饒。他高舉菜刀猶豫片刻，又輕輕放下，仰天大笑三聲，卑夷地瞪了跪地作輯的造反司令一眼，抹頸自殺。來個自我了斷。

葉金滿直到1978年右派大改正的時候，才得知他的好兄弟已在十多年前離開人世。中華大地又多了一個“反革命右派強姦殺人犯”。由於葉紹林在這個世界上孑然一身，無親無眷，無人出頭替他討回公道。然而葉金滿倒是認為，這是人的生命中的另一種壯烈，葉紹林不枉在人世間瀟灑走一回！

### 陳 賁 慘死在戈壁灘的總地質師

原地質部總地質師陳賁（1914-1966），原名陳國澤，祖籍福建閩候，1914年出生于湖南長沙。1934年考入清華大學地學系，師從地質學家謝家榮教授，參加一二·九學生運動。一二·九學運後中共成立外圍組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他是第一批民先隊員。1938年隨校流亡到長沙，未及畢業便離校參加八路軍，在炮兵團參謀處教員室任數理化教員，給排以上幹部上文化課。

炮兵團的軍官基本都是文盲，向團長哭訴聽不懂。團長是朝鮮族人，性格粗暴，聽了反映便訓斥陳賁等文化教員：“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擺臭架子”，叫他們“你們給我滾蛋”。陳賁性格剛烈氣憤不過，頂嘴道：“滾蛋就滾蛋”。他立即和其他幾位文化教員離開炮兵團去參加抗大。

不料炮兵團長事先已打電話給抗大，讓抗大拒收這幾位文化教員。陳賁便回到西南聯大，繼續讀完課程，於1939年在西南聯大畢業，加入重慶的中央地質調查所工作，謝家榮和黃汲青同為他的導師。資源委員會派他去甘肅，籌建老君廟油礦局。

在那裏他遇到中共地下黨負責人、清華同學刁德順。經刁介紹，陳賁於1941年4月加入中共，積極從事中共的地下活動。黨支部派他到蘭州去找八路軍辦事處接續黨的組織關係，接待他的是董必武。董出於警惕性沒有答復他，使他失望而歸。後來董必武派中共甘肅省工委組織部長趙振雄專程去老君廟油礦，與他們建立了組織關係。

殊不料，趙振武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受康生迫害而坐牢。陳賁所在整個黨支部與中共上級黨委失去聯絡，處於地下時期的中共地下黨組織，往往都是單線聯繫的。一旦中間某一環節上的人叛變、被害或脫黨遁走，由他領導或聯絡的下級黨委和人員就會斷線，跟著倒楣。陳賁和他的同志就此失去了中共組織關係。直至1949年7月，陳賁才重新入黨。



陳賁，原燃料工業部總地質師

在石門礦務局工程師任上，陳賁於1945年至1949年奉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派遣，赴美國進修。回國後聘任為中國石油公司上海勘探室工程師，再度去西北地方，編寫《青海冷湖油田開發方案》，並繪製《玉門油田油層地質構造圖》，首創引入注水工藝。

中共掌權後，陳賁調任青海石油局研究所地質師和總地質師。地質部成立後先調地質部，後調往燃料工業部。燃料工業部部長康世恩是他的同學，他向康提出建立“全國石油儲量委員會”，擔任過燃料工業部勘探司付總地質師。總地質師的職位一直空缺。因此他實際上就是總地質師。

在肅反運動中，中科院院士、中國油氣田專家童憲章被人揭發，誣衊童憲章在老君廟油田搞技術破壞，多次抄家。陳賁瞭解童憲章是位勤奮工作、埋頭苦幹的老專家，挺身而出為他仗義執言：“在查無確鑿證據之前，要特別謹慎從事，以免在技術人員中造成不良影響，給黨的事業帶來損失。”

他又為自學成才的高級工程師黃先馴辯護。黃先馴因與蘇聯專家有分歧而受到嚴厲處分。1956年又撤銷了處分。繼而在1958年再戴上右派帽子，送山西煤礦勞教。在礦上發了幾句牢騷，說了幾句怪話，被戴上現行反革命分子帽子。等到1979年平反，已患直腸癌而故。

陳賁是極少數敢於為知識份子不公平待遇而說話的中共黨內技術專家之一。領導早已懷恨在心，1957年鳴放運動中，他向燃料工業部黨組織提出“對現行計劃任務辦法的意見和修改建議”，主張搞經濟核算，注意經濟效益，減少國家損失。這份意見和建議本來對改進計劃工作極有意義。但部黨組把它視為毒草，指責陳賁幾次三番地為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鳴怨叫屈，惡毒攻擊階級鬥爭和政治運動。幾罪迸發，劃為極右分子，開除黨籍，開除公職，流放青海勞動教養。

在青海冷湖石油管理局勞動教養時，不少好心人勸告他“承認錯誤，才得摘帽”，均被一一拒絕了。1966年文革的紅色恐怖席捲全國每一個角落，像青海冷湖這樣偏僻荒涼的戈壁灘亦不能倖免。1966年6月15日以前陳賁已被革命造反派揪出，當作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和國民黨殘渣餘孽加以批鬥侮辱。性格剛烈的陳賁始終不服罪。因不堪凌辱，於6月15日自盡於戈壁灘上一間破落的小屋裏。他的屍體被草草拋到荒漠上的亂石堆中。身後在極右分子的帽子之上，又加上一頂“畏罪自殺的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而且開了三天三夜的缺席批判會。

1979年他的夫人黃佩文和女兒陳守卉才被准許赴青海老君廟參加他的追悼大會，他的屍骨早已蕩然無存了。到了這時才追認陳賁是1939年11月11日參加革命工作的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他的黨齡從1941年12月起計算。

## 敖乃松 殉情的情聖

本書《新梁祝哀史》一文，敘述了一位殉情的男性右派王季洪淒慘的一生。敖乃松是另一位殉情的右派。他們平平淡淡而又可歌可泣的短暫一生，證實了匈牙利詩人不朽的詩章“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

“當門打開，只能走出一個人的時候，記住，搶行是可恥的。”這是敖乃松（1934-1973）從不離身的扇子上寫的一句座右銘。曾同他一起勞教的作家叢維熙的《走向混沌》、吳越的《他為殉情而自殺》和張鶴慈的《兩把右派扇子的故事》都描述了敖乃松的人生經歷。據這幾位作家介紹，敖乃松乃是一位學問和人品都出類拔萃的知識份子，頭剃得光光，穿一件短褲衩，活像一尊笑口常開的彌勒菩薩。

敖乃松是江蘇常州人士，195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圖書館管理系。畢業前體檢發現肺結核病已進入第二期，遂申請暫緩分配，回到常州外婆家休養治療。敖乃松的父親敖恩洪是中國有名的攝影家，《中國畫報》的攝影記者。敖乃松是長子，兄弟四人。受家庭影響，他從小愛好文學和音樂，對古典詩詞造詣頗深。

外婆家在常州的鄉下，一座老式木屋寬敞舒暢，緊靠小河。他在家養病，閑來無事，老外婆給他介紹一位十六歲面清目秀、長相亮麗的小姑娘蕾蕾，替她補習功課。蕾蕾因家貧上不了學，擔誤了上學的時間，跟一群拖鼻涕的毛頭孩子一同上小學，可是插班後仍跟不上進度。她是外婆的侄孫女，也算得上是敖家的親戚。蕾蕾聰明伶俐、純真甜美、悟性很高，很快跟上了進度。二年後敖乃松養好了病，準備回北京重新分配工作。

蕾蕾青春煥發了，成熟了。她喜愛文學，讀了許多小說。某天看完《簡愛》，動情地對敖乃松說：“我真佩服簡愛，她敢於去愛羅徹斯特。”敖乃松道：“也應該佩服羅徹斯特，他敢於接受簡愛的愛”。蕾蕾反問他：“如果你是羅徹斯特，你會接受簡愛嗎？”敖乃松回答：“我當然會的，如果你是簡愛，你有這樣的勇氣去愛羅徹斯特嗎？”蕾蕾沒有回答，深情地撲進敖乃松懷裏，用熱吻回答了他的問題。那時她快十八歲了，他二十二歲。

老外婆很喜歡這位侄孫女，同意了這門親事。分手那天，倆人山盟海誓，蕾蕾送給他一個繡有敖乃松小名“海龍”的書包。倆人商定，待敖乃松返回北京，征得父母同意後娶她過門。

父母起初不同意這門婚事，北大畢業的高材生娶一位鄉下姑娘，門不當戶不對。後來見他態度堅決，也就勉強同意了。北大將他分配到雍和宮對面國子監內的首都圖書館，工作稱心，婚姻有望。這一段時間是他一生中最稱心如意的一瞬間。

好景不長，一陣腥風血雨橫掃中國幾百萬知識精英。敖乃松上班才幾個月，出於他對中共的赤誠忠心，響應領導號召，挖空心思、搜腸刮肚地找出幾條改進工作的意見鳴放了出來。反右開始，立即被扣上一頂右派帽子，等待發落。他怕連累天真無邪的蕾蕾，不忍心讓她當右派家屬，寫信委婉地了斷這樁婚姻。不料蕾蕾剛接到信，便到北京來了，任憑敖乃松怎麼解釋，她只有一句話：只要海龍哥不變心，她永遠跟著他，哪怕是討飯或者當囚犯。為了表明心跡，要求立即結婚。只要二個人在一起，喝水也甜，喝粥也香。

經雙方父母同意，“黃蓮疙瘩當簫吹”，倆人辦了簡單的婚事，住到了一起。幾天後，一輛吉普車開到宿舍門口，二位警察取出一張蓋有北京市人民政府紅印的《勞動教養通知書》，要敖乃松簽收。剛出家門，傳來一陣撕心裂肺的呼叫：“海龍哥，你要保重呀！”敖乃松回頭瞥了她一眼，豈料這卻是這對鴛鴦的最後一瞥，從此再也沒有見過面。

1957年深秋，敖乃松被送進北京市郊大興縣的團河農場勞教。二、三十人一間大房間，缺衣少食，他是一個肺病剛痊癒的人，從事強體力勞動，全靠有朝一日與蕾蕾團聚的堅強信念支撐著，勉強掙扎著活了下來。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教養條例》的規定，勞動教養應當是有期限的，半年、一年、三年，最多不超過五年。從1957年深秋到1966年文革爆發，這幾萬名右派分子從有期徒刑變為無期徒刑，即使改造好了摘掉帽子，也必須留場成為“摘帽右派二勞教”。右派們紛紛走上絕路自盡，沒有餓死還活著的迷茫了、麻木了，一個個變成行屍走肉。

敖乃松憑著一股渺茫的信念，一直在進行業餘寫作。文革開始，勞教農場也要掃四舊，查抄右派們寫的日記、書信。這個消息傳出來後，為避免說不清楚，各自採取了掩藏措施。敖乃松偏不信邪，儘管他也聽聞這個消息，卻覺得自己的寫作光明正大，無可厚非。非但不藏起來，還繼續寫作不綴。

一天趁大家都下地幹活的當日，場部派人對宿舍進行徹底大搜查，敖乃松的作品自然被搜走了。他發現自己的作品被搜走，居然不知趣地跑到場部去要求歸還。這種做法不啻火中取栗，被管教狠狠地批了一頓。當晚他就上吊自殺了。幸虧半夜有人起床小便，被人發現救了下來。他頂了一個“反抗改造，自絕人民”的罪名，批判他堅持資產階級反動立場，書寫反動小說。他的反動小說不是政治類的反黨小說，而是鴛鴦蝴蝶派的言情小說，寫他和蕾蕾妹妹之間生離死別的哀史。他的答辯是：“這些都是事實，不信可以去調查。”這部反動小說就此裝進了他的檔案材料袋中。他還一心盼望著勞教釋放的那一天。

蕾蕾回到村裏，村民們說這樣一個年輕美貌的姑娘嫁給了一個右派，簡直是鮮花插在牛糞上。有人勸她離婚，有人勸她改嫁。她的回答只有一句話：“只愛海龍哥哥一個人，除了海龍哥哥誰也不嫁。”她苦苦撐到1964年，已經二十五歲了。新上任的黨支部書記和村長都是部隊轉業的年輕人，看中了她，對她採取組織措施，強迫她與右派分子劃清界限。村幹部們把她五花大綁，強行押送到夫家，她又哭又喊無濟於事。

敖乃松的弟弟敖乃栓也是右派，在東北勞動教養。聽聞這個悲慘的消息，告訴了哥哥。敖乃松萬念俱毀。不知蕾蕾的死活，唯有把精神寄託在寫作小說上面。可是他的小說給場部抄走，不知下落。他決定重砌爐灶，用他的整個生命重新書寫他的絕唱。他的新版小說只寫到他被送去勞教為止。再往下他沒有勇氣寫下去了，不敢寫出他心愛的蕾蕾的下落。

光陰荏苒，轉眼間到了1973年春天，敖乃松和他的朋友飲完酒後將一本珍藏的樂譜送給朋友，說道：“我想結束啦，留著它沒用了。”又說：“我和你不一樣。我的老母已經故世，妻子被別人霸佔。在這個世界上，我已經沒有什麼責任，也沒有什麼可留戀牽掛的，我可以放心地走了。”

第二天一早，在勞教隊搬遷到六分場時，找不到他了。有個叫李衍德的忠厚的蘇州人，說是見過敖乃松，並交給他一包手稿，托他交給另一個朋友。這部手稿是他完整的絕唱，已經寫完了蕾蕾之死。

眾人急忙找到養魚塘邊，他常騎的自行車貨架上夾著一張紙，上面寫著潦草的鋼筆字。算

是遺書：“朋友們，對不起，我要先走一步了。必須說明的是，我是因為失戀而自殺的，與政治無關，更與這次調往六分場無關。我選擇這樣的時間離開你們，真不是時候。湖水太冷了，要你們下水來撈我，我實在不忍心。現在我想了一個辦法，你們為我收屍的時候，只要拉一下這棵楊柳樹上的繩子就行，可以不用下水。不過眼下凍土還沒有開化，挖坑要打鎬，很累的。我向為我挖坑的朋友說聲對不起。我特地為你們買了二瓶二鍋頭，算是我對你們的慰勞吧。另外還有一瓶，是替給我換衣服的朋友準備的。大冷天幫我換濕衣服，我知道那滋味也很不好受。按理說，我應該多給你們買幾瓶酒，但是我的力量達不到了。最後，奉勸想自殺的朋友們，結束之前，千萬不要忘記喝酒，它可以把你送到極樂世界。別了，朋友們，一切恩恩怨怨都沒有了，都了結了。敖乃松，1973年3月28日下午。”

楊柳樹幹上拴著一根繩子，眾人七手八腳地拉上這根繩子，很快地把他拉上來了。他穿戴整齊，面色如生，雙手蜷縮胸前，似在向大家拱手作揖。腰間拴著繡有“海龍”二字的布書包，裏面裝著五六塊磚，他怕沉不下去，以防萬一。善良忠誠、與世無爭的敖乃松失去了生活的勇氣，窩著一肚子委屈無聲無息地走了。

敖乃松死後，循例還要開一個批鬥會，批判他“抗拒改造，自絕於人民”的醜惡行徑。過了幾天警察去通知家屬，全然不顧他老父親因犯心臟病臥病在床，逕自上前推醒老人大聲嚷嚷：“你兒子死了，是自殺的，他要與人民為敵到底，這都是你平時缺乏教育的結果。”

### 蔡克誠 蒙辱自殺的總編輯

1957年《新湖南報》打出的右派分子多達五十四人，比《文匯報》、《光明日報》和《人民日報》中任何一家大報社都多得多。在五十四名右派中，有以“挑起關於3月份農村報導的爭論”罪名，被劃為右派分子的《新湖南報》農村部主任蔡克誠。他也是“鄧蘇傅蔡反黨右派集團”的骨幹之一。鄧洪鈞是報社社長，蘇辛濤為副總編輯、傅白蘆和蔡克誠均是編委。

他們的主要右派言論為：一、從報紙的特點出發，以抓政治思想為重點來宣傳黨的方針政策；二、報紙應當辦得豐富多彩，充滿群眾的聲音；三、不要只看著領導機關，也要注意群眾的反映意見和要求；四、報紙宣傳固然要以黨的中心工作為中心，但也要抓好一般社會問題和群眾生活問題的報導。

蔡克誠（1924-1968）廣東普寧人，中共黨員，1955年擔任過《新湖南報》肅反五人小組副組長兼辦公室主任。1956年，任農村部主任。

1958年，蔡克誠在反右補課中受第二類處分：開除公職、開除黨籍、勞動教養。1962年解除勞動教養，並同時摘掉右派帽子，被安排在長沙市真知中學擔任語文教師。

然而對於蔡克誠來說，更大的災難還在後頭。1967年，所謂“一打三反，清理階級隊伍”運動蓬勃開展時，蔡克誠立即串連與他同時打為右派分子的前社長鄧鈞洪、嚴伯嘉、何新明、陳望岳、宗柏生、劉皓宇等，共同回顧當年兩種辦報方針的爭論情況，並分頭搜集前中共湖南省委書記周惠在《新湖南報》的親信總編輯宮鍵平和副秘書長孟樹德的歷史情況。當過中共湖

南省委統戰部長的宮健平，竟是殺過共產黨人的“反動分子”，履歷表上除“官”與“男”二字外，都是偽造的。在湖南省圖書館查閱《中央日報》，發現孟樹德在1946年至1947年期間以共產黨員身份充當《中央日報》特派員和採訪部主任，寫了大量反共文章，竟稱蔣介石為“明燈”，大罵“共匪”。

他們把有關材料寫成大字報，交給已經摘掉帽子仍然留在《湖南日報》社的同事，以他們的名義一批又一批地在《湖南日報》院內張貼，引起了很大的震動。同年8月，他們決定上訪中央，由嚴伯嘉和何新明等人攜報告進京。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寫信給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嚴伯嘉等三同志于9月13日來中央反映前省委迫害前《新湖南報》革命群眾問題，現介紹去你處，請接談處理，並請調查處理。”湖南省革籌負責人於9月兩次接見前《新湖南報》受迫害人，“支持他們進行革命大批判。還批下一筆經費，供受迫害同志出版報紙之用”。嚴伯嘉、何新明兩人由中央文化革命接待室介紹，還去中央監委進行了申訴。

從10月到翌年1月共出版三期報紙，報導成立《新湖南報》政治迫害案聯合調查團消息，發表“撕開《新湖南報》政治迫害案的黑幕”等文章，報紙出版後，流傳全國。

這起事件便是轟動全國的《湖南日報》事件。1968年春節假期剛過，蔡克誠等人被《湖南日報》造反派《紅色新聞兵》抓走，關進牛棚。在“右派翻天，堅決鎮壓”的口號下，大肆對他們進行迫害，搞逼供信。前社長鄧洪鈞也被《紅色新聞兵》抓走，進行了殘酷的批鬥，被打傷。《紅色新聞兵》還四處搜捕蘇辛濤等。蔡克誠在報社內被造反派嚴刑拷打，不堪忍受凌辱而自殺身亡。

1979年中共湖南省委宣傳部發出的《湘宣政字（79）15號》文件指出：“蔡克誠同志1957年被劃為右派，屬於錯劃，給予改正。撤銷原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勞動教養的處分。作因公死亡對待。

### 第三章 勞動改造與勞動教養

#### 綜述 中國古拉格

##### 蘇聯的昨天是中國的明天

在上世紀1950年代中蘇蜜月時期，中國流傳著一句家喻戶誦的口號：“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俄羅斯文學巨匠索爾仁尼尼巨著《古拉格群島》以嚴酷的事實告訴中國人，蘇聯的昨天就是中國的今天和明天。

索爾仁尼琴（1919-2008）誕生於10月革命的烽火中，他是一位中學數學教師。二戰期間在蘇聯紅軍當個尉官，立有戰功。1945年因為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批評史達林而在前線遭到逮捕，在勞改營中服苦役度過八年時光。後來被放逐到前哈薩克斯坦加盟共和國，並在那裏治癒了胃癌。

出獄以後不久，他發表了第一部以他在集中營生活為題材的中篇小說《伊凡-傑尼索維奇生命中的1日》，引起西方極大關注，作者也一舉成名，於1970年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索爾仁尼琴在勞改營中已經“在黑暗中依靠囚犯們記憶”寫成了《古拉格群島》的初稿。他躲藏在專制的黑夜裏，用最細小的字體書寫螞蟻般的天書，塞進小瓶裏秘密隱藏和傳遞。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三年，他的這部巨著秘密送往國外，隨即於1974年在巴黎問世。他立即被當時的蘇聯當局斥責為叛徒，並以“叛國罪”驅逐出境。離開蘇聯後，居住於德國、瑞士和美國。他曾在公共場所被人注射蓖麻毒針，險些喪命。蘇聯解體後於1994年才回到俄羅斯。先後又出版了《癌病房》、《崩潰的俄羅斯》等著作。

### 古拉格群島

俄文中的《古拉格》（Gulag）是俄文“勞改營和教養院管理總局”的縮略語，最初隸屬於克格勃（全俄肅反委員會）。古拉格群島這個陰森恐怖、令人膽顫心驚的名字是索爾仁尼琴的一種比喻說法。作者將其比喻為“群島”，意在指出勞改營制度已經滲透到蘇聯政治生活中的每個領域，無所不在，變成了蘇聯的“第二領土”。

在蘇聯的第二領土上，處處佈滿監獄和集中營。犯人們生活在極端嚴酷的政治和生活條件之下，沒有自由，沒有麵包，沒有衣服，卻又無法逃離群島。作家藉以比喻蘇聯人民生活在失去自由的殘酷制度下，從而抨擊史達林的極權統治和集中營制度。

古拉格群島最早誕生於1918年。1923年在靠近北極圈的白海中的索洛維茨基群島（Solovetsky）上建立了第一座特別勞改營，用來關押反對十月革命、與蘇維埃政權為敵的政治犯和不同政見者，包括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和宗教界人士。

自此以後，古拉格模式在全蘇越建越多，1935年已有十四處，經過1937年起的肅反運動，到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已達到八十五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許多囚犯帶罪上前線。二戰結束時減少了約三十處，剩下五十八所，但到1947年，又回升到七十處。1953年史達林逝世前夕，全國竟達一百七十所，遍佈各個地區和角落，象一張巨大的蜘蛛網，罩在蘇聯的版圖上，儼然成為蘇聯的“第二領土”。

史達林逝世後，蘇共二十大清除個人崇拜及其後果，古拉格的數量一下子減少一百0二所，尚剩六十八所。此外在1948至1953年間，蘇聯內務部又建立了十二所殘酷監獄制度的政治犯特別集中營。所以在前蘇聯解體前夜，還有八十所。

在《古拉格群島》中，索爾仁尼琴介紹了許多“不可思議”的囚犯。有一位國營大企業的廠長在歌頌史達林的大會上，第一個停止鼓掌被判刑十年；一位裁縫不留神將針插在有領袖頭像的報紙上；鐵路工程師建議多拉車皮被指為破壞火車頭和鐵軌；十七歲小姑娘波切拉參加讀書俱樂部被送進勞改營，而她十八歲以上的朋友們統通槍決了……。關押的囚犯從十四歲到八十多歲，內中有黨和國家高級領導、各級黨政官員、元帥將軍以及強制遷移的少數民族群體，當然最大多數還是知識份子。

食不果腹、衣不蔽體、超強勞動的囚犯們相互之間往往還要夫妻出賣、父子反目、母女成仇，這裏沒有親情和信任，只有“大義滅親”。作者在第七部《史達林死後》的第二章《統治者易人，群島依然在》中說：“它只有入口而沒有出口，它吞進來的只是敵人，送出去的只是

它生產的財富和屍體。”

前蘇聯哲學副博士恰利科娃說：“1937--1950年集中營死亡一千二百萬人，加上槍斃富農、集體化被鎮壓和餓死的二千萬人，死亡總人數達三千二百萬。”

赫魯雪夫大權獨攬後，一方面在講臺上攻擊史達林的監獄暴政，另一方面毫不遜色地繼續強化勞改營制度。在史達林後繼者們的統治時期，“仍然有千百萬人成為不公正司法制度的犧牲品”。索爾仁尼琴一針見血地指明產生這種反常現象的根源所在：“統治者換了人，但古拉格群島依然存在”。

索爾仁尼琴的答案不僅適用於昨天已經垮臺的蘇聯，也完全適用於今天貌似強大的中共。中共自繚襪中起一直由盧布餵養長大。勞改制度、人事檔案、戶口管理、組織體制、舉報告密、群眾專政，無一不抄襲蘇聯老大哥的榜樣。中共的成長壯大發展驚人地像昨天的蘇聯，中共即將到來的衰退敗落滅亡也會像昨天的蘇聯。誠如索爾仁尼琴在書中所說，答案很簡單，“是因為這個國家制度”使然。

### 為右派量身度造的中國古拉格

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蘇聯在十三年內非正常死亡三千二百萬人；原毛澤東秘書、中共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李銳在《千秋功罪毛澤東》一書的序言中說：“從新中國成立到1976年毛澤東逝世，沒有內戰，沒有重大自然災害，非正常死亡在五千七百五十五萬以上，經濟損失一萬四千二百億。”。而辛子陵在另一本書中指出的非正常死亡人數達七千五百萬人。

中國向蘇聯學習，從立國開始便建立勞動改造與勞動教養制度。1949年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系統地提出了“人民的國家要強迫反動階級的人們勞動”的觀點。1956年肅反運動後又進一步指示，把那些在鎮反肅反和歷次運動中被殺者，包括錯殺者的家屬，都送去勞動教養。由此又波及各種未殺的反革命份子的家屬親友。

1957年反右鬥爭開始後，按照鄧小平為組長的中共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的規定，右派份子分六類處理（學生分四類）。除第一類是判刑法辦的現行反革命或歷史反革命右派份子外，各地區各單位被開除公職的大批右派份子無法安置，成為燙手山芋，流落社會必成公害。毛澤東便將勞動教養體制法律化和規範化，這是史達林所不及的。

1957年7月18日，毛澤東在青島省委書記會議上說：“除了少數著名人士之外，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勞動教養。搞個勞動教養條例。”他迫不及待地指示周恩來於1957年8月1日向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十八次會議遞交批准了《國務院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此後便對第二、第三類右派份子開除公職和勞動教養同時執行。

周恩來差強人意地向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了勞動教養和勞動改造二者之間的“本質性區別”：勞動教養是預防性的行政措施，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勞動改造是刑罰執行措施，處理敵我矛盾。即二者的區別在於罪與非罪。刑事犯定罪靠事實和證據，而政治犯和思





想犯的“罪” 卻應當如何去界定呢？毛澤東用區分香花毒草的意識形態標準替代法律意義上的罪與非罪。

1957年8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頒佈的《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 規定，凡是“不務正業”、“違反治安管理”、“拒絕勞動或破壞紀律”、“不服從工作分配”的；“罪行輕微、不追究刑事責任的反革命份子，反社會主義份子，受到機關、團體、企業、學校等單位的開除處分，無生活出路的”，均可送去

載腳鐐的勞改犯

勞動教養。隻字未提勞動教養的主要對像是右派份子。

事實上，勞動教養設立之初就是以所謂防衛社會的藉口來禁錮人民的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從而達到控制社會的目的。因此勞動教養制度缺乏正義性和法律基礎，是極權專制的必然產物。

心是口非，心口不一是歷代獨裁統治者的共同特點，毛澤東把幾十萬右派份子驅趕進了勞動教養場，剝奪了一切公民的權利，享受勞改犯一樣待遇，甚至比囚犯更慘。原來規定勞動教養最高期限三年。可是囚犯有刑期，右派勞動教養無期限，摘帽右派與戴帽右派一個樣，解教後留場變成遙遙無期的“二勞教”。許多人到1979年一風吹改正後才解教。 勞動教養了整整二十多年，相當於無期徒刑。

五十三年來，中共勞動教養制度的受害者至少有五百萬之眾。在1957至1958年度人大立法後收容的勞教人員約四十萬人中，四次鎮反肅反中清理出來不夠判刑條件的戴帽反革命份子約二十萬，右派份子有十五萬，佔五十五萬多官定右派的近三分之一。他們成為第一批勞動教養人員的主力軍。後來在三年人禍災荒時期，逃荒討飯的盲流份子逾百萬人也加入了勞動教養大軍的隊伍。

甘肅夾邊溝勞教農場關押三千七百多名右派份子。由於饑餓、勞役、嚴寒以及精神和心理折磨，待1960年撤銷農場建制，存活僅有二百多人，死亡率達90%以上；遼寧省凌原縣新生焦化廠的一個右派勞教中隊三百餘人，餓死、病死、累死、打死二百二十七人，死亡率75%；遼寧省錦西煤礦一千二百名右派，非正常死亡一千人，沒有餓死的二百人中，有一百九十八人已形似僵屍，僅有兩人靠生食青蛙、蟪蚱存活。

### 毛澤東逝世後的中國古拉格

毛澤東逝世後他的繼承者們與史達林的繼承者赫魯雪夫們一模一樣，自1979年11月至2004年3月全國人大常委會一口氣通過《國務院關於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等六個強化勞動教養的決定。到了今天，勞動教養工作專門歸口司法部勞動教養管理局負責，全國現在尚有三百座勞動教養管理所，勞動教養人員二十六萬人。這次四川大地震，震出個位於地震災區的”新華勞動教養所”來。

中國也像前蘇聯一樣，不承認有政治



夾邊溝勞教農場

犯。可是把不同政見者、異議人士、訪民、法輪功修練者隨便按上個”洩露國家機密”、”破壞安定團結”、”擾亂社會治安”等莫須有罪名照樣可以當政治犯來處理，把他們送去勞動教養。

蘇俄歷史學家拉津斯基指出，恐怖行動不僅解決了政治任務，而且也在解決經濟任務。史達林集中營把驅使囚犯從事艱苦勞動並創造財富作為最高目標，通常不干涉囚犯的思想和靈魂。也就是說”它讓犯人們的心靈自由地遨遊”。而毛澤東的勞改營和勞教營則比史達林和希特勒的集中營更上一層樓，不單單把囚犯看成免費勞動力，文革中山西省甚至用煤炭換取上海的勞改犯當作勞動力。還把他們當作思想改造的洗腦對象，向囚犯強迫灌輸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古拉格群島》是同那些描寫反右運動的書籍一起在中國的書店的書架上消失的。因為它的內容同中國的現實實在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在古拉格群島上服苦役的囚犯不就是中國在夾邊溝、北大荒、興凱湖、白茅嶺、沙坪、茶澱、郭堡、四一五築路隊以及青海、新疆、甘肅、安徽、四川、雲南、廣東、廣西等地勞教農場改造的右派份子嗎？

據吳弘達、廖天琪編寫的由《勞改基金會》出版的《勞改手冊》統計，截至2008年底，中國還有一千四百一十三座勞改勞教農場、礦山和工廠，極其不和諧地屹立於『和諧社會』之中。

習近平上臺中共召開八大，終於廢除了臭名昭著的勞動教養制度。可是中共一黨專政的獨裁體制依舊不變，勞教制度廢除後，針對訪民、法輪功、維權人士、異見者以及觸犯刑律但不夠判刑人員的各種學習班、戒毒所、訓練所、精神病院等形形色色變相勞教組織紛紛替代了勞教場。

### 徐洪慈 成功冲出勞改營

1957年被強劃為右派分子的人中，有不少人不堪忍受屈辱、冤曲和凌辱，紛紛用各種方式試圖逃離中國這座人間地獄。他們幾乎都失敗了，無法逃脫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等待他們的不是判刑便是槍斃，倒在了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之下。他們之中有北大學生沈元、顧文選、張錫琨、北大助教任大熊，清華學生劉世廣、大學生徐關增、王汝強……等等。其中只有一名數度越獄，歷盡艱險，成功逃出中共魔掌的佼佼者。他便是中共地下黨員、上海第一醫學院學生徐洪慈。他的經歷已記載在他口述的自傳體小說《冲出勞改營》中，足以拍成一部好萊塢式的驚險電影。



徐洪慈和蒙古妻子及其子女

據他自稱，他是全國五十五萬多名右派中唯一成功逃出國境的一個右派。

徐洪慈（1933-2009）出身於上海一個小康的資本家家庭，生活條件相當優裕。祖父是徽商，靠開當舖起家。父親徐雲蓀是國民政府海關的高級職員，母親畢業於天主教晏摩氏女中，這是一個貴族子弟學校。外祖父王子林與黃金榮、杜月笙關係密切，是一個幫會人物。後來成為上海著名的房地產商，僅在昆山一地就置地幾千畝。

他在昆山中學讀書，十五歲那年，上海已處於“解放”前夕。中共昆山地下黨破例吸收不足十八歲的徐洪慈加入中共。那時他狂熱地相信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曾經參加過土地改革運動和共青團華東局的工作。

1954年8月底，徐洪慈以調幹生身份考進上海第一醫學院（現為復旦大學醫學院），帶薪讀書。每月工資五十四元，工資水準相當於大學畢業生，大大超過工人和一般公務員。他的調幹生和解放前入黨的中共地下黨員身份，讓同學們羨慕不已。並且他的功課又好，因此大家都尊稱他為“老大哥”。

可惜他春風得意的歲月到1957年6月6日嘎然而止。那天晚上中共上海第一醫學院黨委召開全體學生黨員和團幹部鳴放動員大會。黨委書記嚴厲批評黨團幹部死氣沉沉，不敢帶頭鳴放。最後他聲嘶力竭地叫喊道：“同學們，我們期待著，黨委期待著，我一定要看到大家的大字報！我們不見不散！”

徐洪慈聽得熱血沸騰，共產黨員的責任感促使他要響應黨的號召，帶頭起來鳴放。他與同學們湊在一起，七嘴八舌地拼湊出五十一條意見和建議。實際上只有五十條，第二十三條在匆忙中忘記編號。五十條中，比較尖銳的有以下幾條：“選舉不民主；反對等額選舉；候選人應由下而上產生，應該和選民見面，發表競選演說，開展競選活動”；“肅反錯了要平反，胡風集團究竟如何處理？”；“毛主席到各城市視察，行動太神秘，應多與群眾見面”；“第八次黨代表大會報喜不報憂，缺乏自我批評精神”；“行政幹部升級應建立考試制度”；“反對機械學習蘇聯，應學習一切先進的世界經驗”；“外文一年級應該自選”；“不要只請蘇聯專家，還應聘請一些文化科學先進的國家的教授學者來中國講學”；“反對漫罵魏爾蕭、魏斯曼、摩爾根。對他們應做正確的評價”；“反對把巴甫洛夫學說教條化、庸俗化”等等。

他們的大字報得到黨委的表揚和師生員工的歡迎。可是僅僅風光了二天，6月8日《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發表後，開始反擊右派的進攻。黨委頓時變臉，黨委書記宣佈他是“黨的叛徒”，羅織了他四大罪狀；一、煽動群眾貼大字報，破壞了黨委的整風計劃；二、五十條大字報內容極端反動，瘋狂攻擊共產黨、社會主義、馬列主義，反蘇親帝；三、和民主黨派中的反動分子勾結起來進行陰謀活動；四、組織不明真相的群眾鬥爭黨委。黨委召開批判大會後，決定把他“開除出黨”。

7月23日，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和共青團上海市委機關報《青年報》發表通訊批判徐洪慈。《解放日報》第二版第二大標題是《徐洪慈墜落為資產階級馬前卒》。《青年報》則用頭版大標題《甘心拜倒在右派分子腳下，一個黨的叛徒——徐洪慈》。

毛澤東到上海來視察，為上海的反右運動升溫加油。他在上海和平飯店九樓的市政協禮堂接見了上海市各高校的學生代表，聽取學生代表彙報反右情況，並作出“最高指示”。毛澤東知道了徐洪慈的案情，下命令要對徐洪慈“狠狠打擊”。一醫黨委雞毛當令箭，組織全醫學院進行無情的批判鬥爭。

徐洪慈生得虎背熊腰，身材魁梧，目光銳利，談吐睿智，能操六國語言，熟悉八方風情，通曉生活百科。他生就一付倔強的脾氣，面對毛澤東的“最高批示”，依然強頭倔腦，不肯低頭。在醫學院的批鬥大會上舌戰群儒，把強加於他的罪名逐條反駁回去。其結果是升級劃為極右分子，開除學籍、黨籍後送往安徽白茅嶺勞教農場。從此開始了十四年的“勞教——越獄——加刑——再越獄”的驚險人生。

他於1958年4月押往安徽白茅嶺勞教農場，當年12月便與右派難友、華東師範大學俄語系學生陳象哉一道，第一次越獄沖出勞教營。第一次越獄沒有經驗，徐洪慈十分孝敬父母，在回家探望母親時便被公安跟蹤盯梢其母，與陳象哉一起被擒，再度押往安徽白茅嶺勞教農場服苦役。

當時已處於大躍進的饑荒時期，糧食不足，出現浮腫病，犯人大批病倒，徐洪慈因越獄而受到體罰。但是他沒有洩氣，回到監獄僅僅五十天，他便與陳象哉第二次越獄。這一次他吸取教訓，不敢回家，而是通過親友把母親約出門來，在電影院門口見面，拿了母親給他的衣物、鈔票和糧票準備前往西藏，從西藏出逃印度。

他們二人已經抵達川康地區，陳象哉對長途跋涉產生悲觀情緒，不想再逃，與他分道揚鑣，徐洪慈隻身前往西藏。不料正巧碰上中共鎮壓藏人，達賴喇嘛出走印度，前往西藏的所有通道均被軍方封鎖。他只得改道從雲南瀘水出境往緬甸方向走去。他人生路不熟，迷失在崇山峻嶺之中，誤闖邊防禁區而被捕。剛關進拘留所，他便挖牆逃跑，才挖穿牆又被抓住。五個月內三次逃跑，破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越獄全國記錄”，他因而獲得“逃跑大王”的光榮稱號。

在雲南麗江勞改農場，他度過了十三個年頭。他做過苦役犯，因一再逃跑的歷史和上海右派的身份，被場長視作眼中釘肉中刺，一再受到懲罰。文革開始後又成為獄中其他犯人的批鬥對象，上腳鐐戴手銬，關在高一米五的小籠子裏，成年累月站不能立，臥不能躺。

徐洪慈意志堅強，經過幾年的精心策劃和準備，用肥皂刻制印章，製作逃亡途中必須具備的證件和介紹信；偷偷積累糧票和鈔票。終於在1972年因抗拒改造而將要受到進一步嚴厲懲罰的前夜，抓住一個停電的千載難逢的機遇，在其他難友的掩護下，成功地逃出牢籠。

他與追捕的公安和民兵以及警犬玩起捉迷藏遊戲。按照常規，最近的出逃路線應當走近在眼前的緬甸方向。他卻反其道而行之，穿越整個中國，擺脫追捕，行程一萬五千公里，從內蒙古越境抵達蒙古人民共和國。一路險象環生，幾度瀕臨絕境，死裏逃生，其艱險曲折歎為觀止。

逃出勞改營後在深山峽谷中步行十三天，穿過金沙江、怒江、瀾滄江、大渡河、瀘定橋、走了幾萬公里。登上成昆鐵路逃出雲南。他不忘父母養育之恩，先回上海探望闊別十三年的母親。隨即北上，經北京到達內蒙古集寧。在狼群出沒、荒無人煙的戈壁大沙漠徒步一萬二千里，

在邊境二連浩特乘夜越境，穿過戒備森嚴的邊境哨所，進入蒙古境內。一路上越過複雜的地形，遇到各種喪生的風險和九死一生的危境，他都以聰明機智從容渡過。他用大無畏的孤膽精神挑戰中共強大的體制力量，而且取得了成功。

1972年12月2日，蒙古法院以“偷越國境”罪，判處他有期徒刑一年。然後與一萬多名已判決的犯人送往蒙古北方色楞格省宗哈拉林業托拉斯勞動改造。1974年刑滿出獄後安排在後杭蓋省運輸場工作。當年得了右眼視網膜中心炎，到烏蘭巴托住院治療，與護士蘇赫戀愛同居。先同居後結婚是蒙古人的習慣。

1982年春天，上海市公安局首先對他的極右分子勞動教養判決平反，雲南麗江中級人民法院撤銷1969年1月17日對他二十年徒刑的判決，恢復名譽；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撤銷1960年對他六年徒刑的判決。1982年恢復中國國籍，發給中國護照，與此同時蒙古政府也批准他入籍蒙古。1983年4月回國探親，1984年5月率領全家回國定居，被聘為上海石化總廠教育中心副教授級高級講師，講授管理學。

徐洪慈與蒙古妻子育有一女二子，在上海金山衛石化城安度晚年。回眸他驚險的一生，至今仍驚魂不定。2009年病逝於故鄉上海。

### 林方 一顆真誠善良的心

重慶建築工程學院高材生（1937-2005）於1937年11月12日誕生於四川省廣安市岳池縣。家境貧寒，從小在孤兒院長大。

他被打成右派的原因十分簡單，在重慶建工學院一年級讀書時，僅僅為只有一面之交的詩人流沙河說了幾句打抱不平的話，便被學校當局劃為右派分子，遣送原籍廣安市岳池縣農村勞動。半路上被他溜掉了。他打算遠走高飛，乘車逃向新疆。半路上給抓回重慶，右派抗拒改造，妄圖逃跑，便罪加一等，判處七年徒刑，送去勞動改造。

林方服刑的地方是四川省第二監獄第四中隊，那是獄中唯一一個男女混合中隊。入獄不久，便成為四川省二監少有的幾個大秀才和筆桿子之一，與中共四川省川東地下黨負責人駱雋文和重慶市文工團話劇導演金輝榮齊名。他最大的特點就是善於用報章雜誌上的大道理和馬、恩、列、斯、毛的原話同管教幹部“對嘴”。無論在勞改隊還是在刑滿釋放後進了就業隊，每當討論管教隊長的訓話，他嘴裏吐出來的必然是經過理論包裝的“大實話”，讓人哭笑不得。隊長罵他“狗嘴裏吐不出象牙”，盡說怪話。他自己說一生獲得的最高榮譽是被隊長封為“小蔣介石、小赫魯雪夫、小修正主義”。

1963年中蘇分歧公開化，獄中有些抗拒改造的犯人幸災樂禍，大唱什麼蘇聯老大哥你們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管教幹部便召集幾個有點兒文化的犯人開會，讓犯人談談對中蘇分歧的



年輕時的林方

看法。那時中蘇正在論戰，中共公佈了批評蘇共的九評文章。“三年自然災害”剛結束，犯人們只管吃飽肚子，他們害怕沾手政治，更不關心與他們無關的中蘇論爭口水仗。管教幹部讓大家談感想，犯人們為了應付討好，東拉西扯不著邊際胡說一通。林方最後站出來，不慌不忙頭頭是道地分析了中蘇分歧的起因、過程和前景。最後總結道：“赫魯雪夫他們像貓頭鷹一樣害怕陽光，他們向太陽扔污泥，污泥掉進自己的眼睛”。

1964年前後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前，中共的喉舌批判了一大批中外“封、資、修”電影。蘇聯電影《第四十一》也在批判之列。一位蘇聯女兵押送一位白俄士兵，半路上女兵和白俄士兵談起了戀愛，相互愛上了，不料白俄士兵要逃跑，女兵是個神槍手，曾擊斃四十個敵人。關鍵時刻舉起了槍，她視線被淚水模糊了。這位白俄士兵是她擊斃的第四十一個敵人。這部電影被批判為宣揚資產階級的人性論。林方公開評論說：“儘管這個女兵不該愛上她押送的敵人。但是，人性不服從階級性。我們省一監的女公安幹部愛上了男犯俞維禮。批鬥幾十次她拒不悔改，被開除公職。等到俞維禮刑滿釋放，她和他結了婚。這件事省二監幹部人人皆知，什麼修正主義不修正主義。”

旅澳知名女作家齊家貞及其父親齊尊周當年以莫須有的反革命罪，父女雙雙都在省二監與林方一同服刑。齊尊周在牢中瘋狂地鍛煉身體，一圈圈跑步，將來出獄後可以申冤雪恥。管教幹部指著齊尊周對林方說：“你看齊尊周在做什麼？他在想什麼？他要跟無產階級專政鬥爭到底。他如果能改造好，我拿手板煎魚給你吃。”林方聽罷淡淡一笑：“哎呀，政府，你這就不對了。你們做報告不是老說要相信辯證法，相信事物是變化發展的，人是可以改造好的嗎！為什麼齊尊周就不可以改造呢？用僵死的一成不變的觀點看事物，這就是形而上學。”管教隊長聽罷，大跌眼鏡。

林方善於接過管教幹部的話為犯人和自己申辯。在勞改隊和就業隊傳慶和的反抗方式另有一功，與眾不同。他常常以極其幽默滑稽的方式表示反抗。他被人放在籬筐裏一路殺豬般嚎叫著被人抬去看教育電影；他用一隻漏底的水桶挑水澆田，挑到田裏水也漏光了；他要賴皮請病假又拿不出醫生開的病假條，便撩起衣服給人家看身上貼了三張膏藥，這裏痛那裏痛。可是他從來不發牢騷講怪話，管教幹部抓不住把柄很惱火。

突然傳出傳慶和喊出“打倒共產黨”的口號。這件事可以使他加刑甚至槍斃。大家都知道他不會這麼做，可惜沒人會替他說句公道話。正在此時，林方站出來了，不慌不忙地為素不相識的傳慶和說話：“黨的政策是實事求是，有一說一，有二說二。當時我在場，我證明傳慶和沒有說過打倒共產黨這句話。”不幸在監獄裏是沒有公理的。傳慶和受不住煎迫，跳樓自殺未遂，年輕的大漢頓時變成了癡呆人。

林方的思想這麼反動，又敢於頂撞，為什麼七年刑滿沒有加刑呢？這是因為他像泥鰍一樣滑溜，機智狡詰，讓人抓不住他的把柄。此外林方的才華十分出眾，管教幹部中不乏愛才的有識之士，對他睜一眼閉一眼。有人提醒他：“林方，不要忘記你犯人的身份，禍從口出。”

林方談過幾次戀愛，初戀情人是大學同學，同監服刑。她刑滿要求留獄等待林方，被強制

遣返送去貴州。

離開就業隊後來到社會上，正值改革開放年代。他那重慶建工學院建築專業的身份，使他當上了建築公司副總工程師，本來他還可以做很多有益於社會的事情，可惜得了肺癌，早早離別了人世。

### 張強華 敢於把牢底坐穿

張強華在《煉獄人生》後記中說：“乘著我的那一隻尚算明亮的眼睛還能辨認字跡之際，趕在我的清晰記憶尚未消退之前，將歷歷在目的往事忠實地寫出來，奉獻給讀者，以了卻獲得自由後的二十年的夙願。”

張強華（1935-）上海市人，出生於一個普通家庭。根據中共的階級成份劃分標準，這個普通家庭又應歸屬於反動官僚，父親在上海警察局就職，曾任校級參謀。八一三抗戰，警察局改變為別動隊，與日寇抗爭。可是上海的警察未經正規的軍事訓練，一上戰場便潰不成軍。退至租界，向租界當局繳械投降。張強華一家進入了難民收容所。敵偽時期，張強華的父親當過蘇州警察局局長。後來中共將他當歷史反革命分子槍斃了。



張強華 北平大學生物系

張強華在上海和蘇州上中小學，1953年考入北京大學生物系。1957年畢業前夕劃為右派，開除學籍，送往北京制藥廠監督勞動。1960年被捕入獄，開始了十五年的監獄生活。張強華與眾不同之處在於他在十五年內坐穿牢底，蹲遍了中共治下的各式各樣監獄，計有北京草嵐子看守所、北京自新路看守所、上海提蘭橋監獄、安徽白茅嶺勞改農場。

他一米六幾的個頭。十五年的煉獄生活奪走了他的健康，但是他為人開朗熱情。1957年5月19日北大學生食堂門口貼出了第一張批評北大團委的大字報。一夜之間貼出了一百六十多張大字報。稍後幾天，大字報鋪天蓋地貼滿北大的每個角落。張強華不甘落後，他在生物系提出出版小報並成立編委的設想，得到了同學們的廣泛支持，當即成立了編委會，張強華擔任主任委員。經討論小報定名為《春雷》，三天后便在全校發行。作為主編，張強華寫了創刊詞：“……春雷在響，雨將臨。久旱的人們，在爭待暢飲！”

隨之，張元勳、沈澤宜、李亞白的《廣場》；楊路、張景中等人的《自由論壇》；崔德甫的《百花壇》等小報相繼問世，在北大校園裏達八種之多。6月8日《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發表後，開始了反右運動。《春雷》等八份北大學生創辦的小報定性為反動刊物，編委都打成右派。張強華的處分是開除學籍，留校察看，送去北京制藥廠監督勞動。

進入制藥廠大門，門口掛著紅底白字巨幅標語：“右派先生，歡迎你們，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在工廠裏，學生右派領取二十九元生活費。還要不斷挨批挨鬥。幾個學生聚在一起說話，誣為右派小集團。在政治空氣壓抑、階級鬥爭不絕的年代，張強華萌生了偷渡去香港的念頭。他有幾位同學家在香港，他跟他們議論過偷渡的事，卻始終沒有任何偷渡的行為。

1960年4月29日深夜，張強華在工廠加班勞動。半夜裏剛下班便給二名警察押走了，從此

他失去了當右派時僅存的一絲自由，開始了為期十五年的囚犯生活。逮捕證上寫著他犯了“反革命罪”，上了手銬，摘掉深度近視眼鏡，眼前漆黑一片，暗無天日。他被關進了專押政治犯和反革命犯的草嵐子看守所。草嵐子看守所關押預審犯，結案後轉入北京自新路看守所。1962年6月張強華因患肺結核保外就醫，假釋回上海家中。此前三個月，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將他與同案犯北大學生右派趙樹苑、王又華一起判為組織反革命集團密謀偷越國境、背叛祖國罪，判處徒刑十五年。

張強華輾轉押送到上海郊區川沙縣的外婆家，過了長達三年半劃地為牢的流放生活，以掃街贖罪。隨著階級鬥爭的逐漸升溫，他于文革前夕重新送回監獄，收押進上海提蘭橋。1966年至1976年張強華在提蘭橋監獄度過。他失去了真名，代號是“4114”。在獄中他的肺結核轉為脊椎結核，不得不穿上沉重的鋼絲背心。

1975年張強華的刑期已滿，刑滿前，他母親向監獄當局提出，刑滿後願將兒子領回家中養病。不料監獄當局如此答復：“張強華改造了十五年，反動立場原封未動，不可能放他到社會上去！”

張強華刑滿釋放，卻被押送到皖南山區白茅嶺農場繼續勞動，成為一名“二勞改”。他的殘軀拖著一付沉重的鋼絲背心，過起了變相的無期徒刑的生活。

1979年平反冤假錯案期間，張強華逃出了白茅嶺走上了赴京上訪的道路。他是北大生物系最後一名改正的右派。回到上海，進入上海市重點中學一格致中學教授生物學。他說他本著良心教書，不拍馬屁做人，瞎了一隻眼而準時退休，冒著風險炒點股票。閉門思過，假如我還有什麼過錯的話。

張強華夫妻沒有孩子，“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張強華風趣地自我解嘲說：“我將有愧於民族的繁衍和祖宗的繼嗣。從二十世紀1980年代初謝晉導演的《牧馬人》影片中的主人公的兒子所說：‘爸爸，爸爸，長大了我也要做右派！’一句天真的話中，感悟到右派後繼有人，無需我這個蹺腳右派替古人擔憂。當然，牧馬人的兒子說的所謂的右派，不可能是政治意義上的右派，而是像牧馬人那樣身處逆境而不倒下的正直的人。”

## 王軼生 從棺材裏爬出來的人

王鐵生(1927-)在勞動教養時別人已經以為他餓死，把他裝進薄皮棺材，拉去埋葬。棺材落地將他震醒了，死裏逃生活到如今，已經九十多歲了。王鐵生人如其名，鐵打鐵生，身體硬朗。所以這個天方夜譚式的奇跡應當由他自己去講。

1927年1月王鐵生出生於上海。1948年剛滿二十一歲便在上海交通大學畢業，執教于剛成立的中國人民大學。1957年整風鳴放期間，他批評了肅反擴大化；對花瓶式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體制提出異議；而且讚賞同校的極右分子葛佩琦、林希翎的右派言論，同意儲安平의黨天下觀點。

以上各條已經足夠把他打為與葛佩琦、林希翎、儲安平一樣的極右分子，判處開除公職，同時享受勞動教養最高待遇三年。而實際上足足享受了五年半還不解氣，又強制他留場就業，



“二勞教”再增加六年半。以後九年在一家民營合作制的小診所當雜工糊口飯吃。直到1979年右派改正重返中國人民大學，已經五十二歲。人生中最富有創造力的二十一載黃金歲月就此被共產黨白白糟蹋了。

王鐵生非但自己受盡折磨，死裏逃生，而且株連了家屬子女。兩個兒子都成了“黑五類”，大兒子聰穎過人，酷愛數學。小學六年級即能解答老師不會解答的難題。聰明的孩子比較敏感，因不堪社會歧視和迫害，患了嚴重精神憂鬱症，早早離開了人間。

重執教鞭後，王鐵生著書立說，發表出版了三百多萬字的有關經濟學專業的著作和論文。1992年退休後，返回老家杭州，又出任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他老而彌堅，決心追回失去的黃金年華。他將坎坷歲月記載在自己所著的《血淚交響曲——我的右派生活紀實》一書中。

## 王軼生自述 復活

這裏講述的並非列·托爾斯泰的巨著——《復活》。而是1957年，被“擴大化”成右派的一位教師在清河勞動教養農場，被饑餓送進了“鬼門關”，又在十分偶然的情況下，被重新拉回人間的真實的故事。

低窪不平的土地上，兩個人在拉著一輛平板小膠輪車行進。其中一個人兩手把著車轆，肩套一條栓在平板車前端鐵環上的粗麻索，一步蹬一步，吃力地前進。另一個人挽一條系在膠輪車支腳上的長麻繩在前面拉。兩個人都因用力而身體向前微傾，他們都解開了上身那件勞教農場發的黑粗布棉襖的衣扣。

“這口子也夠慘的，才三十出頭就埋在這荒地上，聽說還是啥子名牌大學的講師哩”。駕轆的那人帶著濃重的口音，邊喘氣邊嘟囔著。他顯然是在說平板車上那口底層由活動拉板構成的薄皮棺材中的苦命人。

“他媳婦和兩個六歲和七歲的娃兒今後日子咋個過啊？單是極右分子和勞教分子家屬這口黑鍋就夠他們背一輩子的了，慘啊！”

“唉，也是，誰叫他大鳴大放說三道四多話呢？”前面拉車的那人帶著半是同情，半是埋怨的口吻說著。“我是為了糊口，在前門擺地攤，違反了格老子啥子城市管理條例被收容教養的。要吃飯，沒得辦法。這年頭有口飯吃就行了嘛，還說三道四幹啥子嘍，自找倒楣。”

大約經過了半個小時，他們終於拉到了清河農場的墳地——也就是人們所說的五八五分場的所在地。這裏的土壤鹼性特重，在一大片泛白的鹼地上，連一向以抗鹼性著稱的、荒地特有的蘆葦也幾乎絕跡，一眼望去，數以百計的亂墳堆無規則地遍佈各處。墳堆前一般樹有一塊約半米高，六、七釐米寬的木牌，上面寫著死者的姓名、籍貫和死亡日期。不過也有許多墳，除了一堆黃土外什麼也沒有。

他們把平板車停在新挖出的墳墓前，穴深約半米，寬約0.4米，長約1.9米。然後抬下薄皮

棺材擱在墓穴上，棺材正好比墓穴略長一點。駕轅的那人彎下腰，把薄皮棺材的活動底板使勁往外一抽，只聽得“叭”地一聲，屍體掉進了墓穴。

就在這一剎那，一件絕對意想不到的天大怪事發生了。隨著屍體“叭”地一聲掉進墓穴，屍體竟發出了“哎喲”的呻吟聲。還好是在大白天，況且兩名埋屍人也是“身經百戰”的老手了，他們沒有被嚇得撒腿就跑，更何況他們也是勞教犯，他們對被埋葬的死者有一種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感情。他們不僅沒有逃跑，還把那個命不該絕的苦命人迅速送到三分場醫務室。這苦命人的確命大，終於活下來了，而且一活就四十多年了，直到今天仍然健在。

讀者至此也許已能意識到，這名入土半截的苦命人就是筆者。幾十年來，筆者的一些親朋好友總是要筆者講述這段傳奇式的經歷，它似乎有點兒像大仲馬筆下的唐泰斯從監獄古堡幾十英尺高的懸岩上被擲進大海的故事。不過促成我寫這篇短文的另一個原因，是我曾經經歷過死亡，或者說我有過死亡的經驗。誠然，有些溺水、車禍、觸電而休克的人被救活後，他們的確也曾參加了死神的一次宴會而重返人間，但他們都是事發突然，一下子喪失了知覺，沒有時間體會臨死前彌留之際的感受。

和溺水、車禍、觸電的暴死不同，我經歷過的是一次餓死的過程。餓死是新陳代謝功能的逐漸衰竭，猶如一盞桐油燈，隨著油碟內桐油的減少，燈芯上燃著的火焰是一點點、一點點地縮小並越來越昏暗，要經歷一段頗長的時間，才會“嗤”的一聲最終熄滅。

那是1961年初發生的事情，神州大地正經歷著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當時天災加人禍，人們就連糠菜半年糧的生活也得不到保證。整個社會尚且如此，勞改和勞教農場的境遇也就可想而知了。我每頓飯只能以清水煮馬齒莧（一種野菜）充饑，據說也加進了一點玉米麵，但在一大盆清湯寡水的馬齒莧中，實在看不出也嗅不出有絲毫玉米麵的存在。我當時在病號隊，生產隊比病號隊的情況稍好一些，每天多少可以吃到一點糧食，如馬齒莧玉米麵糊糊、馬齒莧玉米麵窩窩頭。極度營養不良使我骨瘦如柴，體重由一百二十五斤減少到不足六十斤，我形同骷髏的外貌，和高中生物學課堂上的人體骨骼標本其實沒有什麼兩樣。我的體能已衰竭殆盡，膝蓋以下部位常年冰涼並帶有麻木感，我不得不拄著木棍老態龍鍾地拖著腳步走路，稍不注意，一塊雞蛋大的石頭就會把我絆倒，沒有難友們的幫助，休想自己爬起來。

終於有一天，小吳和小何——就是前面曾提到的兩名埋屍人，他們是生產隊派到病號隊來工作的，除埋死人外，還給病號送開水、送馬齒莧——在給我灌好一暖瓶後，對我開腔了。

“老王啊”，小吳注視著我的臉，帶著濃重的四川口音：“我看該輪到你哥子上路了哩。”

“冬至不出年外，總是個把月的事。”小何補充了一句。

由於經常同死人打交道，小吳和小何積累了一種獨特的經驗。在閒聊中，他們曾對我們講起過，像我們這些因饑餓而極度衰竭的人，如果出現外眼角垂，嘴角上翹，一般不出一個月就會死去。當然，這種變化十分微小，普通人不一定能察覺，但他們因經驗豐富吧，據說這種觀察被證明已是屢試不爽。

又過了二十多天，不祥的預言終於應驗了。那天早上，當小吳和小何掀開用破麻袋縫成的

門簾，進入我們病號隊室內發出慣常的分發開水的吆喝聲時，我發現我的四肢已不聽我使喚，無法動彈，除了耳朵還能聽到聲音外，嘴巴說不出話，眼皮也像注滿了鉛似的，儘管我作了最大的努力，卻睜不開。我左邊和右邊鄰鋪的難友發現我毫無反應，慌忙叫小吳趕緊去找潘大夫。

潘大夫很快趕來了。他也是一個勞教人員。他馬上拿出聽診器在我胸部移動，仔細地聽診。注射了一針強心劑後，他繼續用聽診器不停地監聽我的心臟。

我還有聽覺和一定的感覺，我知道周圍發生的一切。我聽到小吳和小何在商量什麼時候來拉人，我也聽到潘大夫在斥責他們不要瞎說，我還有救。我突然害怕不要在我尚未死透時就被拉去埋掉，我拼命想睜一睜眼睛或動一動嘴唇，以表示我還活著，但就是做不到。

我神志還很清楚，我意識到我已步入生命的終結階段。我並不畏懼死亡，說實話，與其在當時那樣的悲慘境遇下苦受煎熬，死亡其實是一種最好的解脫。我曾經幾次企圖自殺。然而真正到了跨上死亡的門檻時，對人生的最後牽掛——拖著兩個幼兒的妻子，年老體衰的高堂老母，他們今後將如何挺過這漫長而又險惡的人生？——卻一下子全都湧上了心頭。我忽然想起了每月都要從他們可憐的定量中（儘管比我這勞教犯多些）硬摳出幾斤糧食接濟我，使我勉強維持生命的事。我腦海中甚至清晰地浮現出兩個剛讀小學半懂事的兒子，正在“為了救救爸爸”的哄誘下，皺著眉頭吃野菜的景象……我不能死，我不能死，絕對不能死啊！然而這次不是自殺，這次可由不得我在最後一刻把已套上自己頸項的繩索，再用自己的手來解開。

餓死的人與病死的人（比方說癌症死亡者）不同，餓死的人臨終前不會感到有什麼疼痛，毋寧說平時那種不堪忍受的強烈饑餓感（注），這時反而減輕了。我好像飄浮在風平浪靜的水面上，自由自在，無拘無束。慢慢地，我覺得我似乎從水面上飄浮到了空中，越飄越高，越飄越遠。潘大夫他們的聲音也越來越輕，越來越遠……終於進入了絕對寂靜。

突然，“嘭”的一聲震動，把我從虛無縹緲的寂靜中驚醒。……接著便發生了本文開頭的一幕。

事後，潘大夫說，也許從棺材墜落墓穴的一擊，歪打正著，正好起了使心臟再搏動的刺激作用。因為他們也曾對我施行心臟人工擠壓起搏的搶救，卻未見效。我又問他，我從水面飄飄然上浮太空的感覺，是否就是靈魂脫離軀殼在昇華？

“我是學醫學的，沒有學玄學。”潘大夫淡淡地一笑，“所以無法回答你的問題。”

這就是我被打成右派，在勞教農場——北京清河農場三分場，親歷的一次人間絕對少有的，被餓死而又復活的經歷。它使我永記不忘。

（注）我和我的難友們已餓到了見到什麼都想吃的程度。一位曾是第二機械工業部俄文翻譯的難友曾親口對我說，有一次他用了最大的毅力才好不容易克制住了自己，不去吃牆邊一堆外形酷似窩窩頭的人糞便。另外，我們經常閒談一個話題就是：“如果給你一碗紅燒肉燒蛋，大米飯管飽，不過飽餐後立即槍決，你是否願意作此選擇？”我們幾乎眾口一詞地都表示願意。因為作一個飽死鬼的滋味，遠比作一個餓得半死不活的人的滋味要好受多了。個中感覺誠非筆

墨所能形容於萬一，非身歷其境者是根本無法體會的。

## 徐則文 社會邊緣人

上海市重點中學——新滬中學資深教師徐則文(1920-)浙江金華人，家庭出身教師。在家鄉上中小學。1941年就讀于浙江金華英士大學農業經濟專業，1945年畢業。

自1946年至1949年擔任江西上饒信江農業專科學校講師。1949年至1951年任上海市閘北區清華中學副校長，1952年後轉入上海新滬中學擔任生物教師。

1957年整風鳴放時，新滬中學已建立三個民主黨派支部，共有二十二位成員，徐則文是民盟成員。新滬中學的大鳴大放在上海幾百座普通中學中處於“領先地位”。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華東局第一書記、上海市委書記兼上海市長柯慶施定性說：“新滬中學是上海中學生帶頭鬧事的學校。”

當學校裏民盟支部主任委員被揪出成為右派分子後，徐則文接掌了民盟支部的公章，麻煩也接踵而至。有人舉報他是“自投羅網”加入民盟；“自投羅網”接掌帥印。既然給他定了性，再用逆推理法尋找罪證，便是舉手之勞。

徐則文在大學讀農業經濟時，十分推崇沈志遠教授的《新經濟學大綱》和馮友蘭教授的《新理學》。沈志遠教授是民盟上海主任委員、上海民盟頭號大右派；馮友蘭教授則是中國哲學界頭號大右派。按照共產黨的“形而上學”推理法，徐則文崇拜大右派，他自己必然無疑是右派。

徐則文在課堂上講過，米丘林學說是“術”，不是“學”；李森科的“春化學說”是失敗的小麥試驗；摩爾根建立在生化實驗基礎上的遺傳學，才是真正的科學。他的反蘇、反共、親美、崇美的反動思想哪里來的呢？追根溯源，原來他歷史上參加過三青團，骨子裏仇共仇蘇。



徐則文

他被劃為極右分子。不僅如此，由於那段加入三青團的反動歷史，他的極右分子頭銜前面再冠以反革命三個字。右派加歷史反革命即等於反革命右派分子。

1958年10月1日，上海市虹口區人民法院向他宣判“反革命罪，三年徒刑，剝奪政治權利”。伺候一旁的法警立刻把他戴上手銬，押送提藍橋監獄。幾經周折，送往青海省共和縣恰卜恰勞改農場進行勞改。

他在勞改中沒有沉淪。利用所學的紮實技術，在逆境中用科學實驗方法改進密植方式，減少播種量，節約種子，增加生產，記了大功。他創造的《馬糞發酵栽培蔬菜》和《漫灌條件下用水分配裝置》都獲獎立功。

他的立功受獎並沒有減輕他的刑期。三年勞改期滿，返回上海。他失去了公職，失去了糧票、布票、煙票、糖票、線票、火柴票。最致命的是失去了戶口，按照中共的戶籍制度，他的

戶口裝在牛皮紙袋裏，不准入籍。上海市民謔稱《袋袋戶口》，即是非法居住的“黑人”。

徐則文受盡欺凌，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他與妻子離婚，子女改姓，父母雙亡；租屋而居，孤身一人；沒有口糧，沒有收入，掙扎在死亡線上。1966年毛澤東發出“廣積糧，深挖洞，備戰備荒為人民”的號召。他響應號召，參加了里弄挖防空洞的繁重體力勞動，當臨時工混口飯吃。在中州路人防工地推水泥車時，撞傷右腿，落下終身殘廢，以輪椅代步，找不到處理工傷的單位。

熬到1979年右派改正，進入虹口區業餘大學任教。他在1946年就當上了江西上饒信江農業專科學校的講師，劃為右派勞動教養後，直到退休都沒有任何職稱。不能享受正常按職稱工齡計算的勞保、醫療、福利等一切社會主義社會的優越待遇。換句話說，徐則文老師成為一名無法享受改革開放偉大成果的和諧社會邊緣人物。

遭受開除公職和勞動教養處分的右派分子，如果得不到原單位收容復職，或者原劃右單位已經撤銷，那些苦命人就很有可能淪為像徐則文、王關仁那樣無依無靠的和諧社會邊緣人。這便是勞動教養造成的後遺癥和嚴重惡果。他們至今沒有人權，生活困難，甚至失去了江澤民所謂的中國式人權——生存權。

## 林其鑾 歸僑夢的破滅

中共掌權後，有多少華僑及其子弟仰慕新中國的美好前景和中國共產黨的清廉公正，不遠萬水千山，衝破重重險阻，有的偷渡、有的宣誓永不返回、有的擺脫封鎖追捕，滿腔熱情、歷經艱險回歸故里。可是等待他們的卻是失望、眼淚、饑餓、歧視、陽謀、陷阱和勞動教養。雖說中共的華僑政策規定，華僑歸國不滿五年不打右派，但是衛道士們甯左勿右，只要掉進陽謀圈套，管你滿不滿五年、六年。

祖籍福建省福清縣、出生于印尼泗水島的僑生林其鑾（1935--）就是其中之一。他在當地泗水新華中學上完初中，十五歲那年中共剛剛掌權，便像許多愛國華僑青少年那樣，懷著一顆熾烈的赤子之心，告別親人，從南洋隻身返回祖國。離境前他根據印尼移民當局的規定，宣誓簽字永不返回印尼，自行斷絕退路。



林其鑾，北京地質學院學生

一個人來到北京，考進育英中學。他看到祖國日新月異的變化，感到無比幸福，覺得自己選對了道路。高中畢業，選擇工業建設的尖兵——地質勘探專業，1954年考入北京地質學院（現中國地質大學）。

1957年春夏之交，當他充滿憧憬和美好希望的時候，便中了陽謀圈套，掉入了陷阱。林其鑾當時任校刊記者和鳴放大字報《僑聲報》的主編，北京地質學院有一百多名僑生。他僅僅寫

了一篇打抱不平的文章以及一些批評院領導官僚主義作風害人的報導，被打成右派分子，受到留校察看的處分。書無法再念下去，情投意合的女朋友被迫劃清界線，各奔前程。他忍受著誤解、委屈、歧視、侮辱，眼淚往肚裏咽。

此事起因荒誕無稽，一位名叫溫昌蘊的女學生被誣貪污幾十元實習旅差費，把她開除出校。後來她向共青團中央反映，經調查實無此事，恢復學籍。鳴放時她把這件事揭發出來，引起轟動。林其鑾寫的大字報《殺人不見血》就是為她打抱不平。受她這個案子的牽連，全校師生員工中打出三十三名右派分子，林其鑾也是其中之一。她本人當然亦是右派。

他的罪名還有“支助反革命經費”。原來他在畢業分配離校前夕，贈送了一位出身四川農村、生活困難的右派同學三十元錢和二十斤全國糧票。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衛道士們批判他不說話不發言，比說話發言更反動。說他是顆定時炸彈，政治上反動，道德也必然墮落。

北京地質學院共揪出四百另七名右派。他的年級小班三十人中，揪出了九名右派。主持反右的團支部書記石兢後來是中國第一批登山隊黨支部書記。此人在反右中甯左勿右，不得好報，得了癌症早早走人。大名鼎鼎的勞改基金會主席吳弘達是他的同學和勞改中的難友。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也是他的校友，若按共產黨那樣論資排輩，林其鑾應當是溫家寶的老師。

共產黨最毒的一招是把右派分子孤立起來，實行群眾專政。年青人耐不得孤獨，他只好與同病相憐的右派同學交往。可這也觸犯了天條，右派分子是階級敵人，對黨有刻骨仇恨。階級敵人湊在一起，必然搞反革命覆辟，妄圖變天。像反右運動中產生的“章羅聯盟”、“丁陳反黨集團”、“吳祖光小家族”一樣，無中生有地揪出一個“中國青年反法西斯同盟”來，在北京東郊化工廠勞動的一百多名西郊八大院（鋼鐵、航空、地質、礦業、醫學、石油、農機、林業）的右派學生分批判刑勞改、勞教。

此事起因更加荒誕無稽。林其鑾資助反革命經費的四川籍右派同學，在開除後因偷取和塗改銀行存摺而犯了案。日記簿被抄走，從中斷章取義地找出一些牢騷怪話，上綱上線就編織成“中國青年反法西斯同盟”的罪證。“大同盟”成員都是他在八大院的右派同學。

林其鑾曾經幫助過這位同學，因此也被劃定為這個“大同盟”的成員。他是歸僑，海外社會關係複雜，有過重返印尼的意念。又給他加上一頂“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和“企圖叛國投敵”的罪名，被公安局逮捕法辦，投入監獄。

起先把他們“涼”在監獄裏三年多，不審不判。三年後才判他反革命罪，免予刑事處分。他先後在北京草嵐子、功德林、半步橋、清河等監獄和第一看守所預審待判，後送清河農場關押。勞改、勞教前後長達十七年之久。

同牢的囚犯們譏笑他：“你這個傻瓜蛋，誰讓你哭著喊著，非要跑到祖國來嘗嘗坐牢的滋味不可？怎麼樣，嘗夠了嗎？”管教幹部常常咒罵他：“共產黨把你餵養大，你竟然反對起共產黨來啦，真是個忘恩負義的反革命！你就帶著花崗石腦袋去見上帝吧！”

“可憐天下父母心”。1966年林其鑾被捕，老父思子心切，急愁攻心，腦溢血住院，半年

後離開人世，年僅五十五歲。他母親是個小腳老太太，年老體衰。四次回國向共產黨索要失去聯繫七年多的無辜的兒子。高唱革命人道主義的的共產黨毫無人性，堅持不放人，不准帶走其兒子。老太太含怨而歸，從此他再也見不到母親了。

1979年右派改正後，林其鑾由清河農場回到中國地質大學任教。過了不到二年，便永遠離開了生活了三十年令他傷心的祖國。他懷揣中共給他買斷的一千二百五十四元人民幣共二十二年工齡的退職金，跨過羅湖橋，隻身來到香港討生活。他簽字發誓永不返回生育之地印尼，只能以旅遊者的身份回爪哇島泗水城去探親，祭拜雙親的墳墓。

與他一起判刑的“中國青年反法西斯同盟”的右派學生達一百多人，分批分組宣判。1979年9月7日一風吹平反。與他同組的有十二人：

袁傳織，原北京地質學院學生，有期徒刑十五年，刑滿剝奪政治權利五年。

馬槐亭，原北京地質學院學生，有期徒刑十五年，刑滿剝奪政治權利五年。

郭健敏，原北京工業學院學生，有期徒刑十二年，刑滿剝奪政治權利四年。

戴家驥，原北京石油學院學生，有期徒刑十二年，刑滿剝奪政治權利四年。

薛自雅，原北京石油學院學生，有期徒刑十二年，刑滿剝奪政治權利四年。

陳月宦，原北京地質學院學生，有期徒刑十年，刑滿剝奪政治權利三年。

劉興業，原北京石油學院學生，有期徒刑八年，刑滿剝奪政治權利二年。

楊昭剛，原北京石油學院學生，有期徒刑八年，刑滿剝奪政治權利二年。

張仁浦，原北京石油學院學生，有期徒刑三年，刑滿剝奪政治權利一年。

張德環，原北京石油學院學生，有期徒刑三年，刑滿剝奪政治權利一年。

王丞斌，原北京石油學院學生，有期徒刑三年，刑滿剝奪政治權利一年。

林其鑾，原北京地質學院學生，免予刑事處分。

、鐵流原名黃澤榮（1935-），在《成都日報》當編輯記者時用的筆名是曉楓。鐵流在十六歲參加革命，加入中共。1957年他和劉賓雁、王蒙並列為共青團系統三大青年右派。在四川省內，因文章《給團省委的一封信》，和流沙河等人被毛澤東欽點為四川文藝界“七君子集團”。

1957年7月19日，中共四川省委和成都市委在省政府大禮堂召開的千人大會對他進行專場批判鬥爭，當場打成右派分子，開除公職。致妻離子散，送四川省峨邊沙坪勞教農場勞動。

1958年他從沙坪農場白夾林中隊調到號稱“四一五屠場”的四一五築路支隊第十九中隊勞動教養，駐雲南省鹽津縣黃桷槽，開掘內昆鐵路黃桷槽隧道。1959年起，輾轉四川



鐵流，平生無狗性，偏喜作賤民

各地勞動教養，修築鐵路。先轉四川省喜德縣，修築成昆鐵路；1960年再轉一零八中隊，駐旺蒼縣，修築廣旺鐵路。

1962年，他被懷疑涉及“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反革命集團案，差一點被槍斃。所謂“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右派反革命集團”，既沒有什麼組織，也沒有行動，只是把一些右派平時聊天時說的不滿言論，加以上綱上線編造而成。那時毛澤東在反右運動後發動的“大躍進”、“大煉鋼鐵”、“人民公社”，使泱泱華夏餓殍盈野，餓死四千多萬人。在築路支隊勞動教養的右派比老百姓更為悲慘，不僅吃不飽，政治上繼續遭打壓，精神備受折磨；勞動繁重，日夜加班；獄警個個天良喪盡，如狼似虎，克扣囚糧，隨意罵人打人吊人，毫無人性。

此時蘇共二十一次代表大會除繼續清算史達林罪行外，還肯定和頌揚南斯拉夫鐵托的“馬列主義聯盟”。右派們在工餘飯後、解便之機、入睡之前，亦談及此類天下大事。竟為急於立功贖罪的右派同類姚某（北京人，原南充地區公安處法醫）所檢舉，作加油添醬的告密，終鑄成全國驚天大慘案。二十三名右派罪犯經中共四川省政法黨組批准，判死刑二人，死緩三人、無期四人、有期徒刑十四人。另四十六名由當地公檢法處理。中共黨員、紅岩英雄周居正和中共黨員、韓戰英雄楊應森當即槍斃。

鐵流不堪饑寒交迫和吊打逼供，越獄逃亡。流竄至新疆、甘肅。於1963年被通緝歸案。1964年改押四川省第四監獄。1978年又押解到四川雷馬坪勞改農場繼續強迫勞改。

1980年右派分子終獲改正，鐵流前後勞教勞改二十三年後重返《成都日報》當記者。從1985年起，他也被捲入全民下海經商的浪潮，在北京他開設的集團公司資產累積已達數千萬，同時繼續在媒體行業發展。

七十歲過後他才金盆洗手，用餘生將九死一生、艱辛掙扎的經歷寫成文章，回饋給社會和下一代。他用“鐵流”的名字，在海外網路平臺發表大量回憶錄和時政評論。剎時之間，鐵流成為半路上殺出的一匹黑馬。

2007年他多次參與《為紀念反右運動五十周年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的公開信》簽名運動和參加海內外反右運動研討會。近年來在海外網站發表大量回憶反右文章，因此被公安、國保跟蹤、監視、限制出境。他女兒在美國馬里蘭大學就讀，女兒畢業，父母要參加畢業典禮，被當局阻撓。2008年出遊埃及被禁止。鐵流身體硬朗，人老志不老。他的著作有《鐵流詩史》、《鐵流文集》等。

### 蔣文揚 讀報讀出個右派分子

蔣文揚（1934-）四川重慶人，農民出身，老人精神矍鑠，精瘦的身材，說話風趣幽默。是一位十分樂觀豁達的人。他說他之所以打成右派分子，而且是極右分子，完全是因為在小組學習時奉上司命令讀登有大鳴大放內容的報紙，結果





讀報讀出個極右分子來。

當時他是重慶市紡織公司計劃科普通辦事員。科長李德雄為他辯護也被打成右派分子。

當然僅僅在小組學習時讀報上刊登的右派言論還不足以打他為極右分子，“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在充分肯定他是個極右分子以後，再為他羅織了許多罪證。他出身農村，所以誣衊他是農村二流子。解放前他不到十六歲，卻冒充共產黨員、解放軍和農會主席，招搖撞騙，販賣毒品。蔣文揚氣憤之極，本來他熱愛共產黨，受領導之托讀報給其他人聽。他一字不漏忠實于原文照讀，也絕不妄加評論，如今誣指他是二流子，污水髒水往他頭上傾倒，把他逼上梁山。

他於是痛痛快快、淋漓酣暢地竹筒倒豆子，破罐子摔碎圖了個痛快。他說：“我這輩子痛苦極了，我的發言是有刺的。我來紡織公司一年多了，今天才有機會發言。話是難聽的，有刺激的。我這一輩子痛苦極了，如果沒有今天，可能釀成流血事件。我希望在過去的單位查一查我的歷史，我的工作，看我是好人還是壞人，看我是壞蛋嗎？特務嗎？”

他繼續傾吐胸中的鬱悶。他說：“很多問題看法苦悶，有時是恨得要死，我認為共產黨搞不好事，沒有真正為人民服務，那就該打倒，共產黨亡了，中國決不會亡。匈牙利就是利用卡達爾的威信，結果遭到人民的反對，那（哪）個不是為人民服務，你在為人民服務，我不也是在為人民服務嗎？人民曾經擁護蔣介石，後來人民反對他，共產黨也是如此，人民為什麼說要打倒共產黨，殺共產黨？”

“原來我想離開公司，現在我不想了。我想看一看這些可恥的人作些什麼事？黨只相信黨團員，我現在認為應該調一下。群眾與黨有矛盾，應該相信群眾，放棄黨的權益。領導上相信的人，實質上是便衣警察。入黨入團是通過拍馬屁而獲得的，有什麼意思呢？那不是提高，反而成了惡霸。真正的應該有利於人民。我在五二年如拍XXX一下馬屁亦入團了，現在亦會壓服別人。群眾會叫我是惡霸。”

“我言語未得表達，壓在心頭。會上聽了一天多，證明許多事太離譜，由於壓抑的結果，隱瞞真相，說假話就有客觀的可能。這種作法堵塞民主，我將這種人叫做‘教條主義與機會主義混合物’。問題不在於黨團員，在於黨團組織，因為你佈置任務，叫他瞭解情況啣！這樣做把不是反革命的促成了反革命，我看楊政、楊承裕、吳明俊（黨團員）都是便衣警察。我在公司恨共產黨，不能象魯迅一樣向全國吶喊，只好自己為自己吶喊。我不是黨團員，我在公司恨共產黨，在其他單位我卻不是這樣。拍馬屁要考慮一下，我認為這些人找到了天堂，但‘天堂’是指魯迅說的反面。我自己只好為自己吶喊，不能象魯迅一樣向全國吶喊。”

“我認為《人民日報》寫得太過火了，社論說有一部分人有反社會主義的言論，這對‘放’是一種阻礙。今天說話的人都是有選舉權的人，口裏說要打共產黨，要殺共產黨，正如母親對兒女一樣，他雖說要打、殺、實際上還是愛他的兒女的。《人民日報》提出儲安平說‘黨天下’，應該承認儲安平說得對。不是要承認無產階級專政嗎？不是聯合專政。毛主席他提過無產階級專政，承認嗎？不承認黨天下就是不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為啥不承認這個事實呢？”

“毛主席為什麼不來個‘文王訪友’，現在是鄉幹部聽村幹部的反映，區幹部聽鄉幹部的反映，縣幹部聽區幹部的反映，省委聽市委的反映，中央又聽省委的反映……農民生活很苦，工人與農民生活相差懸殊。去年說增產，豐收就要增購。實際上農民土改時隱瞞了土地面積。去年豐收了來一個增加統購，今年不增加了，因農民反映（應）太大了。”

蔣文揚放出了許許多多劇毒的右派言論。但是這些言論已經對於他定為極右分子不起什麼作用了。他的極右，歸根究底是讀報讀出來的，並非放毒放出來的。

1958年蔣文揚被押送到四川省公安廳勞改局四一五勞教築路支隊勞動教養，那是右派雲集的地方。後涉及根本不存在的“中國馬列主義聯盟集團”反革命案，他遭幹警逼供信毒打。管教股頭頭查世傑三天兩頭軟硬兼施，欺哄嚇詐，但他永遠回答一句話“不知道”。事實上這些右派分子只是要求最低程度的溫飽和最起碼的人道待遇。蔣文揚萬萬沒想到發幾句牢騷，竟然成了反革命集團的重要嫌疑犯。

1979年右派改正後，蔣文揚才逃出勞改營，在重慶市針織站辦理退休手續。這位讀報讀出來的極右分子晚年倒過得十分充實，他積極參與右派的維權活動，向中共討一個說法。

### 和鳳鳴 催人淚下的女右派

和鳳鳴（1932-），女，甘肅省蘭州人。她的經歷獨特，梅開二度，二次戴帽，嫁的二位丈夫也都是右派，二位丈夫都早早離世。中共執掌政權時，她才是個十七歲天真爛漫的小姑娘。她以滿腔熱情與第一任丈夫王景超一起積極投入“社會主義建設”中去。1949年高中畢業考取蘭州大學外語系英語專業。聞知蘭州解放，輕易放棄了上蘭州大學的機會，進入《甘肅日報》當記者。她悲慘而痛苦的一生，寫在自傳體作品《經歷—我的1957年》中。



和鳳鳴（左）和獨立製片人王兵

1957年她和王景超同時在《甘肅日報》當記者。王景超撰寫和參與撰寫《向□□□同志進一言》、《請公開宣判》等三張大字報，主要內容是向上級提意見以及替同事鳴不平。和鳳鳴亦受到牽連，批鬥長達幾個月。另加所謂“跟右派分子楊允文訂攻守同盟”罪，定為右派分子。她在絕望中幾次試圖服安眠藥自殺。

1958年4月，她和丈夫分別送去勞教，二人分隔一千多公里，她被送往安西縣十工農場勞教，月工資由一百零二元降為五十八元二角四分。其丈夫王景超的處分更重，開除公職、送酒泉夾邊溝農場勞教。因二人同屬一個勞教單位，押送勞教時同行。當列車快到酒泉，其夫王景超想送妻子先到安西農場後，再返回酒泉去夾邊溝。但押送他們的人事幹部沒有同意。

為了孩子，王景超曾請求讓妻子留在蘭州勞動。這在有的單位是准許的，按照中央有關政策規定也不是不可以。可是，報社的領導們未同意。硬是強迫其一家骨肉分離，四口人隔絕在三個地方，相距一千公里，倆幼小的孩子失去父母的照料。這種對具有公民權的右派分子的過

激做法，是報社幾個正副總編輯的公報私仇。個別人還有著說不出口的理由，不許她留在蘭州。

1960年她在勞教中接到父親的一封信，得知丈夫王景超在夾邊溝死亡集中營餓得生命危在旦夕，她想盡一切辦法找到一些吃的東西，冒著大風雪趕到夾邊溝農場。可是王景超在她趕到以前已經餓死了。

1961年她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帶著兩個年幼的孩子苟且偷生。1962年她和原西北民族學院馬列主義教研室負責人、右派分子白惠宇建立了新的家庭。1966年開始的十年浩劫中，她再次被戴上右派帽子，開除公職，遣送原籍監督勞動。1974年恢復了工作。次年調往甘南藏族自治州甘南民族學校和西北民族學院任教，擔任漢語系寫作課教師。1983年她的第二任丈夫白惠宇患癌症去世。1987年寫出論文《試論理論思維的形象化表達》獲甘肅省社會科學科研成果獎三等獎，取得副教授的職稱。

西安出生的獨立製片人王兵在紀錄片《鐵西區》之後又拍攝了一部片長達三小時零三分鐘的紀錄片《和鳳鳴》。體態龍鍾、行動遲鈍的和鳳鳴老人埋身在家中舊沙發中，喃喃講述著她非人的悲慘一生，鏡頭從她十七歲美麗少女攝起，記錄了她怎樣從一個天真無邪、熱愛中共的青年冤屈打成右派、怎樣想幾次自殺、怎樣勞教、怎樣挨餓、怎樣死了丈夫、怎樣建立新家庭、怎樣在文革中二次戴帽、怎樣當濺民的經歷，故事情節催人淚下。

記錄片《和鳳鳴》於2007年獲得日本“山形國際電影節”（Yamagat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國際競賽單元大獎。在中國大陸這部片子當然會被當作大毒草而遭禁演，恐怕中國觀眾連這部得獎作品的名字都沒有聽說過。

### 陸清福 他的苦難和執著

在階級鬥爭當飯吃的年代，共產黨幹部中的普通心態是“甯左勿右”，左在人家身上，右在自家頭上。這種心態在“天高皇帝遠”的僻遠落後地區的幹部身上更加突出。政策偏左一寸，到了他們那裏層層加碼，便要偏左一尺。這種越往基層越偏激的政策在共產黨內已蔚然成風，成為共產黨順理成章的光榮傳統。戰爭年代如此，和平年代如此，進入臭名遠揚的反右文革更加如此，臻至登峰造極。

地處原西康省，現為四川省雅安地區的寶興縣位於夾金山麓，是紅軍長征過雪山草地的地方。在這個連公路都不通的偏僻小縣城裏，1957年7月15日貼出了一張大佈告：

關於極右分子陸清福的處理決定

陸清福，男，漢族，現年二十五歲，四川省雅安縣人。家庭成份地主，本人成份學生，大學



陸清福（中）在香港

文化，共青團員，中共候補黨員。

陸清福1950年參加革命工作，在黨的領導和教育下，曾擔任寶興縣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秘書長、縣人民委員會委員、縣政府財政科長等職務。

該陸清福長期以來，拒絕思想改造，頑固地堅持反動立場，極力鼓吹“民主、自由”等資產階級反動觀點，趁我黨整風之機，宣揚和鼓吹“黨天下”、“清一色”等反動謬論。聲稱“要殺共產黨”等一系列極端反動的言行觀點。

更反動的是組織“陸(清福)、羅(德恩)右派聯盟”，陰謀策劃反黨活動，聲援大毒草《草木篇》及支持雅安農學院反動學生的鬧事行為。

該陸清福思想一貫反動，氣焰極為囂張。根據縣委整風領導小組和五人小組的一致意見，劃陸清福為極右分子，並報經中共雅安地委批准，作處分決定如下：

撤銷縣人民代表、人民委員會委員、財務科長等行政職務；

開除共青團籍；取消中共候補黨員資格；開除公職，強行押送勞動教養場所進行勞動改造。

中共寶興縣委整風領導小組(宣傳部代印)

同一天，寶興縣人民法院又發出《法刑判（58）字第23號》文件，稱“陸清福思想一貫反動，趁我黨整風之機大肆向黨進攻，不僅贊同‘黨天下’、‘清一色’等反動言論，還大肆宣揚鼓吹；組織“陸、羅右派聯盟”，陰謀策劃反黨方案，情節嚴重惡劣，觸犯刑律，特判決如下：管制四年，管制期間剝奪一切政治權利。”

這二紙文件把他從中共預備黨員，西康省寶興縣政府委員，縣人大秘書長、縣政府財務科長一杆子打入十八層地獄，歷時二十七年不得翻身。陸清福究竟犯下什麼滔天大罪呢？

1957年，二十五歲的陸清福（1931-）還很幼稚。他正帶領農村工作組下鄉，8月17日縣政府反右開始，把他調回縣城。由縣公安局長新調任的縣委書記向他暗示，財務科是知識份子集中之地，要搞好鳴放。陸清福心想，6月8日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早就發表了，全國已在開展反右派鬥爭。財務科只有三名大學生，已算作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縣委書記這席話分明不是要在財務科抓右派嗎？老紅軍出身的老縣長在請他吃羊肉餡餃子時也向他暗示，他家有房產（一間側屋），土改前母親在中學教書，土改後因成份關係不准教書了，跟著兒子生活。言下之意叫他自己掂掂份量，陸清福領悟這是一種黨內動向的關切式透風。吃罷羊肉餃子頓時心情沉重，深知大禍臨頭。

當他聽到即將獲罪的風聲，便立即星夜將戴地主帽子的母親送往鄉下，分別時攝影留念記下生離死別的一刻。老母不久含恨離世，再無見上一面。

鳴放時期他在農村工作組當組長，根本沒有機會鳴一言放一詞，他的右派言行全是在他被確定為右派後，再折返回去尋找出來的。即他右派言行的雞蛋尚未孵出來，套雞蛋的框框先做好了，然後再去尋找母雞。就像毛澤東先給劉少奇按上叛徒、特務、工賊的罪名，再去尋找證據那樣荒唐可笑。於是從他平時言談、小組學習發言紀錄，甚至開玩笑話中，斷章取義，招

頭去尾挑出了“黨天下”、“清一色”之類的右派言論，寫成大字報，鋪天蓋地貼在縣委機關。

除了母親，他的妻子戴小英（1935-1978），也受到他的株連。妻子原是軍區文工團團員，因長相俊美，相貌出眾被軍區政委看中，並突擊入黨。軍區首長的對象必須進行祖宗十八代的政治審查。小英母親聞之大怒，只有丈母娘審查女婿的，哪有女婿審查丈母娘祖宗十八代，遂不同意這段婚姻。女兒本來懾於權威，對年齡比她大十幾歲的首長毫無感情可言，順勢拒絕。這一下遭到懲罰，逐出軍隊，下放全省最偏僻的縣份。不久與陸清福戀愛結婚，育有一子一女。

陸清福因認罪態度不好，劃為極右分子，取消候補黨員資格，開除公職，勞動教養。領導找她談話，問她：“你是要黨籍，還是要你的右派丈夫？”妻子從容地回答：“黨籍是我的政治生命，當然要要。丈夫是孩子的父親，我的親人，更加要要。從來沒有一個真正的女人，願意把自己的丈夫拿去換政治前途的。”

她因為不願與他離婚，在1957年12月底寒冬臘月也被戴上右派帽子。戴小英獨自一人，歷盡艱辛，帶著一雙兒女，掙扎在社會最底層，來不及等到改正，便離開了人間。

從此以後，陸清福開始了苦難的人生。他曾在四川省各個勞教農場輾轉勞教了二十二年之久，包括臭名昭著的“四一五”和“一零一”等右派勞教農場。那個年代，判刑的犯人有刑期，右派勞教卻無刑期，等於無期徒刑，只要不給你摘帽，你就要勞教下去；即使摘帽，大多留場勞動，摘帽右派和戴帽右派僅一字之差，政治待遇相當。

陸清福自幼愛好文學，中學時代便有散文、詩歌發表于《西康日報》等地方報刊。他在二十五歲戴帽，四十七歲改正。但他依舊筆耕不綴，用筆名“綠石”發表了長篇巨著《左右春秋》自傳體小說，記敘他苦難的一生。他在2008年以七十八歲高齡訪港，他身體硬朗，聲音宏亮，一口地道的川西方言，不減質樸清純的本色。回憶幾十年前的經歷，恍如隔世。

## 紀由 鏗而不捨的維權先鋒

紀由（1929-）原名南鴻祿，北京市人。1948年前在北京上學。上學期間在1945年參加中共地下外圍組織讀書會。1948年經北京中共地下組織中共北京市委城工部介紹，投奔解放區正式參加革命，遂改為現名“紀由”。進入解放區後，進入正定的華北大學政治八班學習。同年11月，解放軍包圍平津，紀由調往平山的平津市政人員訓練班學習中共的城市政策，準備接管平津。北平和平解放後，來北平參加接管工作。

進城後先後擔任門頭溝區教科內勤科員、長辛店區中蘇友協總幹事、門頭溝區工會政治教員、北京市總工會農村水利工會秘書等工作。1958年調南苑區工會任秘書、同年下半年與豐台區合併。

1958年底，工會開始整風。他在過去的工會工作中為維護黨紀國法和群眾利益，得罪了許多有權有勢的幹部，便遭人誣陷。這些幹部趁他剛調入一個新的工作單位，群眾對他不瞭解，對他進行打擊報復。而且反右運動後期政策愈來愈左，當時幹部中流行的傾向是“甯左勿右”，“左在他人身上，右在自己頭上”。為他羅織了一些莫須有的罪名，強加於他。

豐台區領導使用欺騙手段，假意勸他不要對抗運動，領導不會冤枉一個好人。就這樣於1957年他的劃右材料未經他本人簽字，便把他打為極右分子，送往清河農場勞動教養，後來又留場就業，成為解教就業人員。

紀由打成極右分子之後，在勞動教養改造思想之餘，進行了認真的反思。他逐漸清醒了過來。首先他認識到共產黨員並非像史達林所說用特殊材料做成。他們也是凡夫俗子，有七情六欲。你要悍衛群眾利益侵犯了他們的利益，他們一樣會對你打擊報復。其次，在那個極左思潮盛行的年代，一個人不說假話，不會耍兩面派便無法生存。第三，要從根本上改變現狀，改變毛澤東以無產階級專政為藉口實行領袖個人獨裁的現象。

紀由提出了“反對錯誤的修正，擁護修正錯誤”、“共產共富”、“擁護科學的共產主義，反對封建的共產主義”三個口號捍衛中共八大的綱領。這一下子紀由捅了馬蜂窩，在文革的一打三反運動中，以反革命罪再次被捕。在關押審訊期間他據理力爭。1970年被轉入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恩准他寫批判毛澤東思想的材料，但不准擴散，不准傳閱。

1970年至1974年，紀由總共寫了五十篇批左論文和二百多首詩詞。他越寫越尖銳，越寫越激烈，氣得毛澤東差一點點要槍斃他，後判刑十年。沒有服完刑期，於1978年改正出獄。可是當年紀由劃右的原因是被領導誣陷的，改正結論中沒有被領導誣陷這一條，所以紀由直到今天都沒有在改正結論上簽字認可。

紀由八十多歲高齡，身體健康，步履輕快。自1978年開始，他走上了一條平反維權索賠的道路，離休以後更加努力。他精通陰陽五行，佛學、哲學、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樣樣在行。他口若懸河，滔滔不絕。詩一樣的語言，句句成真諦。三十年如一日，奔走在維權路上。三十年一萬零九百五十個日日夜夜的奔走呼號感動了上帝。他原來單位的領導終於在2008年11月為他補發了劃為極右分子以來扣發的一萬多元工資，並補助他一萬元。紀由一共得到了二萬多元。單位領導淳淳囑咐他，這是全國都沒有的先例，請你老人家高抬貴手，好自為之，千萬不要張揚，給我們惹麻煩，吃不了兜著走。

他這位老人家二萬多元錢到手，並沒有只顧個人安危，他心裏牽掛著五十五萬多名“階級兄弟”，維權平反索賠要形成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向專制獨裁政權開刀。紀由沒有把二萬多元錢用來喝香的吃辣的，全部用來印各種上訪材料，繼續為右派維權運動大張聲勢，大造輿論，高調索賠。他的單位領導嚇得腳都軟了。為紀由補發工資、給予補償在全國是沒有先例的。領導怕承擔責任，萬一上級追究責任烏紗帽不保。便向他討還錢和文件，遭紀由斷然拒絕，翻了臉。搞得不歡而散。

紀由不顧八十多歲高齡，天天去司法和組織部門，為五十五萬多名“階級兄弟”鳴冤叫屈，紀由的手腕上還留有四十年前戴手銬留下的印痕。因此他所到之處，都受到同情，敬如上賓。接待人員會從四樓攙扶他送到底樓。

紀由說：“在我的切身體會中發現，第一，以法治國目前尚未徹底落實。第二，我雖屬離休幹部，憲法中的人權我仍受到侵犯。但我仍堅信以力欺理的現象總有一天會得到糾正。”

## 李泰倫 無辜勞教十九年

李泰倫（1936-）出生於四川省成都市，父親是國軍起義將領，在解放成都戰役中立有戰功，肅反時反遭鎮壓。1955年李泰倫畢業於北京師範學院（今首都師範大學），分配到北京西郊石景山區北京九中教書。剛參加教師隊伍的小青年認真教學，深受學生愛戴，得到老師和領導好評。

1957年的大鳴大放之風刮進了地處北京邊陲的石景山小鎮磨石口。北京九中貼滿大字報，師生員工響應黨的號召大膽提意見，李泰倫在這種熱情氣氛的感召下，禁不住在小組會上積極發言。他說：“城市有設計院，政治上為什麼不能搞個設計院呢？”他說：“儲安平說黨天下說得對。”他說：“傅作義上天安門是做給臺灣看的，這就是共產黨的政治手腕。”他說：“為什麼說蘇聯科學發達就政治民主，美國科學發達政治就不民主？”他說：“我父親是起義將領，在成都戰役中立了功，後來又說他是反革命給鎮壓了，共產黨太不講信用騙人！”

他在小組會上這番話剛說完不久，學校的小禮堂裏便掛出了一條橫幅“聲討右派分子李泰倫！”李泰倫日以繼夜的接受批鬥。他的肺腑之言均成為向黨進攻的反動言論。他的反動言論按照階級分析法，具有根深蒂固的階級根源。他的父親是給政府鎮壓的反動軍官、歷史反革命分子。他李泰倫是堅持反動立場的孝子賢孫，國民黨的殘渣餘孽，蔣介石的社會基礎。

1958年2月定為極右分子，按二級右派處理，開除公職，清理出教師隊伍，送往農村人民公社監督勞動。從此他小心翼翼做人。可是他戴著極右分子帽子，再小心也無濟於事。說他抗拒改造，繼續散佈反動言論。其實不然，是個別社員同情他，規勸他道：“你小小年紀怎麼也是右派？嘴上無毛說話不牢，以後別瞎說了！他們說什麼就是什麼，你頂什麼嘴嘛！”公社社員好心的規勸話變成他反抗改造的證據。毛澤東又繃緊了稍有鬆馳的階級鬥爭這張弦，首先拿地富反壞右開刀。

李泰倫轉送北京北苑化工廠。進門便搜身檢查，許多囚犯擠在一張大坑上，睡覺翻身要喊“報告”。一星期後押往良鄉新都暖氣機械廠當建築小工、推小車上三層馬道。拌水泥、搬磚、搭腳手架，一天強勞動下來像散了骨架子，第二天照樣幹活。其間他煤氣中過毒，差一點送命。中共針對右派分子的勞動教養制度既不合法又不合理，雖說最長三年實際上等於判處無期徒刑。比勞動教養更嚴厲的勞動改造反而倒是有刑期的。

1961年11月，管教把勞動教養的右派集中起來。李泰倫轉解北京市南苑團河農場二大隊。已經勞動教養二年了，才宣佈勞動教養期為三年。以前的二年不算數。即使以前二年不算，以後也應該在1964年5月24日到期，按照法律程式解除勞教。可是共產黨說話從來不算數。三年勞教到期後繼續勞教，勞動教養變成無期徒刑。中共的舉措自然引起勞動教養的右派極大不滿。人是有思想的動物，右派分子也有獨立的人格。勞動教養的右派分子的憤懣情緒日益嚴重，出現了消極怠工現象。

管教幹部為了壓制右派的不滿，藉故製造事端，鎮壓為首分子。籍口李泰倫和一名親共分

子吵架，污蔑他故意製造混亂，抓起來關了六十天禁閉，要他檢舉揭發其他肇事分子。李泰倫堅決反抗，在禁閉室大聲高唱革命歌曲，呼喊“毛主席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看守每天只給吃四兩糧食，李泰倫抗議說：“我是貓呀！上面把我交給你們，是讓你們看著我。我要是被你們餓死了，你們沒法向你們的上級交代。”李泰倫沒有出賣同伴，放出來時骨瘦如柴，走路東倒西歪，其他右派用小車把他推回隊裏。他拒絕出工，天天躺在坑上休養，氣得隊長暴跳如雷，斥責他道：“這一關倒關出理來了。”

1966年文革開始，勞教隊裏的“鬥鬼大會”更加殘酷。在批鬥牛鬼蛇神的大會上，幾位右派被劊子手打得皮開肉綻，體無完膚，有人嚇得當場尿了褲子。

林彪下達一號疏散令後，李泰倫等人遣送回四川省，關押在成都看守所十八天。然後送去四川蘆山縣苗溪茶場勞動支隊，既不解放又不摘帽，繼續進行改造九年。1977年四人幫倒臺才解除勞教返回成都當建築工程隊的臨時工。待到1979年改正，恢復北京九中的教職，一個人的大好青春已經過去了。李泰倫向中共喊出了“還我人生金色歲月”。

### 周惠南 周指南 夾邊溝的右派兄弟

在臭名昭著的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的三千多名右派分子和其他各種反、壞分子中，有周惠南、周指南和表兄樂世勳三兄弟、姓席的兩兄弟；蘭州醫學院女幹部由天和她的兒子母子右派；公安系統的臘金花和丈夫夫妻右派；父子右派則有周禮南父子和石佩文父子。

周惠南（1922-）和周指南（1924-2005）都是陝西省子洲縣人。哥哥當兵，弟弟搞技術。兄弟倆人都在陝西省榆林中學讀書，哥哥1946年畢業，弟弟1948年畢業。



周惠南 周指南兄弟

哥哥周惠南中學畢業後，在國軍胡宗南部當兵，參加過三次剿共戰役。第一次是青羊砭戰役，第二次是羊馬河戰役，第三次是蟠龍戰役。這三次戰役國軍都失敗了，中共彭德懷的部隊大獲全勝。中共說這是因為毛澤東指揮若定、用兵如神。事實不然，實際上胡宗南身邊有個共諜臥底，那就是擔任胡宗南機要秘書的中共特別黨員熊向暉。周恩來誇他是一個人頂幾個師，胡宗南的軍令沒有下達到軍長師長，毛澤東已經知道了。

如此打仗，當然要吃敗仗。周惠南打不了幾仗，就給彭德懷的第一野戰軍抓住當了俘虜。解放軍送他到陝西學習，學習毛澤的《新民主主義論》和其他著作。後又轉到山西省嵐縣繼續洗腦。他洗腦學習表現出色，分配到西北軍官教導團工作。中學畢業生有文化當上了一名解放軍軍官。分配到設在甘肅省天水縣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步兵學校工作。1954年開展鎮壓反革命運動（鎮反），國軍出身的官兵，不論起義、投誠或俘虜，大多數遭到清洗。周惠南被清洗



到甘肅省糧食廳油籽公司，在秘書科和調運科做文書工作。

不過周惠南是個知恩圖報的人。不管共產黨對自己怎麼處理安排，他還是對共產黨懷著崇敬和迷信的心情，感恩戴德，感謝共產黨優待俘虜，繳槍不殺，還安排工作。他在解放軍部隊裏因為有文化，所以很受器重，在天水的第一步兵學校做文化教育教官。轉業地方，也做文祕工作。

周惠南為人直爽，喜歡實話實說，具有西北大漢的耿直性格。**1957**年整風鳴放的時候，為了答謝共產黨的栽培教育之恩，傾吐肺腑之言，說了一些大實話，難免涉及單位小領導和基層黨支部。他說抓右派為啥非要定個百分之五的指標，若在實際上有百分之十的右派再按百分之五來辦理就不合適了，應該實事求是，有多少抓多少，不要按比例抓人。

他忘記了自己是個俘虜兵，犯有前科。共產黨支部抓右派用放大鏡逐個找去，在甯左勿右思想指導下，共產黨幹部一個個爭先恐後表現自己立場堅定，階級觀念堅強。上級定下的指標只有超額完成，沒有完不成指標的可能性。周惠南的前科加上現行，沒有不當右派的理由。**1958**年**3**月押送到夾邊溝農場總部，冬季轉送新添墩作業站勞動教養。

弟弟周指南從小聰穎異常，數學教師解不開的難題，到了他手裏都能解開。畢業後不久進入蘭州市城建局工作，很快掌握了業務，擔任道路設計組組長。工作表現出色，評級時一下子提升二級，成為一級助理技術員。五年內四次獲獎，評為先進工作者。蘭州市政建設規劃由設計院作出後，交給蘭州市建設局的專家評審。他是設計組組長，認為部分規劃應當有所修正，把自己的合理化建議彙報給建設局長任震英。任震英是國家級工程設計大師、城市規劃的權威。任震英聽了他的意見非常重視。但是此舉得罪了對技術一竅不通的黨員領導，他們嫉妒異常。我們都提不出意見，你算老幾，輪得到你小小技術員說三道四。然而把周指南劃為右派的主要原因是他曾寫過一張大字報《你是築牆人，但不是工人》。批評中共基層單位的三害。這一張大字報曾經轟動全局。

反右開始，周指南劃為右派。他不認錯不服罪，大小會議批鬥四十多次。鬥爭的火候升溫升級。你越不服氣，越要把你按倒在地上。最後中共蘭州市建設局黨委把他打成了極右分子。他的單位裏有一位叫劉光基的幹部替他打抱不平，認為周指南不應當劃為右派。劉光基也因包庇右派、為右派鳴冤叫屈而劃為右派。周氏兄弟、表兄欒世勳和劉光基都成為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的成員。技術專家、城市規劃大師任震英局長後來亦打成右派，對他的處理比較客氣，沒把他送去夾邊溝死亡集中營。

周惠南在新添墩作業站當了個小隊長，安排隊裏犯人的工作。弟兄倆人都是周惠南賢良的妻子高桂芳從死人堆裏救出來的。他們倆人都算活了下來，雖然餓得半死，成為逃離死亡集中營的少數幾個幸運者。老二於**2005**年病死，先走了一步。老大周惠南和妻子高桂芳依舊住在蘭州大學後門糧食廳家屬院簡陋的屋子裏。比起餓死病死的難友，周惠南覺得幸運得多了。

## 尹福生 臨終前的夙願

青島醫學院學生尹福生（1935-2000）在勞教農場和勞教工廠足足度過了二十多個春秋，飽經世間磨難，歷盡人間冷暖。好不容易右派改正了，離開了勞教場所，卻發現癌症擴散已到晚期。自知不久人世，可是他這輩子自己吃苦遭難不去說它，他那賢良的農村妻子和二個孩子也跟著他受苦受難。妻子為了支撐這個不成其為家的“家”，耗盡全部心血，歷盡當右派妻子的苦楚，年逾花甲，尚未跨出省界。許多專家考量他的病，已表示無能為力，已經回天乏術了。

尹福生便抓緊臨終前的最後時光，帶領全家大小遊歷了北京、上海、無錫、蘇州、杭州和南京等城市。原計劃還要去西安、昆明，可是已經不行了，走出五十米都很困難，他只對妻子和孩子僅僅了卻了一半的心願。

尹福生出生在山東西部靠近河南省的荷澤市曹縣的一個貧瘠的農村。他自幼勤奮好學，在荷澤一中脫穎而出，於1955年考上了山東大學醫學院。當接到通知書時，全村、全家為之興奮若狂，山窩窩也終於飛出了個金鳳凰。入學後生活愉快，讀書輕鬆，各門功課優秀，被選舉為班長。

入學一年，山東大學醫學院和山東大學分家，成為青島醫學院，在校學生不足五百人。尹福生由於功課好，又能說會道，被同學們推選為系裏的鳴放委員會主席。他履行主席和班長的雙重職責，為一門課程的考試和考查問題“為民請命”，同教務處多次交涉，終使校方妥協，減輕了學生的負擔，得到學生們的擁護。

鳴放開始，他身為“鳴放委員會主席”不得不帶頭寫了一張大字報，批評年級黨支部缺少民主作風，辦事獨斷專行。改選年級學生會時，尹福生得票率最高，黨支部卻橫加干涉，只讓他擔任文娛委員，學生會主席等要職均由黨員積極分子把持。

反擊右派開始，黨支部為了急於邀功請賞，尹福生這一年級劃定的右派人數遠遠高於其他年級。起初尹福生並不知情，這年暑期照常返家探親，他在荷澤一中的女朋友失去了往日的熱情，神情抑鬱地對他說：“聽說你們青島醫學院已經派人到荷澤一中來調查你的問題啦。”聽到這個消息，如五雷轟頂。在社會和家庭的巨大壓力下，女朋友不再同他來往。回到醫學院，一位相好的同學悄悄地告訴他，黨支部已把他定為右派分子了。這位同學是在路經黨支部開會的教室時，偶然聽到的。

開學不久，年級黨支部組織開他的批判會。黨支部事先已替他的右派言行作了充分的準備，歸納為二類。第一大類是反蘇，罪證有二：他對不少同學說過蘇聯食品非常匱乏，番茄、黃瓜都很貴；不久前從海參威駛來的一艘蘇聯軍艦停泊在青島港。學校組織同學登艦參觀。山東大學俄語系有幾位女同學不夠自重，與蘇聯水兵打情罵俏，行為輕佻。尹福生看在眼裏十分反感，回校後不免對老大哥說了些大不敬的話。黨支部上綱上線，用推理邏輯批判他，議論老大哥便是反蘇，反蘇便是反黨，反黨就是右派。

另一大類是惡毒攻擊黨的農業合作化政策。家裏農村比解放前還窮，合作化了，反而忍饑挨餓。原來在大鳴大放前二個多月，學校曾召開過一次家在農村的學生座談會，讓大家暢所欲言地談談對“解放”後農村的觀感。尹福生在會上發了言，談到家鄉曹縣農村幹部任意打人捆

人，有強迫命令作風，成立農業合作社後生產搞不上去。不少農民吃不飽飯，沒有錢化，只能拿幾個雞蛋到集市上換一點鹽巴和幾盒火柴等生活必需品。他申辯說：“我的家鄉就是這樣，不信你們可以去調查。”

批判者再三追問他反黨和反對農業合作化的動機是什麼？他無言以對。因為他毫無動機，有感而發，說老實話而已。平時要好、無話不說的同學被黨支部動員揭發，反戈一擊。把他平時私底下的言論上綱上線，斷章取義地整理成冊，上交黨支部。他和一位在北京上大學的中學同學的通信也被抄去，成為罪證。

尹福生實在挖不出動機，被迫得走投無路時，隨口講了一句：“想推翻共產黨”。黨支部書記雖然喝住他說：“胡說八道，諒你也沒有這個膽量。”話雖這麼說，還是據此給他定了罪。讓他人代尹福生錄下口供，然後令尹福生簽字劃押，就勢戴上右派帽子。

他們班三十個人，打了三個右派，比例**10%**。起初尹福生還稀裏糊塗，不知右派意味著什麼？他心痛的是無法面對他年邁的父親。他是全村、全家第一個大學生，是父親的驕傲和希望，老父盼望他早日學有所成，光祖耀宗，分擔生活的重擔。父親無法接受他開除學藉和勞動教養的事實。他被開除學藉、團藉後，一紙勞動教養通知書把他們幾個右派學生送到離青島市區三十里路的李村勞改隊窯廠。遠遠看去是高高的圍牆，牆頭豎立著密密麻麻的帶電鐵絲網。

不久，一萬多名犯人又被全付武裝的士兵押上二節火車車廂，四周架設著機關槍。這時他開始懷疑自己的右派身份，究竟和流氓、盜竊、強姦、殺人犯有什麼區別？他們被押往濱臨渤海灣的壽光縣北部一個名叫清水泊的地方。清水泊名不符實，根本沒有一滴清水，全是苦鹹水。白花花的鹽鹼地寸草不長，毫無生命的跡象，一片慘涼。他們住在草席子裏，開墾荒地。夏天蚊叮蟲咬，冬天無法抵禦凜冽的西北風和嚴寒。荒灘上豎著一塊破牌子：“山東省第一勞動教養所”。

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中，食不果腹，衣不蔽體。他在水利隊幹過最重最苦的活---打夯、開過溝、挖過井，還煉過鋼鐵，經歷過**1958**年開始的全國大饑荒。最後調到“山東省地方國營生建八三廠”，帶“生建”字樣的都是山東省的勞改企業。他在裝卸隊裏推礦石車，差一點被車壓死；在修配廠翻砂車間幹活時又幾乎在井下被砸死。二次死裏逃生，目睹死神擦肩而過。

**1961**年**8**月勞教所隆重召開萬人大會，第一次給了四十名右派摘帽子，尹福生也是其中之一，同時宣佈解除勞教。他曾為之欣喜了一陣子，可以挺起胸膛走路了，可是欣喜既刻化為泡影，戴帽右派和摘帽右派僅一字之差，一樣打入另冊。解教人員另有食堂，見到管教幹部照樣要喊“報告”。在勞教所，管教幹部、解教人員和勞教人員三類人員層次分明，中間都有不可逾越的鴻溝。摘帽以後，思想改造絲毫沒有放鬆。文革中彼此揭發，互相揪鬥。

尹福生想結婚成家，可是誰願意嫁給一個勞教過的人呢？命運安排他註定要找一位農村姑娘。姑娘瞭解了他的勞教人員身份後，淡淡地說了一句：“人好就可以”。就這樣未談戀愛便結婚了。婚後立既返回文登老家，兩地分居二十多年，離多聚少，來去匆匆。二個兒子都出生在貧苦的農村。

## 楊少西 高幹子弟中的叛逆者

1957年除夕，一個陰冷的夜晚，成都市各單位挖出的極右分子、歷史反革命分子、現行反革命分子和各種壞分子正被押解到成都市新南門新村四號四川省勞改局收容轉運站。他們一個個耷拉著腦袋，神情頹傷、痛不欲生地被人押送進收容轉運站的大鐵門，自知此去凶多吉少，前途莫測。惟有一位風度翩翩、神態輕鬆的年輕人似乎毫不在乎，嘴裏哼著流行的蘇聯歌曲“再見吧媽媽，別難過，莫悲傷，祝福我們一路平安吧！”

這一位送來勞動教養的極右分子便是成都市鐵道部第二工程局技術學校教員楊少西（1932-），四川潼南人。他輕鬆愉快地踏上勞動教養的不歸路，不知是他天性開朗，看破紅塵，還是他顯赫的紅色家庭背景使他具有視死如歸的光榮傳統。楊少西的父輩有十三位兄弟姊妹。大伯父楊尚奎（楊劍秋）是同盟會員，曾參加護國運動、護法運動、興辦實業；二伯父楊尚麟（楊衡石）同盟會員，後加入共產黨；三伯父楊尚述（楊闇公）中共早期黨員，積極參加國民革命和北伐，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1927年三·三一慘案中被四川軍閥逮捕，受盡酷刑，割舌、挖目、斷手、最後壯烈犧牲，是中共知名的烈士；四伯父楊尚昆，1925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共中央秘書長、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四任國家主席；六姑母楊尚朋，中共早期黨員，文革中迫害致死；父親楊尚倫排行第八，中共早期黨員；十二伯父楊白正（楊白冰），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主持中央軍委工作；十三姑母楊白琳，也是著名中共黨員。

楊少西的生父楊尚倫（楊電如）排行第八。早期中共黨員，在上海領導過學生運動。大革命失敗後奉命潛回四川，在軍閥部隊內做統戰工作。1949年底奉中共地下組織之命策動鄧錫侯、潘文華和劉文輝共同宣佈起義，並作為三位起義將領的代表之一，與其他二位代表乘車前往桂湖公園，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司令賀龍、副司令員王維舟和參謀長張經武，彙報起義軍隊情況和成都市區情況。為迎接解放軍進城，為和平解決成都做出了重大貢獻。成都易幟後，楊尚倫被一野司令員賀龍聘任為成都軍事管制委員會高級顧問。四川與西康合省後為四川省民政廳副廳長。

有著如此顯赫紅色家史的楊少西，前程似錦。憑著他任何一位伯父的資歷就可以做一個有權有勢的高幹子弟。可是楊少西是高幹子弟中的異類。有人羨慕地問他：“你伯父、叔叔、你父親都是高官為何沒有保你？為何不放你一馬？”楊少西毫不在乎地回答道：“我的右派言論是重量級的，誰都保不了我。”

楊少西的右派言論確實是劇毒的重量級，反動透頂。他對《白毛女》中的惡霸地主黃世仁頗有微詞。他說地主剝削農民是事實。但地主投入資金買了土地該不該有收益？如果收益的比例過高，當然可以叫剝削；萬一收益比例恰當，就該算合理。他認為農村的地主並非都像黃世仁那樣霸道，也有勤儉持家、樂善好施者。土改時殘酷鬥爭和殺掉一些地主是錯誤的。

他對抗美援朝也有說法。他說美國若要侵略中國，為何不在國共二黨內戰時期而偏偏要在

國民黨敗退臺灣、共產黨掌握全國政權的時候？說美國侵略中國是缺乏軍事常識的愚民之談。美國要找跳板為何不找臺灣找朝鮮？兵強馬壯的蘇聯老大哥援助朝鮮是當之無愧的，何必要找剛結束內戰、百廢待興的中國老二？

毛澤東開展反胡風集團和肅反運動。楊少西認為是小題大作，把學術爭論和文藝界內部的派系鬥爭上升到階級鬥爭。胡風歷史上是進步的、革命的、為中共做過好事，中共錯把朋友當敵人。

而他榮登極右分子寶座的致命傷則是在1956年致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的書面意見。他將平時林林總總的看法和觀點彙集在一起，諸如土改、抗美援朝、肅反、反胡風、個人崇拜、人大選舉走過場、中蘇友好等等，上書中共八大會務處。他用心良苦，完全從善意出發，希望中共吸取經驗教訓，糾正錯誤。儘管他的看法和觀點在今天看來都是正確的。可惜到了反右的時候都成為鐵證如山的罪狀了。

文革開始的時候，楊少西已摘掉帽子，解除勞動教養了。他回到成都在一家工廠做工。楊尚昆已作為“彭羅陸楊反黨集團”的反黨分子與彭真、羅瑞卿、陸定一一同揪了出來。成都造反派要在市體育場召開批鬥彭羅陸楊大會，一時找不到活靶子，便找到了這個與楊尚昆沒有任何關係、沒有得到楊尚昆半點好處的侄子來了，把他揪出來陪鬥。楊少西自知，在這種場合替代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作活靶子，民憤難填，凶多吉少，至少要受皮肉之苦。

半途上他急中生智，聲稱要拉屎，實在憋不住了，真給他憋出幾個臭屁來。造反派不得不押他去廁所，又怕臭，不陪楊少西進去了，在門外等候。楊少西乘機從另一端溜出廁所，走進一家飯店的廚房逃之夭夭。全市批鬥走資派大會少了一個活靶子。他躲過全市批判大會卻躲不過工廠裏的批鬥會。但工廠批鬥會的陣勢要比全市萬人體育場的批鬥大會小多了，皮肉之苦也少受了些。

1979年改正後，他的紅色家史讓他當上了四川省政協委員。俗話說：“江山好移，本性難改”。他依舊不顧身份，坦誠直言。省政協會議分組討論，請他提個提案。他吟呻半響，總算給他憋出一個提案。他說：“人民南路廣場毛主席他老人家一個人站在那裏太孤獨了。不如再塑二個像，一個朱總司令，一個周總理，分站在毛主席的兩旁，陪陪他老人家。”結果下一屆省政協取消了他的委員資格，把他除名了。

楊少西的可貴在於“出污泥而不染”，證明“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出身論的破產。

## 李才義 李鴻章的侄子是右派

李才義（1938-2011）原籍湖北沙市，出生于成都。筆名余紅夫，因取其妻之名余紅之丈夫也，計劃出版《紅夫文選》。父親李鴻藻和祖輩都是湖北沙市的小商人，從四川隆昌販運麻布至家鄉做蚊帳出售。抗戰爆發，武漢吃緊。舉家移居到重慶，後又返回老家，所以他生在成都。

李氏為湖北名門，李鴻章與其父同祖同宗同輩分。如此計算，李才義應當是李鴻章的小小侄子。李氏家譜可以追逆至唐代，尊唐太宗為祖宗。其排序為“世美言齊正，天廷國泰凱，仁德鴻才智，萬戴忠公在”。李才義排在第十四位，輩份靠前。父親替他取名“才義”，意在盼他“才高八斗，義重千斤”。抗戰勝利後，父亡家破，隨母生活，家庭成份降格為“城市平民”。母親節衣縮食，培養他到高中畢業。參加了革命工作。

李才義從小熱愛共產黨，熱愛毛澤東，不久入團，成為共青團員。高中畢業後參加中國建設銀行四川省分行工作，任國防軍工撥款部門的文秘。1957年整風，共產黨號召向自己提意見，改進工作作風。李才義看不慣黨員喜新厭舊，趾高氣揚，寫了篇大字報《笑聲和淚水》，批評一位黨員幹部進城後拋棄農村髮妻；又在報紙上發表一篇短文《春風何時至，隔岸聞花香》，批評領導害怕群眾批評，機關的整風運動冷冷清清。整風運動中，他在機關人員全體大會上上臺發言，揚言“一個人的墮落從生活開始，一個黨的興亡要靠全體成員。”

劃他極右分子的最主要根據是他帶頭向中共省委機關聚眾鬧事。他曾率領六位共青團員去中共四川省委要求會見省委書記李井泉，遞交有百分之八十機關幹部簽名的信件，要求省委派工作組來銀行調查領導壓制群眾批評的情況。他們見不到李井泉這樣的大人物，由中共四川省委書記處書記兼省委組織部長許夢俠接見了他們。那時還處於引蛇出洞階段，許書記兼部長熱情接待，非但沒有批評那七位小青年，反而鼓勵他們回應毛主席號召和黨中央決定，積極投入整風運動。如果黨團員不帶頭提意見，群眾便不敢開口。

受到如此熱情鼓勵，七位團員如獲尚方寶劍，回到機關，把白報紙用漿糊連成一長條，從四樓掛到一樓，用大字書寫省委書記兼部長接待過程和許書記的重要指示。創造了成都市最大最長大字報的記錄，吸引了許多省市機關前來取經學習。李才義見狀好不得得意。

“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來”，“助黨整風”頓時變臉為“反右整風”。二字之差，性質頓變。被視作英雄好漢的七位共青團員打成“反黨小集團”，李才義榮登榜首，成為“反黨小集團”的頭子，在省政府大禮堂，接受財政廳系統（財政、稅務、保險、銀行和財校）上千人的批鬥，《四川日報》在《省級財貿系統打退右派倡狂進攻》的報導中，將許多污蔑不實之詞強加於他們頭上，英雄瞬間成了狗熊。

批評他們的反黨反社言行尚不足夠，照例還要深挖思想根源和階級出身。李才義原來的城市貧民家庭成份忽然又變為工商業兼地主。舅父楊啟明原來在國軍黃隱部任上校團長，犧牲在黃河邊上的抗日戰場，陣亡將士搖身變成了反動軍官。如此快速變臉，真是匪夷所思，賽過川劇的變臉特技。

橫批豎鬥的結果，首惡分子李才義從嚴從重處理，劃為極右分子，開除團籍，強制勞動教養。其他六位脅從分子開除團籍，發配到邊遠農村勞動改造，由貧下中農替他們進行洗腦教育，改過自新。

李才義在接受勞動教養期間，修築過內昆、成昆、廣旺三條鐵路，從事開山放炮，打洞砌磚等重體力勞動。他與高幹子弟中的叛逆者楊少西兩人難兄難弟，結為莫逆之交。第一年年終

評審，李才義因讀《水滸後傳》，乃至詩興勃發，學宋江在扉頁題反詩：“正直無故反遭戡，難怪英雄上梁山……”，為此榮記大過一次。

李才義和楊少西在勞動教養中並不孤單，他們有幸結識許多各界名人。譬如重慶民盟宣傳部長李康、西南《工人日報》副總編汪崗、《成都日報》記者黃澤榮（鐵流）、四川諧劇創始人王永梭、西南人藝羅克仁、四川人藝程東天。**1963**年摘帽後，在永川新勝勞動茶場留場就業，受紅岩英雄周居正的牽連，以右派翻天的罪名，加判勞動教養三年。

**1979**年改正後，對他進行“三恢復”寬大處理，恢復原職原薪原工齡。“無巧不成書”，復職後居然分配他分管省勞改局財政預算撥款，代表省財政廳審核一年一度的全省勞改企業、農場的基本建設財務決算。他在大會上大模大樣發表講話，審查批復勞改系統的財務預決算。真是“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此一時彼一時，令人不可思議。

**1998**年提前退休後從事筆耕，奮力留住往昔歲月。他著有紀載他親身經歷的《天府悲歌--四川右派勞教經歷》，國內出版時改名為《風蕭蕭路漫漫》。出版社編輯這番煞費苦心又富有詩意的改動，回避了“悲歌”、“右派”、“勞教”那一類忌違用詞。反右五十周年前夕，他發表了十多位難友的傳記，出境參加了香港、美國等地的學術研究活動。當然由於當局對反右運動的定性尚未作出明確結論，諸多活動也就不便公開參加。李才義雖然年逾古稀，仍熱情洋溢，筆耕不綴，近日正在寫作紀實文學《情系天山》，並出版《紅夫文選》。

## 沈秉強 從左派到極右派

極右分子沈秉強（**1901-1969**）廣東韶關曲江人，原來是國民革命軍中著名的左翼將領。曾任十九路軍高參。在陳銘樞、蔡廷鍇建立福建中華共和國時，曾任駐港代表。

抗戰初期，任廣州市政府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兼代秘書長。廣州淪陷後，任國民政府廣東戰區糧食管理處中將處長，後隱退家鄉。抗戰勝利後，出任廣東省第二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曾幫助中共營救中共地下黨員和進步人士。**1947**年以“通共罪”被國民政府扣押廣州。後經張發奎干預而獲釋。

中共掌權後，沈秉強成為廣東省級統戰對象，出任民革廣東省委委員和韶關市民革負責人、韶關市副市長、韶關地區專員公署副專員等職。在中共廣東省委統戰部的內部排列中，根據他一貫的親共表現，將他列為左派。

整風鳴放以後，根據民主人士在各級鳴放座談會和人大、政協會議上的表現，中共廣東省委統戰部重新作了排隊，並把排隊結果推向各地的反右運動。統戰部分析，民主人士中右派分子的情況有三類。第一類原來就是右派，在中共掌控之中；第二類是假左派真右派，中共受他們蒙蔽；第三類原來確系左派，後來轉化為右派，中共未察覺。

中共廣東省委統戰部把沈秉強列入第二類與第三類之間。中共廣東省委統戰部僅僅根據他在中共組織的民主黨派座談會上向中共提出的幾條溫和的合理化建議，使用套雞蛋方法把他的言論套為極右分子，全然不顧他過去的親共立場和為中共立下的汗馬功勞。廣東省在反右運動

中，在文教界、文藝界、衛生界、新聞界、科技界、工商界、民主黨派和中共內部，揪出了三萬六千六百多名右派分子，占參加運動總人數**5.5%**，並以極右、普右、中右、疑右分子等名目分類，民主黨派中有**20%**成為右派分子；機關幹部中的右派，占參加運動總人數**3.68%**。其中有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省人大代表、省政協委員共三十人。還有省人民委員、省工商聯常委、湛江、汕頭、海口市的副市長及政協副主席、各民主黨派湛江、汕頭、海口市的正副主委，湛江、汕頭、海口市工商聯主委中，一大批民主人士中箭落馬。

在行署副專員、副主任一級民主人士中，韶關地區副專員沈秉強已從左派降為極右分子，湛江地區副專員彭中英也從左派降為右派分子，海南地區副專員周錚從左派降為中右分子。沈秉強和彭中英都撤除了副專員職務。周錚是中右分子，海南行署副主任的職務也撤掉了。

全省共一百十七個縣、市（包括廣州市，但統計數字不包括該市），民主人士任副縣、市長的縣、市有八十個（其中一屆有八個縣、市），已安排民主人士總數共九十三名（其中一屆安排了十一名）。反右後這些民主人士政治排隊情況如下：左派十人，**10%**；中左二十三人，**24%**；中-中二十人，**21%**；中右十二人，**12%**；右七人，**7%**；極右十三人，**14%**；未明八人，**8%**。

整風運動前劃的政治態度如下：左二十三人，中二十六人，右八人。未排隊的三十六人（高要、韶關兩區未排隊）。第一屆人大安排的十一名民主人士中，現在要撤職處理的有四人，占**36%**強。第二屆人大安排的八十二人中，現在要撤職處理的有十三人，占**15.8%**。如把一、二兩屆合計受撤職處理的共有十七人，占全部的**18%**強。

在反右鬥爭的基礎上，綜合各地提出的處理情況如下：保留四十一人（占**44%**）、調職十人、退休一人、辭職三人、撤職十七人（占**18%**）、未研究二十一人（其中惠陽占十一名）。許多人一死了之。省人委在年底發出的通報稱“從**11月20日**至**12月9日**這段期間，在省人委系統內先後發生自殺事件六宗，其中：省銀行一名，工業廳一名，外貿局四名（藥材公司三名，外運公司一名）。內有右派分子四名，疑右分子一名，中右分子一名。已死四名，未死二名。”其他各系統都有類似事件發生。

陶鑄在省人代會第六次會議上說：“當前要用最大的勁頭來展開反右派鬥爭。”是年8、9月間，鬥爭已經迅速蔓延到中共黨內。其激烈的運動方式、殘酷的鬥爭手法，決不遜於黨外反右派鬥爭。這就是反地方主義運動。廣東省反右運動的特點是反右和反地方主義相結合，黨內黨外相結合。

廣東省的反右運動，在陶鑄的極左思想指導下，取得了二個極為偉大的“成果”：縣團級以上中共各級幹部中揪出地方主義分子三萬多人；知識份子和民主黨派中揪出右派分子三萬六千多人。其中地方主義分子兼右派分子“雙肩挑”的有一萬多人。二個極為偉大的“成果”極大地挫傷了廣東省幹部隊伍和民主黨派知識份子的元氣。



## 李衍德 蘇州園林專家

知名蘇州園藝專家、研究員及高級工程師李衍德先生有一長串銜頭：蘇州風景園林學會副理事長、中國盆景藝術家協會理事、《中國園林》編委……可他最珍惜的頭銜是中國帽兄。原來在中國大陸，1957年的右派們相互之間用帽兄、帽弟、帽姊、帽妹來稱呼。其中意思，盡在不言中。真是“同是天涯淪落人，相知相識陽謀中”。



李衍德（右）和宋林松

李衍德（1935-2009），出生於上海的海員工人家。1955年畢業於上海市重點中學--虹口中學。1949年加入共青團。曾任中學團支部組織委員，積極回應中共各項號召參與運動，如鎮反、抗美援朝、肅反等，是中共重點培養的積極分子。中學畢業後考入北京林學院林業系，並自修園林綠化。

1957年他作為親共積極分子，響應毛澤東號召幫助中共整風。反右開始後，8月30日被《北京日報》點名為學生右派集團首領之一，父親在美國遠洋海運輪船公司任輪機長，居然亦成為他的罪狀。他被戴上極右派分子帽子，開除學籍，先安置在林學院實習林場，監督勞動三年半。1960年復學五九級。延遲至1964年才畢業。但因戴著右派帽子，仍不分派工作，留校勞動。

1965年，因他批評當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餓死人而被判送勞動教養。在北京清河勞教農場時，同戴煌、高莊、杜高、譚天榮、楊路、吳弘達、林其鑾等朝夕與共，飽受煎熬。他們之間也建立起了持久的友誼。

1974年中美建交後，父母來華探親。這時才知真情，知道他當上了右派。父母上書僑辦，把他調回蘇州。1979年右派改正後，方始允許他技術歸隊，調入蘇州市園林局，脫離了長達十多年的勞教生活。

蘇州園林舉世聞名，他在蘇州始得一展技術專長，參與籌建蘇州市園林技術學校，並開設專業課程，編寫和審定建設部統編教材。1984年晉升工程師，聘任為蘇州市園林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兼任蘇州市風景園林和花卉盆景二個協會的秘書長。1996年被邀請為美國國家公園保護協會（NPCA）名譽會員。

退休後，李衍德的生活十分充實，四次往返美國，應邀請前往紐約、奧斯丁、達拉斯等城市進行學術交流和講課，廣受歡迎。1988年應聘赴紐約長島為著名華裔王宅營造中國園林，聘為園林設計顧問。

## 何之光 妒嫉文化 禍起蕭牆

勞改文化、勞教文化、打砸搶文化、逼供信文化、浮誇文化、造假文化、造謠文化、欺騙文化、遺忘文化、告密文化、妒嫉文化，凡此種種構成了中共社會獨特的“黨文化”。它們完全與五千年中華文明背道而馳，它們滲透到中國現代社會思想、精神風貌、社會道德、物質文明等的方方面面，侵蝕了中國人的大腦細胞。它們是階級鬥爭、政治運動的孳生物，是一黨專政、專制獨裁的副產品，其陰霾至今籠罩著中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大地，久久不肯消散。

何之光(1923-)便是妒嫉文化的犧牲品，也是中共黨文化的受害者。他於1923年10月出生在一個耕讀為本的大家庭，湖南醴陵縣泗汾鎮何家壟村人。祖父務農，含辛茹苦供父親讀書。父親高中畢業後，在北京工業大學上了二年學，家貧再也讀不下去了，中途綴學當了小學教師和小職員。後來參軍，在國軍中當軍需官，歷經抗戰，1945年隨軍去臺灣。

七七事變時他在長沙上初中，就讀的中學遷往衡山白雲。其間適遇長沙大火，休學在家。抗戰女傑胡蘭畦率領“上海勞動婦女戰地服務團”恰好進駐他住的村裏。團員三五成群常去他家探訪，他也去團部借書閱讀。不僅大開眼界，而且深刻影響了他的思想理念。

1941年8月，何之光考入中山大學文學院外文系，在校參加抗日愛國學生運動，在1942年宣誓加入中共。因所屬中共地下黨粵北省委遭破壞，暫停組織活動。他響應中共號召，到敵後去打遊擊，與同學越過封鎖線，到達大鵬灣東江縱隊司令部，參加東縱第一期“青年幹部訓練班”。

結業後，東縱領導派他到司令部直屬中隊即武工隊，擔任指導員兼黨支部書記。東江縱隊與日軍接觸不多，卻經常與友軍即國軍鬧摩擦，打了幾仗。1946年9月，他按照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大城市工作”的指示，離開東江縱隊，返回廣州中山大學，繼續未完成的學業，並參加學生運動。

在中山大學畢業後，中共原擬派他到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工作，他的組織關係都轉過去了。可是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前身是香港分局)為了加強湖南工作，提出“湖南人都回湖南去”的口號。幾經曲折，他回到湖南，擔任中共地下黨的“兩衡工作組”組長。為了掩護身份，他回到中學母校做英文教師。

時中共湖南省工委正在開展對程潛、陳明仁的和平起義策反工作。與他們兩人關係密切的民主人士程星齡正在臺灣。中共中央華南分局試圖利用親共的程星齡做程潛、陳明仁的統戰工作，爭取他們和平起義。

中共便叫何之光藉口暑假去臺灣探望父母，想方設法尋找程星齡，遞交一封中共的密信。他在臺北順利找到程星齡，程讀信後立即表示接受中共委託，返回長沙開展工作。

何之光完成使命回到長沙，依舊從事地下黨的工作，負責幾座中學的地下黨外圍組織，開展學生運動。同時做中共長沙地下市委的秘書，不久調入“長沙市各界迎接解放聯合會”，參與解放軍入城部署。

經過程星齡的秘密策劃、穿針引線，程潛、陳明仁在1949年8月4日向全國發出通電，宣佈起義，長沙和平易手。程星齡立下汗馬功勞，中共冊封程星齡為湖南省黨外副省長。程星齡沒有風光

幾天，在陽謀中淪為階下囚。可是他對中共赤膽忠心不減當年，右派改正後申請入黨，成為一員“偉光正”。

長沙和平易幟後，何之光隨即轉入地上支前，籌措錢糧，支援大軍南下。他調往邵陽任青年團地工委書記，參加土改、剿匪、反霸、三反。結束邵陽地區的工作後，調回長沙，任青年團湖南省委宣傳部長。他作為湖南省代表，出席了在維也納舉行的“國際青年權利大會”。可惜他的好日子僅僅不過是曇花一現，肅反運動一起，他便災難纏身，中共棄他如敝屣了。

1955年肅反運動中，中共對他實施突然襲擊，指名道姓地宣稱他是“混入黨內的特務”。步出審查會場，他不禁熱淚盈眶，哭著回家。其實一年前就開始懷疑他了，在1954年審幹中，有人說他出身不好，父親是反動軍官；地下黨成份複雜，不可靠；又去過香港、臺灣。

去香港、臺灣都是上級黨組織安排執行的任務。僅僅懷疑還不算數，派人將他關進一間小屋，把他的褲腰帶也搜走了。幾次三番迫他交代。省公安廳下了逮捕令，收容到一間臨時監獄，與八個肅反對象關在一起。關了一年多，把他釋放了。中共湖南省委肅反辦公室主任對他說：“你的歷史已經審查清楚，沒有問題。”

事後何之光才知道，機關裏那些農民出身、沒有文化的老幹部，妒忌他既有學歷文化，又有地下黨、打遊擊的背景，擋了他們的仕途，便肆意對他迫害。自此以後，一直拿他的出身和經歷大做文章。欲置他於死地。他的夫人有了外遇，同他離了婚。從此他孑然一身，形單影隻，艱苦度日。這便是中共妒嫉文化的惡劣影響。

審查完畢回到機關，沒有安排他的工作。直到1957年4月，才調他去中共湖南省委講師團，給中層幹部講解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到了講師團，他發現存在的問題不少，便據實向省委報告，解決了一些問題。反右開始，上級派來的領導說講師團裏有“反黨集團”，號召大家檢舉揭發，誣稱何之光與黨支部書記周建與副書記張佐、前任書記廖學純是“反黨集團”成員。

他是反黨集團的頭子，撤銷一切職務，開除黨籍，保留公職，送去勞動教養。原來他向上級反映問題，又得罪了頂頭上司，翻出他原先受審的出身經歷問題，定性右派後再尋找“證據”落罪。中共搞運動的手法，用來對付他這位久經考驗的老地下黨員、老遊擊隊員亦不例外。

他被押進新生工程隊勞動教養，在刺刀底下從事勞動強度極大的危險工作，采運石頭。吃不飽穿不暖，經常受傷。1960年又派往手工操作的小煤窯挖煤、挑煤、搬煤，每天餓死人。在一次冒頂事故中，身子壓在煤矸石下，受了重傷，又不給治療，腰肌勞損，左腳痺痛。

因為他是行政十四級，由省級組織部門管理，所以他與同隊勞動教養的湖南省廣播電臺台長陳明一樣，遲於其他右派摘帽。解除勞動教養後，安排到湖南醫學院圖書館做分類編目工作，他熟悉英文，中共要利用他的專長。三十九歲時，與表妹重新結婚，又有了一個家。

儘管他默不作聲地埋頭工作，夾緊尾巴做人，文革開始，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時候，又把他這只死老虎揪出來了。關牛棚、挨鬥、陪鬥、挨打、乘噴氣式，遍償人間地獄各種滋味。

最令他不堪忍受的是株連了唯一留在大陸的親人、上蘭州大學的弟弟何之明(1936-)。反右運動中，何之明是班幹部，又是積極分子，沒有提過一條意見，寫過一張大字報。某次開會，宣佈他有問題，

搞突然襲擊。抓住某些雞毛蒜皮小事情上綱上線，把他打為右派。何之明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後來有人告訴他說：“你哥哥是湖南省理論界最大的右派。”他才恍然大悟，明白是哥哥株連了弟弟。

何之明與二十多位右派學生在農村勞動，向有關部門反映大躍進中農村混亂的情況，打成“反革命小集團”，全部逮捕判刑。何之明判了十五年徒刑，發配到郊區磚廠勞動改造。刑滿後在小學教書。改正後，去美國父親那裏定居。

何之光從一生的冤屈和苦難中得出結論：“你的資格老，是東縱的老革命，又是大學生，在領導人裏文化比較高，不把你整下去，他們能青雲直上嗎？”

## 周志勳 一個沒有右派言論的右派分子自述

我生於1936年9月。第二年冬天，日本侵略軍打到我家鄉——江蘇宜興縣丁蜀鎮，父母抱著我到附近鄉村中逃難，對門鄰居中有一人被日軍子彈擊中身亡。長大後父母告知此事後，我心中就有了強國夢。1952年7月我畢業於宜興縣精一中學初中部，1955年畢業於無錫市惠山腳下的紡織工業學校，被分配到四川成都針織廠。工作一年後，於1956年考入西安交通大學動力系。

由於我對政治從不關心，1957年整風時我當然也不會去關心，從未發表過意見和看法。我的家庭成份為小商販，父親在家鄉自行製作和銷售陶器，為人本份，對共產黨無冤無仇。

1957年下半年反右鬥爭開始，學校停課，校園裏整天高音喇叭振天響。我所在班級裏一名女同學蕭子俞首先被定為右派，一天批鬥三次（上午，下午，晚上各一次），約鬥了一個月。我那時是群眾，雖也參加反右鬥爭，但對此極不感興趣，會上一言不發，充當看客，心裏卻有些反感，這些政治運動，日夜鬥爭人，根本不是說理鬥爭。

1958年初，反右鬥爭在西安交大快要結束時，我班的唯一黨員王理同學，突然通知我到班級開會。我到教室開會時，看到黑板上寫著“批判右派分子周志勳大會”。我當時心裏十分驚慌。會上安排有幾個同學發言，約半小時後，就將我定為右派分子。實際上我與班內的那名女右派蕭子俞從來沒有說過話也沒有任何聯繫。我也沒有發表過任何右派言論。因為我看到其他右派分子因不承認自己是右派分子而被日夜鬥爭、精神疲勞的場面，所以我當場只好被迫違心地承認自己是右派分子。後來，負責反右鬥爭的班內唯一黨員王理通知我，“罪行較輕，態度惡劣”，定性為普通右派，對我的處分為“保留學籍，勞動察看”。並說你只要勞動三個月即可返校學習。實際情況是，我勞動到1961年10月才回到西安交大讀二年級，總共勞動了三年零十個月。

1958年春節過後不久，學校用一輛卡車將一批右派分子送往西安市郊區霸河邊農村侯西村，離市中心二十五華里，住在農戶家中。共有七名右派分子在該村勞動改造，有學生有研究生有教師。當地農民住在破窯洞裏，吃的主糧是窩頭，一年四季沒有魚肉吃，蔬菜極少，生活十分貧困。大約在農村勞動一年半到麥收時節，我們這批右派被集中調到陝西省渭河工程局汧河工



周志勳

地（離寶雞市二十五華里）勞動，用附近的黃土築一大水壩，高二十五米，長八百米，寬六十米。這批人中，西安交大右派約八十人，西安動力學院右派十餘人，還有公安系統的，退伍新四軍的四、五十歲的中年人和個別大學教師右派。農閒季節附近咸陽市興平縣會調大量民工來此工地勞動，半個月後即可回家休息。我們這些右派則成天拉車運土，每人一輛二輪車，上載五百市斤黃土，每天要拉車走一百多里路，與馬拉車是一樣的，勞動強度很大。在農村勞動時，家裏每月寄十五元給我買口糧繳給生產隊，輪流在農戶家中吃飯。到水庫勞動時，家中收入少了不寄錢給我，我也就不繳伙食費了。每月水庫定糧五十二斤（特重體力勞動），但只給我們吃四十五斤，克扣七斤。民工來水庫勞動時都帶有五斤重的白麵大餅，他們說這些右派都快要餓死了，當時全國大饑荒已來臨。

1961年10月，我被調回學校復學，讀二年級，四年以後於1965年畢業。由於我學習刻苦努力，學習成績全班第一，受到老師好評。畢業時，系政治指導員通知我摘去右派分子帽子。我與同班的右派周郊如二人一起被分配到上海市機電局屬下的上海壓縮機廠工作。當時全校尚有十名右派分子沒有摘帽，不予分配工作，遣送回原籍。

到上海工廠報到後我分派在金工車間勞動，一年多後調到設計科搞技術工作。1968年文化大革命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我又被揪出，下車間掃地。運動結束時有一位造反派老工人對我說：你的問題我們已經覆查了，你檔案裏沒有重要材料，不知道你怎樣定為右派分子的。而且我們到西安交大覆查你的情況，他們也沒有說你什麼。你知道你為什麼定為右派分子的嗎？我說不知道。老工人說：估計當年反右時你是為湊數而被劃為右派的，意即你是冤枉的。現在社會上沒有為右派平反的事情，我們也沒法為你平反。你勞動就算幹部下車間勞動。

文革結束後，我回到工藝科從事技術工作，直至1993年因患憂鬱癥提前退休。

在西安交大反右鬥爭中約有數十位學生被劃為極右分子，處分為：開除學籍，勞動教養。他們都被送往西安北面的銅川市煤礦下井勞動教養。直到1978年，他們中的倖存者乘卡車回到學校後，他們都坐在校園的草地上大哭了一場。

在反右鬥爭中被傳為反右英雄的西安交大校長、四級幹部彭康老人，在1966年文革初期被活活鬥死。

五十餘年過去了，特將這段往事簡錄如上，祈望歷史悲劇不要重演！

## 吳中琪 一個學生右派的自述

1949年5月上海解放那年，我十二歲。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我是上海市第一批帶上紅領巾的少先隊員。從小學六年級開始，我進入上海中學附屬小學，開始我的住校讀書生涯。此後，初中、高中、大學我都是住校生，我也樂意住在學校。因為我出身不好，我祖父、父親都是商人。父親1950年到香港去經商。我的家庭是雙重性的，我父親的兄弟姐妹中除我父親（排

行第二) 經商外, 其他二個叔叔和二個姑媽都是中共地下黨員。在新滬中學六年求學中, 我曾先後擔任過少先隊大隊長, 隊委會主席, 學生會候補委員, 學生會文娛部主任。

1956年9月我進入上海第二師範學院(現上海師範大學的前身) 數學系求學。萬萬沒有想到, 1958年上半年反右補課時, 將我劃為右派分子, 說我反黨、反蘇, 真是想不通。我設有說錯話, 沒有做錯事。那時, 想不通也得接受, 容不得你辯解, 誰越辯解, 處分會越重, 因為這是頑抗的表現。

我是怎麼會被打成右派的呢? 我又沒有寫過一張大字報。1957年運動初期, 我想我是團員應該積極參加會議、開展討論、發表意見。

吳中琪

當時我一切正常, 運動開展得轟轟烈烈。其間, 我的母校新滬中學的領導曾邀請我回到母校大禮堂(民主棚), 在全校師生大會上作了一次我們大學裏反右鬥爭情況介紹。我為了慎重, 曾將講稿送給大學年級組抓運動的政治老師審閱, 經他修改過。想不到幾個月過去, 到1958年反右運動補課時, 矛頭指向了我。在運動初期大鳴大放大辯論時, 我有一個毛病: 愛出風頭, 好表現自己, 自以為我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新中國思想, 不會講錯話、做錯事的。理論性的問題是百家爭鳴, 越爭越明。當時動員時就說過: 中央文件規定不抓辮子, 不打棍子, 不扣帽子。

生物系有一個同學貼出了一張列有幾十個問題的大字報, 轟動了全校。在生物系的全校大辯論會上, 我發言對其中幾個問題說了我的觀點。一問: 共產黨會不會變質? 我說: “存在變質的可能性, 從量變到質變的規律來講, 假如多數黨員變質了, 那黨也會變質了, 假如黨的領導們變質了, 那黨也會變質了。現在發動全國人民幫助黨整風, 向黨提意見, 就是為了使黨不變質, 才要進行整黨, 這就是說明黨有變質可能性的存在。” 二問: 蘇聯該不該向我國要回支援的經費? “也太小氣了”! 三問: 丁玲是老黨員作家, 在運動中突然成為資產階級右派, 這可信嗎? “假如真是右派, 那只能說明丁玲所在的黨支部對丁玲的教育存在問題, 要追究黨支部的責任(當時報紙上報導的被揭出的大右派大多是民主黨派人士, 黨內右派還很少), 沒有教育好她。” 當然那時還有一些其他問題的辯論, 如: 外行能不能領導內行等等, 我沒有發言。

參加辯論會後, 沒有人找我麻煩, 包括班級討論會上的發言。反右補課開始, 班上首先揪出楊伯芳同學, 批鬥他。他來自浙江農村, 他曾發言反映了農村的一些黨員幹部怎樣欺壓老百姓, 他對這些人極為不滿, 發表了意見。有關人士說他這是反對黨的領導, 右派言論, 要他檢查。一天晚上全班開大會批鬥他, 他的檢查講到一半, 主持會議的老師氣勢兇兇地阻止他講。我看到他手裏的講稿沒有讀完, 覺得這太不民主、太氣人, 就說了一句, 他的稿子沒有讀完, 讓他讀完再說嘛, 應該允許他申辯。主持人馬上指向我說: 你為什麼幫右派分子說話, 為右派分子翅膀上插羽毛? 於是其他同學都不敢說話了, 後來發言的幾個人都是一邊倒。

第二天開會, 要我檢討昨天晚上的錯誤, 並且把我在生物系辯論會上的發言也作為我所犯的右派言論, 符合右派六條標準中的第一條反黨, 第六條反蘇的罪名, 還有其他方面的, 而這

二條是主要的。開始我不服，解釋我的觀點，任我再怎麼力爭，用學到的一點辯證法、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等理論為自己辯護，都沒有用。接著校報上也將我的所謂“反黨，反蘇”言論予以公佈，並加批判，指名道姓地說我是右派，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當時，只要是點過名的所謂右派分子，誰越是極力為自己辯護，不認錯，則說明他態度頑固，罪加一等。哪個人為點到名的右派辯護，為其說話，也要列入右派名單。在這種情況下被點到名的人無形中被孤立了。我看形勢，為了不吃眼前虧，只有唱自我錯了。我將自己關在教學大樓頂層的小房間裏寫了一星期的檢查。寫了五十幾頁的檢查書，檢討我沒有聽黨組織的話，沒有按黨的意願做事，不但沒有起到一個黨的助手——團員的作用，反而幫右派說話，幫右派的忙等等。找根子，是出身不好，有反動階級的烙印。經過四五次的大會小會檢查交代，最後算是通過了。本想檢查得深刻點，有個好結果，可爭取免除對我的處分。但最後還是給戴上了一頂右派的帽子。屬於學生右派第四類（公告中寫道：免予行政處分），是最輕級。我理解為照常上課，分配工作。後來事實也是如此，被劃為一、二類的右派，有的去勞改農場，有的去新疆青海。前面提到的楊伯芳就被送到了新疆。

1958年8月，我們這批師範學院的畢業生，被分配到上海市各區教育局。我被分到長寧區，可是市區的各區教育局不接受我們，只好留在學校裏參加新學期開學前的後勤勞動工作，整理打掃教室宿舍等。等到11月，上海的幾個郊縣教育局同意接受我們，我被分配到上海縣。到哈密路上海縣教育局報到後，我和其他二個右派同學分配到閔行中學。

11月7日到閔行中學報到，當天晚上就參加大煉鋼鐵的戰鬥。其實是在學校的空地上挖地洞，上面擱陶瓷燒鍋燒鐵水。幾天後校長說：“你們還不能開課，要下鄉勞動改造。”1959年1月1日，我們三人被送到當地黃浦第一生產隊勞動，住在農民的柴間裏，夜裏冷得掛著的毛巾都結冰了。冬天沒有農事可幹，就叫我們去做泥磚，去燒磚。從來沒有在農村勞動過的我們，算是經受苦難了，磨練了我們的心靈。在泥漿裏凍得手腳冰涼，赤著腳踩泥漿，我都經受住了。我還提出過合理化的操作方法，提高了效率。5月份將我們調到馬橋公社營部集中後，將上海縣部分分散在各生產隊的右派三十餘人集中起來（用公社民兵組織形式）下地勞動。

下地勞動對我來說最難的是挑擔子，因我個子小，只有一米六十高，二個肩壓不起。慢慢地我也練出來了。特別難的是從船裏挑擔啟糞（帶水的）到大田去澆，或挑入糞池裏。漲潮時，船與地面高低相差不多，跳板斜度不大，在跳板上挑七、八十斤重還可以。但落潮時跳板斜度大，走起來就很困難。有的人跌入河水中，我刻苦勤學，沒有跌入過。其實我帶有好奇心，邊幹邊學，同時也為了表示我在努力改造自己。出了勞動成果後，看著平整好的大片土地，也有成就感。有一段時期，二三天要拉一車蔬菜，二個人拉一輛車，走二個多小時到老閔行收購站去。天再熱，口再渴，我們都不敢從車上拿一個番茄吃，只得頭上包著濕毛巾挺著幹活。

過了幾個月，又把我們分散到下面生產隊去。不到二個月，又把大家集中起來到鄰松養鴨場去趕鴨子，共有二十多人。赤著腳趕著鴨子下水田，下茭白地，劃著只能坐一個人的小船到河裏和黃浦江裏放鴨子。有一次我劃的小船被水浪推到江中心去了，水流急，劃不回來，岸上的人

急死了，叫喊著要我不能站著，面朝船底睡下來，用二隻手劃。最後，我總算劃回來了，沒有淹死。集中在鴨場勞動的右派當中，有醫生，有原閔行鎮鎮長，他是老革命者，有小學校長，有政府工作人員，歲數大的一位近五十歲，我在裏面是最年小的，比較單純。要我做召集人，定期向派出所專管民警彙報情況。有一年地方上要選舉人民代表，所有選民必須參加。平時鬥地富反壞時總要我們這些人陪鬥，這次地富反壞不能參加，而我們卻和農民們一起坐在下面參加會議，這使一些幹部和個別民警也沒想到，我們是有選舉權的。從此他們對我們另眼看待，也比較客氣一點了。其實那些農民兄弟姐妹老爺爺老奶奶並沒有看不起我們，反而很同情我們，勞動時手把手地教我們，有時生活上也會予以照顧。

1959年國慶十周年時，閔行劃為上海市區，成立了閔行區。1961年底我調入正在籌建中的閔行劇院工作，二十五歲開始，一幹就是三十五年，直到1997年退休。

在這三十五年裏，我從服務員做起，一點一滴地邊幹邊學，將劇院所有的職務工作都幹了一遍。當過服務員，售票員，小賣部營業員，跑片員，電工，放映員（自學考出放映證），總務，最後是副經理，經理。

我是摘了右派帽子後到劇院工作的，照理是有完全的公民權，不可以對我另眼看待。可是實際工作中，處處受到不公平對待：幹重活有份，加工資沒份，不給參加民兵……。1970、1980年代凡是來劇團演出，特別是市里有名的國家劇團來，都要住在後臺演員宿舍。劇院要為他們供應熱水棉被蚊帳等，因我院條件差，棉被等要到老街去租，七八十條棉被要用三輪車去拉，我承擔了這份重責。平時還要用大煤爐燒水供應劇團，晚上要忙到他們演出結束後卸裝，洗腳洗臉水燒到夠用，我才能下班休息，總在晚上十一點以後。一次，有一位劇團的頭頭對我們劇院的支部書記指著我說：這個同志工作很認真負責，為我們劇團服務很好。當時我在附近工作，聽到了他們談話，支部書記說：“他是摘帽右派”。言下之意他是應該的，不值得表揚。我聽了後很生氣，也沒辦法。心想：原來他平時對我態度還可以，總是把工作壓給我，我還以為這是他對我的信任，看得起我，原來他是這種德性！從此他在我心目中沒有地位了，我瞧不起他。一個領導幹部這樣的水準低下平，也難怪當了三十幾年的科級幹部，升不上去。

1965年我交了個女朋友，是一起工作的放映員，已交往了三年。她知道我的歷史問題。可是劇院搞人事的幹部跑到她家（她家離劇院很遠，我們平日都是住在劇院宿舍裏）告訴她父母，說我是摘帽右派，又是生過肺病的（肺病是在下鄉勞動時傳染到的）。這樣，女朋友在父母面前招架不住了。後來文革開始後，我又被批鬥，她在父母壓力下，只得與我分手。看，這個人事幹部多麼缺德！這時我二十九歲，一直到文革結束後，我四十一歲時才解決了婚姻問題。

文化大革命期間，地、富、反、壞、右是同樣看待的。照理摘了帽子的不能算作右派，但是照樣要靠邊，陪鬥（鬥走資派），關在牛棚裏。過一陣，經過檢查交代，算通過了，參加勞動。我會放映電影，要我跟流動放映隊下工廠放映電影。當時放映革命樣板戲，派人跟我同去，監督我。放映時兩機交接時不許漏放一句臺詞一字唱腔。如發生此情況回來就要批鬥。於是我特別仔細，裝片時嚴格按照尺寸，總算沒有發生過事情。文革中發生的事情也很多，我住宿舍，



就抄我宿舍，翻箱子，將我在大學裏的檢查材料和日記全部拿去，日子過得提心吊膽。

1978年中共中央五十五號文件到達前，我姑媽（十二級幹部）問我，反右時我說了哪些話。以前她從來也不問為什麼我會劃成右派？這次她關心起這件事，要我把原來的言論，寫份材料給她看。她看過後，要我向師範學院寫一份申訴信，把這些問題（所謂反黨反蘇的言論）再敘述一遍，要求改正對我的戴帽處分。我信寄出後，學院知道了我的下落和要求，不久回函閔行劇院，領導轉給了我。函中除了說明我系錯劃右派並給予改正的文件，還有恢復我共青團團籍的證明，另有一張學院1958年印發、本應發給我的畢業證書，當時以我政治不合格為由予以扣壓，這次物歸原主了。

此後，我恢復了幹部身份。由於我努力工作，熟悉劇院所有的工作，後來我當了劇院副經理，經理。1989年我被批准加入中國共產黨，時年五十二歲。

### 劉 武 棄如便屨的最可愛的人

1957年反右運動中，劃為右派的解放軍軍官據非官方統計有二萬多人。可是有更多的復員退伍的解放軍、志願軍在地方上打為右派分子，昔日的最可愛的人，亦難逃覆沒的命運。

劉武（1937-）重慶市巴縣天水殿人。1949年考上重慶市的清華中學。讀了一年中學，便參軍加入解放軍三十一師文藝工作隊。1951年朝鮮戰爭爆發，他所在部隊編入中國人民志願軍，開赴遼寧省寬甸縣長甸河口，跨過冰凍的鴨綠江。文藝工作隊向過江的部隊作宣傳鼓動，提升士氣，他編小曲，唱快板，送部隊過江。1952年，志願軍建立特種部隊，他調到志願軍炮兵三十一師任偵察員，派往炮兵四十七團三連指揮所，當年加入青年團。

1953年，同樣加入志願軍的三哥劉子西在上浦東山反擊戰中犧牲，才二十一歲。富有戲劇性的是，母親寫信告訴他，父親和二哥在土改中槍斃。一家人中同時出現革命烈士和處決的反動地主，這是當年殘酷的階級鬥爭中司空見慣的現象。劉武靠近共產黨，立即向組織彙報，並表態堅決擁護政府槍斃自己的父親和二哥。這是作為黨員、團員的必須具備的六親不認的立場，否則自身難保。

1954年志願軍返國，他恢復解放軍的本來面目，駐浙江江山縣。翌年他放棄保送南京炮兵學院深造的機會，要求復員，繼續中斷的學業。回到家裏，家庭已由中產階級淪為城市貧民，全部家產沒收歸公。母親、妹妹、侄女三人擠住一間破屋，靠母親幫傭維生。劉武求助於在重慶市第三中學任教的堂兄幫助，才勉強在第三中學讀高中三年級。而他讀書時的生活費全靠三位戰友資助。1956年考入重慶大學電機系電力網電力系統專業。按當時規定，志願軍復員軍人享受四級調幹待遇，每月除十元五角伙食費外，另有十二元五角生活費。

不久開始整風反右，劉武已經是團支部書記。重大校長動員黨團員積極參加鳴放，指出如果黨有缺點錯誤，你們黨團員不聞不問，你們的黨性哪里去了？你們的黨團員是怎麼當的？有人遞條子問，如果說錯了話會受處分嗎？校長鄭重宣佈中共中央的政策，煞有介事地宣佈：打

擊報復是卑鄙的行為，大鳴大放說錯話的人一律不給處分。宣佈全校停課七天，以班為單位大鳴大放。

劉武給同學們推選為班級的鳴放小組長。他回應黨委號召，積極帶頭，挖空心思考慮了整整二天，想起了在遼寧省駐防時，聽房東講起過蘇聯紅軍紀律敗壞、姦淫搶劫；區人大代表等額選舉不能充分表達民意。他在鳴放會上代表班級發言，放出了右派言論。他還同意董時光的觀點。

6月8日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發表時，風向逆轉，大鳴大放轉為反右鬥爭。召開了劉武錯誤言論批判大會，從此大會小會不斷，劉武身心飽受折磨，人格受到污辱。污蔑他有殺父之仇，他的反黨言行是階級報復，發洩階級仇恨。

1958年停發他調幹助學金，反右補課運動中毛澤東親自到重慶，並在重慶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重慶市區內的地富反壞右以及政治不可靠的人統通驅趕到距離市區二十公里的地方強制勞動，以防止階級敵人破壞，保證毛澤東的絕對安全。就在這裏也抓緊了對右派分子處理。劉武戴上右派帽子，“保留學籍，勞動考察”。重大一百多名學生右派先在重大農場勞動，後送重慶市南桐礦區叢林鄉改造。

1959年在叢林鐵廠勞動二個月後，一百多位右派轉到陳舊落後的叢林煤礦勞動。叢林煤礦毫無安全設備，生產方式原始，每天步行一百多里山路運枕木，然後輪流去煉焦場煉焦，缺衣少食，忍饑挨餓。劉武忍無可忍，說道：“我們這樣的勞動考查，比犯人還不如，勞改犯人勞動，至少吃飯不用自己掏錢，勞動教養的人還有工資，牛和馬的主人還要給它們投草料。”他被連續批鬥了三個晚上。

他趁管教和難友熟睡的當口，隻身逃出煤礦。在那個紅色恐怖的年代，一個逃跑的囚犯是走投無路的，五天后不得不回到煤礦去“自首”，“坦白從嚴”，經過批鬥，他又多了一頂“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1959年他和一百多位難友又被重慶大學轉移到重慶市級機關的農場廣陽壩園藝場去勞動。重大交十元伙食費，其他費用自理。他雖然戴著反革命右派分子的帽子，但還有行動自由，回家探望了母親和妹妹。第二年他在廁所裏發現半張《參考消息》，上面登著英國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聯合招生的一則消息，專門招收大陸遇難的知識份子，可以免試入學。他的心又動了，決定冒險逃往香港碰碰運氣。當天便逃出廣陽壩園藝場，實行他的第二次逃跑。

他一路走一路打工，1962年辛勤勞動一年，積蓄了一百多元，去遵義、貴陽探望了戰友後，經柳州、桂林到達廣州、深圳。他知難而退，回到廣陽壩園藝場投案自首。這是他第二次投案自首，當然又受到從嚴處理。開除學籍，強制收容，勞動教養三年。在重慶市勞動教養收容站關押五個半月，由武警看押，從事搬運木材等重體力勞動。1964年轉入重慶市北碚區西山坪四川省公安廳重慶北碚勞教支隊新生園藝場第二作物區六中隊勞動教養。

在文革混亂不堪的年代，他在勞改場目睹了過去耀武揚威的當權派一個個倒臺了。中共重慶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鄭思群自殺身亡；四川土皇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西南局

第一書記、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成為西南地區頭號走資派，在萬人大會接受批鬥；他的妻子、四川省輕工廳長上吊自殺；大兒子在清華大學被紅衛兵亂棍打死，女兒在華西醫科大學光天化日底下遭人輪奸；中共重慶市委書記、市長任白戈挨打批鬥。

劉武本人勞教期滿解教，無法即時回家，留場成為二勞教。管教比勞教期間相對寬鬆，他便廣交朋友，奮力讀書。**1968**年，就業人員全部清放回家。勞教支隊給了他一次性勞教補助費二十元正，由一名民警送回家鄉，結束了四年另七個月的勞教生活，文革期間回歸動亂的社會，依舊過著饑寒交迫的生活。

**1978**年改正後先任重慶沙坪壩區汽車修配廠技術員，後任重慶市南開中學校辦工廠廠長，著有《一個青年大學生的遭遇》，記敘自己如何從最可愛的人淪為自己所信仰的中共的階下囚。

### 倪艮山 三叩鬼門關

蒙古族的倪艮山(1925- )遼寧省新賓縣人，一生在亂世苦難中掙扎搏擊，“更殘漏盡夢闌珊”。三次叩動鬼門關，第一叩錯劃右派，北大荒勞動教養，歷經饑寒交迫；第二叩文革牛棚，法西斯煉獄，飽受毒刑拷打；第三叩八十四高壽，遇兇險車禍，住醫院搶救，回天有術。三叩鬼門關均死裏逃生，在鬼門關前徘徊折返，閻羅大王拒之門外，知難而返。倪艮山老先生豁達樂觀，福大命大，高齡長壽。

艮山先生出生地遼寧省新賓縣，原名興京縣，一代滿清發祥於此。他的家鄉位於長白山餘脈山區，群山環抱，層嵐疊翠，林木鬱鬱。現名新賓滿族自治縣。祖居老屋是三間簡陋的農舍。祖父倪全自學成醫。父親倪文門在縣裏讀完中學，考上東北大學國學系。**1930**年大學畢業，張學良授予畢業文憑。校方推薦到奉天鐵路總站工作，九一八事變後，撤退到天津北寧鐵路局。

從**1933**年至**1946**年，他的小學和中學都是在天津上的。他視天津為第二故鄉，對天津持有濃重的依戀情結。天津人性格開朗豪爽，講義氣，能言善辯，人稱津油子、津片子，對他性格的形成有著潛移默化的作用。

中學畢業後，經父親托人進入天津鐵路局主計課工作。課裏有八個中國人，三個日本人。他在這裏親自經歷了八一五日本投降的過程，令他終身難忘。日寇投降不久，內遷的燕京大學回北平復學。他以試探心情應試，竟獲錄取。可是他父親工薪微薄，只能靠助學金勉強上學。

其間南京中央大學招生，條件優厚。他考中後無力支付路費，曾就助於燕大校長司徒雷登(時任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勸他繼續燕京學業，幫助他解決生活困難，完成學業，使他終生感激不盡。

燕大學習期間，他積極參加中共地下黨領導的學生運動，“沈崇案件”、“反饑餓反內



倪艮山 三叩鬼門關

戰”、“助學運動”等，凡是中共組織的學生運動，他都積極參加。還曾向駐在中南海的國民政府北平行轅請願示威和參加護校運動。1949年畢業離校前夕，加入了中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從1950年起，就努力爭取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

中共甫一掌權，便在高校畢業生中實行統一分配。他被分配到設在瀋陽的東北財經委員會財政金融處，初進中共機關，便感受到強烈的特權觀念和森嚴的等級制度。1952年底，中共撤銷大區行政機制，中央成立國家計劃委員會，他獲遴選上調。

調入國家計委的第三個年頭，按照讖緯侵象法，運交華蓋，流年不佳。1955年的肅反運動中，他這個一向擁共親共的積極分子竟被當作反革命嫌疑犯列作重點批鬥對象，隔離審查了一年。要好朋友之間，相互揭發。平日開玩笑或有口無心的話，都拿來據此大搞逼供信。他被懷疑為潛伏特務，積極申請入黨是偽裝進步，視為政治陰謀。更把他主動上交，表明自己思想觀念的文章拿出來斷章取義，攻其一點，不及其餘。

搞了一年逼供信，實在查不出涉嫌反革命的蛛絲馬跡，只得匆匆收場，給他一份不倫不類的手寫審查結論：一，經多次調查未發現參加過特務組織；二，犯思想錯誤；三，免予處分。他的女友也離她而去。中共搞階級鬥爭，用這種簡單粗暴的方法，把自己同志推向敵方營壘中去。

險風惡浪一波接一波，1957年是丁酉年。民謠說：“丁酉丁酉，雞鳴淚流；是非非是，鬼憂神愁！”他不輕信民謠讖語、卜卦圓夢，可是肅反運動心有餘悸，整風鳴放，還是免開尊口。他已成驚弓之鳥，深懼因言賈禍。

但是他是團小組長，又在爭取入黨，禁不住上級處長和黨支部書記一再動員、慫恿甚至軟泡硬磨，只得硬著頭皮帶頭發言。他發的言非常之和平細雨，嗅不出絲毫火藥味來。他說了四點：肅反擴大化，傷了一些同志；我國應由人治走向法治，建立健全法制；調整工資存在厚此薄彼；對幹部重使用，輕培養。

倪艮山又找到一位心上人，進入談婚論嫁的階段。距婚期僅剩兩個月，他又被揪出來了，不偏不倚，中了讖語。翻出他寫給中共國家計委關於肅反挨整的申訴報告，摘取幾句，上綱上線，還劃成漫畫。他的未婚妻是共青團委組織部長，被逼劃清界限，痛苦分手。

劃右後開除團籍，開除行政職務，在保衛科幹事押送下，送往北大荒八五〇農場雲山畜牧場勞動教養。他面臨著三大壓力：生活艱苦、勞動繁重、精神創傷。在完達山區履艱歷險，幾次險闖鬼門關，目睹難友們一個個倒下，埋骨荒山野林。

在北大荒的第三個年頭，中央派來考察團，研究對右派們的處理。除少數人仍留下，少數人摘帽回京，大多數人分去各省市，重新安排工作。他分配到遼寧阜新新邱煤礦，在新露天車間搞統計和會計工作，成天打算盤，與數字打交道。1961年底，中共礦山黨委宣佈替他摘去右派帽子。

這時他已三十六歲，孑然一身，住集體宿舍，睡通鋪大炕，生活極不方便。經過二次打擊，他對結婚成家已心灰意懶。經人介紹，認識一位元比他小十四歲的女會計。人家不嫌他是摘帽

右派，婚後生活幸福，育有四子。可是結婚不久，女方領導不滿她嫁給摘帽右派，加以歧視，把她精簡還鄉，生活平添許多困難，艱苦地撫育四個兒子。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狂風惡浪席捲了這個偏遠礦區，掃四舊、抄家、批鬥、揪牛鬼蛇神、戴高帽遊街，搞得倪艮山全家心驚肉跳，坐立不安。9月初，礦區機關開大會批判他，會後對他進行毀滅性大抄家，家中物品搜掠一空。他被趕下礦井勞動。

1968年5月12日，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那時已開始清理階級隊伍，下班後一群紅衛兵猛撲上來，將他掀倒在地，五花大綁，雙手反剪吊起，疼痛鑽心。一路上拳打腳踢，推推搡搡，押進牛棚。同時，進行了第二次毀滅性抄家。

在牛棚裏，各路打手隔三岔五地對他刑訊逼供，使用了各種刑具。打得他皮開肉綻，牙齒脫落，大小便失禁，衣服與皮肉粘連。他們這批垂死的專政對象，每天還要請罪三次，背誦語錄。

在牛棚煉獄熬過一百另四個日日夜夜，總算僥倖活了下來。妻子把他領了回去，一位老工人諷刺道“抓得正確，放得正確；完全正確，一貫正確！”1968年群眾專政的紅色恐怖中，阜新市打死一千一百人，阜新礦務局打死九百九十八人，他的礦區打死六人，遼寧全省打死二萬多人，全國打死了多少人呢？

1978年獲得改正後，調入中國地質礦產經濟研究院負責科研成果管理，並擔任學術委員會委員兼秘書，曾任中共中央黨校函授學院大專班學員畢業論文導師。

艮山先生第三叩鬼門關，則是在他八十四高齡的幸福晚年。2008年12月15日下午，他騎單車去醫院取化驗單和看醫生。年逾八十仍騎單車代步，足見他身體之健康。在穿越馬路時，被飛馳而來的白色轎車撞至該車前廂蓋上，頭頂撞破汽車擋風玻璃，然後滾落路旁。頭傷三處，血流如注。面部、圍巾、手套、上衣，皆染血污。從撞飛到落地，渾然不知。

救護車把他送醫院搶救，縫合頭部傷口，並作首次CT檢查。但見他顱腦飽滿，狀如五六十歲者，醫生嘖嘖稱奇。一周後再作CT檢查，顱腦出現積水並有萎縮，全身出現後遺癥。傷後病狀紛呈，厭食、便秘、胡思亂想、失眠、多夢、耳鳴、手抖。住院三十四天，方始復原，復又健步如飛。

肇事車屬民政幹部管理學院車隊，學院領導善後處理適當，賠償了醫療、精神、財產損失。艮山老人輾轉反側病榻之際，夢幻現實，百念俱生。回眸一生，三叩鬼門關，三次死裏逃生，恍如隔世。惟為人正直坦蕩，不做喪天害理的缺德事，才能面對詭譎兇險的人生。

#### (附)倪艮山 雲山畜牧場冤魂錄

令人痛心和難以忘懷的是，不少知識份子在北大荒公亡、病死或自殺，而永遠埋葬在黑土荒原或山林野谷中。他們的姓名和事蹟，已被無情歲月所湮沒。留下的只有蒿草叢生的無名黑土墳丘了。那些死在雲山畜牧場的知識份子，由於種種原因，當年所知僅為點滴情況；今天尚能回憶起來的，僅為冰山一角。為了紀念這些不幸的知識份子精英，史海鉤沉，昭烈芳名於此，

以昭後世。

劉琛（中國糧油進出口公司總經理），1958年冬伐木被樹砸死；  
施宗仁（國家經委十八級科員），1958年冬伐木被樹尾撞死；  
王光浩（北京新華書店總店職員），1958年冬修水渠爆破凍土被炸死；  
張建森（國家僑委幹部，歸國華僑），1960年夏死於運糧途中；  
馬鏡亮（國家經委二十級科員），1960年10月13日小雲山大會戰累餓而死；  
郭冠軍（對外文委二十級科長），1960年聽說摘帽興奮而死；  
汪之森（國家僑委幹部，歸國華僑），累餓浮腫而死；  
唐文彝（一機部十六級會計師，愛唱京劇青衣），餓死在雲山水庫水閘旁；  
韓俊廷（一機部科員），餓累而死；  
佟正溫（一機部科員），餓累倒在路上而死；  
劉湖琛（一機部十一級編輯，歸國華僑，業餘作家），1960年10月13日小雲山大會戰累餓致死；  
楊雋（輕工業部設計局十八級科員）1960年10月13日小雲山大會戰累餓而死；  
屠雙（交通部《汽車》雜誌十七級主編），1960年初餓累而死；  
余啟明（交通部工資局十九級科員），1960年餓累而死；  
安樹倫（交通部二十二級統計員），1960年餓累病死；  
趙琪（交通部十七級科員），1960年5月餓死於風雨途中；  
王九成（商業部幹部），挨餓浮腫死亡；  
孔憲中（商業部教員），1960年10月13日小雲山大會戰餓累而死，死時口咬玉米麵摻榆樹皮團子；  
王勤本（中國人民銀行幹部），夜裏餓死，天亮才被發現；  
陳伯龍（中國人民銀行幹部），1960年10月13日小雲山大會戰餓累而死；  
徐征明（中國人民銀行教員），1960年10月13日小雲山大會戰餓累而死；  
張宣（中國人民銀行科員），1960年12月餓累死在回北京的列車上；  
鄒執中（中央氣象局講師），排水勞動累死；  
羅相成（教育部十九級科員），1960年餓累而死；  
韓明德（北京國際書店科員），1959年春破冰修路時餓累病死；  
任耀章（防空軍高級幹校中尉助理員、副連級），1960年9月因餓累與肺病致死；  
唐奕驊（中央軍委桂林測繪學院講師），1960年10月13日小雲山大會戰餓累而死；  
杜恂凡（海軍後勤部中尉助理員、副連級），1960年11月因饑餓中誤食中毒而死；  
王廣謀（軍委總軍械部助理員，彈藥專家），1960年冬饑餓浮腫死亡；  
孔祥禎（軍委系統幹部），餓累致死；

佟藹成（一機部子弟學校十七級校長），妻離子殘，吊死在小雲山；

曹作仁（輕工業部二十二級辦事員），1959年10月15日投井自殺身亡。

——摘自倪艮山著《沉思集》——

以上三十三人都是在北大荒八五〇農場雲山畜牧場非正常死亡的右派分子，其中有六人在1960年10月13日小雲山大會戰的同一天累死餓死。中共經常採用大會戰的人海戰術，驅使人們出賣勞動力。

### 陳宣人 祖孫三代的乖戾命運

陳宣人(1904-1959)浙江省永嘉縣人。浙江永嘉位於雁蕩山的溫州地區，山明水秀，物產豐富，人傑地靈，是浙江省的魚米之鄉。1956年，當時的中共永嘉縣委書記李雲河，在全國首先提出“包產到戶”並付諸行動，受到嚴厲打壓，翌年劃為右派。



陳宣人、岳麗峰夫婦及子女，前左一為幼子陳景聖

陳景聖的祖父陳銘碩是清朝後期公費外派日本的留學生，就讀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學財經專業。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後，日方幾次三番請他出來，為日本人工作。都遭陳銘碩嚴詞拒絕，堅決不當漢奸賣國賊。最後在無法抗拒的情況下，絕食身亡，以死萌志。現永嘉縣誌上有此記載，表彰陳銘碩的高尚民族氣節。

在溫州商業專科學校畢業後，陳宣人在上世紀1920年代隻身來到上海，考進發明四角號碼法的實業家王雲五的商務印書館，由於勤奮精幹，沒到二年就被老闆提拔負責工會工作。

商務印書館是上海灘知名大企業，國共兩黨的必爭之地。陳宣人在商務印書館的才幹得到某國民政府官員的賞識，推薦他到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任職，不是什麼大使、領事、參贊之類的外交官，而是總務、後勤工作。抗戰時隨國民政府內遷陪都重慶。最高職位是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外交部庶務科長。

抗戰勝利後，陳宣人棄政從商，回到上海，他與國學大師顧頡剛合作，自立門戶，在虹口四川北路橋堍開設了一家《大中國圖書局》，顧頡剛擔任董事長，他任副董事長總經理。

1951年鎮反的時候，由於陳宣人有在國民政府外交部工作的經歷，雖然不是頭面人物，也算反動官僚，給他管制處分。這是對舊政權軍警官吏最輕微的處分了。當時叫作管制分子，照樣可以上下班領工資，像普通人一樣生活。但定期思想彙報，不准亂說亂動。出門辦事要向保衛科打報告，一舉一動受革命群眾監督。

公私合營後，陳宣人擔任私方經理，領工資，同時也還拿每季二百餘元的定息，家屬拿到文化大革命為止。1957年助黨整風時，陳宣人對管制分子的壓抑生活發了幾句牢騷，朋友們勸他收回，他的結婚介紹人、原商務同仁、時任上海第一人民醫院黨員院長薛朝聖也幾次規勸他

認個錯算了。可是陳宣人個性耿直，拒不認錯。領導翻出他的舊賬，新賬舊賬一起算，替他戴上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分子的帽子，並以歷史反革命罪判刑十五年。

上海市虹口區罪行較重的右派送往青海勞動改造，陳宣人在提蘭橋監獄很快便送往青海省距西寧市數百公里的共和縣洽卜洽農場。那時由於毛澤東三面紅旗的錯誤路線，全國出現大饑荒。1959年場部通知家屬，陳宣人死了，沒有說明死因。

陳宣人判刑勞改後。他家原來居住虹口區溧陽路一二〇八弄九號一座寬敞的花園洋房，這幢現在市值一千多萬的豪宅就在當年被“共產”了。1958年10月全家亦被掃地出門，這就是中國幾千年傳承的株連九族。陳景聖隨母親搬去外婆老家江蘇常州。

陳宣人妻子岳麗峰系常州女子師範學校畢業，與大律師史良是同學。因陳宣人事業有成，就在家相夫教子，七個子女有五個均是同濟、復旦等名牌大學畢業生。岳麗峰因有文化，多年擔任居民委員會主任。丈夫出事後，五個子女先後出道獨立，她攜帶二個讀小學的兒子。屈居常州。在文革中就為陳宣人這段右派歷史被紅衛兵批鬥、跪玻璃。六兒子陳景川陪鬥後精神失常，其後長達四十年住在常州精神病院。直到2008年8月才結束他右派分子後人的悲慘生命。幼子陳景聖，作為右二代，更有令人唏噓而奇特的經歷。

文革期間，陳景聖是五類分子的子女，唯一出路是上山下鄉，插隊落戶。改革開放後，剛結婚生女不久，便執意離家。1980年初到香港與母親、大哥團聚。可是文革耽誤了他的學業，只好在餐館做麵食師傅，低微的身份使他非常失落。餐館的同事介紹他認識了一位臺灣軍事情報局香港站官員。發展他成為臺灣軍情局的特工。經過簡單的訓練，他在1981年三次奉派返回大陸。他的任務是發展人員，搜集各種政治、軍事情報。得到了臺灣局本部的嘉獎。他大膽成功策反了原單位的中共黨總支書記、解放戰爭南下老幹部田某某，田後被判刑十年。他又策反另二名親友，他的頻繁活動終於被上海公安部門盯上。在1981年11月26日晚再想策反表哥時被捕，僅僅做了九個月的間諜，卻付出判刑十三年的沉重代價，走進父親呆過的地方——上海提籃橋監獄服刑。1993年11月減刑出獄。次年返回香港定居。

有三位女性為他做臺灣特務作出了犧牲。他的妻子無法承受丈夫是蔣匪特務的嚴峻事實，遺下女兒服毒自殺；母親在二年後痛苦病逝；他一直編織美麗的謊言欺騙入獄時才三歲的女兒。他在獄中托親友搞到一些香港郵票，貼在信封上寄給他女兒，騙她是在香港寄出的。他出獄時女兒已是十五歲的大姑娘了。當她從姑媽處得知父親的真實身份後，開始厭惡他、疏遠他、回避他。1996年女兒獲准來香港，父女相依為命。但女兒從來不叫他一聲“爸爸”，平時父女很少講話。直到患了不治之癥——白血病，臨終前才開口叫了他聲“爸爸”。

少年喪父，中年喪妻，晚年喪女，他沒有眼淚，只有麻木。為了給女兒治病，他舉債三十萬。年過六十，孑然一身，依靠香港政府的綜援金苟且殘生。2004年8月，陳景聖去臺灣軍情局表明身份，要求補償。軍情局表示十分同情他的遭遇，但法規不溯及既往，僅給他八千美元，以濟助方式安撫了事。

祖孫三代命運坎坷。祖父在民族存亡的關頭，不肯當漢奸賣國賊，肯死不屈，充分展示了



中國士大夫的愛國情操和骨氣；兒子像千千萬萬死因不明的右派一樣，成為階級鬥爭的犧牲品；孫子在改革開放的年代，淪為兩岸明爭暗鬥的受害人。陳宣人祖孫三代乖戾的命運是中國現代史的縮影。

## 李文書 長壽湖逃亡記

長壽湖位於重慶市區以北的長壽縣，是個方圓才幾十公里的小湖，一般地圖上還不易標出。然而長壽湖卻有一段不平凡的離奇經歷。

李文書（1939-）四川省鄰水縣人。家在縣城開一家小照相館。耳濡目染，從小喜歡繪畫，1954年初中畢業，已繪了幾百幅畫。家長、老師都認為他有天賦，決定由老師帶他上重慶報考美術學院附中。附中看了他的作品，十分滿意。可惜教育局有個區域限制，只准成都、重慶、昆明、貴陽、拉薩五座城市的學生可以報考。無奈之下，見西南人民藝術劇院演員訓練班招生。雖然他不喜歡當演員，但不妨試試運氣。

“有心種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他一考即中，二百五十人中只招五人，可見難度之大。偏巧這個演員訓練班設置在美術學院內，勾得他心猿意馬，又想學表演，又想學繪畫。



李文書

1956年6月，畢業演出一炮打響，分配到話劇團。不到一年，開始鳴放。看到人們給當官的提出許多意見，什麼任人唯親、獨斷專行、耍干女兒——搞年輕女人。李文書年少氣盛，充分發揮繪畫天才，繪了幅漫畫，指名道姓諷刺院長。他把院長繪成個肥頭大耳的羅漢，舒舒服服地躺著，旁邊有人打扇，有人撓癢，有人掏耳朵。院長則把一頂頂“優秀”、“先進”、“黨員”的桂冠分贈服侍他的人。

反右開始，便把他劃入反黨小集團，成員有李正、範國瑞等。他們已劃為右派，而他還沒有。領導找他談話，要他寫檢查、認錯。他強頭倔腦地不幹。領導前後找他三次，問他寫不寫，他都不寫。領導說：“不寫劃你右派。”他回答：“劃就劃，當右派有什麼了不起！”

當年他不到十八歲，為了劃他右派，將他出生年齡提前二年，就像如今的中國運動員一樣。1957年11月，送去南桐農村勞動。李文書年輕力壯，活潑開朗，農民喜歡他，二年後就摘帽了。

摘帽後仍是摘帽右派。正巧趕上餓死人的大躍進，中共重慶市委異想天開，要把長壽湖建成西湖一般的賽西湖。漁場成立一個美術組，調去右派美術家，他們中有四川美協國畫家、漫畫家、西南美院美術系主任等美術專才。用他們的手繪出個世外桃源烏托邦來，欺騙世人耳目。

李文書派去當副組長，讓摘帽右派去領導戴帽右派。可是他這個摘帽右派並沒有改造好，又和頂頭上司、漁場獅子灘區黨支部書記產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他認為這些畫家都是年過半百的老頭，身體不好，繪畫就夠了，不必勞動；黨支部書記認定凡是右派，只有通過勞動才能改造思想。黨支部書記辱罵他：“你別以為你摘了帽，告訴你，摘了帽也還是右派！”

大躍進變成了大饑荒，到處餓死人。美術組撤銷，還搞什麼“賽西湖”。1961年冬，有個小整風。他看見場部小食堂仍在大吃大喝，他忘記了1957年教訓，又寫大字報了。還把黨支部書記調戲熱帶魚研究所女娃的事捅了出來。

當地幹部都抱成疙瘩，這一捅捅出個馬蜂窩。他遭到連串打擊報復，強迫他幹重活，不幹完不准吃飯；通宵達旦雙搶，送去孤島懲罰，整整二個月孤單一人。

他實在忍受不了，第一次逃回劇院，要求領導調他到別的地方去勞動教養，長壽湖暗無天日，實在呆不下去。領導不予理會，他只得返回長壽湖。回到長壽湖，受到更瘋狂迫害，動員一些孤兒揍他。他又一次逃跑折返後，決定認真地逃亡了。二十二歲正當青春渾發，他以為有力氣就有飯吃。一路上餓殍遍野，他才感到死亡的威脅。他流浪到涪陵，坐船回重慶，再去鄰水。老家只有哥哥一人，因病癱瘓，眾多子女，無錢無糧。

聽說北大荒地廣人稀不缺糧，便想去闖關東。臨別哥哥送他一架父親開照相館留下的照相機，這是家中唯一值錢的東西。到了北京，身無分文，只得到民政局，要求把他當盲流收容。民政局將他和其他盲流一起押上火車，送回重慶。

在豐台站，他溜下車來，在賣照相機時被警察逮個正著。他坦白承認自己是右派，想去北大荒謀生，照相機是祖傳遺物。警察不信他的，在看守所關押二十多天，沒收照相機，仍把他押回重慶。

車到石家莊市，又給他逃脫了。遇到兩位河北熟廬縣農民。他們瞭解他的身世後，勸他不要去北大荒，那裏也沒得吃的。不如跟他們去內蒙古，管制不嚴，較易謀生。因此他改變了大方向，由“闖關東”轉而“走西口”。

在內蒙古走了三個縣，沒有一家肯收留他們。心灰意懶之下，三人分手。他又混上火車，流浪到北京，想換個地方去南方。於是主動找到收容所，慌稱湖南盲流，與大批盲流坐悶罐子車押往湖南。

車經武漢，又心血來潮，逃了出來。就這樣，他從武漢、長沙、衡陽、桂林、柳州、貴陽，一路流浪，一路乞討混飯；沒處住了進收容所，住膩再跑。最後在貴陽遇到一位河北寄縣郭姓農民，他對這位農民大哥的恩情刻骨銘心，至死不忘。

他們從收容所逃出來，相約去雲南宣威修公路。雲貴高原都是崇山峻嶺，一路上跋山涉水，風餐夜露，他的體力不支，終於病倒不起。那位農民沒有舍他而去，而是一路背著他，跑到苗寨，找老苗醫治病，把他從死亡邊緣搶救回來，令他終身難忘。

身體尚未復原，他們被當地民兵抓住了。這一回再無力逃跑。二位生死之交只好分手，各奔東西。1962年1月，他被押送到畢節看守所，關了二十多天。從此失去自由。送到重慶，劇團不收留，轉押進長壽縣收容所，最終回到長壽湖人間地獄。歷時半年，九死一生，經過十幾個省，繞一個怪圈回到原來起點。當他踏上獅子灘熟悉的土地，心中不禁一陣收縮。要殺要剮，悉聽尊便！

## 楊 平 死囚逃生記

1934年出生的楊平(1934-)雲南昆明人。1949年，他不到十五歲，便在昆明參加了中共地下黨的工作。在地下黨的安排下，懷著對共產革命無比崇敬和嚮往的心情，從昆明白區潛往遊擊區，成為一名小遊擊隊員。

不久可能水土不服，生起病來，於1949年12月9日從遊擊隊潛回昆明治病。恰巧這一天盧漢宣佈雲南起義，雲南和平解放，楊平由地下轉入地上。從此以後揚眉吐氣，抬起頭來做人。

他的紅小鬼歷史，使他很快調往北京，在中央工作。後又調到成都的國防軍工部門，當機要秘書和俄文翻譯，少年得志，一帆風順。1955年開展反胡風運動，憑著當年參加“爭民主，爭自由”的學生運動心態，居然十分幼稚地對批判胡風表示反感。為此受到長達一年的隔離審查。雖然事後黨委書記向他公開賠禮道歉，但是他心中不服氣，為自己抱怨，也為胡風抱怨。他一賭氣不幹這分優越的工作了，要求去上大學，考進成都電訊工程學院，那是屬於軍工系統的高等學校。

1958年大學畢業回原單位，正好趕上反右補課運動，領導反右的是原來與他作對的黨委書記。不言而喻，翻出他的舊賬，把他打為右派，送去勞動教養。他從勞教犯，逐步升級，升為反革命分子、勞改犯，最後成為死囚犯，歷時二十一年。其間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四歲兒子成為孤兒，流浪昆明，與年邁體衰的祖母相依為命。

他已被捲入一架巨大的絞肉機，再也停不下來，無法自拔。四人幫猖獗時期，他在雲南一所監獄裏勞改。因為學過電訊工程，叫他負責全監區的配電工作，一個人獨自吃、住在監獄外的配電間內。一位剛從警校畢業的年輕獄警看管著他。小警察出身幹部家庭，做過知青、當過兵。

開始時十分嚴肅，不苟言談。但這位小警察愛好文藝，混熟了當他瞭解楊平具有文化修養、對中外文學造詣很深時，便逐漸產生了好感和敬仰。在文革造成的一片文化荒漠中，他幾乎每天晚上都到配電室來，聽楊平口頭講述禁書，包括《悲慘世界》、《巴黎聖母院》、《斯巴達克斯》、《約翰克里斯多夫》以及《水滸》、《紅樓夢》、《三國演義》等中外古典文學精品。

聽楊平說書的人擴大到小警察認為可靠的刑滿就業人員，小小配電室儼然成為監獄裏的《裴多菲俱樂部》。如此放肆，給楊平帶來更大的災難。小警察得到一次探親假。他家在雲南邊境距國境線僅幾公里的軍墾農場，父親是場長。他與楊平告別時竟落下眼淚，把剩下的食品全送給楊平，暗示這一去不復返了。

可是過了一個月他回來了，悄悄告訴楊平，他已成功偷越國境逃到緬甸，捨不得家又回來了，還走私帶回一隻高級手錶。不到一個星期出事了，賣手錶時被捕。牽出男女關係問題，主動交代曾偷越國境。楊平自然成為教唆犯，腐蝕拉攏獄警。

他被押進一間長、寬不足二米的單人禁閉室，黑得伸手不見五指，長尾巴蛆蟲不斷從便坑爬上床來。每天四兩米飯或包谷，一盅冷水，賴以活命。就這樣足足關了一年另八個月。“反

革命教唆犯”查無實據，便採用刑訊逼供，無所不用其極，甚至抱來一大堆書核實。

審訊員曾給他看一首詩：“瘦骨嶙峋一秀才，敢死才上斷頭臺；屠夫縱有千把刀，億萬英雄自會來。”，逼迫他承認是他所寫，作為定罪依據。這首詩確系他所寫，並給小警察看過。但他咬緊牙關，抵死不承認，監獄當局拿他沒有辦法。

不論有無罪證，共產黨自有定罪辦法。監獄領導在全監獄犯人大會上作報告時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錯誤的”。毛澤東斃命、四人幫倒臺以後，監獄當局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依舊上報判處他死刑。他在死牢中耐心地等待秋後處決。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法院駁回監獄呈報的死刑判決書。獄方只得以“事出有因，查無實據”為理由把他放出死牢。次年改正錯劃，落實政策，恢復公職，他和朋友辦起民辦學校，不久成了家。

回憶當死囚犯的歲月，他在慶幸自己死裏逃生之餘，牢記著巴金的教導：“我們這些身經者，應該把那個黑暗時期的情形寫下來，留給下一代人作‘下結論，寫歷史’的真實材料。”以及“難道為了向前看，我們就應該忘記過去的傷痛？就應當讓我們的傷口化膿？”因此他寫了《死裏逃生記--我的1978年》。

## 管正和 父子右派

管正和（1932-）家庭出身工商業兼地主，四川省富順縣兜山鎮人。1952年畢業於宜賓縣財經學校，分配在宜賓供銷社工作。從小愛好文學，早期深受中共地下黨員的表叔別利華的影響。1945年他的表叔、中共地下黨員別利華自成都來宜賓教書，受其革命啟蒙。因表叔遭國民政府追捕，臨走時留下一本毛澤東寫的《新民主主義論》給管正和，他讀之再三，似乎見到了一線曙光，民主自由的新中國即將到來。

1949年宜賓和平解放，管正和十七歲起追隨革命，和同學們高喊口號，唱著《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走上街頭，參加遊行示威，迎接解放。他是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狂熱擁躉。

1951年土地改革期間，他用斧頭砸破家族牌位，表示與工商業兼地主的家庭決裂，滿腔熱情地投入革命，積極爭取加入共產黨。分配到宜賓縣供銷社工作後，一心效忠黨國，為實現夢想中的那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而奮鬥，工作認真負責，朝氣蓬勃。業餘時間常在省報和《觀察》雜誌上發表文章，揭露社會不公。因供銷社主任彭琳官僚主義，向縣人民政府申請將糞便由供銷社統購統銷，修建特大糞池失敗，造成二十多萬元損失。鬧得滿城風雨，怨聲載道，堪稱特大荒唐事件。他便寫出《糞的風波》在《四川日報》上發表。領導們恨之入骨，內定為最難管治的小幹部。

在這樣的背景下，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被誣陷為反革命右派分子，開除公職、送去勞教。他的父親也打成右派分子，在隨後的三年饑荒中餓死了。

1960年下放農村監督勞動時，有人捏造事實企圖進一步誣陷他謀害下放幹部鄧某某未遂，

便判處勞動教養。自此，淪為牛鬼蛇神。妻子受株連失去工作，禍及子女。那時，無罪偏說有罪，說不完的假話，道不盡的荒唐。頑石能變鋼，畝產十三萬斤糧，黑的變成白的，真的變成假的，善的變成惡，美的變成醜，餓死的只能說撐死。白日裏只准規規矩矩，夜晚時怕說錯夢話惹禍上身，人人自危。扼殺上百萬知識精英，使六幾千萬無辜百姓死于饑餓的罪魁禍首卻成了至高無上的神，受人頂禮膜拜。

1979年改正後，他感慨自己的一生，論曰：“二十二年，腥風血雨，油煎火燎，歷盡磨難，忍受骨肉分離之苦，飽嘗人間辛酸。在彷徨中掙扎，絕望中呻吟。茫茫苦海，何處是岸？古稀之年，回首往事，歷歷如昨，發幾聲呻吟，說幾句真話，撥開雲霧，還世道朗朗乾坤，謀子孫萬代幸福。”

他立志將畢生親歷苦難，供諸世人，撰寫了《來自死亡族群的報告》，發表在《自由聖火》、《觀察》、《民主論壇》等網站上。

### 劉振遠 年輕右派小醫生

劉振遠（1936-）藝名劉芳，1936年寒冬，誕生在黑龍江省賓縣新甸鎮一個木匠家裏。在寒風呼嘯、大雪飄飛的黎明前的黑夜裏降生，一出生就飽嘗大自然的嚴酷。七個月喪母，以後由外祖母撫養長大，外祖父母是農民，年老不能勞動，沒有生活來源，一家人一直在貧困線上掙扎。從六、七歲起開始跟隨外祖父打柴，燒火、作飯、取暖。春天跟隨外祖母去挖野菜，夏季采野果，秋季去揀糧，刨秋收後遺留在土裏的土豆來充饑果腹。兩個七十歲的老人養一個孩子，從一歲養到十歲該多麼艱難！孩子還要念書，兩位老人省吃儉用仍家貧如洗，房無一間，地無一壟。1945年東北光復，定貧農成份。父親劉永貴，十六歲學木匠，滿徒後在農村到處流浪做木匠活，製作傢俱，蓋房子、做農具，光復後進建築公司當工人，最後自己連一間房子也沒有。



劉振遠夫婦在包頭

他從小學到中學，總是在貧窮線上掙扎。只知道好好念書，長大後有一碗飯吃！沒有偉人那種一統天下，甚至吞下地球的偉大理想。中學時代寫的詩歌《春雷隆隆》面世後，這就是他走上文學之路的第一步，苦難的路！由於家境貧寒無力苦讀，只好考入鐵路衛生中專，在哈爾濱讀書三年。讀書之餘，幾年間寫了許多故鄉的詩，覺得故鄉是那樣的燦爛，人間是那樣的真好。

1956年3月他分配到當時的鐵道部第三工程局醫院工作，當時醫院醫護人員少，病人多，工作太忙，常常加班加點，到點了下不了班，吃不上飯是常事。醫院內部有人拉夥結派，而哈爾濱新來的學生因為不瞭解他們的內幕，哪一派也不加，這樣他們便成為眾矢之的。一些人打他們小報告，屢屢挨批，他們才知道人世間不都是好心腸的人，還有壞心腸的人！但是，更為

殘酷、更陰險的事還在後頭。

1957年5月反右派運動開始，鳴放大字報滿天飛。開頭他在運動之外，10月上邊派下來四個指標，他也就湊上了指標。大會小會點他的名，可是沒有言論也不行，領導小組於是召集他的同學一次次開會搜集材料：“他就沒有缺點？平時幾說些什麼反黨的話？你們沒直接聽到，聽別人說的也行，他寫了什麼反黨的文章沒有？”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他知道後就告訴他的同學們：“你們儘管編造好了。只要我沒有說過沒有做過，隨你們怎麼編！”同學們有顧慮，他反而做同學們的思想工作。說道：“只要是你們編出來的我都一一承認就是啦。”因此他們就編出了：“共產黨不懂業務，當時醫院的領導是外行，外行不能領導內行，門診主任像個小偷。”等等。

1957年反右運動正是國際上匈牙利反蘇事件之後，於是又加上了反蘇、反社會主義的罪名。他生長在東北，1945年親眼看見蘇聯紅軍在東北對中國人民燒殺搶掠，不但掠奪大量中國的財富，還強佔黑龍江以北大片中國的土地以及中長鐵路、旅順、大連港口……中蘇友好是賣國的騙局，史達林和日本人一樣是侵略者，匈牙利反蘇反社會主義暴亂是反對共產黨一黨專政，共產主義不得人心。事實上蘇聯老大哥幫助中國是假的，佔領地盤掠奪財富是真的。

即使有這些言論也還是不夠，於是研究他的成分，從成份上做文章。有人提出他是貧農成分，又有人提出：“給他改成地主成分，不就夠了嗎？他隱瞞地主成分，假報貧農，企圖反攻倒算鬧翻天，這不就夠右派了嗎？”共產黨用這種方法製造了多少右派？二十二年後共產黨自己說反右派是99.9997%的錯誤，就是這麼來的。

他戴右派帽子後，送去勞動教養。1958年6月發配往山西省軒崗築路，這個勞改隊有各式各樣的右派，年齡從二十一到六十歲不等。有的拖著病體，一樣的抬石頭、扛枕木、抬土，烈日下、狂風裏，敢於慢一點或是停一下的會得到及時的報應——毒打。再加上無窮盡的批判，當時住的是柳條編的泥棚或是帆布帳篷，吃的定量一再減少節約。由於活重、糧少，多數人吃不飽，又沒有任何補救辦法，漸漸一個個倒下，沒有名冊、沒有墓碑。

1959年後幾易勞動改造場所：西蒙大漠、桃司兔荒原、拉曾廟蒼宇、寧夏沙灘、松花江畔，把一生美好年華，耗在荒山，廢在大漠，被狂風卷走，被黃沙淹沒。勞動改造對他造成嚴重的身體損傷、終生的殘疾和心臟疾病。1962年後由於機構撤銷，人員疏散，他被發回原籍農村改造。

因為屢遭迫害，對象離散，她被逼與共產黨書記結婚。當時有一種逼婚的有效辦法，即共產黨書記為了搶奪一個右派分子的女人，對女人進行二十四小時輪流精神轟炸，直到投降為止。女的如果不和共產黨書記結婚，女的也劃成右派！這就是共產黨劃右派的另類標準，這種刻骨銘心的仇恨他怎能忘記？

右派的婚姻更同樣受到階級鬥爭的影響，右派分子只能和“地、富、反、壞、右”子女結婚。如果你不相信政治成分，只相信人性的結合，其結果就要承受百般苦難：戶口、糧食、生活來源等等生活難題應運而生。妻子找不到工作，老年無退休金，嚴重的身心傷痛和家庭苦難

更不在話下！

1965年，劉振遠已經三十歲了，眼看後代延續成問題，只好與沒有戶口的農村女人結婚，生了孩子也沒戶口，沒有糧食。吃糠咽菜太平常，向親戚借糧食吃，到最後沒有人肯借。因為借給你你也沒有糧食還，不如就是白給你們大人孩子吃。到這種地步已經沒有人格和尊嚴了。堂堂知識份子變成農民的敵人、國家的公敵。在無情的階級鬥爭中，被當作政治活靶打擊終生。

在那漫無邊際的改造窒息中，他唯一的精神寄託只有寫書、寫詩歌。天涯浪跡、顛沛流離，處處留下詩歌一首首，留下文章一篇篇，有人生的描摹，心靈的吶喊。大部分作品不是在和平、寧靜、輕鬆、鮮花、雨露中寫成，而是在精神、肉體、道德受到百般肆虐、饑寒交迫、貧病交加中堅持寫成。明月下，暗燈前，東方放明燈油盡，文字底稿堆零亂，酷暑風沙漫漫夜，嚴寒沱雨陰霾天……寫的春暖冬寒，寫的日出日落，寫的春華流失，寫的滿臉溝壑，寫的青絲落去，寫的白髮垂額。

1979年的改正是一紙空文，並無真正消除影響，恢復政治名譽。實際上仍處處受到打壓、歧視，提薪升職均無望。他本應回到醫院恢復原來的工作，可是把他分配到遠離城市的偏遠小車站當保健站醫生。生活上艱苦，孩子不能上學，苦不堪言。做醫療工作很少，整天打雜。工資只有同等學歷的一半，家庭收入只是同等學歷的四分之一。幾次升職、提薪，儘管考試合格都不行，發退休金只是同年同班同學的一半，對個人老年生活造成非常大的影響。而當右派期間二十一年無工資，沒有生活來源，忍饑挨餓，饑寒交迫，嘗盡人間各種苦難。現在兩口子每月生活費僅相當於二百五十美元。

當了右派還要株連後代，孩子上學、工作、進修都受到無形的影響。自己的孩子上學、進修的名額被別人頂替；自己孩子上班工作，被別人取代，右派的孩子靠邊站！

人間旅途，坎坷磨難，劉振遠一生寫下近萬首詩詞，四百多萬字小說。主要著作有《青松詩集》、《由河風光》、《劉芳詩集》、《藍天集》、《劉詩三百首》、《白雲集》、《千禧集》、《百花苑集》、《劉詩八百首》。

小說：中短篇：《松花江情曲》、《碑前幕後》；中篇：《哈爾濱雪》、《孤兒淚河》、《沙漠半日秋》；長篇：《風雨鐘山》、《清初疑案》、《僧尼傳奇》。

1980年後相繼參加了包頭市作家協會、包頭市詩詞學會、中國作家協會內蒙古分會、中華詩詞學會內蒙古分會等文藝團體。2009年，當年的小右派已經七十三歲，體弱多病，但心中仍然燃燒著要求徹底平反的烈火，心中仍然要求共產黨真正賠禮道歉三鞠躬，力爭追回失去五十二年的尊嚴，要求共產黨補發欠下五十二年的工資，並且給予國家賠償。

## 郭振乾 夾邊溝倖存者

1932年4月1日出生於河南開封的郭振乾已是84歲的老人了，他至今身體硬朗，思路清晰。關心國家大事，每天工作數小時，將互聯網上搜集的時政評論、政治經濟、歷史地理、養生健康、文化藝術、乃至生活常識輯錄成集，發送給親朋好友。有時興趣所致，自己動手也寫上幾

篇，以饗讀者。

郭老1937年入讀開封市第二小學，1938年開封淪陷，1940年舉家遷往陝西西安，轉入陝西省第一實驗小學。1944年小學畢業，考進潞河中學。次年日本投降，遂回開封繼續讀書。

1948年開封落入中共之手，他又隨全家遷回西安。1950年高中畢業，考進天津南開大學機械系。讀了一年便參軍，在空軍第二預科學校當文化教師。1955年8月調蘭州空軍第二速成中學任文化教師，被授予空軍少尉軍銜。

當年在學校裏開展的肅反運動中，他因發表同情胡風的觀點而受到重點審查。雖然沒作什麼結論，但他心中憤懣不平，因此在整風鳴放中向中共提出自己善意的意見。不料中了陽謀圈套，反右運動開始，便受到批判，被打為右派分子，開除軍籍，於1958年5月解送甘肅省酒泉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

夾邊溝勞教農場地處荒漠，土地貧瘠，荒無人煙，缺水少雨，是塊200多平方公里的未開墾處女地。甘肅省及部分全國各地右派約3000多人集中在這塊無房缺水缺糧的不毛之地，接受強制性的勞動教養。住的是自己挖出來的地窖子，簡陋無比；吃的是野菜稀湯。

當時正值毛澤東左傾狂躁癥大爆發期，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搞垮了國民經濟，反右後遺癥造成全黨全民虛瞞說假，為了完成虛假的高產指標，不惜奪走農民和市民口中維生的糧食。勞教中的右派更是深受其害，忍饑挨餓，很快得了浮腫病。

從1958年底到1961年短短的兩年中，3000多右派，餓死、凍死、病死的右派達2600多人，占90%。甚至發生活人吃死人的人吃人現象。有人上報中央，中央派下工作組，召開省委擴大會議後採取緊急“搶救”措施，把活著的還剩下口氣的人送回城市。

1962年底本來身體健康的郭振乾早已餓得奄奄一息了，眼看尚可走動的右派一個個離去，躺在土坑上直焦急。幸好他媽媽得到消息不顧年邁體弱趕到夾邊溝來接他。母愛的力量是無窮的，1962年1月2月老太太冒著嚴寒，把掙扎在死亡邊緣的兒子背回蘭州搶救。

在母親和家人精心調理下，郭振乾才慢慢地恢復了健康。1965年他被調往甘肅正寧縣農機修造廠當翻砂工，那時他仍載著右派帽子。直到1979年中共在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錯案期間，他的右派身份才得到改正。1980年他終於調到西安市木材公司擔任生產技術科副科長，人到中年才得到發揮一技之長的機會。

在毛澤東時代，人們流傳著一句話“在共產黨領導之下，什麼人間奇跡都可以創造出來”，這句話想不到在郭振乾身上也應驗了。像許多摘帽右派那樣，他被中共黨組織看中了，1992年退休前夕，把他發展入黨。共產黨善於變帽子戲法，剎那之間，可以把你從左派變成右派，給你套上個荊棘，讓你永世不得翻身；反之，剎那之間也可以把你從右派變成左派，戴上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員桂冠。然而郭振乾依然是郭振乾，他的民主自由理念絲毫沒變。

可惜他還來不及充分利用他這頂桂冠，當年的4月1日便光榮退休





了。

## 曹家同 煤窯勞改犯

這是一張珍貴的老照片，攝於1958年嚴冬，距今半個世紀，僥倖逃過了多次劫難得以保存至今。照片上兩個大男孩是當年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現均年過八旬，已是兩個老耄矣！作家杜高，當他見到檔案袋裏裝的黑材料，驚呼“這不是我！”當曹家同從箱底翻出這張陳年舊照時，也不由驚呼：“這就是我？”沒錯，是他。他現將此照供親友及右友共賞，並將拍攝此照的前後故事介紹給大家。

1958年秋，全國暴風驟雨似的反右運動進入尾聲。北京大學反右頭頭黨委書記陸平奉旨將全校右派師生分門別類予以懲處。當年北大學生八千多人，劃了七百餘名學生右派；還有七百餘名不戴帽右派雅稱“中右分子”。西語系學生四百多人，劃了四十餘名右派。他所在的英三，一個年級三十三人，劃了七名右派。他們是：徐烈炯（上海人）、潘衍明（來自上海）、陳玉麟（來自上海）、周桴梓（上海人）、朱辛介（上海人）、曹家同（上海人）及調幹生謝叔寒。右派占了全班學生總數的21%。另有一個女同學阮季霆（上海人）沒有戴上帽就給活活嚇死。當她見到這麼多同學好友被劃右派，不由膽顫心驚莫名恐懼，連著數夜夢中驚醒，從床上跳起，喊道：“我是自覺自願的右派分子！”由於過度驚嚇，不幾天便獨自去了市內大同酒家，喝完了一瓶萊沙爾，痛死在衛生間。她的好友、戴了帽子的陳玉麟受到多方盤問，也許想找點材料追認阮季霆為畏罪自殺不戴帽右派分子。到1979年，他們七個右派都先後摘帽改正，唯有阮季霆，至今誰替她申冤叫屈呢？她無帽可摘，無錯可正，死得慘，死得冤。如果閻王受感動，給她改正，使她重返陽世，她將去何處尋回附魂的軀體呢？

陸平本人也沒好果子吃，翌年便給戴上了右傾帽子，戴高帽，自鳴鑼，遊大街。陸平有句名言，逢會必說，“哈哈，右派嘛，兔死狐悲。”他指戴了帽的右派為兔，不戴帽的及廣大有良知的群眾為狐。兔死，狐悲了；然而兔死狗烹了；最後，狗死兔悲了。兔為狗的下場可悲。

曹家同由於身背家庭出身包袱，鳴放中始終不敢亂說亂動。沒發一言一語，沒寫一字一句，怎麼會榮獲此桂冠的呢？徐烈炯（以後任香港城市大學中文、英文、翻譯三個系系主任）在當年寫的《狼吃小羊》一文中為他鳴不平：狼要吃小羊，找了一堆胡攪蠻纏的理由；左棍要找茬劃他為右，找了一些張冠李戴的理由。徐烈炯為了這張大字報也被套上，並封為小集團軍師。他們幾個右派都是來自上海，就成了上海幫右派小集團。可見“上海幫”並非始于王、張、江、姚，而是始於北大西語系三年級！

京西門頭溝齋堂鄉窮鄉僻壤，是北京大學下放幹部和右派學生勞動察看的基地。化學系的下放幹部、右派員工和西語系的右派學生分配在馬欄村——“窮中窮”村。全村可耕地全在山坡上，一片一片的梯田，只能使喚大騾子耕地。當然以耕種玉米、高粱、小米為主。村民的糧食自然是窩頭、碴子粥。初到時，出工幹活後，儘管饑腸轆轆，卡在嗓子裏的那塊窩頭就是咽不下去，掙扎著進了口，又怕掙扎著不能出口。此窩頭不是當今市上出售的那種甜饅饅。

馬欄村雖窮，村民善良樸實，沒有一個人或村童追在我們後面唱“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他們在背後偷偷互相說：“這些就是說了老實話的好人哪！”。

馬欄村有兩個右派小組。曹家同所在的組除他外還有譚平、蔡英俊、蔣季傑、袁勳培、杜連貫、劉文玉、賀萱（女）、裴虎叉（女）及組長許明龍。另一個組有：朱承立、馮秀純、畢汝濫、朱自……等人。其他系的右派學生分配在齋堂各村，以火村為主總，人數不詳。

馬欄山地，卻有漫山遍野的核桃樹。到了秋天，走哪兒都可隨手揀起幾個核桃，用小石塊一砸，便可品嚐噴香美味滋補的核仁。村裏還有一個小煤窯——最原始的挖煤方法。農閒時派工挖點煤用毛驢馱到鎮上便是現錢。坑道低矮、狹窄。拉煤用竹筐，下面按上兩片溜冰鞋似的刀片，在坑道的橫木棍上拉曳。他們當拉煤工，頭套乙炔燈、上面滴水、腳下打滑，裝上一筐煤便像老牛拉犁奮力前進，一旦拉出洞口便過磅記工分。曹家同體弱，裝得少，拉得慢，往往不達定額，屢遭過磅掌櫃的白眼。他心想，“拉多了你能摘我帽嗎？”時值寒九天，洞外冰天雪地，洞內猶如開著煤氣。穿棉襖洞內太熱，穿單衣洞外受不了。於是他那件唯一的毛線衣便成了最適宜的工裝。每天流汗、捂干，再流汗再捂乾……不幾天毛衣上出現了一片白花花、蠕動著的喝人鮮血的老白虱。他把毛衣塞進農藥袋，第二天把死虱體抖擻抖擻，又穿上拉煤去囉！不幸中之大幸，他沒被瓦斯燒死、炸死；沒被塌方砸死、壓死。出點力、出點血不算什麼。不然他的右派改正通知書就會送到閻王府去，那裏的冤魂或許正在討論什麼莫名其妙的《南京政府向何處去？》

一天，乘煤窯維修，他與化學系的右派員工杜連貴溜躑到十幾里地外的小鎮，先上小餐館，治療“胃虧肉”，然後去小相館，瞞了身份，好話謊話兼說，拍下了這張跨世紀的瞬照。此非文物，而是證物，它有力見證了那個年代的政治運動是多麼荒唐的悲劇和鬧劇。

1958年，直至1961年，勞動察看了三年多，絲毫不見允許返校學習的跡象。目睹總路線、人民公社、大躍進三面紅旗天方夜譚似的大好形勢，人禍天災逐日升級。吃飯不要錢，吃完白麵吃大米（下放幹部和學生的糧票中，含有細糧），吃完了大米吃玉米、小米，吃過了玉米、小米，開始向樹皮、樹葉進軍。眼看挨餓日子迫近，不得不作自謀生路的打算。一天讀報，見到《人民日報》上刊登一則消息：非洲阿爾及利亞招募各國志願兵，抗擊法帝國主義侵略。他腦子一熱，匆忙寫信願當志願兵。信封上的收件人地址百分之百肯定是阿爾及利亞駐北京大使館，絕對沒錯。沒想到郵遞員仁兄是文盲，不識字，把信送到了北大黨委齋堂支部。原來給友好國家使館寫信是犯了法，犯了憲法中規定的公民有自由通信的大法。嗚呼，慘了，他又栽了！升級換了個勞動營繼續深造。幸好，在給使館的求職信中，沒寫一句反動言論，逃脫了現行反革命的帽子。

黨委用小車送曹家同去了當年關押李大釗和政治犯的草嵐子胡同。在監號裏用餐時他說了一句大實話：“這裏吃大米飯，蘿蔔湯上面飄著油花！”立即遭到同號（子）三十餘人的大聲斥責：“放毒！你在放毒！外面沒有裏面吃得好？”接著要批鬥他。管理人員明白真相，把此事壓下來了。

在草嵐子胡同呆了幾個月，接著輾轉遣送，從草嵐子到北苑化工廠、第二模範監獄、河北省茶澱農場、唐山清河農場的583農場、584農場、585農場，只差沒去586——那是埋葬病死、餓死勞教分子的墳場。1965年全部北京市右派集中到大興縣團河農場三餘莊。從近六百名右派逐漸減少到最後最頑固的七十二“賢人”。其他人一小批一小批地由小院搬到大院改當摘帽右派留場就業、改當改造好的“新人”去了。有的去了新疆，有幾個被當現反槍斃了。

1969年，“永遠健康”一聲令下，北京市地、富、反、壞、右、資……等黑九類人員全部掃地出門。他被遣送到安徽銅陵對江的普濟圩農場——屬於上海市的勞改農場，直到1979年摘帽改正，戴了二十二年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帽子才終於摘掉，二十多年各種變相的勞動改造才終於完畢。這不是因為他思想改造好，認罪態度好，勞動表現好，更不是由於靠近政府、與壞人壞事鬥爭好（包括小報告打得好），而是全國人民心知肚明的那樣：死了一個人，解放了千萬人。此人不死，大亂不止！是啊，是啊，不然哪有今天！

## 第四章 中國共產黨

### 綜述 清黨是反右運動的終極目標

#### ——中共建國後第一次最大規模的黨內鬥爭

對於上世紀1950年代發生在中國大陸的反右派運動，中共及其歷史學家始終把它定性為一場整肅知識份子及民主黨派的運動，反右運動的性質如同中國現代史那樣，早已被官方蓋棺論定了。五十三年光陰荏苒，體制內外的歷史學家和當年受害者反思後挖掘出來的史料證明，毛澤東發動“陽謀”的最終目的，如同以後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四清運動和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一樣，都是為了打擊黨內的反對派，保持他的江山安泰。這批黨內右派中，首當其衝的是不聽中央號令的諸侯、地方主義份子和地方民族主義份子、打遊擊和地下黨出身的原白區黨內幹部、黨內知識份子和黨內民主派。因此本文將剖析毛澤東發動反右運動的最終目的是“清黨”，旨在建國後第一次大規模清理中共黨內門戶。

#### 一，中共黨內揪出多少右派

反右派運動究竟打了多少右派，有三種不同說法：第一種說法是官方認定的五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七人；第二種是加上中右份子、內控右派、疑右份子以及工、農、中小學生中的反社會主義份子和壞份子共約一百三十萬人；第三種再加上受株連者共有三百多萬人。本文所探討的黨內右派以官方認定的第一種數字為基準。

中共對於黨內右派的數量始終諱莫如深。如今只能依據三個文件來推算黨內右派數量。中共官方把反右運動劃分為鳴放、反擊、補課、處理四個階段。這種劃分方式很容易使人忽略1958

年反右補課運動的特殊重要性。

毛澤東不愧為偉大的政治家，早在建國伊始，他已敏銳地看清，共產黨江山變色的危險在黨內，黨內在高層，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1956年11月10日**中共召開八屆二中全會，**14日**晚毛澤東作了臨時發言。他說：“東歐一些國家不斷在政治上混亂，基本問題是領導層沒有階級鬥爭觀念，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新老反革命沒有搞掉，這方面我們要引以為戒——我敢說，我們黨內也有階級鬥爭。”劉少奇不大同意他的看法，急忙補充道：“毛澤東同志講話是他個人意見，中央政治局沒有討論過，會議要備案。”原來毛澤東早已有在黨內進行階級鬥爭的打算。

**1957年**他搞“陽謀”，由外及裏、自下而上，最後藉助社會上的反右清理門戶，消除黨內隱患。反右補課表面上是在湊右派指標，完成毛澤東和中央反右領導小組層層下達和不斷升級的定額。實際上旨在清黨。

**1957年**反右開始不久，毛澤東即已提醒親信：“請各地注意黨內的鯨魚”。**7月28日**《人民日報》社論《反右鬥爭是對於每個共產黨員的重大考驗》，明確指出有人是資產階級右派的“內應”。同月在青島舉行的省委書記會議上，毛澤東進一步挑明：“所有的人都要過社會主義關，某些老幹部特別重要，其中有些人是過不去的。實際上這次整風在黨內就是清黨，但對外不說。”

毛澤東這種指導思想的背景就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風雲突變。**1956年**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大所作的反史達林個人崇拜的秘密報告和安娜·路易絲·斯特朗的《史達林時代》，在中共黨內高幹中廣泛流傳。毛澤東的接班人、親密戰友和掌權高幹中不少出身於知識份子，搞過學生運動和地下黨，受過西方式的教育。他們的心底深處深埋著民主意識。毛澤東清醒地察覺，這些人便是他最大的敵人，遠比黨外右派危險、可怕。

反右補課即以清黨為主，毛澤東稱之為“清理階級異己份子”。不論給他們戴上什麼帽子，冠以什麼份子，目的都是為了排除異己，鞏固中央集權，維護一黨專政的局面。因此其打擊的矛頭只有一個，即所謂的“混進黨內的階級異己份子”。如果說在反右運動中揪出的最大幹部僅僅是二位中央候補委員，即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和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副省長古大存，到了文化大革命已經揪出了毛澤東的接班人、國家主席劉少奇、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以及一大批開國元勳、元帥將軍。毛澤東是秦始皇、劉邦、朱元璋式的封建獨裁暴君，決不是什麼馬克思主義者。

文化大革命是從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開始的，打擊地、富、反、壞、右、資、資產階級學術權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紅衛兵造反派抄家掃四舊僅僅是毛澤東發動群眾的手段。待群眾發動起來了，便將鬥爭鋒芒撥向真正打擊的目標——睡在自己身邊的赫魯雪夫。毛澤東搞群眾運動的手法一貫是打迂迴戰、包圍戰，掃清周邊、攻其核心。反右運動從以民主黨派、知識份子、青年學生、社會基層為主的周邊開始。當群眾發動起來周邊掃清了，便將階級鬥爭矛頭即刻轉向黨內。假如說毛澤東的真正戰略目標在反右運動中尚算遮遮掩掩、避人耳目的話，

到了文化大革命便昭然若揭了。其目的只有一個：生前怕人奪權，身後怕人鞭屍。

1957年5月15日毛澤東在《我對局勢的幾點看法》的黨內指示中寫道：“看來黨外知識份子中，右派約佔15-20%，可能是保守的。黨內知識份子約佔5-10%。民主黨派中右派可能高達20%以上。高等學校中的右派也不會少於10%。”

黨內右派5-10%毛澤東是怎麼樣“計算”出來的呢？1956年中共八大時有黨員一千二百萬。從八大代表成份分析，60%為工農，工農不劃右。40%可以劃右的黨員包括知識份子、幹部、軍官和其他階層，共有四百八十萬之眾。依照毛澤東在反右前夕信口開河訂下的5-10%估算，黨內右派可高達二十四萬至四十八萬，大大超出當時全國官定右派總數，顯然靠不住。

1959年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辦公廳發表的黨內文件《縣委書記以上受到開除黨籍處分的決定彙編》和1958年11月7日中共中央組織部紅頭文件《關於今後接受黨員工作的意見》指出，自1957年6月至1958年6月，黨員總數共減少二十七萬人。扣除自然死亡、劃右以外的其他因素、因內控右派或中右而勸退及取消預備期的黨員，分散在各行各業黨員右派總數應在二十萬以上，佔五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名官定右派中的36%以上，在反右派運動中受整敕的黨員數量之大、比例之高，正是中共至今秘而不宣、刻意隱瞞的原因之一。

這個資料的另一個印證是在1958年3月9日至 26日於成都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毛澤東講話。他認為黨內反右運動“實際上是一次清黨，一千二百萬黨員中，清除二十萬，百把萬，不算多。”毛澤東不是數學家，在國家建設方面的資料搞得一蹋糊塗。然而在決定政治運動階級鬥爭的打擊指標方面，卻十分精確。毛澤東訂下的黨內右派指標中的二十萬底線，正好符合我們折算的資料。

這個數字還不包括黨內劃的內控右派、中右份子，因為黨內也和社會一樣要劃左中右。他們僅受除不開除黨籍以外的其他黨紀處分，對外保密，組織部門掌握。喬冠華和楊獻珍便是這一類人。外交部部長助理喬冠華贊成實行美國國會兩院制。部長陳毅說：“喬冠華是外交部右派的首領。是露骨的，徹頭徹尾的反革命，足夠定為右派。”但處理時報中央書記處，批覆僅給予“嚴重警告”的黨紀處分，不戴帽、不開除黨籍；中共中央黨校校長楊獻珍起初一個右派也抓不出來，劉少奇警告他：“我看你就像個右派。”中央書記處撤了他的職，他只得讓秘書馬鴻模頂替他當右派。

## 二， 黨內右派是些什麼人

更為嚴重的是劃右黨員的身份。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辦公廳在1958至1960年期間出版了內部發行的五卷本《關於清除黨內的右派份子決定彙編》。其中披露黨內行政十三級以上高幹右派份子和反黨反社會主義份子材料二百八十五份，除三十三份是1957年和1959年分別處理的個案以外，其餘二百五十二份材料都是在1958年反右補課運動中判定的案子，即在1958年反右補課中，行政十三級以上黨內高幹中劃的右派份子和反黨反社會主義份子佔總數的88.44%。在這二百五十二個案例中，省部級以上高幹一百多人，有三十九個是集團性案件，即“右派反黨集團”和“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或“地方民族主義反黨集團”案。

他們之中有中央候補委員、部長、省委書記、省長、市地縣委書記、中將、少將、大校，身居高位要津，難怪毛澤東擔心江山變色。

毛澤東在1957年底訪蘇歸來，來不及揮去身上的塵土，便馬不停蹄地數度離京，至1958年三、4月間，共密訪全國近二十個省、市、自治區。1957年12月秘訪上海、杭州，揪出上海市委工業部副部長周克、同濟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薛尚實、浙江省長沙文漢、浙江省委宣傳部代部長陳修良、副部長兼省文化局長黃源等反黨右派集團。

1958年1月密訪山東、安徽、廣東、廣西；1958年2月東北三省；3月至4月武漢、廣州、浙江、甘肅、河南、河北、雲南、青海、新疆，替當地挖出了一大批省部級的黨內“定時炸彈”，即混進黨內的階級異己份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份子、地方主義份子和民族地方主義份子。把他們一律開除黨籍，清除出黨。被毛澤東在巡遊中揪出的主要有十大反黨集團：

1，以浙江省省長沙文漢為首的沙、楊（思一）、彭（瑞林）、孫（章祿）地方主義、宗派主義右派反黨集團；

2，以甘肅省副省長、省委常委孫殿才為首的孫、梁（大鈞）、陳（成義）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

3，以安徽省省委書記李世農為首的李、楊、李、陳右派反黨集團；

4，雲南省委常委、省委組織部長鄭敦、副部長王鏡如右派反黨集團；

5，以廣西僮族自治區副主席、常委陳再勵為首的陳、王、駱、王、廖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

6，以青海省省長、省委第二書記孫作賓（極右份子）為首的青海省委右派反黨集團；

7，河北省委常委劉洪濤右派反黨集團；

8，以司法部常務副部長、黨組書記王翰為首的司法界右派反黨集團；

9，遼寧省委書記王錚、省委書記兼省長杜者衡為首的遼寧省右派反黨集團；

10，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

毛澤東用出巡密訪的辦法發動政治運動整人，即由反右運動始，以後各大運動都沿用這種方法，直到文化大革命終止。

### 三，黨內右派的構成

黨內右派首先是一批中央和地方具有民主意識的各路諸候。1925年加入中共的浙江省長沙文漢主張黨政分工，被誣指為是“資產階級政權觀點”，他對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嚴格執行政策，誣為“包庇右派”；1932年入黨的監察部常務副部長兼黨組書記王翰主持全國監察工作，反對用政治運動階級鬥爭取代司法監察，反對製造冤假錯案；中宣部秘書長兼機關黨委書記李之璉與副書記兼全國作協書記黎辛，在批鬥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中，抵制中央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他們均被劃為右派。黨內民主派大多受過高等教育或學生出身，比較容易接受民主意識。

1955-1956年合作化高潮中與毛澤東唱反調首次提出“包產到戶”並付之實行的年僅二十六歲的中共浙江省永嘉縣委副書記李雲河和中共廣西環江縣委副書記兼縣長王定，都是黨內

民主派的代表人物。王定還是地方主義份子兼極右份子。

其次，利用反右運動打擊報復黨內對手，也劃了一大批右派。青海省委書記兼省長孫作賓是1920年代入黨的唯一的黨內極右份子，他的罪行僅僅是在黨內批評省委第一書記高峰作風專斷。

改正後曾擔任上海市委組織部長的周克在1956年7月舉行的上海市第一次黨代會上對中共中央華東局和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民主作風不正常提出意見；同濟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薛尚實指責柯慶施獨斷專行為黨內一霸，演成滬上轟動一時的“一霸事件”。他們幾人均被柯慶施打成右派。

中共中央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與柯慶施互為仲伯，將無記名選舉中不投他票（經公安廳秘查）的重慶市委書記處書記兼宣傳部長張文澄和批評他“一言堂”家長作風的成都市團委常委兼宣傳部長黃一龍劃為右派。經過黨內反右，中共全黨萬籟無聲，無人敢提不同意見，無人敢說真話。其直接後果就是餓死三千七百五十五萬八千人的大躍進。

第三方面的黨內右派，是通過反右清洗白區武裝鬥爭和地下黨出身的幹部。毛澤東認為地下黨成份複雜，多為知識份子，不可靠。不宜擔任黨政第一把手（正職）。1949年發至各大軍區首長的內部絕密文件中，下達了處理南京地下黨的十六字方針：“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南京共有二千名地下黨員，兩次整黨處理四百六十六名，開除二百另五名。曾任南京地下黨市委書記的陳修良本人一路降職，直至戴上極右份子帽子。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袁永熙是一二九學運領袖、甘肅省委常委、副省長孫殿才出身學運工運，他們同成千上萬地下黨出身的黨內幹部一樣被劃為右派，打入另冊。

1984年胡耀邦執政時期，中共中央決定全面處理地下黨歷史遺留問題，當年9月中共中央組織部在昆明召開“十六省市處理地下黨歷史遺留問題座談會”，僅江西省委就成立了“處理地下黨歷史遺留問題辦公室”，工作二十多個月，恢復江西省地下黨成員六百五十二人黨籍，其中有一百二十七名隸屬中共閩浙贛邊區城工部的地下黨員因城工部領導人出了差錯，都當叛徒慘遭槍決。另有一個中學生地下黨小組胡顯中等五名黨員連同他們的入黨介紹人統通劃為右派份子。

第四方面是因犯“地方主義或地方民族主義錯誤”而被劃為右派的黨內幹部。1958年3月，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指出：“反地方主義，全國各省市都要進行。地方主義者，實際上是右派，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對地方主義不要讓步，要派一批外地人去廣東，廣東幹部可調一批到北京來。泥裏摻沙，沙裏摻泥。改良土壤。”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廣東省首先把第二次反地方主義運動納入反右運動的軌道。廣東省的反右鬥爭的重點便是反地方主義。廣東省全省共揪出右派份子三萬六千八百另八人，因犯地方主義錯誤而劃為右派的各級幹部有一萬二千多名，佔全省右派的三分之一。

廣西、甘肅（含寧夏）、雲南也揪出了大批地方主義反黨集團，謝富治僅在滇東北就揪出散佈在昭通、魯甸等十一個縣市原邊縱地下黨地師級、縣委書記、縣長等各級幹部二千多人。

謝富治在雲南省委擴大會議上瘋狂叫囂說：“要像挖山藥蛋一樣在地下黨、邊縱中挖右派。”

至於地方民族主義份子，中共中央統戰部在《關於反地方民族主義鬥爭及其擴大化的說明》中透露：“由於對當時階級鬥爭形勢估計過於嚴重，在反對地方民族主義鬥爭中犯了擴大化的錯誤。一是擴大了範圍，有些地方由共產黨內擴大到黨外……，二是混淆了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把大量人民內部矛盾當作敵我矛盾來處理。據全國二十四個省、市、自治區統計，共劃少數民族右派份子五千人，其中劃為地方民族主義份子的共一千七百人。”

中共在意識形態文宣部門的各級領導，成為黨內右派的第五方面軍。從中央到地方幾乎一網打盡。他們中有中宣部秘書長兼機關黨委書記李之璉、解放軍總政文化部長陳沂少將、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馮雪峰、浙江省文化局長黃源以及一大批中共各級分管意識形態和筆桿子的宣傳部長。

黨內右派第六方面軍是中共的槍桿子——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軍共揪出一萬五千多名右派份子，以批判劉伯承、蕭克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為主線條。

#### 四， 中央及地方揪出的黨內右派集團

根據中共中央監委辦公廳在1958至1960年期間陸續出版、內部發行的五卷本《關於清除黨內的右派份子決定彙編》以及各地發佈的資料，中央和地方劃為黨內右派反黨集團或個人的主要有：

**中共中央宣傳部：**1957年9月揪出“李之璉、黎辛右派反黨集團”，李之璉為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長兼機關黨委書記，黎辛任機關黨委副書記兼作協黨總支書記，反黨集團成員還有機關黨委副書記張海、崔毅。

**中央廣播事業局：**1958年10月揪出“溫濟澤右派反黨小集團”，溫濟澤為中央廣播事業局副局長、黨組成員。

**中國人民銀行：**1958年揪出“尚、詹、夏反黨集團”，尚明是中國人民銀行總行辦公廳主任，詹武任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國外業務管理局局長兼中國銀行副總經理，夏原任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國外業務管理局副局長。

**中央監察部：**1957年揪出“王翰右派反黨集團”，王翰為監察部常務副部長、中共監察部黨組書記。

**中華全國總工會：**1958年5—7月召開“中華全國總工會第三次擴大會議”，批判以總工會主席賴若愚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搞福利主義、鬧獨立性、搞反黨宗派主義。書記處書記董昕、書記處辦公室主任秦達遠等十多人劃為階級異己份子。

**上海市：**上海市委工業部副部長周克右派反黨案，以薛尚實為首的同濟大學右派反黨集團，薛為黨委書記兼校長，黨委副書記兼總務長劉准，黨委會三分之二委員，共青團正副書記都是右派。

**安徽省：**“李、楊、李、陳右派反黨集團”，李世農為安徽省長、省委書記處書記，楊效椿為省委委員、省委組織部副部長、省檢察長，李銳為省委委員、副檢察長，陳仁剛為司法廳



副廳長、司法廳黨組書記。

**1958年4月**揪出“淮南市右派反黨集團”，其成員是中共淮南市委書記處書記夏際霞等人；

**1958年11月**揪出“蚌埠市反黨聯盟”，成員有中共蚌埠市委第二書記兼監委書記羅霞光、市委副書記王榮華、市委副書記兼市長杜宏本。

**浙江省：**1957年12月揪出“沙、楊、彭、孫右派反黨集團”，沙文漢是浙江省長、省委常委，楊思一為浙江省副省長、省委常委，彭瑞林為省檢察院長，孫章祿為省委委員、省委財貿部長。

**1957年10月**揪出中共永嘉縣委副書記王定，首創“包產到戶”之一。

**廣東省：**1958年2月揪出“馮、古地方主義反黨集團”，馮白駒為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廣東省副省長，古大存是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副省長。同時揪出四大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

一，“蓬、謝、鐘、溫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蓬荊為原水產廳副廳長，謝平為汕頭市稅務局長，鐘傑民為水電廳處長，溫盛湘為水產公司經理。

二，“陳、吳、鐘、王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陳恩是中共廣州市委秘書長，吳有恆是廣州市委書記處書記，鐘明是廣州市委書記處書記，王有恆是市委辦公室主任。

三，“歐新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歐新為中共廣東省委統戰部處長，該集團包括十多名縣團級幹部。

四，“陳華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陳華曾任中共地委書記，中共省委黨校哲學教研室主任，集團中包括十多名縣團級幹部。

劃為地方主義右派份子的還有中共港澳工委宣傳處長麥素君，廣州市副市長俞美慶，中共廣州市委統戰部副部長兼僑務辦公室主任謝創，廣州市財貿辦公室主任古念良。

**河南省：**1958年7月揪出“潘、楊、王右傾反黨集團”，潘復生為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楊珏為中共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王庭棟是中共河南省委副秘書長。

**四川省：**1958年1月揪出“重慶市張、王、賈、謝四人右派反黨小集團”，張文澄是中共重慶市委書記處書記，王匡時為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賈維英是《重慶日報》總編輯，謝予是重慶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主任。

**1958年11月**揪出“重慶市反黨聯盟”，主要成員是中共重慶市工會黨組書記、重慶市總工會主席張顯儀等人。

**1957年12月**揪出“宜賓地區右派反黨集團”，李鵬為宜賓地區專員兼地委副書記，呂逢權為宜賓市長兼市委副書記。

**甘肅省：**1958年2月揪出“孫、陳、梁、曹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孫殿才是副省長、省委常委，陳仁義是副省長，梁大鈞是中共銀川地委第一書記、省委委員，曹又參是銀川專員公署專員。此外還有省人民委員會秘書長陸為公，民政廳長劉餘生，司法廳副廳長王新潮，交通廳副廳長林裏，商業廳副廳長梁克忠，文化局局長馬濟川等人。

**廣西僮族自治區：**1958年6月揪出“陳、王、駱、王、廖、廖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陳再勵是中共廣西區委常委、自治區副主席，王夢周是中共廣西區委組織部長，駱明是中共廣西區委宣傳部長，王浩是中共廣西區委文教部長，廖原是中共廣西區委財貿部長，廖聯原是兵役局長。中共廣西區委八個部長有六人劃為右派。

“中共環江縣委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包括縣委副書記兼縣長王定（包產到戶首創者之一），副書記陳朝群，車丙寅。全縣幹部有九十六人劃為右派，六十六人劃為中右。

**青海省：**1958年6月揪出“孫作賓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孫作賓是青海省長、中共青海省委書記，其成員是省婦聯主任劉傑（孫作賓妻），省高級法院副院長高繼先，中共青海省河南縣委第一書記潘光亞。

**河北省：**1958年2月揪出“劉洪濤反黨聯盟”。劉洪濤是省委常委、統戰部長，還有統戰部副部長王葆真等。

**福建省：**1958年6月揪出“福建省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主要成員有中共福州市委書記黃國璋，省教育廳長林汝南，晉江專區專員許集美，福州市委書記王一平等人。

**貴州省：**1958年2月揪出“貴州省侗族地方民族主義右派反黨集團”，主要成員有省委候補委員、中共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州委書記處書記、副州長梁旺貴（侗族），中共黔東南自治州委委員、州人民委員會秘書長馮興漢（侗族）。

**雲南省：**1958年4月揪出“鄭敦、王鏡如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鄭敦是中共雲南省委組織部長、省委常委，王鏡如是組織部副部長，其成員有中共省委組織部組織指導處長臧野農，省建築工程局處長袁用之，中共玉溪地委副書記全明，省委組織部副部長謝加林，思茅地委書記梁家。

滇東北的反右運動與反地方主義結合起來，由時任雲南省省委第一書記兼省長的謝富治親自領導，主要矛頭對準1940年代戰功卓著的邊縱和地下黨幹部。揪出原昭通地委第一任書記李德仁（已調任北京鐵道學院黨委書記）、昭通專員李劍秋、雲南省地下黨領導費炳、浦漢英、孫志能等人。滇東北共有十一個縣揪出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謝富治超額完成抓右派指標，共有二千多人被打為右派份子：

**會澤縣：**縣委書記薛振華、縣長陸子英為首地方幹部二百餘人；

**昭通縣：**縣委書記陳季佰、縣長張保全等地、縣兩級幹部三百多人；

**鹽津縣：**縣委副書記瞿增偉、組織部長何浩正等一百四十餘人；

**魯甸縣：**縣委副書記李春仁、組織部長袁成明等一百二十多人；

**威信縣：**縣長吳之伯、縣委組織部長楊曙、宣傳部長王文、財貿部長崔汝益等一百五十多人；

**巧家縣：**縣長郭雲谷、副縣長龍樹林、宣傳部長丁恩祝、農工部長周天祺等一百五十多人；

**大關縣：**縣委常委、組織部長傅開仁等一百多人；

**永善縣：**縣長張德欽、副縣長韓禮福、檢察長吳啟躍等一百八十多人；

**綏江縣：**縣委組織部長龍祥林、宣傳部副部長楊正舉等一百二十多人；

**鎮雄縣：**縣長歐陽興科等一百二十多人；

**彝良縣：**縣委書記陳子良等一百八十多人。

**山東省：**1958年8月揪出“山東省王卓如地方主義反黨反社會主義集團”，王卓如為山東省省長、中共山東省委常委，成員有省委候補委員、中共山東省委財貿部副部長張耀曾，省外貿副主任郭仕毅，副省長袁子楊，財貿廳廳長續中一，省計委副主任曾戎等人。

1958年3月揪出“荷澤地委地方主義反黨集團”，其成員有荷澤地區專員，中共地委副書記扈國華，地委常委、宣傳部長杜湘，地委常委、財貿部長王魯光，地委委員、宣傳部長褚連捷，地委委員、中共單縣縣委第一書記申雲璞。

1958年4月揪出“青島市地方主義反黨集團”，主要成員有中共青島市委書記處書記孫漢卿，中共青島市委書記處書記矯楓，青島市副市長褚介，中共青島市委宣傳部長、市委委員孫樸風、中共青島市委文教部副部長俞光前、國棉一廠黨委書記王作，《青島日報》總編輯顧膺等人。

1958年12月揪出“濟南市地方主義反黨集團”，主要成員有中共山東省委常委、中共濟南市委第一書記王路賓，市委書記處書記張毅以及市委秘書長、市委工業部副部長等人。

山東省地方主義反黨右派份子還有中共泰安地委書記曹禮琴，中共惠民地委書記李峰。

**遼寧省：**1958年2月揪出“遼寧省地方主義反黨集團”，其成員有遼寧省監察廳長、黨組書記張靜超，監察廳副廳長、黨組成員方一臣等。

1958年10月揪出“遼寧省右派反黨集團”，成員有中共遼寧省委書記王爭等人。

**西藏自治區：**1958年8月揪出“範明右派反黨集團”，範明為中共西藏工委書記、進藏部隊司令兼政委，少將軍銜。成員包括共青團西藏工委副書記梁楓（范明妻）、青藏公路交通運輸管理局副局長、黨委第二書記白雲峰，中共西藏工委組織部長曾實等人，受株連者達六百多人。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1958年4月揪出“新疆地方民族主義反黨聯盟”，主要成員有中共新疆區黨委書記處書記熱賽拉夫，自治區政府副主席伊敏諾夫，中共自治區黨委常委艾斯海提等。

## 五，為什麼黨內反右鬥爭的蓋子至今幾乎沒有揭開

反右派運動過去六十年了，對於反右鬥爭的認知，依舊限定於官方設定的二個禁區範圍內，即反右運動是“必要的，正確的”以及“反右運動是整敕知識份子”。提起反右，人們把時限定格於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開始。很少有人把時限延伸到1958年由以黨內反右為主題的反右補課，更沒有把反右補課看作是建國後第一場最大規模的黨內殘酷鬥爭和清黨運動。

這一場黨內鬥爭史幾乎揭不開的原因，不外有多種因素。首先是中共設定的歷史禁區和誤導作用。1979年右派大改正後，開放了一段時間的反右研究。剛打開門縫，不多久便匆遽關門

了。1957反右和八九六四都成為禁區，黨內反右史更成為禁區中的禁區。

1958年的反右清黨運動與社會上的反右派運動不同，採用“關門打狗”的方式。毛澤東和中央反右領導小組反覆強調“內外有別”，大多數黨政系統的黨內右派沒有推向社會，關起門來批鬥處分，當時鮮為人知，事後如果自己不說，便更無人知曉。上文提到的幾個文件，都已封存在檔案庫中，不見陽光。時過境遷，漸漸成為歷史盲區。

其次，在右派大改正時，中共中央組織部有一條規定：“對本人及其家屬、子女、親友檔案中涉及這個問題的材料，應予以撤出銷毀。”在中共黨內更有極其嚴密的幹部檔案管理制度。黨、政正職領導的人事檔案，同級黨委不准管理，必須由上一級黨委管理；廳局級由省部級管理；省部級由中組部管理，以此類推。這種以官本位為基礎的黨內人事檔案管理體制，很難揭開黨內鬥爭的蓋子。

第三，黨內右派受傳統的組織觀念和黨的紀律限制，有些人改正後官復原職或官運亨通，不願再去違紀揭開傷疤，影響升官發財。這是與黨外右派的不同之處。改正後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的朱鎔基的態度，頗具代表性。

在他擔任國務院總理後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有記者追問他1958年當右派的事，他閃爍其詞地回答：“這一段經歷對我的教育是很深刻的，但是也是很不愉快的。因此我也不想再提這件事了。”中共官方也竭力掩飾朱曾當右派這件事。

鄧小平在專門研究起用朱鎔基時，問起朱是否正確對待右派問題，舉出自己歷史上三次被打倒的經過，要求朱以事業為重，朱當然心中有數，“夾著尾巴做人”。朱鎔基的態度基本上代表了黨內右派幹部的立場。很少有人會去揭開黨內這段歷史。

自然淘汰規律也是揭不開這段歷史的重要因素。《開放》雜誌總編輯金鐘先生於2007年6月在該刊發表專文《關於右派的一項死亡統計》。他以官方認定的五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七人作為基準，經過研究分析，認為在當年還存活一萬另三百名右派，即健在者不到百分之二。時過十年，又有多少右派老人逃不過自然淘汰規律。如果黨內右派也以此數測算，而今健在者應在三千人左右，況且大都是當年二十歲上下的學生黨員右派。他們的閱歷和對黨內鬥爭的認識畢竟尚有一定局限性。

### 第一節中共黨內十大省部級右派反黨集團



原浙江省原浙江省省委省長沙文漢  
和他的妻子陳修良

#### 一、以浙江省長沙文漢為首的沙、楊、彭、孫地方主義、宗派主義右派反黨集團

沙文漢（1908-1964）浙江鄞縣漕溪鄉沙村人士，父親是務農的中醫，三十九歲那年撒下五個兒子離世。沙氏五兄弟在寡母的撫養下艱難成人。她變賣家產，供兒子們求學。弟兄們不負母望，奮發圖強，尚勇好義，崇拜中國歷史上

的英雄好漢，熟讀歷史和詩詞。

1925年4月他在學校加入中共，年僅十八歲。沙文漢排行第三。長兄沙孟海以書法見長，曾任蔣介石秘書。雖說老大在暗中接濟弟兄們，可弟兄們全站到中共的一邊去了。沙文漢同老二沙文求於1927年參加廣州起義。起義失敗老二被殺。老四老五都是中共骨幹。

沙文漢本名沙文舒，地下工作期間化名張登。1937年擔任馮雪峰任書記的上海地下黨的宣傳部長。妻子陳修良隨同他在潘漢年領導之下一同參加地下工作。這也是若干年後被雙雙打成右派的禍根之一。

早在1931年沙文漢曾被懷疑“右傾”、“右派”，受叛徒告密和國府追捕，失去生活來源，度日如年。夫婦倆不得不東渡日本，尋找組織關係。1937年秋上海地下黨恢復，他擔任江蘇省委宣傳部長，長期領導文教和針對國民黨軍政人員的策反工作，成績斐然。他策動了南京御林軍起義、上海駐軍起義和重慶號起義，領導中共上海地下警委接管上海市警察局。

1950年以後，夫婦倆備受潘漢年一案的牽連，長期不受重用。沙文漢雖然擔任浙江省省長和省委常委一職，但不能按中共的慣例兼任省委書記或副書記。說明他在黨內是受“控制使用”的。在反右補課階段，浙江省忽然揪出一個以省長沙文漢為首的“沙楊彭孫反黨集團”，有九名省委委員開除黨籍，轟動一時。楊思一是浙江省副省長兼省委常委，彭瑞林是省委常委、檢察院長，孫章錄是省委委員、財貿部長。

沙文漢的右派觀點主要集中在民主主義思想方面。批判他的民主政權觀念，主張黨政分家，實行黨內外民主；批判他的信任民主人士，團結依靠知識份子，反對以思想意識問題作為劃分是非和敵我的界限；批判他堅持貫徹雙百方針，擁護中共八大發展經濟和階級鬥爭基本結束的政治路線。沙文漢還認為省委指揮地委、地委指揮縣委，這一條線指揮下去，政府系統就是多餘的了。省委書記江華怒斥他說：“你這是反對黨對政府的領導。”

以上種種民主主義的思想言行構成了沙文漢的主要右派罪行。批判者還說他“和黨外右派分子一唱一和，互相支持，親如兄弟，支持宋雲彬、李士豪、陳修良向黨倡狂進攻。”宋雲彬是浙江省民盟的右派、李士豪是浙江省農工民主黨的右派。省委書記江華在毛澤東巡視杭州時向毛澤東彙報，毛澤東淡淡地說，這種人不當右派，還有誰能當右派呢。

反右以後，沙文漢被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工資級別由原來的行政六級降為十二級。經省公安局抄家後，逐出北山路葛嶺的高幹住宅。夫人陳修良戴上極右分子的帽子，送往嘉興勞動。全家離散。

他新住的一所普通居民樓的小套間，受到住在隔壁的公安局全天候監控。他的身體急劇地衰落下去，發現自己只能做二件事：反復不斷地寫檢討，乘機學習、反思以及研究中國的政治和歷史。他懷著巨大熱情，帶著病痛完成八萬多字的論文《中國奴隸制度的探討》，以嚴謹的學術研究來度過餘生。

1964年1月2日沙文漢在鬱悶中孤獨地死去，年僅五十五歲。他的右派冤案在1980年改正。隨著潘漢年冤案的昭雪，沙文漢、陳修良夫婦倆人在地下工作中的功績和貢獻重新得到充分的

肯定。浙江人民懷念他們的老省長，懷念他超越時代的開明思想。中央電視臺曾經播放過電視連續集《沙文漢和陳修良》。雖然劇本刻意回避了1957年那段令人心寒的歷史，但是隨同禁止紀念反右五十週年，這部電視劇與其他一切涉及反右的作品一起被打入冷宮。

## 二、以安徽省委書記李世農為首的李、楊、李、陳右派反黨集團

李世農（1911-2006）出生于河北省巨鹿縣。原名王若俊，加入中共後因秘密工作需要改現名。1930年3月加入共青團，同年夏轉入中共，在邢臺河北省立第四師範學校讀書時領導學生運動。1931年至1934年底，先後出任河北省大谷縣團中心縣委書記、共青團北平市委組織部長、共青團唐山市委書記和組織部長、共青團中央交通員。1934年1月在上海被捕，關押在國民政府南京陸軍監獄。次年即被中共地下黨營救出獄。1937年起任中共皖中工委書記、中共安徽省工委委員和組織部長、兼任中共皖東津浦路東工委書記。1944年任淮南津浦路東地委副書記和書記、中共蘇皖邊區委員會副書記兼華中第二軍分區政治委員、中共華中幹校校長、中共淮南工委書記、淮海支隊政治委員、中共淮南區委副書記等職。長期在安徽省做地下工作和開闢根據地的工作。



原安徽省省委書記李世農

中共掌權後，先後出任中共江淮區委副書記、皖北區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中共蚌埠市委書記兼軍管會副主任和警備司令部政委。1951年起調安徽省委工作，擔任中共安徽省委副書記、書記處書記、副省長、省長。

李世農廉潔奉公，剛正不阿，平易近人，工作勤奮，是安徽老百姓心目中的李青天。可是他又十分固執己見，剛愎自用。同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長期不和，兩人工作中的意見往往相左。當年各省市的中共第一書記是“小毛澤東”。書記處書記和正副省長絕對聽命於第一書記。到了1957年反右運動中，李世農和曾希聖的矛盾激化了，曾希聖下決心解決這個矛盾，1958年1月27日，中共安徽省委召開中共中央安徽省委第一屆六次全體（擴大）會議，作出《開除李世農、楊效椿、李銳、陳仁剛的黨籍，撤銷他們黨內的一切職務，並建議有關方面撤銷他們黨外的一切職務》的決議。

楊效椿是中共安徽省委委員兼組織部長和省檢察長，李銳為省委委員、副檢察長，陳仁剛是司法廳黨組書記、副廳長。

凡涉及“李世農右派反黨集團”的人，一律戴上右派分子和混進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的帽子，開除黨籍開除公職押送勞動。究竟為什麼要把李世農等人劃為右派分子呢？原來有人舉報他們上下勾結，利用職權包庇縱容大批反革命分子，否定和取消肅反。指責他們胡說什麼：“反革命分子也有兩面性”，“殘餘反革命分子保險一個找不到”。說他們採用“該判不判、重罪輕判”的手法，放跑了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二百多名。

李世農還被指責誇大災情，向中央伸手多要救濟款。有人更捉住了他在黨政幹部大會上的幾次發言，上綱上線，與右派言論掛上鉤。加之，他與省政府和省委領導之間對楊效椿、李銳、陳仁剛等人的劃右有不同看法。同情和包庇右派與右派同罪，曾希聖乘機乾脆把他一起劃為右派。曾希聖在毛澤東於1958年1月密訪合肥時報請毛澤東同意，就勢進一步把他打成這一夥右派反黨集團的頭目了。這是毛澤東創造發明的階級鬥爭慣用手法，抓住一個案例，上靠下聯，從而株連一大批，安徽省亦不例外。

李世農在一次大會作報告時說：“怎麼突出（政治）呢？工作部門和幹部結構應該是科學的，符合實際需要的。這比如一個人的手，只能長五個手指頭，多長一個手指頭既不好看，又不方便工作和生活。多長一個手指頭是突出了，但不好。如果把這個指頭移至鼻子尖上，那是很突出的了，可那多麼難看呀！所以，幹工作尤其是黨的組織工作，不能要求突出自己的位置，大家說是不是呢？”

有人向曾希聖打小報告，李世農含沙射影攻擊毛澤東的“突出政治”，他貌似忠厚老實，實質陰險毒辣。李世農便理所當然成為安徽省右派反黨集團的首腦、階級異己分子、反革命分子。李世農被開除黨籍，撤銷一切黨內外職務，削職為民。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縣委書記以上的七千人大會以後，毛澤東暫時退居二線，劉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全國政治氣氛相對比較寬鬆。中共中央組織部通知各地：“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傾、整風整社、民主革命補課運動中批判和處分完全錯誤了的黨員、幹部，應當採取簡便的辦法，認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別平反。”

劉少奇還主張為一部分錯劃的右派平反。各地根據他的指示開展過一陣甄別平反工作。中央組織部提出：“凡是在交心運動中受到處分或者劃為右派分子的，應一律平反。”“做好對摘了右派帽子的人和右派分子的安置工作”。統戰部也提出：“如果右派分子本人和其家屬要求甄別的（包括已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員），應該進行甄別。”

1962年春，李大釗之子李葆華接替左王曾希聖赴安徽任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在大躍進時期積極執行毛澤東浮誇冒進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當了替罪羊，撤職查辦。曾希聖違心地檢查道：“安徽出現的問題，我要負主要責任。”

李葆華赴任前，劉少奇指示他，可以為右派甄別平反。李剛到合肥，便大力開展這個工作。他說：“我來安徽時，少奇同志當面交代要搞右派平反——少奇同志不是中央嗎？還不執行少奇同志的指示嗎？”7月間，安徽省委通過決議，為第一批四千多名右派平反，從省委書記到大學生都有。李世農正好趕上在毛澤東煞車以前，因此他的右派不是“改正”，而是平反，復職為省委書記處書記。

毛澤東知悉後，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發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右派平反緊急叫停。安徽和青海等少數省份便成為全國僅有的幾個曾經為少量右派平反的地區。

可惜好景不長，李世農在文革中又被揪出來打倒了，成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下方勞動。待到萬里到安徽省擔任第一書記，便把他“解放”出來，重新啟



用他擔任省委書記、省人大副主任、省紀委第一書記和省委顧問。2006年12月28日在合肥病逝，享年九十六歲。

### 三、以甘肅省副省長、省委常委孫殿才為首的孫、梁、陳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

在反右運動中，中共甘肅省委犯了嚴重的左傾錯誤。錯誤之一是打出一個莫須有的“孫陳梁曹右派反黨集團”。當時孫殿才是省委常委、副省長；陳成義是副省長、省政法黨組書記；梁大鈞是省委委員、銀川地委第一書記；曹又參是銀川地區專員。

孫殿才（1909-1975）是寧夏彭恩堡新營子人，回族，農民家庭出身。曾用名趙忠國、孫樹德、王文清、陳光華。1924年恩和高級小學畢業後於1927年進入蘭州共和中學和甘肅第五中學唸書，積極參加學生運動，加入了共青團。1930年秋赴北平弘達學院，同年12月加入中共。



前甘肅省省委書記孫殿才

加入中共後，他投身工人運動，擔任北平市工會委員會書記兼組織部長，在工人中建立工會和中共黨組織，發動了電車、人力車和掏糞清潔工人的大罷工。不久以後，去天津擔任天津市工會組織部長，領導和組織了紗廠工人反日大罷工。

1933年先後擔任察哈爾省總工會和張家口總工會的組織部長，組建平綏鐵路工會。同年調任張家口同盟軍軍部黨支部書記兼前委巡視員、東北抗日聯軍第一師政治部政訓員。1934年出任中共唐山市五登特委書記，領導了唐山、開灤地區和水泥廠的工人罷工。同年去上海擔任上海總工會執行局常委和宣傳部長，上海工人聯合會書記。

1937年八一三以後，任淞滬工人抗日別動隊第五支隊特支書記。1937年冬調往八路軍辦事處，派到安徽省動員委員會，任幹訓班大隊長。不久擔任中共舒蕪地委副書記，堅持敵後抗戰，成績突出，評為模範，並當選為中共七大代表。1941年返回延安參加整風。

1943年任中共三邊地委統戰部長、中共寧夏工委副書記、中共甯綏工委副書記，率領回漢支隊。1947年回漢支隊改編為中共的正規軍，他任司令員。1948年至1949年擔任中共寧夏工委書記，進駐和接管銀川。1949至1954年任中共寧夏省委常委、寧夏人民政府副主席兼省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委員、政法委副主任、建委主任等要職。

1954年左右，中央政府決定撤銷寧夏省的建制，設立寧夏回族自治區。寧夏地區的工作在自治區成立以前，暫時由甘肅省兼管。孫殿才調任中共甘肅省委常委、甘肅省副省長、省政府黨組書記。

那個時代，不論黨內黨外的省長，必須接受中共省委書記的領導，意見不同，必須聽從省委書記。孫殿才是回族，出身于寧夏，非常熟悉當地情況。他分工籌建寧夏回族自治區的工作。因此對於少數民族政策，孫殿才和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時常發生分歧。整風鳴放時，他在



黨內把這些分歧提了出來。照理這是完全符合黨內民主生活原則和組織程式的。

毛澤東有個習慣，每當他要採取重要舉措時，必會巡視各地打招呼、找岔子。如同以後的文革前夕和要搞掉林彪一樣。這一回他自莫斯科回國後，風塵未洗，便於**1957年12月**至**1958年4月**，四次離京巡視了二十多個省市。最後一次來到蘭州，聽取了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的彙報。他這次來就是為了抓黨內右派、反黨集團、地方民族主義分子和地方分裂主義分子。一路走來，他已經在近十個省市抓住了多個黨內右派反黨集團，成績斐然。根據張仲良的彙報，他武斷地將對於成立寧夏回族自治區的政策持有不同看法的孫陳梁曹打成甘肅省的右派反黨集團。這四個人以及他們的追隨者都是寧夏回族的少數民族幹部。銀川市的馬立凱市長和二位副市長分別被劃為極右、右派和內控右派，銀川專區和銀川市的黨政領導幾乎一網打盡。

中共中央總書記兼反右領導小組組長鄧小平在西安的一次黨政幹部會議上殺氣騰騰地說：“對黨內右派，不論他的資格有多老，一律開除黨籍。因為黨內右派反黨的政治資本就是他的黨齡。我們要徹底剝奪他們的政治資本。”鄧小平這番話便是針對孫殿才等人說的。

不僅如此，中共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於**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全體會議上發言說：“黨內外右派分子利用我們工作中的個別缺點，大肆向黨進攻，說‘五百萬水田是用人命換來的’，是‘秦始皇磨民’；說‘**1956年**各項工作冒進了，這些都是領導幹部腦袋發熱造成的’；說‘批判甘肅落後論是無的放矢，**1956年**春召開的區委書記會議是個冒進會’”。又說：“經過全民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特別是經過了傳達八屆三中全會的精神，在黨內清除了孫、陳、梁、曹為首的反黨集團，情況大變，一個波瀾壯闊的社會主義建設高潮，一日千里地向前邁進。**1958年**的水利工程六個多月的成績就等於**1957年**的十倍。”張仲良的發言贏得了全場的掌聲，甘肅省的反右成果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和稱讚，張仲良在會上增補為中央候補委員。

甘肅省共有人口一千二百萬，占全國人口五十分之一，右派分子揪出五萬多人，占全國十分之一。夾邊溝右派勞改農場是中國的奧斯維辛集中營，臭名昭著。甘肅省反右和冒進的直接後果導致了**1958到1960年**的三年大災荒，餓殍遍野，民怨載道，震驚朝野。**1960年12月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蘭州召開會議，“幫助”甘肅省委糾正嚴重錯誤，調正省委領導班子。呼籲“緊急動員起來搶救人命。”

對歷次運動中受迫害的四萬多幹部和二十四萬多工、農、學陸續甄別平反。摘了五千三百七十八名右派帽子。即便如此，極左流毒仍在甘肅急劇漫延。

孫殿才、陳成義、梁大鈞、曹又參等反黨集團成員得到甄別平反，恢復黨籍，重新被啟用。孫殿才出任中共甘肅省委委員、甘肅省政協副主席。不過他們後來沒有躲過文革浩劫，重新揪了出來，打成漏網右派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1975年1月18日**文革結束前夕，孫殿才病逝於蘭州。

#### 四、雲南省委常委、省委組織部長鄭敦、副部長王鏡如右派反黨集團

中共掌控政權後，各省市的地方黨政領導班子，主要由隨軍南下的北方共幹和堅持地下鬥

爭的地方土共組成。他們兩派之間充滿矛盾和鬥爭。南下共幹自持正統，出身延安八路軍新四軍，瞧不起地方土共；地方土共也看不上南下共幹，認為自己有文化，老子提著人頭打下江山，比你們更加熟悉地方情況。有人把這種矛盾看作是“白區和紅區”之爭。毛澤東的立場鮮明，他認為白區地下黨的成份複雜，魚目混珠，許多人入黨動機不純。不如南下共幹經過戰火考驗和正統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教育來得可靠。

這種爭權奪利的矛盾種下了黨內鬥爭的禍根，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顯山露水，頑強地表露出來。在反右派運動和以後的文化大革命中，揪出來的大批右派、叛徒、特務、走資派和混進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便是明證。

中共雲南省委常委、省委組織部長鄭敦和副部長王鏡如在整風運動中說：“老幹部沒文化，應該採取贖買政策讓他們退休，‘進博物館’。”他們說的老幹部便是指南下共幹。

鄭敦（1917-1980）廣東梅楊人，出身官僚地主家庭。在學校中參加學生運動，1938年加入中共。曾經擔任中共永和埔縣委書記、閩南特委副特派員，長期堅持地下工作。1944年進入延安中央黨校學習。以後擔任中共地方部隊滇桂黔邊區縱隊副政委、中共滇桂黔邊區黨委宣傳部長。

中共建國前後鄭敦調入雲南省，擔任中共雲南省委常委兼組織部長、省政協副主席、全國人大代表、中共八大代表。他在主持全省的組織工作中，和副部長王鏡如一起整頓了各級幹部的瞞產私分、貪污盜竊、虛報產量、弄虛作假的不法勾當和嚴重破壞黨群關係的行為。從此得罪了許多幹部，不少人對他們懷恨在心，伺機報復。

1958年4月1日至24日，在毛澤東視察了雲南省後，中共雲南省委召開了地、市委書記會議。會上傳達了中央成都會議的精神，會議中間有六天時間參加省委擴大會議，集中火力，猛烈批判鄭敦和王鏡如以及追隨他們、贊同他們觀點的幹部。省委擴大會議指出，鄭敦和王鏡如等人的野心活動早在1948年雲南地下武裝鬥爭時期已經開始顯山露水，以雲南地區的地方幹部“領袖”自居，有篡黨奪權的狼子野心；抓住工作中的個別失誤找岔子，嚇唬人。

會前，省委主要領導還向毛澤東彙報，鄭王右派反黨集團惡毒攻擊大躍進、人民公社、地方工業和農業生產的成就。宣稱“反黨集團有綱領有市場”，右派反動言論“系統而惡毒”，是個很好的“反面教員”。就這樣上綱上線，尤其是他們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批評，最觸動毛澤東的神經，引起他的反感。離開雲南前夕，毛澤東點頭同意把鄭、王兩人打成右派反黨小集團。

中共雲南省委把自己工作中的錯誤和缺點，一股腦兒全推給了鄭、王。領導幹部進行整風補課，在省市機關和地市級高幹中深入清除鄭、王的影響和流毒。把全省二十多個縣落後的原因也推到鄭、王身上。落後原因是這些縣的縣委領導中有反對派，有鄭、王的爪牙，鬧不團結；在縣委書記或常委中混進了右派分子。如此一來，凡是反右運動開展得快，三面紅旗就舉得高，大躍進運動搞得好的地方，浮誇冒進、吃不飽、餓死人的現象便更加嚴重。頓時全省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盛行。

省黨委擴大會議隨即作出決定，深入批判已經揪出來的“鄭、王右派反黨集團”，全省清除反黨集團分子和他們的流毒。決定又指出：“當前機關、學校、財貿系統的反右補課要查明四種人，即漏網右派、反黨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極端個人主義分子，尤其要查明部、局長中的四種人。查出右派，要及時組織鬥爭”。並且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別出心裁地在工農群眾中，大抓反社會主義分子，因為毛澤東早先說過，工農不劃右派分子，但可以劃反社會主義分子或壞分子、反革命分子。

在擴大的反右鬥爭中，昆明全市高等學校有**25%**的教職員工打成右派，昆明黨政機關學校團體劃右一千八百二十人，有右派觀點但不戴右派帽子的疑右分子有一萬多人。

鄭敦和王鏡如長期遭受迫害。在史無前例的文革浩劫中，他們又被幾個造反派和紅衛兵組織輪流揪出來批鬥、蹲牛棚。鄭敦在**1979**年改正後，自**1980**年起擔任雲南省檢察院副檢察長。不久病逝于昆明。

### 五、廣西僑族自治區副主席、區黨委常委陳再勵為首的陳王駱王廖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

**1958**年初夏，全國的反右派運動已接近尾聲，唯有廣西的反右派還在升級。**1958**年**6**月，中共廣西僑族自治區黨委一屆三次大會繼續批判“陳再勵右派反黨集團”。宣佈開除省委常委和副省長陳再勵、組織部長王夢周、宣傳部長駱明、文教部長王浩、財貿部長廖原、兵役局長廖聯原等人的黨籍，戴上右派帽子。中共自治區黨委八個部長中有六個打成右派，這在全國各省市中是絕無僅有的。

陳再勵（**1887—1975**）於**1887**年**11**月出生在湖南省平江市安定鎮的一戶貧苦家庭，少年時代在造紙作坊當童工。**1925**年入團，次年加入中共。他早年參加工人運動，組織工人罷工，成為基層工會負責人。馬日事變後，帶領造紙行業工人參加遊擊隊，投入秋收暴動。

**1928**年**7**月參加平江起義，歷任紅五軍第一縱隊特務大隊黨代表、長壽縣委書記、萬載縣委書記、中共湘鄂贛省委總務部長、中共東南分區政治部主任、西南分區政治委員、西北特委書記兼分區政治委員，在南方敵後堅持了三年遊擊戰爭，在鄂東南發展建立了一支二百多人的遊擊隊。

抗戰初期任新四軍政治部民運部副部長、部長。皖南事變後，擔任新四軍第七師政治委員兼皖江軍區巢湖支隊政治委員。**1943**年調入延安中央黨校，選為中共七大代表。

抗日戰爭勝利後，陳再勵擔任東北民主聯軍政治部民運部長和組織部長，培養和訓練了大批地方幹部。**1949**年**9**月隨軍進入湖南，任湖南省人民政府民政廳長。**1952**年任中共三三一廠黨委書記兼廠長、湖南省委委員。**1954**年調任中共中南分局組織部副部長。同年**11**月調入廣西，任廣西省交通辦公室主任、副省長、省委常委、一屆政協副主席、中共八大代表。

他在廣西深入基層調查研究，發現一些幹部的群眾觀點淡泊，作



陳再勵

風浮誇，虛報產量，造成群眾口糧困難，不少人得了浮腫病。陳再勵為此深感不安和內疚。在省委常委會上提出要向中央如實彙報情況，採取有效措施，核實產量，下撥糧食，解決百姓的疾苦。

他幾次大聲疾呼：“共產黨就是要為人民謀幸福，不能高高在上，不關心群眾的死活”。他得到了省黨委八位部長和大多數黨政領導以及媒體的支持。群眾聞知後稱讚他說：“陳省長是個敢於講真話的真正的共產黨人。”

可是他的言行卻得罪了省委主要領導，給一把手臉面抹黑，丟了臉。在反右運動中，毛澤東於1958年1月來廣西視察。省委主要領導乘機向毛澤東“謊報軍情”，說陳再勵和省委幾個部長從1956年6月起，打著“反冒進”、“反主觀主義”的旗號，詆毀農業合作化和農業戰線在大躍進中取得的偉大成就，攻擊黨的正確領導，破壞黨的團結。

在1957年6月中央宣佈因災餓死人的事件中，陳再勵的“反黨活動”達到高潮，指責自治區黨委說“餓死人是農業合作化和糧食統購統銷犯了錯誤，廣西的工作路線犯了錯誤。”

更為嚴重的是陳再勵支持廣西僑族自治區副檢察長徐江萍的觀點。徐江萍認為肅反沒有必要。肅反中，冤案、錯案占50%以上。被認為是“惡毒攻擊偉大的肅反運動”。

毛澤東聽罷大為震怒。他這一趟外出巡視，就是為了來抓各地混入領導崗位的黨內右派的。毛澤東立即宣佈將陳再勵和支持他的省委幾位部長打為以陳再勵為首的“陳王駱王廖廖右派反黨集團”，開除黨籍，遣送各地勞動。其他幾位支持他的部長，劃為內控右派，撤銷職務、留黨察看或嚴重警告。

陳再勵已有六十多歲高齡，調回老家湖南的湖南農學院當顧問，像他這樣一位上個世紀1920年代加入中共的老黨員，為中共出生入死，功高蓋世，卻長期受到不公正對待，晚年貧病交加。1975年10月13日在長沙含冤病逝，享年八十八歲。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共中央和廣西省委對陳再勵等幾位錯劃右派和地方主義分子等予以改正和平反。平反決定說：“陳再勵、王夢周、駱明、王浩、廖原、廖聯原等六位同志，當時在會上的發言基本符合事實，不屬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也不屬於反黨集團性質。因此決定恢復陳再勵等六位同志的政治名譽和黨籍。”

## 六、中共青海省省委第二書記兼省長孫作賓（極右分子）為首的青海省委右派反黨集團

孫作賓（1909-2002）是中共黨內二十世紀1920年代入黨的右派分子，而且也是那個年代入黨的唯一的極右分子。他是陝甘寧青地區老資格的早期革命活動家，習仲勳的老戰友。

1909年1月21日，孫作賓出生於陝西省咸甯縣路家灣倉豁口村一個農民家庭，是個地道的農民兒子。父親孫拯



中共青海省省委書記兼省長極右分子孫作賓

耀只上過四年私塾，卻多才多藝，練得一手好武藝，人稱武林拳師。他幼年最愛聽聰穎賢慧的母親講故事，母親的教誨影響了他的一生。“講實話”便是母親讓他終生銘記的家訓。

孫作賓聰穎好學，乳名戊申，字相臣。七歲入村塾，老師見他勤奮好學，彬彬有禮，用古人“作賓於王室”之詩句，為他取名作賓。十五歲考入新築鎮高級小學。由於家貧，讀書不易，因此刻苦攻讀。1926年春，十七歲時以優異成績考入陝西省立第三中學，參加了中共地下黨領導的學生宣傳隊。1927年入團，1929年加入中共。

自1928年5月至1931年，孫作賓在西北軍楊虎城部做兵運工作，曾任西北軍三十八軍的中共軍委書記。1932年5月參加靖遠起義，任中共陝甘遊擊隊四支隊司令兼政治委員。同年12月任中共甘寧青特委軍委書記。1933年初組織西北抗日義勇軍，開展武裝鬥爭，參與創建陝甘邊區和紅軍。奉中共組織派遣打入楊虎城任隊長、孫蔚如任副隊長的南陽教導隊，任中共支部委員兼黨小組長，搞兵運工作。

1933至1936年底孫作賓先後擔任中共陝西省臨時省委負責人和中共中央交通員，三次組建陝西臨時省委，往返西安與保安（中共中央所在地）之間，傳送情報和資訊，為毛澤東周恩來開展十七路軍上層統戰工作做出過特殊的貢獻。

1937年8月至1939年6月孫作賓任中共甘肅工委書記，恢復和發展甘肅中共組織，建立抗日統一戰線。1939年回延安馬列學院學習，並組建甘寧工委，任書記。這時，康生一手製造了“搶救運動”和“紅旗黨事件”，把孫作賓等一大批陝甘寧地下黨和工委負責人打成“紅旗黨”，逮捕關押，長期刑訊迫供。他受盡肉刑折磨，堅不承認自己是特務。作了二首詩自慰：

主觀主義害死人，可惜至今尚猶存；  
調查研究不周密，硬把同志當敵人。  
世間事情真複雜，革命人受革命法；  
千里駿馬知路遙，赤金何懼浪淘沙。

在抗日戰爭勝利後，關押在共產黨牢房裏長達二年半之久的孫作賓才得以獲釋。他立即又被中共重用，重任中共甘肅工委書記兼中共隴東地委統戰部長、第一副書記、代理書記等職。

1949年7月至1952年12月，孫作賓任中共甘肅省委副書記兼統戰部長、省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省委婦委書記和省政府監察委員會主任等要職。其間主持了甘肅省境內回族和藏族聚居區的平叛工作。

1953年至1954年6月，他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統戰部第一副部長兼西北民族事務委員會第一副主任。1954年7月至1958年3月，調任青海省省長、中共青海省委第二書記。

1958年1月3日至3月8日，中共青海省委召開二屆五次擴大會議，用近二個月的時間以大鳴大放大字報的形式，揭發批判孫作賓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和右派言論。把孫作賓的一些報告、講話和文章斷章取義，上綱上線。“無端棍子啪啪下，不盡帽子頂頂來”。他批評省委第一書

記高峰領導作風的話，被說成是“對黨不滿”、“在黨內製造分裂”、“進行宗派活動”、“向省委鬧獨立”。

甚至上掛下聯，把他的秘書和公務員在整風中向省委辦公廳提出克服“會議多，下鄉少；文件多，落實少；佈置多，檢查少；說的多，做的少；浪費多，節約少”的現象，也說成是孫作賓鼓動秘書和公務員一起向黨進攻。他的秘書屈養生作風正派，敢於提出中肯的意見，被視為反黨，劃成右派。孫作賓替他說話：“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這樣孫作賓又多了一條“包庇右派與右派同罪”的罪名。

他從小牢記母親“講實話”的教誨，在批判會上對於那些不實之詞立即反駁辯解。但是會議主持者責令他“只許認罪，不准辯解”。於是把孫作賓提出的“按照民族特點處理民族矛盾”的觀點，誣蔑為“誇大民族矛盾，否認階級鬥爭”；把“慎重穩進，適當放緩畜牧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步子”，污蔑為“要黨讓位於剝削階級”，指責他“完全背叛了黨，成為剝削階級牧主、頭人在黨內的代理人”；把“爭取上層，就爭取了群眾”，污蔑為“向剝削階級投降”等等。

1958年3月，毛澤東秘訪了西寧，聽取了省委第一書記的片面彙報，同意將孫作賓劃為右派。知情人指出，這是一場第一把手打倒第二把手的戰爭。在家長制的中共黨內，大家長必勝無疑。

在第一書記高峰的指揮下，對孫作賓的不公正批鬥逐步升級。1月27日青海省委作出“關於停止孫作賓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定”，3月8日省委二屆五次擴大會議又作出對孫作賓等右派分子的處理決定。孫作賓定性為極右分子，開除黨籍，貶到青海省圖書館工作，長期擔任圖書館館長。

他的妻子劉傑是1937年加入中共的老黨員，時任青海省婦聯主任。受孫作賓的株連，也被打成右派分子。孫作賓一家被趕出省委高級住宅，搬進圖書館職工低矮的平房。

1962年，他被摘掉帽子。摘帽後他立即向接替高峰的青海省委第一書記楊植霖提出申訴，要求徹底復查。高峰當政時的青海省，曾餓死二十萬人，竟占青海省人口的十分之一。

在十年浩劫期間，紅衛兵和造反派又多次把他揪出來批鬥，嚴刑拷打，九死一生。最後受到軍事監護，身心受到嚴重摧殘。那時他唯一允許做的工作，就是不斷接受外調人員的圍攻，要他替當年地下黨老戰友作所謂的叛徒、特務、奸細、工賊、走資派偽證，如果不從，便在精神上對他橫加折磨。

四人幫倒臺後，他於1977年又一次致信新任青海省委第一書記譚啟龍，再次堅決要求復查平反。

1978年1月，中共中央責成中共青海省委對孫作賓的問題進行復查。青海省委直到此時才作出結論，推倒一切污蔑不實之詞，撤銷原來的處分決定。孫作賓在青海蒙冤二十年後，終於被調回家鄉陝西省。1979年擔任陝西省副省長，陝西省人大常委副主任。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常委。2002年病逝于西安。

## 七、河北省委常委劉洪濤右派反黨集團

河北省在1958年2月揪出“劉洪濤反黨聯盟”。劉洪濤是省委常委、統戰部長，還有統戰部副部長王葆真、省工會副主席杜存訓等。

## 八、以司法部常務副部長、黨組書記王翰為首的司法界右派反黨集團

毛澤東向來自詡“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他的心目中根本沒有法治觀念，甚至沒有最起碼的道德底線。反右運動中，他把業已凋零不堪的司法界幾乎一鍋端，取消了司法監察部門。從根本上抹去了“法制”二個字。在這個右派窩中較為著名的有法學家彭文應教授、北京政法學院院長和全國人大法案委員會委員錢端升教授、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庭長賈潛、副庭長朱耀堂、監察部常務副部長兼黨組副書記王翰、北京市高級法院院長王斐然、中級法院院長賀戰軍、北京司法局局長賀生高、副局長樓邦彥、北京律師協會副主任白振武、法官梁文茜、福建省司法廳長何公敢、安徽省司法廳長李湘若、副廳長陳仁剛、遼寧省司法廳正副廳長、浙江省檢察長彭瑞林、廣西省副檢察長徐江萍、安徽省正副檢察長楊效椿、李銳等。北京司法部門的右派占9.25%，北京市司法局顧問處右派占50%以上。

楊兆龍教授是我國法律教育界的老前輩，他的悲慘結局實際上是中國法律界的縮影。早年他是哈佛大學法學博士、柏林大學博士後，在多所著名大學擔任法學教授和法學院長，並曾在上海擔任過上訴法庭法官、律師、審判日本戰犯的罪證調查室主任。在肅反時因中共易幟後留下不走，反而被懷疑為潛伏特務。反右中堅持法制觀念和司法獨立被打成右派。1963年因莫須有的反革命罪被捕入獄。1971年判處無期徒刑，冤死獄中。上海批判楊兆龍，北京批判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教師吳家麟，全國人大批判錢端升，把大學法學院批判得體無完膚，慘不忍睹。反右後，我國司法教育已經名存實亡了。

從司法部門的眾多右派看，其中要數監察部常務副部長兼黨組書記王翰的地位最高，資格最老。

王翰（1911-1981）原名陳延慶，江蘇建湖人。少年投身革命，1932年加入中共。1935年復旦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後任交大黨支部書記、中共上海社會科學聯盟常委、中共江蘇省臨時省委委員、湖北省委秘書長、中共鄂西北區委書記、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長等。在軍隊裏曾任新四軍第五師政治部副主任等職。

中共建立政權後，他首先任中南人民監察委員會主任，後在中央人民政府監察委員會擔任副主任。嗣後被周恩來任命為監察部常務副部長和黨組書記，主持監察部的日常工作。1957年反右運動，他是監察部反右領導小組的負責人之一。多年來王翰主持監察部工作，歷來反對製造冤假錯案，主張使用知識份子，提倡學業務，反對老是搞政治運動。他在監察部黨組的地位，使他比較瞭解毛澤東的劃右標準。因此他對部裏一位幹部的劃右有意見，他堅持可劃可不劃的儘量不要劃，不要管它完成或完不成抓右派的指標。

在1958年反右補課階段，在甯左勿右的政治氣候中，領導幹部反右不力，以包庇右派論處，與右派同罪。有人進一步揭發他平時主持部務工作重業務輕政治，監察工作不抓階級鬥爭。批

判他否定社會主義建設成就，污蔑國務院各部委工作一塌糊塗；攻擊發展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不是冒進便是冒退；說現在的大學教育不如解放前；替黃紹竑辯解；崇美思想嚴重，推薦美國學者杜威的《圖書十進分類法》來整理監察機關檔案；吹噓美國導彈，小孩奶粉要買美國貨。最嚴重的是他主張司法獨立和司法工作垂直領導，取消黨對司法部門的一元化領導和雙重領導，將司法監察工作置於黨和政府之上。

監察部開了十六次批判大會，貼了一千一百多張大字報，專門為他舉辦了“罪行展覽會”，給他來個新賬舊賬一起算。七鬥八批，上綱上線，王翰頂了個監察部的右派名額。監察部的右派集團還包括副司長安汝濤、彭達、研究室主任陳達之、研究室翻譯室主任梁建一等人。不僅如此，自他以下的監察機構自中央到地方，右派竟然多達百分之二十~三十。國務院司法部和監察部被指脫離黨的領導，於1959年4月被撤銷，全國各地監察機構隨之撤銷。

中共中央明文規定：“各級法院和檢察院均受同級黨委的直接領導。”1960年中共中央進一步決定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合署辦公，由公安部牽頭。法院和檢察院聽命於同級黨委，三權分立的公檢法合而為一，歸口公安部領導。這是反右運動的偉大成果之一。從此中共走上無法無天的道路，黨的各級幹部的犯罪行為可以不受任何部門的監督。

王翰受到嚴懲，開除黨籍和公職，送到三門峽工程局監督勞動。在文革中又受盡折磨。1979年改正，擔任重新恢復的監察部顧問。二年後便鬱鬱病死，享年七十歲。

## 九、中共遼寧省委書記王錚,省委書記兼省長杜者衡為首的遼寧省右派反黨集團

1958年10月，反右補課已近尾聲，遼寧省趕上末班車，在中共中央反右領導小組敦促下，終於被揪出以中共遼寧省委書記王錚和書記處書記兼省長杜者衡為首的遼寧省右派反黨集團，填補了東北地區缺少省部級右派反黨集團的空白，遂了鄧小平的心願。

1958年6-10月，遼寧省召開馬拉松式的省委擴大會議，鄧小平、李富春親自上陣，分別到會作報告。會議主題是批判王錚、杜者衡等人反對省委第一書記黃歐東興建供毛澤東專用的南郊別墅，反對中央對工會工作的指導方針，“有嚴重的經濟主義和工團主義反動思想”；“反對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對水、肥、土、種、密加田間管理的方針執行不力”，公開反對中央工農業並舉方針；不執行中央發展工業大中小並舉方針；只抓大、洋，不抓小、土，使遼寧省工業發展受到很大影響；不執行毛澤東三面紅旗政策。責問他們“為什麼在全國轟轟烈烈大躍進中，遼寧省只有一般進步？”；胡說什麼“農業搞不好，群眾吃什麼！”上綱上線為兩條路線鬥爭。



同時遭到批判的還有省委書記處書記兼副省長李濤、省委委員旅大市委書記兼市長宋黎、省委常委兼省工會主席張烈、省委常委兼省委秘書長吳鋒等一大批省市級幹部。

王錚（1915-1989）遼寧省義縣人，1935年入讀北京大學並加入共青團，1936年轉入共產黨，參加一二九學運。後進入太行山根據地，擔任過縣長、縣委書記。1945年抗戰勝利後回到東北，歷任中共遼寧省委第二書記、第一書記、書記。1978年右派改正後出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書記。

杜者衡（1910-1975）遼寧省開源人，東北大學經濟系畢業。畢業後在東北軍工作，參加過西安事變，擔任過志願軍後勤司令部副政委，後任中共遼寧省委書記處書記、省長。

#### 十、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

潘復生（1905-1986）山東文登人，原名劉巨川，曾用名劉開濬，筆名“大溝”。1931年10月在濟南省立第一鄉村師範學校讀書時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12月轉入中共。1932年任共青團山東省委組織部長，一個月後即被捕，後轉入反省院“反省”，在獄中堅持鬥爭。坐了五年多牢，於1937年11月抗戰前夕出獄。後任中共文登縣第四區委組織委員。1938年任中共膠東特委委員、東海邊工委書記、中共文登縣中心縣委書記。

1939年至1944年在中共中央山東分局工作，先後擔任巡視團主任、組織部組織科科長、分局秘書長兼組織部組織科科長。1941年至1945年任中共湖西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中共冀魯豫區第六地區、第十一地區書記兼軍分區政委。

抗戰勝利後擔任中共冀魯豫區黨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自1948年1月開始升任中共冀魯豫區黨委書記兼軍區政委、冀魯豫區行政公署主任。中共建國後，先出任中共平原省委書記兼軍區政委，後調任中共河南省委書記兼軍區政委，在中共八大被選為候補中央委員。



潘復生

在中國大陸緊接著1957年的反右運動後，出現了1958至1961年的大饑荒。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幾千萬。為什麼河南省是全國死亡人數最多的一個省份呢？這完全同1957年河南省的反右鬥爭以及1958年的反右補課運動中打出一個以潘復生為首的“潘、楊、王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有關。楊珏是中共河南省副書記，王庭棟是中共河南省委委員、省委副秘書長。在揪出潘復生後，掃除了拌腳石，全省共打出右派七萬零八百六十九人，僅信陽地區就有八千六百九十六人。二十年後全部改正。

在1957年反右運動及1958年反右補課運動中，中共河南省委第二書記吳芝圃二次企圖把第一書記潘復生打成右派分子和極右分子，理由是潘復生同楊珏和王庭棟等人反對毛澤東的大躍進指標以及反右運動中的保守主義和溫情主義。潘復生認為右派分子不能超過參加運動人數的2%，縣以下單位不應開展反右運動。但是吳芝圃將潘復生的劃右請示報告上報中央後，中央反右領導小組未批准。吳芝圃於心不甘，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搞了個突然襲擊，指責潘復生搞右傾機會主義，是個地道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毛澤東當場鼓掌表示支持。毛澤東一拍手，沒人敢反對。潘復生在會上被免去第一書記職務，吳芝圃馬上接任河南省委第一書記。

從此以後，河南省在吳芝圃的領導之下，走上了一條災難的道路。他首先抓出一個“潘楊王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揭批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右派言行。吳芝圃創造性地執行和發展了毛澤東的左傾路線，在全國率先創立了人民公社。1958年8月6日毛澤東視察了河南省七里營人民公社，8月底河南全省建立人民公社，全國第一。從此河南省帶領全國農民走向死亡幾千萬人的人間地獄。

河南省在黨內黨外，從省委到基層，在組織上和政治上批倒批臭反黨集團後，又批判潘楊王和他們的農業政策，包括自養牲畜、自留地、包工包產、自由市場、小塊廢地種樹個人所有等有利調動農民積極性和發展生產力的政策。批判他們的小農經濟優越論、反對統購統銷等發展資本主義的綱領。

同時，河南全省大抓“小潘復生”和大小“潘楊王”，弄得幹部人人自危，全省上下長期性地從上到下層層說假話，浮誇風盛行。雖然糧食產量下降，反而浮誇虛報高徵購，又不准農民逃荒。1958年產糧四百五十億斤，高估為七百零二億斤。二年多征六十億斤，農民把口糧都上交了。信陽地區是重災區中的重災區，非正常死亡達人口的10%。信陽地區專員張樹藩在遺作《信陽事件：一個沉痛的歷史教訓》中指出，信陽事件的發生，與此前開展的河南省政治運動有關係。河南省發生過“潘楊王反黨集團”事件，全省到處抓“小潘復生”，從此人人自危，很多人睜著眼睛說瞎話。浮誇風、瞎指揮就在全省刮起來了。農民說：“跟著潘復生，一天吃一斤；跟了吳芝圃，吃了不少苦。”張樹藩和河南省的各級幹部和群眾都認為，河南的反右鬥爭和反“潘楊王反黨集團”是造成大饑荒、大死亡的直接和根本原因所在。

河南省自1957年至1958年的反右鬥爭和反右補課、1958至1959年的反右傾鬥爭使極左路線在政治上思想上占了統治地位。在經濟工作上的反映，則形成五風盛行的局面，人民公社和大躍進站在全國最前列，冒進冒得最遠，對人民的危害也最烈。反右派和大饑荒有著共同的思想淵源。反右的深度和廣度同死亡的餓死的人數和強度直接相關。反右派和大饑荒、大死亡有因果關係，有歷史的連續性和必然性。

潘復生雖然沒有戴極右分子帽子，卻也戴上了一頂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雖然保留了黨籍，卻也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貶到河南省黃泛區農場當一名無職無權的副場長。1962年平反。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員、農辦主任；1965年調任國務院財貿辦黨委副書記。1966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處書記。文化大革命中沒有受到衝擊，擔任第一任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

主任。但是在毛澤東的錯誤路線下，這一次他也站錯了隊，支一派打一派。他支持的“軍工紅色造反團”大搞打砸搶，武力鎮壓對手，血腥接管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此是後話不提。

1986年4月20日潘復生病逝於哈爾濱。

## 第二節地方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

### 綜述 香火趕出和尚

1949年10月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以曾生為司令的兩江縱隊一個炮兵團與林彪四野塔山阻擊戰英雄團為接管國軍一五四師投降而交起火來，起因是雙方都誤以為對方是國軍一五四師。經過一夜激戰，兩江縱隊“俘虜”了四野塔山英雄團一個整連及其戰鬥英雄連長。地方遊擊隊打敗了四野王牌軍，雖然揚眉吐氣，卻也因此而種下了禍根。以後林彪派四野政治部副主任陶鑄帶數百人接管兼併了兩江縱隊和東江縱隊。地方幹部與南下幹部產生的隔閡，首先是語言、生活習慣的差異。北方人聽不懂白話和廣東官話，廣東人不會講國語，廣東人喜愛沖涼，北方人難耐悶熱……

林彪原來的根據地在東北，率領四野一路征戰，南下廣東。毛澤東取得勝利後冊封諸侯，把全國劃分為五大行政區。東北地盤封給了高崗，林彪則兼任中南軍政委員會主席，廣東屬於中南地區，歸林彪管轄。葉劍英當時任北京市長，在周恩來暗中支持下，聞訊急忙南下當還鄉團，因為廣東歷來是周恩來的根據地，當時周還分管著中共中央南方局。1949年10月19日，周恩來主持的政務院在建國伊始匆忙任命葉劍英為廣東省人民政府主席，方方、古大存、李章達為副主席。

廣東問題的癥結是毛、周之間的爭權。中共建國後進入和平建設時期，周恩來領導的國務院作用越來越大。毛澤東說：“中央政府有分散主義傾向。”為削弱周的權力，毛將國務院分權，並摧毀周控制的最後一塊地盤——廣東。

毛、林的合作關係遠勝於毛、周。林彪伺機開始反擊，1952年初，林彪藉口廣東省土改右傾，迷失方向，出現“和平土改”現象，開始了第一次反地方主義鬥爭。改組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共廣東省委，由中南軍政委員會下屬的中南土改委員會主任李雪峰出面，陶鑄、趙紫陽貫徹執行。毛澤東拍板決定調走葉、方；馮、古降職。馮、方、古被定為地方主義分子三大主帥，葉劍英險些入甕。豈知毛澤東在不久以前還剛接見過馮白駒將軍，誇獎他堅守海南，領導瓊崖縱隊，二十三年紅旗不倒，把他比作陝北的劉志丹。

然而毛澤東是個翻臉無情的人。1952年6月，毛澤東插手廣東問題，他在中南海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周、葉、馮、方、古、陶等有關人員均出席。毛澤東一上來就批評廣東地方主義，說道：“這裏是最高會議，討論廣東問題。”接著掉頭轉向方方說：“你犯了二條錯誤，一是

土改右傾，二是幹部犯地方主義錯誤。”毛又對眾人說，廣東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全國三隻烏龜，廣東、福建、廣西。現在福建、廣西爬上來了，廣東還在爬。”

毛澤東指出，中央認為廣東“在決定關鍵上犯錯誤，迷失方向。”宣佈以陶代方，嚴厲批評葉劍英的“廣東土地改革特殊論”和方方的地方主義錯誤。葉、方、馮、古在會上均作了檢討。當時氣氛緊張，發生過“中央授意陶鑄深夜帶槍見周恩來”之類的荒誕事。

廣東省第一次反地方主義鬥爭以葉劍英、方方調離廣東，馮白駒、古大存降職處分暫告段落。毛澤東用“去皮見骨”的毒招把周恩來孤立起來，使他在中央削權，在地方受制。

可是反地方主義的根源未能消除。這是由中共的封建集權機制所決定，同中共建黨與生俱來。早在井岡山根據地，毛澤東“火拼王倫”，剛上山便誘殺王佐、袁文才，併吞他們的人馬，佔領他們的地盤，香火趕出了和尚；長征到達陝甘寧邊區，暗害了劉志丹，鵲巢鳩佔。其實，如今廣東反地方主義就是當年毛澤東在中央蘇區反AB團搞肅反運動的翻版。與其類似的還有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熱賽拉夫、常委伊敏諾夫地方民族主義反黨集團案、甘肅省副省長、常委孫殿才（回族）地方民族主義右派反黨集團案、廣西僑族自治區陳王駱王廖廖地方民族主義右派反黨集團以及後來在文革中發生的內蒙古內人黨冤案和雲南蒙自沙甸回民大屠殺等慘案。

第二次反地方主義鬥爭發生在1957—1958年反右派運動期間。中共廣東省第一書記陶鑄於1957年12月19日在中共廣東省委第八次擴大全會上的總結中說：“地方主義首先是在海南發起……其他各地也躍躍欲試，蠢蠢欲動。……有的已發展到組織反黨小集團的地步。例如蓬荊反黨小集團、歐新反黨小集團、陳華反黨小集團、陳恩反黨小集團等就是。”

以陶鑄為首的中共廣東省委在毛澤東授意下，在1958年第二次反地方主義鬥爭中再度揪出了已降職為中共廣東省委副書記兼副省長的馮白駒和古大存，揪出“馮、古地方主義反黨集團”。中共廣東省委作出《關於海南地方主義反黨聯盟和馮白駒、古大存錯誤的決議》。在此基礎上，又連續拼湊出蓬荊等四個地方主義右派反黨小集團。

說是拼湊出來的，因為這四個反黨小集團的頭目和成員各不相識，或素有矛盾，更遑論組織什麼反黨集團了。像反右中“章羅聯盟”、“吳祖光小家族集團”、“丁陳反黨集團”一樣，純屬子虛烏有，憑空捏造。發明者因應階級鬥爭的需要，“硬裝斧頭柄”湊合出來這麼四個反黨小集團。

廣東省馮、古地方主義反黨集團和四個地方主義反黨小集團倒有點像中國國旗五星紅旗，四顆小星星拱托著一顆大星星。廣東省第二次反地方主義鬥爭是中共黨內趁反右之勢清理門戶和地方勢力的重要之舉，暴露了毛澤東發動反右運動的真實意圖，重點旨在清洗不服從中央號令的地方諸侯和黨內反對派。

廣東省直機關、各地縣市受這五個反黨集團牽連受處分的幹部竟達兩萬多人，大多數地、市級和省屬廳、局級領導都被打成地方主義分子，受到撤職或降級處分。其中許多人更被劃為極右或右派分子。他們中有十七位省委委員、七十七位省直屬廳局級領導人。廣東省在反右運

動中總共揪出右派分子三萬六千八百零八人，因犯地方主義錯誤而劃為右派的各級幹部卻占了差不多三分之一，可見廣東省黨內反右是以反地方主義作為主線條的，最為典型的是蓬荊右派反黨小集團。

廣東地處東南沿海，臨近南洋。珠江三角洲的人口一半以上有親戚朋友在海外謀生，與華僑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因此葉劍英提出“廣東土改特殊論”不無道理。批倒批臭地方主義後，土改、鎮反、肅反貫徹毛澤東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侵犯華僑利益，隨意分配華僑的房屋、土地、浮財，關殺華僑家屬，造成嚴重後果。

1958年3月，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說：“反地方主義，全國各省市都要進行。地方主義者，實際上是右派，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對地方主義不要讓步。要派一批外地人去廣東，廣東幹部可調一批到北京來。泥裏摻沙，沙裏摻泥，改良土壤。”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廣東省黨內反右派運動的主要重點是反地方主義，把一萬多名地方主義分子劃為右派分子，造成廣東省幹部隊伍的巨大損失。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習仲勳和任仲夷先後調去廣東主政。他們在胡耀邦積極支持下，克服重重困難，平反了反地方主義大冤案。任仲夷說，今後不能再出現反地方主義這樣的事情了。可是一黨專政體制不改，誰敢保證不犯前衍呢？

## 一，地方主義分子

### 蓬荊 海外赤子淪為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頭目

蓬荊反黨小集團的全稱是“蓬（荊）謝（平）鐘（傑民）溫（盛湘）地方主義右派反黨小集團”，四人均為1930年代參加革命的老紅軍。其首腦蓬荊（1915-2002）出生於馬來西亞，為馬來西亞華僑。原名李鴻鈞，祖籍廣東省東莞縣。幾代人僑居東南亞，從未返回家鄉。蓬荊經著名愛國僑領陳嘉庚寫親筆信介紹回國，考入廈門集美中學讀書。1936年3月在北平參加中共外圍組織“中華民主青年先鋒隊”，不久加入中共，進國立北平藝專學習。

七七事變北平淪陷後，他奉命撤離南下，曾在鄂豫皖蘇區、中共長江局舉辦的“農村工作人員訓練班”學習。結業後到紅二十八軍政治部任宣傳科長，又任安徽官亭遊擊隊政委。1939年調到新四軍第四支隊，後轉調任宣傳股長、《前鋒報》主編。

1939年底赴延安進入魯迅藝術學院學習，任中共系黨支部書記。1945年參加中共組織的南下兩廣幹部隊。途中因日寇投降而轉赴東北，曾任東北民主聯軍三縱隊七師二十團政委，後任大連旅大區黨委中共黨校副校長、大眾和光華書店黨組書記等職。

1949年5月，中央抽調在東北的華僑幹部到北京在中共中央統戰部集中培訓，再派往國外工作。是秋出國南下途中，在江西贛州遇到葉劍英，葉留下其中兩廣幹部參加接管廣東。到了廣州，蓬荊即獲委任為省政府交際處長，後改任人事處長，負責接管國民政府的總統府和省政府。曾任民政廳軍代表，處理散兵游勇。處理完畢調往農林水利廳擔任廣東省水產局長。

1954年中共向蘇聯學習，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抽調各省優秀幹部支援重點建設項目。蓬荊旋即調往武漢，任武鋼黑色冶金設計院黨委書記。1956年國務院成立水產部，又被指名調北京任水產部海洋漁業司副司長。

1957年秋蓬荊出差來廣東，恰遇陶鑄掀起第二次反地方主義大辯論。廣東省水產廳湊合出一個莫名其妙的地方主義反黨小集團，把相互之間素不相識的蓬荊、謝平、鐘傑明、溫盛湘拉郎配似地拉在一起。蓬荊是東北南下幹部，謝平來自華東野戰軍。倆人以前均未在廣東見過面。而蓬荊早在1954年便調離廣東。這件純粹的冤假錯案，完全是廣東省領導陶鑄等人主觀臆想出來的。它是怎樣泡制出來的呢？

1957年夏天，蓬荊以水產部海洋漁業司副司長身份出差來粵，老部下數人請他吃飯，其中有人為肅反受審向他訴苦。蓬荊勸他們有錯認錯，無錯可向上級申訴。他舉延安整風為例，當年亦有搞錯的。嗣後有心人舉報稱他此行南下煽風點火。第二次出差福建途經廣東，陶鑄強令水產廳扣下蓬荊批鬥。批判者誣指蓬荊想當廳長，謝平、溫盛湘想當副廳長，其實純屬子虛烏有。

1954年他調中央時，在廣東省擔任領導的趙紫陽曾勸他留下勿走，可把水產局提升為省廳級，當時有農村部副部長李子元和溫盛湘在座。但是這也不是三年後批鬥蓬荊的真正原因，跟地方主義沾不上邊。

扣下已在中央工作的蓬荊，並把他打為地方主義反黨小集團頭目的原因只有陶鑄本人最清楚。蓬荊在聊天閒談時，無意中說起他們自延安出關去東北，途中聽到槍聲，陶鑄嚇得躲進山溝，不敢出來。後來不得不派人回頭去找尋他。蓬荊在閒談中曾經說過陶鑄是“怕死鬼”之類的話。此話傳到陶鑄耳裏，其後果可想而知。



蓬荊夫婦和兒子張小鋼

至於謝平打為地方主義分子的原因更為可笑。他僅僅在中央水產部召開的全國水產工作會議上發言批評了廣東省政府和水產廳領導不民主，作風粗暴，有宗派主義，因而得罪了省廳領導。

蓬荊和溫盛湘兩人劃為極右分子，謝平劃為右派，三人均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勞動教養。鐘傑明本來是被陰錯陽差硬拉入反黨小集團的，是個天方夜譚式的鬧劇。折騰一陣後，又說他認罪態度好，只戴地方主義帽子，免戴右派帽子，受留黨察看處分。

蓬荊打成極右分子後送往三水農場勞動教養。1962年送進中共廣東省委統戰部舉辦的“右派分子社會主義政治教育學習班”，邊勞動邊洗腦。半年後送回省水產廳當養殖公司副經理，再度下放惠陽澳頭珍珠養殖場當蹲點場長。

文革中，革命造反派把他這只死老虎揪出來當活老虎打，打得死去活來再關進監獄。三年後放出監獄送進廣東省農林水系統粵北五七幹校放牛養豬。1973年回廣東，1978年改正。改

正後任廣東省水產廳副廳長、湛江水產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1984年以正廳級離休，享受副省級醫療待遇。

2002年病逝時，後人對他的評價是：

海外赤子北上奔延安進魯藝北戰南征忠心為黨幹革命，  
救亡先鋒南下創漁業辟南珠培養專才奮爭水產樹豐碑。

蓬荊的兒子張小鋼旅居澳大利亞，是知名的網路作家。他既有流體力學的學位，又擁有電腦學位，因此充分發揮他的專長，開展網路民主化運動，為中國的民主化而奮鬥不息。

謝平（1921-1996）廣東省梅縣人。1940年入黨，團級幹部。南下廣東省當省財政廳處長，後調任汕頭市稅務局長。反右前，謝平批評水產廳領導有宗派主義，不民主，老幹部都想走。因此被劃入蓬荊地方主義反黨右派集團成員。謝平戴上右派帽子後，送省屬白雲山農場勞動。數年後摘帽，調返水產廳新洲漁輪廠車間勞動。1979年改正後任水產廳造船公司經理。多年歷經折磨，身心備受摧殘，疾病纏身，1996年元旦病逝於廣州，終年七十歲。追悼會上懸掛著他生前自撰的挽聯：

卅載戎馬，廿載沉冤，坎坷奮鬥，謳心血，捫心何愧？  
一生忠誠，畢生盡瘁，剛正不阿，疾惡仇，此生何求！

在蓬荊地方主義右派反黨小集團成員中，遭遇最為慘烈的非溫盛湘莫屬。誠如老子所說：“壽者多辱”。溫盛湘雖然是蓬荊地方主義反黨小集團中受苦難最重的人，卻是最長壽的。他以九十高齡著書立說，寫回憶錄，保存歷史真相，為先走的難友討回公道。

溫盛湘(1919-)又名溫梅先、溫予群。1919年12月出生于廣東梅縣。1933年在廣州中山大學附中讀書時，即接受他哥哥溫盛剛烈士（1926年入黨）的啟蒙教育，當“廣州文總（社聯）”通訊員，進行革命活動。1934年初“廣州文總”遭破壞，他哥哥等數十人被捕入獄，溫盛湘每週去探監，秘密通訊，協助營救。8月1日“廣州文總”溫盛剛烈士等六人被殺害犧牲。他到黃花崗畔刑場收烈士遺體，這年他才十四歲。次年他即參加了廣州一二九學生抗日救亡活動。1936年秋參加了中共領導的外圍秘密組織“廣州藝術工作者協會”理論組和地下學聯。1937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入黨後即在中共廣州市僑工委宣傳部任幹事，駐守市工委外縣工作委員會秘密機關。並自籌經費創辦《遊擊隊》雜誌，是一個最早刊有毛澤東、洛甫等中共領袖文章的刊物，共出版了十多期，後成為市委外縣工委機關刊物。同時還創辦《新時代出版社》，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十多本著作。此期間還協助刊印過中共廣東省委出版的《大路》和延安中央出版的《解放》雜誌。

1937年9月，中共中大附中支部成立時他任書記。10月中旬日本侵略華南，廣州淪陷，他參加的“抗先”數萬人退出廣州，至四會城郊成立“抗先”（廣東青年抗日先鋒隊）總隊部，被選為二十三個委員之一，其後任“抗先”總隊部常委兼宣傳部長。

1938年底成立中共廣甯縣委時，他任常委、宣傳部長，1940年任中共始興縣委書記。1945

年秋到東江縱隊司令部，奉指示派往廣州從事地下工作，由中共香港分局（後為華南分局）直接單線領導。期間曾協助華東及上海等地下機構的外貿及運輸船務工作，直至廣州解放。

廣州解放時，溫盛湘是最先主動與南下進城的四野十五兵團接上關係的地下黨員，曾協助接管城市。省支前司令部成立時，他任交通運輸處長。海南渡海作戰成功後，他任海南戰役善後委員會賠償處長。**1950年10月**任廣東省修築公路委員會東線五六工程處政委。**1952年春**，三反運動中被懷疑為大老虎被捕關押了半年多，後查明無貪污行為，釋放回水產公司任經理。

**1956年秋**調北京中央水產部對外聯絡司，兼任全國農展會水產館副館長。溫盛湘此時的組織關係雖在廣東，但是他要求留部工作，並到中央黨校學習。反右中他是水產部對外聯絡司反右領導小組成員。**10月**間風雲突變，國慶日還在觀禮台觀禮，國慶後被限令返粵。他一返抵廣州，水產廳認定他為蓬荊反黨小集團成員之一。他既無反黨言行，也沒有寫過大字報，他本來是領導反右運動的。最後定他為“地方主義反黨小集團”成員，極右分子。

**1958年**初送白雲山農場勞動，至**6月**，突然被逮捕押送黃花路看守所監獄，關押了一年多。與反革命、敵特等囚犯混擠斗室，至**1959年秋**宣佈以“不適在此改造”為由，轉送省勞教處收容隊，後轉送三水農場勞教三年。至**1962年底**釋放回省水產廳，後又下放去海南島白馬井南海水產公司。

**1966年**文革開始，他這只死老虎又被當作活老虎打，批鬥後下放木材車間勞動。**1968年8月**中旬再被戴高帽遊街後，與另兩人五花大綁押上南司漁船送返海南島白馬井漁港南司基地。一上岸即遭亂棍野蠻毆打，並給短槍衝撞了幾十下，折斷肋骨兩條。另兩人則被毆打至半死，拉至沙丘槍殺，要他挖坑埋屍。

據說上面有交待要保護他，不能打死。首先他是黨內活字典、活檔案，要留下活口；其次懷疑他與“特一號”案有關；第三，江西省委黨校校長有歷史問題，已派來兩人，正要他寫材料。為此才救他一命。他被關進牛棚一年多，期間歷經折磨、凌辱摧殘，三天三夜不准休息車輪大戰，甚至打算將他吊死示眾。駐省廳軍代表認為這是野蠻恐怖暴行，予以干涉。該軍代表也因此以不受歡迎的人而被趕走。軍代表向海南行署作了反映，他才免予一死。

**1970年**初送荒山野嶺開闢農場，住帳篷與山豬、黃獐等野獸僅一布之隔。自搭茅棚，泥巴糊牆。**1971年**夏再被綁返南司，不知何故再次關押兩個月多。其後一位頗有正義感的軍代表瞭解他的情況後，立即解除關押。**1978年**冬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為其改正，歷時二十二載的沉冤終得到昭雪。

蓬荊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案牽連了許多人，其中溫盛湘妻子夏冰受牽連劃為右派。她於**1938年1月**入黨。溫盛湘打成右派後她被逼離婚，否則開除出黨。她忍氣吞聲，備受折磨，英年憂鬱早逝。夏冰在解放前曾先後任中共南雄縣常委、宣傳部長，增、龍、博中心縣委兼正果區委書記，東江縱隊組織部科長，獨立大隊指導員。解放後任廣州市公安局外事科長，進中南黨校、人民大學及中央黨校學習黨史後轉任中央黨校教員，廣東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主任及外語學院馬列主義教研室主任，逝世時年僅五十五歲。溫盛湘遭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人間悲劇，



真是“此情可歎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鐘傑民（1913-1976），原名鐘文傑，又名鐘卓英。廣東省東莞縣厚街人。1937年4月參加中國共產黨。曾留學日本。在日本從事過愛國抗日救亡活動。抗戰初在廣州參加組織文化界抗敵救亡服務團。中共地下市委曾在其家中舉辦過黨員啟蒙訓練班。1938年10月廣州淪陷後，先後在粵北連縣及廣西柳州等地從事革命活動。日本投降後東江縱隊北撤，他留在香港搞漁民小學等工作。

1949年10月廣州易幟後任省農林廳水產局軍代表兼局長。1954年任省水產廳養殖公司經理。1955年冬他們夫婦兩人與蓬荊有矛盾，均不願留水產廳，鐘傑明調去省水電廳任處長，其夫人李玉如調去中山醫院任人事科長，後為藥物加工廠長。1957年冬反地方主義時，鐘傑明被硬拉入蓬荊反黨小集團，成為成員之一。當時他早已調離水產廳一年多，蓬荊則調離廣東三年。實際上他與蓬荊工作上、感情上都合不來，常有分歧意見，故早有離開水產廳之意。他與謝平也不認識，他走後謝平才調入。故此這個地方主義反黨小集團是個十足的怪胎，成為天方夜譚式的鬧劇。鐘傑明幸虧已調入水電廳，僅作地方主義分子處理，未戴右派帽子，保留了黨籍。但也遭降級處分，身心長期不舒。1976年秋心臟病突發而逝世，終年僅六十三歲。

### 陳恩 陳恩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

1957年冬，在反右運動高潮中，廣東省進行了反地方主義的大辯論。全省各地、專、縣、市如潮汕、韶關、江門、佛山、興梅、湛江、海口等各地都已揪出一個個地方主義反黨小集團，只有省會廣州按兵不動。此前不久，陶鑄、區夢覺點名批判了中共廣州市委書記處書記吳有恆為“松有嶺”事件翻案；批判了吳有恆對史達林《論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質疑，吳認為社會主義時期仍有需要發展商品經濟，不應取締私人無牌小加工廠和銷售進口洋貨的小攤販。吳有恆還認為南下幹部和本地幹部各有所長，地方幹部不比南下幹部差等等。凡此種種使吳有恆列為反地方主義的重點批判對象。但他一個人還不足以構成一個地方主義反黨集團。

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在省委會上向中共廣州市委書記王德和趙武成施加了壓力，指令他們掘地三尺、深挖細找，務必在廣州找出幾個地方主義分子來，拼湊成繼荊蓬、歐新、陳華之後，第四個省一級的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反黨集團的頭目先確定為中共廣州市委秘書長陳恩、中共廣州市委書記處書記吳有恆、鐘明和市委辦公室主任王伯群。人員定了，有了方向，再組成專案組去搜集他們的罪證。這是中共搞政治運動一貫使用的先入為主的逆推理法和反證法，屢試不爽。

專案組硬說吳有恆、鐘明等二人想改組市委，成立第二市委。初時想扣上“吳鐘聯盟”的帽子，後見實在挖不出材料，也對不上號，於是便把市委秘書長陳恩和南下幹部、辦公室主任王伯群也拉進來湊成四人反黨小集團。吳、鐘本身就是市委書記，陳、王是秘書長和辦公室主任，何來改組市委？吳、鐘、陳三人都是1930年代老黨員、久經考驗的老紅軍老幹部。王伯群是河北人，抗戰初期入黨的南下幹部，也劃為地方主義分子。實際上是想通過批鬥陳恩、王伯

群來揭發吳有恆、鐘明的反黨罪行。

市委第二書記趙武成在批鬥陳恩時，見始終挖不出什麼罪證，甚至恐嚇誘惑說：“你若講出吳有恆、鐘明反黨材料則可不開除黨籍。”但陳恩仍沒有說出半點材料。趙武成便拍桌大罵陳恩，說：“你還有良心麼？”罵陳不識抬舉。陳恩答曰：“共產黨員的良心就是黨性。實事求是，不講假話。”結果陳恩處分最重，殺雞儆猴地把他列在他的上級吳有恆、鐘明之上，成為反黨集團頭目，開除黨籍，連降四級，由行政十級降至十四級，下放嶺頭農場勞動。

中共廣州市委第一書記王德在大會上雖然宣佈給陳恩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但實際上這頂右派桂冠沒有放入陳恩檔案內。更滑稽的是在嶺頭農場右派摘帽時，要陳恩當組長負責去摘別人的右派帽子。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右派改正時，因在檔案袋裏沒有陳恩劃右派的書面結論，所以僅平地方主義的反，無右派帽子可摘，白白吃了二十多年冤枉官司。

陳恩(1921-)又名陳欣，1921年生，廣東東莞人。1936年2月在廣州嶺南大學附中讀書時參加中共的外圍組織“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同盟”，1937年8月轉為中共黨員。1938年曾任“廣東青年抗日先鋒隊”（簡稱抗先）副總隊長，中共廣東省青委委員。1940年在始興參加省委黨員骨幹訓練班學習。結業後派赴南路從事黨的地下工作，曾先後任中共滇桂黔邊委常委，一支隊政委。曾率隊派赴越南參加支援越南抗法戰爭。

中共掌權後任共青團廣州市委書記，後任中共廣州市委秘書長。劃為右派分子後下放嶺頭農場勞動。後調第二教育局所屬勞動大學、市業餘大學當副校長。1979年改正後任中共廣州市委統戰部部長、市顧委常委。

吳有恆(1913-1994)出生於廣東省恩平縣沙湖鎮上凱崗村。1936年9月在香港加入中共。曾先後任中共香港市委書記、東南特委組織部長。1939年被選為中共七大代表，經長途跋涉赴延安，後因七大延期，改到馬列學院學習，參加整風。七大後於1945年返粵，曾任南路地區特派員、人民解放軍粵桂邊區部隊司令員、粵中縱隊司令員。

中共掌權後任中共粵中地委書記、廣州市委書記。出席過中共八大、十二大，任全國第一屆人大代表。他也是《羊城晚報》黨委書記兼總編輯，專業作家，省人大常委副主任。1958年初被打成地方主義反黨集團頭目，下放到廣州造紙廠車間勞動。此期間曾寫有《北山記》、《山鄉風雲錄》、《濱海記》等書。

十年動亂中備遭迫害摧殘，初在廣州監獄被關押近兩年，再轉解粵北樂昌荒山野嶺中的“三十一辦”關押重犯監獄的單人房，達兩年之久。至1972年以後調到英德縣省文藝五七幹校，繼續監督審查。1973年春節獲釋放回廣州居家待罪。1980年8月正式宣佈撤銷1958年對吳有恆的處分決定。

吳有恆是廣東省著名的將軍和作家，能文能武，博學多才，著作頗豐。於1994年10月23日與世長辭。

鐘明(1919-)原名鐘子鴻，又名鐘子驛。原籍寶安縣（今深圳市）龍崗人。1936年11月在香港入黨並在港從事地下學運及工運。曾任中共九龍區委書記，東南特委宣傳部長。1939

年被選為中共七大代表，經一年多長途跋涉才到達延安，因七大延期召開，先去中央高級黨校一部學習及參加整風。七大後於1945年奉派返粵工作，任中共廣州地下市委特派員、市城工委書記。

廣州易幟後，先後任中共廣州市委書記處書記、市監委書記，副市長。1958年反地方主義運動中，先被誣為“吳鐘反黨聯盟”，後劃入“陳恩右派反黨小集團”。撤去市委書記、市監委書記、副市長三職，連降三級，留黨察看一年，送協同和機器廠車間勞動。

1961年調去任中共廣州市芳村區委書記，1963年調回市政府任副市長。文革中再被揪出批鬥二百多場，市革委成立後任市革委會常委。1980年改正，摘去地方主義分子帽子，並撤銷各種處分。以後調省人大任常委會副主任，中共廣東省顧問委員會副主任，直至離休。

王伯群，河北省人，抗戰期間入黨。廣州易幟後南下，是南下幹部。曾任共青團廣州市委書記。中共掌權初期，在陳恩任共青團廣州市委書記期間，曾被批判犯有“先鋒主義”，“鬧獨立性”的錯誤，後又遭否定。陳恩調離後由王伯群接任共青團市委書記。反地方主義時，王伯群任中共廣州市委辦公廳主任。

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區夢覺在談到“廣東歷史問題大辯論”有什麼收穫時說：“不僅有古、馮為首的地方主義反黨集團，還有廣州市委書記吳有恆為首的地方主義反黨集團。”但初時的反黨集團僅有吳有恆一個人，獨木不成林，構不成集團。在省委壓力下硬把鐘明、陳恩及王伯群也拉進來，拼湊成“陳恩地方主義反黨小集團”。陳恩是吳有恆、鐘明的下級，卻讓陳恩當“反黨小集團”的頭目。連南下幹部王伯群也拉了進去湊數。

廣東的反地方主義運動是在當時極左路線的思想指導下開展的政治運動，特別是後來又與反右運動掛上了鉤，毛澤東武斷說地方主義分子就是黨內的右派分子，使反地方主義運動的謬誤進一步發展成為冤假錯案。這場運動是當時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歷史條件下的產物。

廣東省直屬機關，各地市縣因涉地方主義而受處分的地方幹部共一萬多人，絕大多數地市級和省直廳局地方幹部都被打成地方主義分子，受到撤職降級處分。

## 歐新 歐新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

歐新地方主義右派反黨小集團是以陶鑄為首的中共廣東省委在反右運動中挖出的四個地方主義小集團之一。

歐新（1910-1987），廣甯縣芙羅人，他是1927年12月參加過“廣州起義”的工人赤衛隊隊員。起義失敗後避往順德、澳門等地，當店員作掩蔽。1937年4月在澳門加入中共，1938年參加地下黨組織的“會（四會）甯（廣甯）港澳華僑回鄉服務團”，回到家鄉從事抗日救亡革命活動工作，曾任中共石澗區委書記等職。

解放戰爭時曾任粵桂湘邊區縱隊獨立團團長兼政委。中共掌權後任中共廣甯縣委書記兼縣長，土改後調江門粵中行署任辦公室主任。1956年調來省委統戰部任幹部處處長。是年冬天省委召開第一屆黨代會，省委領導號召黨員交心，對過去土改中遺留問題及三反、五反等運動中

被錯傷過的人，本人可以申訴，知情的亦可以替他人向上反映，目的是為了弄清是非，加強團結。並說不打棍子，不扣帽子。

當時在省委黨校學習的解放初期任中共廣寧縣委組織部長、代縣長的馮華，以及聽過此會議傳達的原廣甯縣委委員兼古水區委書記高梅，分別上書省委反映解放初期中共廣甯縣委書記王炎光等人在廣甯搞土改時作風粗暴，搞得很左，傷害了許多老區基本群眾和錯傷不少老區幹部，整隊時許多人被“搬石頭”撤職或調離。如解放前中共派人打進舊政權去當鄉保長，本屬“白皮紅心”策略，使遊擊隊武裝賴能活動，有的還營救過中共領導。解放初其中一些人被提為區、鄉長，而且是經縣委集體討論決定的。

歐新等當時的中共縣委領導被說成嚴重喪失立場，敵我不分，馮華為此扣上什麼“馮華基礎”，以致一些人當作“白皮白心”的反革命分子殺害，甚至“紅皮紅心”的老黨員如譚堯裕及江宏基亦以“偽鄉長”罪槍決，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才得以平反昭雪。又如四會的陳德，1937年去延安抗大學習，1938年派回來，一直堅持地下工作及武裝鬥爭，當過縣委書記，解放後任過四會縣副縣長。土改時以階級異己分子罪開除黨籍撤職降級，下方到封開縣邊遠糧倉當保管員。

歐新及陳重文為此不平，曾幫助陳德轉遞過申訴，後得復查否定原處分。可惜文革中再被揪鬥迫害，用鐵線捆綁手足，開大會鬥爭後拋入至西江河中淹死，聞之令人髮指。陳德案已徹底平反，追悼會祭詞中有“死後無屍首，悼念欠骨灰”字句。骨灰盒內放點遺物，現存放於銀河革命公墓。

歐新等人認為，僅僅依靠南下幹部掛帥的想法片面，他認為不論外來、本地幹部各有長短。卻被誣為“反對南下幹部掛帥”罪。1957年冬，第二次反地方主義鬥爭時，馮華、高梅分別成為批判對象。歐新雖沒有在馮、高的上書上簽過名，只是見面時談論而已，也被省統戰部作為重點批鬥的地方主義小集團頭子，並扣上極右分子帽子。

此時原省委統戰部長饒彰風也被撤職，下放到連平縣，調進羅xx當部長。羅以其反地方主義得力受寵于陶鑄，後當上副省長。他在反右中大顯身手，把馮華、高梅拉進歐新的“地方主義反黨小集團”，還牽連到原廣甯縣縣長陳威。四會統戰部長顧兆新因來省開會，見過歐新亦被納入集團，劃為右派分子。統戰部處長李海，列入集團，劃為極右分子。原幹部處科長陳重文因與歐新是上下級關係，為陳德遞過申訴書，無辜劃為右派。統戰部還有處長王可夫被扣上極右帽子。如此僅統戰部就劃了三個處長為極右分子兼歐新地方主義小集團成員，均被送去勞教，成為省直機關之冠。

歐新當年在廣州起義失敗後去順德其舅父醫藥店當學徒，學得一套醫治肝病的秘方。此時適北京、武漢肝炎流行，有人推薦他，遂被武漢的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王任重及北京共青團中央三胡等領導延請北上治病。歐新這個極右分子、地方主義分子和反黨集團小頭頭，卻成了醫治肝病專家而名揚北國。歐新在名義上要送三水農場勞教，實則在外治病當大夫。後來中顧委曹瑛得知歐新是廣州起義赤衛隊員等歷史，特親筆書寫一條幅“不為良相是良醫”書贈歐新。

1962年歐新摘帽後，安排擔任省文史館館員。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歐新及其所謂地方主義反黨集團成員二十多人都得到了改正，恢復了黨籍及原職級。歐新於1987年11月在廣州病逝。

### 陳華 陳華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

陳華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是廣東省四大省級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中規模最小的一個，陳華本身的職位也沒有其他三個右派反黨集團頭目那麼顯赫。但是中共廣東省委劃陳華和集團中其他人員為地方主義右派分子的手法十分卑劣。陶鑄之流用正常的上訪信件作為定罪材料，剝奪了一個黨員或公民向有關方面反映情況的正常權利。今天，事隔五十多年，中共毫不吸取歷史教訓，對沿著正常途徑向上級反映情況的中共黨員和普通公民照樣進行打擊報復。

陳華（1914-1990）廣東省梅縣松口鎮人，原名溫京，溫宗人。1935年在廣州商學院讀書時，參加了中共的外圍組織——中國共產主義青年聯盟，簡稱“中青”。1936年冬轉入中共。

1937年秋陳華創辦抗戰救亡刊物《抗戰大學》，出版了十多期。後來《抗戰大學》成為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的機關刊物。同一時期，他開辦了《統一出版社》，從事翻印馬克思、列寧等經典著作的工作。

1939年冬天，陳華參加中共廣東省委在南雄舉辦的黨員幹部訓練班。結業後派往粵南桂北，任茂（名）（電）石中共建黨特派員兼三縣武裝部指揮員。1946年擔任中共南路欽廉四屬（十萬大山、六萬大山）特派員兼中共桂東南特派員，中共粵桂邊六萬大山、合浦、北海地委書記。

1953年—1954年期間，陳華奉調到中共馬列學院學習。馬列學院即中共中央高級黨校的前身，培養中共地、廳級以上幹部。學習期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鄧子恢聽到反映，派出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負責幹部到中央馬列學院聽取老根據地合浦地區學員的意見。陳華作為中共合浦、北海地區的地委書記，應中央農村工作部負責人的要求，向中共中央寫了一封長信。信中詳細反映了合浦地區等老根據地存在的問題，並中肯地說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議，他還幫助根據地出身的老幹部遞交了一些向中共中央反映老區問題的信件。

這種向上級反映情況的信件，本來是中國共產黨黨章規定的每個黨員應該享有的權利。可是過去要受迫害，今天照樣也會受迫害。在廣東省第二次反地方主義鬥爭期間，陳華的學習已經結束，返回廣東。在中共廣東省委黨校（原稱中共中央第六中級黨校）擔任哲學教研室主任。他的信件被當作地方主義翻案活動證據處理。陳華被扣上反黨分子、地方主義分子、混進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右派分子等一大堆帽子，開除黨籍，撤職查辦。在文革中又受到進一步打擊，歷經二十二年折磨。

在陳華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中，還有原合浦根據地的老幹部、老黨員、中共廣西靈山縣委書記陳銘金等二十餘人以及中共廣東省委黨校的十名員工。1979年2月陳華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成員案全部改正，並在中共廣東省委機關報《南方日報》上刊登消息公告全黨。

## 古大存 廣東地方主義魁首

廣東省二次反地方主義運動總共揪出三萬六千多名地方主義份子，有一萬多人同時“兼任”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而其中地位最高、名氣最響的二位魁首是分別擔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和廣東省長的馮白駒和古大存。

古大存(1896-1966)廣東五華梅林村人，字永鑫，曾用名張炳、陳德炎、蘇必達、顧達方。1917年春入梅縣中學。1919年五四運動對他影響極大，他積極參加學生運動。1921年入讀廣東法政專門學校，深受陳獨秀、陳公博的影響，接受共產主義和馬列主義，於1924年便加入中共。年底畢業，參加廣東革命政府組織的東征軍，任戰地政治宣傳員、宣傳隊負責人。1925年受中共派遣



古大存，原中共廣東省省委書

回家鄉五華組織群眾武裝，領導農運。成立中共特別黨支部時，他任組織委員和五華縣農民自衛軍大隊長。1927年四一二後，他擔任五華縣革委會主席、工農紅軍第七團團長，率部進山建立革命根據地，任五華等五縣暴動委員會主席。

1929年任中共東江特委常委、軍委書記、東江民主政府副主席、工農紅軍十一軍軍長兼政委。1932年擔任東江紅軍第一路軍總指揮、東江遊擊縱隊政委、中共東江特委常委、組織部長。1938年後為中共廣東省委統戰部長、廣東省出席中共七大四十人代表團長，在七大選為中共中央候補委員。

1946年奉派出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委員、秘書長、組織部秘書長等職。1949年後又調回廣東，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常委、中南行政委員會委員、廣東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長。

在廣東省土改工作中，中南行政委員會主席林彪指示土地改革工作委員會主任李雪峰，批評廣東省“土改特殊論”，缺乏階級分析，把一些次要的、少量的特點(華僑、工商業)擴大化。進展緩慢，群眾沒有充分發動起來，黨組織和幹部隊伍不純，他們同地主、官僚、國民黨、華僑、資產階級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下不了手。

1950年9月，毛澤東用揀沙子的方法，抽調九千名北方幹部南下，改組廣東省幹部隊伍。中共中央發出“依靠大軍，依靠南下幹部”的指示。南下的北方幹部擔任黨政第一把手，廣東本地幹部擔任副職。中南土改委員會甚至指示說，對於華僑地主的財產可追至海外，“不應只以國內財產為限”，沒收面達80%。

葉劍英、方方、古大存從實際出發，保護華僑利益。他們認為大多數華僑是愛國的，出身於勞苦大眾，賺些錢買地蓋房造福家鄉，愛國華僑不能一概以地主論處。因此廣東省土地改革應按地方特點“甯慢莫亂”。南下幹部有老區經驗，不熟悉廣東特殊情況，照搬照套北方土改模式。

雙方爭持不下，毛澤東插手干涉了。他在1952年6月召開會議，提出“三個烏龜論”，定

下調子，批評了葉劍英、方方、古大存。葉劍英承擔責任，檢討說“主帥無能，累及三軍”，會後稱病回京休養。方、古或調職或降職。廣東省第一次反地方主義，集中六十七縣土改小隊長以上七千七百零三人進行“整隊”，處理七百八十一人，占土改幹部10%。

古大存遭批判後降為副省長、副書記。1955年後才調回省政府主持工作。1958年在反右補課中的第二次反地方主義鬥爭是由“林克澤信件”事件引起的。林克澤是1920年代入黨的老黨員，1931年已任中共海口地下市委書記，在東北中共西滿分局工作時與陶鑄相識，後來林克澤調回廣東任省政府秘書長。

陶鑄主政廣東後，欲調林任海南行署主任。林給老上級馮白駒寫信，要求兼任中共海南區委書記，稱：“如不兼任書記，很難發揮作用。”信末附言：“古老向來對海南比較關心，此信是否也讓他看一看。”

信送到馮白駒家，馮不在家，馮的秘書便把信直接送去省委。陶鑄閱後乘機大做文章，將信印發中共廣東省委四屆全委會議，在會議結束時宣佈把馮、古打為“馮白駒、古大存地方主義反黨集團”以及揪出蓬荊等四個地方主義反黨小集團，開始了廣東省第二次反地方主義運動。

對於馮白駒、古大存而言，還有一個更為嚴重的包庇右派分子，與右派共鳴，一鼻孔出氣的問題。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區夢覺沖著馮白駒、古大存說：“右派分子對他們的言論十分讚賞，他們對右派分子也引為知音。這裏只舉一個例子來說明。1956年，右派分子雲應霖到海南島借視察之名，行放火之實。回到廣州後，根據地主、反革命分子提供的材料，在省人代會第四次會議上(古大存在青島養病沒有參加)，向黨進行極端惡毒的攻擊，說海南島人民比解放前還痛苦萬分，並說什麼‘海南人民頂呱呱，不吃大米吃地瓜’。”

“對雲應霖的污蔑，省委認為必須組織大會發言予以駁斥，可是馮白駒卻堅決反對，認為壓制民主。當時只有海南和合浦二位代表發言以及陶鑄同志在總結發言中，對雲應霖的反動言論作了一次批駁。可是僅僅這樣，也惹起他們十分不滿。古大存從青島回來後大表不滿，認為雲應霖所說沒有什麼不對，省委根本不應該批判雲應霖，‘批評他就是不讓人家說話，就是壓制民主’。以後古大存在由他主持的第五次會議上，就到處散佈空氣，攻擊省委不讓民主人士說話，不民主。聲言第五次人代會要‘大大發揚民主’，‘有什麼話就可講出來’。現在可以清楚地看到，並不是他們真的這麼愛民主，只是他們要和右派分子唱同調。反黨集團的用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嗎？”

雲應霖(1896-1975)海南島文昌人。早年參加國民革命軍，在北伐軍中歷任連長、營長、上校團長。1932年擢升為國軍第七十八師少將師長，參加一二八淞滬抗戰，次年參加福建事變。抗戰時期同情支持中共，被國民政府逮捕入獄。四年後保釋出獄，返回廣東參加抗日。

抗戰勝利後，先後參加中國農工民主黨和民盟。中共掌權後他擔任農工廣東省主任委員、省人大代表、省政協常委、海南行政公署副主任、廣東省監察廳副廳長。1975年5月逝世。

為了打倒古大存，陶鑄在全省上下廣泛發動，自下而上層層揭發，重新認識古大存，把他搞臭打倒。古大存撤銷中共廣東省委副書記、省人委黨組副書記的職務。保留黨籍、保留省委

常委、副省長。戴地方主義分子帽子，但不劃右派。當時李富春自廣東返京，古大存托他帶信給中央，提出處分太重。可是陶鑄看信後認為處分太輕了，反而把保留的常委和副省長職務統通抹掉了。古大存連降數級，下放增城，任中共增城縣委書記。

1962年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七千人大會)上，馮、古兩人均遞交申訴材料，同年10月中共中央批復“不予平反”。1961至1965年再任副省長。

古大存在觀看梅州地區漢劇團演出的新編歷史劇《齊王求將》後，感觸頗深，心潮起伏，寫了一首詩舒發情懷：

齊王昏聩七年中，犯境秦兵一振聾。

愛國無鹽終未死，匡有田相為先容。

驚慌失措方求相，忠憤言懷許整戎。

舞態歌神傳妙肖，現身心與古人通。

注：“無鹽”為皇后的名字。

進入文革，1966年成為古大存的災難之年。陶鑄一貫極左，得到毛澤東的欣賞。調到中央，一下子竄到第四把手。後來曇花一現，被江青抓住把柄，淪為階下囚。但他在權傾一時之際，不忘老冤家古大存，揭出他的舒懷詩，交給紅衛兵和造反派批鬥，令古大存飽嘗紅色恐怖之苦。可憐叱吒風雲的一代革命家于當年11月命喪黃泉。

## 黃榮 廣西地方主義黑後臺

毛澤東於1958年1月巡視到廣西，將廣西地區的反對地方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鬥爭亦納入反右運動範疇。廣西僑族自治區與廣東、寧夏、新疆、青海等地區一樣，毛澤東所到之處，都是反地方主義的重災區。毛澤東親自跑到廣西，揪出了“陳王駱王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還揪出了一大批戴帽或不戴帽的地方主義右派分子。黃榮便是劃為內控右派，受開除黨籍和降職降薪處分的地方主義分子。

黃榮（1911-1990）原名黃樹榮，廣西巴馬縣人，僑族。1929年便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中共劃右的少數1920年代早期黨員之一。加入中共後任鳳山縣蘇維埃政府軍事委員，東鳳農民赤衛軍連長。

1931年隨紅軍主力進入中央蘇區，參加反圍剿作戰和二萬五千里長征。長征中任紅三軍團和紅五軍團電臺報務管理主任；紅四方面軍二局局長，中央軍委二局科長。抗戰時期任新四軍二師通訊大隊長兼政委、新四軍總部通訊總隊副總隊長、華東通訊學校校長、華東電信工程學校校長兼政委等要職。



黃榮，原廣西僑族自治區副主席，廣西地方主義黑後臺



中共執掌政權後，黃榮擔任華東電信管理局副局長兼上海電信管理局局長。不久調回廣西，任廣西省交通廳廳長、中共廣西省委交通部部長、廣西機械工業廳廳長、交通指揮部主任、廣西僑族自治區副主席、中共廣西僑族自治區委員會常委、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廣西僑族自治區第一至三屆政協副主席、廣西僑族自治區第五至六屆人大常委會主任。曾任中共八大代表和第一至六屆全國人大代表。

黃榮在中共僑族幹部中是少有的早期高級幹部，僅僅因為工作上與主要領導有分歧，卻也不能倖免被打成“地方民族主義分子”。雖然沒有戴右派分子帽子，但是逃不過內控右派的命運。他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降職降薪。

受黃榮領導的一些省部級領導幹部，亦被打成右派分子和地方主義分子。陳王駱王反黨右派集團中的副省長陳再勵、省委組織部長王夢周、省委宣傳部長駱明、省委文教部長王浩、省委財政部長廖原、廣西軍區兵役局長廖聯原，不僅劃為右派分子和混進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而且還戴上地方主義分子的雙重帽子，受牽連者達一千多人。黃榮則是陳王駱王右派反黨集團的黑後臺。

## 王定等 廣東省劃為地方主義右派的幹部

中共環江縣委地方主義集團

王 定，原中共環江縣委書記，極右分子。

陳朝群，原中共環江縣委副書記，極右分子。

車丙寅，原中共環江縣委副書記，極右分子。

中共縣委四個正副書記有三個劃為右派分子，縣委改組。農村工作部正副部長譚彥明劃為右派分子、李堅劃為中右分子；全縣八個區四個區委書記劃為右派分子，一個劃為中右分子，全縣幹部中有九十七人打成右派分子，六十六人被劃為中右分子；更多的則被扣上王定的“社會基礎”的帽子，被清除回農村管制勞動。

夏 冰，女，1938年加入中共，曾任東江縱隊組織部科長，獨立大隊指導員。1957年任中央黨校教員，廣東省黨校黨史教研室主任、廣東外語學校馬列主義教研室主任。受其丈夫、蓬荊地方主義右派反黨小集團成員、極右分子溫盛湘牽連而劃為右派分子，被迫離婚。

麥君素（1913-2001），廣東南海人，1937年在香港加入中共，中共港澳工委宣傳處長。1958年反右補課中，因地方主義劃為右派分子。

陳 禮，廣東省供銷公司，受蓬荊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牽連而劃為極右分子。

程 功，廣東省南海水產公司，受蓬荊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牽連劃為極右分子。

程一嶽，廣東省南海水產公司，受蓬荊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牽連劃為極右分子。

方國華，廣東省南海水產公司，受蓬荊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牽連劃為極右分子。

馮順樓，廣東省南海水產公司，受蓬荊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牽連劃為極右分子。

何爾夫，廣東省南海水產公司，受蓬荊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牽連劃為極右分子。

黃君默，廣東省南海水產公司，受蓬荊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牽連劃為極右分子。

蔣普明，廣東省南海水產公司，受蓬荊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牽連劃為極右分子。

鄭心惠，廣東省南海水產公司，受蓬荊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牽連劃為右派分子。

傅尚藝，廣東省水產廳，受蓬荊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牽連劃為右派分子。

蕭子超，華南墾殖局，地方主義分子，右派分子。

楊 奇（1922-）廣東香山人，1941年在香港加入中共，東江縱隊機關報《前進報》社長，1957年（羊城晚報）總編輯，劃為地方主義分子，右派分子。

陳 威，廣甯縣副縣長，受歐新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牽連劃為右派分子。

沈秉強，韶關地區專員公署副專員，地方主義分子，極右分子。

顧兆新，中共四會縣委統戰部部長，受歐新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牽連劃為右派分子。

彭中英，湛江地區專員公署副專員，地方主義分子，極右分子。

### 益多朋措（藏族） 現行反革命右派分子

益多朋措是個典型的藏族漢子，長有一副豪放而桀驁不馴的眼睛。他又是五十年前為數不多的受過高等教育的藏族知識份子之一，也是為數不多的從夾邊溝死亡營死裏逃生的倖存者。

益多朋措（1926-）出生於甘肅省臨潭縣，漢名王珍。家庭出身中農。1941年考入蘭州一中，1949年高中畢業後考入蘭州大學少數民族語言文學系，因休學轉入西北大學東方語言系。姊姊王哲是1946年入黨的中共地下黨員，益多朋措從小受姊姊的影響頗深，靠近中共。他在1952年劃入西北民族大學春季班後，於1955年畢業。在校期間曾任甘肅省足球隊隊長，經常率領足球隊外出比賽，因此見多識廣。

大學畢業後他分配到《甘肅時報》社記者組。1956年調到甘肅省民族委員會擔任行政二十級的講師級少數民族語言翻譯。益多朋措劃為右派分子的起因是與當時的頂頭上司、中共甘肅省民委黨支部書記馬學海有齟齬。馬學海在反右中說打蛇要打頭，伺機報復益多朋措。可是他沒有發表過任何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言論，實在抓不住什麼把柄，反右運動中僥倖逃過一劫。可是躲得了初一躲不過十五，1958年的反右補課運動中，賊心不死的馬學海將印刷廠一個印刷錯誤強加到他的頭上，誣指他隱瞞家庭成份，進行打擊報復，抵充了一個右派名額。而且一不做二不休，進一步將他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深更半夜由荷槍實彈的武警押往夾邊溝勞教農場。

剛進夾邊溝農場，益多朋措由於水土不服，拉了二個多月的肚子，把身體拉垮了。進了饑荒期後，逮著什麼吃什麼，軟棉花、癩蛤蟆、蜥蜴、螞蚱、死人肉和內臟。偷吃了糠拉不出來，家相互用手摳。天天有人死去，景象慘不忍睹。正在他餓得奄奄一息，躺著等死的時候，她的漂亮妻子拉嘎及時趕來，用牛奶和炒麵把他灌救了過來。她的姊姊、妹妹、外甥都到夾邊溝給他送吃的。他的運氣好，沒有親人送吃的右派統通餓死在夾邊溝了。

益多朋措所以能活到今天，主要還是靠她溫柔美麗的妻子拉嘎。拉嘎在1956年加入中共，是中共的藏族幹部，在甘肅省天祝縣婦聯會工作，後來調入張掖專區婦聯會。益多朋措打為現



益多朋措與他的妻子

行反革命分子後，組織上迫她劃清界限，與現反丈夫離婚。她非但不離，還要去夾邊溝探望。法院辦離婚的人對他說，你和益多朋措不離婚，組織上不讓你去。她堅持不離，一個人去了夾邊溝。見到益多朋措已經躺著起不來了，她哭著把他從死亡線上搶救了回來。待他慢慢緩過氣來。便把他接回了家，同時捎帶接回了三個垂死掙扎的右派，將他們送回了家。

因為是現反，政府不給益多朋措分配工作，所以他一直當臨時工，木工、瓦工、泥工什麼都幹過。到了1978年右派大改正時，中共甘肅省委統戰部派人經過調查，給他作出了“查

無實據，恢復原職”的結論，這八個大字毀了他的青春和大半生的光陰。

右派改正、現反平反後，他到西北民族學院當了九年的教師，六十二歲退休。益多朋措和拉嘎有一個女兒，老倆口總算是有一個較安祥的晚年。

#### 杜圭（土家族） 夾邊溝勞教的西藏軍區軍官

杜圭（1932-），男，土家族，重慶市黔江縣人。地主家庭出身。1949年在黔江縣武陵中學畢業後，同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1953年在解放軍五十三師炮校學習進修兩年，隨同十八軍五十二師一五五團駐扎在西藏，任班長、上士、司務長、排長、營參謀等職，領少尉軍銜。

1957年他在營裏做參謀工作，兢兢業業，任勞任怨。可是卻很不容易提升，杜圭思想有情緒。整風鳴放時部隊領導又反復強調“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向組織交心，不加任何追究”。而且領導出了題目讓大家發言，不說就批評軍官們對黨不忠。杜圭剛好探親回來，於是就彙報式地說了些老實話。譬如統購統銷政策很好，可是下面有些走樣。叔父來探親時自己背著口糧。他認為統購統銷不能將人情世故統掉。另外，針對中蘇關係問題，也談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任何事物不可以一成不變，說中蘇關係萬古長青，按辯證法這是不對的。”



杜圭，土家族、原西藏軍區軍官

後來批判他時，上綱上線地把他與章伯鈞和羅隆基聯繫起來，加上出身地主家庭，便將他打成右派分子。打成右派分子後，杜圭被押

送到了甘肅省夾邊溝勞教農場。西藏軍區與他一起押送夾邊溝農場勞教的右派軍官，還有後來當過甘肅省作家協會主席的西藏軍區創作員高平，曾著長篇敘事詩《西藏三部曲》、《川藏公路之歌》等。還有畫家甯里、鄭憲中和兩名醫生。

杜圭被分配到新添墩基建隊勞動，接著到明水挖沙子、裝火車。又到張掖板橋鄉挖石膏，體力勞動非常繁重。他憑著年輕力壯拼著命幹。右派們吃不飽還要死命勞動，有病得不到治療，

天天大量死人。所在小隊四十多人，只活下來七、八個人。要想活下來，必須靠外援接濟。

有姓王的右派，由於老婆要離婚、孩子又有病，就偷偷跑掉了。中隊長派杜圭到酒泉去抓。大家都是受苦受難，杜圭同情他就將他放掉了。到了高臺縣明水大河農場後，由於天氣寒冷，人死後在地上刨個小坑埋進去，第二天風一吹就露出來了，也沒有人去管。因為死的人太多，那些管教幹部已經完全麻木不仁了。兩千人去了明水，活著出來只有兩三百人，比希特勒的奧斯維辛集中營要慘得多。能活著出來的，主要是靠偷著吃點兒。胃口好的割下羊皮煮上吃。有一天他發現一匹騾子餓得躺在地下，半夜時帶了一把刀子，從騾子尻子上割下一塊肉來，整整吃了好幾天。有一次他用五斤糧票，換了兩斤小米。

杜圭憑著自己年輕力壯的身子和吃苦耐勞的土家族傳統，終於掙扎著離開了夾邊溝死亡集中營，他是少數逃出夾邊溝煉獄的幸存者之一。

### 麥君素 生拉硬扯的地方主義分子

廣東省第二次反地方主義鬥爭，打擊了三萬多名縣團級以上的廣東籍地方幹部。其中一萬多名劃為右派分子，蒙冤二十多年。陶鑄貫徹毛澤東極左路線，使廣東省二次反地方主義運動極大地破壞了廣東省的幹部隊伍，造成地方幹部和外來幹部之間的矛盾，至今餘毒未消。反而形成廣東人“外來和尚好燒香”的仇外心態。

麥君素（1913-2001）是中共港澳工委的領導幹部之一。廣東省南海縣人。早年在香港上大學。1937年在抗戰烽火中在香港參加革命，同年9月加入中共。他在香港接受高等教育，因此英語流利，精通醫術。1938年至1946年先後在中共廣東省委文委、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任職。曾擔任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珠江縱隊政治部情報員、珠江縱隊獨立第三大隊南海三水建政委員會副主任。在抗戰年代，他率領東江縱隊獨立三大隊二中隊在槍林彈雨中出生入死，右腿和臉部都曾中彈受傷。1942年在廣州被捕，他巧妙地擺脫了追捕，保住了抗日遊擊隊軍餉。

1946年至1949年，擔任香港《華商報》採訪部主任、粵中《人民報》肇慶版總編輯。中共建政後，1950年起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政策研究室研究員、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第四處副處長、處長、中共廣東省港澳工委宣傳處長、《華商報》史學會顧問等職。

1958年在反右運動補課期間，廣東省開展了第二次反地方主義運動。陶鑄秉承毛澤東的旨意，將廣東省第二次反地方主義的鬥爭納入反右運動的軌道，把堅持廣東省當地地下鬥爭的大部分縣團級以上幹部揪出來。他們中有中共廣東省委委員、部長、司局長、處長、縣長、縣委書記、專員、地委書記，只要是講廣東白話的、打過遊擊的、搞過地下活動的紛紛揪了出來，不管他們有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有沒有歧視北方南下幹部，都打成地方主義分子，或按右派分子標準處理。

當年麥君素已接到中共廣東省委組織部的調令，將他調往澳門的中共港澳工委擔任領導工作。在他動身前夕，一頂右派帽子自天而降。他暨沒有寫過大字報提過意見，也沒有批評過頂頭上司，他是中共廣東省委機關裏出名的老實人。原來他是因講廣東白話、打過遊擊、搞過地

下工作而落難的。

1978年右派改正後，麥君素調往暨南大學新聞系出任副主任。暨南大學新聞傳播專業聞名於世，著名新聞工作者吳文虎、杜導正、陳朗、馬戒均先後出任新聞系主任。麥君素的晚年全力投入新聞教育事業。他生活簡樸、工作勤奮，受到學生愛戴。1984年以廳局級幹部待遇離休。得了癌癥後，自知不久將于人世。囑咐家人死後將他的遺體和眼球捐獻給醫療事業。為此他精心服藥，使內臟不受損傷。2001年胃部大出血死亡。

生前他有大量著譯，如《美拉尼西亞》、《光榮與夢幻》、《英美概論》、《新聞從業人員》(美國霍恩伯特教授著)等。

老人一生光明磊落。他逝世後，夫人淡淡地說：“結婚五十多年了，直到麥老去世，我們沒有睡過一張新床。我們現在睡的床還是孫子以前睡過的床”。香港《華商報》報人莫廣智給這位擁有六十三年黨齡、畢生為中共奉獻精力和血汗的老黨員，在悼詞中總結了歷經坎坷和冤屈的一生：

轉戰沙場寒敵膽，香江揮筆有硝煙。  
笑談鄙對風情事，回首深懷坎坷年。  
品德生平人讚頌，謙虛處世互流傳。  
幾度誣讟全無懼，訣別悲愴涕淚漣。

## 二、關於反地方民族主義分子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熱賽拉夫、常委伊敏諾夫為首的地方民族主義反黨集團；

在少數民族地區進行的反右運動，以反對地方民族主義為主。1944年抗戰進入尾聲，新疆伊寧、塔城、阿勒泰地區群眾，在蘇聯和中共策動下反抗國民黨統治，要求獨立，在中共黨史上稱作“三區革命”。當年參加三區革命的人紛紛加入中共，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中共是主張疆獨的，毛澤東曾高度評價三區革命，說：“三區革命是全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在新疆牽制10萬國民黨軍隊。對於全新疆和全中國的解放，是一個重要的貢獻。”可是當時三區打出的東突厥斯坦旗號，三區解放組織成立的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現在已被指為恐怖主義標誌。

熱賽拉夫（1918-2002）新疆吐魯番人，1937年畢業于蘇聯中亞大學行政管理系，1944年三區革命時歷任三區革命聯合政府科長、教育局長、專員。1950年加入中共，歷任中共新疆分局和中共新疆黨委組織部副部長、副檢察長、自治區政協副主席、人大副委員長、區黨委書記處書記等要職。

買買提-伊敏諾夫（1913-1970）伊寧人，參加三區革命武裝部隊，開國少將，曾任自治區副主席、新疆軍區第一副司令員。後來在文革中又被打為劉少奇在新疆的代理人。

民族地方主義與地方主義的性質相同，只是發生地點的區別。發生在漢族聚居地不合毛澤東旨意的地方幹部稱作地方主義分子；在少數民族地區便稱為地方民族主義分子。熱賽拉夫和伊敏諾夫等三區革命出身的維吾爾族幹部支持自治區黨委書記處書記、監委書記武開章反對第一書記王恩茂引發的民族分裂，民族幹部不受重用，指出幹部政策有偏差；反對挪用支農卡車大煉鋼鐵。

在自治區黨委會上，雙方爭論激烈，矛盾尖銳。結果在反右大形勢下，黨委作出“關於武開章右傾機會主義和反黨活動的決定”，撤職開除黨籍，下放塔城地區沙灣縣，後調回老家山東。支持他的新疆民族幹部熱賽拉夫和伊敏諾夫等人則被打成地方民族主義分子。

新疆還有一個《關於武開章、辛蘭亭右傾機會主義和反黨活動的決定》。武開章為自治區黨委常委、書記處書記、監委書記。1956年8月他在北戴河中央會議上嘀咕“農業搞不好，讓群眾吃什麼？”回去後反對動用支農卡車大煉鋼鐵；辛蘭亭也是區黨常委，二人均被開除黨籍，武下放塔城沙灣縣，蘭調回原籍山東。

新疆打成民族地方主義右派分子的尚有民政廳長依不拉音吐爾，烏魯木齊市長阿賽德，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副州長阿不都熱依木-艾沙，商業廳副廳長阿不列孜-卡里等。

## 中共中央統戰部關於地方民族主義分子摘帽問題的指示

發佈單位：中共中央統戰部

文號：-----

發佈日期：1979年10月13日

生效日期：1979年10月13日

我們黨在1957年反右派鬥爭期間及以後幾年內，在一些少數民族地區，進行了批判地方民族主義的鬥爭。當時，在一些少數民族中，地方民族主義傾向有所滋長，進行這場鬥爭，對加強民族團結、鞏固祖國統一，是必要的。但是，也存在著擴大化的偏向。各地在批判地方民族主義的鬥爭中，劃了一批地方民族主義分子，有的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有的戴了地方民族主義分子的帽子。戴地方民族主義分子帽子的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當作敵我矛盾性質對待；一種是作為人民內部問題對待。

中共中央批准的《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請示報告》和《貫徹中央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的文件下達後，右派分子的帽子已經全部摘掉了，許多地方提出也要為地方民族主義分子摘帽子。據瞭解，對地方民族主義分子，不少地方也已經宣佈摘了帽子，但有的地方還沒有或者沒有全部摘掉帽子。對此，我們的意見是，凡是當時劃為地方民族主義分子的，不論是按照敵我矛盾或者人民內部矛盾對待的，也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改正的標準，應依據中央1957年10月15日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和關於鑒別少數民族中的

右派分子的主要標準：（一）反對社會主義；（二）反對共產黨領導；（三）破壞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對於摘掉地方民族主義分子帽子和改正過來的人，都應按照中央同意的《貫徹中央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的文件精神妥善處理。希望各級黨委結合對右派分子摘帽子的工作，把這項工作切實做好。

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

## 中共中央統戰部關於反地方民族主義鬥爭及其擴大化的說明

1957年上半年，在共產黨整風期間，在一些少數民族地區，也有極少數有民族主義傾向的人借機攻擊黨的領導和黨的民族政策。在黨的領導方面，反對共產黨的統一和團結，認為其他民族的共產黨員不能為自己的民族謀幸福，主張按照不同民族劃分共產黨的組織；認為“少數民族不要黨的領導也可以革命”，要求取消共產黨的領導。在民族關係方面，反對民族間的團結合作，排斥漢族，主張各民族單幹，講什麼“沒有漢人幫助一樣進入社會主義”；反對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主張實行“聯邦制”等等。這些民族主義思想傾向顯然是錯誤的。

針對當時民族地區極少數人中存在的民族主義，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要在少數民族地區進行整風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指示》。《指示》對民族地區的整風運動劃分為三種類型：第一類，是基本上實現了社會主義改造的地區，要在黨內外幹部群眾中進行大鳴大放，批判地方民族主義，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並且適當進行反右派的鬥爭；第二類，是基本上完成了民主改革、正開始社會主義改造的地區，一般地要在黨內進行整風，不能參加整風的，採取適當形式的社會主義教育；第三類，是沒有進行民主改革或不需要進行民主改革的直接過渡地區，可在黨內有條件地進行整風，或採取其他形式進行教育。《指示》規定，在二、三類地區黨內外一般不進行反右派鬥爭。

在少數民族地區，經過黨內整風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使廣大幹部和黨員認識到祖國的統一、民族的團結是建設社會主義的根本保障，任何民族如果離開共產黨的領導，離開各民族的大團結，要想單獨得到進步和發展，不僅違背本民族的根本利益，事實上也是不可能實現的。這是具有積極意義的。但是，由於對當時階級鬥爭形勢估計過於嚴重，在反對地方民族主義鬥爭中犯了擴大化的錯誤。一是擴大了範圍，有些地方由共產黨內擴大到黨外，有的地方甚至把一些民族宗教上層人士也列為地方民族主義分子進行批判鬥爭。二是混淆了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把大量人民內部矛盾當作敵我矛盾來處理。據全國二十四個省、市、自治區統計，共劃少數民族右派分子五千人，其中劃為地方民族主義分子的共一千七百人。

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

##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反右及反地方民族主義運動簡介

1957年5月15日中共新疆建設兵團黨委召開擴大會議，學習貫徹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兵團範圍內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旨、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主要內容的黨內整風運動。會後，整風運動立即在黨內外逐步展開，廣大幹部、職工積極回應黨的號召，向各級黨組織和黨幹部提出大量善意的、有益的批評和建議，也出現了一些攻擊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言論。6月21日，兵團黨委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正當整風運動向縱深發展的時候，全國開始了反右派鬥爭。兵團各師也相繼開展了反對資產階級右派鬥爭。根據中共中央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精神，兵團黨委發出了《關於深入地開展對右派分子進行鬥爭的指示》，強調反右派鬥爭是當前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8月，反右派鬥爭在兵團全面展開，到1958年底基本結束。全兵團劃定右派分子一百九十人，接收上海北京等地運送新疆的右派分子三百人，收容自動來新疆人員中的右派分子三百一十六人，共計八百零六名。1961年11月，兵團黨委根據中央指示精神，發出《關於甄別工作的指示》，對部分右派分子摘帽平反。

1957年12月16日，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擴大會議在烏魯木齊召開。自治區黨委委員、候補委員，各部委、廳局，各自治州、專區、市的黨員負責幹部及部分縣委書記、縣長等三百八十一人出席會議，其中少數民族黨員幹部二百六十人，漢族黨員幹部一百二十一人。這次會議的任務是根據中共中央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進一步討論和部署自治區少數民族幹部的整風和社會主義教育問題。中央明確指示，少數民族幹部此次整風和社會主義教育的重要內容之一，是反對地方民族主義，以達到提高社會主義覺悟，進一步鞏固祖國統一，加強民族團結，更好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

王恩茂在12月13日召開的預備會議上作了講話。16日會議正式開始時，賽福鼎·艾則孜向大家作了題為《堅決反對地方民族主義，為社會主義的偉大勝利而奮鬥》的報告。16日以後，開展了對黨內地方民族主義的揭露和批判，區黨委各常委分別作了發言。

這次擴大會議，於1958年4月26日正式結束。會議通過了《關於反對和克服地方民族主義的決議》和《關於賽甫拉也夫、伊敏諾夫、艾斯海提等同志錯誤的處分及開除孜牙·賽買提、依不拉音吐爾地、阿布都熱衣木·艾沙、阿賽德、阿布列孜·卡里等黨籍的決定》。王恩茂在會議結束時作了題為《為黨的解決民族問題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而鬥爭》的總結報告。1958年5月14日，自治區黨委下發了《關於在少數民族幹部和知識份子中進行整風的計劃》，指示各級黨委根據中央和自治區黨委的決定，在少數民族幹部和知識份子中普遍進行一次以反對地方民族主義為中心內容的整風運動，對於破壞民族團結、破壞祖國統一的人進行揭露鬥爭；對於大多數具有一般民族主義思想的人，本著“團結——批評與自我批評——團結”的原則，進行教育，分清是非。區黨委要求各級黨組織將運動自始至終置於黨的領導之下，防止和及時糾正在執行黨的民族政策中可能發生的缺點和錯誤。之後，自治區少數民族幹部中以反對地方民族主義為



重點的整風運動在各地開展，1959年3月基本結束，在運動中被劃為地方民族主義分子計一千六百一十二人。

1979年，中共中央批轉的中央統戰部《關於地方民族主義分子摘帽子的請示》中指出：“我們黨在1957年反右派鬥爭期間及以後幾年內，在一些少數民族地區，進行了批判地方民族主義的鬥爭。當時，在一些少數民族中，地方民族主義傾向有所滋長，進行這場鬥爭，對加強民族團結，鞏固祖國統一，是必要的。但是，也存在著擴大化的偏向。”自治區1959年至1964年對被劃為地方民族主義的部分人進行了摘帽工作。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至1985年，基本完成了復查、改正和平反工作，糾正了鬥爭中的擴大化錯誤。

——摘自新疆建設兵團通訊

注：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賽甫拉也夫在本書中譯為熱賽拉夫。

## 中共黨內右派分子

### 毛特夫 毛澤東宗親難逃陽謀

毛澤東在1923年返回韶山沖家鄉開展農民運動，帶出一大批毛氏宗親參加共產革命。他們之中最為毛澤東器重的是毛新梅、毛特夫父子。毛新梅參加共產革命後不久即壯烈犧牲，成為中共早期黨史和毛氏宗親中的知名烈士。他的長子毛特夫也是早年加入中共，又是根正苗紅的烈士子弟。1957年說了一句無關痛癢的話，抵充了一個黨內右派的配額。毛澤東聞訊見死不救，也說了一句不痛不癢的話，委實令毛特夫哭笑不得。

毛新梅（1886-1927）又名毛澤澍、錫純，毛氏家族鑒公房，韶山沖人。出身貧苦，與毛澤東家相距僅一華里，行醫為業。他年長毛澤東七歲，毛澤東自幼與他結為好友，尊稱他為“新梅六哥”。1923年毛澤東回到家鄉，便介紹他與毛澤民、毛福軒一起去安源煤礦工人俱樂部搞工人運動。1925年在毛澤東家裏的閣樓上，他與幾位毛氏宗親，面對鐮刀斧頭的黨旗舉起右手，在毛澤東的監誓下，宣誓加入中共。

加入中共後不久，即擔任中共韶山總支部委員，積極領導農運。他曾賣掉耕牛，籌集去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的路費。回來後出任縣農民協會庶務部長，率領兄毛旭梅、弟毛仙梅、妻沈素華、長子毛特夫、侄子毛照秋參加革命。四一二國共分裂，毛新梅參加攻打長沙，計劃受挫後返回韶山沖，被小鄉紳毛吉成告密，在自己家中被捕。他給民團捆綁在毛氏宗祠的廊柱上，受到嚴刑拷打。最後在湘鄉硯池坪遇害，終年四十一歲。

毛特夫（1912-1982）是毛新梅的長子，名遠錦，加入中共後化名沈德武。毛澤東返回家鄉搞農民運動時，毛特夫才十三歲就參加兒童團，站崗放哨，1926年加入共青團。1929年秋在毛新梅遇害之後，毛澤東派人接他去上海，在一家印刷廠當排字工，1930年經毛澤民介紹加

入中共。

1933年毛特夫奉派離開上海進入贛東北蘇區，委任為紅軍第五分校教員，翌年6月任紅軍總醫院宣傳科長兼中共黨總支書記。1935年在遊擊戰中被俘，12月即獲釋，回韶山在族校教書。1938年任中共韶山特別支部宣傳委員，接著擔任中共湘鄉縣委書記、中共衡陽工委書記。

根據毛特夫的出身經歷以及與毛澤東的特殊關係，他完全可以進入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序列，分享革命成果。可是他被俘釋放後沒有參加長征，而是返回家鄉照顧老母。毛澤東到達延安後，心中惦記新梅六哥的遺孀和後代，要將毛特夫兄弟數人接去延安。但毛特夫作為長子留下伺候母親，而將三弟、四弟送去延安。自此以後，毛特夫沒有再離開過家鄉。

1949年7月，湖南省和平易幟前夕，毛特夫奉派擔任湘中糾察總隊政委。湖南和平易幟後，湘中糾察總隊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三八師，他繼續留任師政委。轉入地方後，先後擔任湘潭市長、湘潭縣副縣長、縣長等職。應當說他是毛澤東家鄉的父母官。

湖南省由中共掌權後，毛澤東即致電毛特夫，鼓勵他繼承父業，並向他瞭解家鄉的情況。1954年9月毛特夫進京入中央政法幹校學習，毛澤東還特為在中南海接見了他。毛特夫見到毛澤東，親切地稱呼毛澤東為“三叔”。毛澤東說：“你就是新梅六哥的兒子？你就是德武呀？”毛澤東回憶了兒時的景況和當年與新梅六哥一起搞農運的經歷。

1955年1月，毛特夫又隨同叔父毛仙梅得到毛澤東接見，毛澤東和毛澤青一起與毛特夫合影。1959年毛澤東返回韶山沖老家，專程去探望了毛特夫的母親、毛新梅遺孀沈素華。沈素華見了毛澤東，淚流滿面，拉著毛澤東的手，久久說不出話。

1957年整風反右時，毛特夫正任湘潭縣縣長。有一次開黨小組會過黨的組織生活，大家七嘴八舌地議論社會上的右派言論。有人談起儲安平“黨天下”，以及種種以黨代政，黨委包辦一切的現象。毛特夫抽著旱煙，漫不經心地咕嚕了一句：“縣委對政府工作包辦得太厲害，以黨代政是事實。”

那時候中共湘潭縣委正愁完不成上級下達的右派分子配額，用放大鏡在四處尋找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言行，按照毛澤東的香花毒草六條標準逐一去套。素來與中共縣委書記有矛盾的毛特夫的這句話是典型的右派言論，和儲安平遙相呼應，攻擊黨的領導。社會上的右派指標尚未完成，黨內的配額更難達到。毛特夫卻跳出來自投羅網。中共湘潭縣委如獲至寶，為了完成政治任務，全然顧不上他是毛澤東的宗親、根正苗紅的烈屬子弟，或者1920年代參加革命的老紅軍老幹部，把毛特夫抵充了一個黨內右派的配額。

毛特夫劃成右派分子後，開除黨籍，開除公職，撤銷行政職務，放逐到湘潭縣中路鋪一家老年幸福院當食堂管理員。開除公職後取消了工資，每月僅發十五元生活費。毛特夫一家老小八口人，上有七十高齡的烈屬老母親，下有六個孩子，十五元錢如何度日？即使有母親沈素華的烈屬津貼和妻子楊靜的微薄工資，也難以維持生計。

鄉親們將毛特夫的慘景反映到毛澤東那裏，毛澤東聽罷覺得事情有點兒過火，不禁自言自語道：“特夫是烈士後裔，怎麼會反黨？”稍停片刻又說：“不過，受教育也好！”反右

運動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自己的宗親豈可心慈手軟？不過偉大領袖還是對他作了一些特殊照顧，將他的生活費提高到六十四元五角。政治上的賤民地位則絕對不允許有絲毫更改。

文革十年浩劫，毛澤東的棍子又打到毛特夫頭上。因為他歷史上被俘過又給放了出來，沒有光榮就義，因此除了摘帽右派，再加一頂叛徒帽子，後來莫名其妙地又加一頂五一六分子的帽子。有了這三頂大帽子，毛特夫和他全家所遭的罪便可想而知了。待他**1978**年得到寬大改正，恢復正縣級待遇，他已經是一位半身不遂、疾病纏身、年近古稀的老人了。

### 朱鎔基 朱鎔基的右派檔案

前國家總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傳奇人物朱鎔基對自己過去那段屈辱的歷史，一直諱莫如深。曾經有記者在朱鎔基當上國務院總理後的記者招待會追問他關於**1958**年當右派的事，朱鎔基閃爍其詞地回答道：“這一段經歷對我的教育是很深刻的，但是也是很很不愉快的。因此我也不想再提這件事了。”確實如此，像朱鎔基那樣右派改正後又當高官的幸運份子，不論是中共官方抑或他們本人都很忌諱重提“這件事”。而中共官方也竭力回避朱當過右派的這段歷史。



朱鎔基和夫人勞安

朱鎔基**1928**年**10**月出生于湖南長沙安沙鎮和平村。出生前四個月父親患肺癆而死，因此他是一個遺腹子。十歲時母親又病貧交迫死去，由伯父朱學方領養長大。伯父已有四個兒子，家庭生活困難。但伯父母寧可讓自己的兒子綴學，也要供朱鎔基讀下去。他果然不負伯父母所望，中小學經常名列前茅。朱鎔基知恩圖報，當上總理後不忘報答培養他成長的伯父母。**1947**年考上清華大學電機系。積極參加中共領導的學生運動，於**1949**年加入中共，**1950**年任清華大學學生會主席。

**1951**年畢業，他率領一百多位同學奔赴東北，任東北人民政府工業部計劃處生產辦公室副主任。次年調返北京國家計委。**1958**年在國家計委機械局綜合處長任上打成右派份子。對於朱是如何成為右派的？官方和個人都諱莫如深。**1988**年朱鎔基出任上海市長，宣佈他的簡歷時，官方竟然有意對這段右派歷史避而不提。

朱鎔基踏入仕途，年輕氣盛，鋒芒畢露，脾氣耿直，愛提意見，易得罪人。他對經濟理論頗有研究，反對當年的冒進和高指標。**1957**年**4**月在黨內學習《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時提了三條意見：

一，官僚主義與人民群眾相對立；二，宗派主義是封建殘餘，使黨內勾心鬥角、爭權奪利；三，主觀主義和驕傲自滿會脫離群眾。

**5**月**2**日學習人民日報社論《為什麼要整風？》時，朱鎔基在辦公室拍著會議桌說：“大家還等什麼，還怕什麼呢？黨在號召我們參加整風運動，不要怕犯錯誤。我就什麼都不怕，就要

講真話，講心裏話。給黨掃掃灰塵，不然灰塵積得太多太厚，就要用鐵鎚、鎚車來清除了。”他動員大家向國家計委進言，“一次不行就二次、三次、多次。”他串連幾個人起草《給官僚王國——國家計委來個重磅一擊》的大字報。以後在座談會上又多次發言。

據他當年的一位同事回憶，劃朱鎔基右派分子的有五大罪狀：

- 一、攻擊黨，鼓吹大鳴大放，對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不滿；
- 二、攻擊國家計委領導是官僚主義集團，比國民黨還壞；
- 三、利用組織生活向黨交心的機會攻擊領導；
- 四、以資產階級的立場對黨和計委工作的缺點誇大、渲染；
- 五、拉攏他人試圖狂妄改組計委和整頓黨組織，具有資產階級個人野心。

根據以上五條罪行，他被開除黨籍和公職，留用察看，去陝西山區勞動。在宣佈處分時，朱鎔基曾起立自辯，當然毫無作用。

朱鎔基勞動五年後，因腰肌勞損調回國家計委幹部補習學校教書。1962年摘帽。文革中又免不了受衝擊，下放幹校勞動。1979年右派改正後恢復黨籍。

改革開放的新時代，給很多人帶來出人投地的機會。朱鎔基重登仕途，平步青雲，官運亨通。但是，中國千萬個像朱鎔基那樣有才華的千里馬，如果沒有伯樂相中，也是不可能脫穎而出的。扶他上馬的伯樂有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馬洪、冶金工業部和三機部部長呂東、國家經委主任張勁夫。最後起決定性作用扶他一把上馬的是鄧小平。鄧小平在1992年南巡講話中誇獎朱鎔基是個懂經濟的人才。

有一次鄧小平到上海去過春節。二公主鄧楠向父親推薦說：“朱鎔基在海外的形象很好，作風正派，工作有魄力，很有實幹精神。來上海後，各方面工作有起色，深得人民群眾的擁護。”鄧小平在上海二十多天的逗留期間，曾多次召見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朱鎔基，當面加以考察。後來鄧楠在無意中洩露了天機：“我們這一次來，主要是來看朱鎔基的。”

據說鄧小平在專門研究起用朱鎔基時，問起朱鎔基是否正確對待右派問題，舉出自己歷史上三次被打倒的經過，要求朱以事業為重。朱當然心領神會。朱鎔基“夾著尾巴做人”，謹言慎行，進退有度，一步步邁向高層。但他的出身和右派經歷，還是使他同中共正統的官僚有所區別。

1989年六四期間，江澤民調去北京，朱鎔基在上海主持工作，六四事件發生後，朱向全市人民發表電視講話，宣稱他決不會調動軍隊進城恢復秩序。呼籲學生工人市民復課復工，回到工作崗位上去。中共上海市委處理六四事件的方法果然不同于天子腳下的北京。

1999年4月25日法輪功學員到中南海請願。朱鎔基聞聲走出中南海，問道：“你們來這裏幹什麼？你們有宗教信仰自由嘛！……你們有什麼問題派代表來，我帶你們進去談。”在聽取了法輪功學員的意見後，他說：“你們反映的情況我不是做了批示嗎——你們反映的情況我們將向國務院和中央領導彙報。請你們出去後，叫大家回去，儘快回家。”本來四二五事件在朱鎔基的批示和正確處理下會很快平息。不料在政治局會議上，江澤民把他大批一通，決策頓時

轉向強硬。

人稱朱鎔基“經濟沙皇”。他的主要功勞是改變了中國僵化的計劃經濟模式，在鄧小平和陳雲之間巧妙地走著鋼絲。然而他個人生活簡樸、為人低調。夫人勞安是出身名門的大家閨秀。他的一家子似乎也不像江澤民和李鵬那兩家子那麼張揚。他做完總理，名望仍然在中共高層無人可及，他說退就退，沒有戀棧之意。可以想見，才識如他，洞悉官場，進退有度，不愧為一個寵辱備嘗而有自知之明的人。

## 周克 組織部長是右派

原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長周克(1920- )1934年參加共青團，1937年轉為中共黨員，长期从事地下工作.1949年后曾任上海市團市委書記、中共上海市委青委書記.現享受省部級離休幹部待遇。

### 得罪了市委第一書記，就大禍臨頭了

他劃右原因，按照他自己的說法：“得罪了市委第一書記，就大禍臨頭了。”，“你說當年哪一個是劃對的！有沒有呀？”當然他自己更加是劃錯的。他的右派非但錯劃，而且反右運動尚未開始，已落進“陽謀”圈套，就事實上已經劃定右派了。

1956年7月11日至26日，中共上海市委召開第一次黨員代表大會。那時他已輾轉調任上海市第二輕工業局局長。上海市有第一和第二輕工業局，二個局之上有輕工業黨委；再上去是上海市工業生產委員會和中共上海市委工業部；最後歸口分管工業的市委書記馬天水領導。他對這種層層疊疊的官僚架構和各級領導頤指氣使的官僚作風很有意見。

陳毅已上調北京擔任國務院副總理。這次他專程返回上海，在黨內的大會上號召發揚民主，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等各級領導宣稱要“高價”徵求代表們對市委工作的意見。周克在會上作了三次發言，傾吐了鬱積心頭的意見。他批評市里有三種不好的工作作風：一是“將軍”、二是“限時限刻”、三是“不許回嘴”；他又批評市委內部民主作風不正常，第一書記柯慶施對第二書記陳丕顯吆五喝六，極不尊重；他對下一屆市委領導候選人名單發表意見，直接向主要領導柯慶施提出批評意見。

周克引用了列寧批評史達林的例子。列寧在遺囑中曾經批評史達林：一個共產黨人粗暴是不允許的。作為黨的總書記，粗暴就更不能容忍了！柯慶施的脾氣特別大，訓斥起人來毫不留情。許多好心人為周克捏把汗，批評中共黨內唯一見過列寧的柯慶施，不啻老虎頭上拍蒼蠅。

1957年，他奉調到中共上海市委擔任工業部副部長。自上年黨代會後他埋頭苦幹，根本沒有參與整風鳴放。反右運動開始，9月初秋毛澤東視察上海。周克也去聆聽毛澤東那次著名的講話。毛澤東說：“老柯啊，人們叫你柯老吧，是老柯啊還是柯老啊？你們上海人才很多啊，你們現在獻寶獻得還不夠。上海不是有龍捲風嘛？你們今年還沒有刮龍捲風吧。”

當時周克與許多在場的人一樣，根本聽不懂毛澤東講話的深刻內涵和寓意。毛澤東實際上在暗示，你們上海打右派打得不夠，“你們上海人才很多啊”，還沒有刮龍捲風呢！可是其他

人沒有聽懂，柯慶施聽懂了。毛澤東走後不久，柯慶施決定在上海進行黨內反右補課。這一補，翻開周克的陳年舊賬，把他補進了“右派行列”。

周克在這場“政治龍捲風”中遭遇滅頂之災。別有用心的人找出他在黨代會上的講話，嚴加批判。一位對他懷有敵意、主管反右運動的市委工業部副部長別有用心地指出，上海1956年黨代會上的鬥爭並不是孤立的，它是1956年國際階級鬥爭在中國黨內的反映。柯慶施、馬天水（以後淪為四人幫成員）把他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赫魯雪夫掛上鉤，上綱上線，誣指他是國際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在中共黨內的代理人 and 應聲蟲。

中共內鬥殘酷無情。一旦階級鬥爭的矛頭對準了你，你就成為混進黨內的階級異己份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階級敵人。任何罪名都可以加到你的頭上。周克被開除黨籍，撤銷一切職務，取消行政十級高幹待遇，下放大隆機器廠當工人，還株連了家屬親友。中共黨內也盛行封建株連法，“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一人遭殃，株連九族”。

關於黨內鬥爭的殘酷無情，不自1957年反右運動始。自中共建黨起，沒有停止過一天內鬥。周克在他撰寫的四十二萬五千字回憶錄中，記述了這樣一件事。周克和他夫人丁瑜一家人在地下黨時期的經歷亦充滿驚濤駭浪。使他難忘的是他的一位情同手足的戰友、先後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兼宣傳部長和金華地委書記的汪光煥、程為昭夫妻，在1942年抗戰烽火中，忽然雙雙成為黨的內奸，慘遭作風專橫、嫉賢妒能的中共浙江省委組織部長兼浙南特委書記的處決。為了節省子彈，汪、程二人是被繩子活活勒死的。四十年後，1982年12月28日，中共浙江省委才作出“為汪光煥、程為昭兩同志平反的決定”。直到今天，每當提起這件事，仍令周老痛心疾首。

### **胡耀邦為他“三恢復”，李銳把他“扶上馬”**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垮臺。中國走上艱巨的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道路。胡耀邦執掌中共中央組織部後，開始平反大量冤假錯案。周克弟弟也是老地下黨，雖然自己在文革中的政治審查尚未結束，仍從北京打來電話提醒哥哥：該是申訴的時候了。周克借出差的機會，將申訴材料送到中央組織部。他想見見胡耀邦，接待他的幹部說，不必了，我會向耀邦報告的。

第三天，周克就收到胡耀邦對他申訴信作出的批覆：“申訴收到，不需面談了。由我們中央組織部負責辦！”。周克又去拜訪了中組部辦公室主任，不無擔心地告訴他：“我的問題是有對立面的，因此在上海是有阻力的，所以我特地到北京來上訪。”辦公室主任回答道：“耀邦同志已經看了你的申訴，他說：‘這是1956年的事嘛，怎麼算到了1957年右派大鳴大放的賬上去了？這是在黨代會上的發言，是在黨內向組織提的意見，是正常的黨內民主生活，怎麼是向黨進攻？！’”

這位主任告訴周克，要他放心，一個月內會直接通知他經辦的情況。周克把家裏的電話、位址告訴對方。按照中共組織原則，這麼重大的事情，不能直接通知本人，必須通過組織層層下達。但是中組部的安排煞費苦心。上海是四人幫老巢，處理冤假錯案必有阻力。況且那個時

候，上海處理右派問題尚未啟動。胡耀邦已經多次提出：“上海有‘四大明星’。怎麼到現在還不動呀？”

“四大明星”系指反右運動中上海打出的四位黨內最大右派和反黨份子：王堯山、薛尚實、周克、黃浩。王堯山（1900 - 1995）1931年入黨，曾是左聯領導人，時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兼秘書長。在潘漢年事件中敢於說真話，不投井下石，被打入“潘漢年集團”，1959年開除黨籍，但沒有戴帽，下放上海市淮海中學。王的夫人趙先，是上海市婦聯主任，為丈夫鳴冤叫屈，打成右派；薛尚實（1902 - 1977）1929年入黨，時任同濟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因指責柯慶施是上海“一霸”，犯下與周克同樣罪行而劃為右派。黃浩則是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副行長，曾在1920年代到蘇聯留學，其資歷與柯慶施不相上下。黨內亦稱他們四人是反黨“四大金剛”。

應當說，柯慶施在反右運動中對屬下幹部還是比較保護的。薛尚實、周克向他提意見，敢於在老虎頭上拍蒼蠅，那就對不起啦，請君入甕！王堯山則算是潘漢年線上的人。胡耀邦多次督促上海解決四大名星的問題，六月底，中組部將掛號信直接寄往周克家裏，通知他，已正式列為X X號案件，由中央組織部直接負責覆查。最後，由胡耀邦親自插手解決了他的“三恢復”——恢復黨籍、恢復級別、恢復原職。

1981年，周克去北京參加中共各省市委秘書長、辦公廳主任會議期間，胡耀邦接見了他。一見面就說：“你辛苦了！總算還好，你已經又在工作了，這就好！這就好！”接著說：“是的，項南和你當年都是團幹部中精幹的。現在項南在福建幹得不錯。你也還可以多幹些工作的！你的身體不錯就好辦了。”胡耀邦、胡啟立、胡克實、王照華、項南、周克等人可以稱得上是中共最早的老團派了。

胡耀邦思路非常開闊，非常活躍，說道：“中央急需選拔一批年輕的優秀幹部。‘四人幫’耽誤了一批幹部，摧殘了一批幹部，也毒害了一批幹部。這個創傷是巨大的喲！”

上海是四人幫的發跡地，四人幫餘毒很深，三種人（打砸搶、造反起家、幕後策劃和制造反革命輿論）盤根錯節，因此組織工作特別重要。中共上海市委陳國棟、胡立教、王一平等準備選拔周克出任市委組織部長。報到胡耀邦那裏，胡說：“我同意呀！”陳雲也問起，說道：“那好呀，他做組織部長好呀，那你們報嘛！”

此後的申報過程卻是一波三折，報幾次退幾次，拖了二、三個月。直到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李銳在上海呆了約一個月，雖然沒有找周克談話，但事後才知道，李銳是專程為考察周克來上海的。過了一年，在1982年11月李銳又來到上海，臨走時約周克談話，開門見山說：“現在可以明確地告訴你，王照華同志去年是來考察你的；我今年又是來考察你的。現在聽下來，你成了矛盾的焦點！——反對你的人很多，但贊成你的人也很多。我們現在的結論，你是好的，我們贊成你！我回去報告。”正因為李銳的考察和報告，1983年春節，中央下達任命周克為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長的批覆。

### **為王申酉冤案覆查平反**

右派改正後不久，那是1979年1月，中共上海市委召開市委擴大會議，全市局級以上幹部參加。周克的老毛病又犯了，一口氣講三個小時，一吐胸中積鬱為快，闡明自己觀點。他說，這座小樓我已經二十一年沒來了，今天來了，我的感慨很多。我來此以前，很多老同志關照我說，你還得小心些，能講的講，不能講的不要講；可是群眾對我說，該講的還是要講……為什麼大家還心有餘悸？因為汪東興同志還是黨的副主席，他還在阻撓幹部的平反工作。……我的問題主要是得罪了柯慶施同志，因為我當時感到市委民主生活不正常，主要是看到了柯慶施同志對陳丕顯同志的態度很專橫，對我們下面幹部更不用說了。我想，一個第一書記怎麼可以這樣對待第二書記呢？

他又談到在黨內會議上的發言，怎麼算到大鳴大放賬上？1956年前的事怎麼算到了1957年以後？黨代會上正常的民主生活發言，對領導提點希望，怎麼叫作反黨？在學習會上發言，怎麼叫攻擊黨的方針政策？他說搞運動用推理分析代替事實——敢於反柯慶施就是敢於反黨中央；引用列寧批判史達林的話就是反馬列主義、反列寧，如此等等。他尖銳地指出，定右派按比例，根本不是實事求是。敵人有就有，沒有就沒有；有多少就是多少，怎麼可以預先定個比例？

回到家裏，他把這件事告訴夫人丁瑜，她也是1930年代入黨的地下黨老幹部。她說：“啊呀，老周，你真是打不怕，又去發言了。”他說：“我實在忍不住，還是講了。”

在重新登上中共上海市委領導崗位和三中全會後，已經六十多歲了，到了下崗的年限，僅僅做了幾年。在眾多的工作中，有三件事他覺得有意義。一是審查清理了二千多名幹部，其中不乏三種人和四人幫餘孽，以及不稱職的人；其次向中央輸送了幾十名第三梯隊，包括李源潮、孟建柱、趙啟正，他點了幾個人的名字；第三是覆查平反了王申酉冤案。

他沒想到，參與王申酉冤案的覆查工作，使他承擔了新的風險和壓力，對他後來的工作也產生了很大影響。但是，為了堅持原則，為了為這樣一位政治成熟、見解深刻的追求真理的革命好青年覆查平反，他義無反顧！仿佛又回到血氣方剛的青年時代，為革命理想赴湯蹈火。

1980年3月，陳國棟調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胡立教為第二書記，周克進入市委擔任副秘書長。王申酉案是以彭沖為首的前市委班子定的，成為後來新班子面臨的一道難題。周克參與了這個案件的覆查，在市委常委會的爭論中沖在最前面。李銳對他說：“你成了矛盾的焦點。”

王申酉（1945 - 1977）出身於上海工人家庭，1962年考入華東師範大學物理系。1967年參加炮打張春橋，被抄家毒打。1969年1月關進上海市第一看守所，三個月後釋放回校監督勞動。在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中，被認定犯有“惡攻罪”（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破壞一打三反運動，定性敵我矛盾，押送蘇北大豐農場勞動。期間寫下一百多萬字的日記。1972年返校監督勞動。

他參與了四五天安門事件，在四人幫倒臺後居然又被誣指犯下“惡攻罪”，關押進上海市普陀區拘留所。判他犯有的九項“惡攻罪”，收繳他的日記和情書。普陀區公檢法和上海市高校黨組判處他死緩 and 死刑兩種方案送呈中共上海市委批准，市委常委會否定死緩，批准死刑。



於1977年五一節前處決。進入撥亂反正、改革開放年代，中國依舊沒有法治，只有黨治——執行死刑不由法院而由黨委批准。

從周克接觸的材料看，王申酉在政治上很成熟，研讀了大量政治理論書籍。他和張志新不一樣，非但為劉少奇鳴冤叫屈，更重要的是他感覺到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和運用、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有很大誤區。毛澤東的做法實際上是農業社會主義、烏托邦，在中國行不通。他認為從歷史進程看，否定資本主義發展過程是不對的。他的思想體系和理論分析具有顧准（黨內極右份子）的水準和深度。

施平調去擔任華東師範大學黨委書記後，有一位已經畢業的研究生寫信給施平，指出王申酉案有錯。施平報告分管文教的市委書記夏征農和市委副書記兼宣傳部長陳沂，他們二人支持施平，施平便在1980年春天召開的市委擴大會議上提出來了，引起全場轟動。怎麼？上海也有張志新，而且發生在粉碎四人幫後的改革開放年代，性質更為嚴重與惡劣。

新市委決定成立覆查組，法院院長關子展任覆查組長，周克任副組長，共有七位成員。覆查組發現，原先上報的是“有期徒刑”，被原市委退回六次，每退一次，上面批示：“你們思想右傾”、“你們要很好作檢查，思想右傾”。指令層層加刑，最後市委批示“死刑，立即執行”。

覆查平反過程的艱巨曲折簡直難以想像。有人提出王申酉在日記中有反動言論，有人認為王申酉是“持不同政見者”、“異見份子”，更有人以為是小題大做。市委內部爭論了無數次，有多次爭論得異常劇烈。最後申報中央同意後，以市委名義召開王申酉平反昭雪大會，肯定他是一個勤奮學習、追求真理的好青年。

王申酉的平反昭雪過程和最後的決策權，跟判處死刑時的情況一樣，證明在中國只有黨治，沒有法治，用政策代替法律，又無制衡機制；其次，周老也想說明，四人幫（實際上五人幫）的勢力是多麼強大，至今陰魂不散！



周老著的《風雨七十年——時代大潮中的我和我的一家》，已由文匯出版社出版。上面登了一張珍貴的照片，那是在1979年11月1日照的上海、南京地下黨劫後餘生的領導人。從右起趙先（原上海婦聯主任、右派份子）、陳修良（原南京地下黨市委書記、極右份子）、王堯山（原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兼秘書長、受潘漢年牽連開除黨籍的反黨份子）、張棋（原總工會主席、批判工會福利主義）、張承宗（原上海地下黨市委書記、“降級安排”）、周克（右派份子）。六位地下黨領導人，二位右派，一位極右，一位開除黨籍，尚存二位也受不同程度迫害。

### “搞革命絕對不能當地下黨”

周克回憶起這麼一件事。1949年3月，中共上海地下市委外縣工作委員會在他家秘密聚會，部署工作，迎接解放。會上，地下市委領導人張執一鄭重地將一份通過安插在國軍內線

冒著生命危險偷來的《國軍上海軍事佈防圖》和國府在上海重要軍事、經濟據點分佈交給他，要他立刻親手交給三野粟裕副司令員。

他立即秘密渡江，親自把圖交到粟裕手裏。粟裕稱讚感謝上海地下黨同志，及時送來這麼重要的資料，這一情報對解放上海地區很有用。現在這份資料還保存在上海博物館裏。

僅南京和上海兩地的地下黨，在領導組織學生運動、全方位的情報工作、國軍海陸空三軍大策反、大起義中立下了功不可沒的汗馬功勞。中共一貫鼓吹毛澤東熟讀孫子兵法，神機妙算、用兵如神。用遊擊戰、地道戰、地雷戰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遼瀋、平津、淮海三大戰役奠了解放戰爭決定性的勝利。事實上，中共奪取勝利、鞏固政權主要靠的是第五縱隊——潛伏在對手陣營中的間諜、特工、地下黨、中共特別黨員。過去如此，今天依舊如此。

可是共產黨沒有放過自己人，毛澤東過河拆橋，翻臉不認人。首先把打天下的功勞歸於自己，其次是解放軍，地下黨遊擊隊忝居末位。他秘密制訂了處理南京地下黨的政策：“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下達到四大野戰軍的首長一級。毛澤東一直認為以知識份子、青年學生、城市貧民和工人為主體的地下黨成份複雜、動機不純，存在嚴重問題，靠不住，亟待整頓。

#### 駱明 廣西地方主義右派頭目

駱明（1916-），廣西省靈川人，1936年在校讀書時，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年畢業於廣東襄勤大學教育學院文史系。曾在徐州等地從事中共秘密工作。1940年到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後任鹽城縣縣長、蘇北鹽阜專員公署專員、蘇北行署秘書長。

1949年中共掌權後，駱明返回家鄉，歷任梧州、容縣專員公署專員，廣西省人民政府秘書長、省財經委員會副主任，中共廣西省委宣傳部部長。

1957年與陳再勵、廖聯原、黃榮、陳岸和區鎮等在中共廣西省委常委擴大會議上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幫助省委總結和分析工作中的錯誤，同時對省委貫徹黨的民族政策、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和發展少數民族山區的生產建設等問題，提出了正確的批評和合理的建議。他們正確的主張被打成“極力鼓吹地方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利用地方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的情緒”，來攻擊黨的民族工作，抹殺黨在民族工作方面的偉大成績，挑撥民族關係，分裂廣西各民族人民團結。給陳再勵、駱明、廖聯原、黃榮、陳岸和區鎮等開除黨籍或撤職、降級等黨紀、政紀處分。被打成“陳王駱王廖廖地方主義反黨右派集團”。

1958年中共廣西省委和欽州地區縣以上機關，在開展反右派鬥爭的同時，開展了反地方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鬥爭。在反右派鬥



廣西地方主義右派頭目駱明



陳岸 地方主義分子，右派

爭的補課中陳、王、駱、王、廖、廖均劃為廣西省黨內大右派分子。在中共廣西省委常委擴大會議和中共廣西僑族自治區第一屆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駱明與陳再勵、廖聯原、黃榮、陳岸和區鎮等受開除黨籍或撤職、降級等黨紀、政紀處分。

1978年中共廣西區委在《平反決定》中決定恢復陳再勵、王夢周、駱明、王浩、廖原、廖聯原等六位同志的政治名譽和黨籍。

位列第五的廖原（1913-1977），廣西賓陽縣人，原名廖玉才。讀初中二年級時因家貧綴學務農。1934年考入南寧計算人員養成所，畢業後分配到省政府統計局任調查員。1937年5月加入中共，後因組織破壞失去聯繫。1939年流落到安徽，任安徽省政府秘書處辦事員，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

1939年11月經李迪介紹重新參加中共，協助中共地下黨領導人李豐平（曾任浙江省長）工作。1940年經李迪批准到新四軍任職。在豫、皖、蘇邊區和浙西解放區先後任淮北行署財政處副處長，邳、睢、同分區財政局長，浙西行署、蘇南二專員公署財政處長等職。第二次國共戰爭時期，任解放軍三野一縱、第九兵團供給部長，參加了宿南、魯南、萊蕪、孟良崮、魯西睢杞和上海等戰役。

中共掌權後調回廣西、歷任省工商廳長、財政廳長、省財委副主任、省政府秘書長，中共廣西省委財政部長等職。

在“陳、王、駱、王、廖、廖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中，位列第二的省委組織部長王夢周（1912-），河北省峰峰縣臨水鎮東溝村人。1930年在磁縣中學讀書時參加共青團，1935年轉為中共黨員。1932年參加直南工農暴動，後在家鄉參加中共地下工作。曾任團支書、區團委書記、中共縣委組織部長等職。抗戰中歷任中共區委書記、縣委副書記、地委黨校校長等職。1949年後南下廣西，先後任桂林地委、百色地委副書記，書記、中共廣西省委組織部副部長、部長，中共廣西省委常委等職。

1958年6月中共廣西黨委一屆三次黨代會上王夢周等人被開除黨籍、戴上右派分子和地方主義分子的帽子後，有人問王夢周有何感想。王夢周坦然地回答：“一位副省長被打成右派反黨集團的頭目，省委八個部中有六個部長被打成右派反黨集團成員和右派分子，其中四個部長被開除黨籍，一個部長受留黨察看處分，另一個部長被撤銷職務，在省委內部處分這麼多領導幹部，在黨史上是罕見的，在全國各省市中也是絕無僅有的。至於對我個人的處分，我的態度是，服從組織，意見保留。我深信歷史是最公正的，總有一天會給我們作出正確的評價。”

反黨右派集團的另一名重要成員廖聯原（1917-），僑族，又名石崗，出生於廣西貴縣（今貴港）。1936年加入中共，長期從事中共地下活動。曾任陝甘寧邊區政府保安處特派員、延安馬列學校和中央研究院研究員、中共貴縣縣委副書記、中共桂林地方委員會書記、桂中遊擊隊司令兼政委等職。他是廣西地區中秋起義的領導者。

中共掌權後，他歷任中共梧州地委副書記、廣西軍區副參謀長、廣西軍區兵役局長、中共廣西省委統戰部部長、廣西政協副主席。

1958年反右補課運動中，他被劃為中共廣西省委內部右派反黨集團的重要成員，與黃現璠並列為地方民族主義分子。

與“陳王駱廖王地方主義反黨右派集團”同時受批判的還有陳峰（1910-2008），廣西貴縣（今貴港）人，1929年即加入中共。從事地下工作，曾任中共廣西工委書記。1950年後任廣西民政廳副廳長、中共廣西省委聯絡部副部長、桂林專員公署副署長。1958年劃為中右分子，開除黨籍，降職使用。

### 陳修良 中共三大紅色女諜之一

在中共奪取江山的時候，間諜特工起了特別重大的作用。錢壯飛、胡底、李克農是中共有名的諜報三傑，又稱前三傑或中央特科龍潭三傑。後來又出現了一個後三傑，即熊向暉、申健和陳忠經。鮮為人知的是中共也擁有間諜特工女三傑，她們是張露萍、陳修良和朱楓。張露萍十八歲打入軍統秘密電臺，不久案發被槍斃；朱楓在1948年由中共秘密派往臺灣，被國府察覺後也被槍斃。僅有女二傑陳修良活了下來，官至南京地下黨市委書記，為中共出生入死，建立了卓越的功勳。可是在1958年反右補課運動中，以中共浙江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和代部長的身份，劃為極右份子。

陳修良（1907—1998）出生於浙江寧波的一個封建大家庭。母親是這個封建大家庭的叛逆者，崇敬鑒湖女俠秋瑾和孫中山，為女兒取名“逸仙”。人稱“眾家媽媽”，掩護革命。陳修良就讀寧波女師時，因領導學生運動遭開除。後畢業於杭州的浙江省立女中（現十四中）。她在大革命高潮中入團，擔任中共領袖向警予的秘書，並由向警予介紹入黨。1927年至1930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回國後長期從事地下工作。1930年代黨組織多次遭破壞，她與丈夫沙文漢二次東渡日本尋找組織關係。曾任江蘇省委婦委書記和群工委員，領導婦女、青年和宗教界的抗日救亡運動。抗戰勝利後擔任中共華中分局城工部的南京工作部長，長期在潘漢年領導下工作。1946年起任中共南京地下黨市委書記。她的前任先後有八位被殺。而她卻無所畏懼，領導二百二十名地下黨員，同國府的八千多名特工周旋。

她領導了“五二〇”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大遊行，後延至全國，毛澤東稱讚為“開闢了對國民黨的第二戰線”。她又領導了國軍空軍（四架B24）、海軍（重慶號）、首都警衛部隊、江甯要塞、大校場機場塔臺和431電臺的起義，成功偷取密碼，多次受到中共中央的表揚和嘉獎，被尊稱為“策反主帥”。

中共依靠潛伏在國統區的特工和地下黨員奪取了政權，然而在勝利後，毛澤東卻過河拆橋，翻臉不認人，首先把功勞歸於自己，其次是解放軍，地下黨叨居末位。他秘密制定了處理南京地下黨的政策：“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毛澤東一貫認為以青年學生和知識份子為主體的地下黨“成份複雜，動機不純”，存在嚴重問題，必須加以整頓。鄧小平在南京做報告時嚴厲批評南京地下黨無組織無紀律，對解放軍不服氣。劉鄧進入南京後，劉伯承取代陳修良，出任南京市委書記，陳修良立即降為組織部長。遭受鄧小平無故指責後，

調往上海，1955年調往杭州。無獨有偶，上海地下黨市委書記張承宗由陳毅取代，張也降為組織部長。其他城市地下黨也與陳修良和張承宗的命運相同，一路往下降。為中共打江山出生入死拋頭廬灑鮮血的地下黨成為毛澤東拋棄的一枚臭棋。

陳修良對於這些強加于南京地下黨頭上的罪名不服，與上級有過劇烈的爭論，多次挨批。此外，陳修良和丈夫沙文漢因受潘漢年案的牽連，早已受到懷疑。陳修良在1989年曾著文解釋她被打成極右的原因：“1956年，劉曉任駐蘇大使，將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報告寄給了中央，還附上了自己寫的一分報告，認為史達林搞肅反擴大化，強迫實行農村集體化，搞個人迷信是完全錯誤的，赫魯雪夫揭露這些問題是正確的。我同意劉曉的看法。在討論蘇聯問題時，我發表了類似的看法。不料在反右時這卻成了反蘇言論，成了把我打成極右派分子的罪名之一。我在討論蘇聯問題時，說過史達林處死布哈林等人是錯誤的意見。但想不到在反右鬥爭時，被扣上反蘇罪名。”

此外在1957年鳴放期間，陳修良作為省委宣傳部長奉命組織各界人士大鳴大放。她那一級幹部，無法瞭解毛澤東的“陽謀”真諦，難免說些不痛不癢的應酬之詞，授人以柄。例如她說過“圓章管方章”。當年中共的公章是圓的，政府的公章是方的。“圓章管方章”即指以黨代政、黨政不分。這是典型的右派言論，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共產黨一貫使用新賬老賬一齊算的技倆，罪行連升三級，戴上極右帽子後，發配嘉興勞動。

文革再次受到衝擊，直到1977年才摘帽，1979年改正。她在晚年淡出政治，撰寫大量回憶錄，對歷史以及現實問題進行反思，完成一百多萬字的著作，成為黨史專家。

1998年，重病住院。在地下鬥爭時期她曾經領導過江澤民。10月6日江澤民、曾慶紅、黃菊、徐匡迪前往探望。陳修良於當年11月在上海華東醫院病逝，享年九十一歲。電視劇《沙文漢與陳修良》比較客觀地反映了他們的事跡，但略去反右，她和沙文漢的那一段歷史在電視劇中成為空白。

## 胡蘭畦 當代中國傳奇女傑

中國當代傳奇女傑胡蘭畦曾被多種文藝作品當作原型人物，譬如茅盾小說《虹》中的梅女士便是她的化身。她是中共早期資深黨員、女將軍、新聞記者、女作家，她的自傳體小說《胡蘭畦自述》（上下卷）曾是獲獎作品。

胡蘭畦（1901-1994）四川省成都市人，畢業于成都毓秀女子師範，她在青年時代深受五四運動和北京大學進步學生思想的影響，強烈嚮往民主、自由，在惲代英的直接引導下，於1922年在成都加入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讀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最早的中譯本，並開始參加婦女解放運動。1926



中華傳奇女傑胡蘭畦和養女，身後為她募集的抗日慰問品

年，她奔赴當時的革命中心廣州，在廣州結識了周恩來、李富春等中共代表人物和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何香凝夫婦。

宋慶齡和何香凝對她的一生有重大影響，是她的引路人和保護神。**1926年**在北伐戰爭高潮中，胡蘭畦離開以何香凝為部長的國民黨中央婦女部前往北伐前線，併入讀黃埔軍校第六期的女生隊。當時黃埔軍校的校長是蔣介石，但實際主持工作的是左派領袖鄧演達。由法國歸來的陳毅是中共黃埔軍校的秘密黨委委員，胡蘭畦在這裏結識了四川同鄉陳毅。

**1927年**國共分裂，宋慶齡、鄧演達等出走德國柏林。胡蘭畦受蔣介石通緝，在國內難以存身。遂於**1929年12月**赴德國留學，入讀柏林大學德文班。那時何香凝的兒子廖承志在漢堡留學。經廖承志和著名作家、教育家成仿吾的介紹，**1930年**胡蘭畦加入了中共，其支部的名稱為“德國共產黨中國語言組”。該支部成員有成仿吾和章文晉，後來的外交部副部長和駐美大使。

**1931年**她陪同宋慶齡返國參加宋氏家母葬禮。同年**10月**，宋慶齡再度送胡蘭畦赴德學習。當時德國法西斯勢力興起，胡蘭畦組織中國留學生成立了中共外圍組織“旅德華僑反帝同盟”，她任主席，成員有王炳南、江隆基（北大副校長、蘭州大學校長）、程琪英（北大德語教授），盟刊為《反帝》。

**1932年12月**，根據德國共產黨決定，胡蘭畦在柏林體育館舉行的反法西斯大會上發言譴責日本侵華罪行。在會上發言的還有德共國會議員瑪麗亞·愛塞，二人從此結識。會後，胡被德國警察拘捕，次日宣佈“驅逐出境”。由於愛塞和德共領袖克拉拉·蔡特金以議員身份出面擔保，胡蘭畦才得以暫留德國。

當時在德國的中國留學生大部分受國民政府的中國大使館控制，他們力圖把抗日救國運動納入擁護國民政府的軌道。而其中的共產黨成員，受中共駐莫斯科代表王明、康生等人的影響，對反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重要性缺乏認識，以極左的宗派情緒對待宋慶齡、何香凝等國民黨左派領袖，散佈流言蜚語。胡蘭畦被批判並被少數人以極其草率的口頭表決方式“開除出黨”。

胡蘭畦上訴莫斯科。德共中央受共產國際的委託，派議會黨團負責人奧爾·托堡調查解決，在他和閔岑貝格的幫助下，德共為胡蘭畦恢復了黨籍。

**1933年**春，希特勒上臺，大批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被捕。胡蘭畦同德共中央機關報工作人員費茨·辛田合作，印發傳單，因而被捕，關入女牢。由於宋慶齡和魯迅等人以“民族同盟”的名義，向德國駐上海總領事館提出抗議，胡蘭畦才於三個月後獲釋，不久再度被驅逐出境。

離開德國以後，胡蘭畦迫於生計，在巴黎一家猶太人辦的園藝學校半工半讀，她利用空餘時間，寫出回憶錄片斷《在德國女牢中》，陸續在亨利·巴比塞主編的《世界報》上發表。胡的經歷揭露了德國法西斯對進步人士和無辜群眾的殘酷迫害，也記述了來自社會各階層的女囚們的仇恨和機智、頑強的鬥爭，文章立即被譯成俄、英、德、西四種文字，在國際上引起了廣泛而普遍的讚揚。

在巴黎期間，胡蘭畦仍繼續進行反法西斯宣傳，法國當局要求她限期離境，她只好取道英國，準備回中國參加抗日鬥爭。此時，她收到中共駐蘇代表、著名文藝界領導人蕭三轉來的邀

請函，命她赴蘇出席全蘇第一次作家代表大會。在會上，她結識了高爾基、布哈林、西蒙諾夫和莫洛托夫等領導人，成了高爾基的貴賓。會後，胡留在蘇聯。高爾基病故，她作為中國作家代表執紼送葬。

1935年，胡蘭畦受中共在蘇聯的代表王明、康生的委託，前往香港從事抗日統戰工作。在淞滬戰役中，她組織戰地女子服務團，參加羅卓英部十九集團軍作戰。

1937年胡蘭畦終於與陳毅訂下了終身之約。但是陳毅應項英之命奔赴前線，兩人無奈分手，造成終身遺憾。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胡蘭畦受宋慶齡、何香凝和李濟深委託，率領婦女工作團進行宣傳教育工作和戰地救護工作，1939年被國民政府任命為少將指導員，為國軍歷史上第一位女將軍。

1947年她擔任《貴州日報》社社長，從事新聞工作。1949年初，胡蘭畦以驚人的膽略，置生死於度外，隻身穿越火線，成功地完成李濟深交代的任務，策動國軍張軫部起義，為加速中共的勝利作出了貢獻。中共取得政權前夕，她參與了上海地下黨的領導工作。

1949年以後，她盼來了為之奮鬥的勝利，可是反而處境困難。她寫信給陳毅，曾經領導過她的潘漢年代表組織找她談話說：“有人對你有看法，認為你的社會關係太複雜。”又告誡她：“陳毅人家他已有了老婆孩子，還找他幹嗎？”她被打發到華北大學工學院，管理伙食。著名文學家陽翰笙說：“胡蘭畦在極左思潮氾濫的年月，備受折磨，直到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後才重見天日。”

陽翰笙指的是胡蘭畦平白無故地戴上右派帽子一事。她在鳴放中並未開口，但是她是章伯鈞和章乃器的朋友。以往在章伯鈞坐牢的時候，她就去探過監。在反右運動中，她聽說二章被鬥，成為中共痛打的落水狗。她出於同情，去探望了章伯鈞一次。只因為章是頭號右派，她也順理成章地成為右派分子了，時年五十七歲。戴上右派帽子後，勞動了二十年，到1978年才獲改正。

進入上個世紀1990年代，她已是又聾又瞎，長年孤身臥於病榻。偶爾有人探望她，便會淚流滿面地說：“我是1930年入黨的，但是現在黨齡只從1978年才算起。”

歷史激流終於沖掉了將她深深掩埋的灰塵。現在站在世人面前的胡蘭畦是反法西斯戰士、革命作家、真理衛士和中共早期資深黨員，她有功於國家，有功於中華民族，不愧為當代中華女傑。

胡蘭畦曾和德國著名作家、曾任東德作家協會主席的安娜·西格斯結為密友。安娜·西格斯著有《第七個十字架》、《死者青春常在》等反法西斯文學作品。她的作品裏經常出現中國革命的主題。1932年，安娜·西格斯和胡蘭畦合作創作了小說《5月1日，楊樹浦》，引起廣泛注意。1951年安娜率東德作家代表團訪問中國，通過詩人和作家、北大西語系主任馮至教授的介紹，迫不及待地會見了胡蘭畦，事後胡卻遭到中共當局無理批評，指責她違反了外事紀律，事先沒有請示彙報。

縱觀胡蘭畦跌宕起伏的傳奇人生，儘管她一生多次遭到中共不公正的對待，不時施以迫

害。但她始終堅持革命鬥爭、堅持中德友誼、堅持文學創作和新聞事業，直到生命終止。她是中國現代傳奇女傑。

1994年胡蘭畦在北京含恨離世，終身未嫁。

### 謝雪紅 從童養媳到二二八起義領袖

從童養媳到臺灣二二八起義的領袖，被國府當局列為二二八事件八大罪魁之首的謝雪紅（1901-1972）一生坎坷，充滿傳奇色彩。在兩岸同時發表的張克輝電影文學劇本《啊！謝雪紅》記敘了她充滿悲劇色彩的奇異一生。謝雪紅說過：“人生應當是不斷探索真理的旅行”。她的一生歷經艱辛，苦難和傷痛如影隨形。青少年時代的悲慘生活，煉就了她終身執著，養成了他桀驁不馴、堅持己見、特立獨行的風格。以至後來只有少數人在她身邊能互相扶持，多數人則是猜忌和誤解，直到去世都生活在陰影之中。

1901年10月17日，臺灣彰化縣北門土地廟旁的一戶貧苦工人家中，出生了一個女孩，取名叫謝氏阿女。父親是搬運工人，母親替人縫補。她排行第六，共有兄弟姐妹八人，均未上學。阿女五歲起挖野菜，煮豬飼料。1913年父母相繼病逝。為了葬母，阿女以一百六十元賣給台中開雜貨鋪的洪喜當童養媳。她要給十幾個人做飯，洗衣，



臺灣二二八起義英雄謝雪紅

還要到店鋪幫工。洪喜的大老婆經常把她打得頭破血流、遍體鱗傷。她自殺未遂，逃回家中。一個名叫張樹敏的富翁替她贖了身，並表示要明媒正娶，她同意了。

1919年她與張樹敏在日本正式結婚。婚後張帶她到青島，住在朋友家中，她開始學習寫字。朋友常帶她參加大學生聚會，介紹十月革命和蘇俄。有一張紅軍攻打冬宮的照片，殷紅的鮮血灑滿皚皚白雪，給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便自己取名“雪紅”。謝雪紅便成為她終身的名字。

當年秋天，她隨夫回到臺灣家中，發現丈夫張樹敏早有妻室。她不甘心做妾，決心外出苦學，自謀生計。回家鄉開了家“嫩葉屋裁縫店”。1923年4、5月間，她決心到上海求學，在輪船上結識了林木順等三人，結伴參加各種社會活動。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她多次參加示威遊行，大聲疾呼：“同胞們，別忘了還有四百萬臺灣同胞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下呻吟！”她的演講引起人們和記者的注意，紛紛前來採訪，她乘機在報上發表《毋忘臺灣》的專訪文章，因此出了名。

由於她表現突出，中共吸收她入黨，改名為謝飛英。1925年就讀於上海大學。10月間，地下黨派遣她和林木順等人共赴莫斯科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學習。在學校裏她與中共早期革命活動家向警予同住一室，成為要好朋友，向警予向她傳授了許多共產主義理論，同時介紹她認識蔡和森等中共領導人。



1927年，謝雪紅東大畢業，共產國際的日共領導人片山潛向她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決定，派她去日本會見日共主席渡邊政之輔。請日共協助建立台共。台共由日共領導，成為“日本共產黨臺灣民族支部”。1928年4月15日台共在上海法租界召開成立大會，有八位代表出席，大會選舉林木順、蔡孝乾為中央委員；謝雪紅、翁澤生為候補中央委員；謝雪紅為駐日共代表；林木順為委員長。當時僅有十八名黨員。

謝雪紅隨即赴臺灣，開展地下工作，因“台共事件”被日本當局逮捕，失去了組織關係。在判處十三年服刑期間，她在獄中受到了六個月不間斷的殘酷肉刑和最卑鄙的利誘迫供，她不得已和其他人一起填寫《轉向書》，聲明今後不再從事政治活動。後來她說這是一生中最大的污點，1939年因病保釋出獄。

1945年日本投降後，撤出了臺灣。謝雪紅在國民政府接收大員陳儀抵台前幾個月，在台中成立了“人民協會”，引起當局不滿。1947年春震驚世界的二二八事件發生了。市民大會推舉謝雪紅為主席率領市民遊行，包圍警察局，收繳了武器彈藥。她挑選最精良的成員成立“二七部隊”，控制了臺北市。可是來不及成立人民政府，來自內地的國軍迅速包圍了“二七部隊”，經過激戰，寡不敵眾，謝雪紅逃到上海，與中共上海局接上關係。

1947年6月，謝雪紅一行來到香港，在中共和何香凝、李濟琛、蔡廷鍇等支持和幫助下成立“臺灣民主自治同盟”，謝雪紅被選為主席。作為新政協的一員，北上參加中共建國活動和新政協會議。

在此同時，她以中共特別黨員的身份恢復了中共黨員的組織關係。中共特別黨員是一支受毛澤東、周恩來直接領導的滲透在對方陣營中的秘密部隊。謝雪紅這個特別黨員的職責便是操控“臺盟”，使其成為中共的一個表決機器和花瓶，照毛澤東的說法，就是“不舉手不給飯吃”。

然而做兒子黨、花瓶黨的角色同謝雪紅天馬行空特立獨行的個性絕對不符。她雖然擔任全國婦聯副主任、擁有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頭銜，在1957年臺盟舉辦的六次整風座談會上仍然向中共連續開炮：

“處理臺灣問題必須考慮到臺灣政治、經濟、文化等特殊環境，以中國民族主義來要求臺灣是不近人情的。”

“我謝雪紅有什麼罪？同志們聽著，黨和毛主席要把所有大陸上的臺灣人一律下放，並且要一放到底，歸農落戶。對臺灣人來說這是極殘酷的。試問臺灣人民生長在一個亞熱帶地方，住在大陸北方寒冷地帶，已經有些受不了了。今天要他們到東北，要他們到西藏，要他們……倒不如把他們早點弄死，反而乾淨。”

“我是臺灣人，向黨要一點臺灣人在大陸的根。他們雖都絕望，請黨不要迫死他們。今天把臺灣人一律下放，這不是把天上的飛鳥送到水裏，水裏的魚兒送到岸上一樣嗎？”

“因此，我覺得下放太可怕，我在替大陸上的臺灣人向黨要求，饒他們一條垂死的命。這樣你們就指控我反黨、反社會主義？我倒要請問一聲：是不是要把臺灣人民都搞死，才是共產

黨，才是社會主義？”

“我的反動歷史就是這樣，還不是昨天要利用我時，黨就把我捧上天上的神仙。今天不利用我了，就把我說得比魔鬼還壞。這簡直成了什麼世界？一點人性都沒有，一點同情都沒有。說句實在話，只有共產黨才如此待人。資產階級是不會如此沒有人情味的，至少人性的尊嚴和體面是會保留的。”

“我對同志們這麼說的，過去中共聲言要解放臺灣時，用我做宣傳工具。現在解放臺灣，有困難了，就對我不滿。既然共產黨和毛主席對臺灣沒有辦法，叫我謝雪紅有什麼辦法呢？即使我能再到臺灣去三美堂、大華酒家也沒有用呀。我老了，我的時代過去了，我是不願再把我這條老命送到臺灣去丟人的。”

反右鬥爭開始後，開始對她進行反擊，指責她“臺灣意識濃厚”，有地方民族主義，“大量栽贓、誣陷、迫害臺盟幹部”。批判她道：“她以老革命和二二八英雄自居，目空一切，唯我獨尊。”；“這次更利用黨整風的機會放出許多毒箭向黨進攻”；“煽動臺盟幹部用寫大字報等辦法企圖趕走在臺盟的共產黨員”；“當右派分子瘋狂地攻擊黨的肅反政策的時候，謝雪紅也不例外，她在今年1月22日政協工作座談會上提出一批案件，要求平反。”等等。

經過批鬥，謝雪紅被開除黨籍，撤銷一切職務，戴上右派帽子。由行政八級降為十二級，和丈夫楊克煌搬出高級公寓，遷入北京建外永安里一所普通樓房，過著隱居的生活。文化大革命中，多次受到抄家批鬥，人格和肉體不斷受到污辱、折磨。有一次被舊臺盟的共產黨員王萬德毒打得遍體鱗傷，昏厥過去。

她始終不承認被開除中共黨籍的事實，堅持每月照常繳納黨費。於1970年4月5日抑鬱而死，死後留有三條遺囑：

第一條，我不是右派；

第二條，我仍然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

第三條，我一生也犯過錯誤。

## 王 蒙 當初做官太傻太天真

當王蒙的孫子十四歲時，他還住在北京朝內北小街四十六號的老房子裏。有一天他教訓孫子說：“你都十四歲了，怎麼一天到晚光知道玩。爺爺十四歲的時候都入黨了。”孫子回答他：“啊，你那時候沒有什麼玩具，沒有玩具可不就革命去了嗎？”王蒙1934年10月誕生於北平，出生後即回祖籍河北南皮龍堂村。四歲重回北平，五歲上小學，十歲跳級上中學。可是只唸到高一便肄業了。他孫子說的對，他早早參加了中共的城市地下工作，1948年10月10日不到十四歲就加入了中共，成為中共地下黨員，失去了童年和少年，書倒反而唸得不多。



原文化部部长王蒙

中共執掌政權後，他在1949年進入北京市團委工作，1952年擔任東四區團委副書記。業餘時間開始寫小說，曾用筆名陽雨。長篇小說《青春萬歲》是他真正的處女作，可惜趕不上出版就被打成了右派，直到改正後才得以正式出版，並改編成電影。

所以1956年發表在《人民文學》上的短篇小說《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才是他實際上的處女作。“一書成名又招災”，這篇小說不僅使他一舉成名，同時又讓他身敗名裂。《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是編輯改的名，王蒙取的本名是《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小說描寫一位新來共青團區團委工作的年輕人對官僚主義的不滿。這個在今天極為平常的主題在當時歌功頌德的時代不啻引起軒然大波。王蒙的這篇小說和比他更年輕的劉賓雁寫的《在橋樑工地上》便成為當時最典型的右派代表作。

不久開展的反右運動中，這篇小說就成為他劃為右派的主要依據。毛澤東在動員鳴放時曾對這篇小說多次表態肯定，說是沒有政治錯誤。等到反右，王蒙受批判了，劉少奇特意找來這篇小說，讀罷讓夫人王光美打電話給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安子文，表示王蒙不應該劃為右派。

據安子文的秘書陸沅事後回憶，安子文完全同意劉少奇的意見，並向有關方面作了傳達。但是後來還是陰差陽錯地把他劃為右派了。原來那是王蒙的日記出了問題惹的禍。王蒙在受批判時，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和坦蕩，主動地交出了日記。日記中記有幾句反動言論，例如“英國有海德公園式的民主，中國連這個都沒有。”諸如此類的右派言論便使王蒙在劫難逃。

劃為右派後，他被開除黨籍、團籍，送到北京郊區勞動。1962年摘帽後分配到北京師範學院工作。那個年代，摘帽右派與戴帽右派僅一字之差，以成份而言都是政治賤民。次年他即主動申請貶去新疆勞動。他一杆子到底直下基層，在伊犁彥岱公社二大隊從農民做起，埋頭苦幹十六年，最後被農民選舉為副大隊長。

在新疆期間，他刻苦學習了維吾爾文，將維文作品譯為漢語。在新疆作家協會擔任過創作員、在新疆文聯當過編輯。他的妻子李蕤在他最困難的時候陪伴身邊，不棄不離。她把他們的經歷寫在《我的先生王蒙》中。她欣賞他的“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

1978年改正後調回北京。他被樹為右派重用的典型，一路青雲直上，先後委任為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人民文學》主編、中國藝術研究院院長、國際筆會中心中國分會副會長。在上個世紀1980年代，王蒙當選為第十二、十三屆中共中央委員、擔任了四年的文化部部長。除朱鎔基以外，王蒙是右派改正後擔任最高職務的人，是右派中的幸運兒。

1989年六四以後，他拒絕以文化部長的身份，前去醫院慰問在鎮壓學生運動中受傷的解放軍官兵。遂被原總理李鵬宣佈，根據王蒙本人的意願，辭去文化部長的職務。鄧小平給了王蒙一個下樓的臺階。

王蒙是個多產的作家，他的作品累計已有一千多萬字。計有長篇小說七部、中短篇小說十部、古典文學研究三部、舊詩集一卷、新詩集二卷、英文維文譯作多部。著名的作品除處女作《青春之歌》和《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以外，尚有《火之歌》、《最寶貴的》、《說客盈門》、《歌聲》、《夜的眠》、《春之聲》、《布禮》、《蝴蝶》、《悠悠寸草心》、《活動變

形人》、《費厄潑賴應該實行》。他的自傳體三部曲《半生多事》、《大塊文章》和《九命七羊》記敘了自己的一生。

2008年4月27日，在鄭州書市舉辦的王蒙自傳第三部《九命七羊》首發儀式上，王蒙接受記者訪問時表示：“有人說我聰明才做了中央委員、文化部長，如果我聰明就不會被打成右派，如再說我聰明，我立馬上吊！”他在書中借李商隱抒發感慨：“在他的身上幾乎集中了中國男人的志大才疏，頂不住命運，放不開功名，夢想著富貴，自戀自憐自歎，唧唧咕咕瀝瀝，忍不住寂寞，憋不住牢騷的毛病。”他還慨歎：“事實證明，我確實不是政治家。我太天真，我太幼稚，我太溫情和軟弱。”

王蒙認為生命健康有三大標準，即善良、明朗、理性和自我控制。應當說這也是他的人生哲學。年逾古稀的王蒙依然筆耕不綴，勤奮寫作。可是他十分謙虛地說，自己已經是“秋後的螞蚱，蹦不了幾天了。”

## 白石 從囚徒到省委書記

白石和馮以平這一對共產黨的患難夫妻在大動亂大震盪的階級鬥爭年代，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獨特逼真的傳奇生活。白石從共產黨的囚徒奇異地搖身一變，成為中共河北省委書記、省紀委書記。坐著直升機從地下直沖九霄。這種荒誕不經而又觸目驚心的傳奇佚事只有在共產黨中國才有可能發生。如果不信，請看白石和馮以平夫妻倆人合著的自傳體小說《從囚徒到省委書記》，由官方的作家出版社出版，第一、第二部六十萬字，第三部四十萬字。

白石（1927--）河北省樂亭縣人，1945年參加革命，讀過三個大學。十八歲讀文學系研究生時國民政府懷疑他是共產黨領導，趁全城戒嚴時把他抓去坐了大牢。嗣後找不到證據又將他釋放了。出獄後一直從事中共地下青年工作。解放後在河北省共青團省委工作。她的妻子馮以平（1931--）江蘇徐州人，從事出版編輯工作。

1955年白石在機關內部參加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學習。一天他在看報上的胡風集團材料時，不經意地說了一句：“這個人我見過，是個有名的詩人，在解放區他找過我的一個同學。詩寫得很好，想不到他也是個反革命。”言者無意，聽者有心。不久支部書記找他盤問詳情，叫他交代他同學的情況。過了幾天，批判胡風變相成為“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運動”。白石的那句話使他成為肅反重點對象。接著便搜查他的宿舍和辦公室，把所有東西翻了個天，抄走了日記、信件、筆記本和詩歌草稿。斷章取義地抽出幾句話，上綱上線地指責他“宣傳胡風反動思想”。把白石關押了半年多，最後不了了之。令他暫回科室工作，不作任何結論。



這本書的作者為河北省省委書記白

石和馮以平合著

肅反剛結束不久，又開始了反右。在鳴放階段他和妻子在各自單位共同對他在肅反時無端



胡耀邦（中）、與基維諾（左）和華雷

被懷疑為胡風分子關押批鬥半年多的事實提出意見。反右階段批判他們倆人為胡風反革命集團鳴冤叫屈。白石不服氣，進行申辯和抗爭。頓時批鬥升級，劃他為極右分子，馮以平劃為右派分子，雙雙開除黨籍，開除公職。白石勞動教養，馮以平監督勞動。

1958年白石剛剛打成極右分子後拒不認罪，被從嚴處理送進勞動教養所勞動教養。每天除了沒完沒了的繁重體力勞動，回到教養所便囚禁在圍有鐵絲網的院子裏，沒有任何自由。他已不再企盼自由。十四、五歲的時候，背著貝多裴的詩句

“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冒死參加了革命，加入了共產黨。為的就是追求自由，現在革命成功了，自由卻失掉了。

勞改十二年後，他被押解回原籍農村交付群眾專政了整整十年。1979年改正後，來到妻子工作的河北省灤南縣。那時社會上有大量的人員平反改正後需要落實安置工作。一個小小的縣城無法安置幾百個人，他被打發到劃他極右分子的原單位共青團河北省團委要求落實政策，仍舊無法安置。一氣之下，自己選擇了一家清水衙門，設在石家莊郊區一座破舊的院落裏的中國科學院農業現代化研究所。住房是一座筒子樓。顧名思義，筒子樓裏全是直筒筒的一間間房間，沒有廚房沒有廁所。廁所每一層樓一間，不分男女，排隊輪候。廚房則在走道上，蜂窩煤、劈柴、鍋灶炊具全擁塞在樓道內。他專業不對口，要從頭學起。不過勞改、專政二十二年，都是和農業打交道。所以對農業也算有感情了，發表了多篇論文得到好評，也稱得上小有成就。

想不到他在這個擠不出一滴油水的窮研究所時來運轉了。研究所是新建的單位，人員來自四面八方，經過群眾推薦和領導考察後，先把推上了一個副處級的領導崗位——農業經濟室副主任，行政級別為副處級，級別越過了副科長和科級，跳躍了二個階梯。接著被推薦為研究所的黨委書記，跳到了正局級。在胡耀幫當權時期，中共黨內有個不成文的政策，對於黨內的右派分子表現好的可以破格啟用，但一般不宜擔任黨內正職。可是白石是個例外。

上世紀1980年代初期的改革開放、撥亂反正初期，中共需要大批的幹部。選拔的第二梯隊和第三梯隊首先應當不是文革中的三種人，然後在學歷、年齡等方面的要求還是襲用原來套雞蛋的方法，只不過雞蛋框不同了，尺碼也不同了。中共河北省委選拔黨政二套班子。白石又被套中了。某天晚上，省委書記解學恭派自己的小汽車把他接到家中。進了省委第一把手家的客廳，解學恭嚴肅地通知他進入省委領導班子。他驚呆了，他這個當了共產黨二十二年囚徒的混進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怎麼會進入省委領導班子呢。省委書記明確地告訴他，“為了革命的需要”，你到省委當省委常委兼秘書長。以後又根據“革命的需要”提升為省紀委書記、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即中央紀委）委員。過去他是專政對象、政治賤民、末等公民，被人整得暈頭轉向，現在成為河北省最高領導人之一，專整別人了。在河北省裏，他赫然是在省委書記

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人上人。

這種直升飛機式的直上直下，古今中外只有共產黨才有。它認為你壞，馬上把你打入地獄；它認為你好，即刻把你捧上雲霄。這時馮以平妻隨夫榮，當上了省委機關報《河北日報》的總編輯。他們兩位一位是省部級高幹，一位是廳局級高幹。直至離休賦閒寫作，還弄不明白究竟發生了怎麼一回事。於是提起筆來，共同寫出這段坎坷而又傳奇的經歷。此外，夫妻倆合寫了中長篇報告文學多篇，出版了長篇報告文學《金錢也誘惑》，編寫了六集電視劇《噩夢醒來遲》，在中央電視臺等多家電視臺播放。

## 昌 滄 耀邦同志送別右派

昌滄（1924--）原名昌學禹，湖北仙桃人，1949畢業於同濟大學法律系。在大學加入中共。1950年畢業於中央團校第二期。從此長期在團中央系統工作。直至1958年劃為右派。曾任新華社團中央分社、中國青年雜誌社、農懇報社的編輯、總編室主任、社編會委員和副主任等。

1957年鳴放期間，在青年中廣有影響的《中國青年報》和《中國青年》雜誌刊登了團內的一些鳴放言論，大多數是向黨的領導提出些工作上的批評和建議。待到反右運動開始，團中央系統亦有劃右的比例。團中央系統一共打了五十七名右派，《中國青年》雜誌社也打了六名右派，昌滄就是六名之一。

1958年3月初的一天。中國青年雜誌社反右鬥爭領導小組的工作人員通知昌滄：“耀邦同志明天上午九時在工字樓二樓會議室召開座談會。你作好準備。明天由我帶隊，你們六個人一起去參加。”

按照1958年4月2日由毛澤東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整風問題的指示》，在右派送去勞改前，應由單位領導召開送別會，交代政策，指明出路，有打有拉。

團中央一共打了五十七個右派。其中有上海市團市委副書記譚西山、雲南省團省委副書記董學隆、四川省團省委副書記賀惠君、江蘇省團省委副書記王正、廣東省團省委副書記仇作華、哈爾濱團市委書記郭永澤、中國青年報總編輯陳緒宗和副總編輯陳模及鐘佩璋、中國青年出版社總編輯李庚、中國青年報文藝部主任吳一鏗，連團中央書記處書記項南也被戴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受到留黨察看的處分。

那天，大多數右派都去了。當時的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也提前到會。他同各部門帶隊的幹部一起清點出席人數。耀邦掃視著會場，突然問：“劉賓雁來了沒有？”

“沒有。”《中國青年報》的帶隊幹部回答：“他拒絕參加這樣的會議。”

“‘小辣椒’來了沒有？”“小辣椒”是指舒學恩，筆名叫舒展。當時他是中國青年報社文藝部的編輯，主持辣椒副刊。

“他在地，還沒回來！”

“打電報去叫了沒有？”

“打了，可能在回來的路上吧。”

隨後，座談會開始。可大家神志沮喪，默然不語，有些冷場。

耀邦為人耿直、思想敏捷，一向快人快語，說：“那我先說幾句：同志們！你們中間的絕大部分是有才華的，才華橫溢！為黨為人民曾作過不同程度的貢獻，可你們這次錯誤犯得太大了，你們太驕傲了，尾巴翹到天上去了！”他越說越激動，他動感情了。“你們看，劉賓雁還拒絕參加今天的座談會，連我請他都請不動！”按毛澤東的指示，右派是敵我矛盾，不准稱“同志”，只准用“先生女士”稱謂。胡耀邦卻敢於稱呼“同志”，同他的臨別贈言一樣，是明知故犯，實為大膽突破禁區。

停了停，他解開胸前的衣扣，斬釘截鐵地高聲說：“今天你們犯了這麼大的錯誤，我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我平常對你們只知道使用，幫助不夠，敲打得不夠。你們中大多數人現在悔恨、難過，我也不好受，很不好受。你們中間絕大部分同志要下去勞動鍛煉，有些還要到北大荒去。你們要認真、徹底地改造思想。下去，肯定不習慣，尤其過去長期生活在南方、大城市的同志。北大荒那兒勞動條件很艱苦，你們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希望你們能自覺地找苦頭吃，自覺地好好地勞動，通過勞動徹底改造非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徹底改造資產階級思想，爭取早日回到革命隊伍中來！可以恢復黨籍，可以重新入黨嘛！我們馬克思主義老祖宗之一的恩格斯說過，勞動創造世界，也創造了人類本身。我相信你們能改造好。我相信咱們將來還有共事機會！你們改造好了回來時，我給你們開歡迎會，咱們就這樣說定了。”

胡耀邦的講話，給這些已被“打”得暈頭轉向、神志模糊的右派以力量。大家灰濛濛的臉上露出了絲絲的笑容。昌滄牢記胡耀邦的臨別贈言，來到了北大荒八五三農場一分場三隊。他定為農工一級，每月工資二十八元整。同為慶祝建國十週年的特赦戰犯在一起，在1959年10月被首批摘去了右派分子帽子，重新分配到農聲報社當記者。好景不長，隨著神州大地的血雨腥風，他又歷盡了坎坷，重新返回煉獄。

昌滄在右派改正後改行擔任《中華武術》雜誌的主編、中國武術學會常務委員、中國武術協會委員、中國武術研究院特邀編審。撰寫各類作品一百多萬字。編輯終審了一千七百多萬字的書刊文稿。成為中華武術界的知名人士。

### 劉賓雁 中國的良心

中國大陸名記者、作家劉賓雁（1925-2005），1925年農曆正月十五出生於中國吉林省長春市，2005年12月5日在美國於政治流亡中病逝，終年八十歲。

劉賓雁生前被“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評選委員會評為1986年首屆中國傑出民主人士。



胡耀邦接見劉賓雁

劉賓雁1939年加入中共領導的外圍組織讀書會，當年他年僅十四歲。這一年他發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說。1943年，劉賓雁十八歲，在天津市參加了中共的地下抗日聯合會，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6年抗戰勝利後，他以教員的身份為掩護，從事愛國進步活動，並曾翻譯一些當年的文學作品。而後至1951年，在哈爾濱從事青年工作和報刊編輯工作。1953年，劉賓雁到北京，參加“《中國青年報》的創辦，擔任報社的編輯委員和部門主任。

1956至1957年，劉賓雁發表了新聞特寫《在橋樑工地上》，尖銳地批評了中共黨內的官僚主義，這是自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後，衝破《講話》設定的禁區的第一篇批評性作品。此後他又發表了《本報內部消息》及續篇，更加直接地將批判的矛頭指向中共對新聞的控制，一時間造成極大的震動和影響，共鳴者眾。1957年5月，劉賓雁又發表《上海在沉思中》，批評中共上海市委推動鳴放不力。至此，劉賓雁的批判精神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毛澤東親自對他的文章批示：“想把中國搞亂”。1957年7月，劉賓雁被劃定為極右分子，開除中共黨籍。

1957年至1979年，劉賓雁先後被押送到農村強迫勞動十三年，在《中國青年報》資料室做事務性工作五年，在商務印書館、中國社科院“非正式”工作了三年。

1979年，對劉賓雁來講是一個具有轉折意義的年份。2月，他的右派獲改正。事隔半年後的9月，他就發表揭露中國社會黑暗面的報告文學《人妖之間》，在中國社會再一次引起巨大的反響。12月，劉賓雁調入《人民日報》任高級記者，使得他更能憑藉《人民日報》在中國的特殊地位和他本身在中國新聞界、文化界崇高的知名度和威望，為中國的改革，為農民的疾苦，發出更強有力的聲音。

1984年，在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代表大會上，沒有被上頭提名為主席、副主席候選人人選的劉賓雁，獲得比欽定為主席的巴金還多的最多選票，成為中國作協副主席。身兼作協副主席和人民日報高級記者的劉賓雁，仍然繼續不斷地呼籲開放言禁，力主新聞自由、創作自由。同年，他發表報告文學《第二種忠誠》，矛頭直指個人迷信，在中國引起軒然大波。

1986年，中國最高當局開始感覺到劉賓雁的正義形象和道德力量的分量，以及他在中國人民中的巨大影響力，對中共以謊言和暴力維持的統治產生的威脅，他們開始再次對劉賓雁展開迫害。9月，劉賓雁的《我的日記》剛出版就成為禁書。劉賓雁又一次身處險境。但他仍然不改鞭撻社會黑暗的赤誠之心。1987年1月，一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導致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下臺。劉賓雁則被鄧小平點名，作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代表人物，與王若望、方勵之等著名人士在一起，第二次被開除中共黨籍。



劉賓雁獲獎後和他的銅像合影



1988年3月，劉賓雁應邀赴美國訪問。先後擔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和哈佛大學訪問學者。1989年，北京發生天安門廣場民主運動和六四中共軍隊開槍鎮壓學生和市民的血腥事件。劉賓雁在美國發表談話，支援學生的愛國運動，強烈遣責中共當局的暴行，他因此被中共當局非法剝奪了返回祖國的權力。從那時起，劉賓雁開始了長達十七年的流亡生涯，直至於美國新澤西州溫莎市寓所附近的醫院中逝世。

劉賓雁流亡美國期間，整個身心仍系於中國的自由、民主、人權事業上。1991年，他出任由中國留學生和海外流亡知識份子六四後於洛杉磯創辦的，《新聞自由導報》理事會主席。1992年以來，他在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從事中國問題研究。編輯英文月刊《中國焦點》和中文月刊《大路》，向美中兩國傳達有關中國的資訊。1997年以來，他擔任美國自由亞洲電臺的特約評論員，讓自己的聲音通過電波傳往中國。在身體狀況允許的情況下，他積極參與海外民運活動。他並與癌症爭奪時間，傾注他一生對中國問題的思索，撰寫長篇著作《走出千年泥濘》，但未能完成，便與世長辭。

劉賓雁逝世後，海內外給他以崇高的評價，稱他為“中國的良心”。

### 王若望 豁出老命的王若望

王若望（1918-2001）原名王壽華，筆名若望、若涵、若木。1918年2月4日出生於江蘇省武進縣。1933年在上海新亞藥廠當學徒，同年參加共青團，並成為左翼作家聯盟的成員；1934年在上海因參加罷工被國民政府的軍法處判處有期徒刑十年。三年後抗戰爆發，因國共合作而無條件釋放，隨後赴延安，同年入陝北公學並加入中國共產黨。其後曾任中共西安工委委員、中共寶雞地委（時稱中心縣委）書記。1942年調至山東，任《農村文化報》主編，並於1948年任山東省總工會勞保部長。1949年中共執政後，回到上海，先後擔任上海總工會文教部副部長，1953年調任上海柴油機廠黨委副書記兼廠長、上海作家協會黨組成員、理事、《文藝月報》副主編，1955年任《上海文學》副主編。



王若望（左）與戈揚在美國

1957年被打成右派，他的右派言論主要是批評毛澤東的文藝路線，反對《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王實味鳴不平。他受到開除中共黨籍和公職的處分，下放到農村勞動改造。1968年在文革浩劫中，因批判毛澤東和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而入獄四年。他剛入獄時的囚號是一七八三號。這個囚號原來是胡風分子賈植芳使用的。王若望入獄前，賈植芳剛出獄不久。他的囚號便由王若望接替了。

當年在王若望劃為右派後，他在安徽省勞動局任職的三弟王鶴和在青島海軍部隊服役的小

弟王雷華均受到株連，雙雙劃為右派，下放農村勞動。兄弟三人都是右派在那個年代亦不多見。他的丈人馮秉華即羊子的父親也是右派。所以王若望的一家出了四位右派。

1978年後，他的右派得到改正，現行反革命罪名得到平反，並重新恢復工作，同時恢復《上海文學》原有職務和中國作家協會理事。1987年因批評鄧小平和抨擊中共專制政策，與方勵之、劉賓雁等人一起被鄧小平點名，戴上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老祖宗”的帽子，第二次被開除黨籍，並遭受了抄家之災。在八九民運中，他披著“救國救民，先救孩子”的肩帶，走在聲援絕食學生的遊行隊伍的最前列，而後第三次被捕，兩次入獄共十四個月。

王若望從一個最初信仰共產主義的黨員幹部，到後來成為反對共產主義的民運人士的心路歷程，見證了中國的苦難。王若望的一生，是不屈不撓、追求真理的一生。青少年時代，他為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奔赴延安，投身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但他很快看到了延安的陰暗面，並對中共高層的言行發出了質疑，致使他在1943年中共的整風運動中，遭受“走到反黨的邊緣”的警告，他由此開始意識到共產黨的專制本質。中共執政後，王若望雖身為執政黨的官員，仍保持自己的良知和批判意識，不斷批評中共的各種倒行逆施政策，也因此屢遭厄運。從他的經歷可以看到，在中國大陸歷年來的政治運動中，王若望都曾因言論超越了中共意識形態的教條框框而屢屢遭受迫害。在大陸他是一個典型的老運動員了。這位為中共奮鬥了大半輩子的老戰士，一生蹲過三次監獄，但是蹲共產黨自己的監獄遠遠超過蹲共產黨敵人監獄的時間。



王若望與夫人羊子

邁入古稀之年的王若望，仍堅持發表對中共錯誤的獨立批評，並將自己批評中共、批評鄧小平的評論文章，托人輾轉帶到海外公開發表。他與中共專制當局和獨裁者不屈不撓的抗爭勇氣和精神，令海內外關心中國民主前途的人士倍受鼓舞。他也被稱作“民族的良知”、“民主鬥士”；王若望自己則聲言，為了民主他把老命豁出去了。1987年王若望獲得傑出民主人士獎，但是當局卻不批准他出國，他只得派代表出席領獎。以後他又數度提出出國申請，都被中共刁難拒絕。一時間，王若望甚至寸步維艱、有腿難行。

1992年8月5日，上海公安部門突然通知他可以出國，他攜夫人羊子流亡到了美國。此後，他全身心地投身海外民運，1993年在洛杉磯成立的“中國民運團體協調會”，王若望任總召集人，1995年6月在紐約成立中國民主黨，他又被選為主席。在紐約的中共總領事館門前的抗議活動中，人們常常看到王若望白髮蒼蒼的身影。他對中共極權專制的批判，老而彌堅，毫不動搖。王若望認為，“隔著海洋，從遠處觀測北京當局在大陸的所作所為，反而比身在中國看得更細密、更客觀。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

當他得知自己身患絕症後，分外思念故國的親人，中共當局開出“不可發表批評文章，不

可接觸‘敏感人士’”為允許他回國的條件。為此他傲然回答：“寧可客死他鄉！”再次顯示了他為追求真理而寧死不悔；為中國的民主事業寧折不彎的浩然氣節。在他彌留之際，他的女兒從大陸飛來美國探望他，再次傳達了中國政府允許他回國的資訊。

2001年12月19日王若望因患肺癌在紐約逝世，終年八十三歲。他為中國的民主化事業奔走呼號，鞠躬盡瘁，一直奮鬥到生命的最後一息。

### 關維智 中共甘肅省委裏的第一位右派

關維智(1936--)是中共甘肅省委內部第一個揪出的右派分子。1936年他誕生於甘肅酒泉。他的祖籍是甘肅高臺，爺爺是拔貢，人稱拔貢爺。那個時候，關家擁有一些房產，家道尚稱殷實。他的父親弟兄三人，父親排行老大。不久家道衰落了，無以為生，他的父親便到了酒泉謀生，老二留在高臺家裏種田，老三隻身闖蕩新疆。他父親來到酒泉後，在民族飯店以北大南街開了間規模很小的雜貨鋪子，雜貨鋪後面帶有一院落的房子。關維智便出生在院落內的房子裏。

關維智五歲那年，雜貨鋪子經營不善，舉家返回高臺。關維智兄妹五人，他排行老三，在他十三歲時哥哥關維禮患肺癆死去。經濟日益拮据，他父親百愁莫解，無奈之中又帶子女返回酒泉，投奔關維智的母舅閻林德，在閻開的米店做帳房。

1945年，關維智插班進入北斗宮小學三年級。1947年考入酒師附小，二年後畢業。本來因家貧父親不讓他繼續讀書，後來在舅父支助下，考進了酒泉師範學校。1949年中共軍隊進城，學生們紛紛報名參軍，他也去報名，卻嫌他個子太小，沒有錄取。轉而考入地方幹部學校。二年後進入酒泉專署工作。不滿十八歲就參加了中共。1954年，中共甘肅省委舉辦全省機要檔案培訓班，他參加學習後被省委留了下來，在省委組織部檔案室工作。1955年甘肅省委派他到中央組織部參加整理幹部檔案的工作，中央組織部有意留他，但甘肅省不肯。回到甘肅省，他擔任組織部幹部處幹事和巡視員，定為行政二十一級，享受正科級待遇。



中共甘肅省委的第一個右派關維智

在1957年反右鬥爭以前，他的仕途是一帆風順的，小小年紀當了正科級幹部，工作在省委機關的核心部門。中共只啟用可靠的自己人方可在組織部門工作。1957年6月，在組織部門內部討論黨員思想動態的名單，亦即在黨內進行左中右排隊時，他受到社會上鳴放輿論的影響，突然指責黨支部搞黑名單，引用葛佩琦的話說黨支部起了“監視黨員的便衣警察作用”，是國民黨作風。

不久以後，中共甘肅省委機關報《甘肅日報》以《看！黨的叛徒關維智的醜惡嘴臉》為題，發表一篇未署名文章，對他進行批判。文中指責他欣賞葛佩琦，主張絕對民主和絕對自由，不要過嚴格的組織生活；叫囂“共產黨內出了階級，領導幹部跟普通幹部的待遇不同，就是階級

差別；反對靠政治吃飯，學會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同情支持儲安平的“黨天下”和羅隆基關於肅反的言論，揚言胡風的三十萬字意見書“值得考慮”等等。

其實，關維智同當時廣大黨內知識份子一樣，希望中共有一個好的黨風。他的想法過於單純和天真。自此他成為中共甘肅省委內部第一個被揪出來的右派分子、混進黨內的叛徒和階級異己分子。1957年9月份開始他失去了工作，不是接受批判，就是監管勞動。過了半年對他作了處理。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工資由行政二十一級降為二十五級。下放農村監督勞動。

自此之後，關維智踏上了一條三年多勞動改造的不歸路。因他是酒泉人，先押送他去酒泉安西十工農場。那裏同夾邊溝農場的條件相仿，差一點餓死。在中共中央西北局，指令甘肅省委搶救人命時，又被送到高臺城泉子農場。在農場他親身體驗了行將餓死的難友們“人相食”的淒慘場面。1961年元旦自高臺回到蘭州後又過了近二十年沒有人格、沒有尊嚴的屈辱生活。關維智很晚才結婚，娶了個農村婦女，過著清貧的生活，直到退休。

### 李慎之 不願在刺刀下做官的人

原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慎之（1923-2003）是中共黨內民主派和自由知識份子的領軍人物、國際問題專家和中共的思想理論家。先後擔任過周恩來和鄧小平的外交秘書。

他又是個老人造反的典型，“兩頭熱”的人物。所謂兩頭熱係指青少年時代狂熱追隨共產革命，擁護中共、擁護毛澤東；中年歷經痛苦的反思、徬徨和重新追尋；步入晚年便擯棄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成為大徹大悟的民主戰士。他在1999年寫的《風雨蒼黃五十年》便是他人生道路的總結。

李慎之的人生道路是一部完整的三部曲。

第一步，青少年時代迷戀共產主義和共產黨，貢獻出自己寶貴的青春。李慎之誕生於江蘇無錫一個殷實的家庭。但是他從小背叛家庭，投身革命。1940年考上燕京大學經濟系。僅上了一百多天，得了肺病綴學。太平洋戰爭爆發，他來到重慶，在自流井曙光中學教書。在學校宣傳馬列主義，被特務發現，翻牆逃跑。到了成都，找到共產黨，進入新華社工作。

中共掌權後，他擔任新華社國際部副主任，負責編輯《大參考》和《小參考》。《大參考》供黨政軍領導幹部閱讀，每天上下午兩份，大號字排版。毛澤東很喜歡，每天必讀；《小參考》即《參考消息》，最早供行政十八級以上的幹部閱讀。大小參考是中國發行量最大的兩份報刊。

李慎之刻苦鑽研業務，成為中共國際問題的高參策士，被周恩來聘為外交秘書。1980年代又成為鄧小平的外交秘書。

他廣泛接觸和瞭解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風雲變幻，緊緊追蹤蘇共二十大和波蘭、匈牙利事件的發展，開始進行一些初步的反思。同時還受到內部傳出的毛澤東批評新中國的愚民政策和專制主義的激發，在鳴放中倡議大民主、還政於民和建立憲法法院。他說：“請毛主席除了經濟建設的五年計劃之外，還要制定一個還政於民的五年計劃。”、“我們要開放新聞自由，小學中學都要設立公民課或憲法課；新中國每一個公民都要清楚自己的公民權利和義務。”、“我

們應當實行大民主；應當建立憲法法院；革命勝利後就要搞點改良主義。”

這是徹頭徹尾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理論。李慎之因言罹禍，打成右派，開除黨藉公職，監督勞動。他的人生道路跨入了第二步。

像千千萬萬右派分子一樣，李慎之起初並不怪罪中共和毛澤東，而是深挖自己的思想根源，承認犯了錯誤。只不過處罰太重太過份，自己感到委屈和冤枉而已。

右派分子可區分為主動右派和被動右派兩種，中國五十五萬多名右派分子絕大部分不具備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本質，他們在主觀上都是善意地提出意見，幫助中共改進工作，中了毛澤東的陽謀圈套而落網。只有極少數是真正反對中共的主動右派。而李慎之的高明之處，在於他自1960年代開始明白真理在他自己手中，以當右派為榮。然而還不敢向強權挑戰，只能禁若寒蟬，尊口免開。

2000年10月，他在給原胡風分子舒蕪的信中寫道：“前兩年讀了陳獨秀在1942年逝世前的言論，我更是恍然大悟，根本沒有什麼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的不同，民主就是民主。”這段話似乎可以證明他的思想飛躍發生在1990年代，自由主義言論始於1997年評論顧准的文章。

1973年經周恩來點名，把他自五七幹校“解放”出來，重回新華社加以重用。1979年以外交顧問的身份陪同鄧小平訪問美國，1982年參加起草中共十二大文件，1985年調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那時他與自由主義還保持著相當的距離。

1989年6月4日，天安門廣場的槍聲和坦克轟鳴聲，徹底震醒了他。他公開宣稱：“不願在刺刀下做官。”他決定“不讓屁股決定頭腦”，因此被撤職查辦，第二次罹難。由此起，踏上人生的第三步，“覺今是而昨非”，徹底擁抱自由主義。

他在思想認識上有了質的飛躍。首先，他在黨內民主派潰不成軍、黨外民主派接過接力棒的時刻，公開打出自由主義的大旗，令人振聾發聵，耳目一新。他承接陳獨秀、顧准黨內民主自由思想譜系，寫道：“世界經過工業化二三百年的比較和選擇，中國尤其經過了一百多年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試驗，已經有足夠的理由證明，自由主義是最好的，最具有普遍性的價值。發軔於北京大學的傳統在今天的復興，一定會把一個自由的中國帶入一個全球化的世界，而且為世界造福增光。”這不啻是中國自由主義宣言。

其次，他的第二個貢獻是以自由主義為理論根據，批判中國的專制主義。有二層新意，其一，突破馬克思主義的思維框架；其二，高舉反對“中國專制主義”的大旗，有力地回擊了新保守主義的逆流。

第三，試圖調動中共黨內的一切資源，重新啟動六四以後擱置起來的中國政治改革和文化改革。他並非孤立無援，胡耀邦、趙紫陽以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中被鄧小平開除黨藉的劉賓雁、王若望、王若水、吳祖光、方勵之；黨內公開的民主派和省部級高幹李銳、李昌、李魯、朱厚澤、于光遠、胡績偉都同他站在同一面大旗底下。中共黨內的民主派正在逐漸重新集結起來。

2003年4月22日，李慎之因老年性肺炎病逝於北京協和醫院，成千仰慕他的人為他送行。他留下的《李慎之文集》等作品無疑是為後人提供了寶貴的思想寶庫。

## 顧 准 當代中國的普羅米修斯

原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慎之評價顧准道：“顧准是中國近代以來（且不說自古以來）最偉大的思想家。比五四先賢陳獨秀、胡適、魯迅、李大釗、蔡元培更偉大。” 也有學者認為，中國近代最偉大的思想家當推魯迅和顧准。學者們為什麼給予顧准如此高的評價呢？

顧准（1915-1974）於1915年出生于上海，家道貧困。幼年綴學於黃炎培創辦的中華職業專科學校，進入潘序倫的會計事務所當練習生。刻蠟板時自學會計學，無師自通。十九歲時寫成《銀行會計》一書，成為中國第一部系統規範的銀行會計大學專科通用教科書，受到嘉獎晉級。他從一個練習生自學成才，成為會計學教授。



顧准的全家照

然而他的興趣卻是做一名職業革命家。因此他努力自學馬克思主義和哲學，自行成立了秘密的馬克思主義組織——進社，後轉為武衛會。1935年加入中共。10月，武衛會遭到破壞，他流亡北平。半年後返回上海，擔任上海職業界救國會黨團書記、中共職員支部書記、江蘇省職聯宣傳部長和書記、中共江蘇省委副書記。

1940年8月由上海去中共蘇南根據地。至1945年，他輾轉于蘇南和蘇北兩個根據地，一度曾以文人的身分做過遊擊隊長，最後來到延安。抗戰勝利後，自延安返回華東，擔任中共中央華東分局財委委員、淮陰利豐棉業公司總經理、蘇中區行政公署貨管處處長、山東省財政廳長，同時積極準備接管上海。

1949年5月隨軍南下進入上海，擔任中共掌權後的上海市第一任財政局長兼稅務局長、華東軍政委員會財政部副部長、上海市財經委員會副主任。他在工作崗位上，努力鑽研業務，迅速成為中共黨內少有的財政專家和會計專家。他所創導的財稅專管制度，全國通行至今。

他的命運多蹇，一生坎坷不平。他那獨立的人格、明智的思想和過人的才識使他同中共正統的主流派格格不入，勢不兩立。1952年開始反浪費、反貪污、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他在稅收問題上同中央發生分歧。北京指示：“發動工商聯成員民主評議”。而顧准堅持：“這一做法可能引起很不公平的後果，應通過查賬徵稅法徵收。” 爭論的結果是他被打成三反分子，撤職查辦。

1956年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經濟研究所任研究員，寫出《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一文，首次在中國提出市場經濟理論。1957年初調任中國科學院資源綜合

考察委員會副主任，同蘇俄專家共同考察中國資源。他為了捍衛中方主權，抵制了蘇俄專家的錯誤主張，觸犯時禁。人未返回北京，一份《顧准反動言論》已整理就緒。他被打成右派，開除黨籍和公職。

他的思想在勞動改造的凌辱中依舊閃耀著光輝。**1962**年摘掉帽子。**1964**年又率先提出價格改革理論，主張提高糧食市場價格，縮小工農業產品的比價，縮小剪刀差。

在文革前夕的**1965**年，災難又一次降臨到他的身上。顧准的外甥在清華大學讀書的同學中組織了一個“馬列主義研究會”。這件事本來與他無關，但是別有用心的人生拉硬扯地把他扯了進來，打成反動集團幕後黑手和後臺，第二次戴上極右分子帽子。一個人梅開二度，當二次右派，這在全國都是極為罕見的。

“無情未必真豪傑”。**1960**年代他的家庭分崩離析了。夫妻離婚，子女脫離關係。他是位孝子。母親住在近在咫尺，為了劃清界限，至死不能探望。他孑然一身，臨終前歎息道：“我想他們，想得好苦呀，想得好苦呀！”

**1966**年**9**月，他遭到紅衛兵毒打，滿身是傷。紅衛兵還不過癮，再用方磚將他砸得頭破血流。他含笑面對兇手，又把兇手激怒了，遭到更殘暴的毒打，又拖又踢，直到打翻在地。

他於**1969**年底在牛棚裏才知道妻子汪璧已在一年半前因不堪忍受污辱自殺了。接著他被押送到河南五七幹校勞改隊強迫勞動，樹為牛鬼蛇神的典型。在幹校他的肺病得不到治療，逐漸轉化為肺癌。

在極端的紅色恐怖中，顧准不畏強暴，不顧傷病，堅持研究寫作。臨終前在異常困難的環境中，寫出《希臘城邦制度》和《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主張多元文化，堅持獨立思考，關注民主自由。指出貌似民主的群眾運動的危害性。

他用獨特的眼光，研究審視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實事求是地還其本來面目，將他們拉下神壇，向多難的國人指點迷津。他的主要論點為：

一，正面肯定英、美典範的資本主義。**1688**年的英國革命和**1787**年的美國立憲促使平穩的民主和多元的憲政在全球穩步實現；

二，否定法國大革命和巴黎公社。他說：“革命，既是革命黨人的精神動力，又是勝利後妨礙革命黨向執政黨轉化的精神桎梏。”；

三，精確地指出馬列主義的弊端和危害性。顧准在血雨腥風中宣稱：“今天當人們以烈士的名義把革命的理想主義轉變成保守的反動的專制主義的時候，我堅決走向徹底的經驗主義、多元主義的立場，要為反對這種專制主義而奮鬥到底！”

**1974**年顧准在孤獨中死於肺癌，死後才獲得平反昭雪。他的光輝思想至今依然閃爍著耀眼的光芒。他的《顧准日記》已成為他光輝思想的結晶。

## 許良英 堅守知識份子良知

許良英（**1920-2013**）生於**1920**年，祖籍浙江臨海縣，**1942**年畢業於浙江大學物理系，

備受老師王淦昌的賞識。1947年任中共浙大支部書記和杭州工委委員，1950年任中共杭州市青委學生部長。許氏早在初中時就立志要做愛因斯坦那樣的科學家，但由於發生日本侵華戰爭，痛感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大學時接受馬克思主義，投身中共領導的地下活動和群眾運動。

1952年調到中國科學院工作，負責《科學通報》工作。五六年調哲學研究所，研究科學哲學和科學思想史。1957年因公開反對反右運動，被定為極右分子，開除黨籍，失去公職，下放農村——回老家當了二十年農民。1962年開始編譯《愛因斯坦文集》。

1978年，許良英結束了二十年的農村生活，重返中科院，在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近代、現代科學、科學思想史，愛因斯坦以及民主的歷史和理論。他深切感到，中國必須補民主啟蒙這一課，經歷像歐洲十七、十八世紀那樣的啟蒙運動。1980年7月應胡耀邦之請，中科院為中共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領導人組織“科學技術知識講座”，許良英執筆第一講科學史的講稿，許在講稿中提出“兩百年世界歷史的實踐證明：科學和民主是現代社會賴以發展、現代國家賴以生存的內在動力。”科學和民主是國家的立國之本，是實現現代化的根本和關鍵。這個講稿在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時，被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和中宣部列為清查對象。

1986年11月，在反右運動三十週年前夕，許良英和方勵之、劉賓雁共同發起“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反映十分熱烈，但卻遭到當局禁止，方、劉被第二次開除黨籍，許良英也被又一次打入另冊。1989年2月，為紀念五四七十週年和法國《人權宣言》二百週年，推進我國民主化進程，許良英又起草了一封致當局的公開信，指出當前“腐敗成風，官倒猖獗、物價飛漲、人心渙散、教育、科學、文化事業面臨嚴重危機”，欲擺脫困境，必須“使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同步進行”；“切實保證憲法規定的公民基本權利”，特別是“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新聞自由的權利”。這封聯名信共有四十二人簽名，其中絕大部分是有成就的科學家，並且由王淦昌和錢昌照先生領銜。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第一次有如此眾多的科學家對國事公開發表意見。

許良英認為1989年的學生民主運動是完全自發的，其後期偏離理性的狂熱，就是證明；所謂某些人操縱或領導，純屬自欺欺人。許良英強調，中國民主化的道路應該是和平的、非暴力的，不應該再走武裝鬥爭和暴力革命的老路。

在六四以後中國政治高壓的環境裏，許良英雖然年老多病，仍一如既往地堅持自己的獨立知識份子的良知，積極投入各種上書運動、簽名運動，為中國的人權和民主事業堅持不懈的努力。

1995年即聯合國寬容年，許良英起草了一份迎接寬容年的呼籲書，並聯絡由王淦昌等著名學者領銜，林牧、王丹、丁子霖等四十五人簽名，影響廣及海內外。為此榮獲了1996年度的傑





出民主人士獎，並榮獲1995年度紐約科學院Heinz R Pagels科學人權獎。許良英先生的一生在這一輩知識份子中頗有代表性：他們都經歷了從對馬克思主義與中共的迷信到困惑到反省覺悟的過程。但許先生可以說是覺悟得最為徹底的一個。

許良英主要著作有《愛因斯坦文集》（編譯，三卷）、《二十世紀科學技術簡史》（主編）、《愛因斯坦研究》（主編）、《科學-民主-理性》（文集）、《走近愛因斯坦》（主編）等書。

## 王季洪 新梁祝哀史

1957年，時任中共成都鐵路局黨委宣傳部長的王季洪（1928-1977）出身書香門第，鄭州大學文學系畢業。在校時加入中共，1955年參加隨軍南下服務團。分配到四川成都鐵路局當中共的宣傳幹部，不久提升為宣傳部長。他身高一米八五，相貌堂堂，一表人才，儒雅翩翩，學識淵博，誠懇和善。長於金石、書法、音律。詩、詞、歌、賦樣樣精通。是他屬下鐵路文工團姑娘們傾心的白馬王子。

1956年春節審查演出節目，文工團張團長請他審定春節慰問節目《釵頭鳳》。他忽然被扮演唐琬的演員吸住眼球，她美艷驚人、身材苗條、典雅高貴、楚楚動人。善於拍馬溜鬚的張團長軋出了苗頭。當王部長問起這位女演員姓甚名誰時，他心中早已有了數，便把王部長邀入他的辦公室關門密談。

“小妮子名叫陳美霞，今年二十三歲，共青團員，成都溫江人，父母中學教師，四川省藝專畢業。剛分配來文工團便成為文工團的頂樑柱子，追求她的人，上自領導，下至大學生如蝶戀蜂圍。她都視若無睹。”她的閨中女友透露，她“須擇個意氣相投，品學兼優，溫柔體貼的如意郎君，相伴終生，否則——不嫁。”。張團長一口氣背來，如數家珍，似乎早已胸有成竹。

在張團長的大力撮合之下，這對戀人很快進入角色，拜見了雙方父母，談婚論嫁，瓜熟蒂落。按王部長的正處級待遇，分得住房一套，兩人辦好了《結婚登記證》，只差洞房花燭夜了。可是1957年春天，一聲霹靂，禍從天降。身為宣傳部長的王季洪，必須到成都鐵路局所屬各路段去作整風動員報告，主持各級整風鳴放座談會。結婚前夕，正是他春風得意的時候。他四處奔走，宣傳貫徹毛澤東的鳴放政策，號召大家打消顧慮，積極向黨提意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不打棍子，不抓辮子”，如此等等。他成段成句地搬用毛澤東的話，可是像他那樣一個處局級的共產黨基層幹部無法領會毛澤東的神機妙算。他不僅使他動員鳴放的人中了陽謀圈套，有心人在他無數次的動員報告中隨意挑出幾句“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話，已經足夠套進毛澤東的六條香花毒草標準了。可憐他這個小小的宣傳部長猜不透其中的奧妙，毛澤東說這些話是“引蛇出洞請君入甕”的戰略戰術；而他王季洪重覆毛澤東的話，便成為王季洪自己的右派言論了。

成都鐵路局的反右領導小組組長是王季洪的情敵張鳳如副局長。文工團的團長張德明看風使舵，眼見王季洪岌岌可危，趕緊改換門庭，投靠了權大氣粗的張鳳如。一個為了橫刀奪愛，一個為了升官發財，覬覦宣傳部長的位置，二張雙雙策劃，把王季洪頂了一個局裏的右派名額。

正當他倆高興地宣佈第二天舉行婚禮的當口，當天晚上不早不晚王季洪被揪了出來。反右領導小組長在大會上宣佈：“王季洪是鐵路局內最大的右派分子，是混進黨內的階級敵人。趁黨整風之機，四面八方煽風點火，挑動對黨的倡狂進攻。據查，他的長兄已劃為右派分子，他們兄弟倆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代表人物。他們的目的是要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是我們不共戴天的敵人。必須批倒，嚴懲不貸。”五天后又宣佈王季洪為極右分子，開除黨藉，開除公職，強制收容勞動改造。

他佈置一新的洞房內外鋪天蓋地貼滿大字報，婚禮取消。押送勞改的前一晚，看押他的幹部大發慈悲，允許他回家收拾行李，與尚未洞房的新婚妻子告別。夫妻兩人數日不見，恍如隔世。王季洪摟住憔悴的陳美霞抱頭痛哭，悲痛欲裂。他抱著她說：“看來我們今生無緣再做夫妻了，你忘了我吧。你要好好生活下去，如有來生，我再娶你。”說著嗖嗖落下兩行熱淚。美霞一下子撲到他的懷裏，噙著眼淚對他說：“不，不允許你這麼說，我們不是夫妻嗎？不論時間多久我會等著你回來。”唏噓半晌又深情地說：“書呆子，難道你要學柳下惠坐懷不亂嗎？我這一生只能把最珍貴的貞操獻給我最愛的人……”。

這一夜恩愛的結果，使陳美霞懷上了愛情的果實。從此一別以後，“無限相思枉斷腸”。王季洪在新勝勞改農場改造，又送去汶川鐵路築路。在階級鬥爭那個年代，夫妻兩人都不敢通信。他們這一夥勞改的右派，日久生事，在工後飯餘閒聊之中，平白無故地冒出一個“馬列主義反革命聯盟”的大案，紅岩英雄周居正和解放軍中尉楊應森等人被槍斃。王季洪經過嚴刑拷打，咬緊牙關，堅不招供，反而挺了過來。二十年後，王季洪的右派始獲改正。回到成都，見到陳美霞，才知真情。

在送走王季洪的第三天，文工團張團長代表組織找她談話，給她指明二條出路。如果堅決跟著王季洪，死路一條，立即作為右派家屬開除出文工團；如果同王季洪堅決劃清界線，寫一張離婚申請書，既往不咎，嫁給張鳳如副局長，當個局長夫人。成都鐵路局直屬鐵道部，當時同成都市並級，管轄好幾萬人。陳美霞萬念俱灰，為了肚子裏的孩子，只得屈從，轉眼之間又成了局長夫人。結婚之前她向張局長提出條件，把她和王季洪的孩子視若己出。孩子出生後，她給他取名“念洪”。

二十年後，孩子長得像親生父親。她告訴了孩子這段故事，孩子一時接受不了這個現實，但答應見親生父親一面。在一個星期天，陳美霞陪著孩子去見從未見過面的親生父親。她叮囑孩子一定要叫一聲爸爸，自己遠遠地躲到聽不見談話的地方。不一會兒，只見父子倆爭吵起來，她趕緊過去。只聽得王季洪高聲吼道：“我和你媽的事，用不著你這個後生小子品頭論足，你認賊做父，不是我王家的血脈。”她兒子也大聲呼喊：“我根本就沒有你這個父親，請你不要打擾我們一家子平靜幸福的生活，更不要再自作多情了。”聽到這裏，陳美霞突然昏死過去，倒在地上。念洪趕忙搶救母親，送往醫院。

王季洪高舉雙手，仰頭向天，瘋狂地胡嘶亂吼：“毀滅吧，你這萬惡的世界，我要舉起神聖的自由之火，把這魔窟燒成灰燼。燒一燒一燒呀！”喊著喊著口吐白沫，雙眼上翻，不省人

事。

王季洪受刺激太深，成為終身難愈的精神分裂癥患者，送進精神病院，以撕人民幣取樂。一個月後離開了人世，僅活四十九歲。身後留下了一個終日以淚洗面生活在痛苦之中的昔日情人和不肯承認父親的逆子念洪。

那是發生在瘋狂年代的一個真實而瘋狂的故事。誠如白毛女所唱，“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這句唱詞看來要反其道而行之了。真是：

梁祝悲情世代傳，  
一夜淒風百花殘；  
枉寄廿年相思情，  
豈容瘋顛解前緣。

### 鐘惦棐 敲響電影鑼鼓的人

鐘惦棐（1919—1987）四川江津人，原名鐘永發，著名的電影評論家和中宣部電影處副處長。少年就讀于江津中學，1937年11月，十八歲時即赴延安，進入抗日軍政大學，次年轉入魯迅藝術學院，1938年加入中共。1939年去敵後，在華北大學文藝學院任教。1943年到冀中遊擊隊工作。1948年調中共中央華北局宣傳部，次年調文化部籌建藝術局。1952年調中宣部，任電影處副處長，電影處處長便是江青。他們二人是電影處的主要領導。

鐘惦棐長期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頗有建樹。因而使他陷入了一場災難。1956年10月文匯報在上海復刊。文匯報復刊之初，極想打響幾炮。當時毛澤東剛剛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文匯報便以為雙百方針鳴鑼開道為己任。文匯報北京辦事處三十來歲的女記者姚芳藻抓住電影問題，跑去中宣部電影處向鐘惦棐請教，並徵求鐘的意見，文匯報將就此問題組織討論。鐘很支持文匯報的意見。在文匯報發表了五篇文章，討論告一段落時，鐘撰寫了總結性文章，敲響了電影鑼鼓。

鐘惦棐評論性的總結文章《電影的鑼鼓》同時發表在文匯報和文藝報上。針對觀眾提出的“題材狹窄，故事雷同，內容公式化、概念化”、“看了開頭，就知道結尾”、“為什麼國產故事片那麼少？”等問題，他寫道：“……目前有許多有經驗的電影藝術家不能充分發揮出創作上的潛力，而只能唯唯聽命于行政負責人員指揮，尚未進入創作已經畏首畏尾，如何談得到電影藝術的創造？沒有創造，如何談得到電影事業的繁榮！”、“關心過多，也就往往變成干涉過多”、“藝術創作必須保證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必須充分尊重藝術家的風格，而不是‘磨平’它！”

毛澤東聽到了電影界響起的鑼鼓聲，最初對文匯報掀起的討論持肯定、鼓勵的態度。1957年3月，他在接見新聞出版界的著名人士時，曾對文匯報總編輯徐鑄成說：“這次對電影的批評，

很有益，但是電影局開門不夠，他們的文章有肯定一切的傾向。”毛澤東的這番評價，對鐘惦斐無疑是莫大的鼓舞。

言而無信、出爾反爾是毛澤東的流氓無賴本性，如同他聽到臺灣報刊讚賞費孝通的《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時的態度一樣，當他聽到臺灣大道通訊社將《電影的鑼鼓》比喻為“反暴的鑼鼓”時，頓時變臉。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報告中猛烈抨擊鐘惦斐和他的《電影的鑼鼓》：“共產黨裏也有右派，中宣部有個幹部叫鐘惦斐，他用假名字寫了二篇文章，把過去說得一塌糊塗，否定一切。這篇文章引起了批評，引起了爭論，但是臺灣很賞識這篇文章。”這符合他形而上學的武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

毛澤東一錘定音，在陽謀尚未結束，反右運動的序幕尚未拉開之前，他已經早早地把鐘惦斐打入右派另冊了。至於後來的批判，僅僅是錦上添花而已。

“錦上添花”之一是當時文化部電影事業局局長陳荒煤揭發了鐘惦斐與天津市文化系統大右派何遲的不正常關係。鐘對此遲遲不作檢討，繼續向黨倡狂進攻。鐘惦斐作為中國電影界的右派頭子受到聲勢浩大的批判。文化部在北京朝內大街剛建成的文化部大廈禮堂，從1957年的8月4日至9月27日，舉行了十五次鐘惦斐批判大會，他一次次地作著始終通不過的檢討。

陳荒煤說：“鐘惦斐的檢討仍然沒有改變立場，他不僅在文藝思想上反黨反社會主義，而且發展到對黨中央領導和重大政策有惡毒的攻擊和污蔑。責成鐘惦斐應該向黨老老實實徹底交代。”

鐘惦斐在1957年因《電影的鑼鼓》罹難，受到開除黨籍、罷官、行政連降四級、下放農場監督勞動的嚴厲處分。他的右派生涯十分悲慘，夫人張子芳和岳母帶著四男一女五個孩子，從機關宿舍遷居簡陋的平房，每月生活費二十六元，每個孩子十元，長年忍饑挨餓。

經過在唐山市柏各莊農場四年的監督勞動，他摘去帽子成為脫帽右派，在中國影協資料室工作。來不及喘一口氣，文革鑼鼓又敲響了。脫帽右派自然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被趕進了牛棚。繼而又發配到五七幹校勞動。1979年改正後，鐘惦斐苦笑著說：“我的黨齡現在被確定為四十年，居然有一半多的時間不在黨內。”

鐘惦斐在晚年，強忍肝病和腎癌病痛，寫下百萬餘字的電影理論著作，為中國的電影事業發展作出重大貢獻。中國人民大學甘惜分用二句話，勾劃了他的品質：“松竹梅的品格兼備，才學識集於一身。”人們為他寫的挽聯是：

鑼鼓一聲，沉冤如海，亮節如山，長為人間留榜樣；

文章百萬，瀝血化珠，嘔心化玉，拼釋生命鑄銀壇。

## 張文澄 黨內民主犧牲品

原中共重慶市委書記張文澄（1915-1989）原來是中共優秀的地下工作者。他是四川省仁壽縣人。1936年參加革命，1937年加入中共。長期在成都、重慶等地區從事中共地下工作，

曾任中共成都市委組織部長、川康特委秘書長、青委書記等職。

1940年因地下組織遭到破壞而疏散到宜賓地區，擔任中共宜賓中心縣委書記，領導重建和整頓當地的中共黨組織。經他的努力，很快恢復了中共的地下組織機構。

1941年3月調任中共川南特委委員、中共南方局雲南調查研究組組長。1946年抗戰勝利後，他擔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員、省委副秘書長、中共武漢市委委員、市委宣傳部副部長。1949年中共接掌四川政權後，他擔任中共重慶市委委員、副秘書長、三區區委書記、中共重慶市委宣傳部長、市委書記處書記等職。

1952年，四川省由川東、川南、川西、川北四個行署合為一個四川省，中共中央事先已內定李井泉為中共四川省委書記。可是又要作秀，裝扮成民主選舉的模樣，表面上要符合《黨章》規定的“黨的各級領導由黨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這個原則。那時中共中央直至各級地方機構依照蘇共模式盛行等額選舉，選舉多少名省委委員就只允許有多少名候選人。中共四川省第一屆黨代會籌委會拿出來的常委候選人的名單中，竟沒有一名地下黨的成員。雖然有人按中共規定的組織原則向黨代會反映了這個問題，但李井泉不予理睬，仍要按照他根據中共中央授意的方案選舉下去。

等額選舉的結果，李井泉少了四票，他覺得有損面子。會後指示四川省公安廳廳長、中共四川省委委員趙蒼壁用公安特技檢查每張選票上的指紋，很快查出沒有投他票的人是中共重慶市委書記處書記張文澄、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明朗等人。李井泉赤膊上陣，親自召見談話，勒令各人寫檢查。在高壓威脅底下，其他三人紛紛認罪，檢查交付。

唯獨張文澄態度強硬，不買李井泉的賬。他頂撞李井泉說：“投票選舉黨的領導，選誰不選誰是黨章賦於我的權利，我有什麼錯？如果要我認錯，除非你修改黨章。”這一席話使李井泉更加下不了臺，李井泉便要伺機報復。

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張文澄以中共重慶市委書記處書記的身份領導重慶市的反右運動，天天到處作報告，到處抓右派。他小心翼翼，不敢說錯一句話、做錯一件事。可是即使這樣，李井泉仍然不放過他，指示中共重慶市委第一書記任白戈：“非得把張文澄給我打成右派不可。”任白戈不敢怠慢，堅決執行上級的命令，羅織罪名，雞蛋裏挑骨頭。在張文澄所做的鳴放和反右動員報告裏斷章取義地挑出幾句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抓出了“張文澄五人反黨小集團”。除張文澄以外，其餘四人為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王匡時、《重慶日報》總編輯賈維英（張文澄之妻）、重慶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主任謝予、《四川工人日報》總編輯室主任汪崗。五人均開除黨籍。王匡時、謝予和汪崗三人不開除公職，降職降薪留用。張文澄和賈維英二人開除公職，夫妻雙雙送去勞動教養。

“張文澄五人反黨小集團”還株連了許多這五個人的部下和親戚朋友。僅報社和四川省的廠礦院校便有二百多人被劃為右派，其中包括報社的業餘通訊員。張文澄有二位兄弟也被劃為右派，真可謂：“金榜題名，一門四傑。”

張文澄事件是中共黨內內鬥和打擊報復的典型。屬於此一類的當時還有軍內的彭（彭德

懷）、劉（伯承）之爭；廣東省的陶（鑄）與馮（白駒）、古（大存）之爭；河南省的吳（芝圃）、潘（復生）之爭；安徽省的曾（希聖）、李（世農）之爭等。掌權得勢的一方利用手中權力，把對手批臭打倒，並株連了許多無辜的人。失敗者被戴上右派帽子或其他各種帽子，張文澄既是黨內民主的犧牲品，也是白區黨和紅區黨矛盾的犧牲品。

中共的歷史證明，所謂中共黨內的路線鬥爭仿佛是毛澤東下棋。這樣內鬥的結果，鬥爭雙方最終都沒有好下場。他們都是毛澤東棋盤上的棋子。今天我吃掉你，明天你吃掉我，全憑棋手的意願擺佈。

1979年張文澄在改正後出任中共西南政法學院黨委書記、中共重慶大學黨委書記。1983年任重慶市十屆人大常委會主任兼黨組書記。1988年10月離休，1989年7月逝世。

### 黃一龍 李井泉一言堂犧牲品

四川省反右運動有一條不成文的潛規則，凡對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有意見者，都要劃為右派分子。由上及下，由此及彼，四川省各級領導以此類推，凡對自已有意見者都應劃為右派。安徽省反右運動中，中共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在毛澤東香花毒草六條標準之外加上反對農業集體化和反對本單位領導二條土政策，成為安徽省香花毒草八條標準。四川省李井泉則加上一條對自已和各級領導提意見者劃右的土政策，成為四川省香花毒草七條標準。



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

時任共青團成都市委常委兼宣傳部長黃一龍（1933-）說：

“李政委（李井泉）報告有教條主義，應當檢查。”因此符合李七條劃為右派。1957年12月25日，中共成都團市委支部關於處分黃一龍的決議中說：“黃一龍，男，現年二十四歲，四川華陽縣人。家庭出身教員，本人成分學生，1951年參加工作，1952年10月入黨，現任團市委常委，宣傳部長。由於黃一龍受資產階級思想影響很深，入黨後又存在嚴重的驕傲自滿情緒，思想上不但沒有得到根本改造，並且頑固地堅持自已的資產階級觀點和立場。因此，在社會主義革命逐漸深入、國際修正主義大肆氾濫、國內資產階級右派大肆進攻的時候，黃一龍便失掉立場，逐步倒向了資產階級右派的陣營，向黨進攻。黃一龍的主要錯誤是否認了今天階級鬥爭的存在，認為階級觀點已經過時。在宣傳工作上，對青年的估計和分析完全違背了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甚至發展到對李井泉同志傳達今年2月中央省、市委書記會議精神的報告進行攻擊，說‘李政委報告有教條主義，應該檢查’。錯誤地強調獨立思考和創造精神，在實際工作中對上級的指示和決定便往往採取了懷疑和否定的態度。在共青團工作上，認為‘共青團保證黨的領導和代表青年利益有矛盾’，這種觀點甚至帶到了共青團全國第三次代表大會上，要求三大討論保證黨的領導與代表青年利益有矛盾，在新的歷史時期應如何解決此一問題。由於三大未接受他的這個錯誤意見，加上黃一龍濃厚的資產階級民主、自由觀點，便說三大不民主，

沒有解決工作中的具體問題。最後大會通過決議時，準備棄權，經其他同志勸阻後，勉強舉了手。並且同意和支持右派分子王亞生向團中央、黨中央進攻的《當前全國團代會和整風精神相去十萬八千里》的反動文章。在大鳴大放中，在肅反和選派留學生等黨的重大政策上，黃一龍思想上和右派發生了共鳴，也認為有問題、搞錯了。當右派分子倡狂向黨進攻的時候，黃一龍當時思想上卻認為是‘群眾思想活躍’、‘批評空氣形成了’、‘政治積極性空前高漲’、‘形勢是正常的。’

“根據以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思想和行為，黃一龍完全掉入了資產階級右派的泥坑，錯誤的性質是嚴重的。但由於黃一龍在運動中還能夠主動向黨交代問題，檢查思想和批判錯誤，目前對自己的錯誤也有一定的認識，並願意改造自己，且以往工作一貫表現積極負責，支部委員會認為可以不作為右派分子處理，但為了嚴肅黨紀，教育黃一龍本人，黨內應給留黨察看二年的處分，並建議行政上撤銷其團市委員、常委、宣傳部長職務，降職使用。”

文件中說得很清楚，黃一龍不戴右派帽子，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可是上報中共成都市委後，中共成都市委書記廖井丹的一句話改變了黃一龍的命運。廖井丹說：“黃一龍還不劃右派，成都還劃哪個？”

根據領導指示，黃一龍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開除黨籍，開除公職，下放勞動。領導的一句話便可以推翻下級的集體決定。中共的一言堂、領導說了算的體制並不始自今日，一貫有之。幾十年後，黃一龍方才明白，他的劃右依據在於對李井泉的大不敬。

富有戲劇性的是在他劃為右派分子後過不了幾天，他的頂頭上司、中共成都市委常委、宣傳部長、青委書記葉石，由於同樣的“大不敬”罪名“對李井泉同志進行攻擊”而列入右派行列。中共重慶市委書記張文澄也因為“沒有投李井泉同志的票”而劃為右派。李井泉是毛澤東的好學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老師獨裁，學生專制，天經地義。

## 杜光 中央黨校裏的反右運動

中共中央黨校的前身是劉少奇兼任院長的中央馬列學院，是中共中央培養廳局級以上幹部和供高級幹部進修的地方。在反右運動中，中央黨校也不是清水一杯，連校長兼黨委第一書記楊獻珍和副校長兼黨委第二書記侯維煜也差一點當了右派。

中央黨校參加反右運動的有普通班八百九十八人，學員為司局級幹部；新聞班九十四人，學員來自各省市廳局級的新聞單位負責人；師資訓練部五百三十八人，學員來自各高校、省市黨校教師和理論工作部門領導；中央黨校自身的教職員工五百零三人。此外還有軍級領導幹部研究班五十人，新疆班四十四人；各地理論教師短訓班四百六十二人。總共約二千六百多人。

反右開始後，楊獻珍和侯維煜提出反右與理論學習相結合，反右、學習兩不誤，得到中央主持日常工作的劉少奇同意。但是毛澤東聽了康生、陸定一的報告後大吃一驚，認為中央黨校的反右運動嚴重右傾。中共中央書記處於1957年6月19日召開專門會議，研究中央黨校的整風反右。提出“黨外的右傾思想都放出來了，黨內會沒有嗎？高級黨校就暴露出很多右傾思

想。”、“社會上右派的思想，我們這裏（中央黨校）都有。”在中央黨校進修的高級幹部們說：“歷來整風都是號召大家提意見，結果誰的意見提得多，挨整也最兇。”、“隨便把發牢騷的話也當作真實思想來整，中央這一手辦得很拙劣。”這些不是典型的右派言論嗎？

1957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在總書記兼中央反右領導小組長鄧小平主持下研究中央國家機關、全國總工會和中央黨校的反右問題。鄧小平批評楊獻珍和侯維煜領導的中央黨校反右運動的右傾思想，嚴厲指責道：“蕭魯的問題，你們第一次上報他的材料時，中央就批准把他劃為右派，你們怎麼現在還在猶豫？如果這樣的人不劃右派，黨內就沒有什麼右派了。”中央反右領導小組副組長彭真在一旁狠狠地插嘴道：“現在的問題不是蕭魯是不是右派，而是你們兩個是不是右派的問題。”把楊獻珍和侯維煜兩人驚嚇出一身冷汗。楊、侯回到黨校重新部署反右運動，楊獻珍還是強調：“右派要搞出，面不要太寬，既要從嚴，又要慎重，要保存元氣。”

在毛澤東、鄧小平、彭真、康生等人一再施壓下，中央黨校揪出了一批右派。其中比較著名的有：

蕭魯：全國總工會海員工會國際部長。鄧小平批他道：“一個黨員領導幹部，稍微有些風吹草動就倒過去了，那怎麼行？”

王譚：《廣西日報》代總編輯，主張“犯上”，向上提意見。

徐盈：《大公報》名記者，國務院宗教事務局長。因與儲安平、徐鑄成、浦熙修關係密切而劃右。彭子岡的丈夫。

王善玲（女）：勞動部副司長。

丁景才：江西省農業廳副廳長兼農科所所長。批評工農剪刀差和統購統銷政策。

劉漢仁：長春市檢察院副院長，延安整風挨整。他說：“一提起1942年整風就氣憤。”為高崗鳴不平。

石天行：中共江西省委工業部副部長，批評中共政策左右搖擺。

劉曉晞：《人民日報》農村工作部副部長，批評個人崇拜，胡風材料不足，推崇黃萬里的《花叢小語》。

劉德焜：中共寧波市委書記，批評三反五反，批評毛澤東不冷靜。

齊佩軒：財政部國際財務司司長，批評農民生活苦，工農差別懸殊，八大代表選舉不民主。

張生強：甘肅省定西專員公署專員，批評肅反擴大化，農業合作化冒進。

陳友偉：華東師範大學講師，中國革命史教研組長。

楊庚：通俗出版社副社長。

中央黨校揪出的右派，都是1938年前加入中共的老黨員，大多知識份子出身。在政治高壓下，丁景才、陳友偉和楊庚相繼自殺身亡，三人定性為叛徒，開除黨籍。僅教職員工中就劃出右派三十二人，占參加運動的教職員工五百零三人中的6.4%。中央黨校宛如封建王朝的翰林院，各路諸侯上京鍍金，回去後好升官發財。可是在反右運動中照樣難逃毛澤東陽謀圈套，鍍



金未成帶回一頂右派帽子，萬劫不復。

杜光是中央黨校教職員右派之一。杜光(1928-)浙江溫嶺人。1946年考上北京大學。1948年8月因受國民政府特刑庭傳訊和通緝，離校後改名換姓逃往華北解放區。

在中央黨校劃為右派、開除黨籍和公職以後，與其他三十二位右派一同送往山西太谷農村勞動，後來又在水泥廠、林場、農場、稻田等處勞動。中央黨校的右派從1959年至1961年國慶日分三批摘帽。杜光表現不好，在1961年最後一批摘掉帽子，返回黨校。不准從事教學工作，安排至教務管理處。

中央黨校校長楊獻珍在1959年曾受批判，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降職為副校長。1962年七千人大會後為他平反。1963年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又發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像“捉放曹”一樣又批判楊獻珍了。對楊的捉放放殃及了摘帽右派。中央黨校是神聖的殿堂，摘帽右派留校工作是楊獻珍右傾機會主義的表現之一。於是摘帽右派統通驅逐出中央黨校。

杜光又被下放至杭州，進入杭州市第七中學。他在杭州七中度過了十三年光陰。文化大革命期間，他被作為牛鬼蛇神地富反壞右的代表揪了出來，受紅衛兵小將的污辱打罵，然後再把他關進牛棚，變相勞改。放出牛棚後在杭州七中的附屬農場勞動八年半。

1978年改正後回到中央黨校。先後任理論研究室副主任、科研辦公室主任兼圖書館館長。1988年參與籌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會，任幹事長兼《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雙月刊主編。

1989年杜光支持八九學生運動，被撤銷黨內外職務。1990年離休後，致力於應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來總結和分析歷史的和現實的問題，撰寫政論時評。杜光的主要著作有《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為自由化正名》、《解放戰爭時期北平學生運動史》、《楊獻珍傳》等。

杜光慶倖自己高壽，能進入二十一世紀新時代。他說這個新時代可以用二句話來概括：“一是空前繁榮，二是空前腐敗。”

## 謝和庚 他和王瑩都是中共特別黨員

謝和庚和他的妻子、著名演員王瑩都是早期的中共特別黨員，長期從事諜報工作，為中共出生入死，充滿傳奇色彩。最後都被中共棄如便履。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姚蘭、鄧群所著的《白崇禧身邊的中共秘密黨員》一書記敘了謝和庚離奇而悲壯的一生。

謝和庚(1912-2006)廣西桂林人。早年曾參加馮玉祥、吉鴻昌領導的察綏抗日同盟軍。後來到北平上大學。1933年在大學裏秘密加入中共，成為受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直接單線領導的中共特別黨員。他根據中共的指派，未待大學畢業，回到廣西老家，利用家族關係打入桂系的高層。他的才華得到李宗仁、白崇禧的賞識。抗戰開始時，他先後擔任過國軍副總參謀長白崇禧的中校機要秘書、國民政府大本營國防會議秘書、總參謀部軍訓部西北戰事巡迴教育班主任秘書等要職，在國民政府和國軍的心臟竊取了大量機要諜報，多次受到中共最高當局的表彰。

王瑩（1913-1974）安徽蕪湖人，原名俞志華，少年時代遭繼母虐待，被賣到富商家當童養媳，備受折磨。後偶然得到在南京當教師的美國女作家賽珍珠的幫助脫離苦海，入讀長沙湘雅醫學院護校。在學習期間已與中共地下黨有接觸。1928年來到上海，先後在中國公學和復旦大學文學院讀書。1930年秘密加入中共，成為中共特別黨員。二年後加入左聯話劇運動和明星影片公司，主演許多部電影。1936年和江青（蘭蘋）爭演《賽金花》的主角時種下禍根，導致殺身之禍。

抗戰爆發後，王瑩參加上海救亡演劇隊的第二隊在全國各地巡迴演出。在廣西桂林她結識了時任白崇禧上將機要秘書的謝和庚，倆人一見傾心。王瑩離開了她的同居情人金山，投入謝和庚的懷抱。倆人感情甚篤，相伴至終。由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張志才和陳桂英合著的《永遠在初戀》一書，描寫了他們悲歡離合的感情生活。

1942年7月，他們倆人奉中共諜報部門的指派，利用國民政府公派留學生的機會，雙雙赴美深造。王瑩的公開身份是“東西文化協會”理事，曾去白宮演出《元配》和《放下你的鞭子》。演出後，羅斯福總統的兒子親自提箱送她出白宮。

留美期間，他們按照中共的指示，搜集情報和做統戰工作。謝和庚以國民政府駐芝加哥總領事館見習外交官的身份開展中共地下工作，同時在美國國際事務研究所學習，1946年畢業。王瑩則組織中國文藝工作者去美國演出，幫助美國作家斯沫特萊創作《朱德傳》。兩人經中共有關組織批准於1950年正式結婚。

上世紀1950年代，美國麥卡錫主義盛行。他們的中共諜報工作人員身份備受懷疑，被美國移民局逮捕，關押了二個多月。1954年以危害美國國家安全罪驅逐他們出境。中共外交部通過第三國，用韓戰中的美國戰俘交換。同時得到獲得諾貝爾獎金的女作家賽珍珠等人的聲援，他們才得以出獄回國。他們於1955年底回到北京，受到董必武、廖承志等中共領導人的接見，表彰了他們的功績。謝和庚擔任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識》雜誌編輯部高級編輯和歐美組組長；王瑩在北京電影製片廠擔任編劇。

他們回國不久，便開展了助黨整風的鳴放運動。謝和庚在人民出版社貼出大字報反對官僚主義，要求保護古跡牌樓。他提意見說：“1925年段琪瑞政府時代，北海就開放了；1929年，中南海也開放了。現在，中南海應該對人民開放，中共領導佔據著這處古跡是不對的。”中南海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盤據之地，豈容謝和庚說三道四。謝和庚撫了龍體上的逆鱗。這是典型的右派言論。

中共人民出版社黨委請示周恩來，是否劃他右派。周恩來說叫他認個錯就算了。但是毛澤東聽聞後說不行，謝和庚有這種右派言論就是右派無疑。謝和庚打成了右派，開除黨籍（秘密）開除公職。送去北大荒勞動教養。一年多以後，董必武和周恩來相繼出面干涉，才把他調回北京。回京後，他們隱居北京香山狼見溝，王瑩專心創作，完成二部自傳體小說《寶姑》和《兩種美國人》。

文革風暴襲來，他們又一次陷入腥風血雨。1967年初紅衛兵和造反派輪番衝擊，抄家拷問，

夫妻倆人雙雙被捕入獄。關押在秦城監獄。江青沒有忘記當年與她爭演《賽金花》主角的王瑩，她被打為特務、叛徒，1930年代黑線人物。嚴刑拷打，致使下體癱瘓，無法說話。1974年3月死於獄中，遺體被匆匆火化，死亡書上沒有名字，只有囚號“六七四二”。

謝和庚也坐了八年的牢獄。1975年始獲釋放。出獄時身患重病，才知妻子已折磨致死。他悲痛欲絕，精神失常。經長期治療才見好轉。安排在外交部謀得一份閒職，離休後，隱居於廣西桂林老家。

王瑩和謝和庚這一對為中共出生入死的特別黨員，不論立下多大的戰功，建立了多大的功勳，一旦觸犯毛澤東和江青的龍顏，照樣把他們當作敵人往死裏整，毫不手軟心慈。

### 楊延修 中共戰略特工

楊延修（1910-2015）原名楊連生、楊再之，江蘇泰州人。出身貧苦，七歲就從泰州到上海投親。當過小皮匠，英國洋行的茶房。完全靠刻苦自修和拼搏，受聘于法商保太保險公司，擔任高級職員。

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淞滬抗戰，使青年楊延修異常悲憤，懷著誓死不當亡國奴的決心，第一批報名參加了戰地救護隊，奔赴中日激戰的前線。經過抗日戰火的洗禮，他積極投身於中共地下黨領導的“上海洋行華員聯誼會”、“華聯同樂會”等進步團體的抗日救亡運動。1938年4月，楊延修成為中共黨員。上海變成孤島後，環境愈益險惡。中共地下黨領導指示楊延修迅速離滬去昆明，擔任廣大華行這個中共第三條秘密戰線的絕密機構內的昆明分行經理，從事秘密戰線的工作。



中共戰略特工楊延修

皖南事變後，周恩來深感中共在國統區的八路軍、新四軍辦事處和新華社等一線組織以及中共地下黨等二線組織都靠不住，有被破壞的可能，便立即建立更為隱蔽的第三條戰線，以“廣大華行”作為載體，盧緒章和楊延修為負責人。

當時昆明是西南重鎮，交通樞紐，連接滇越、滇緬兩條國際貿易通道和戰時補給線。也是東南各省、市去陪都重慶的必經之路，戰略地位突出。因此大批工廠企業、機關學校和文化團體都內遷到這裏。來自四面八方的職業青年彙聚春城，大街小巷到處湧動著抗日的熱情和蓬勃的朝氣。雲南省主席龍雲為了保住地盤，鞏固自己的統治，對群眾的抗日民主活動比較寬容。

楊延修利用這一機會，籌建了“昆明業餘聯誼會”。把愛國抗日、文體活動、福利服務結合起來，吸引了社會各階層的人士。他不但團結了許多職業青年，又結交了當地黨、政、軍頭面人物和經貿界領袖。像昆明市市長裴存藩、市府秘書長劉志寰、省商會會長嚴變成、中國銀行昆明分行行長王振芳、航空檢查所所長嚴實、中國航空公司經理劉安平等都熱心參與。幾次大的活動還請出龍雲親筆題詞，為公司在雲南站穩腳跟，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憑著多年的經驗和對商機的敏銳感覺，楊延修一到昆明就抓住交通中轉站這個優越條件，

大力開展貨物運輸業務，立刻獲得了豐厚的利潤。為了就近辦公，還把公司搬到離火車站不遠的中和街，就在龍雲公館的對面。同時，看准大批內遷的醫學院、醫院、診所對西藥、醫療器械需求旺盛，在雲南各地迅速佔領市場。他還想方設法廣泛吸收社會遊資，建立了中和大藥房。

按照周恩來的指示，楊延修遠離了過去的左派朋友，除了為中共提供經費外，完全以一個殷實商人的面目出現，以利長期潛伏。恰巧他過去的熟人，救國會領袖之一李公樸也來到昆明，自己開一家北門書店，離楊延修的辦公處不遠。他經常來找楊延修聊天敘舊，還熱情地邀請昔日好友去家裏吃飯。

楊延修生怕引起特工的注意，壞了中共的大事，可又不好斷然拒絕。苦惱之餘，他令門房見李公樸到來便託辭不在。即使出來見客，往往是顧左右而言其他，非常冷淡。李公樸屢屢碰壁，不知何故，從驚詫、疑惑轉為憤怒，最後拂袖而去，見到故友便痛斥楊延修：“人一闊臉就變，真是滿身銅臭的商人！”民盟領導人沈鈞儒等也對楊延修的行為鄙夷不屑，紛紛憤然離去。

他長期在昆明隱瞞真實身份，孤軍作戰。與國民政府黨、政、軍、警的周旋中遊刃有餘的楊延修，內心深感苦悶，卻不能向任何人傾訴。1943年秋，他因商務去重慶。突然接到中共地下黨的通知，讓他立刻去彙報工作。他仔細化妝，換好衣服，對鏡自檢，儼然是一位學富五車的老教授。他在天黑後去指定的地點等車，半夜時分，終於回到紅岩村。

周恩來還在開會，董必武、鄧穎超接見了楊延修，給了他充分的肯定與鼓勵。不久，周恩來開完會從臥室走出，親切地招呼楊延修進辦公室單獨談話。周恩來說：“你們的工作既特殊又重要，在白區，你們一個人的作用就能頂上一個師。要當好這個‘資本家’，不要怕人家說東說西，黨需要你們堅守崗位，完成任務。為黨要能忍受委屈。”楊延修聽了心中豁然開朗。後來他再次去紅岩村時，周恩來還特別指示他要做好龍雲的工作。

1945年8月，日本投降，長年在大西南的國民政府準備遷回南京，上海又將成為全國財政金融的中心。楊延修肩負著為總公司打前站的重任，想方設法擠進第一批回上海的隊伍。他已有國民革命軍委會化學防毒處上校參謀頭銜，又找到新任上海市衛生局局長俞松筠，搖身一變，成了衛生局的接收專員，名正言順地登上了首航上海的接管包艙。

1946年春節，楊延修隨身攜帶兩箱金磚，約九百餘兩乘飛機抵滬。一轉手在金市賣了個好價錢，剩餘的九十兩黃金全部存入了總經理辦公室。沒想到當晚小偷用迷魂香麻倒了值班人員，從沿街視窗爬入室內，撬開保險櫃，竊走了金磚外加兩萬多美元現鈔。後經調查確定，這是上海黑社會所為，雖然追回了部分資金，卻也鬧得滿城風雨。不過新聞報導反而起了宣傳廣大華行的作用。

接受了這次教訓，楊延修等人開始注意結交上海幫會人物。後來在他任經理的“上海廣大藥房”開張典禮時，青幫頭子黃金榮喜孜孜地早早前來道賀。當時店內貴賓如雲，熱鬧非凡。一些乘機來敲詐勒索的地痞、流氓，見祖師爺坐鎮客廳，談笑風生，都嚇得悄悄溜走了。一般黑社會人物也不敢再打他的主意。

為了進一步發展，找到穩固的政治靠山，總公司擬定了與陳果夫合作辦藥廠的計劃，得到周恩來的批准。陳果夫一直對開發中醫中藥很感興趣，還建立了專門的特效藥研究所。所以當廣大華行與之接洽在上海合辦中心制藥廠，並擔任董事長時，他欣然應允。

1947年8月10日，陳果夫帶著醫護人員和隨從，親自到上海為中心藥廠奠基剪綵，成為哄動一時的新聞。從此，中共三線絕密機關就有了陳果夫這把政治保護傘。一天深夜，楊延修得到消息說警察局要監視、偵察廣大華行。他立即向中共地下組織彙報，迅速通過國民政府和中統系統的上層關係，弄清了密令確系南京內政部發出，懷疑廣大華行私通共匪，要各地嚴查。於是，楊延修等人首先宴請陳果夫的親信，讓這些人到處為自己正名。後來中共內線查到，陳果夫在密令上批示《撤銷此案》。楊延修巧妙地逃過了中統、軍統、經濟部等一道道難關。

在長期尖銳複雜的地下鬥爭環境中，楊延修很好地完成了中共交辦的各項特殊任務，受到中共的嘉勉。由於地下黨內部出了叛徒，周恩來指示在第三條秘密戰線工作的人員立即撤退到香港。楊延修接到命令後迅速安排好善後事宜，也轉移到香港。

1949年初，隨著形勢的變化，中共指示楊延修等北上學習。楊延修把在公司的紅利、股份，包括他做民孚、民安等公司董事時的投資、存款約十萬美金全部都交給了中共。來到中共佔領區後不久，即受命隨同中共大軍一起南下接管上海。

1949年5月26日清晨，楊延修冒著濛濛細雨從丹陽坐火車來到上海郊區的南翔，換乘吉普車進入市區內。傍晚，他們住進了中共地下黨聯絡點金門飯店。那時一切比較混亂，許多外地來的南下接管人員沒有吃飯。楊延修讓附近廣大藥房的職工去買早點。這些夥計在兵荒馬亂中見到自己的老闆非常高興，一個職員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告訴他：“聽說共產黨要整治有錢人，儂可要當心哦！”楊延修笑笑，又取出一些錢分給藥店的職工，這些飽受通貨膨脹之苦的店員含著熱淚感恩戴德地走了。後來，當他們發現楊經理竟是共產黨的大官時，不禁一個個目瞪口呆，半晌才恍然大悟。

中共上海市委迅速成立了市工商局，許滌新任局長，楊延修、蔡北華任副局長。上海市委派楊延修召集工商界名人胡厥文、劉鴻生、榮毅仁、劉靖基等開會，商討整頓私營工商業的辦法。當身穿軍裝的楊延修以上海市工商局副局長身份出場主持會議時，好些在抗戰前星期二餐會上就同他稱兄道弟的商人，見他從西服革履的大老闆，突然變成穿軍裝的共產黨幹部，紛紛又驚又喜地圍攏來說：“老楊，想不到儂也是共產黨！”楊延修笑答：“你們要是知道了，還敢跟我做生意嗎？”說得大家哄堂大笑。

楊延修由於在穩定市場、保障供給、發展國營企業、改造私人工商業和統戰工作等方面表現出色，被選為上海市第一、二屆政協常委，擔任上海市第二商業局局長兼黨組書記。

然而楊延修雖然有高超的地下鬥爭藝術，卻絲毫沒有黨內磨擦的內鬥經驗。在反右運動中，眼看許多民主人士和工商界同仁，被扣上莫須有的右派帽子，遭到了殘酷打擊。他實在不能理解，憤而直言，為他們討公道。他立即以同情和包庇右派罪，打成右派，開除黨籍，撤職查辦，他過去為中共立下的汗馬功勞和巨大貢獻被一筆勾銷，反而獲得幾頂“混進黨內的階級

異己分子”、“叛徒”、“特務”的帽子。

1979年1月，楊延修恢復了黨籍，被任命為上海市工商聯副主任兼黨組書記，市統戰部黨組成員，市政協副秘書長。1988年楊延修離休後，繼續在上海市工商界愛國建設公司任職。1996年，以八十五歲高齡出任董事長。目前他又以九十八歲高齡在上海主講《第三條隱蔽戰線的往事》。

### 嚴希純 接管和創辦中國科學院的人

嚴希純（1897-1965）貴州印江縣人。原名嚴儔，又名嚴紹彭。清朝書法家嚴寅亮之子。少時就讀于成都第一小學。辛亥革命後，隨父到了貴陽。1914年考取貴州省立模範中學，1922年9月，進入南京河海工科大學水利工程系，結識共產黨人惲代英、蕭楚女，開始從事革命活動。不久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擔任中共河南支部委員。1925年成為“上海慘案後援會”骨幹，1926年4月獲河海工程大學學士學位，受中共派遣赴廣州參加國民革命。

北伐戰爭中先後在上海、南京等地以上海中法大學醫學科講師、上海科學社編輯、上海工務局技佐、山西民族大學教授、桂林科學印刷廠秘書、昆明煤鐵公司工程師等公職從事工人運動。1935年中央紅軍長征期間，擔任中央軍委的交通員，並使紅二、六軍團順利通過貴州畢節地區。此後在上海堅持中共的地下鬥爭，在中央特科（紅隊）工作過。曾被國民政府當局逮捕，後獲釋。1937年抗戰爆發，進入上海市公安局防護團任教官。

1940年開始在周恩來和中共南方局的領導下，以重慶工業合作協會專員、工程師名義，從事黨的經濟工作，進行抗日活動。1945年抗戰勝利後轉赴香港，先後擔任大千印刷廠經理、達德學院教授、文匯報科學生活週刊編輯等職務。

中共執政後，出席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參加接管和創立中國科學院，歷任中科院秘書處長、辦公廳主任，並籌建中國科學出版社，任副社長。同時他是政務院參事室參事，科學技術委員會計量局副局長。1952年出席亞洲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1953年受中央派遣赴蘇聯學習。回國後被選為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常委，還先後擔任全國僑務委員會主任和全國科協、《光明日報》的名譽職務。他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於1948年加入中國致公黨，成為致公黨中央常委兼秘書長。

在中共中央召開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非黨派民主人士1957年5月16日的座談會上，中國致公黨秘書長嚴希純說：“合作共事關係搞得好不好，黨與非黨二方面都有責任。今天本著‘春秋責備賢者’的精神，黨員應該負主要責任。許多黨員不瞭解解放前在白區工作的艱苦，黨和民主人士一同鬥爭的血肉關係，僅僅把今天對民主人士工作安排當作照顧，當作點綴。”談到機關中如何體現黨的領導問題，他說，黨的領導並不等於不管黨員稱職不稱職，把他放在什麼崗位上，就體現了黨的領導。嚴希純舉出了這樣一件事例：一個圖書館內有一個圖書館專家，做了十幾年工作，一個文化水準不高的黨員作他的科長。

嚴希純說，有的在科學機關作領導工作的黨員，自己不懂科學，又不虛心，不懂還要裝懂。

有些黨員還把領導科學技術機關看成帶軍隊一樣，把科學家、教授、工程師一律當作下級，不尊重他們的意見，也不給以應有的禮貌。他還說，科學技術工作在研究過程中是允許失敗的，但現在要追查科技人員的責任，甚至懷疑有政治問題，加以逮捕。這樣專家們如何敢於負責呢？

嚴希純還談到當時推廣先進經驗中的一些問題，例如混凝土用竹筋代替鋼筋。他說，聽說有些地方已蓋了四層樓的房子，我很擔心，幸而最近國務院否定了這種所謂的先進經驗。又例如北京築了很多品質不好的馬路，光冒漿。據說原來認為用少量的錢造很多的路是先進經驗，其實這是常識都通不過的事，根本不應認為是先進經驗。

最後談到人事工作，他說，黨外領導人對人事工作是無權過問的。人事部門往往只重政治，選拔一個一個考試成績最壞的學生出國留學，就因為他是黨員。這是很大的浪費。有一個黨外幹部出國路經蘇聯，回來說紅場不大，竟叫他當眾檢討。嚴希純還希望早日解決那些在國民政府時期因失掉革命的關係，自己去創造條件進行革命，而由於肅反、審幹中的偏差而抬不起頭的共產黨員和民主人士的問題。

他在中共中央統戰部舉行的座談會上，以國家計量局副局長的身份鳴放道：“領導上派一個文化程度不高的科長去領導一群專家，這樣做，是不能使非黨人士心服的。”這類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他還鳴放了許多許多。

嚴希純這個1920年代就加入中共的早期資深黨員，中共派他打入以海外華僑為對象的中國致公黨的本意是要他代表中共統戰致公黨。不料，他自己卻被致公黨主席陳其尤、中央常委黃鼎臣的反黨右派集團統戰了過去，成為集團的重要成員，著實讓中共惱羞成怒。奉中共之命打入民主黨派內部的中共特別黨員在反右運動中幾乎都立下了汗馬功勞，唯獨謝雪紅和嚴希純兩人例外，成為中共的叛徒。

嚴希純被中共清除出黨，但保留了中國致公黨的黨籍，降為中國致公黨的普通黨員。1965年在北京病逝，免除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難。

### 胡顯中 為胡風辯護的地下黨員

胡顯中（1932-）江西省南昌人。父親胡仲乘，早年畢業於警官學校，曾經在江西省好幾個縣擔任過警察局長。後在國軍保安第五團擔任上尉軍需官。因不滿軍隊裏的裙帶腐敗關係，退職賦閒在家。靠變賣田產過活。

在南昌私立心遠中學讀書時，胡顯中於1949年中共進城前夕，與幾位中學生一起參加了中共地下黨，當時年齡不滿十八歲。胡顯中擔任中共地下黨小組長，歸中共南昌地下市委城工部領導。當時的地下黨都是單線聯繫的。聯繫他們黨小組的地下黨負責人的上級出了事，中間脫節，中斷了聯繫。中共掌權後，地下黨由地下轉上地面，搖身變為執政黨。胡顯中等幾位青年學生們黨籍無人確認，又做回普通老百姓，反而淪為地下黨。



胡顯中和金東郁（左，朝鮮族），吉林大學經濟系學生

幾經坎坷周折，歷經磨難，當過胡風骨幹分子、右派分子，勞教二十二年後，他於1984年又被承認為中共地下黨員。中共及其成員的歷史像廚師案板上的麵團，可以隨意由當政者搓揉成各種模樣。1984年胡耀邦執政時期，中共中央決定全面清理地下黨歷史遺留問題。當年9月份中共中央組織部在昆明召開了十六省、市處理地下黨歷史遺留問題的座談會，中共江西省委成立了處理地下黨歷史遺留問題辦公室。工作了二十多個月，恢復了江西省地下黨成員六百五十二人的黨籍。胡顯中當了三十七年的“地下黨”，終於重見天日。

比之江西省另外一百二十七位地下黨同志，他應該算是幸運的。這一百二十七位隸屬於中共閩浙贛邊區城工部的地下黨員，也是由於領導城工部的中共領導人出了差錯，中共都把他們當作叛徒給槍殺了。中共黨內的內鬥和自殘跟中共與生俱來，因為中共崇尚你死我活殘酷的階級鬥爭，對自己的同志亦毫不手軟。

南昌易幟後，胡顯中以普通學生的身份參加了政府工作。由於他父親長期失業在家，生活十分困難。他曾打算利用工作之便，為他父親開一張介紹工作的證明信。天真幼稚的他事後又後悔了，沒有敢做這件事。那個年代盛行向黨交心，哪怕是一閃而過的私心雜念也要向黨坦白交代。胡顯中向黨組織坦白交代了想做又不敢做的事。“坦白從嚴，抗拒從寬”，胡顯中反而被開除公職。

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他考取了東北人民大學經濟系（後改名吉林大學）。1955年暑期，他在學校圖書館偶然看到《長江文藝》上一篇文章《聲討江西省文聯的胡風分子--劉振輝》，不免大吃一驚。於是又幹了一件愚不可及的蠢事，在反胡風運動中向黨表忠心。原來那個劉振輝是他心遠中學同學，又是他領導的地下黨小組成員。他又向黨“交心”，交代了江西省文聯的胡風分子是他心遠中學同學。領導正為揪不到胡風分子而發愁，得知他的交代如獲至寶，立即派人赴江西省文聯外調。經過一番向劉振輝的逼供信，劉振輝不得不坦白交代：“我拿了胡顯中的介紹信去見胡風。”

如此這般，從未與胡風謀面的胡顯中便成為胡風集團的骨幹分子了。不久公安局對他突擊搜查，搜查信件和照片。他成為肅反運動的重點對象。審訊幾次，毫無進展，送進學校內部半監獄性質的集訓班反省，大小便都要報告。翻來覆去審查半年，實在查不到他是胡風集團骨幹分子的絲毫證據。但是根據他在班級中曾經說過“胡風是左翼作家，魯迅的得意弟子”等反動言論以及自己坦白交代的私改檔案等錯誤，給予“受胡風思想影響，記大過處分”。這就叫作“事出有因，查無實據”。

他的心靈受到嚴重創傷，1957年的鳴放中，他寫出了一篇名叫《胡風等人是反革命嗎？》的文章，落入了陽謀圈套。他在文章中寫道：“根據已經公佈的材料，胡風等人不是反革命集團，他們是這樣一個文學上的流派：在藝術觀點上有錯誤成份，在文學活動中有日益嚴重的宗派活動。但是他們的文藝思想並不完全反動，特別是他們活動的性質並不是反革命性質。”

他被劃為替胡風辯護的右派分子。不僅如此，他在心遠中學的同學，同為地下黨員的羅時峰、熊國模、鐘純民，他們的入黨介紹人張自旗，對他們進行共產主義啟蒙教育的語文老師廖



伯坦都被打成右派分子。

胡顯中一不做二不休，他與朝鮮族同學金東郁合作寫出《縱論國是兼評鳴放》的長文。進一步闡述他的思想觀點：“黨只注意欣賞對自己的歌頌，而不注意聽取對自己的批評（甚至不願聽），因而使那些純潔的人也染上了虛偽的習氣。”他又寫出《再論胡風問題》、《致打手》等多份大字報，引來無窮無盡的批鬥。

胡顯中認為自己在吉林大學不能得到公正對待，決心一走了之。離開之前，貼出《最後一言》的大字報。有位物理系女學生鄧榮玲，在他的大學報上寫上“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把他比作謀刺秦始皇的壯士荊軻。這位女同學當然也被打成右派。

他一口氣跑到北京的英國代辦處，英國人給他申請簽證表，英國各地風光圖片和雜誌，要求他先去公安局申請護照。政治避難不成被揪回學校，戴上三頂帽子：極右分子、反革命分子、叛國投敵分子。**1957年11月**被逮捕，從此入獄二十三年。他逃跑二次未遂，關入重刑室戴上腳鐐手銬，判處無期徒刑。他不服上訴，又改判十年徒刑。到**1980年**改正，他是吉林大學最後一名改正的右派。

改正和恢復工作後，胡顯中勤於筆耕，出版多部著作，發表大量政論文章。他把自己的一生描述在《陰謀下的人生》中。他在《滿江紅》中表達他晚年的決心：

老驥又萌千里志，雄心何懼兩鬢雪。

### 譚顯殷 團派右派何其多

譚顯殷（**1928年—2012年**）**1947年**，譚顯殷在重慶南開中學讀書。當時，擺在他面前有三條路：一、科學救國；二、追隨國民黨；三、跟共產黨走。他選擇了最後一條路，這在當時是最艱辛的一條路。同那個時代的許多熱血青年一樣，他非常愛國，一心渴盼祖國富強。他讀到《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讀到新華日報的文章，共產黨呼喊的要建立一個獨立、自由、繁榮、富強的新中國很讓他激動，他覺得他應當為這一個目標奮鬥。

十年後，**1957年**，譚顯殷被共產黨的“陽謀”陷害，中箭落馬，下放重慶長壽湖農場勞動改造。

譚顯殷出生於四川萬縣，於**1941年**來到重慶，考入了重慶著名的南開中學。當時，南開是一所非常優秀的學校，是一所培養有獨立思想和自由意志的地方。



**1947年**在南開讀高中時，他參加了地下黨的外圍組織，專門從事學生運動工作，並擔任地下社支部書記。他很活躍，演進步劇，發挺進報，組織遊行示威，反饑餓，反獨裁，反內戰。**1948年**下半年，他考入了一所大學——政陽法學院。

**1957年**反右運動時，他擔任重慶市團市委宣傳部長。

他認為，反右整人，扼殺民主，與當年共產黨大聲疾呼的東西背道而馳，與他追求的東西背道而馳，這本能地引起他強烈反

感！

年輕時的譚顯股夫婦

譚顯股對南岸區委宣傳科長陳適情談了他對以言定罪的反感。陳又對其他人談了譚顯股的點。一個姓張的人把陳的話整理成材料告密，陳適情馬上被打成右派，天天挨鬥。陳經受不住，突然失蹤了。人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他獨自站在區委下面長江邊的一塊礁石上，估計他投了河。

那份告密材料也轉到了團市委，成了譚顯股的罪狀之一：同情右派，否定反右鬥爭，與黨離心離德。他被劃為反黨分子，下放長壽湖勞動改造。

他屬於清醒得很早的人，反右一開始，他就覺得不對勁，以言定罪整人，他更反感，到他本人當了反黨分子，他便徹底清醒了——這個黨與民主自由為敵。

他在長壽湖，一開始就沒有心理負擔，他心裏明白得很，反右肯定錯了，共產黨肯定錯了！他不敢公開反抗，便把當年地下鬥爭的本領施展出來同他們鬥。他告訴團市委那幫難兄難弟，一定要抱成一團，決不要互相揭發，互相鬥。那時他已經看清了共產黨的整人術：老是挑動一些人整另一些人。

大饑荒那幾年，他對難兄難弟說：私人的東西咱們絕對不要動，公家的東西，能吃則吃，能偷則偷，湖裏的魚，不能吃？國家財產？屁！咱們辛辛苦苦的勞動成果，大多送到那些官員人餐桌上，勞動者反而不得食？

1962年下半年，譚顯股調回重慶，在南岸海棠溪一個油毛氈棚子裏賣菜。1967年2月22日，一幫人突然闖進家來，叫他馬上收拾東西到長壽湖。

憑多年的經驗，他知道來者不善。一個月前，小說《紅岩》的作者羅廣斌也是突然被帶走，沒幾天就傳來消息：羅廣斌畏罪跳樓自殺。他去參加了羅廣斌的葬禮，他妻子胡蜀欽親口告訴他，她絕不相信羅廣斌是自殺。

他預感到他很可能要步羅廣斌的後塵，文革來勢兇猛，打人、殺人、死人的事天天發生。

但是，他很鎮靜，他悄悄對妻子交待了三點：一、如果他死了，不要相信他是“畏罪自殺”，他絕不自殺。二、三個娃兒要撫養成人。三、他母親要養老送終。

他強調第一點，就是為了避免像羅廣斌那樣死了說不清楚。

與他同時被抓的還有一個叫陳孟汀的右派，他當年是延安抗大的教員，一個老革命，很有理論水準，也很頑強。到獅子灘時，他們趁解押人員不注意，悄悄約定，如果他們兩人中有一個死了，另一個要負責把情況告訴對方家庭。他倆還交換了一張紙條，上面寫了各自的家庭地址，還特別注明：我不是畏罪自殺。

到同心島時，遇上一群右派正在打撈屍體——一個叫李思強的人在前幾天的批鬥會後跳了湖。譚顯股認識李思強，1956年他從團市委宣傳部長的位置上調到市委宣傳部，他接的李思強的班，李思強是他的前任。看見李思強腫脹的屍體，譚顯股心裏撲咚一跳：這次來要步他的後塵？

第一次審問下來他就明白為什麼抓他了——為了羅廣斌。羅廣斌寫了《紅岩》，算個名

人，整死了有點不好說，於是想整一個“反黨集團”出來，羅廣斌屬於這個反黨集團。

1979年，大形勢讓譚顯殷“重新做了人”。市委組織部的人找他談話，問他這些年怎麼過來的。他說：“四年魚販子，一年流浪漢，十六年菜販子。”

改正後，他進入市委宣傳部，後擔任了副部長、市高等教育辦公室主任，又幹了十年。

1980年代初，平反冤假錯案，改革開放，他很振奮，以為共產黨有希望了。1980年代後期，他又覺得不對勁——以權謀私、官倒撈錢愈演愈烈，但真正給他當頭一棒，讓他痛醒的是六四的槍聲！

他年輕時就是專搞學生運動的，追求民主自由，反對獨裁專制是學生運動的主旋律，也是他青年時代生命意義所在，1989年他老了，但當年的精神和追求仍在。他說，他年輕時加入的這場革命是歷史的一個大錯誤，一個大悲劇。

### 賀惠君 四川學運領導者

賀惠君（1929-1997），女，出生於四川省成都市。在1957年劃為右派分子時，是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四川省委副書記、團中央委員，行政十五級。

1943年賀惠君十六歲即參加中共地下學生運動。她是作家賀星寒的小姑，先後在成都市少城小學、松如女子小學、蜀華中學、建國中學及華西大學先修班讀書。1947年考入成華大學經濟系學習，同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任中共成都特委中學片區委書記。成都臨近易手時，與丈夫詹大風同為中共成都市委、區委負責人，他們都是成都學潮的策劃與指揮者。1948年，脫產從事中共地下工作，任中共成都市中學區委副書記，直至全大陸變色。



賀惠君全家

1949年，因為他們都是中共地下黨出身，開始受排擠。毛澤東懷疑以知識份子為主的地下黨成份不純。因此自一九五零至1953年，賀惠君降任青年團成都市委學校工作部副部長、部長等職。1953至1956年，任青年團四川省委學校工作部部長。

1955年在肅反運動中受審查，被懷疑為胡風分子。後來查無實據，僅受胡風思想影響而已。1956年，在共青團省代會上當選為團省委副書記。

1958年賀惠君劃為右派分子。當時批判她的主要反黨言行是攻擊肅反，到處散佈污蔑肅反的反動言論。反對中共四川省委擴大會議的精神，反對階級分析法，散佈修正主義的反動理論。她說：“大規模的階級鬥爭既然已經結束，就意味著國家機器作為鎮壓敵人的作用就要逐漸減少了。”；“南斯拉夫大力精減機構，運用工人委員會去代替國家機器，這樣就使國家權力逐漸削弱、國家逐漸消滅。這的確是一個理論性問題，南斯拉夫是有他的理論根據的。”又說：

“中央正在考慮取消憲法中關於黨的領導的明文規定，黨將依靠自己的黨員在群眾中取得信任，通過他們來實現黨的主張。”

批評者說，在鳴放期間她把矛頭指向四川省委，向黨進攻。大量散播流言蜚語，咒罵各級領導同志。與賀天熙、蘇良沛等結成反黨集團，有組織、有綱領、有計劃地向黨進攻。

中共四川省委關於右派分子賀惠君材料的批示中稱：“賀惠君已墮落成為黨內的極右分子，但賀惠君是最早交代他們的反黨集團和訂立攻守同盟的人，因此從寬處理，將賀惠君劃為一般右派分子，開除黨籍，撤銷原任職務，由行政十五級降為十八級，另行分配工作。降職到《四川青年報》做雜務工作。”

1979年改正後，歷任四川省旅遊局副局長，被選為省政協第四屆委員會委員。1984年任全國對外友協四川分會副會長、四川省外事辦副主任等閒職。1994年離職休養。1998年六十九歲時死於四川醫學院的醫療事故。

### 葉公琦 從右派到上海副市長

上海市在改革開放後的歷任市級黨政領導中，曾出現過四位右派分子出身的正部級領導幹部。他們是市長、市委書記朱鎔基；市委副書記兼宣傳部長陳沂；副市長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葉公琦，以及女副市長謝麗娟。

謝麗娟是在上海第二醫學院讀書時劃為右派的。1979年改正後加入了九三學社。中共選拔高級幹部都用套雞蛋方式選出各行各業代表性人物，又要考慮男女比例、各黨派比例、老中青、民族屬性等。當時上海時要選拔一位非黨女性副市長，分管科技文教衛生工作。謝麗娟時任盧灣區中心醫院醫生，恰好套進雞蛋框，平步青雲登上了市級領導崗位。

而且在1985年左右，中共黨內根據胡耀邦的意見有個內部指示，要啟用一批原來的右派分子到各級領導崗位。謝麗娟各方面都符合這項規定。榮幸地登上了世界級大城市副市長寶座。

葉公琦（1929-），江蘇省吳縣人，上海大夏大學肄業。長期從事上海地下學生運動。於194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與領導地下學生運動，曾任中共滬新中學黨支部委員，中共大夏大學黨總支委員，中共上海地下黨交通員等。

1949年中共掌權後，他從地下走上地面，出任中共上海嵩山區學委委員、代理書記、區委組織員、秘書、中共嵩山區委組織部副部長、中共邑廟區和嵩山區工業部部長等職。

1958年，個性並不張揚、性格內向的葉公琦劃為右派分子，頂了個黨內右派的名額，完成了該區黨內右派的指標。他的劃右，與其說他有什麼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還不如說他有地下黨長期從事地下學生運動的背景。戴上右派帽子後，開除黨籍，下放勞動。摘帽後出任上海圓珠筆廠技術科副科長、試驗室主任、工程師。

1979年改正後，恢復了黨籍和行政級別，先後任上海電影照相工業公司負責人和市輕工業局副局長。1983年出任上海市副市長。1988年沒有突出政績，卻也沒犯什麼錯誤的葉公琦副市長任期滿後，出任市第九屆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黨組書記。1992年當選為第十屆人大常委會

主任、黨組書記。是中共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代表，第七屆、第八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共上海市第一次、第五次、第六次代表大會代表，第四屆、第五屆、第六屆中共上海市委委員，第八屆、第九屆、第十屆上海市人大代表。

從行政職務上退下，然後在人大、政協瀟灑地過渡一下，提升一級，任個閒職。離任後風風光光地退出官場，待遇不變，安享晚年。這便是中共官場沒有犯貪污腐敗的經濟錯誤和喪失立場的政治錯誤的“官場潛規則”，儘管你平平庸庸，無所作為也罷。

### 陳緒宗 為妻子鳴冤叫屈的部長

胡耀邦當共青團中央總書記時的團中央機關報《中國青年報》，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揪出了不少右派分子，他們之中有社長陳緒宗，總編輯陳模。繼承的社長兼總編輯張黎群，副總編輯鐘沛璋、李庚等。

陳緒宗（1918-），男，1957年任《中國青年報》社社長兼總編輯，行政相當於副部級。1939年，在讀書時期加入中國共產黨，上海復旦大學文學系畢業。擔任過共青團華東工委宣傳部長。1940年，在延安《解放日報》社工作。曾因為無端被誣為失足分子而遭到殘酷搶救，跳山坡企圖自殺未死。以抗拒運動的罪名在檔案上記上一筆。

胡耀邦非常賞識陳緒宗的才華，把他從上海調來北京，先當《中國青年報》副總編，後提拔為社長兼總編輯。1956年肅反運動中，其妻金懷瑾曾寫匿名信批評報社內某一領導，對他進行了攻擊。揭發出來後竟指她是反革命行為。陳緒宗對此不滿，在整風鳴放時公開提出反對中共黨委所作的結論：“金懷瑾是混入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和現行反革命”。陳緒宗想方設法為金懷瑾辯護，試圖推翻中共黨委所作的金懷瑾是反革命分子的結論。又說：“共產黨拆散人家的夫妻，不近人情”等言論。衛道者批判他打著“老黨員”、“負責幹部”的招牌，在法庭上污蔑黨，攻擊黨。拒絕黨委勸阻，親自出庭為反革命分子金懷瑾辯護。他不以為然地說：“我認為一個共產黨員到法庭上去辯護是可以的，《憲法》和法律上都有這樣規定，而《憲法》是黨參與制定的。”他依靠了所謂的資產階級右派，為金懷瑾翻案。陳緒宗為了保護受怨曲的妻子金懷瑾，抱著不怕丟掉飯票、選票、黨票的決心，和黨鬥爭到底。他準備在高級人民法院維持原判時，上訴到最高人民法院，說這是“為了真理”。當右派分子向黨倡狂進攻時，他感到“是氣候了”，認為黃紹竑關於法制自治的言論很對，決定依靠所謂民主人士即資產階級右派向黨進攻。其實以上這些都是在批判陳緒宗時強加於他的污蔑不實之詞。

當時指責陳緒宗的違法和犯罪事實的，還有與自己妻子金懷瑾秘密來往和私通信件。把團中央高級幹部的情况告訴胡風，洩露和誇大我們工作中的某些缺點，散佈“土改中曾有以殺人多少作為發動群眾與否的標準”等誣蔑黨的話。同情胡風。

經過批鬥，為陳緒宗作出了：“完全蛻變為黨的叛徒，成為反革命分子在黨內的代言人”的結論。鑒於他尚願檢查，做出“開除黨籍，撤銷原有職務，行政留用察看”的處分。

著名作家韋君宜在《思痛錄》中回憶陳緒宗道：“劉賓雁在《本報內部消息》裏所描寫的

那位到了中年就喪失了革命鬥志的總編輯，就是陳緒宗。但是到頭來，陳緒宗竟然也免不了劃成右派。原因是他的妻子曾寫匿名信對報社內某一同志攻擊、不滿。她攻擊不對，最多只能說是個人行動不對，與反革命什麼相干？但是，卻定了她一個反革命分子。她的丈夫陳緒宗出來代為辯護，就此把他劃成了右派，而且牽連到當年在延安搶救的事情。我知道，陳緒宗在延安時，曾因為無端被搶救，跳山坡企圖自殺過。那事情不是早過去了嗎？”

### 牟宜之 有功豈必書之碑

在建設部經常聽到提起一個人，那就是劃為右派的原市政公用局長牟宜之，當時任部長的萬里誇他詩寫得好，是建設部第一大詩人；人們懷念他有才華、業務能力強；為他打抱不平，惋惜他的早亡。在城建局裏，他的老部下的辦公桌玻璃板下，壓著他的詩作和照片。李銳在2009年3月《炎黃春秋》上發表了《讀牟宜之詩》。

牟宜之（1909-1975）曾用名牟乃是，字去非。山東省日照市東港區奎山鄉牟家莊人。他是東林後人，世家子弟。父親從事教育工作，姨夫是國民黨元老丁惟汾。1925年在濟南讀中學時，參加過共青團。少年詩人在二十歲時寫的《少年行》，氣勢磅礴，雄渾豪放：



牟宜之 有功豈必書之碑

少年頗負倜儻名，略觸談鋒舉座驚。  
足涉八荒志在遠，胸填五嶽意難平。  
王侯將相了無意，農工學商各有情。  
踏平坎坷成坦途，大道如天任我行！

日照地區是山東老革命根據地，大革命時期他回家鄉參加日照暴動。九一八事變後，回到家鄉，計劃再次暴動，未果。為躲避追捕，東渡日本，進大學讀工科。在東京與房東女兒產生一段戀情。在《客居東京》一詩中寫道：

東瀛居處亦清寥，水竹縈回遠市囂。  
純真少女勤照料，落難英雄暫逍遙。  
柔情莫把讎仇忘，清酒且將塊壘澆。  
木屐寬衣誰識我，雨中緩過櫻花橋。

1935年秋回國。抗戰爆發前，利用姨夫的關係，回到山東組織抗日武裝。

1938年初，他也是依靠姨夫的關係，獲國民政府委任為樂陵縣縣長。與此同時，他秘密參加中共，成為中共特別黨員。中共特別黨員不同於地下黨，是單線聯繫、不交黨費、不過組織

生活、執行特別任務的黨員。至今中共隱諱不宜這一黨內之黨的特殊階層。

牟宜之利用國民政府樂陵縣長的特殊身份，舉全縣之力，接應八路軍進入山東，創建魯北抗日根據地，甚至將縣地方武裝力量改編為八路軍泰山大隊。周恩來評價牟宜之在樂陵縣的作為道：“倘若在抗戰伊始，中國有幾十個牟宜之這樣舉一縣之人、財、物力投身革命的縣長，就會極大地促進抗戰事業的發展，使抗戰全局有所改觀。”

1939年春天，他又是依靠姨夫關係，調往重慶，協助周恩來做國民黨上層統戰工作。1940年經延安、太行山返回山東，參加八路軍一一五師，先後擔任山東軍區參事室主任、軍區城工部副部長、中共山東分局參議長、沂蒙抗日根據地專員，曾策動偽軍六千多人反水。

國共內戰時期，他調往東北戰場，以策反國軍為主業。參與“三下江南、四保臨江”以及圍困長春戰役，策動國軍一八四師起義。

中共掌權後，牟宜之先任濟南市城建局長，後調往北京，任林業部經營司司長。這時他揭露過混入林業部領導班子的政治騙子李萬銘，作家老舍據此寫出劇本《西望長安》。1956年調入建設部，任市政公用局長，主管全國環境保護、供水排水、三廢（水、汽、廢）處理、路橋、廣場和城鄉公用設施建設。

在他短短的一年任職期間，敏銳地發現了國家建設宏觀指導上的許多問題。環境保護這個影響國計民生和子孫萬代的極端重要的項目，居然在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排不上號，委屈地掛靠在市政公用部門；他提出有計劃地控制人口，中國的環境資源和有限耕地承受不起急速膨脹的人口壓力；他指出統購統銷政策不利農村經濟發展，注意宏觀經濟和社會調查。

他在東北工作過，深知蘇軍所作所為。他指出要正視史達林錯誤，個人崇拜對黨和國家造成的惡果；反對蘇聯長期駐軍東歐；關於胡風，他主張正當的文藝批評，反對亂打棍子、亂扣帽子；他支援梁思成、陳占祥的北京城市規劃方案，反對套用莫斯科模式。

牟宜之一系列正確的觀點和主張自然背離毛澤東思想和中共的正統觀念。反右運動中，被扣上“破壞中蘇關係，提倡馬爾薩斯人口論，替右派詩人唱讚歌”等大帽子。

衛道者又搬出他在歷史上，曾利用姨夫丁惟汾的關係，打入敵陣，並按周恩來指示所做的國民黨上層統戰工作，康生狠毒地說：“就憑牟宜之在國民黨內的複雜關係，他也是個右派。”牟宜之的身份本來就是中共特別黨員，他的職責是混入敵陣，做中共的臥底、線人。如今反咬一口，倒打一耙。中共這種出爾反爾的一貫做法實在讓赤膽忠心的自家人寒心不已。

他被劃為右派分子、開除黨籍後，十分不服。幾經申辯，無濟於事，索性不再理會。有人勸他認罪，他說何罪之有。以後又人勸他寫份檢查以求摘帽，他說戴著帽子暖和，拒寫檢查。帶著這種心情，在1958年寫出《任憑風雨》：

如何戚戚帶愁顏，濁酒一杯聊自寬。  
世事紛紜多變幻，人情翻覆似波瀾。  
九秋楓葉經霜豔，臘月松枝帶雪寒。



心懷高潔誰與信，兩驟風疾若等閒。

文革開始，造反派奪權衝擊舊的體制，砸爛國家機器，建設部癱瘓，人員四分五散。牟宜之與他的右派妻子雙雙發配到東北齊齊哈爾郊區昂昂溪勞動改造。他們承受田間勞動、抄家遊街、牛棚監獄等各種常人難以承受的懲罰，忍饑受餓，飽受皮肉之苦。

林彪事件是中國封建專制社會上層權貴的勾心鬥角。千古立廢、宮廷內鬥在中國是司空見慣的，是歷史的往復迴圈，與桑梓百姓無關。牟宜之作詩《詠史》三首，表達他對中國封建獨裁體制的厭惡。其一曰：

寒林落葉歲雲秋，一世英雄寂寞收。  
蕭牆禍端何曾料，宮帷秘事誰與謀。  
權貴廝殺如豺虎，百姓躬耕似馬牛。  
千古立廢迴圈事，江河無語任東流。

又一首點出壞事做絕的有比林彪更甚者：

周公王莽事可參，自古由來信史難。  
世上美名爾享盡，人間壞事君作完。  
水落石出終有日，雲開霧散見真顏。  
天道無邪不容欺，評說還須待後年！

1975年鄧小平復出，他想起他在八路軍一二九師政委任上，牟宜之憑著與國民黨上層關係，搞來幾萬大洋解決全師冬衣，便在信件上批示讓他從北大荒返回山東老家安渡晚年。但山東方面拒不收留，致使他悲憤填膺，客死濟南。

《牟宜之詩》收錄詩人從二十歲的《少年行》到六十六歲逝世前的《論作詩》，跨越四十六年，共一百七十八首，劃為右派後一百五十首，絕大部分是在身處逆境時的佳作，可知作者的心志。臨終前一年所作《故友重逢》，那時中國還處於中世紀黑暗期。詩人卻已預測毛澤東的禍國殃民、倒行逆施為時不久矣：

身世浮沉似飄萍，歷經劫難又相逢。  
流落邊陲為南冠，邂逅京城訴衷情。  
安邦濟世思有道，禍國殃民罪無窮。  
冷眼旁觀桀紂事，宴客高樓暫態傾。



1985年《人民日報》紀念七一，牟宜之在山東的老戰友蕭華、黎玉、莫文驊、霍士廉、林月琴聯名著長文《有功豈必書之碑》紀念他，文末引用他殘稿裏的二句詩：“無詩安能言吾志，有功豈必書之碑”。

李銳在《讀牟宜之詩》一文中寫道：“牟老長我八歲，過去無一面之緣，我的老伴在建設部老幹部局工作，對這夫婦都打成右派的一家老小，非常同情關心，卻幫助不了；她很尊敬這位老人，同我談過，稱為極其耿直、厚道的好人。現在看到有關資料，才感到牟老同顧准、聶紺弩這些老學者、老專家多麼相似，是在階級鬥爭、政治運動年代，少有的保持自由思想、獨立精神的大知識份子。他們革命尊重科學，黨性記住人性，無產不忘資產；不論處於怎樣的逆境，受到怎樣的折磨和殘害，總是相信真理，相信自己；他們因思考而受難，因受難而再思考，總要用筆墨將自己的思考留在人間。”

### 王定 中國首創“包產到戶”的縣委書記之一

中國共產黨內，始終存在著兩條路線鬥爭，以中共創黨總書記陳獨秀為首的黨內民主派，由於蘇聯盧布的作用，一直處於受壓制的地位，發不出聲音來。然而黨內民主派又是十分頑強的，他們始終不屈地鬥爭著。上世紀1950年代的中共廣西環江縣委副書記兼縣長王定就是黨內民主派的代表，他與胡耀邦、趙紫陽屬於同一時代人。他逝世後，環江縣人民在他墳頭樹起一塊巨大的石碑，上面寫著“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分子，不屈不撓爭民主人民英雄”。



王定（1923-2000）廣西全州人，原名廖其豪。1947年和妻子蔣繼璘把才剛八個月的女兒留在家裏，參加中共領導的全

（州）灌（陽）武裝起義，是遊擊隊中唯一的一對夫妻戰士。這支隊伍成立不到十天，就遭到地方保安團的襲擊而被打散。蔣繼璘不幸被俘，同年9月15日在縣城英勇就義。是解放戰爭時期全州第一位女烈士，突圍後，王定化裝到達武漢，輾轉至香港，入中共領導的達德學院學習。

1948年，他參加了中共領導的西江遊擊隊。1949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後調回廣西，先後擔任過遊擊大隊長、參謀主任兼聯隊長等職。中共掌權後，他擔任過副縣長、縣長、中共縣委副書記。

1956年，農業合作化運動席捲全國農村，廣西環江縣一夜之間冒出一百零九個高級農業合作社。他作為中共縣委書記卻一頭鑽進厝兒裏視察民情、調查研究。他感覺到高級合作社並不符合農民的根本利益和心願。於是，提出了“包產到戶”的主張；為此，中共環江縣委向宜山地委作了專題彙報。起初，地委批示“各縣可參考，環江可試點”。1957年《廣西日報》1月16日正面報導了環江包產到戶的消息。同月27日，《浙江日報》也刊登了中共永嘉縣委書記李

雲河關於包產到戶的專題報導。王定和李雲河是中國最早提出包產到戶的兩位中共縣委書記。

1957年5月，王定在中共廣西省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發言，對省委拖延兩年仍未處理平樂地區大量餓死人事件，公開提出了尖銳的批評，贏得了大會代表的熱烈掌聲。當時中共黨內尚不知“陽謀”為何物，可是王定的禍根卻埋下了。不久即與李雲河雙雙被打成了右派分子。王定因為參加地下黨，打過遊擊，還多了一頂地方主義分子兼極右分子的帽子。開除黨籍、公職、勞動教養。李雲河亦被開除黨籍、撤職降薪。王定全家掃地出門，攆出縣委大院，住到四面通風的圩亭。幸有好心人騰出一間房，一家才得安身。妻子葉葵仙是財政科副科長，也被株連，逼迫離婚。她堅決不從，被罰到酒廠挑水。從此一家淪為賤民。

中共環江縣委被迫改組，縣委四個正副書記，三個為右派，副書記車丙寅、陳朝群亦為右派分子；農村部正副部長譚彥明、李堅劃為中右分子；全縣八個區四個區委書記劃為右派分子，一個劃中右分子，全縣幹部中有九十七人打成了右派分子，六十六人被劃為中右分子；更多的幹部則被扣上“王定的社會基礎”的帽子，被清除回農村管制勞動，所有這些人同時戴上地方主義分子的帽子。像環江縣那樣在反右運動中把各級幹部一網打盡的現象在全國絕無僅有。

1958年，王定被武裝押解到柳江縣新興農場開荒隊。這個廣西最大的勞改農場，當年集中了三百多名勞動教養的極右分子，他們以前大都是區、縣級幹部。此時環江縣的中共縣委書記洪華，為了升官求榮，死心塌地追隨毛澤東極左路線，在大躍進中大肆弄虛作假，竟放出全國水稻畝產十三萬斤的最高產衛星，結果使這個不足十七萬人口的小縣，餓死五萬多人，占全縣三分之一。王定在得知情況後痛哭三天。

1961年，王定解除勞動教養，摘掉右派帽子。因不服處理，先後八次向中共廣西自治區委申訴，四次向中組部上書，又被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像他那樣拒不服罪，反復翻案又被重新戴帽的黨內右派在中共黨內也是很少有的。

1979年，他才恢復政治名譽、恢復黨籍、恢復原工資級別，分配工作，先後當過小學教師、農校校長、統戰部宗教處處長、副廳級諮詢員。他不辭勞苦，長期搜集整理核實環江縣餓死五萬多人的事件。1980年，當他得知當年環江縣餓死人事件的主要責任人洪華獲得平反後，在驚訝與憤慨之中，寫了一篇短文說：“幹蠢事的人不受懲罰，每每啃著甜頭，不肯罷手；做好事者吃著苦頭，難以翻身。”在另一篇文章中又說：“現實告訴我們，與其說要說假話者誠，倒不如說要說真話者誠了。好人受罪，壞人神氣的局面什麼時候扭轉，說假話才會被人引以為誠。”（王定：讀《說假話者誠》的感想）

1988年，環江事件三十週年之際他又再次上呈《申訴意見書》稱：“大慘案三十週年了，使我這個曾經擔任過環江縣委書記的黨員幹部感到揪心的痛苦。”他明確提出三點要求：一，從速安置受冤和被株連清洗回鄉的幹部；二，追查主要負責人員的罪責；三，請飭《廣西日報》對當年假報導速作公開檢討。他的正義要求卻沒有人理睬。

1997年，他兩次衝破重重樊籬，毅然投書媒體，為民請命。寫了三萬字的《一顆‘衛星’五萬人命》。文中說“四十年前，即西元1958年9月9日，廣西環江縣放出了水稻畝產稻穀十三

萬斤的‘大衛星’，這顆全國最大的水稻假衛星，在一個正常年景裏，給環江縣造成巨大災難，黨和政府的威信更是受到難以估量的損失。自1949年未建立環江縣政權之始，直到1957年底反右，我是環江縣的首任縣官，有責任就所親見親聞及三十多年來搜集的有關資料，具書陳述，並供後世查尋。環江縣位於廣西西北部，總面積四千五百多平方公里，居住著毛南族、僮族、漢族、苗族、瑤族、仫佬族、水族、侗族等多種民族，山區人民敦厚純樸。環江縣是個產糧大縣，畜牧業以養牛、養豬為主，農民有圈養黃牛的傳統。縣內森林資源較為豐富，有大片的原始森林。只是在放水稻大衛星後兩個多月，環江又放出日產鋼鐵六萬噸的大衛星，原始森林遭到嚴重破壞。”

這篇文章發表在10月9日《南方週末》上，其小標題是：“合作滋生弊端”、“包產到戶、到組、縣委遭改組”、“密植奪高產的假戲法”、“畝產十三萬斤的‘製作’過程”、“浮誇騙來榮譽、權位”、“放衛星後的高徵購”、“追瞞產置人於死地”、“大饑荒、餓死五萬人”、“迫害反映情況的好幹部”、“設置障礙，調查受阻”、“造假者的結局”。原題為《狂熱及其災難》，從而向國人揭開了四十年前環江慘劇的真相。

這篇文章的發表相當於一次大地震，環江人馬上將文章復印，廣為傳播散發。環江縣的幹部和老百姓寫信傾訴多年來埋藏在內心深處的心聲，王定是當之無愧的環江人民的真正公僕：反右派——大躍進——餓死人，環江就是這多米諾效應最殘酷的典型。本來完全是人為造成並且完全可以避免的事情，竟然成了歷史的必然。這教訓實在太慘痛了！而這一切，全部是毛澤東禍國殃民的空想狂熱烏托邦，所謂共產主義瞎胡搞瞎折騰所造成的。

王定在2000年逝世，享年七十七歲，環江縣人民在他的墳頭立下一塊巨大的石碑，上面刻著：

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不屈不撓爭民主的人民英雄。

## 李雲河 中國首創“包產到戶”的縣委書記之二

上世紀1950年代初，在毛澤東狂熱的右傾幼稚病掀起農業合作化高潮中，敢於同毛澤東唱對臺戲提出包產到戶並付之實行的二位年青勇敢的縣委書記，浙江的李雲河和廣西的王定，他們在反右中都劃為右派分子，王定還是地方主義分子和極右分子。可是農民卻把他們當作英雄，當作代表農民利益的好人。

李雲河（1932-1998）中國第一個進行包產到戶的試點人。李雲河原名蘇鳳亭，山東省惠民縣人，因1939年九歲時過繼給貧農李玉蘭當兒子而改姓李，改用現名。他於1945年參軍並加入了中共，後隨軍渡江南下，1949年5月下旬抵達溫州，參加溫州軍管會的工作，接著調入市委組織部和秘書處工作，翌年被派到永強區開展剿匪反霸鬥爭和減租減息。因永強、三溪、藤橋、梧埏四個區從溫州市劃出，給了永嘉縣，李雲河便隨著到了永嘉縣委擔任土改指揮部領導成員和秘書。土改任務於1952年3月完成後，李雲河先後擔任了縣委秘書、縣委宣傳部副部

長、部長、縣委常委。在1956年召開的永嘉縣第一屆黨代會上，李雲河被推選為主持農村工作的中共永嘉縣委副書記，時年僅有二十六歲。

1998年7月，浙江省永嘉縣試行“包產到戶”改革四十二週年紀念會和學術研討會即將舉行，北京、上海及全國各地的領導、專家、學者和記者都來到了永嘉，全縣上下都籠罩在一種少有的歡樂氣氛中。而在此時，本該成為會議的主角、包產到戶的首創者、捍衛農民利益的英勇鬥士李雲河，卻因兇殘的癌症於7月7日奪去了生命，再也不能出席會議了，終年僅有六十八歲。專程趕到浙江參加會議的原中顧委委員、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潤生，十分沉痛地說：“我本想在這裏會見李雲河同志，誰知竟不能如願……我對這位包產到戶先驅者逝世表示惋惜和哀悼！”

杜潤生是全國著名的農業專家和學者，他為何對李雲河懷著如此深厚的感情？李雲河的逝世為何引起這麼多人的懷念？這與他的坎坷經歷和遭受的迫害有關。

在毛澤東領導的農業合作化的日子裏，浙江省永嘉縣活躍著一位軍人出身的年輕領導者。他身材瘦長，眉目清秀，頭髮濃黑，說話辦事都顯出軍人那種迅捷幹練的作風。這位領導者，便是該縣主持農村工作的中共縣委副書記李雲河。

李雲河走上永嘉縣的領導崗位之時，其所在的浙江省農業合作化運動，就曾是引起爭論的一個重要省份。1951年4月17日，中共山西省委給中共中央報送了一份《把老區互助合作組織提高一步》的報告。報告認為隨著農村的恢復和發展，發現了渙散的互助組不是向現代化和集體方向發展，而是向富農的方向發展，因而他們主張把互助組提高一步組成合作社。劉少奇、薄一波、劉瀾濤不同意這一主張，

當年7月3日劉少奇給這份報告加了按語，印發給黨內負責人和馬列學院的學員，語言激烈地指出，黨內有一部分人害怕資本主義發展，有企圖用平均主義去戰勝資本主義的錯誤傾向。

毛澤東卻明確支持中共山西省委的意見，專門找劉少奇、薄一波談話，批評他們的觀點“右傾”。同時毛澤東還指示陳伯達召開第一次互助合作會議，起草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決議。這樣就使農業互助合作化運動在全國搞起來了。

在這一運動中，中共浙江省委農工部沒有及時糾正一些地委提出的“抓兩頭，帶中間”即依靠貧農、鬥爭富農、帶動中農的錯誤口號，強迫命令，使該省的農業合作社由1954年秋收前的三千八百個猛地增到1955年春天的五萬零九百五十個，加上四千八百個自發社，總數達到五萬五千個。

由於過速過快地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農民怕有“歸公”的思想顧慮，就出現了比較普遍的不利於生產的現象，如不積極澆肥積肥，大批出賣牲畜，有了錢不買生產資料，用於搶購不急需的用品，甚至用於修墳、買棺材等等。時任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兼第七辦公室主任的鄧子恢，於1955年3月下旬和中央副秘書長、中央書記處第二辦公室主任譚震林，邀請浙江省委書記江華開會研究，並將討論意見寫成了《對浙江省目前合作化工作的意見》。

此文編寫成後，鄧子恢曾委託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伯達呈請毛澤東

審閱。同年3月25日，中央農村工作部將此《意見》用電報發往浙江省委，指出：據已知材料，你省農村緊張情況仍在繼續發展著，農民生產情緒很不穩定，除糧食工作外，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發展過猛，步子邁得過大過急（由千分之六發展到百分之三十幾），也是促成緊張的重要因素之一。據此，特建議你們對合作社數量分別地區實行壓縮，有條件鞏固的必須加以鞏固，無條件鞏固的，應主動地有領導地返回互助組或單幹經營，能夠鞏固多少算多少，不要勉強維持虛假成績。

此電報發出後，鄧子恢出國，譚震林召集中央二辦和農村工作部的負責人開會，決定派農村工作部秘書長杜潤生、中央二辦副處長袁成隆一道去浙江解釋電報精神。杜、袁二人在浙江調查後，經過一個多月的工作，使該省的農業生產合作社減少了一萬五千個，占總數將近一半。減下來的合作社大部分轉為互助組。

毛澤東覺察到浙江收縮合作社後，於1955年5月5日在頤年堂和鄧子恢談話時警告說：“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錯誤，否則又要作檢查。”毛澤東在《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報告中批評說：浙江由於採取所謂“堅決收縮”方針（不是浙江省委決定的），一下子就從五萬三千個合作社中解散一萬五千個包括四十萬戶的合作社，引起群眾和幹部很大不滿，這是很不妥當的，這種“堅決收縮”的方針，是一種驚慌失措的情緒下作出的，是資本主義傾向。

毛澤東是不同意“堅決收縮”方針的。1955年7月，他在頤年堂約見鄧子恢、廖魯言、劉建勳、杜潤生、譚震林和陳伯達時，對鄧子恢說：“你的思想要用大炮轟。”第一次提出批判合作化問題上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到1956年1月29日，毛澤東在中央召開的知識份子問題會議的講話中，更尖銳地說：“我們的農村工作部，應該是一個促進部，但是在一個時期之內，它是促退部。”

作為縣級幹部李雲河當時不大清楚中央高層在合作化問題上的分歧和爭論，但他在對永嘉縣四百六十六個高級合作社的調查中，既為群眾突然高漲的熱情而高興，又為各社存在這樣或那樣的一些問題而著急。這些問題，集中地表現為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不相適應，用當時說法，就是“鞋子”太大，“腳”太小。同時還存在管理不善、責任不一、效率不高、窩工浪費的諸多問題。農民對窩工問題意見最大，說是：“早上排排隊，回頭煙妹妹（吸香煙），晚上開開會，幹起活來一大片，走起路來一長串。這樣大呼隆，別說增產增收，就是老本也難保。”

在三溪區和梧埏區的農村調查中，李雲河還發現了四個突出問題。一是高級合作化，勞動組織較之初級社時的規模擴大了三、四倍以上；二是生產關係改變了，但生產力發展水準沒有改變，用小農生產方式進行著大兵團生產；三是為適應集體大生產，有人試圖採取“並丘擴田”，但因土壤肥瘦不均，加之畜力少，工具陳舊，形成許多不便，從而造成增產緩慢；四是用大批勞力在小塊地上勞作，一件農活要經過數十人的合作。“按勞計酬”難以正確執行。

作為縣委的一位年輕的思想活躍的農業書記，面對迅猛到來的農村社會主義高潮，特別是面對農業合作生產高級化急迫需要解決的這麼多重大問題，李雲河苦思冥想地去尋找解決之法。在與農業合作社社員的座談中，在走家串戶的調查中，他在尋覓著解決問題的最佳出路。

在回到機關、回到宿舍之後，他仍在作深沉的思索。在他感到“山窮水盡疑無路”之時，《人民日報》的一篇短文引起了李雲河的注意，心裏像有一絲光亮透了進來，頓時感到眼前亮堂了起來。“包產到戶”就是這樣搞起來的。

在李雲河解決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管理問題極端苦惱的時候，鄧子恢於1956年4月在全國農村工作部部長會議上的講話傳達下來了。鄧子恢講，改進生產管理，建立承包制度，是保證辦好合作社的關鍵。《生產組和社員應包工包產》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這篇文章不長，位置也不很突出，而對高級社管理問題十分著急而變得異常敏感的李雲河，卻一下子注意到了這個標題，認為它是第一次突破了生產組織和社員不能包工包產的禁區，是提出生產組和社員建立包工包產責任制設想的好文章。

該文一下點明瞭高級合作社生產管理方面問題的癥結所在，李雲河受到啟發，大膽地在永嘉縣推廣包產到戶。可是不久開展的反右運動中，把他的包產到戶主張批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對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在農村搞資本主義復辟，李雲河戴上右派分子帽子，被撤銷一切職務，開除黨籍，從此淪為賤民，直到1979年改正。

李雲河，永遠活在人們的心裏！永嘉縣和浙江省的農民懷念這位敢於向毛澤東說“不”的改革先驅。

## 黃 源 中陽謀圈套的魯迅戰友和學生

魯迅昔日的學生和戰友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在反胡風和反右運動中中箭落馬，他們中有胡風、馮雪峰、彭柏山、賈植芳、路翎、黃源等。原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樓適夷雖然逃過反右，卻逃不過文革。至於魯迅本人，毛澤東在上海說過，如果魯迅活到現在，不是進監獄，便是不開口。

皖南事變後，新四軍軍長葉挺在獄中寫信給中共中央說：“聞黃源於此次皖南慘變，在陣中頭部受彈傷，立即殞命。黃源到皖南軍中後，參加軍中工作，努力工作，成績也甚好。在此次慘變中，忍受饑餓之苦，形容憔悴，又不免一死，痛哉！”《新華日報》和《重慶日報》都報導了他的死訊。他在重慶當護士的妹妹黃啟鳳聞知，哭得死去活來。1941年5月，他奇跡般地回到蘇北新四軍總部。陳毅軍長表示熱烈歡迎，幽默地說：“我們以為你盡忠報國了呢！”並立即贈以雪茄一合，以志慰問。



魯迅學生和戰友 黃 源

魯迅的學生和戰友黃源(1905-2003)浙江海鹽武源鎮人，字河清。父親是本縣西塘鎮小學教師。黃源於1920年在家鄉小學畢業後，上了嘉興秀州中學和上虞春暉中學。1925年赴上海讀立達學院，不久去日本留學，在1929年回國。

魯迅在1927年抵達上海定居後，經常去勞動大學和立達學院演講。有關方面指定黃源做紀錄，因此他與魯迅結下了不解之緣，投身於上世紀1920年代的進步文化運動，領導左翼文壇，

主持《文學》月刊的編輯工作，對中國文壇產生過重大影響。

他在魯迅指導下，編輯《譯文》月刊，後任主編。參加魯迅領導的文化反圍剿鬥爭，成為魯迅直接培養的學生。抗戰前夕，他與茅盾、巴金創辦《吶喊》、《烽火》雜誌，發動全民抗日。

抗日戰爭爆發，黃源走出書齋，投筆從戎。**1938**年去皖南參加新四軍，翌年加入中共。與李一氓、朱鏡我、彭康等一起領導新四軍的文化運動。**1940**年底皖南事變前，他負責新四軍的印刷廠，隨項英突圍。途中，他和警衛員馬夫三人與大隊失散，人們誤以為他中彈身亡。他這個連槍都不會放的文化人，歷經艱險，九死一生，突出重圍，幾個月後奇跡般地生還，隻身一人回到蘇北軍部。

國共內戰時，他隨華東野戰軍，轉戰蘇、豫、魯、皖，參加魯南、孟良崮等重大戰役。曾任魯迅藝術學院華中分院教導主任、浙東根據地行署文教處長、浙東魯藝院長、華中文協會長，是華東革命根據地文化工作的開拓者。

中共掌權後，他擔任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副部長、中共中央華東局宣傳部文藝處長、上海市軍管會文藝處長、華東軍政大學文學院長，領導華東地區六省一市的文藝工作。

**1955**年調回浙江省，擔任中共浙江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浙江省文化局長、浙江省文聯主任兼黨組書記。他堅持執行“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文藝方針，親自領導和改編昆劇《十五貫》，劇中婁阿鼠的形象栩栩如生，為觀眾所熱愛。毛澤東、周恩來給予很高評價。毛澤東還說：“一部戲救活一個劇種”。可是不久，毛澤東打了自己耳光，把它打作大毒草。

黃源是中共黨內少有的文學家、翻譯家、文藝工作領導者，又是魯迅的學生和戰友，但是一樣難逃毛澤東的陽謀羅網。**1957**年初的整風鳴放運動中，他作為全省文藝工作最高領導，堅決執行雙百方針，傳達和貫徹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和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這是他份內的工作。殊不知不論他鳴放不鳴放、開不開口、說不說話，早與魯迅的其他學生和戰友在一起，列入了黨內右派分子和混進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黑名單。在這份黑名單上有馮雪峰、丁玲、蕭軍、聶紺弩、黃苗子、馮亦代、黃源、樓適夷(內控右派)等知名作家和文藝工作者。

黃源劃為右派後，押送到浙江里安城郊公社蔬菜隊監督勞動。在砌築堤塘的重體力勞動中，這位年近六十的乾瘦老頭，憋著一股勁在搬送泥塊。別人都是用雙手搬的，而他年老體衰，只能用雙手把泥塊抱在懷裏，慢吞吞地向前移動，把一身絲棉襖搞得骯髒不堪！

旁人實在看不過去，關心地對他說：“老大爺，您這樣把絲棉襖都搞髒啦！”他坦然一笑，不無幽默地回答：“不，過去因為太少接觸泥巴，所以成了右派，現在就應該多接觸接觸泥巴。”後來分派工作時，人家同情他，給予他某些小小的關照和方便。

文化大革命中，他又作為浙江省文藝黑線總代表和牛鬼蛇神的頭目揪出批鬥，關牛棚，坐噴氣式遊街，又一次整得死去活來，奄奄一息。**1978**年改正後曾擔任浙江省文聯名譽主席，潛心寫作。

黃源性格開放爽朗，為人大度。他和樓適夷之間的友情傳為文壇佳話。他曾把高爾基小說

《在人間》的翻譯版權讓給樓適夷，使樓適夷全家老小靠它生活了十多年，以後又得到一筆五千元版的稅。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五千元是個天文數字了！

黃源的著譯頗豐，代表作有《屠格涅夫生平及其作品》、《世界童話文學研究》、《結婚的破產》、《將軍死在床上》、《三人》、《日本現代短篇小說譯叢》、《紀念魯迅論述》、《在魯迅身旁》、《魯迅書簡追憶》、《魯迅致黃源信手跡及注釋》、《黃源回憶錄》、《黃源影集》三卷等。《憶念魯迅先生》獲1984年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優秀成果一等獎；1995年獲魯迅文學藝術突出成就獎；1998年中國翻譯成果獎；2002年浙江省突出貢獻老作家獎。

在魯迅先生的學生和戰友名單上，還有一位彭柏山不可忘記。他曾擔任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長。1955年在反胡風運動中，毛澤東說了一句：“上海不可沒有胡風分子！”柯慶施雞毛當令箭，查出胡風與彭柏山通過幾次信，便把彭柏山打作胡風骨幹分子，關押了一年多，反右前夕才放出來。

據彭柏山的女兒回憶，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長後來擔任上海市委書記的王一平曾偷偷告訴她父親二句話八個字，使彭柏山逃過反右劫難。那便是“要鉤魚了，不要說話。”彭柏山後來下放去青海省，沒有逃過文革浩劫。

### 陳仁剛 毛澤東緊急剎車前的幸運兒

“安徽省李楊李陳右派反黨集團”排位最末一位的陳，即陳仁剛，是當時的安徽省司法廳副廳長兼中共安徽省司法廳黨組書記。司法廳長是民主人士，所以掌握全省司法大權的是陳仁剛。

陳仁剛是安徽人士，在上世紀1930年代中學未畢業即參加中共的地下活動，並在抗戰前夕加入中共。1937年12月，日寇侵佔南京、揚州和沿江城市，陳仁剛與當地地下黨的負責人魏然等在一起聯絡了皖、蘇一帶的愛國青年，拉起隊伍成立蘇皖邊區抗日義勇軍，進入天長、六合交界處的橫山打遊擊，一度攻克天長縣城。引起國民政府下屬的安徽省政府的恐慌不安。安徽省政府下令義勇軍解散，他們便停止了活動。這是一支江北地區最早成立的地方抗日武裝組織。1938年4月，魏然、陳仁剛這一批人又組成了“中國工農紅軍蘇皖獨立師”，實際上是地方遊擊隊。當時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任弼時曾經問毛澤東，這支地方武裝算不算共產黨領導的紅軍，毛澤東回答道：“當然算啦！”

安徽省在中共掌權後，陳仁剛歷任安徽省黨政要職，1954年出任司法廳副廳長，後來又兼任中共安徽省司法廳黨組書記。中共的黨組書記不同於黨委書記，黨委書記只管機關的黨員，對所在機關起監督作用，表面上由機關黨員選舉產生。而黨組書記則由上級黨委直接任命，握有該機關的行政決策權。如果第一把手是黨外人士，黨組書記實際上就是該機關的最高領導，擁有生殺大權。“黨組責任制”是中共一黨專政、以黨代政的具體體現。從建政之始直到今天一直如此。遍設於人大政協、政府機關、群眾團體、民主黨派、工會婦聯，無孔不入。“黨組”就是“一黨專政”的代名詞。



1958年反右補課運動中，安徽省挖出了以“李世農為首的右派集團”。又稱“李楊李陳右派反黨集團”。李世農是省委書記處書記、副省長，分管政法工作。這個集團成員有楊效椿（省委委員、省委組織部副部長、省檢察長）、李銳（省委委員、省副檢察長）、陳仁剛（省司法廳黨組書記、副廳長）。他們都是安徽省政法方面的領導幹部。據《中共安徽省擴大的第六次全體會議關於開除右派李世農、楊效椿、李銳、陳仁剛黨藉的決議》說，“安徽省委曾批示各地批判右傾思想，堅決打擊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的各種破壞活動。但是，肩負司法領導責任陳仁剛卻抗拒省委指示，竟在蚌埠召開的縣人民法院院長會議上佈置反‘左’的任務，要求司法幹部不要‘腦子發熱’和‘盲目附和’，說‘省委今春提出在政法部門批判右傾是錯誤的，與中央文件精神不符，與下面情況不符’。”

決議還說：“今年3月分在皖南的時候，陳仁剛要歙縣、績溪、甯國、屯溪四個縣市復查1955年早經多次檢查並據實判決的案件。他還親手檢查兩個案件，企圖把因造謠污蔑人民政府、破壞統購統銷而判罪的原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俞伯淵改判‘教育釋放’，把不法地主分子汪碧玉‘免於刑事處分’。陳仁剛還把他這種包庇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作為‘榜樣’，要這些縣市的司法幹部仿效，企圖為犯罪分子開脫罪責。”

“陳仁剛還有一個大錯誤，就是同廳長李湘若的關係。李湘若是黨外人士，安排當了廳長。陳仁剛在名義上是李湘若的副手，但作為司法廳的黨組書記，是事實上的領導。可是整風運動開始以後，陳仁剛和黨外右派分子、安徽省司法廳長李湘若裏應外合向黨進攻。李湘若為人奸詐，一貫對黨不滿，陳仁剛是知道的。但陳卻毫無原則地吸收李參加不必要參加的黨的重要會議，把黨內機密文件給李湘若看，並將他自己下鄉收集的那些反動的所謂‘調查’告訴李湘若。李湘若向黨進攻時，就動用了不少上述材料。”（摘自1957年9月7日《人民日報》）

陳仁剛曾說過：“殘餘反革命保險一個也找不到”、“反革命分子有兩面性”、“反革命分子在我機關多做一年工作，等於多贖一年罪”。中共安徽省委指責他“該判不判，重罪輕判”，以致全省放掉的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達兩千多名，都是陳仁剛的罪過。

陳仁剛與李世農、楊效椿、李銳一起開除黨藉，降職降薪、留用察看。當時毛澤東巡視各省，親自插手了安徽省的“李楊李陳右派反黨集團”案，並定了性。

1962年七千人大會後，曾希聖當了毛澤東左傾機會主義狂躁癥的替罪羊，免去中共安徽省委書記一職。李大釗之子李葆華接替了他的安徽省第一把手職務。在李葆華走馬上任前，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接見他時指示，抓緊時間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右派分子甄別平反。李葆華到了合肥，立即著手這一工作。第一批甄別平反了李世農、楊效椿、李銳、陳仁剛等二千多名右派分子，等到躲在二線的毛澤東發現這一情況，連忙緊急煞車。這二千多右派便成為全國的幸運兒，安徽省是少數幾個曾經為右派甄別平反的地區。

## 陳炳南 究竟是改正還是平反？

1957年錯劃為右派的人，1978、1979年在三中全會後絕大部分人獲得改正。但是也有一小

部分人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後獲得平反。這是安徽、青海、甘肅等少部分省區獲得劉少奇指示後，搶在毛澤東下達“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叫囂前，搶先動手平反的結果。

安徽省中共黨員陳炳南（1935-）情況比較特殊，屬於兩可之間。有人說：“共產黨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確鑿無疑，他至今搞不清楚，他的右派帽子究竟算是平反還是改正？陳炳南安徽蕪湖人，出身貧苦，父親是個修傘匠，從小過著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艱苦生活。他十五歲參加革命，工作積極，不久便加入中共，調到中共蕪湖地區黨校，任秘書室幹事。

他工作任勞任怨，負責認真，經常得到好評。聽說地委黨校要搬到離蕪湖一百里外的巢湖去，便懷著對黨赤膽忠心的精神，向上級黨委寫信反映，地委在蕪湖，如果黨校搬到一百里以外，不便聯繫，也不利於地委領導，搬來搬去勞民傷財，這裏邊有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片面性在作祟。

他的意見完全正確，強行搬去幾個月後，又不得不遷回原址。但是搬遷決定是由地委書記作出的，不論正確與否，不許反對。此時正趕上反右的當口，在安徽省的反右運動中有一條心照不宣的土政策：反對領導就是反黨，不管你反得對不對，也不管這個領導的大小，哪怕是個小組長。

開了幾次批鬥會後，陳炳南根據中國共產黨黨章規定的黨員權利和義務、循照黨章規定的組織程式、向上級領導反映正確意見的光明正大行為，被誣陷為反黨反社會主義性質，劃為右派分子兼混入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取消工資待遇，每月僅給十二元五角生活費，送去勞教場所勞動教養。

這樣的表述方法，聽起來似乎有些拗口，但確實是中共黨內生活異常的普遍現象。另一種異常現象便是株連九族，這是中共封建化的表現。陳炳南的妻子江秋雲無緣無故也劃為右派，開除公職，取消工資待遇，發給十二元五角生活費，也送去勞教場所勞動教養。

一人戴罪，全家遭殃。他的五位長輩祖父、父親、母親及妻子的外婆、舅父，都沒有熬過1960年代初的大饑荒，拋屍荒野，任由狗啃狼噬，白骨無收。他的父母和她的舅父餓死時才四十出頭。

1962年七千人大會後，全國政治空氣較為寬鬆，毛澤東退居二線，劉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央曾在甄別平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同時，就右派分子甄別平反問題發過一個文件，意謂按照實事求是精神，根據本人申訴或家屬的要求，可以甄別處理。

中共中央組織部提出：“凡是在交心運動中受到處分或者劃為右派分子的，應一律平反。”、“做好對摘了帽子的人和右派分子的安置工作。”中共中央統戰部也指出：“如果右派分子本人或家屬要求甄別的（包括已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員），應該進行甄別。”

李大釗兒子李葆華在1962年春去安徽接替被撤職的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毛澤東的好學生、“左王”曾希聖的時候，劉少奇在中南海接見他，指示他可以為右派甄別平反。

李葆華剛到安徽便說：“我來安徽時，少奇同志當面交代要搞右派平反——少奇同志不是

中央嗎？還不執行少奇同志的指示嗎？”李葆華大刀闊斧地進行甄別平反，7月間，中共安徽省委通過決議，為原省委書記、省長李世農等二千多名右派第一批平反。李世農復職為中共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這是全國唯一一批得到平反處理的右派分子。

毛澤東聞知這個情況，不禁大發雷霆，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發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警告，右派甄別平反工作緊急剎車。陳炳南在1962年列入甄別平反的範圍，但有人說：“他是地委書記親自定的，翻不了案。”中共中央監委書記錢瑛來蕪湖視察，她在瞭解了陳炳南的情況後表示，向上級黨組織直到中央反映情況和意見，是一個共產黨員的權利和義務，反對遷校怎能說是搞大民主呢？

等到中共蕪湖地委替他作出平反的結論，他沒有趕上李世農等二千多名右派平反的既是頭班車又是末班車，錯失良機。陳炳南在自傳體小說《赤子吟》中說，他比春天第一燕溫濟澤還早一個月得到改正的原因就在於此。

1978年4月26日，即在胡耀邦單獨為溫濟澤改正的前一個月，那時全國性的大規模為右派改正的工作尚未開始，《人民日報》發表陳炳南《黨的政策在我身上落實了》一文的《編者附記》稱：“最近，我們收到中共蕪湖地委來函稱：地委已正式批准為陳炳南同志全部平反，恢復黨籍。”其原因便是中共蕪湖黨委的這個決定早在1962年已經作出了。

胡耀邦決定的為右派平反，被當年中共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長、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修正為“改正”。這個不倫不類的“改正”，為歷史和後人帶來巨大的傷痛與後遺癥！

## 三大大學黨委書記

1957年反右運動中，全國有很多高等院校的校長、副校長劃為右派分子。但是作為中共在大學裏的實際代理人 and 最高統治者的黨委書記，則很少劃為右派。毛澤東的陽謀大計在大學裏只傳達到黨委書記這一級（正部級）。不過亦有例外，本列傳介紹了三位劃為右派的大學黨委書記，即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袁永熙、同濟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薛尚實和北京地質學院黨委書記兼副院長陳子谷。

### 袁永熙(清華) 學運先驅

中共實行官本位制，什麼大中小學、工礦企業、商店街道、寺廟教堂，不論什麼單位都要套上一個級別。清華、北大屬於省部級。因此清華、北大的校長和黨委書記都相當於省部長。從行政級別上看，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右派袁永熙便是相當於沙文漢、李世農那一級的黨內大右派了。

袁永熙（1917-2000）的大兒子陳必大在小時候經常問媽媽陳璉，父親為什麼會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陳璉總是向子女解釋道：“你爸爸放鬆了改造思想，居功自傲，個人主

義膨脹，不珍惜自己的歷史，走到了黨和人民的對立面上去了。”

出身于貴州修文一個淵源久長的官宦世家的袁永熙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四百多年前袁家的祖上中了武舉，官至明朝的貴陽守備。這個家庭延續了十八代功名。袁永熙父親袁祚塵曾任袁世凱的幕府，捐了個營口道台。辛亥革命風雲突變。袁祚塵“二次創業”，當上了山東棗莊煤礦的董事長和北京報話局局長。經營多種工商業，搖身變為資本家，他先後娶了五位夫人，共有十六位子女，袁永熙排行十二。

袁永熙的青少年時代經歷了一個從闊少爺變為革命家的過程。**1935**年北京爆發一二九學生抗日救亡運動，袁永熙積極投身學生運動。**1938**年他在西南聯大加入了中共，並任校黨總支書記，以自己的幹練和才智，成為中共學生運動的卓越領導人。其同學兼女友，亦是中共黨員的陳璉是蔣介石文膽陳布雷的女兒。抗戰勝利後，倆人奉命進北平做地下工作。**1947**年袁、陳結婚時由國民政府的北平市長何思源證婚。未及一月，倆人身份暴露，與中共清華大學黨支部書記陳彭遠等一起被捕，押至南京。蔣介石為收買人心，先放走了陳璉。次年**5**月又讓陳布雷和袁永熙的姊夫、外交部次長葉公超保袁出獄。袁永熙出獄受到劉少奇批准的“重新入黨，不影響使用”的奇怪處分。

中共建國後，袁永熙擔任清華大學第一任黨委書記，享受省委書記的待遇。但他與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翔相處不好，經常鬧矛盾。袁不滿蔣的獨斷專行，等到肅反運動時，因有“自首變節嫌疑”被撤銷黨委書記的職務，改任校長助理。

毛澤東於**1957**年**8**月**1**日寫下《中央關於進一步深入開展反右鬥爭的指示》。他在《指示》中說：“黨內、團內右派分子，只要是同黨外團外右派分子的政治面貌相同，即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向黨倡狂進攻的，必須一視同仁，一律批判。”袁永熙頃刻成為“同黨外右派政治面貌相同”的人。《人民日報》的文章指出：“在清華大學的工會主辦的自由論壇上，當右派分子高呼‘反對共產黨的特權’等等誣衊性的口號時，他竟跟著群眾一起鼓掌。”他的另一條罪名叫“別有用心地歪曲和誣衊中央的方針”。其根據是鳴放時他曾說：“毛主席受到很大的壓力，國內告急，電報雪片飛來，都要求收。”這篇文章的通欄大標題是：《在鬥爭的緊要關頭背叛共產主義的袁永熙做了右派分子進攻的黨的內應》。

蔣南翔當黨委書記的清華大學按照中共北京市委大學部的指示，必須抓出一個特大右派來推動運動的高潮。蔣南翔選定了袁永熙，大會批小會鬥半年有餘。結髮夫妻陳璉在反右鬥爭的火線上宣佈同袁永熙劃清界限，提出離婚，當場被蔣南翔批准。陳璉帶了三個孩子改嫁他人，孩子改姓。袁永熙兄弟三人，**1930**年代參加革命，為中共出生入死。到頭來一人被中共錯殺，二個當了右派。

在批鬥時，袁永熙不服，爭辯了幾句，為此定為極右分子。時年四十歲的袁永熙開除黨籍，從行政十級降到十七級，判處五年勞動改造，送往京郊昌平縣勞改農場。**1962**年刑滿送往河北省南宮縣一所農村中學當語文教師。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紅色恐怖中，該校紅衛兵在批鬥牛鬼蛇神時當場打死六名教師，被工友用架子車拉到荒野中暴屍，以示無產階級專政的威力。當野

狗嘶咬袁永熙的大腿時，他痛醒了，立即呼喊著坐起，嚇走三四隻野狗。其他五位老師已被野狗咬得不像人形。他爬到一位學生家裏，才逃出一命。

妻子陳璉雖然逃過了反右一劫，但在**1967年11月19日**，當時擔任上海市某局局長，在遭受批鬥後，黃昏時分爬上中共上海市委的樓頂，頭朝下地跳到水泥地上，腦漿崩裂而死。定性為“自殺叛黨、敵性內處、開除黨籍”。

**1979年**袁永熙終於獲得改正，恢復黨籍，擔任北京市經濟學院院長、政協委員，至**2000年**病故。袁永熙之所以能夠熬過文化大革命比反右時更大的衝擊，全仰仗和他在**1965年10月**第二次結婚的妻子張蘭芬。張蘭芬是南宮中學的化學教師，大學畢業，虔誠的天主教徒，為人質樸，性格張揚豪放。文革開始，袁永熙被指為劉少奇、彭真安插在南宮的定時炸彈，打得死去活來，拖出去喂野狗。張蘭芬見勢不妙，直沖縣人民武裝部，對支左部隊領導雙膝跪下，大呼：“救救袁永熙。”她故意挑逗紅衛兵，讓紅衛兵放下袁永熙，轉而批鬥她。特意讓紅衛兵把本來沒有任何問題的她關進牛棚，以便照顧袁的飲食起居。讓他熬過了文革那段艱難歲月。

### 薛尚實(同濟) 地下黨裏右派多

以同濟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薛尚實為首的“同濟大學右派反黨集團”在反右運動中名聞遐邇。黨委副書記兼總務長劉淮以及同濟大學黨委三分之二的委員、共青團的正副書記都是右派反黨集團的成員，戴上右派帽子，開除黨籍。北京師範大學一個班有四分之一打成右派，據說為全國之最。可是同濟大學建築系五九級“卓婭班”全班五十人，居然有十八位學生打成右派，右派比例高達三分之一，事實上為全國第一。

**1929年2月**加入中共、為中共在地下浴血奮戰三十年的薛尚實（**1902-1977**）廣東梅縣人，是葉劍英的同鄉。原名梁昌華，地下工作時化名羅根、孔尚士、孔志誠。幼起讀了十二年私塾，後考入廣益中學和學藝中學。**1926年**秋入讀上海大學，隨即參加中共的地下活動。**1927年**春投身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裝起義，失敗後轉去廣州加入青年赤衛隊，參加廣州起義，失敗後重返上海加入中共。按照中共的說法，在革命低潮時入黨的人是最經受得起考驗的。

他放棄學業從事工人運動，在煙業工會編小報。同年底調入中共江蘇省委秘書處任文書。**1930年**進上海浦東煙廠做工。九一八事變後擔任上海煙業總工會黨團書記。**1932年**秋改任中共上海紗廠總工會黨團書記，同年調入市政總工會，積極領導抗日救亡運動。

**1933年**初任上海市工會聯合會黨團書記。同年**10月**調往天津，任中華總工會華北辦事處主任；**1933年**任中共中央北方局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深入北平、天津和唐山地區組織工人運動。

**1936年6月**，中共北方局書記劉少奇派他到華南加強當地黨的領導，在香港從事抗日統一戰線工作。不久任中共外圍組織華南抗日救國會組織部長。**9月份**起，任中共南方臨時工作委員會書記，主持恢復和重建廣州、汕頭、西江的黨組織，重建中共廣西省工委，加強對瓊崖縱隊的領導。同時協助廖承志、張雲逸開展上層統一戰線工作，領導華南地區抗日救亡運動。

1937年9月，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成立，薛尚實出任副書記兼組織部長。1938年9月改為中共廣東省委，他任常委兼組織部長。同年12月任中共福建省委組織部長。翌年4月，改任中共浙江省委組織部長，9月代理書記，領導閩、浙兩省的地下黨擴大組織。

1940年1月出任中共中央東南局黨校校長。不久轉入新四軍，擔任中共蘇中區委敵工部長和民運部長、蘇中各界抗日聯合總會主任，開展敵後遊擊戰。抗戰勝利後，任華中軍區北線後勤司令部副司令、中共膠東區黨委宣傳部長兼秘書長、中共青島市委副書記。

中共建國後，歷任中共青島市委副書記、青島總工會主席、政協副主席、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這時發生了中共中央山東分局代理書記向明、副書記邢質斌等人的“反黨宗派主義集團”事件。中共中央山東分局書記康生在京養病。他在北京遙控製造了這件冤案，指責宗派小集團包庇按政策釋放寬大處理的反革命分子。受牽連一百多人。薛尚實雖然僥倖免於難，免於處分，但也受到牽連，成為以後劃右的原因之一。

嗣後他被調去上海。他有曾經在潘漢年領導之下參加地下工作的經歷，又受“向明反黨宗派集團”的牽連。因此再也不受重用，職務一路下降。最後僅擔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員、同濟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

以上這些便是他劃右的背景。然而他劃右的直接原因卻是“一霸”事件和同濟大學黨委領導反右不力。

所謂“一霸”事件係指薛尚實在鳴放時批評“一霸”具有“家長作風，獨斷專行，缺乏黨內民主作風”的言論。薛尚實所批評的“一霸”指的是誰他沒有挑明。但是大家都心中有數，他指的不是毛澤東，便是柯慶施。論資歷和貢獻，薛尚實絲毫不亞於柯慶施，他當然不賣柯大鼻子的賬，在上海只有他敢於頂撞“一霸”。薛尚實隨即受到“一霸”的整肅。在中共上海市委，除馬天水、張春橋等少數幾個“一霸”的親信外，宣傳部長彭柏山、學校工作部長等幾位部長都受到“一霸事件”的牽連。

以薛尚實為首的同濟大學黨委當時也抵制了柯慶施下達的右派高指標和無限制擴大打擊面的做法，於是“包庇右派”也成了他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滔天罪行之一。

薛尚實被打成右派分子，開除黨籍，降職使用，調往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當一名普通職工。文革中又受到衝擊，一直受到不公正待遇。1977年病逝於上海，死後才改正。

同濟大學校園內至今還有一個由薛尚實建立的精緻園林《三好塢》。陳從周教授曾著文《三好塢談往》，記敘薛尚實的功績：“三好塢中千尺柳，幾人知是薛公栽。”

薛尚實、陳修良、孫殿才、袁永熙等千千萬萬為中共出生入死的地下黨員在反右以及隨後的文革浩劫中的坎坷遭遇，真是值得人們深思呵。

陳子谷(地質) 富貴於我如浮雲



死

陳子谷 富貴於我如浮雲

“富貴於我如浮雲”這句話是當年新四軍軍長葉挺將軍對陳子谷的評語。縱觀陳子谷的一生，堪稱是個視死如歸、赤膽忠心的革命志士。然而他的信仰、理念屬於中共黨內民主派，為毛澤東和黨內正統派所不容，處處受到排擠、打擊，最終被專制政體所吞沒。中共黨內千千萬萬仁人志士的遭遇，難道不為今天親共、擁共、媚共的憤青們所警惕嗎？

一生坎坷而曲折的陳子谷（**1916-1987**）又名陳子鵠，出身於廣東汕頭港外南澳島的一個貧苦漁民之家。由於家境窮困，孩子眾多，很小便給人販子倒賣給旅居泰國的華商陳崢嶸，成為陳家長孫。祖父十分鍾愛他，少年時在曼谷給予他很多呵護。

十三歲讀完高小，中國大陸的革命浪潮也衝擊到曼谷。他仰慕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不屑過公子哥兒般的優裕生活，瞞著家人，偷偷溜回祖國。先在汕頭讀完初中、高中，接著於**1932**年隻身來到北平，考入中國大學經濟系。翌年轉入外國文學系。他開始接受馬列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影響，參加了共產主義青年團。

當時在進步青年中，東渡日本探求新思想、新文化之風氣甚為時髦。他從小酷愛文學，喜歡寫詩。**1934**年**12**月他去日本，很快參加由中共地下黨員組成的東京《左聯日本分部》活動。他編輯左聯機關刊物《東流》的詩歌部分，出版詩集《宇宙之歌》，分贈魯迅、郭沫若，獲得好評。陳子谷遂以左聯詩人嶄露頭角，開始了他的職業革命家生涯。

左聯革命活動引起日本當局注意。**1935**年秋，東京警察局以莫須有罪名，勒令他出境。他來到香港，即刻投入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運動。經宣俠父介紹參加民族革命大同盟，回國參加兩廣事變，失敗後仍回香港。

**1938**年底他到了延安，進入陝北公學學習。**1938**年**2**月分配到新四軍軍部，來到蘇南敵後由陳毅、粟裕率領的新四軍一支隊政治部工作。**1939**年加入了嚮往已久的中國共產黨。新四軍在**1940**年左右十分困難，部隊的經費、糧食、衣裝都很緊缺。正當此時，陳子谷接到曼谷兩位叔父來信，祖父過世。依照祖父生前留下遺囑，留下遺產分為三份，他和兩位叔父各得一份。根據泰國法律，遺囑繼承人必須到齊才能分。因此要他立即回泰國。

這件大事立刻上報，報到軍長葉挺那兒，葉挺馬上同意，並要他以葉挺秘書的名義，為新四軍向泰國愛國僑胞募捐。在泰國，他從叔父那裏分得二十萬國幣的遺產，又募集到六萬元捐款。

回到新四軍，二十六萬全部上交軍部，解決了全軍二年糧餉和當年過冬寒衣，頓時使新四軍走出困境。葉挺軍長萬分高興，寫了條幅送給陳子谷：“富貴於我如浮雲”。後來在**1956**年，已經當上中共北京地質學院黨委書記的陳子谷也曾收到泰國寄來的四萬元人民幣，他全部上交中共北京市委作為黨費。自己和家人過著節儉清貧的生活。

**1941**年，起因未明的皖南事變爆發，新四軍九千將士被圍，僅部分突圍而出，大部被俘。陳子谷與其他七百多名新四軍俘虜關押進上饒集中營，他編入特別訓練班。

集中營裏，除了苦役勞動，還有洗腦學習，經常請來反共專家上課。某天上完反共八股課，戴著近視眼鏡、文質彬彬的陳子谷突然站出來提出抗議，質問教官。

陳子谷被傳喚到集中營總部，受到長時間輪番毒打，他被打得遍體鱗傷、滿身血污、奄奄一息。幾個人把他裝進籬筐，投入集中營裏的獄中之獄——茅家嶺監獄。由於傷勢過重，昏死十多天，在獄友幫助下，才慢慢康復。

1942年5月26日傍晚，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茅家嶺暴動。陳子谷與二十六名獄友，趁看守一時疏忽，沖進衛兵室，奪械沖出牢房。越獄後經歷數不盡的艱難險阻，過著一年多顛沛流離的生活，在1943年9月回到淮南新四軍總部。

1945年抗戰勝利，他又遭受一次牢獄之災。日本投降時，他擔任新四軍城工部偽軍工作科科长。奉軍部命令，秘密前往南京，商談日軍投降事宜。途中給偽軍拘留，投入蘇州監獄，關了將近一年。1946年7月出獄才回到軍部。

在國共內戰中，陳子谷又為中共立下汗馬功勞。在萊蕪戰役，他冒極大危險潛入國軍第四十九軍營地，與軍長韓練成秘密會談。導致韓臨陣叛逃，李仙洲兵團六萬多人全軍覆沒，共軍取得徐蚌戰役的偉大勝利，這裏面有陳子谷的一份功勞。

中共掌權後，他歷任浙江省人民政府交際處副處長兼中共杭州市委統戰部副部長、浙江省人民政府調查室主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行政處副處長。1952年高校調正時，調他籌建北京地質學院，初任總務長，後任中共黨委書記兼副院長，成為學院最高領導者，俗稱第一把手。

助黨整風的序幕拉開後，地質學院經過上上下下反復動員，教職員工和學生對各級領導提出許多批評和建議。幾年前的肅反運動擴大化，整錯了一些知識份子。陳子谷虛心聽取意見，包括某些比較激烈的批評。他像當時各單位領導的普遍做法一樣，在職工大會上態度誠懇地表態：

“過去我們在運動中整錯了一些好同志，我雖然不知情，也應對此承擔責任，現在我代表黨委向他們致歉，希望這些同志今後振作精神，把教學工作做得更好。”

正當他遵循中央規定的鳴放方針領導全校的運動時，黨內發下閱讀範圍到他為止的毛澤東親自撰寫的內部文件《事情正在起變化》，他不免大吃一驚。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後，立即大抓右派。他一方面違心地執行上級指示，在各系抓出幾個右派；另一方面內心又十分不安，毫不掩飾對這種不道德行為的不滿，一再叮囑各級工作人員，揪右派務必鄭重，千萬不可整錯人。有些在鳴放中說錯話的人，本意善良，並非反黨反社會主義。

他這種善良正直的黨性促使他保護了一些師生，也使地質學院的右派指標難以完成，自然引起上下左右的衛道士的不滿。1958年反右補課階段，批判溫情主義和右傾保守。那時按中共對高校的管治體制，地質學院行政業務歸地質部管，黨委系統和政治運動歸地方黨委，即北京市委管。

在中共北京市委授意下，以地質學院黨委副書記為首的衛道士們，向他們的領導發難，指責他“包庇右派，賣黨求榮”，包庇右派，與右派同罪；完不成反右指標，向右派分子投降。在中共發動的政治運動中，批判者可以污蔑誣陷，受害者沒有申辯權，位高權重的黨委書記亦不例外。陳子谷由中共北京市委批准劃為右派，他拒絕在結論上簽字。



消息傳到新四軍軍長陳毅那裏，陳老總連連跺腳，驚訝地問：“陳子谷怎麼是右派呢？”地質部部長何長工聽了，歎息不已，可是無能為力，因為反右領導權不由他掌握。他的老戰友、老上級都為赤膽忠心的陳子谷扼腕痛惜。

劃為右派後，開除黨籍，解除公職，下放河北省地質局所屬懷安縣右所堡磷礦區勞動。他在勞動間隙，再三再四給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寫申訴信，要求復查他的冤案，均石沉大海，音信還無。

三年大饑荒時期，他眼見週圍農村大刮共產風，農民口糧征光，餓殍遍野。胸中不禁滿腔怒火，他不顧個人安危，還戴著右派帽子，給中共石家莊地委寫信，結果根本無濟於事。這股風是由毛澤東刮起來的，哪里是個別地區、個別部門的問題？

1961年摘帽，調到河北省地質局綜合研究地質大隊當副隊長。不久，文革來臨，他又一次受到瘋狂迫害。造反派強加給他的罪名是：“死不悔改的翻案老右派”和叛徒，不斷地批鬥、毒打，罰他做最苦最累的活。令他扛大木頭獨自上山、給在山上作業的工人送水，一天要往山上挑幾十擔。

有一次實在挑不動了，跌倒在半山腰。地質隊造反派振臂高呼：“下定決心，排除萬難，誓把陳子谷打成叛徒！”他們派人四出外調陳子谷兩次被捕的材料，一無所獲。旁證材料證明他是個頂天立地的真正英雄。

1979年改正了，他卻站不起來。四十多年的折磨摧殘使他只能在病榻上掙扎。勉強工作幾年後，於1987年6月9日他永遠離開了辛酸的人間，這位偉大的詩人和革命家僅活了七十一歲，便被萬惡的暴政吞噬掉了。

他在青年時代是位熱烈奔放的詩人，在新四軍軍部，他寫過這樣一首詩：

別回顧你腳邊的黑影，  
請抬頭望前面的朝霞；  
誰要自由，  
誰就要付出血的代價。

### 黨內內控右派

中共在反右中揪出相當多的黨內內控右派，如項南、艾思奇、錢三強、楊獻珍、喬冠華等。遭到從開除黨籍到記大過等各種處分，預備黨員取消預備期。但不戴帽，內部控制使用。後三位在本列傳中均已提及，本節介紹項南和艾思奇二位。

#### 項 南 改革開放急先鋒

1989年3月27日，離胡耀邦逝世前不久，他在寓所對前來探訪他的朋友語氣沉重地說：“我沒有保護好項南，這是我經常感到不安的一件事。”後來這二句話傳到項南那裏，項南也苦笑著說：“這也不能全怪他。他有什麼辦法？他自



身還難保呢！”接著又說：“耀邦是個好人，只是太軟了。”他們二人之間充滿諒解和自責。

可惜在保守頑固勢力占統治地位的中共黨內，胡耀邦、趙紫陽、項南、任仲夷這樣的黨內民主派都成為了悲劇人物。因為在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之流看來，黨內民主派屬於階級異己分子，等同右派。

胡耀邦（十一）與項南（十一）

項南（1918-1997）是閩西山區連城縣朋口鎮文地村人，出身於革命世家，自稱“閩西大山的兒子”。父親項與年是閩西最早的中共黨員、紅色特工；母親坐過牢；叔父早年犧牲。習仲勳曾經讚譽這個革命家庭是“滿門忠烈”。項南出身在這個紅色家庭，自小受到革命的薰陶。

項與年在1925年入黨，1926年中共派遣他去荷屬東印度群島開展地下工作，那裏有許多福建移民，講閩南方言。項與年離妻別子來到異國他鄉，建立起中共組織，引起殖民當局注意，一年後就把他驅逐出境。項與年回到上海，參加了中共中央特科（紅隊）三科，成為紅色特工，與陳雲、康生、潘漢年、李克農等一起工作。他參加過懲處叛徒白鑫的行動，營救過彭湃，可是沒有成功。

1929年，項南十一歲便擔任福建省連城縣的少先隊長。1930年項與年把母子接到上海，項南便在上海半工半讀。不久紅隊解散，項南跟隨父母回到福建。1937年在中共領導下他同一些青年在順昌縣成立“順昌抗敵劇團”，並擔任閩清縣民教工作隊長。1938年加入中共。

中共在福建省處於地下狀態。不久他便同上級失去了聯繫。他隻身經香港去上海，輾轉來到蘇北鹽城參加了新四軍。1941年在新四軍中重新入黨。先後擔任蘇北阜東縣政府秘書、中共阜東九區區委書記、中共阜東縣委宣傳部長、蘇北五分區專員公署建設處長等職。

1951年起擔任共青團安徽省委書記、中共安徽大學黨委書記；1952年調任共青團華東工委第二書記。1955年進京擔任共青團中央宣傳部部長。1957年起升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

剛擔任書記處書記，便開始了整風鳴放運動。他在團中央舉辦的一次座談會上就共青團的改革和建設作了發言，提出十大建議，得到了共青團幹部的一致贊同。1958年在反右補課運動中，他那些受到普遍歡迎的好建議卻受到嚴厲的批判，被指責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青年運動綱領”。誣指他是共青團內最大的右派，斷章取義地批判他說過“黨的權力大得很”、“高級領導幹部已經在蛻化。共產黨已不能代表人民的大多數”；主張共青團有自由批評黨委的權力，反對民主集中制、反對有領導地進行選舉；厭惡自上而下地佈置工作任務，提出共青團要“三化”（自治化、群眾化、民主化）等，這些都被說成是反對黨、攻擊黨的領導的右派言論。

原來支持和讚賞他的人隨著風向的轉變頓時變臉，由支持改為反對，由讚賞改為打倒，異口同聲地要把他劃為右派分子。幸虧有胡耀邦挺身而出，保護他僥倖過關。但是胡耀邦僅僅勉強保他不戴右派帽子。內控右派、黨紀處分還是逃不過去。

1958年8月初，中共中央授意團中央召開專門批判處理項南的共青團三屆三中全會，8月13日全會通過了《共青團三屆三中全會關於項南錯誤的決議》。《決議》指出：“項南錯誤的

根本點是反對黨，反對黨對團的領導。”，“為了嚴肅紀律，教育全團，全會本著‘思想批判從嚴，組織處理從寬’的原則，一致決議，撤銷項南團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和書記處書記的職務。全會希望項南下定決心和自己的錯誤決裂，繼續深入檢查，徹底改造自己。儘快地真實地回到黨的立場上來。”

在階級鬥爭的年代，共產黨十分講究稱呼，由稱呼可以區別階級成份。在一個人的名字後面加不加“同志”二個字大有學問。加“同志”者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男女一律；加“先生”、“女士”或什麼都不加而直呼其名者，則屬於敵我矛盾，納入階級敵人的行列。決議中對項南直呼其名，表明他的錯誤已經不屬於人民內部矛盾，而是敵我矛盾了。

內控右派通常也要開除黨籍。胡耀邦又出手拉了他一把，沒有開除黨籍，降格為留黨察看二年。這也是僅次於開除黨籍的黨內最高處分了，只不過保住了他的黨籍而已。他被撤銷一切職務後下放農村勞動。次年廬山會議，揪出“彭、黃、張、周右傾機會主義集團”，全國大抓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項南再度被揪出批鬥，並正式戴上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

1962年中央工作會議（七千人大會）後，又一窩風給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平反。平反後，項南轉入農機部門工作，先後出任農業機械部辦公廳副主任和農機局局長。1966年文革浩劫中，他作為漏網右派和走資派二度被揪出送進牛棚關押，造反派輪番對他進行批鬥。

1972年在解放幹部運動中復出，擔任第一機械工業部農機局局長、副部長。1976年中美尚未建交，他便率領考察團赴美考察農機工作。後又赴歐洲、澳洲考察。這些國家的先進農業和中國的貧窮落後形成鮮明對比，給予他強烈的衝擊。他大膽而如實地向最高決策層彙報了發達國家先進的農牧業技術及其管理經驗。

1978年胡耀邦剛出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就致信中共中央組織部，要求過問項南的問題。翌年，中共中央批准了共青團中央要求撤銷1958年作出的《共青團三屆三中全會關於項南錯誤的決議》和為項南同志徹底平反、恢復名譽的報告。項南擔任了農業機械部副部長和黨組副書記。

1981年項南調回家鄉，擔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第一書記。他在任上堅決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論點，充分利用福建省“山、海、僑、台”的特點，大膽改革開放，發展經濟。他的作風樸實無華，有一次他為《福建日報》撰寫的社論僅一百四十字。

中共中央福建省委第一書記項南和中共中央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一位是改革開放的急先鋒，一位是改革開放的排頭兵，把二個南方沿海大省搞成了“解放區”。二位地方大員密切配合了中央胡耀邦和趙紫陽的工作。胡、趙對項、任“放得下心”。在胡、趙、項、任當政的時期是中國最有希望的時期。可惜六四槍響，烏雲又覆蓋了剛露出雲端的太陽。

項南的改革開放自然會引起保守落後勢力強烈抵制。胡喬木在陳雲的支持下首先在中央會議上向項南發難，質疑廈門特區有點兒像“舊中國租界”，福州和日立合資的福日牌電視機廠是“殖民地性質的企業”，項南把鄉鎮企業這個“私生子”看得比“親生兒”還親，如此而已，不一而足。

最後保守勢力利用“晉江假藥案”事件把項南徹底打倒打垮。“晉江假藥案”的起因是

福建省晉江縣陳埭鎮涵口村用白木耳和砂糖製造止咳嗽糖漿。本來是個局部性的問題，誇大為全縣，乃至全省的問題。這是中共為打倒某個人製造事端的一貫手法。項南叫中共晉江縣委書記要實事求是，不要胡亂檢討，一切由他頂著。

在陳雲和胡喬木操縱下，項南被撤銷了中共福建省委書記等一切黨內外職務，受黨內警告處分。但是項南拒不同意，至死拒絕在處分決定書上簽字。**1997年**鬱鬱而終，享年七十九歲。項南留下的作品有《紀念陳嘉庚》、《懷念林巧稚大夫》、《憶廖公》、《紀念全民族英雄林則徐》等。

## 艾思奇 大眾哲學家

中共體制內哲學家艾思奇（**1910-1966**）雲南騰沖人，蒙族，原名李生萱。他是成吉思汗大軍南下時的名將黑斯波里的第十八代後裔。祖父李曰垓是同盟會員，辛亥革命和護國運動的功臣。父親李德潤是滇西華僑儒商，常年往來于雲南各地與緬甸仰光之間，他的中西合璧教育觀對艾思奇的成長有莫大影響。蔡鍔是他父親的義父，臨終前囑託艾思奇祖父李曰垓襄助四川督軍羅佩金多為民國革命作貢獻。

在這樣的家庭背景下，艾思奇從小具有民主意識，聶耳是他的好友。早年留學日本，流寓蘇滬期間與章太炎研究過國學和經史。他可用日文和德文對照閱讀古希臘柏拉圖、蘇格拉底、亞里斯多德，到伏爾泰、盧梭、培根、斯賓諾莎、康得、黑格爾、費爾巴哈的哲學著作。他對中國古代哲學也頗有研究，尤重墨子的實踐觀。

**1935年**入黨，**1937年**赴延安。曾任《解放日報》副總編輯。中共掌權後長期在中共中央黨校工作，先後擔任哲學教研室主任、副校長、校長等職。著有《大眾哲學》、《哲學與生活》、《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艾思奇文集》等。

“救命的書”——《大眾哲學》

**1934年11月10日**，《讀書生活》半月刊在上海創刊，李公僕任主編，柳湜、夏征農和艾思奇任編輯。艾負責撰寫《哲學講話》、《科學講話》欄目，也為《讀者問答》和《名詞淺釋》撰稿。其間他用一年時間，為《哲學講話》專欄寫成二十四篇文章，結集出版，形成後來的《大眾哲學》。

他用通俗易懂的語言，結合日常生活現象，解釋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解釋各種世界觀，著重宣傳共產主義世界觀。如《哲學並不神秘》、《卓別林和希特勒的鬍子》、《貓吃老鼠》、《不是變戲法》等，使哲學走下神壇，為普羅大眾所接受。

《大眾哲學》出版後迅速風靡全國，發行三十二版。不少年青人受這本書鼓惑走上共產革命道路，奔向延安。當時有《大眾哲學》動員十萬青年參加革命的說法，引起國府的警覺。**1931年**顧順章投奔國府後，中共組織在上海被迫收斂，中共領導的上海左翼文化運動萬馬齊喑，哲



艾思奇

學界卻一枝獨秀，脫穎而出，出版各種流派的哲學譯著，《大眾哲學》即是其中之一。艾思奇的書，在共產革命的低潮中救了中共一命。

蔣介石說：“我不是敗給了共軍，而是敗給了艾思奇先生的《大眾哲學》”。

艾思奇女兒李昕東於2012年第4期《縱橫》雜誌著文《大眾的哲人：我的父親艾思奇》回憶她的父親。她記敘道，1984年後蔣介石先生高級幕僚馬壁來到她家，對她和她母親說了一番令人難以置信的話。蔣介石曾經說過：“我不是敗給了共軍，而是敗給了艾思奇的《大眾哲學》。”當時，艾思奇夫人和女兒驚得目瞪口呆。蔣介石怎麼可能說出這種不可思議的話來呢？

原來蔣介石一再說過，得人心者得天下，蔣指的人心可能就是從《大眾哲學》開始失去的。在這以前，蔣介石在1934年2月搞“新生活運動”，目的就是為了贏得民心，他知道人心向背的重要性。當年為了剷除心腹之患共產黨，提出“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原則，並認為“以力服不如心服之有效”，所以把在南昌首先發動之“新生活運動”，作為對付共產黨的“有效之心服工具”，在全國推廣。

正當“新生活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艾思奇的一本《大眾哲學》卻“衝垮了三民主義的防線”。蔣介石曾大發雷霆，指著主管黨務的陳立夫的鼻子怒罵道：“共產黨能寫出這本《大眾哲學》，你們怎麼就寫不出來？”蔣介石不僅把《大眾哲學》推薦給蔣經國、蔣緯國和他的下屬看，而且自己還常年放在案頭翻閱。

馬壁先生（1912-1985）湖南湘潭人，歷任國民政府要職，於1961年返回大陸，任全國人大常委和全國政協常委。他住在北京國務院宿舍區木樨地二十二號樓，他在寓所為艾思奇後人寫下詩卷：

一卷書雄百萬兵，攻心為上勝攻城。

蔣軍一敗如山倒，哲學尤輸仰令名。

卷中用小字注曰：“1949年蔣介石檢討戰敗原因，自認非敗於中共之軍隊，乃敗于艾思奇《大眾哲學》之思想攻勢，1957年提到《大眾哲學》餘悸猶存。特寫小詩七言絕句一首書贈。”1985年馬壁在老家去世。這首詩如今懸掛在雲南騰冲《艾思奇故居》內。

艾思奇怎樣劃為內控右派？

蔣介石如此高度評價的艾思奇，卻為毛澤東和他的鷹犬所不容。可能受到家學淵源的薰陶，艾思奇為人處事作風低調，不善張揚，更不擅長玩弄政治。平日潛心學問與教學，頗有書呆子、老學究氣質。

1953年，兼任中央黨校馬列學院副院長的陳伯達在食堂裏突然走到艾思奇跟前，豎起一個小指頭說：“艾教員是九品官。”意思是說，你的職位比七品芝麻官還要小。在階級鬥爭年代，這位毛澤東政治秘書、號稱中共理論家的陳伯達不會輕易用威脅和嘲諷口吻開這樣的玩笑，必然非同小可，事出有因。

接著陳伯達指責艾思奇就是靠一本書即《大眾哲學》吃飯。這本書錯誤百出，翻開任何一頁都可找到錯誤。從此以後針對艾思奇的各種流言蜚語開始出現。在批判會上，他違心地承認

各種莫須有的錯誤，他希望儘快解脫出來，返回教學崗位。艾思奇解釋道，《大眾哲學》是他年輕時寫的一本書，幼稚之處在所難免，也正因為如此，所以在一直不斷修改中。

陳伯達尋釁滋事後，艾思奇開始不斷檢討，並承諾“以後再也不寫這種粗製濫造的偽劣產品”，他與中國青年出版社簽訂的出版合同就此取消，從1953年起，從1936年至1948年十二年間出版過三十二版的《大眾哲學》便不准再出版了，1958年反右運動後，更從書架上消失掉了。

在1953年7月的三反運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中，中央黨校馬列學院黨委作出結論：“對作為教員的艾思奇在教學與科研中的錯誤進行檢查”，中央黨校決定對他進行嚴肅處理，並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書記處呈送報告，此事不了了之。

據艾女李昕東在文章中說，艾思奇遭到這般突然襲擊，心中鬱悶可想而知。妻子王丹一因醫療事故住進醫院，艾思奇不敢向妻子透露半點消息。艾的摯友、曾任毛澤東秘書和衛生部副部長的吳亮平建議他逕直去找毛澤東申訴，他亦不敢去。

事情遠不到此為止。從上世紀1950年代初到文革以前，中央黨校爆發過三次大論戰，影響擴大至全社會，構成所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預演。論戰雙方的代表中有艾思奇和楊獻珍。這三次論戰本來不過是哲學教學中不同學術觀點的爭論，其中“一分為二”原來是“從現象到本質”科學分析過程中所作的比喻。然而“合二而一”問題一再上綱上線，發展為全國性的政治打擊運動，成為陳伯達、康生等毛澤東鷹犬打擊異己的手段。康生泡制了“三次論戰”的權威史論。在史無前例的十年浩劫中，“三次論戰”又擴大成為“十次論戰”，排斥和打擊政治對手。

至於艾思奇被陳伯達等人在反右運動後期定為內控右派一事，則更為蹊蹺，也更為令人髮指。艾思奇有一次在講解哲學上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的時候，他解釋說，象中國這樣人口眾多的國家，要進行偉大的革命，產生一個領袖是必然的，但是這個領袖由誰來當則是有偶然性的。有的學員當即提出：“毛主席成為領袖是否有偶然性？”艾思奇不假思索地回答：“當然有偶然性”。

中央黨校的學員都是有來頭的縣團級以上幹部。這個問題顯然是個政治陷阱。艾思奇是個犯有前科的人，這樣的回答是徹頭徹尾攻擊偉大領袖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他自投羅網跳進了陽謀圈套。陳伯達抓住機會聯繫他以往一系列“反黨錯誤”，定他為黨內右派分子。

在這一系列“反黨錯誤”中，有一條是與另一名黨內右派柳湜“狼狽為奸”。柳湜是1928年便加入中共的老黨員，長期從事文化和諜報戰線地下工作。反右運動時擔任教育部副部長、中共教育部黨組副書記、教育部機關黨委書記等要職，還是中共八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

反右運動中柳湜被打為右派，由柳湜又牽連艾思奇。早在1934年他們二人在中共外圍組織“社聯”中，有一段合作共事的關係，在上海《申報》和《讀書生活》專欄共同撰稿。因為是文人，有共同語言，以後經常來往，切磋一些學術問題。

劃右的又一個原因是在延安，艾思奇的《大眾哲學》一度受到毛澤東青睞，成為毛澤東座

上客，經常應邀與毛探討哲學問題，並有書信來往。艾思奇把書信和手稿交囑夫人王丹一珍藏，進城後王丹一拿去榮寶齋裝裱這些書信，不料被康生妻子曹軼歐發現，她提議公開發表。艾思奇不同意說“不可招搖”。此事得罪康生，亦為禍根之一。

艾思奇劃為右派上報中共中央書記處未獲批准，卻按內控右派處理。從此以後他成為“內部控制使用”的專政對象，不斷被人打小報告，散佈流言蜚語，諸事煩擾，不堪其憂，使他鬱鬱寡歡，度日如年。因此在1966年3月文革前夕早逝，享年僅五十六歲，但却因禍得福，逃過文革一劫。

## 第五章 中國人民解放軍

### 綜述 鋼鐵長城並非牢不可破

反右運動在黨內是清黨，在軍內便是清軍。如同中共黨內一樣，毛澤東借反右運動之機關起門來清理軍隊的門戶。社會上的鳴放之風也吹進了部隊大院和軍事機關。在總政、總參、總後、總裝等四總部，海軍、空軍、一炮、二炮、裝甲、工程等各軍種司令部以及十大軍區機關內部紛紛貼出大字報，批評領導作風和工作中的缺點。比之社會上的鳴放，部隊內部的鳴放比較和風細雨，也沒有什麼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火藥味。這是因為部隊官兵絕大多數都是經過政治審查的黨團員，而且紀律嚴明。中央軍委有條紀律，部隊鳴放不要走向社會。

除掉按照毛澤東香花毒草六條標準套出一些中下級軍官和軍事工程技術人員中的右派分子外，軍隊上層的反右主要是同反對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和教條主義結合起來的。毛澤東是中央軍委主席，他說：“現在軍事院校奇怪得很，中國革命自己的經驗不講，專門講外國的‘十大打擊’。而我們幾十個打擊都有，卻不講。”又點名蕭克上將：“蕭克這個人很壞，是資產階級隊伍的人。”

蕭克若干年後寫的回憶文章指出，1958年軍內第一次大批判打亂了軍隊正規化現代化建設，給軍事訓練和院校教學遭受極大危害。也開創了軍內大批判無限上綱、無情打擊的壞頭。

當時打擊的矛頭對準劉伯承、蕭克和李達三人。劉伯承元帥時任訓練總監部部長兼最高軍事學院院長和政委，蕭克上將、李達上將任副部長。但是毛澤東這次很怪，定下調子後自己袖手旁觀，不插手不過問。讓主持軍委工作的副主席彭德懷元帥主持1958年5月召開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擴大到師一級。在一個多月中大會批小會鬥，把年老體衰的劉伯承元帥批進了醫院，鬥得蕭克上將咯血。

與會的最高軍事學院訓練部部長蔡鐵根大校挺身而出，為他們辯護，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批鬥的結果，毛澤東撤銷了訓練總監部，縮編為總參軍訓部，解散軍事條令部，蕭克為劉伯承受過，調離軍界，降為王震手下的農墾部副部長。立下“解放西南第一功”的起義將領劉宗寬中將代劉伯承元帥受過，蔡鐵根大校為蕭克頂罪，他們及他們以下一百多位中下級軍官統通劃為右派分子和混入軍內的階級異己分子，開除黨籍，逐出軍隊，監督勞動。蔡鐵



根大校在文革中又以莫須有的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這是中共建國後被槍決的具有最高軍銜的老紅軍。

在反右補課階段受牽連的除劉伯承元帥和蕭克上將外，尚有五位上將。他們是李達上將，批鬥後被免職；周士弟上將，降為空軍副司令員；郭天民上將調軍隊院校賦閑；彭紹輝上將去總參“幫助工作”。只有張宗遜上將反而升任副總參謀長兼軍訓部長。

軍中劃為右派分子的最高軍銜還有陳沂少將、範明少將和童陸生中將。童陸生中將因為地主母親治喪，喪失立場，戴右傾機會主義帽子，按右派處理，開除黨籍，逐出軍隊。陳沂、範明、童陸生、蔡鐵根都是二十、三十年代參加革命出生入死戰功卓著的老紅軍。

軍隊內部究竟劃了多少右派，中共至今沒有解密。中央國家機關和軍委各總部各軍種有大批右派分子被送往北大荒八五〇軍墾農場監督勞動，不少人長眠於此。據八五〇農場史記載，在送來勞改的九二五名右派中，軍隊有一四五名。軍方右派估計總共有一萬五千五百多名，僅海軍有八千多名。全軍尉級軍官打成右派約一萬多人，是軍隊右派的主力。軍隊右派占軍內知識份子百分之五左右，而中共軍隊幾百萬官兵絕大部分出身於農民，文盲和半文盲佔有多數。軍隊右派大多數出身軍事院校和大專院校，思想活躍，具有獨立思考能力，不同於工農出身的軍人。軍方右派大多數同時是黨團員，因此他們在黨內右派中也佔有相當比率。

毛澤東對軍隊的清洗工作由此開始。一年後的廬山會議，劃了彭德懷元帥和黃克誠大將為“彭黃張周右傾機會主義集團”；文革前後先後遭清洗的有羅瑞卿大將、蕭勁光大將、陶勇中將（自殺）、吳瑞林中將（自殺）、趙啟民中將、張學思少將、賀龍元帥、楊余傳、四帥二李、黃吳葉李邱；最後還有林彪元帥。

由此可見，軍隊中的反右運動以及隨之而來的清洗工作的殘酷性和劇烈程度，比之社會上的反右鬥爭毫不遜色。因為這是毛澤東為鞏固政權、維持一黨專政而採取的重要措施之一。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鋼鐵長城並非鐵板一塊。

### 陳 沂 左派將軍當右派

陳沂（1912-2002）是軍中最大的右派之一。他被劃為右派，有一個曲折離奇的過程。陳沂是貴州省遵義市人，原名余立人，1931年參軍入黨後改名陳毅。在陳毅部下工作，兩個陳毅不好區分。陳毅說：“沒有關係，我叫大陳毅，他叫小陳毅。”後來給毛澤東知道了，毛澤東替他改名陳沂。陳沂作戰勇猛，屢建戰功。當過東北野戰軍前線政治部副主任、四野後勤副政委等要職，1955年授予少將軍銜，反右時任總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領導全軍的文藝體育工作。本人著有《萬水千山》、《白山黑水》等多種小說和劇本。人稱“文化將軍”。

1958年初，反右運動進入尾聲，由社會進入黨內。毛澤東



陳沂少將



稱之為“是清黨清團的好機會”，實為文化大革命揪黨內走資派之先兆。反右補課由反對溫情主義開始，掘地三尺，挖出深藏黨內的大鯊魚。毛澤東說，黨政軍中央地方各部門都有，並讓擔任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長的總書記鄧小平下達指標。解放軍下達到三軍總部和各大軍區各兵種。

陳沂本來是總政反右領導小組成員。早先曾對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提出異議，毛澤東批評他“不讓人講話是專制主義”，三次說他“左傾”。眾所周知，陳沂是毛澤東文藝路線的忠實執行者，以“左將”聞名軍內外。左派將軍打成右派，不是陰錯陽差，歷史的誤會；便是毛澤東抓右派抓昏了頭，不分敵我了。

反右運動中，某天在天橋劇場看西伯利亞芭蕾舞團演出。陳沂看見毛澤東坐在前排。幕間，毛澤東主動來找陳沂，拉著陳沂的手笑呵呵地說：“你翻身了”。陳沂聽不明白。毛澤東又說：“這些時右派攻得你好苦呀。毒草總是要出來的。不要怕，出來就鋤嘛！”陳沂回答：“是主席的六條標準保證了我翻身。”某些部隊文藝工作者圍攻他是毛澤東的“御林軍”和教條主義者。這樣一個響噹噹的左派怎麼會跌落右派的泥坑呢？

陳沂是直接受到毛澤東批評阻礙鳴放的軍隊文藝工作的最高領導人。他檢討了自己的錯誤，並親自到軍隊院校動員鳴放，用實際行動糾正自己左傾錯誤。他曾說，我從1927年入黨，一直是跟著黨走的，沒有黨就沒有我，沒有黨，我就會是“解甲歸田無田可種，告老還鄉無鄉可歸”……。這十六個字斷章取義，便可成為他“猖狂向黨進攻”的主要依據。

可是他劃右另有隱衷。反對黨的領導是毛澤東區分香花毒草六條標準中的頭一條。平民百姓反對基層黨支部書記是反黨；小領導反對大領導也是反黨；少將反對大將更是反黨。陳沂的右派帽子來自他與總政治部主任譚政大將在工作中的矛盾。陳沂處事果斷，作風凌厲。建國初期，他受命領導全軍文化建設，組建八一電影製片廠、軍樂隊、八一體工隊、總政文工團，出版《解放軍文藝》和《解放軍畫報》。

他向譚政打報告要求增加管樂。譚政大筆一揮：“有了弦樂還要什麼管樂”，弄得陳沂哭笑不得。為了充實八一體工隊，他向國家體委榮高棠要資金要器材，遭榮白眼。陳沂把他臭罵一頓，找賀龍解決了問題。這樣又引起了譚政的不滿。陳沂頂撞他：“賀龍是元帥，國家體委主任，軍委副主席，我不找他找誰。”諸如此類的事情太多了，譚政懷恨在心，想方設法要整一整他。

到反右補課階段，《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突然拋出一篇配有漫畫的文章《假左派真右派真相大白》，矛頭直指陳沂。陳沂的立場頓時由左向右旋轉了一百八十度。總政組織了大小批鬥會二十五次。1958年2月12日總政幹部大會宣佈開除他軍籍黨籍。要他低頭認罪，他強頭倔腦地聲言：“你們開除我，但我自己不承認被開除！我聲明，我一定會回來的。”語驚四座。總政譚政等領導將陳沂打成右派還不解氣，本來要把他送上軍事法庭，周恩來出面干涉方才甘休，便送他去黑龍江齊齊哈爾市郊監督勞動了二十一年。兵團級的幹部，夫妻兩人只發二十八元生活費，可見整人之狠。

陳毅、羅榮桓聽聞此事十分震驚和激憤。陳毅親自給譚政打電話。譚政回答：“你不瞭解情況。” 啪的一聲掛上電話。陳毅倒抽一口冷氣說：“好傢伙，人家是那樣一位重要的領導，我是元帥也奈他何！” 羅榮桓表示異議：“陳沂同志雖然有某些缺點錯誤，但他所領導的全軍文化工作有很大成績的。” 原來陳沂這一級的高幹，須經毛澤東親自批准方可劃為右派。所以譚政才有恃無恐。

事情並不到此為止。**1962**年周恩來和陳毅陪同西哈努克親王去哈爾濱參觀訪問。陳毅沒有忘記老部下。打電話叫陳沂妻子到北京見他，讓陳沂寫信要求甄別。在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提出了“有反必肅，有錯必糾”的問題。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加速進行黨員幹部甄別工作》的通知，總政準備給他甄別平反了。可是毛澤東又在北戴河會議上發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陳沂又被打成了“陳沂翻案集團”頭子。文革開始，夫妻雙雙入獄，又成為“陳沂黑幫”。直到**1979**年改正。陳沂回憶過去說：“這些年我的一條經驗是不能自殺，身體不能垮，不然他們就高興了……”

陳沂復出前，胡耀邦找他談話說：“二十二年了，真不容易。你有什麼問題？無非是工作中有些霸道麼。” 他於**1979**年至**1983**年擔任上海市委副書記兼宣傳部長。**1983**年至**1989**年擔任上海市人大副主任。

在反右補課運動中，還有一位按右派分子處理而不戴右派帽子的高級將領，名叫童陸生中將。他回鄉為其土改時劃為地主的母親送葬，建立一座以母親名字命名的圖書館。被劃為階級異己分子，開除軍籍黨籍，監督勞動，與右派分子同等待遇。

## 範明 六多將軍

曾任中共西藏工委書記、西北軍區進藏部隊司令兼政委的范明少將，被李維漢譽為“六多將軍”，即“多才多藝、多災多難、多福多壽”。范明曾在軍中為彭德懷起草文章函電，被彭德懷譽為“軍中儒林”。

范明（**1914**-），原名郝克勇，字若庸。**1914**年**12**月**4**日出生於“三秦”之中秦，臨潼縣櫟陽鎮郝刑村的一個耕讀世家。**1926**年春，范明的父親郝鵬程是西北軍楊虎城部獨立騎兵營長，隨楊虎城堅

守西安，任北城總指揮，重創北洋軍閥劉鎮華。劉懷恨在心，派一個連去郝鵬程家抄家，郝家五十多口人被迫逃亡，範明失學務農。範明自小受到良好教育，天資聰穎，十歲便能背誦四書五經和唐詩宋詞數百首，而且還能撰寫詩詞。逃難地耀州附近有一座藥王山，上有供奉藥王孫思邈的藥王廟，不久他背熟了碑文。又經一位高明的道士指點，使他略通醫術。



范明少將（左二）在拉薩群眾大會上

正在他潛心研究醫術的時候，他大哥郝克俊在1930接他到上海讀書，在1932年入團，1933年考入復旦大學，主修中文和哲學。1938年轉為中共黨員，大學肄業後，抗戰時期中共將他派往趙壽山為軍長的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路軍三十八軍任中共三十八軍工委委員、書記以及教導隊長和搜索隊長，做兵運和統戰工作。他不忘研究中醫，經常替官兵看病，獲得好評。

1942年趙壽山派他潛往延安，向毛澤東彙報兵變內情。毛澤東接見了他，替他改名為範明，轉為中共特別黨員，受毛澤東單線領導。

1944年范明回到延安進中央黨校學習。學習中兩派學員發生爭論。教務主任安子文向毛澤東彙報，毛叫來範明，覺得他很有見地，把他推薦給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民主人士李鼎銘。經李鼎銘指導，範明的醫術更有長進，在從政之餘經常為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徐特立、林伯渠等推拿按摩，把脈問切。這是範明第二次會見毛澤東。

日本投降後，他奉調去中共西北局統戰部任處長。國共戰爭時期，範明擔任彭德懷第一野戰軍政治部秘書兼聯絡部長、一野騎六師政治部主任。在彭德懷的指揮下參加了延安保衛戰以及青化砭、羊馬河、蟠龍、沙家店、宜川、荔北、扶眉、蘭州等戰役。作戰勇猛、指揮有度。是一野有名的戰將，很為彭德懷賞識，又一次稱他為不可多得的“軍中儒林”。

中共立國以後，範明擔任第一支進藏部隊，即十八軍獨立支隊的司令兼政委。以後同十八軍共同組成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任工委書記。1955年授予少將軍銜。歷任中共西藏地區工委副書記（書記為張國華）、西藏軍區副司令、第一副政委、西藏自治區第一屆政協副主席、西南軍政委員會駐班禪行轅代表等要職。曾陪同十三歲的班禪進京，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接見。在工作之餘，他研究藏醫藏藥，攀登海拔五千米的高山，採集雪蓮。

1953年範明和張國華赴京參加會議。在京期間，他為中央領導的夫人治癒了包括不孕癥在內的多種疑難癥，中共中央統戰長李維漢多年不愈的耳疾也被他治癒。毛澤東又一次召見了他，武斷地把攻克癌癥的任務交給了他，說道：“現在癌癥對人類的健康威脅很大，大家談癌色變。目前好像還沒有對付這種病的好方法。我想到了你，限你在十年內給我把癌癥拿下來，你看怎麼樣？”又說：“什麼科班不科班，盤尼西林不是染布工人在染布大缸裏撿了一塊大青蘭發明的。”範明推說自己不是科班出身，恐難以完成。毛澤東對科學技術也同樣採取“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態度。

在西藏軍區的反右整風運動中，範明為他寫的小說《新西遊記》突然被批鬥了一百多天，大會鬥，小會批。上面有人誣指他的小說是反黨綱領大毒草。最終揪出一個“範明右派反黨集團”。其成員有中共西藏工委組織部長白雲峰、共青團西藏工委書記的他妻子彭楓。隨其進軍西藏的六百多名幹部均被整肅。範明本人劃為極右分子和反黨集團頭子。開除黨籍軍籍，從行政七級降為十八級。勞動改造後又監禁，長達二十二年之久。李敏傑和朱



光亞發表在《人物》雜誌1995年第六期上的《誰信郎中是將軍》，不提範明的劃右原因。這篇介紹範明的長文中寫道：“在西藏整風反右中，他被打成極右分子和反黨集團頭子，先後發配到東北長白山和陝西大荔農場監督勞動……他冤屈、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在勞動改造期間，他寫了幾萬字的申訴書，表明自己的觀點、立場、態度。”

據一位曾在十八軍工作過的離休幹部說，範明打成極右分子的真正原因，是他對中共的西藏政策有不同看法，比較偏袒班禪額爾德尼，批評了西藏平叛的軍事行動。在反右運動中，並有包庇右派行為，真相如何，尚待揭曉。不過，發生在1984年北京全國政協會議上的一幕頗能說明問題。那天在會場上，範明與班禪額爾德尼不期而遇，二人抱頭痛哭，泣不成聲。引起眾人詫異，轟動了整個會場。

範明少將（左）任中央駐班禪（中）行轅首席代表

1959年的廬山會議，彭德懷的冤案又波及到他的身上。起因是彭德懷在廬山會議的一次小組會上，批評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時，談到了反右擴大化。他當著毛澤東的面說：“範明這個人我是瞭解的。像他這樣的好同志，也打成了右派，那我彭德懷不就是老右派了。”餘音未消，過了幾天毛澤東果真把彭德懷打成了中國右傾機會主義的頭子和彭黃張周右傾機會主義集團的為首分子。隨著全國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的深入開展，又有人聯名寫信給中共中央，揭發範明與彭德懷的關係。列舉範明在歷史上和彭德懷的密切聯繫。範明曾根據彭德懷的旨意，寫了反黨小說《新西遊記》。他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彭德懷分子”和“黑幹將”。毛澤東看了這份檢舉信，十分惱怒。親筆做了批示：“範明的《新西遊記》看了，利用小說反黨又是一大發明。彭德懷的萬言書，範明的萬言申訴書，彭德懷的軍事俱樂部，範明的裴多非俱樂部，不謀而合。這樣嚴重的事件如果不嚴加處理，就會出現納吉事件。”

1962年9月19日晚，僅僅自由了半個月的範明，突然又同白雲峰一起被抓捕了起來，投進了監獄。不久，轉移到北京秦城監獄。比起大荔農場的勞改生活，坐牢的日子更加難過。精神上的折磨和苦悶更加難以忍受。範明百思不得其解，他同彭德懷的關係是清白的。毛澤東前後幾次對自己的批示，顛倒是非、矛盾百出。

從延安時代起，毛澤東同他多次促膝長談，說古道今，十分投機。高談闊論中還流露出對自己的欣賞。把他列為歸自己單線領導的特別黨員。尤其在西藏問題上，範明有不同的認識和處理方法，毛澤東關鍵時刻多次支持了他的立場和觀點。想不到說翻臉就翻臉，完全不像一個偉人和領袖。毛澤東為什麼要這樣對待自己呢？他更不滿意毛澤東對彭德懷的批判，不理解毛澤東對彭德懷和他範明的批語。

從1958年起的強制勞動改造和關押監禁，直到1980年平反的二十二年中，範明唯一享受的“優待”是毛澤東對他的特別“關照”，允許他閱讀隨身攜帶的《易經》、《內經》、《傷寒論》、《金匱要略》和《中國藥學大辭典》等十餘種中醫經典著作，他得以在獄中繼續鑽研中醫。他曾在放風中用拾到的半截鉛筆頭在醫書的扉頁上寫下一則入獄十週年題文：“……昔文王囚於羨里而演《周易》，孫子刖足而兵書成，司馬遷刑而《史記》成。餘雖不敏，心羨先賢，

亦必將於久囚十一年之後，完成《中醫辯證施治與唯物辯證法》之著作，勉之！勉之！”

1980年，他從秦城監獄出來回到了故鄉陝西，當選為陝西省政協常務副主席。從此以後，他把全身心投入到中醫事業，改行治病救人，創辦了“老中醫門診部”和“孫思邈醫藥大學”。年逾九旬，奮鬥不息。

範明的主要著作有《司馬遷》、《史聖司馬遷》、《護送班禪大師榮返西藏》、《把五星紅旗高高地插在喜馬拉雅山上》。

## 劉宗寬 代劉伯承受過的中將

劉宗寬中將（1905-1992），字志弘。陝西蒲城人，與楊虎城家相距二十華里。他家境清貧，好不容易讀完師範，父親讓他回家當鄉村教師，他不肯，毅然投奔楊虎城而去。人們傳說，他是楊虎城的至親。西安事變後，胡宗南“告御狀”，說他是楊虎城的外甥。蔣介石看了看呈文，立即大筆一揮，批他個死刑。後經馮玉祥營救才免一死。實際上劉宗寬在楊虎城的西北軍中，由士兵而將軍。期間入黃埔軍校第三期和陸軍大學。在黃埔軍校他深受周恩來、惲代英、蕭楚女、廖仲愷、鄧演達等人的影響。



劉宗寬中將

1926年1月他剛滿二十歲，在黃埔軍校畢業回楊部任楊虎城侍從副官。在對吳佩孚一戰後，與楊虎城失散。他臨時拉起一支隊伍，名“陝西遊擊縱隊”，自任司令。差一點被國民政府于右任當作土匪拉去槍斃。此後數年一直在西北軍任職，當過副官長、團長，為楊虎城所重用。1934年保送他入讀陸軍大學特別班二期，入學時的軍銜是少將師參謀長和少將副旅長。他在陸軍大學以第一名“武狀元”畢業，被派往胡宗南部，任一支土著部隊的師長。這支土著部隊的軍官聯合起來反他，告他走私販毒，押進了監獄。又要判他死刑，後改為十三年徒刑。一年後保外就醫。他一生中曾三次被捕，二次判為死刑。

劉宗寬自黃埔軍校起一直敬崇和追隨鄧演達將軍，當鄧演達組織第三黨即中國農工民主黨時，他便參加了進去。1945年周恩來在重慶曾家岩五十號宴請農工民主黨負責人章伯鈞、韓兆鶚、郭則沉時，劉宗寬也應邀參加。日本投降後，重慶談判期間，章伯鈞請農工民主黨內的三位將軍劉宗寬、楊子恒和李如蒼出面，宴請葉劍英。此後他便緊跟中共，在國共第二次戰爭時期他出任國民政府西北行轅參謀處長。中共的吳玉章出主意要他利用這個機會打進內部去，為中共做些事情。

從1946年6月到1949年11月，劉宗寬肩負中共的特殊使命，在國民政府的西南長官公署成為一名要員，度過了一千二百三十九個日日夜夜。每當夜深人靜之際，他把收集到的國軍情報寫成文字，繪成圖表，傳遞出去。並利用工作之便掩護和營救中共的幹部。在行轅改為“重慶綏靖公署”後，他改任作戰處長，全部掌握國軍跟共軍作戰的情報。



1948年當國軍節節敗退，中共軍隊步步得勢的時候，中共的劉伯承二野派交通員跟他秘密接頭，他這個共軍的戰略特工開始浮出水面。張群任西南軍政長官後提升他為中將副參謀長，後又任參謀長，權力愈來愈大。他利用職權，精心設計佈局，在國軍的防署中布下了幾個漏洞，並把這幾個漏洞想方設法告訴劉伯承的二野。另一方面，他通過巧妙的安排，拖垮了國軍主力羅廣文部。

在蔣介石主持、由蔣經國等要員參加的“御前會議”上，劉宗寬又策劃了一次“行動”，他誤導了軍事態勢，將佈防重點設在川西北，而讓劉鄧大軍由川東攻入，使中共劉伯承的二野順利佔領四川，粉碎了國軍的西南防線。

重慶解放前夕，國軍的西南防線已被攻破。他在送出最後一份胡宗南軍隊動態的情報，讓中共二野圍而殲之，這位西南長官公署的中將代參謀長便“失蹤”了，潛入了共區。劉伯承、鄧小平高度評價了他為中共立下的功勞，譽他立下了“解放西南第一功”。周恩來說他的作用抵得上一個師、一個軍。他立即被委任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中將高級參議，他完成了從國軍的中將參謀長到共軍的中將參議這一歷史轉折，也令他陷入一場更加深沉的災難。

1950年劉伯承認為中共的軍隊雖然取得了勝利，但遠未擺脫“小米加步槍”的水準。中共立國後，急於要把這支以農民為主體的龐大陸軍改造成為與美、蘇等國抗衡的現代化海陸空軍。軍隊的素質決定於軍官。所以劉伯承主動請纓，建立一座培養解放軍高級軍官的高級軍事學院，自任院長兼政委。他把受過正規軍事教育、有實踐經驗的黃埔軍校和陸大高材生、他的高級參議劉宗寬中將動員來南京參加高級軍事學院的建校工作。委任他擔任軍事學術研究室副主任和合同戰術教授會副主任。他不負劉伯承所托，努力教學，引進先進的軍事教育思想。他決心將餘生投入中共高級軍官的培養事業中來。

這時在中共軍內，開展了一場由毛澤東授意、由國防部長彭德懷元帥領導的反對軍事教條主義和批判“傳播資產階級軍事路線”運動。這次運動的矛頭針對兼任軍委訓練部部長的劉伯承和副部長蕭克、李達、張宗遜、彭紹輝等上將。中央軍委在彭德懷元帥的親自主持下，把體弱多病的劉伯承元帥揪來會場，開了幾十次批鬥會。演出了一場中共建軍以來第一次元帥鬥元帥的活劇。鬥爭的結果，劉伯承稱病靠邊，蕭、李、張、彭等上將撤職降職。而一大批軍官當了他們的替罪羊，在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劉宗寬作為劉伯承重用的“傳播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媒介”，新賬老賬一起算，劃為右派。他那“解放西南第一功”一筆勾銷。實際上他是代劉伯承受過。劉伯承威望太高，毛澤東在那個時候還有所顧忌，不敢動手。便拿劉宗寬中將開刀，成為劃右派的最高軍級。他被開除軍籍，逐出軍隊，轉業到重慶政協工作，文革中又受到衝擊。

1979年改正後劉宗寬任全國政協委員、重慶市政協副主席、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咨監委員會常委。1992年病逝。

郭汝瑰 蔣介石身邊的中共臥底

郭汝瑰（1907-1992）出生于四川省銅梁伊家市達昌池，一個家道中落的書香門弟，父親郭錫柱是當地的教員。郭家的小塊土地由佃農耕種。1919年郭汝瑰隨父親去投靠在川軍中任職的堂兄郭汝棟。郭汝瑰在成都高等師範小學及成都聯合中學就讀。1924年，成都聯合中學的學生因為嫌校長紀律過嚴而發起學潮，迫使校長張錚被軍閥楊森調離，郭汝瑰為積極參加學潮的學生代表之一。楊森任命的新校長揮霍教學經費，大飽私囊，學校的教學品質也大幅下降，學生們對當初帶頭鬧事的學生代表大為不滿，認為早知如此何必當初，不應該反對張錚。郭汝瑰感覺內心不安，非常尷尬，在畢業前就離開了學校。



郭汝瑰晚年

郭汝瑰於1925年進入黃埔軍校第五期。1927年，郭汝瑰按照中共領導人吳玉章的安排，奉命提前畢業，回到四川涪陵策反自己的堂兄、川軍師長郭汝棟。郭汝瑰任第二十軍政治部科員、連長、營長等職，多次參與四川軍閥間的小規模戰爭。1928年5月，郭汝瑰由少校團副袁鏡銘介紹，在四川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郭汝棟部被國民政府調往湖北，並被要求在部隊裏進行清黨，郭汝棟遂禮送自己部隊中的共產黨分子離職，郭汝瑰被安排去日本留學。

郭汝瑰於1931年4月進入日本士官學校，就此與中共失去了聯繫。他在九·一八事變後退學，回國後於1931年底進入蔣中正任校長的中國陸軍大學第十期和廬山軍官訓練團學習。1937年5月任第十八軍第十四師參謀長。

1937年7月7日廬溝橋事變，抗戰爆發。郭汝瑰隨所在的第十四師參加了淞滬會戰和南京保衛戰。他於戰役中代理第十五集團軍第十八軍第十四師第四十二旅旅長，隨後被陳誠提升為第五十四軍參謀長和第二十集團軍參謀長，第七十三軍暫編第五師師長。郭汝瑰後來參加了薛岳將軍指揮的第三次長沙會戰。

1943年，郭汝瑰任國防研究院研究員，中央訓練團第一大隊隊副。1944年以副武官名義去英國考察。1945年回國。1945年3月，郭汝瑰任軍政部軍務署副署長、國家總動員會議秘書等職。

1945年4月，郭汝瑰通過黃埔軍校的老同學任遜猷，與中共恢復了聯繫，他要求公開恢復共產黨員的身份，脫離國軍。董必武告誡他說：“黨要你留在國軍。”中共以單線聯繫、不過組織生活、不交黨費的特別黨員身份，恢復了他的黨籍。郭汝瑰受中共指使，為了保護自己，曾經檢舉另一名中共特別黨員、國防部負責作戰的次長劉斐有共諜嫌疑。劉斐反過來檢舉郭汝瑰為共諜。可笑兩名兩條不同線上的中共特別黨員相互指責對方為“共諜”，也算是中共內鬥的一種表現形式吧！

他首先取得了蔣經國的信任。他在重慶住在蔣經國的住家附近。一次蔣經國去看望他，他正與家人吃飯，二道素菜粗茶



淡飯。蔣經國歎息道：“要是國軍將領都像郭汝瑰那樣，國軍就有救了。”

1946年2月，郭汝瑰任軍事三人小組中國國民黨代表張治中的隨員，並受到國防部長白崇禧的賞識，於1946年6月，任中華民國國防部第五廳副廳長；10月便擢升任第五廳廳長。

郭汝瑰在四年國共戰爭期間與中共間諜任廉儒接頭一百餘次，將國軍的大量軍事機密洩露給共產黨，其中包括徐蚌會戰（中共稱為淮海戰役）前後重點進攻山東計劃、徐州剿總司令部兵力配置、國軍在大別山的調度計劃、解圍兗州計劃、解圍長春計劃、解圍雙堆集計劃、國軍江防計劃、武漢、陝甘、西南等地區的兵力配備序列等等。

郭汝瑰早年

郭汝瑰有意在國軍內部製造混亂，動搖軍心。1947年3月19日，四百名國軍退役將校因“整編”被迫自謀生路而發生的前往南京中山陵的“哭陵事件”，就是因他所制定的方案而一手造成的。

1947年3月，郭汝瑰任陸軍徐州剿匪總司令部參謀長，協同顧祝同指揮中原和山東等地的作戰。郭汝瑰一直對蔣中正隱瞞劉鄧大軍要向南躍進的戰略意圖，最後導致了蔣中正判斷失誤，作出“集中兵力追殲”的錯誤決策，放“劉鄧大軍”突出黃泛區重圍直抵沙河。中共特別黨員郭汝瑰在徐州剿總司令部參謀長任上還依照董必武的指示，設法調任另一個中共間諜、中共特別黨員張克俠為徐州城防司令。1948年11月10日，張克俠等在萬年閘率部起義投共，使徐州防線的東北大門洞開，讓解放軍得以直搗徐州。

1948年7月，郭汝瑰復任國防部第三廳（作戰廳）廳長。1948年9月22日，授國軍少將軍銜。孟良崮戰役中，郭汝瑰將國軍作戰部署抄錄轉交任廉儒。整編七十四師（由七十四軍改編）因此被解放軍以優勢兵力包圍並殲滅，中將師長張靈甫陣亡。

郭汝瑰除向中共洩露軍情外，還蓄意製造國軍內部矛盾，作出錯誤的部署；擬訂讓國軍吃虧的作戰命令；發佈了很多假情報。1948年10月，國軍統帥決定“守江必守淮”，集中優勢兵力於徐州、蚌埠之間的津浦鐵路兩側與解放軍決戰。“徐蚌會戰”（淮海戰役）的具體作戰方案就是由郭汝瑰本人所制定，此方案尚未下達到前線的國軍，就被郭汝瑰報送給解放軍劉鄧的前線指揮部了。郭汝瑰還誘使蔣中正屢次變更作戰方案，放棄堅守蚌埠，在徐州外圍作戰，增加了國軍在移動中被分割圍殲的機會。

徐蚌會戰開始前，邱清泉察覺蛛絲馬跡，在參加徐州花園飯店召開的軍事會議時對郭汝瑰警告說：“你今天這個部署就等於當年項羽在垓下的部署，今天陳毅從濟南下來，也就是等於劉邦當年的情勢一樣。而今時代變了，戰略態勢沒變，我們現在在九里山，也就是當年項羽失敗的地方，這個部署非蹈歷史覆轍不可！”但郭汝瑰置之一笑，毫不理會，繼續我行我素。

徐蚌會戰後，善於揣摩蔣介石心態的郭汝瑰繼續得到蔣介石的器重和信任。1949年7月，郭汝瑰被任命為新編組的第七十二軍中將軍長；隨後升任國軍第二十二兵團司令，直接指揮第二十一軍、第四十四軍、第七十二軍和三個獨立師，負責保衛四川。1949年12月，郭汝瑰在宜賓率部起義，徹底破壞了蔣介石固守大西南的計劃。



郭汝瑰雖然為中共在內戰中的勝利做出鮮為人知的巨大貢獻，周恩來誇獎他，說他所起的作用不亞于十萬雄兵。但中共在1949年以後僅給予他校級軍銜。先安排他擔任副局級的川南行署交通廳長。後來於1951年調任劉伯承為院長兼政委的解放軍南京軍事學院教員、軍事史料研究處副處長、研究員。肅反時南京軍事學院一位起義留用軍官“坦白”自己是“國民黨特務”，郭汝瑰則是國民黨潛伏特務組長。郭汝瑰隨即被逮捕，因董必武等人作保而被“平反”。

在整風鳴放期間，他在中共南京市委召開的座談會上，將心裏的積怨和不滿傾吐了也來：“劉邦入關，約法三章；李世民尊賢納諫，從善如流，所以才能鞏固政權幾百年。我們要力爭民主法制，才能長治久安。”

郭汝瑰因這番牢騷話而在反右鬥爭中被打成右派，開除軍籍，中共特別黨員身份也暗中取消，發配農場勞動。文革中被批鬥，抄家遊街，把他當作國民黨殘渣餘孽拖出來拷打。

直到右派改正以後，1980年4月，郭汝瑰所在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重慶警備區黨委接到了中共中央組織部的通知：“准許郭汝瑰恢復黨籍”。郭汝瑰在1980年代後才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將軍銜，擔任過黃埔軍校同學會副會長，退休後“享受副兵團司令級待遇”。1997年因車禍去世。郭汝瑰著有《郭汝瑰回憶錄》、《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郭汝瑰主編）等書。

劉斐、郭汝瑰都是蔣介石信任的重臣。可是這二位中共特別黨員“身在曹營心在漢”，不為重用他們的“曹營”服務，卻為輕視他們的“漢寨”獻身。而郭汝瑰更否認自己是貳臣，稱一生從未改變過信仰。在徐蚌會戰中被中共俘虜的國軍將領杜聿明當年曾懷疑過郭汝瑰，並當面指責郭小鬼（因郭生得矮小）：“你郭小鬼一定是共諜，你發的命令都是把我們往共軍的包圍圈裏趕！”

杜聿明在《淮海戰役始末》一文中回憶：“1948年11月28日，蔣中正在南京主持作戰會議，照例由第三廳廳長郭汝瑰在《敵我態勢圖》前報告作戰計劃。他說目前共匪南北兩面皆為堅固縱深工事，我徐蚌各兵團進展緩慢，如繼續攻擊，曠日持久，徒增傷亡，不可能達到與黃維會師之目的。建議徐州主力經雙溝、五河與李延年兵團會師後北進，以解黃維之圍。並滔滔不絕地講解這一方案的理由……。我感到蔣介石之所以變更決心，是被郭汝瑰這個小鬼的意見所左右的。我很後悔在28日未對蔣說明我對郭汝瑰的看法……。弄到現在，老頭子聽郭的擺佈，先後函電向解放軍攻擊，已陷蔣軍於全軍覆沒的危險……。現在逃亦晚矣，打也無望。”（摘自杜聿明回憶錄《淮海戰役始末》）

1981年，杜聿明病逝前，郭汝瑰去探望，杜聿明抓住郭汝瑰的手說：“我最後再問你一次，你當時是不是共產黨？”郭汝瑰說：“光亭（杜聿明）啊，我們是屬於政見不同。”這種模稜兩可的回答使臨終前的杜聿明依舊一頭霧水，不知其然。

郭汝瑰的子女後來評價父親說：“他在軍事上是一個大學生，但在政治上卻是一名小學生。”

中共中央軍委在1997年為郭汝瑰舉行的追悼會上，則稱他“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和人民的解

放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

郭汝瑰、熊向暉、韓練成等中共間諜是利用自身在國軍中所處的位置，尤其是利用了胡宗南、蔣介石、白崇禧的信任，近水樓臺先得月。這種先天優勢成了他們後半生用不盡吃不完的存摺，保他們能出將入相，人大政協，封妻蔭子，青史留名。

郭汝瑰既是國民革命軍的中將，蔣介石寵信的重臣；又是中共的中將和特別黨員，反水後，反而成為受冷遇和歧視的棄臣、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心態是十分矛盾的。他在自己撰寫的回憶錄中，用“蔣介石”、“蔣中正”、“蔣校長”、“蔣委員長”等等不同的稱謂來稱呼蔣介石，甚至在同一段落中使用兩種不同的稱謂，顯示其內心的分裂。國軍後人對他的評價為：

“共匪滲透在我方高級作戰參謀機構，製造內部矛盾，幾個重要關鍵的分裂，幾乎都是參謀機構造成的。如邱、胡二部隊的分裂，邱清泉、沈澄年的隔閡，邱清泉、黃百韜的分裂，使後來黃終於死在碾莊。國防部作戰參謀次長、剿總參謀長的受匪滲透，使部隊內部問題叢生。此外國防部也發佈了很多假情報，沒有匪蹤說有，西面沒有匪兵卻說有匪的縱隊，憑空使部隊力量分散，這都是戰局的敗因。”

徐州剿匪總司令部前進指揮部副主任兼十六兵團中將司令官孫元良回憶說：“黃伯韜兵團被殲時，我就當眾說過：‘消滅黃兵團的是國防部，不是陳毅！’叫王澤浚四十四軍由海州撤向徐州、叫黃伯韜帶一個兵團去援救王浚一個軍、叫黃維兵團奔襲千里去雙堆集袋形之地挨打、叫劉峙輕易放棄徐州、叫杜主任的三個兵團在公路上排成無法作戰的難民式長龍淪為龐大軟體動物的，都是劉斐、郭汝瑰。”（孫元良將軍談五十六年前蕭縣突圍秘辛）

## 邵喜德 全國特級戰鬥英雄右派

1950年北京舉行中共奪取政權後的第一屆全國英模大席臺上坐在毛澤東和朱德身旁的是一位英姿颯爽的蒙古族騎戰鬥英雄邵喜德，他是主席團的成員。毛澤東和朱德喜笑顏時同他交談，並在他的筆記本上簽下他們的名字。毛澤東和這種親昵舉動，引起了應邀列席大會的著名畫家徐悲鴻的注會上聽了邵喜德的講話，深受感動。會後，徐悲鴻邀請邵喜的畫室，替戰鬥英雄作畫。徐悲鴻擅長劃馬，畫騎兵戰鬥英充分發揮他的特長。

他最初的構思是讓邵喜德騎在馬上，後來又讓邵坐在高上，可見他化了不止一天的時間為邵喜畫了好幾幅畫。在作劃的過程中，當年年僅二十三歲的邵喜德講起了他的故事，從此他們結為莫逆之交。



會。主  
兵特級  
開地不  
朱德的  
意。在  
德去他  
雄正好  
椅子

邵喜德（1927-2003）是蒙古族人，原名包烏雲達賚。1927年生於黑龍江省泰賚縣六區嘎爾洲屯。出身貧苦，二歲過繼給姑父家，改姓邵。十八歲參加民主聯軍，十九歲加入中共。



1950年朱德接見邵喜德

參軍後歷任戰士、班長、軍事教員、排長、副連長、團參謀長、軍分區科長，最後任內蒙古軍區騎兵師副團長。參加過齊齊哈爾、四平、遼西、遼沈等大小戰役二百多次，策馬衝鋒，屢建奇功。多次獲記特等功和取得戰鬥英雄的稱號。

1946年解放齊齊哈爾戰役，他一人活捉一名少將、三名團長、一百多名士兵。繳獲汽車六輛、大炮四門、機槍八挺；1947年12月，騎兵團奉命向四平以北大窪地區展開攻擊，為主力部隊衝開一條通道。總攻開始，二次衝鋒均被對方密集炮火打退。第三次

衝鋒時，邵喜德冒著兇猛的機槍掃射，躍馬向前。距敵幾十米時，甩掉帽子高喊：“活在馬上，死在馬上，馬刀見血，為人民立功。沖呀！”他奮不顧身地沖向火力點，單槍匹馬斃敵四十多人，繳獲輕重機槍和六〇炮各二門。他的棉軍衣上十幾個槍眼向外冒著血花，僵臥在馬背上，戰友們把他抬下馬來，已經不省人事。

在國共內戰中，他先後參加大小戰鬥數百次，負傷二十多次，有四十餘次騎馬揮刀殺入敵陣，為戰鬥的勝利立下赫赫戰功。家鄉人民為表彰他的英雄業績，授予他一面錦旗，上書“英勇善戰乘馬衝鋒，馬刀見血為人民立功”。

全國英模大會後，邵喜德名揚全國，前程似錦。1954年他被派往南京高級步兵指揮學校進修學習。1957年畢業前夕，全國開展反右派運動。邵喜德生性耿直，直語敢言。他具有成吉思汗後代的剛烈性格，平時看不起不瞭解中國國情又指手劃腳的蘇俄軍事顧問教官，常常愛向他們提些意見，有時還很尖刻。那時一邊倒倒向蘇俄，唯蘇俄的馬首是瞻。因此領導找他談話，批評了他。然而他非但拒不接受，反而據理力爭，頂撞領導。弄得領導下不來台。

反右補課，軍中、黨內也有右派分子的指標。邵喜德的反對蘇俄軍事顧問和頂撞領導的言行，正好像套雞蛋一樣，套進香花毒草的六條標準。批判幾次後，因據功自傲，態度惡劣，被開除軍籍黨籍學籍，前功一筆勾銷，逐出軍隊，發配軍墾農場幹重體力勞動。一幹就是二十年。邵喜德這位全國特級戰鬥英雄、騎兵團少校副團長在解放軍幾百萬官兵的花名冊上消失了，失蹤了。很久以後他對別人說：“我是稀裏糊塗當上了右派的啊。”

邵喜德忍辱負重，從天堂跌入地獄。只有他的夫人、蒙古族同鄉哈森護士認定他是好人受冤枉，一如暨往地不離不棄。在他最困難的日子裏，他時時拿出徐悲鴻送給他的畫冊《未完成作品》，仔細端詳。喊一聲“悲鴻先生”，不禁淚流滿面。徐悲鴻的畫給了他最大的安慰。原來邵喜德在打成右派以後，他牽著戰馬的畫像也打入另冊，成為徐悲鴻的“未完成作品”束之高閣。



徐悲鴻遺作“全國特級騎兵戰鬥英雄邵喜德少校（蒙族）”，邵喜德劃右後，此畫不准展出至今，由徐悲鴻紀念館提供

徐悲鴻紀念館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不迭地更換展品，唯獨邵喜德的這幅“未完成作品”不知何故沒有撤去。邵喜德和徐悲鴻的友情維持了半個多世紀。徐悲鴻的作品給邵喜德生活的勇氣，激勵他在屈辱中挺直腰板。等到改正那一天，邵喜德終於來到北京徐悲鴻紀念館，站立在徐悲鴻給他畫的肖像畫前面。他與曾經是騎兵的畫像中的自己再次見面。他一再感謝大師，大師慧眼識英雄，大師的畫筆也會說話。可惜徐悲鴻已經聽不見他的說話，早已離他而去。

改正以後，恢復了黨籍。地方當局替他安排了一個閒職，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江山區區政協副主席。2003年病逝，享年七十六歲。

聞悉邵喜德逝世的噩耗，徐悲鴻夫人廖靜文發來唁電：“今悉邵喜德同志病逝，他的英雄事跡長留人間。徐悲鴻先生的‘未完成作品’不僅是徐悲鴻的筆墨丹青，還記錄了邵喜德同志的人生遭遇。”

## 楊應森 革命吃掉自己的子弟兵

中國人民解放軍瀘州步兵學校中尉射擊教官楊應森（1931-1964），四川省岳州縣人。出生貧苦農民家庭。自幼勤奮好學，志向遠大。1950年放棄學業參軍，經歷了土地改革和征糧剿匪，在軍中加入中共。抗美援朝戰爭爆發，他積極報名參加志願軍，開赴朝鮮前線作戰，練就一手好槍法。返回成都軍區便在瀘州步兵學校當中尉射擊教官。

1957年部隊院校開展整風運動。楊應森積極回應共產黨的號召，向軍隊領導提出一些建設性的意見。他在會上提出“軍隊國家化”的建議。他反對“黨指揮槍”的傳統建軍路線。這可犯了大忌，“黨指揮槍”的建軍路線是中共自詡為“中國革命的三大法寶”之一，豈容你反對。經過反復批鬥，楊應森被劃為極右分子，開除黨籍，開除軍籍，勞動教養。

他先被押送到四川省公安廳的勞改場所四川新勝勞改茶場。1961年轉移到也屬於四川省公安廳勞改局的四一五築路支隊一〇八中隊繼續勞動教養。這個築路支隊在1958年專門為右派成立時有一萬多名右派。待到文革前夕解散時，只剩下不到一半人。還有一半人槍斃、逃亡、工傷、餓死、累死。楊應森便屬於槍斃的那一類人。

楊應森、周居正、王季洪、曉楓（鐵流）等本書介紹的人物於1961年夏天集中在一起學習。改造了三年多的右派之中突然傳出“清放”回家的消息令人振奮。可是不久之後音訊闕無了。失望之餘未免牢騷滿腹。一天在旺蒼縣白水鎮快活鄉一條小街巷的茶樓裏，右派們擺起“龍門陣”，說話多少帶有牢騷性質。議論起當時正在召開的蘇共二十一大，從新接納了被史達林視作叛徒逐出教門的鐵托和“南斯拉夫馬列主義聯盟”。七嘴八舌地議論中國也應當走南斯拉夫

的道路，三權分立，民主建國。有人信口開河，提議把中國共產黨乾脆改名為“馬列主義者聯盟”拉倒。

這是飯後茶餘擺的“龍門陣”，發一陣子牢騷也就過去了，誰都不當它一回事。但是有一個姓姚的右派，立功心切，加油添醬地打了小報告。無中生有、小事變大，居然演繹成了右派要成立“中國馬列主義反黨聯盟”的驚天大案來。“四一五勞改築路支隊”進行了一次大搜捕，一舉逮捕了多達二百多人。其中六十九人槍斃、判刑。

為首的周居正、楊應森、魏昭天等七人分別關押在灌縣（今都江堰市）四川省公安廳看守所和永川新勝茶場。公安廳看守所關押這批造反右派的地方叫作梓童宮，關的都是重刑犯。楊應森的監號“四〇七”，有老犯人看管，帶上沉重的腳鐐。同案犯曉楓（鐵流）曾形容他：“每個鐐聲感心驚，不知原來是何人？今日倚窗來窺視，方知故人楊應森。”

經過刑訊逼供，許多人頂不住了，亂咬亂供。只有楊應森咬緊牙關一口咬死什麼都不知道，打死也不知道。既不自己隨便承認，也不胡亂咬人。1963年12月的一天，他傳遞給難友的秘密字條上寫道：“馬盟事已起訴，十分嚴重，看來凶多吉少，現在要各自保重，爭取活下來。”另二張字條寫著：“秘密審訊，無一人旁聽，他們宣佈判處我死刑，真未想到。”、“他們決了心就不會放下屠刀，縱然上訴也不會發慈悲，吃屎的狗不會改！死就死吧，只要你們能活下來。”

楊應森很快被轉移到第一監區的十三號死牢。他戴著腳鐐，雙手反銬，已不能活動，反復背誦著文天祥的詩：“自古人生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本來是個體格健壯的運動員，在死牢中雙手背銬照樣做體操，一式一招毫不馬虎。然後聚精會神地靠著牢門閱讀《黃帝內經》。他戴著腳鐐反銬雙手照樣看書，簡直創造了人間奇跡。他上身彎曲下肢微斜，右腿伸直，足尖抬高，把書的一頭放在肩胛上，另一頭緊緊貼住門窗沿，腦袋傾斜，兩目直視書本，用舌尖翻動紙頁，一頁一頁往下看。

1964年3月某天清晨牢門打開，獄吏厲聲高叫：“楊應森出來！”二個肩帶紅布條的武裝行刑隊員陰森森地望著他。他微微一怔，並不慌張。慢慢地站起來，巍然站立在牢房中央，環顧周圍，然後十分平靜地對同牢難友曉楓說：“曉楓，請你把帽子給我戴上。”因為他反銬雙手，無法戴帽。

這是一頂洗得發白的軍帽，他參軍後抗美援朝、當軍事教官一直戴著它；當右派勞改築路也戴著它；而今他走向刑場也要戴著它。“曉楓，我要走了，你要保重。”他最後時刻與難友告別。“慷慨捐軀易，從容就義難。”楊應森二者都做到了。

楊應森挺直腰板、拖著沉重的腳鐐、背銬雙手，踏著晨光而去。周居正則在永川縣新勝茶場同一時辰被槍斃。這一位對中共忠心耿耿的共產黨員把鮮血灑在成都都江堰的岷江河邊。楊應森只活了三十三歲。下午，看守所的牆壁上貼出楊應森和周居正被處決的佈告。共產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子弟兵。“中國馬列主義同盟”冤案至今沒有平反。

## 沈力成 海軍反右受害者

海軍右派沈力成（1931-）上海交通大學船舶動力系畢業，海軍艦船修造部艦船處中尉技術員。1950年4月，海軍領導機關成立，蕭勁光大將任司令員，設立政治部、後勤部和衛生部。1952年成立海軍航空部、海岸炮兵部、軍械部、船舶修造部、工程部和學校管理部，調進一批文化程度高、年輕有為的幹部。沈力成大學畢業時，正是海軍初創時期，他參軍來到北京，進入公主墳的海軍總部艦船修造部，立志要用自己所學的專業知識報效祖國。



海軍右派沈力成和妻子

1957年4月，沈力成在鳴放的高潮中與北京大學助教女友結婚。他經常到北大來探視女友，看到那裏的許多大字報，很受啟發。回到公主墳海軍總部，當時的沈力成才二十六歲，積極參加整風，帶頭貼大字報。作為中尉技術員，出於熱愛共產黨和海軍，在海軍副司令羅舜初中將召開的整風座談會上，他非常坦率地說：“我們不應該只照搬蘇聯，也要學習英美。有的領導人不鑽研業務；領導犯了生活作風問題的錯誤，只在黨內偷偷地關門處理而受到袒護。群眾有問題卻要依法處理。”他的意見引起了大家的關心和注意。

1957年6月上海江南造船廠按照蘇聯轉讓的圖紙建成中國第一艘潛艇。沈力成作為國家驗收委員會委員，參加在旅順海軍基地的試航驗收，該艘潛艇就編入了海軍建制。他隨林真部長回到北京，不久海軍開始反右。10月份起海軍司令部就沈力成鳴放的言論和提的意見進行批判。11月初，在處長找沈力成談話時，他偷眼看到辦公桌上右派分子登記表裏有他的名字，就問處長這是怎麼回事，處長安慰他說，批判以後就沒事了，一切仍按正常上班就是了。11月7日上午，會議室裏掛起了批判右派分子沈力成的橫幅，開大會對他進行批判。

按照上級部門的要求，沈力成上交了自己的日記本。日記中記有“匈牙利事件”、“特權”、“民主自由”、“人權”等字眼。此外，他記載了出差青島時的感想。他在日記中說，青島有幾個海濱浴場被作為禁區，一般人不准入內，這是特權。為了祖國的獨立富強，即便犧牲一點民主自由也值得的。

開了幾次批判會，沈力成和其他四個人被定為右派分子。在艦船修造部的百來人中，按百分之五的比例完成了劃右派的指標。1958年初，沈力成被開除軍籍團籍剝奪軍銜連降三級留隊勞動察看。

海軍總部共有十一名右派分子，其中五位是大尉或大尉級的文職幹部。還有一些人被定為更為嚴重的極右分子，被送往北大荒等勞改農場。留隊的十一個人被編成右派分子學習班，他們都是軍隊裏的業務骨幹，因打成右派而被集中在一起。其中有打過仗的老革命、高學歷的技術專家和有成就的藝術家。

右派班的任務是每天在海軍總部掃大院，後來到十三陵水庫工地上勞動。每天晚上在繁重的勞動收工後還要批判學習。

沈力成的妻子趙根植，195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俄文系，在北大的外國留學生班擔任助教。海軍總部派人來找她外調，外國留學生班的黨政領導幹部多次找她談話，要她劃清界限，揭發沈力成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她抗辯說：“沈力成放棄上海的舒適生活，到海軍來艱苦創業，這就是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的表現。”領導們聽了十分震怒，指出：右派分子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也就是你的階級敵人。指她喪失了中共黨員的階級立場，要她好好反省。動員與她同宿舍的同事揭發她的言行。有人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偷走了她的日記本交給黨支部。他們還動員她離婚，被她嚴辭拒絕。沈力成為了不願連累她而提出離婚也被她拒絕。

之後，黨支部書記和人事科幹部向趙根植宣佈“勸告退黨”的處分。

1959年春，沈力成接到海軍軍事法院的判決書，他被永遠開除出軍隊。9月份右派學習班結束，大多數人被送到北大荒和山西的勞教農場。由於他是交大畢業生，有一技之長，被調到第六機械工業部所屬的上海七〇八研究所從事造船勞動。十年文革時，單位造反派說他思想反動，又被批鬥挨打、掛牌勞動、戰高溫和隔離審查。

1979年右派改正後，沈力成夫妻移居美國。

從1959年至1980年沈力成的工資一直是四十九元。全國提升工資時沈力成和妻子都因為有政治問題而不能升級。1979年，沈力成的右派被改正後，他的工資才恢復到1957年的水準。他們一家五口擠在一間十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間裏。

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在中央軍委五總部中抓了大批的右派分子，他們被送到北大荒八五〇軍墾農場等地，被迫長期勞動教養，不少人長眠在那裏。

## 李凌 空軍右派的泣血控訴

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空軍是1957年反右運動中劃右最多的軍種。因為空軍是技術含量最高的現代化兵種，知識份子最為集中，所以劃的右派也比其他軍種多。

李凌(1925--)是千百個空軍右派中的一位。他出生在廣東省三水縣，父親是小手工業者，家境貧寒。十三歲那年，家鄉被日寇佔領，開始了流亡生活，先逃到香港，後又進入大後方昆明。1942年考入抗日民主堡壘——西南聯大。在西南聯大，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擔任地下黨支部書記。

抗戰勝利後，聯大解散，北上復校。他進入北京大學，繼續做地下黨領導工作。未幾，奉調進入解放區，調入中共中央青委，即青年團中央的前身，到農村參加土地改革，支援解放戰爭。

1949年初，他還在中共中央青委研究室工作的時候，上級通知他調往剛新建的空軍。空軍需要大批知識份子人才，在各單位抽調優秀人才充實空軍。李凌作為優秀幹部，選調到哈爾濱空軍第一航校當政治教員，兼任政治部宣傳科和文化科副科長。從1955年起，調到中央軍委空

軍政治部《人民空軍》雜誌社工作，擔任政治組組長。

1957年整風鳴放運動開始，空軍司令員劉亞樓上將作動員報告。他傳達中央整風精神，號召大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劉亞樓自我檢討說，自己脾氣急躁，常常罵人，影響很不好，希望黨員幹部帶頭給他提意見，貼大字報，幫助他改正缺點。

當時中共空軍黨委要辦一份供空軍高級領導人閱讀的《整風簡報》，政治組成員分頭到空軍各機關看大字報，參加座談會，收集意見匯總在《整風簡報》上。各單位對劉亞樓的意見很集中，但沒有消除對他的顧慮。大字報和文章寫成，誰都不敢署名，害怕劉亞樓秋後算賬，打擊報復。李凌是組長，身上又無辮子可抓。眾人便推舉他出頭署名。

李凌義不容辭，貼出了大字報《向劉司令員吹些和風細雨》，態度極其誠懇，語氣極其緩和，比《人民日報》社論《整風要和風細雨》還要和風細雨。

二、三天后，空軍大院貼滿了大字報，鋪天蓋地聲討右派分子李凌。把李凌先後關押在地下室和樓上一個廢棄的廁所內。怕他跳樓自殺，用木板釘死廁所窗戶，派衛兵在廁所門口日夜看守。從此之後，大小批鬥會不絕，他像只籃球似地給人拋來拋去。

先定性，後找證據，這是中共搞政治運動、階級鬥爭的慣用手法，軍隊亦不例外。劉亞樓、吳法憲在他的家庭出身和個人歷史方面挑不出毛病，便抓住了他的二個現實罪行。第一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發展到反黨；第二是有系統的反黨理論和綱領。

五十年代初，中共掀起學俄文的高潮。李凌為了閱讀俄文原著，刻苦自學，翻譯了二本俄文書籍《成長中的一代》和《捷克斯洛伐克青年》，在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此外，他的文章《論公私合營企業剩餘價值規律的作用和定息的作用》，分別刊載於《大公報》和《新華半月刊》。1957年初因刻苦工作學習，評為空政機關先進工作者，與空軍戰鬥英雄一起，在中南海懷仁堂受到毛澤東、朱德接見。事過半年，便從“先進”淪為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發展到“反黨”。

劉、吳派人搜查他的私人物品，在抽屜裏找出他未發表的文章，其中有他對史達林論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質疑。有許多看法都是他在學習筆記中記下的應予探討的觀點，從未公開發表的學習心得。這便是他第二條罪證“有系統的反黨理論和綱領”的來源。抄家搜查私人物品本來就是違法行為，怎麼可以成為定罪依據呢？

劉、吳抓住他對史達林理論的質疑，性質定為“罪大惡極”，由右派升格為極右。然而判他為極右的真正原因，是因為他出身於地下黨，又是知識份子。地下黨出身的知識份子中共借反右運動之機，清理混進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的大好機會，軍隊亦不例外。

為了搞倒搞臭李凌，吳法憲把他寫的文章列印出來，裝訂成冊，印發全軍。在空政大禮堂，吳法憲主持了有中央軍委空軍、北京軍區空軍、南苑空軍部隊全體知識份子共二千來人參加的批判李凌反黨綱領大會，連續開了六天。而且不容許李凌分辯。

李凌劃為空軍頭號右派後，經軍事法庭審判，開除黨籍軍籍，每月只發二十元生活費。1958年春，由兩名持槍士兵押送，去北大荒虎林八五〇農場雲山畜牧場第三生產隊勞動教養。

在北大荒，右派們吃不飽穿不暖，承受著超體力的沉重勞動。最痛苦的是精神折磨。管教



幹部經常訓斥他們：“你們都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人，你們不但要用汗水來洗清自己的罪惡，還要向黨交心，互相監督，用行動來證明對黨的忠誠。”這是明目張膽地提倡互相告密。

右派們非常羨慕附近勞動的其他勞改犯。他們是判了重刑的反革命、殺人犯、強姦犯、強盜、流氓，他們的勞動改造都有刑期。而判處勞動教養的右派，雖然法律規定的最長勞教期限為三年，實際上是遙遙無期。有一次派李凌等人去燒炭，指定一個勞改犯當組長監管他們。對著一片即將燒炭的水曲柳、山核桃和做槍托的黃鳳梨木，他們向組長反映，用這些燒木炭太可惜了。這就惹怒了組長。他訓斥道：“叫你們燒就燒，別說三道四。別看你們過去是老革命，我是老反革命，今天你們歸我管。你們能不能摘帽，全憑我一句話！”氣焰囂張至極，這是中共實用主義的另一種表現。

李凌感到生不如死，尋求解脫的方法，餓死、觸電、溺斃，都不能死得其所。幸虧他在1959年底第一批摘帽。摘帽後分配到八五〇農場黨校(後改為機械化學校)當政治教員。中共是實用主義者，空軍頭號極右分子，又不認罪服罪，怎麼可能在短短一年多內就改造好了呢？

空軍打李凌極右，是為了完成劃右指標，李凌的條件正好符合指標，相當於“量體裁衣”；一年後李凌摘帽，也符合各項條件，相當於“量體脫衣”。此話怎講？原來場部有一位他原來單位的同事，後來悄悄告訴他，場部領導在研究右派摘帽時，看了李凌的檔案。怎麼看也不像個右派。農場要建黨校，急需政治教員，於是他給套中雞蛋了，摘掉他的帽子，好讓他當黨校的政治教員。黨校學員都是黨員，怎能讓一個開除黨籍的混進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教授無產階級政治呢？真是滑天下之大稽。這是中共實用主義的又一表現。

1963年，把他調回北京郊區通縣麥莊公社任秘書。他的家在北京，開恩讓他家庭團聚。他在通縣呆到1978年右派改正，足足十六年。十六年中他的主要任務仍是勞動，勞動改造思想。他的工作是催耕催種做統計。

文革浩劫中，多次被當作死老虎揪出批鬥，常常打得鼻青臉腫，血流如注。但是他內心所承受的痛苦，遠遠超過皮肉。每當這個時刻，心中默誦著一首古詩來宣洩悲苦的心情：

枯魚過河泣，  
後悔復何及。  
寄書鯁與魴，  
相戒慎出入。

## 彭荊風 昆明軍區裏的右派

《蘆笙戀歌》、《邊塞烽火》、《山間鈴響馬幫來》、《達吉和她的父親》等幾部描寫雲南邊疆少數民族風土人情的電影是大陸中國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少數幾部具有觀賞性的電影。它們之中大多數是由昆明軍區政治部文化部裏的創作員、軍中右派彭荊風和白樺參與創作的。

彭荊風（1927-）於1927年11月22日出生於江西萍鄉。家中貧寒，唯讀過兩年初中便綴學了。1949年在南昌參軍，加入第二野戰軍第四兵團，隨軍來到雲南。做過連隊文化教員、報

紙編輯和創作員，加入中共。入滇後，在瀾滄、西盟等少數民族地區蹲點，同少數民族有較多的接觸，創作了不少炙爛人口的作品。1954年創作短篇小說《當蘆笙響起的時候》，1957年創作《蘆笙戀歌》和《邊塞烽火》。

在1957年的整風運動中，部隊也號召鳴放，向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提意見。彭荊風本來就對於文學作品的層層審查制度和長官意志干涉作家創作自由的做法深為不滿。因此他在一次座談會上發言說：“寫電影劇本要層層送審——過十餘道關卡。那些來自大小官員的意見，有的如聖旨都是命令式的，不改就將犯罪；有的如天書般玄妙，苦思良久也難解其中奧妙——結果使作家不敢輕易動筆，或者只寫些應景文字。”

這種否定黨對文學藝術的領導、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言論自然是典型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向黨的進攻行為。彭荊風被打為混入軍內的右派分子和反黨反軍分子，開除軍籍黨籍，遣送賓川賓居農場強迫勞動。與他在同一個農場勞動改造的還有軍內右派作家公劉和樊斌。

彭荊風被迫得夫妻離異。本來他有一子一女。離婚後兒子歸前妻，女兒歸他。他在賓居農場勞改，還拖著一個少不更事的小女孩。幸而他的女兒乖巧懂事，善解人意。在嚴酷的現實生活中，彭荊風和他的女兒演出了一幕新的《達吉和她的父親》。

1962年右派帽子摘掉後，他依舊是個摘帽右派，無法返回軍中，留在大理，在大理州衛生防疫站工作，編寫《大理衛生》地方性雜誌。不久文革開始，他又陷入了一輪新的更大的浩劫。根據他平時酒後飯餘的談話，他被定性為“反軍亂軍分子”，新舊賬一起清算，關進了監獄，前後達六年之久。他在獄中備受煎熬，他的女兒流離顛沛，也吃盡人間甘苦。

1979年改正後，彭荊風重新復出，回到昆明軍區。部隊裏對他這一個軍中右派優撫有加，提拔他當上了文化部長、宣傳部副部長等要職，離休後享受正軍級待遇。主要作品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尚有《秦基偉將軍》、《鹿銜草》、《斷腸草》、《雲裏霧裏》、《紅指甲》、《瀘沽湖水色》、《綠月亮》、《孤城日落》等。

## 聶毓禪 白衣天使

一位出身名門的大家閨秀，典雅美麗、端莊賢淑、氣質高貴。在清末民初那個時代，她本來可以成為閨房淑女或者賢妻良母。然而她憂國憂民，從小立志，終身不嫁，立誓為中國護理事業披荊斬棘，開創先河，成為譽滿中外的護理專家和護理學教育家。可是她的命運坎坷多乖，屢遭挫折。她的事業和潔白無瑕的一生受到不公正的對待和摧殘。她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三〇一醫院）少將級副院長、軍內右派聶毓禪一級教授。

聶毓禪（1903-1998）原名聶玉禪，出生於河北省撫寧縣都塞鎮。她父親是位開明紳士，熱心教育事業。聶毓禪上有一兄一姐，下有一弟，她排行第三。清朝末年，“重男輕女”和“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盛行。而她的父親卻主張“男女平等”，男女同樣享有受教育的權利。聶毓禪同她姊姊一起，上完父親開設的私塾後，去天津上中西女校。她的學習成績優秀，思想開放。在1919年五四運動期間，積極投身由周恩來、鄧穎超、張若名等人領導的學生運動。

照理憑她的成績和實力，在中西女校畢業後可以直接升入南開大學深造。但是她選擇的醫學專業在南開大學沒有。中國人體弱多病，被洋人誣為“東亞病夫”。她立志學醫，決心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改善中國人的體質。因此她毅然去北平，以優異成績於**1923**年考入協和醫學院預科。

學了一年，她發現中國是既缺醫更少護。護理專業和護理教育在中國幾乎是一片空白。“護理”和“護士”這兩個概念是由美國護士馬克切妮（**McKechnie**）在一八八四年帶進中國的。一八八八年美國人約翰森（**Johnson**）在福州開辦了中國第一所護士學校。“護士”這個行業在中國被視為伺候人的下等人，屬於苦力一樣的低級勞動，被人瞧不起。於是她毅然向學校當局提出申請，要求轉入協和醫學院附屬護士學校學習。她的這個申請使學校當局大惑不解，不可理喻。棄醫習護，天下哪有不願當醫生卻要當護士的傻瓜。

學校當局要她聽取家長的意見，徵求家長同意。她的父親很快給她回信。信中說：“選擇專業是你一生的大事，應由你自己決定之。”這樣，她的抉擇便決定了她畢生的事業和坎坷的命運。

**1927**年從協和護校畢業後，先在協和醫院工作了二年。**1929**年她自費遠渡重洋，先後在加拿大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進修，獲護理學學士學位。**1931**年回國，擔任私立北平協和醫學院護理系教師和北平市第一衛生事務所公共衛生護理主任。在工作中，她發現自己的護理學知識深度和廣度還不夠，決定第二次自費赴美深造，進入密歇根大學，取得護理學碩士學位。

正當她攻讀博士學位的時候，抗日戰爭爆發。聶毓禪義憤填膺，決定放棄獎學金，中止攻讀博士學位，回國參加抗戰。回國探望母親後，她被協和醫學院院長胡恒德（**Henry S Hongton**）任命為協和醫學院護士學校原來由美國人擔任的校長一職，這是第一次由中國人來擔任這個職務。同時她積極參加抗日救亡群眾運動。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佔領了美國資產協和醫學院和協和醫院。她歷盡磨難，將協和護校遷至成都。在艱苦的環境中堅持教學，為抗戰培養了大批護士，送往前線。抗戰結束，她立即將護校搬回北平，用最快的時間，恢復上課。

**1946**年她被選為中國護士學會理事長，率領中國護士代表團參加第九屆國際護士代表大會。她獲得了國際護理界的最高榮譽、中國第一枚南丁格爾獎章。

雖然她擁護和支持中共執掌中國大陸的政權，可是在抗美援朝後開展的肅清美帝國主義影響、三反五反肅反等歷次運動中屢屢受到衝擊，說她是美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在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中，她受到不公正的審查，幾度靠邊，情緒低落，工作遭受干擾。

正在此時，她被邀加入軍隊，擔任軍醫總院副院長，領導全院的護理工作。那個時代，中央首長幾乎都在三〇一醫院治病和保健，中央首長的護理工作尤其重要。所以需要配備一位具



原解放軍總醫院副院長聶毓禪

有她這樣資質和經驗的護理專家擔任副院長。聶毓禪幾番推辭不成，只得從命。當時解放軍總醫院內的各級領導人員，都有靠山和後臺，任人唯親，護理工作難以按規章制度辦事。聶毓禪是非黨人士，非黨人士在軍隊中更加有職無權。可惜她是個事業心極強的人，在其位必須謀其政，一心推行她的護理方案，改變三〇一醫院落後的護理工作面貌。

她秉性耿直，向醫院黨委和總後勤部提了許多忠肯的意見和建議。1957年大鳴大放時期，她在座談會上又就護理工作的改進提出了看法。反右開始，她的新賬老賬被一起清算，污蔑她是“美帝國主義在舊協和的走狗和代理人”。她提的護理工作的意見建議都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多次批判，劃為右派，革除軍職，降級使用，下放安徽省立人民醫院勞動。沒有把她送進勞改農場，那是照顧她年老體衰，喪失了勞動能力。

在醫院裏，她既當清潔工又當勤雜工，清洗繃帶，打掃廁所，髒活累活苦活樣樣都要幹。幸虧安徽省立醫院院長十分同情她，也非常仰慕她。於1962年替她摘掉帽子。院長量身度造，專門為她建立了護理部。在她的精心打理下，醫院面貌煥然一新。

好景不長，不久開始十年浩劫。醫院院長被當作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揪了出來。他的罪名之一便是包庇重用摘帽右派聶毓禪。當時聶毓禪正好因病回京休養，被造反派揪回合肥關進牛棚，又一次陷落地獄，吃盡苦頭，直到1979年改正。

解放軍總醫院重新請她回來當副院長，1988年中國協和醫科大學聘請她為護理部名譽主任。她執教多年，桃李滿天下。她的旅美護校學生為她設立了“聶毓禪獎學金”，獎勵優秀的護校學生。她的海內外學生在她七十、八十歲壽辰時為她祝壽。

1998年8月22日這位偉大的白衣天使因肺部受感染，心力衰竭逝世於北京協和醫院，享年九十五歲。她的幾百名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專程前來為她送行。



張先癡

### 張先癡 張先癡不癡

有人說張先癡“癡怪”，也有人說他一點不癡。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張先癡（1934-），湖北黃崗人，是林彪的小同鄉。其父親是南京國民政府警察總署副署長。因此張先癡理應算是國民黨的高幹子弟。四九年國民黨撤離大陸，他有大把的機會，在國民政府謀個一官半職，或者渡洋留學歐美，混個學位也並非難事。可是他偏不，從小偏聽偏信，中了共產黨宣傳的邪毒，參加什麼學生運動。後來一發不可收拾，國民黨的高幹子弟，與高官老子斷絕父子關係，參軍入伍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雖說本人成份改為革命軍人，但家庭出身永遠是反革命分子。這一點淺顯的道理都不明白，你說張先癡癡也不癡？

他的歷史簡單而清白：十六歲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二十三歲劃為極右分子，勞動教養；二十八歲犯判國罪，獲刑十八年；四十六歲解除勞改、刑滿釋放、右派改正、反革命罪平反……。

張先癡參軍後，表現積極，不久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當然由於他的階級成分，頗費一番周折。入團後擔任團支部副書記。他繼續再接再厲，爭取加入“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解放大西北、進軍四川，他進入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通訊兵團無線電營，在機要部門擔任報務員，及時準確地將情報送達參謀部和作戰部。土改、征糧、剿匪、平叛樣樣領先，立過功受過獎，是個優秀的解放軍戰士。**1953**年他與二十名通訊兵和十部電臺進駐大涼山彝族聚居區，與原始純樸的彝族人民結下了友誼，也目睹了一場民族大屠殺。

可是張先癡熱情過了頭。在鳴放中他這個小兵瞎起勁，反對什麼部隊裏的官僚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向領導提意見，改進工作作風。反擊資產階級右派倡狂進攻的時候，他不善於察顏觀色，反戈一擊。反而替幾位劃為右派分子的戰友說好話，鳴冤叫屈，打抱不平。在這個節骨眼上，他的階級成分起作用了。領導批判說他這是搞的階級報復，反動階級本性的自然流露，把他也打成右派分子。張先癡真癡，此時此刻還不識相，抵死不認罪，爭辯什麼反右是圈套。拒不認罪，罪加一等。

張先癡由普通右派升級為極右分子，開除團籍軍籍，五年強制性管制勞動。他的妻子是四川省南充市文聯幹部，給領導寫了封信解釋：“張先癡決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文聯領導正愁湊不滿右派名額。這一下子自己跳出個右派來。正道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信又轉到張先癡的單位。他的領導指著他的鼻子罵說：“你張先癡不當右派分子，我這裏就再也找不出右派分子了。”這句話倒真是說對了，光陰似箭，過了二十二年，他是最後一個摘帽改正的。在他以後，確實再也沒有右派分子了。他是四川省最後改正的一批右派之一。

**1961**年，他是四川省公安廳勞改局築路二支隊（四一五信箱）二〇八中隊的隊員，參加過修築內昆、成昆、廣旺鐵路線的強制性勞動。三年天災人禍，實在經不住饑餓的煎熬，更主要的是對毛澤東和共產黨徹底絕望了，起了逃跑的意念。他的軍內右派難友、前軍工廠車間主任任世問和成都軍區司令部右派羅鐵夫也有此意，三個人一合計，演出一場轟動一時的勞改支隊大逃亡的活劇來。他一口氣逃到天津塘沽港，乘坐蛇頭的小舢板駛向外輪打算偷渡。眼看小舢板靠近了大輪船，大功將要告成。豈知頓時探照燈大放光明，他被抓住送回築路支隊加強監管，加判四年刑期。

張先癡不服管教，堅持反動立場。加刑勞改期內繼續攻擊三面紅旗，吹捧修正主義，散佈攻擊性反動言論。他密謀策劃叛國投敵，籌集錢糧在一個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密切配合下妄圖經香港投奔自由世界，投靠他的反動父親。抓住後又被從重從嚴加判十八年刑期。其實這是被那個現反告密的莫須有罪名，那個現反立功心切，把他出賣了。張先癡本意是想逃到北大荒林場打工。聽說那邊只要肯出力幹活，可以管你吃個飽。

張先癡自小愛好文藝，劃右前整理過彝族民歌發表。平反改正後進入地方文藝部門工作。**1980**年有人在四川省作協文學院函授部看到他，那時他搖身一變成為函授部的教務長了，著有長篇敘事詩《一朵巍峨的白雲》。人家問他怎麼放出來的，他不多說話，從抽屜裏拿出一張皺

巴巴的《判決書》給人家看。

那張《法刑（七九）字第八〇六號中級法院刑事判決書》上寫道：“……張先癡1958年被判為右派分子勞動教養。六一年以來在議論中對五七年的反右鬥爭、大躍進、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發表過不同看法。同時為彭德懷同志、南斯拉夫總統鐵托鳴怨叫屈，表示過同情、支持和讚賞。由於感到勞動沒有期限，前途悲觀失望。遂起逃跑念頭……本院認為張先癡同志劃右派問題，經原單位復查實屬錯劃，已作改正。勞教期間，對一些問題發表的不同看法是允許的。實踐證明，這些看法基本上是正確的……為此撤銷原判，無罪釋放。”

在判決書下方空白處，法院院長用圓珠筆龍飛鳳舞地草書附記：

一，原判刑期十八年，自1962年12月20日起。1980年自勞改隊調來場部管教科，稱問題已大體解決。

二，1980年7月6日下午五時二十分由XX同志轉交判決書。”

張先癡小心翼翼地又把這份不倫不類的判決書放回抽屜裏鎖好。啟齒一笑、不無譏諷地說：“改正已經夠寬大的了，你還想怎麼著！”

### 白樺等六人 總政創作室的右派集體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文學美術創作室（簡稱總政創作室）是軍隊系統內部最早投入反右運動的一個軍事單位，這和它的工作性質有關。從鳴放開始到組織處理，運動足足搞了一年。在總政創作室開始鳴放時，離它成立還不到一年。1956年在總政文化部臨時創作組的基礎上，從各大軍區調來一些文學、美術方面的創作人員臨時湊合組成。

創作室主任是虞棘（兼電影處長，創作室黨支部書記）、副主任魏巍、文學創作員藺柳杞、丁毅、胡可、杜烽、徐光耀、西虹、周潔夫、史超、寒風、郭光、韓希梁、張桂、沈默君、黃宗江、陸柱國、白樺、公劉、黎白，秘書柳琪祥、夏信榮、美術創作員艾炎（組長）、關夫生、高虹、彭彬、劉畚、何孔德、黃胄、張祖武。其中，胡可是黨支部宣傳委員、黎白是黨支部組織委員。創作室組成後，由於創作需要，由創作室借調代管的各軍區創作人員有徐孔、林予、樊斌、郭良信、孫景瑞。



在鳴放、反右時期，創作員郭光因病未能參加運動。丁毅調總政文工團，西虹調《解放日報》，實際上都沒有在創作室參加反右運動。張桂是反右初期由解放軍文藝社調來後參加運動的。所以，創作室在編人員只有二十七人參加了運動，非在編人員六人中有五人參加運動。實際參加創作室反右運動的總計三十二人。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八人，受中右、黨內處分或遣回單位繼續受批判的有七人，實際上受處分人數十五人，占全創作室內人員將近一半。

白樺

1957年初，總政文化部長陳沂少將在《學習》雜誌上發表了《燈下漫筆》，總政文化部四位處級領導陳其通、陳亞丁、馬寒冰、魯勒聯名在《人民日報》發表《我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幾點意見》。這二篇文章都是站在“左”的立場，反對社會上正在掀起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形勢。在毛澤東參加的頤年堂會議上，陳沂挨了批評，批評他與中央的方針唱反調，反對大鳴大放。

毛澤東的所謂“批評”打擊了不明底細的陳沂和陳其通等四人。陳沂到處做檢查，動員鳴放。以後又喜劇性地從響噹噹的左派一落千丈，直接掉進了右派的泥潭。群龍無首，總政文化系統的反右鬥爭一度陷入無政府狀態。

總政創作室主任兼黨支部書記的虞棘和黨支部組織委員黎白是總政創作室的反右領導人，可是這二位仁兄自身難保。虞棘有人要劃他右派，反右後期幸虧因病住進醫院，他的那樁公案不了了之。總政創作室在抓了八位右派、八位中右和內控右派後解散，無人追究虞棘的右派問題；黎白是丁陳反黨集團在部隊的重要骨幹分子，必須劃為右派。但有幸有神人相助，擔任總政紀委書記的聯絡部長張楨祥堅持不同意劃，改為中右，留黨察看二年，下放勞動。

二位反右運動的領導成為右派的候選人，總政創作室的反右亂成一團。大家又來自四面八方，只有相互揭發。最後揪出徐光耀、艾炎、公劉、何孔德、沈默君、白樺、樊斌、吳占一八名右派；寒風、黎白、林予、韓希梁、劉崙、胡可、張祖武七名中右和內控。二者相加，共十五名。占實際參加運動人員的一半。現擇幾位主要右派介紹如下：

公劉（1927-2003）：江西南昌人，本名劉耿直。著名詩人、作家，從香港回國參軍。肅反時審查關押，企圖自殺。反右時找出他一年內寫的詩《懷古》，內有“昏庸當道，戕盡了男兒志氣”，遂打成右派。反右後中斷寫作，下放勞動。主要著作有電影劇本《阿詩瑪》、《望夫雲》；詩集《邊地短歌》、《離離原上草》、《公劉詩集》；小說《邊境一條街》；雜誌集《正事惡做》、《不能缺鈣》、報告文學集《裂縫》等，多次獲獎。

白樺（1930-）：河南信陽人，原名陳佑華，十五歲發表第一篇詩作用“白樺”名至今。劃右後擱筆多年。八十年代鄧小平執掌政權時，批判他的電影劇本《苦戀》、《太陽和人》等。同王若望、方勵之等在一起被第二次開除黨籍。

徐光耀（1925-）：河北雄縣段崗村人。1938年參加八路軍並加入中共。肅反中審查“丁陳反黨集團”，他應上級要求寫了一份材料，反右時這份材料屬“替丁陳翻案”。主要作品有《小兵張嘎》、《平原烈火》、《昨夜西風凋碧樹》等。改正後任河北省文聯主席、黨組書記。

艾炎（1914-1998）：香港新界沙田人，美術家。原名文譽揚，擅長木刻畫，曾在香港大埔師範學堂學習，抗戰時拒做俘虜跳崖倖存。曾任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教員。1950年後任總政文化部美術創作組長、外文出版社編輯等。

沈默君（1925-）：安徽壽縣人，生於江蘇常州，筆名遲雨，著名編劇。1938年參加新四軍，曾任華東野戰軍總後政治部文工團長。1950年任第三野戰軍文化部創作員時，同沈西蒙等合作著有《南征北戰》等。

何孔德（1925-2003）：四川西充人，擅長油畫。1950年畢業於四川省立藝術專科學校應用藝術科，參加志願軍第十二軍文工團。1955年入中央美術學校。1957年畢業到總政創作室即被打成右派。

樊斌（1923-）：河北阜城人，1939年參加八路軍。畢業於中央文學講習所。著有《雪山英雄》、《楚大明與田涯》、《雪山進軍》、《桑都拉措》、《人面桃花》等。

吳占一（1930-）：東北人。當過總政文化部長陳沂的秘書，曾隨總政副主任甘泗洪上將去參加蘇聯歸還旅順港的儀式。聽到甘泗洪講過幾句對駐旅順、大連蘇軍不滿的話，回來後同幾個人說了幾句，就以反蘇罪名打成右派。

## 歐陽靜戈 軍隊右派的右派之家

香港女作家石貝，現已移居加拿大溫哥華。反右五十週年前夕，她曾回憶起一家六口右派的故事。她的父親歐陽靜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醫學博士、中國民航總局民升醫院院長兼外科主任；二姨夫嵇成武，福建農學院教授；三姨夫楊烈，復旦大學莎士比亞詩劇翻譯家；小舅父梁其昌，水產部高級工程師；二舅父梁其田，上海的南京和美琪電影院經理；大舅父梁其琛，醫學博士、上海第二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外科主任、教研室主任、二級教授。這一家子中國少有的知識精英，組成了一個右派之家。這六位右派知識精英坎坷的命運，委實令下一代石貝女士唏噓不已。

歐陽靜戈（1911-1978），廣東惠陽人士，1937年畢業於廣州光華醫學堂（現為中山大學醫學院）。1932年在校讀書時發起組織醫護隊，與光華醫學堂師生一起奔赴上海抗戰前線，在蔡廷鍇將軍的十九路軍中搶救傷患，救死扶傷。1946年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進修，得醫學博士學位後於1949年回國，響應中共號召參加社會主義建設。

1950年參軍進入時屬空軍的民航總局民升醫院，擔任院長兼外科主任。歐陽靜戈一介書生，埋頭業務，醫術精湛。但對政治卻一無所知。早在1957年反右之前的三反運動中，被打成三反分子，成為“大老虎”。他拒不承認強加予他的莫須有罪名，中共採取各種刑罰對付他，先是車輪大戰，幾個人白天黑夜輪番對他逼供信，將他囚入牢房一個多月，四個人監管，不准與家人通信。他十多歲的女兒，即石貝的姊姊寫信敦促他交代罪行。歐陽靜戈在反右前的鳴放中道出了這個真相，歎息道：“共產黨真是殘酷”。當然這句話成為他劃為極右分子的主要罪行之一。他在鳴放中以自己為例，表達了對三反、肅反運動中令人髮指的整人現象的不滿，他說：“共產黨最大的缺點就是對人民太殘忍，對高級知識份子虐待。中國不只是我一個人，而是幾千萬。死的死了，殘廢的殘廢了，我很同意三反肅反一團糟的說法。”又說：“有人說國民黨殘酷，而共產黨又怎麼樣呢？士可殺不可辱，都是中國同胞，為什麼要這樣對待。”

他對葛佩琦、章伯鈞、儲安平等人的言論表示共鳴，以正直無邪、愛恨分明的態度，勇敢地說出了知識份子的心聲：“共產黨一搞運動別人就得跟著走，否則就是有問題。運動一來，就好像老虎臨門，我希望共產黨以後不要再用恐怖手段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我有些話一直不



敢講，今天號召大鳴大放，我僅講了百分之一，也可能是危險的，不知道要有什麼遭遇。”

他的擔心並非多餘。**1957年10月**空軍黨委專門下達文件，定他為極右分子。總政治部**1958年**批示，開除軍籍，撤銷一切職務，轉交地方留用察看。由衛生技術五級降為醫生三等十級。押送河北省承德專區監督勞動二十年，在樂平縣醫院任清潔工，不准與家人團聚，每逢政治運動又被揪出批鬥一番。

歐陽靜戈的家庭成員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整肅和迫害，連年幼的女兒都不能倖免。在學校裏受到老師和同學的歧視，被迫與父親劃清界限。而且不論你如何劃清界線，依舊抬不起頭來做人。石貝回憶說，這種幼時的感覺仍然記憶猶新，如芒刺在背。

**1978年**，在胡耀邦倡議下，開始為右派改正。石貝讓父親寫一份改正申請。他父親不屑地說：“這頂帽子是他們給我戴上的，我從來就沒有承認過我是什麼右派，為什麼還要我去要求平反？”在子女的請求下，歐陽靜戈為了子女的前途，還是違心地寫了一份申請報告。當有人將空軍總後勤部政治部的一張通知《**1979年**政字第零一九號關於歐陽靜戈同志右派問題的改正意見》送到家裏時，歐陽靜戈已經撒手人寰了，再也沒有機會看到他不屑一顧的改正通知。

歐陽靜戈右派家庭中另三位右派人物是他的三位表兄弟梁其琛、梁其昌和梁其田。梁其琛教授（**1908-2001**），廣東惠陽人。**1932年**獲齊魯大學醫學博士學位。是中國知名的心胸外科專學，是中國心胸外科創立人之一。在**1954年**進行了全國第一例二尖瓣手術，轟動一時。以後又成功地做了一系列心臟外科手術，培養了大量本科生和研究生。這位耿直的心胸外科專家僅僅在鳴放時對工作提了幾條中肯的建議，共產黨便翻臉不認人，一筆勾消他的傑出貢獻，將他劃為右派。

梁其田在一九四零年代表美資聯怡公司，創辦了上海戈登路（今江甯路）上知名的美琪電影院，此前他於**1929年**在愛多亞路（今延安東路）開設了南京電影院。**1951年**成為上海第一家公私合營的試點單位。**1954年**美琪電影院也公私合營。梁其田是上海電影放映院的創辦人之一。反右中難逃劃右的命運。

梁氏三兄弟中遭遇最慘的是老三梁其昌。梁其昌在中共掌權後始畢業於廣州中山大學經濟系。**1953年**分配到北京，在國務院水產部工作。在天子腳下的中央機關工作，使他看到許多腐敗專制的現象，他對共產黨逐漸產生了懷疑。在反右運動中，他的姐夫歐陽靜戈平白無故地蒙冤入獄，引起他極大反感。因此在**1957年**的整風鳴放運動中他仗義執言，給領導提了幾條意見。他指出共產黨不重視知識份子，共產黨用人講究唯成分論，任人唯親，不是任人唯才；歷次政治運動都是整人運動；華僑為中共執政出過很多力，掌權後卻不重視華僑。

他被水產部劃為右派，行政連降二級。**1958年2月**押送洞庭湖漁場勞動，一年後調回北京，半年後又送去寧夏繼續改造。這一去妻離子別二十多年，在寧夏判刑七年，兩次越獄加刑二十年。妻子受盡折磨，得了精神分裂癥。

**1960年9月**，寧夏搞雙反運動，反對壞人壞事。運動中拋出梁其昌這只死老虎祭旗，在毫無證據的情況下誣告他貪污，不經審判便判他七年徒刑。當地十天內抓捕一萬八千人。沒有逮

捕證，不經法律程式，當局按群眾檢舉揭發，根據比例和指標隨意逮捕。寧夏回族自治區是少數民族聚居地，有人藉口民主改革不徹底，有壞人混入革命隊伍而亂抓亂捕。梁其昌是戴帽右派，自然納入壞人之列。

梁其昌在看守所戴上手銬，關了幾天即送軍區農場開荒。一千多名犯人由一百五十多個看守看押。每天定量僅四兩，早晚兩頓稀飯，中午餓肚皮。梁其昌一百二十多斤體重急劇降至九十斤，上坑都沒有力氣要別人幫忙。勞教農場大量餓死凍死人。人一死草草埋掉，屍體被野狗拖出來吃掉。

有人偷偷告訴他，他老婆到銀川來看他了。他覺得他可能很快會餓死，恐怕這是見他老婆最後一面的機會了。便利用倒尿桶的時間，和另一個犯人一起翻越鐵絲網逃出去。梁其昌妻子住在銀川的朋友家裏。待他摸到朋友家裏已經奄奄一息了。妻子給他做飯吃，勸他回去自首，並商量要和他離婚。因為這麼長的刑期要影響妻子和孩子的前途。吃完飯已筋疲力盡，倒頭睡去。醒來一看，滿屋持槍軍人前來抓捕他。妻子在一旁抹眼淚，原來在他熟睡時，妻子去揭發了他。他被押送到另一個勞改農場，禁閉一個多月，上了前銬，加刑二年。

一年後再次逃跑，一共跑出六個人。三個人逃到火車站，準備逃往新疆，在火車站又被抓了回去。他上了背銬，戴十八斤重的腳鐐。禁閉十八個月，又被加判一年刑期。上了背銬、腳鐐生活不能自理，吃飯穿衣大小便靠其他犯人幫忙。八個月後脫下腳鐐手銬，都已無法走路了。

監獄中按勞動態度分甲、乙、丙三級分配糧食和零用錢。甲級每天一斤二兩，每月一元五角零用錢；乙級每天一斤定糧，每月一元零用錢；丙級每日只有八兩，每月五角零用錢。獄中看守隨意打罵犯人，而且讓犯人打犯人或互毆。經常發生打死打傷犯人的情況。中共的牢房是古今中外最黑暗最慘無人道的監獄，對待蒙冤的自已人亦是如此。

雖然梁其昌兩次逃跑抓回，但仍不斷地寫申訴材料。可能因為他是華僑，父母又居住在澳門，獲五年減刑。刑滿後留場就業，俗稱二勞改，不准返回北京與妻子兒女團聚。

1979年梁其昌始獲改正，僅僅摘掉右派帽子。對於他二十多年的冤枉官司，當局沒有任何說法。他的妻子雖然同他離婚劃清了界線。可是在文革中仍然未能逃過劫難。她帶著兩個孩子含辛茹苦地生活。一個喪妻的軍官看中了她，被她婉拒。紅衛兵反復責問，精神受到刺激，得了精神分裂癥。在精神病醫院整天懷抱語錄不撒手，把親生女兒誤當紅衛兵。病癒出院提起往事便會發癲癩病。

梁其昌與妻子重婚後，終算在晚年過上一段平靜日子。

## 張述祖 中國軍工專家

張述祖（1900-1972），江蘇南通人，1929年在東南大學（中央大學）物理系畢業並留校任教。1929年報考江蘇省公費留歐生，在柏林大學物理研究所師從著名物理學家、諾貝爾獎得主納恩斯特所長，研究普朗克教授提出的課題《電壓下不同濃度電解質》。1932年獲得物理學博士學位。再入柏林工業大學工程物理研究所，師從著名彈道學家克朗茲教授研究彈道學，

獲得彈道學博士學位。在克朗茲的指導下的博士論文《幾個重要外彈道解法計算精度的研究比較》，收入克朗茲的《彈道學-補充本》。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他中斷研究課題，經英國、法國、義大利，由威尼斯乘船輾轉到達香港。受聘於遷到武漢的中央大學和南京兵工專門學校（兵工大學）。1939年武漢失守，學校再遷重慶。1947年後，先後被任命為中央軍校普通科教育處長、教授、交通大學、同濟大學和復旦大學教授。

1949年張述祖拒絕去臺灣，被由陳毅兼任校長的華東軍區軍政大學延攬，任該大學軍事科學研究室主管業務的副主任。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他以精湛的技術為從蘇聯購買的喀秋莎火箭炮排除啞炮故障，成為國內著名的軍工專家。1952年任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籌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陳賡為主任委員。他是哈軍工的建院元勳。

1957年6月6日，張述祖在教授座談會上發表了長篇講話：《學院領導沒有摸到高級知識份子的脾氣》，他說：“高級知識份子以感激和慚愧的心情從事工作。感激的是，在國民黨時代忠心耿耿想拿出自己的知識和抱負，使中國富強起來，使國家和自己也能有一天揚眉吐氣。但是歲月悠悠，十年、二十年過去了，在腐敗的政治下一事無成。全國解放了，共產黨來了，土改完成，抗美援朝勝利了，社會主義建設飛躍發展，在這光明的前途下，高級知識份子的激動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大家衷心感激共產黨。高級知識份子絕大多數是愛國的，有正義感。慚愧的是：對解放無功。老幹部身經百戰，出生入死，數十年汗馬功勞，而自己一無貢獻，坐享其成，這是絕大數知識份子，尤其是年老的知識份子，當然我也是其中一個，要靠近組織，靠近黨，努力工作的原因。那麼高級知識份子的力量都發揮了沒有？發揮了，但沒有儘量。其原因是宗派主義的一道高而厚的牆在作祟，由於宗派主義而聯帶產生了有職無權和對待粗暴的現象。”；“我同意楊仲樞同志的看法，三大主義在我院，宗派主義是主要的，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是派生的。我院是軍事性工程學院，因此院內除黨與非黨的矛盾外，還有軍與非軍的矛盾。我院組織機構龐大，行政各級幹部絕大多數是黨員又是軍人，於是無形中就形成了工農幹部和知識份子尤其是和老知識份子間的矛盾。因為在工農幹部看來，知識份子代表著落後，而老知識份子代表著更落後。因此，宗派主義在我院就顯得比在其他院校特別突出。”他列舉了不少關於宗派主義表現的事例，會議氣氛熱烈，隨後發言的人也暢所欲言。

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陽謀”結束，轉入反擊。8月8日校刊《工學》發表文章《向張述祖副部長進一言》，點燃了圍剿張述祖的戰火。署名作者雖然是一個並不認識的二系學員，但誰都知道，這是學院反右領導小組的戰略部署。儘管張述祖於7月3日就在教授座談會上明確表態，堅決和右派分子劃清界線，並開始檢查自己6月6日的發言。接著從7月6日起到11月24日，連續作了五次深刻的檢查，仍無濟於事，右派分子的帽子已經緊緊地罩在頭上了。他寫下了數萬字的檢查，違心地表示要脫胎換骨，抽筋剝皮，剖心割膽，窮盡一切辭彙來表達自己的懺悔和忠心，甚至做對了的往事也去檢討一番。

在這種特殊的年代中，正直的知識份子不得不無奈地自我醜化，自我作賤。家中一片愁雲

慘霧，他把幾個孩子都叫到跟前，嗓音嘶啞地說：“爸爸犯了錯誤，看來學院決定把我劃成右派分子，以後我不能再當教授了。”老伴陳德華忍不住哭泣起來，小女兒見媽媽哭了，也“哇”地一聲大哭起來。張述祖連忙說：“別哭呀，聽我說。爸爸是農民出身，小時候就會種田，一旦學院不用我了，我打算回老家種田去，你們要有個思想準備才好。”

1958年，反右運動經過一年之後，院長陳賡大將對學院其他領導說：“老教師都是從舊社會過來的，有點舊思想是難免的，有錯誤也是允許的。”又說：“張述祖也劃成右派？他到底有多少問題？我看算了，都那麼大年紀了，劃什麼右派？”8月初，總政給學院黨委打電話，專門談了總政關於張述祖不劃右派分子的意見。總政治部正式復函：“經軍委10月11日第一五八次會議討論批示，認為張述祖問題情節較輕。根據中央關於《自然科學方面反右派鬥爭》的指示中指出：“對於情節輕微，右派言論不系統，可以寬大的精神，可不劃為右派分子，按犯有錯誤的人員處理。”

可是他已經當了一年的右派分子，高大的身板變得有些駝背，說話也含糊不清。留德的博士，國內知名的老兵工專家儼然成了一個衰弱的老農。

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全院共抓右派分子一百五十七名，其中極右分子二十名，一般右派分子一百三十七名，占全院人員總數的1.6%。教學人員三十六名，內有講師以上的高級知識份子十四名，占全體教學人員的3.7%，教學輔助人員十一名，占全體教學輔助人員的1.6%；機關人員三十三名，占全體機關幹部2.3%，學員七十六名，占全體學員1.2%。雖然劃右派比例低於地方，但處分嚴厲過地方。一百五十七名右派分子均受撤職、開除軍籍、剝奪軍銜、開除黨籍、團籍、學籍處分。

以下為哈軍工幾位右派分子的情況：

王祿臻，女，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教員。1957年與丈夫楊仲樞教授一起劃為右派分子，剝奪軍銜，撤銷一切職務，開除公職，遣送還鄉。從此失去了工資。她原是湖南大學的中共地下黨員，大兒子在哈軍工也讀不下去了，年初下放高潮時批准去了農村。株連孩子是夫婦倆最為擔心的可怕後果。老倆口欲哭無淚，默默承受著撕心裂肺般的痛苦。

李宇，男，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1957年劃為右派分子，清除出中共。奉國防部長彭德懷的命令，與楊仲樞等七十九名軍官，剝奪軍銜，撤銷一切職務。

王煦和，男，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1957年劃為右派分子。

黃振昌，男，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二年級調幹生。1957年劃為右派分子。

羅伯衡，男，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三期調幹學員。1957年劃為右派分子。與政治部郭華大尉、預科助理員劉剛上尉等共五十五人送往烏蘇里江畔的八五零九國營農場基建六隊勞動教養。一九六零年在超強度的勞役折磨下，兩眼深陷，面容枯槁，大腿和小腿一般粗細，在走出西風山的路上，兩次心力衰竭，失去知覺。幸好從饒河來迎接撤退隊伍的黃醫生給打了強心針，又喂以葡萄糖液摻玉米麵窩頭，把命撿了回來。

許劍玉，男，上海人，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海軍工程系四期學員。1957年劃為右派分子。

送往烏蘇里江畔的八五零九國營農場勞動教養。**1960**年，被指導員誣為偷懶，拳打腳踢，罰喝“蘑菇湯”（刷鍋水），終於倒下了；突然用上海話質問蒼天，斷斷續續地喊著：“為什麼呀？我有……什麼罪過……要把我打成右派？”；“我不甘心……我要，上學啊……我能為國家……做事呀！”夜裏，情緒更加激動，儘管氣若遊絲，還是想訴說心裏話，不管自己的右派帽子能否摘掉，以最後的氣力，以真正的平等人格與時空對話。不久開始喊冷，被張忠信和丁仁正抱出馬架子。哈軍工的夥伴們點起篝火，面對著跳躍的火焰，躺在夥伴們的溫暖懷抱中，面帶微笑，雙淚長流，午夜時分死去了。後來，總場領導竟說“這是帶著花崗岩腦袋去見上帝的階級敵人”，指示基建六隊一定要在墳前立上《右派分子許劍玉之墓》的木牌子，以示死後的懲罰。

于萬祥，男，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工程兵工程系四期學員。**1957**年劃為右派，送往烏蘇里江畔的八五零九國營農場勞動教養。

魏琛，男（**1936-1960**），河北省唐山人，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裝甲兵系三期學員。**1954**年考進哈軍工時年僅十八歲。**1957**年寫過幾張大字報，被認定“煽動群眾反對領導”，打為右派分子。送往烏蘇里江畔的八五零九國營農場教養。**1960**年饑寒交迫中的“龍口奪糧”中，他再也沒有從鋪著小葉樟的鋪位上爬起來，咽氣的時候，兩隻大眼睛死死盯著掛在棚子上的那雙十分珍愛的裝甲兵黑靴子，一句話也沒有留下。哈軍工的五十多名難友一齊放聲嚎啕大哭，為優秀的青年惋惜，為剛死不久的劉玉琦和俞聲朗鳴不平，更為自己沉冤難伸的命運悲傷。南京部隊的右派們也陪著流淚，令人肝膽俱碎的哭聲伴著寒風的嗚咽，在荒無人煙的西風山中回蕩不息。蒼天啊！你為什麼要把這些好人帶走呢？

劉玉琦（**1932-1960**），男，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空軍系氣象員、少尉軍銜。**1957**年劃為右派。送往烏蘇里江畔的八五零九國營農場勞動教養。**1960**年他所在的班接受去西通鎮背蘿蔔美差，作業站離西通鎮三十多華里，臨行前每人發了一個半斤重的全麥粉饅頭，這就是一天的伙食，要求儘快把蘿蔔背回伙房。在通往作業站西風山的崎嶇山路上，每個人背著二十來斤重的蘿蔔，搖搖晃晃地走著，這兒離西風山還有二十多里，他走最後，艱難地喘著粗氣，實在邁不動步了，身體一斜，癱坐在地上，想休息一會兒。前面的人喊了聲：“你歇一會兒，慢慢走吧！”就被扔下了。本來心臟一直不好，加上低血糖，又餓又累又凍，就死在半路上了。

張予禮，男，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海軍系學員，**1957**年劃為右派。送往烏蘇里江畔的八五零九國營農場勞動教養。**1958**年在完達山伐木時，小腳被軋傷，不得不截肢。

郭自強，男，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軍區部隊軍官，**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原是在朝鮮戰場立過戰功的志願軍；送往烏蘇里江畔的八五零九國營農場六隊勞動教養。

俞聲朗（？-**1960**），男，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工學報》編輯、中尉軍銜。**1957**年劃為右派。一九六零年，他又餓又累又凍，病倒了。白天大家都出工割大豆，隊幹部不許留人照顧，一個人孤零零地躺在馬架子裏，沒有人送一碗熱湯。幾天後，吃不下東西了。只瞪著兩隻眼睛，嘴角囁嚅著妻子和女兒的名字：“真夠難為她們的啦！我真是對不起她娘倆。”有一次收到妻子的來信，夜裏捂著被子偷偷地哭泣，原來老婆來信要“劃清界線”，為了孩子，要離婚。唯

一的希望破滅了，帶著對妻子和女兒的無限思念和當作家的夢想，慢慢閉上了雙眼，離開萬惡的人世。

張成冰（1932-），女，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工程兵工程系繪圖員，1957年劃為右派分子，年二十五歲。送往烏蘇里江畔的八五零九國營農場勞動教養。

鄭元喜（1902-？）男，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實習工廠材料科科長、八級鉗工，1957年劃為右派分子。送往烏蘇里江畔的八五零九國營農場勞動教養。

鐘異，男，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物保部軍需處助理員、上尉軍銜，1957年劃為右派。送往烏蘇里江畔的國營農場勞動教養。

劉剛，男，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預科助理員、上尉軍銜，1957年劃為右派，送往烏蘇里江畔的八五零九國營農場勞動教養。

李國棟，男，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1957年劃為右派後，轉交地方實行留用察看。轉交地方實行留用察看的哈軍工共有三十六人。

葉守芳，男，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學生，共青團員，1957年劃為右派分子，開除團籍，被開除團籍的右派分子有七十二人。他以“歷史上犯有反共反人民罪行”而作為反革命分子處理。由院政治部保衛部陳怡部長宣讀黑龍江軍區軍事檢察院《對哈軍工右派中的反革命分子的處理決定》後，當場逮捕法辦。

戚保葉，男，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1957年劃為右派分子，以“歷史上犯有反共反人民罪行”而作為反革命分子處理。由院政治部保衛部陳怡部長宣讀黑龍江軍區軍事檢察院《對哈軍工右派中的反革命分子的處理決定》後，當場逮捕法辦。

曾令准，男，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1957年，劃為右派分子，以“歷史上犯有反共反人民罪行”而作為反革命分子處理。由院政治部保衛部陳怡部長宣讀黑龍江軍區軍事檢察院《對哈軍工右派中的反革命分子的處理決定》後，作為反革命分子論處。

馬家和，男，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1957年劃為右派分子，以“歷史上犯有反共反人民罪行”而作為反革命分子處理。由院政治部保衛部陳怡部長宣讀黑龍江軍區軍事檢察院《對哈軍工右派中的反革命分子的處理決定》後，作為反革命分子論處。

孟煥章，男，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1957年劃為右派分子，以“歷史上犯有反共反人民罪行”而作為反革命分子處理。由院政治部保衛部陳怡部長宣讀黑龍江軍區軍事檢察院《對哈軍工右派中的反革命分子的處理決定》後，作為反革命分子論處。

李鐵健（1938-），男，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五期學員，父是革命老幹部，母是革命烈士，可謂根紅苗正。只因為替右派分子打抱不平，自己也被打為右派分子，進了關押右派的警衛營，時年十九歲。

季新全，男，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教員，1957年在中共支部會上說：“就這幾句話就當右派？”結果引火焚身，被打為右派分子。

郭華，男，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政治部幹部部正營級幹部、大尉軍銜。1957年幹部部楊川

科長開會時說：“人家政治部反右搞得好，已抓出好幾個右派了，我們幹部部落後了，一個右派也沒有，怎麼辦？”郭華自以為出身好，十幾歲就參加革命，有光榮的歷史，一直是個好幹部，就挺身而出對楊川說：“要不，你把我報上去算了。”結果真的被湊了數，劃為右派分子。教育長張子明為此直拍大腿，想阻止也來不及，暗自歎息不已。郭華被送往烏蘇里江畔的八五零九國營農場勞動教養。

楊秋澄，男，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空軍工程系教師，是系裏反右領導小組成員，在復查右派材料時，總覺得這些人說的話與自己的想法類似，就向系領導彙報，要求退出領導小組：“我也有和他們一樣的想法，所以我不能領導反右。”結果就被劃為右派分子。

丁仁正，男，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海軍工程系四期學員，**1957**年劃為右派分子。

陳文壽，男，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海軍工程系一期四年級學員，只因為給科主任貼了大字報，被劃為右派分子。原是王震將軍的秘書，由王震親自推薦上哈軍工，四年來品學兼優。後與王琬等共四十七人被送到黑龍江省工業廳勞動教養。

李航，男，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1957**年他被劃為右派的原因是公開說“這下子經濟基礎（薪金）與上層建築（前途、名譽等）全完了。”

趙志善，男，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工程兵工程系部隊工程科主任、中校軍銜。**1957**年，劃為右派分子，並成為“林高趙反黨集團”頭目之一。

高國珍，男，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工程兵工程系部隊工程科五期學生，**1957**年劃為右派分子。

李景潤，男，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工程兵工程系部隊工程科四期學生，**1957**年劃為右派分子。

顧松奇，男，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1957**年劃為右派分子，轉交地方實行監督勞動。轉交地方實行監督勞動處理的有三十九人。

## 郭堡右派群體

郭堡不是人名是地名，是中共中央軍委直屬機關和各軍事院校揪出來的三百二十名軍隊右派集中勞動的地方。郭堡已經在反右運動史上成為一個軍隊右派勞動的代名詞了。五十多年過



去，郭堡右派群體逐漸凋零萎縮。然而活著的郭堡右派依舊在懷念這個苦難的地方，回憶著當年的難友和一個個苦澀而又真實的故事。

在當年海軍海政文工團右派創作員周永熙的組織下，自費編寫出版了沒有書號和出版社的文集《郭堡，你可曾記得……》，以及影集《我們曾相逢在郭堡》。昔日的戰友拿起筆來，以筆代槍，寫出一篇篇回憶自己

和離去戰友的苦難人生，彙集成冊。巧妙地避開中共嚴密的審查制度，在地下出版、傳閱。

沈蘇斐（1930-）原來在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上學，1949年中共掌權後，因嚮往“民主自由的新中國”，歷經千辛萬苦搭乘海輪返回上海，輾轉進入海政文工團擔任女高音歌唱家。萬萬想不到她的這一投共之舉居然反而成為她和子女終身災難的根源，在反右中被誣為臺灣特務，與她的老師女高音歌唱家張權一起劃為右派。她寫了自傳體回憶錄《我想有個家》，記敘她與夫君周永熙悲歡離合的一生，已另文出版。她給我們看她早年的照片，在她當右派的時候，還是個梳著羊角小辮子的天真小姑娘呢。



周永熙、沈蘇斐夫婦劃右前的照片

周永熙（1929-）浙江溫州人，就讀于南京國立戲劇專科學校專科部理論編劇班，在學校中積極參加中共組織的學生運動。南京易幟時，他立即參加首先進城的第三十五軍，任文工團員。1950年調海軍，先後在華東軍區海軍文工團和海軍政治部文工團（海政文工團）工作。1949年入團，1954年入黨。在肅反運動中，某晚在和老同學聊天中隨便說了一句：“胡風這是對周揚有意見吧？”、“如果都照胡風說的辦，文藝界可要天翻地覆了。”這二句話在反右中被人檢舉揭發，隔離審查，劃為右派開除黨籍軍籍，押送郭堡勞動。

周永熙已年逾八十歲，銀絲披頭，走路要靠拐杖。但是精神矍鑠。夫妻倆都是離休幹部，兒子移居美國。他們晚年生活十分充實。沈蘇斐擔任蘇州女子合唱團團長。周永熙忙於收集右派的資料，為戰友、也為自己撰寫回憶錄。他正著手編寫《郭堡，你可曾記得……》第二部文集。周永熙是作家，又是詩人。他著文《踩雷記》追述他被錯劃右派的經歷。作詩《我不是第一》來抒發他心中的忿然不平：

我不是第一/也不是最後一個/騎著疲憊的駱駝/想跨過中世紀的沙漠/我不是第一/也不是最後一個/仰望著飛瀑三千丈/解不了要命的乾渴/我不是第一/也不是最後一個/整天磨損著自己的神經/用一把帶鏽的鋼銼/我不是第一/也不是最後一個/揚起漫天的紙錢灰/卻當作彩蝶飛過/我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高興的時候哭著唱歌/痛苦的時候笑著哆嗦/唉呀！我不是第一/也不是最後一個呀/咬碎了我的舌頭/依然學不會沉默。

郭堡是一座水庫的名字，位於山西省中部太谷縣。太谷古稱陽邑。因春秋戰國時期晉侯將陽邑賜于大夫處父為食邑而得名，西漢置陽邑縣，至今已有二千多年歷史。北周時遷至今縣治，隨開皇十八年，即西元598年，陽邑改名為太谷。太谷是座故城，縣城建於西晉，因此頗多名勝古跡，國民政府的財長孔祥熙的老家也在這裏。太谷是晉商的發源地之一，後來又是共產黨老區根據地，中共在1926年便在太谷建立支部組織。

1958年反右運動剛結束，中共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要求國防部長彭德懷支援部隊的技術力量，修建郭堡水庫。部隊沒有轉業幹部，彭德懷便把中央軍委直屬機關和軍事院校三百二十名右派送往山西太谷縣修建郭堡水庫。三百二十名右派分成三個“鍛鍊大隊”，第一大隊由海軍



直屬機關、裝甲兵、炮兵、工程兵、駐山西第十、十二航校和山西軍區的右派組成；第二大隊由空軍直屬機關組成；第三大隊由總政、總參、總後、軍委直屬五院和防化兵學校組成。一年後水庫建成，大部分右派在山西就地分配工作。

在這三百二十名右派中，黨員有九十二人，團員一百三十五人。有的是八路軍、新四軍的老戰士，有的剛從朝鮮戰場帶著硝煙回來。有的留蘇學成歸國、有的是飛機製造工程師。他們中有戰鬥機駕駛員、坦克手、戰鬥英雄、立功受獎者。軍隊是共產黨和毛澤東賴以生存的槍桿子，這些右派原來都是經過政治審查絕對忠誠可靠的軍中精英。

這三百二十名右派，僅占全軍軍官中挖出的、有據可查的右派16000多人中的一小部分。在殘酷的階級鬥爭歲月，這批人過著煉獄般的生活。文化教員徐中行、劉惠民和張世彩是最早揪出來的，大煉鋼鐵修建小高爐時，弧形磚砸碎多了，誣衊他們搞階級破壞，把他們批鬥後立即當現行反革命逮捕入獄。徐中行冤死在獄中；佟惠林在文革中不堪受辱，跳入自己建造的水庫自殺；帥學立身無分文，貧病交迫，身上縛著石頭投河自盡；有人在右派帽子之上又加上反革命分子或壞分子的帽子；陳挺、張英敏戴過三次右派帽子。

大多數軍官摘帽後依舊當摘帽右派，永遠是沒有尊嚴的政治瀝民。他們在政治高壓令人窒息的氣氛中掙扎了將近二十二年。在三百二十人中有八十多人已經離開人間。

郭堡右派中軍銜最高、年齡最大的當數周宏達中校，1920年出生，1937年底參加工作，1938年3月入黨，1939年參軍。在1947年立有戰功，1957年擔任中共中央軍委政治部保衛部中校助理員。在五七年整風運動中他響應總政副主任甘泗淇上將的動員報告，積極向領導提意見。甘泗淇說：“意見儘量提，罵娘也可以，可不要開槍打人。”

周宏達首先向領導的主觀主義提意見。他說：“解放軍總部直屬單位在解放以後經過五次嚴格的政治清理，我們的隊伍基本上是純潔的，但現在仍然提百分之五左右的清理對象，我認為這就是領導上主觀主義在工作方針上的表現。”他舉延安整風搶救運動為例，抓出成千上百的失足者，事後證明一個都不是。他認為章伯鈞、羅隆基都是共產黨的朋友，國民黨執政時期，他們幫助共產黨反對國民黨。朋友向朋友提建議提意見有何不可呢？他還以為因逼供信而自殺的好人不能戴上叛徒的帽子。凡此種種都成為他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言論。經過軍事法庭審判，開除黨籍軍籍，押送郭堡勞動。當年軍隊中的右派軍官都要經過軍事法庭審判，摘掉帽徽軍銜、開除軍籍黨籍，最起碼給予行政降級處分。

陳挺少校（1927-）是立有戰功的解放軍軍官，山東招遠人。1940年入伍，1944年1月入黨，曾任營、旅保衛幹部、團保衛股副股長、組織股長。淮海戰役率領一個營殲滅國軍新五軍一三七團，



周宏達中校



陳挺少校

俘虜團長以下二千餘人，榮立一等功。參加抗美援朝後在總政組織部當少校助理員。1957年僅僅因為批評了肅反運動中一些左的做法而被劃為右派分子。以後右派帽子戴了又摘，摘了又戴，先後三次戴上右派帽子。

張英敏少尉也是三戴右派桂冠的右派中的另類。張英敏（1930-）原籍山西祁縣農村，1949年12月入團，一九五零年12月入伍。在空軍第一航校領航系畢業後，任空軍司令部情報處少尉偵察參謀。他也是因向領導提批評建議而被劃為右派的普通軍官中的一員。他的奇特遭遇在於曾經三次戴上右派帽子。他作詩自嘲：

|         |         |
|---------|---------|
| 荒唐年代競荒唐 | 辛酸往事倍辛酸 |
| 咒念金箍是真理 | 恩蒙三次有桂冠 |
| 二十二年數日過 | 五十五萬皆淒然 |
| 今古奇觀幸際會 | 留得餘生苦笑談 |

經過郭堡水庫繁重的“勞動鍛鍊”，張英敏於1960年10月摘掉帽子，成為摘帽右派。文革開始後，摘帽右派和戴帽右派同列牛鬼蛇神中的第五大類，批鬥抄家，死老虎當活老虎打。造反派在他日記中找出這麼一段話：“三年災荒明明是人為的偏要說成是自然災害，肚子餓得受不了，還得說生活提高了。”就憑這幾句老實話，被輪番批鬥，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開除公職，送回原籍農村勞動改造。

鄧小平復出後，為彰顯階級敵人的改造成果，給他第二次摘去右派帽子。他要復職，祁縣革命委員會在他的復職申請書上批上一個條件，必須重新即第三次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才可復職。這不是中央文件規定的，而是山西地方土政策。

張英敏又戴了一年多的右派帽子，祁縣領導中有一位部隊復員轉業的幹部，看看實在不像樣子，天下哪有重新戴帽子作為申請復職條件的，於是第三次摘去右派帽子，改為“按嚴重政治問題處理”。最後在1979年右派大改正中，改為“按思想問題處理”。張英敏對這個結論比較滿意。因為“古今中外，從所有聖賢哲人，帝王將相直到每一個凡夫俗子，左派右派，誰能說自己沒有思想問題呢，既然大家都有，彼此彼此，也就不必多說了。”張英敏就是這樣自我解套的。非但如此，他於1985年1月居然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張鳳春大尉（1926-1982）河北省籍，於1945年10月入伍，《解放軍報》正營級編輯。妻子小丁是報社資料室的資料員。1957年整風時，他僅僅在小組會發言時批評了封建主義的等級制度和惡劣的官僚主義作風而被劃為右派。在以言獲罪的年代，在解放軍中選拔出幾位敢於直言的軍官，來抵充軍中右派名額，本來是一件極為稀鬆平常的事。張鳳春的出奇之處在於他不服罪，頂風貼出一張大字報：《我是右派分子，請大家批判》。這張大字報一貼出來，便震驚了《解放軍報社》。衛道者認為張鳳春蓄意向共產黨挑戰，向他發起更猛烈的圍攻。

不料此時後院起火。妻子小丁的頂頭上司資料室的小組長蘇某覬覦小丁的姿色乘虛而入。以關心部下組員為名，趁張鳳春不在家時，到他家做部下的思想工作，動員她與右派劃清界線。軟泡硬磨、連哄帶騙，誘姦了小丁。蘇某一不做二不休，一而再、再而三，幾次逼小丁上床姦

污，直到有一天被張鳳春當場捉住。張鳳春怒不可遏，滿腔怒火發洩到妻子頭上，決定離婚，任憑妻子苦苦哀求，全不理會。

《解放軍報社》黨委李書記與張鳳春是多年戰友。張鳳春在戰場上保護過李書記的性命。李書記深知張鳳春為人，勸他原諒妻子，並暗示他寫個檢討，承認錯誤，免戴右派帽子。但張鳳春為人耿直，堅決不從，也不原諒妻子。經軍事法院審判，開除黨籍、軍籍、連降兩級，發配郭堡水庫勞動。他的妻子小丁也被開除軍籍和公職，遣送回四川老家勞動。而厚顏無恥乘人之危的左派衛道士蘇某僅受留黨察看一年的處分，後來被提升為副師級的報社總編室副主任。



2008年10月攝于蘇州周、沈之家，左起申淵、宋林松、周永熙、沈蘇斐、李德衍

小丁回鄉後，受人歧視，帶著二個兒子在生命線上苦苦掙扎。為了活命饑不擇食，結果蛔蟲卵進入體內肆意繁殖，造成腸梗阻，於1960年病逝。張鳳春後悔不已，將小兒子留給妻妹代管，自己把大兒子帶回山西勞動。妻子的骨灰始終留在身邊，終身未娶。文革中他又一次受到衝擊，遣送河北老家，接受貧下中農監督。張家原是地主，張鳳春在文革中享受的待遇便可想而知了。

1979年右派改正，他已百病纏身，臥床不起。報社把他調回北京，任社會科學雜誌社圖書資料室副主任，和兒子一起擠住在辦公室，1982年10月病逝時才五十六歲。

傅飛大尉（1930-1999）黑龍江呼蘭縣人，畢業於偽滿的鐵道學院。1945年參軍入伍入黨。在東北軍區空軍司令部任職。後調北京中央軍委空軍司令部，任空軍指揮所大尉通訊參謀。

反右時期，他新婚燕爾，一時高興，思想無戒備，說了幾句對整風反右不痛不癢的話，中了陽謀圈套，上綱上線，戴上右派帽子，開除軍籍黨籍。發配郭堡水庫勞動。新婚妻子經領導動員與他劃清界線，離他而去。

離開郭堡後，在山西許多單位勞動，接受改造。1963年才重組家庭。1979年改正後，調回太谷縣山西中藥廠任高級工程師。因積勞成疾導致乳腺癌復發，於1999年11月病逝。生前著有自嘲詩《離休感懷》：

|         |          |
|---------|----------|
| 自笑未曾有春光 | 一瞬韶華已夕陽  |
| 盛世沫恩難收網 | 暇視人間短與長  |
| 榮辱浮雲等閒過 | 詩酒澹泊健與康  |
| 老馬不知歸途晚 | 風定菊蓮自在香。 |

方堅予（1920-）女，上海市人。抗戰時就讀于上海滬江大學，因不滿日寇奴化教育而綴學，自學英語和漢語，靠家教為生。1949年參軍入華東軍政大學學習，分配到北京軍事出版社翻譯處，後翻譯處全建制編入中央軍委訓練總監總部。1958年批判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後撤銷訓

練總監總部建制，併入總參。

軍訓部女姓文職人員只有幾十個人。大多是軍官家屬，從事一般性輔助工作，僅方堅予是外語專業翻譯人員。鳴放時推選代表出席座談會，女職工便一致推薦了她。當了代表在其位必須謀其政，她認真地將女職工反映的一些意見、批評和建議帶到會上去反映出來。憑心而論，她的發言並非她個人意見，僅僅是盡職盡力地把女職工的反映表達出來而已，說了些什麼事後她便忘了。

反右開始，突然貼出許多大字報，猛力向她開火。她頓時茫無頭緒。對她的批判東拉西扯，不著邊際，信口雌黃。如果不是她，換一個女職工代表也會如此。1958年中央軍委直屬機關發配右派去郭堡勞動鍛煉前夕，因為湊不齊右派名額，就把她替補上去了，當了一名湊數右派，也意味著是被女職工選舉出來的右派。臨走時領導告訴她戴帽三個月。方堅予思忖三個月咬咬牙就挺過去了。

不料這一去就是無期徒刑。郭堡勞動以後，轉悠在工、農、商、學各行各業。搞農機做玻璃、織布、教書、種田放羊、當售貨員看更，沒有人幹的活樣樣都幹。

進入文革，脫帽右派成為政治濫民，受盡造反派污辱欺凌。她同其他牛鬼蛇神一起，掛牌戴高帽子頭頸上懸著破鞋遊街，民兵持槍押解，從學校押到農場勞動，步行二十多里。餓著肚子勞動，深更半夜拉起來批鬥，兩次暈倒在批鬥臺上。文革結束腰肌勞損無法治癒，成為一個步履艱難的半殘老太。

朱兆極上尉（1926-）黑龍江省哈爾濱市人，農民成份，出身于根正苗紅的革命幹部家庭，家中都是共產黨員。1945年入伍，1946年加入中共。曾任新四軍二團文化教員，在抗大、航校、哈爾濱軍工大學學習。在空軍司令部擔任俄文翻譯和五航校翻譯室主任，保送留學莫斯科考夫斯基空軍工程學院。

正因為他出身根正苗紅，完全符合中共接班人的標準，所以獲選派往蘇聯學習軍事工程。在當時千百萬普通人眼裏，這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機遇，他也自認為天之驕子。他的父親在家鄉任鎮長，姐姐是鄉長，哥哥任齊齊哈爾市文化局長，滿門都是中共黨員。

想不到這樣一位紅色接班人，1957年還在蘇聯讀書的留學生，也會因為一個偶然的原因打成右派分子，中斷留學生活，送往郭堡勞動。

1957年6月底，朱兆極與十一位同學奉命回國實習。從莫斯科乘車回北京，途經齊齊哈爾市，順便下車探望當文化局長的哥哥朱兆機。朱兆機托弟弟帶一封信給正在北京陶然亭帶領齊齊哈爾雜技團彙報演出的副局長陳伯元。朱兆極不知信中內容，在北京就把信轉給了陳伯元。



朱兆極上尉

在北京偶然在廣播中聽到，齊齊哈爾市文化局長惡毒攻擊中共市委、反對市委領導，是混進黨內的右派分子。正在朱兆極一頭霧水，結束實習準備返回莫斯科的前夕，空軍政治部宣傳幹事詢問他有沒有替他哥哥帶過一封信？在他上飛機返回莫斯科的當日，突然被扣留在北京。原來齊齊哈爾市寫信到空軍政治部控告他，說他替哥哥傳遞攻擊市委領導的黑信，信上寫的都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話，並要他檢舉揭發。凌空飛來的橫禍令他措手不及，二個月後軍法處向他宣佈罪狀，開除黨籍軍籍，送郭堡水庫勞動。他在莫斯科已寫好畢業論文，只好半途而廢。從此他和哥哥一樣，兄弟倆人度過了二十二年蒙冤的右派生涯。

二十二年後才真相大白，這封使他們兄弟倆遭遇滅頂之災的黑信，僅僅是當局長的哥哥通知在北京演出的副局長，家鄉有親戚來找他。這一封微不足道的普通信件居然上綱上線，升級為反黨黑信，可見中共搞階級鬥爭的手段之無恥。

章士寰(1933-)是中共抗美援朝的功臣，在朝鮮戰場七年，立有戰功榮獲軍功章。他原籍浙江紹興，書香門弟出身。大伯章錫琛是中國有名的開明書店創始人。1957年6月，章士寰結束了漫長的七年戰地生涯，從朝鮮奉調回國，分配到彭德懷任國防部長的國防部總幹部部工作，總幹部部部長是賴傳珠上將。



章士寰晚年

回到北京，他探訪了離別七年多的親友，並經常去看望時任新聞出版總署專員和中華書局副總編輯的大伯章錫琛，以及在中國圖書發行公司工作的五叔章錫洲。不久他們兩位都被劃為右派分子。因為章士寰是他們的侄子，鳴放反右中與他們有來往，便被莫名其妙地劃為國防部的重點審查對象，收繳了他的五四式手槍和子彈，要他檢舉揭發，與親戚劃清界線；收繳了他自1949年6月至1957年當天的十多本日記。

他自1957年6月才從朝鮮戰場調回，調回時已開始反右，來不及參加鳴放。可是既然已列為重點審查對象，豆腐裏挑骨頭也要挑出一點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言論。於是將他平日閒談中說起的對軍銜制、評級時人為的機遇和因父親被誣陷參加國民黨而影響他入黨的不滿之詞加以誇大批判。當然他的主要罪行是“同情、支持、包庇右派親戚”。



章士寰早年

章士寰湊數湊上了國防部總幹部部三名右派名額之一。中共國防部直屬黨委行文批准，開除軍籍團籍，剝奪了剛要晉升的上尉軍銜，發配郭堡水庫勞動。

當上右派分子後，他過去為中共立下的戰功一筆勾消，淪為“階級敵人”。在文革清理階級隊伍的高潮中，又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判刑十年。後減刑為六年。他總結自己的一生道：

是非功過說原由，含屈蒙冤謫並州。

一夜風波天地悵，廿年煉獄鬼神愁。  
金箍咒念唐憎舌，鐵帽盔傷大聖頭。  
夕照青山活水動，桑榆霞蔚憶霜秋。

## 許慰萱 軍內另類右派

許慰萱（1926-2008）上海市人，暨南大學外國文學系畢業。中共掌權前參軍，並加入中共。中共建國初期，進入上海市青年幹部訓練班及中央軍委工程學校學習，曾任北京中央軍委軍事出版局英語翻譯，軍委防空兵司令部英語教員。曾列入現役軍人編制。

右派的遭遇總是相似的，而無辜的另類右派卻各有不同的經歷。好心腸的親友在得知他加冕右派以後，總是帶著惋惜與不平的口氣說：“你怎麼可能是右派呢？是非皆從口中出，怕又是你胡說八道些了什麼吧！”

“否”，這僅僅出於一般善意的猜測，他沒有像那些積極分子那樣帶頭幫助黨整風，而且似乎還很老到，靜觀其變，沒有開過口。之所以這樣，一來是不會提意見，因為他早已成為黨的聽話幹部，馴服工具，與黨一條心；二來也不敢提意見，因為根據經驗如弄不好，還會傷及自己，當以小心為好。思想上當然有想不通的地方，也只得壓在心頭，讓自己慢慢消化掉。

1957年他在上海某軍校任教。運動一開始，就擺開了架勢。首先要讓大家向黨提意見，他沒有發言。一是意見不成熟，再則生怕被抓辮子，引火焚身。他為此還慎重地把發言稿寫下來，以免說錯。當然能不發言最好。由於工作建制變動，他沒有發過一言，大有蒙混過關之意。

他的軍校將由上海遷往長春，當時他已在上海結婚。他向組織提出申請留在上海，組織上表示同意，唯軍轉民要有一定過程和時間，讓他先去長春，待以後在上海安排妥了工作再回來。他認為組織上的這個安排夠仁至義盡了。他隨即去了長春。到了長春軍校後，反右鬥爭已經開始。不久有人因畏罪而跳河自盡，情況非常嚴重。趁暑假他回上海，找到上海市人事局，局裏介紹他到江灣中學任教，他辦妥了組織關係，正式轉入江灣中學。

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長春軍校方面見他不回，先是來信，迫他回長春參加反右運動，並揚言說：“如果不回，一切後果將由你自己負責。”這樣的口吻他當然有點害怕，也不知道那時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然而由於他的組織關係已經轉來，就沒有去理睬他們。

果然，他們那邊派人來了，他們先要他揭發別人，接著又揚了揚手裏所謂的揭發材料，要他老實交代。他自知對肅反的某些做法，曾經有過看法，無意之間也會說些錯話。根據歷次運動經驗，所謂揭發，也不過就是狗咬狗，大家亂說一通，所以也有些擔心。來人氣勢洶洶，實際上他已被列入他們所要整肅對象的名單中了。



軍內右派許慰萱

此時江灣中學也安排了鳴放會，而且根據長春軍校方面的建議，每個小組的批判對象中都列入了他的名字，誘他上鉤。現在長春軍校派了人來，江灣中學又安排他鳴放，他已是四面楚歌、在劫難逃了。他想逃避現實，躲開大會轟、小會擠，人為的逼、供、信和疲勞轟炸。他們不是要迫他就範嗎？他搶先採取主動。你要什麼他就給你什麼。他以自我檢查的方式寫了張大字報，並且自我上綱上線說自己是反對黨的肅反政策，這是罪行的主要一條。自己覺得還不夠嚴重，便又上綱上線地添加了一、二條。

事後他糊塗到自己究竟是怎麼說的也搞不清楚。不是還有條抗拒從嚴，坦白從寬的政策嗎？對此他也曾幻想過，領導上或許會考慮他過去表現，他把《是我錯》的大字報一貼，不就是坦白從寬了嗎？想不到他不論如何檢討，右派帽子仍然稀里糊塗地落到了自己的頭頂。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的這頂右派帽子是自己給自己戴上的，連甕中捉蠶都夠不上，真是痛快極了。

他不幸被列入反面教員。面對這一事實，只能忍辱負重，苟且偷生。有時他還以“我不當右派，誰當右派”來自我解嘲，實際上還是中了馴服工具論的流毒。

至於他本人，不論是當右派還是當左派，我行我素，我還是我。始終不悔，至多加了個傷疤而已。他被開除黨籍，開除軍籍，送去勞動教養。

錯劃改正後，在上海寶山區中學繼續勞動或做英語教學工作。1987年離休，2008年4月在上海病逝。

### 朱席齋 因日記罹難的新四軍幹部

朱席齋（1926-1995）江蘇省連雲港人，家庭出身舊知識份子，城市貧民。1943年高中期間，跟著叔父參加新四軍。第二年，叔父和第四師師長彭雪楓一塊死於打國民黨頑固派的戰鬥中。新四軍在抗日戰爭後期沒有和日本人打過仗。朱席齋在日記中這麼寫道：“我參加新四軍的目的很簡單，就是要打日本鬼子，叔父也答應，到了部隊，就帶我上戰場，親自教我射殺鬼子。可是直到日本投降，我都沒見到一個鬼子兵。講起來我還是一個抗日幹部，這真是我一生中很大的遺憾。”

解放戰爭（國共內戰）時期，朱席齋在第三野戰軍特種縱隊司令部給政治部主任劉春（劉羅鍋的後代）當文書。所謂特種縱隊是由蘇聯用日本關東軍武器裝備起來的炮兵，還有六名蘇聯人和八十八個日本人（蘇聯紅軍的戰俘）也在部隊做技術指導，炮彈是由蘇軍特管區的大連兵工廠生產的。朱席齋在日記中寫道：“用小米加步槍打敗八百萬蔣匪軍，這是宣傳而已，實際上，我軍的火力要比國民黨厲害得多。而且每次打仗，我軍加上民兵和民工的人數都要比敵方高出八至十倍。這既是一場人民戰爭，又是一場國際共產主義戰爭。”

剛解放時，朱席齋轉業在湖南省公安部門當處長，到全省各地搞調研。即他的日記所云：“遊宦於三湘四澤之間。”然而，遇到一件事開始了他的半生厄運，那就是1951年全國掀起的鎮反運動。這年秋天，湖南省鳳凰縣逮捕前國軍少將沈荃，他是著名作家沈從文的胞弟，多次

負傷的抗戰英雄，卻按歷史反革命罪予以處決。在這當口，朱席齋講了些公道話，向領導反映：“沈荃是起義有功人員，他率部起義我很清楚，從頭到尾我都參加接洽這件事。”朱席齋為反革命死刑犯說話，簡直就是階級立場問題，這下可大禍臨頭了！幸虧省廳有人為他說情，他才按降級使用，並調離政法機關。

朱席齋找關係調動到其妻子的家鄉安徽合肥，在合肥市稅務局當個小科長。然而帶有黑材料的檔案已寄到單位，從此他成了運動員，而且一次比一次挨整得厲害。1957年上級要求各機關按比例找右派，朱席齋自然就成了首選。而且禍不單行，雖然他出事後，早就絕筆不記日記，但舊日記本子尚未銷毀，卻被搜出了。朱席齋的日記被斷章取義地摘取某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片言隻語，編進了該市的《右派言論集》公開發行，供人批判。

1962年，中共安徽省委書記李葆華根據劉少奇批示，在全國率先給右派平反。但朱席齋因為這本日記，涉嫌國民黨特務，被繼續關押。在這之前，他已和他的老首長，時任解放軍炮兵政治部主任的劉春聯繫上，劉春很快為他寫了證明材料，但地方當局卻扣而不報。等到文化大革命爆發，已任外交亞洲司司長的劉春被打倒，所以劉春為朱席齋所寫的證明材料反倒成了後者是美蔣特務的佐證。

朱席齋跳進黃河洗不清，這回要牢底坐穿了！劃右後他發配在石子加工廠勞動，一年後因反動日記送巢湖農場勞動教養。1962年後轉白湖農場繼續勞教至1976年。幸虧劉春沒過幾天平反了，並出任駐土耳其大使和坦桑尼亞大使，當時正宣傳坦贊鐵路是中非友誼的象徵，劉春又紅了起來。所以劉春為朱席齋所寫的證明材料才被正面解釋。1979年，朱席齋獲改正，恢復黨籍和行政級別，擔任中共合肥鋼鐵公司機關黨委書記，1981年離休。

在調查朱席齋的材料過程中，已在英國擔任大學教授的朱席齋兒子朱恩平十分關心《五七右派列傳》的編寫工作。幾次從英國倫敦打國際長途回合肥向老母親查問父親日記的事。他母親說，在他父親右派改正時，他想把“惹禍”的日記要回來銷毀，但沒有成功。至於他父親頂頭上司劉春寫的《證明材料》，據說因為劉春是開國少將，他的手跡被解放軍炮兵學院的檔案館要去了。其他的事已經記憶不清。作者對於這位右派後人認真負責的精神和他親自撰寫提供的材料，深表謝意。

## 第六章 宗教界和少數民族

### 綜述 宗教界和少數民族在劫難逃

卡爾·馬克思有句名言：“宗教是毒害人們靈魂的精神鴉片。”這句話便是中共對於宗教的態度。中國有五大宗教，即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和道教。經過鎮反和肅反、取締反動道會門，在1957年反右運動的前夕，據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統計，僅在上海尚有天主教徒十四萬人、基督教徒十三萬四千人、伊斯蘭教徒約五萬人，佛教和道教難以統計，因為沒有嚴密的組織。在1957年，雖遭屢次運動打擊，全國信教人數不下二億人。



中共掌握政權以後，毛澤東和周恩來便十分重視宗教問題。表面上《共同綱領》規定了宗教信仰自由，然而在實際上，同中共一貫的表裏不一、口是心非一樣，對宗教採取限制改造直至消滅的政策。其具體措施是拉出去、打進來，首先掌控各教的領導權，讓宗教成為中共的御用工具。上海易幟前夕，中共上海地下市委書記張承宗親自發展榮毅仁和吳耀宗為中共特別黨員。

1949年中共剛進城立足未穩，周恩來便數次找吳耀宗個別談話，商量以成立中華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來取代同海外有聯繫的中華基督教協進會、基督教青年會、聖公會、長老會等基督教各個教派，吳耀宗自任會長。三自為“自治、自養、自傳”。三自愛國會成立時擁有四十一萬六千餘人。經過鎮反和肅反，據一百五十六種報刊和五十六種雜誌介紹，有數一萬多名基督徒遭監禁，二千多人被處決。基督教三大巨人中的王明道成為王明道反革命集團的頭子，於1955年被判處無期徒刑。基督教便為吳耀宗和另二位特別黨員李儲文和丁光訓所掌握。紅色牧師李儲文在文革中被紅衛兵暴出身份，便去了香港當新華社副主任了。

天主教有中共特別黨員傅鐵山，通過打擊天主教上海教區主教龔品梅反革命集團（判無期徒刑），取締反動組織天主教聖母軍，成立天主教自立革新運動，同梵帝岡徹底決裂，中共牢牢地控制了天主教。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居士是中共特別黨員；中國伊斯蘭協會主席鮑爾漢也是中共特別黨員。中共在各個宗教團體都安插了自己人去當領導。

反右鬥爭中，基督教和天主教受到的打擊最為深重，反抗也最慘烈。中共將天主、基督兩教的代表和頭面人物集中到北京開會洗腦，互相揭批，採用“關門打狗”的辦法，隔絕外界聯繫。可惜效果並不理想，天主教愛國會大多數代表雖經洗腦，仍舊選擇“要梵帝岡不要共產黨”，趙振亞主教便是一例。

吳耀宗牧師說：“基督教等於資本主義加帝國主義。”真是一付猶大的嘴臉！作為人大副委員長，他乖巧地建議，宗教界的右派劃分標準，除了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中區分香花毒草的六條標準外，還要加上一條“愛國愛教”。

基督教和天主教與海外的發達國家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因此在反右中受害最深。反右中有一萬多教徒打成右派。至文革，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被處決者累計二千二百三十多人。其中有中華基督教循道公會寧波教區主教兼浙江神學院院長範愛侍、廣西靈山縣警世堂牧師蘇子英、為中共做了不少事人稱政治牧師的張海松、天水一中數學教師夾邊溝倖存者《一個基督徒的右派生涯》的作者李景沆、林昭同囚的難友俞以勤、拒讀《毛主席語錄》的吳維尊、基督教刊物《回家半月刊》主編劉齡九、中華基督教會鼓浪嶼堂牧師周清澤和周慶福等人。不管你是教友或是神職人員，凡是不聽中共指揮棒的，一律打成右派。拋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改信上帝的林昭烈士在獄中寫血書說：“作為基督徒，我的生命屬於我的上帝，我的信仰。為著堅持我的道路，或者說我的路線，上帝僕人的路線！基督政治的路線！這個年輕人首先在自己的身上下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這是為你們索取的，卻又是為你們付出的。”

天主教打成右派的有天津市天主教教友愛國運動促進委員會副主任聶國屏和常務委員高慶

琛、教會領袖倪折聲和四川攀枝花市李希孟神父等人；伊斯蘭教有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副主席馬松亭等人；近代佛學界輩份最高的學者、法華宗（天臺宗）大師、長春的澍培法師打成右派；四川灌縣將九十四名道士集中在天師洞鳴放辯論，從中抓出九名右派；1958年12月30日中共召集上海宗教界開會，討論右派名額分配，結果是天主教和基督教各三位、佛教四位、道教一位（實際三位），勉強完成上海宗教界的右派定額指標；北京市基督教社會主義學院在1957年12月25日的學習班上，一次性揪出四十五名右派分子。西藏和內蒙古的喇嘛亦不能倖免。

成都市佛教協會奉市政府宗教處之命，於1959年9月29日即中共國慶前夕召集各派宗教右派開座談會，參加者二十五人，佛教有廣續、佛定、圓照、解定以及崔亞漢、牛次封等十七人，道教四人，天主教和基督教各二人。座談會為中共歌功頌德。右派廣續和尚拍馬屁道：“黨和政府對我們這麼寬大，我想就是餵一條狗，見了主人都知道搖尾巴，所以我們今後要好好地改造。”自此以後，在神父主持彌撒、牧師佈道、和尚講經、阿訇禮拜的時候，還必須加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教條和中共政府的政策。

中國的宗教同少數民族有密切的關連，如藏族與藏傳佛教、回族和維吾爾族與伊斯蘭教、蒙古族與喇嘛教。中國少數民族人口雖然不多，僅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十左右。但是居住地域卻占國土的百分之五十。在少數民族居住的廣袤腹地，物產豐富、地大物博。西藏地區在反右前夕剛發生了抗暴事件。歷代中央政府從未對他們實施過實際意義上的真正管治。因此中共對於少數民族的反右鬥爭相當謹慎。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發佈了《關於在少數民族中進行整風和社會主義教育的指示》，提出“在已經基本上實現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地區”，“適當地進行反右派鬥爭”。“應切實控制打擊面，不要過寬”。由於西藏地區剛發生抗暴事件，所以在藏區不開展反右運動。否則藏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對立情緒很大，右派要抓不過來了。

《指示》又說，地方民族主義者實質上是資產階級右派的一部分，是披著民族外衣的右派分子。據此，中共揪出了“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熱賽也夫、常委伊敏諾夫為首的地方民族主義集團”，按照右派標準處理。

中國最高齡的右派長者，都出在宗教界，釋虛雲法師劃右時的年齡為一百一十八歲；吳德正阿訇（回族）劃右時為一百零八歲。

## 第一節 宗教界

### 劉齡九等五人 令基督教徒自己揪右派

上海易幟前夕，中共上海地下市委書記張承宗“發展”了二名中共特別黨員資本家榮毅仁和基督教吳耀宗牧師。吳耀宗牧師組織了“中華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領導中國大陸

的基督教徒和神職人員向美帝國主義作堅決鬥爭。他的公開身份是“中華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主任委員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他的真實身份是中共特別黨員，代表中共掌控中國大陸的基督教。因此，1957年基督教的反右鬥爭的性質便是中國的基督教要不要擺脫中共控制，要不要做中共的御用工具？大陸的基督教要不要與國際基督教會接軌，恢復從前的密切關係？

1957年10月28日至12月4日，“中華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第十次常務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各地基督教代表人物一百三十多人參加，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和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嚴密監控下舉行了近四十天的大小會議。在討論“全國基督教如何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外衣掩蓋下，揪出披著宗教外衣的基督教右派分子劉齡九、周清澤、董鴻恩、範愛侍和周慶福等五人。

劉齡九是原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的秘書、基督教刊物《田家》半月刊的主編。1930、1940年代曾在四川邊遠地區傳教，成立邊疆服務部，是基督教有影響的神職人員。大會揭發他在鳴放期間，誹謗“社會主義社會不民主”、“共產黨人怕人說話”；“已使全國人民變成唯唯諾諾的奴隸”。批判他惡意污蔑說，國民黨能保持統治二十二年，而共產黨在全國範圍內取得政權只有八年已經腐化了。劉齡九早在1954年就反對在憲法中寫有專政的字樣，說“肅反運動傷害了高級知識份子的自尊心，打擊了他們的積極性。”要為基督教的反革命分子平反。

《田家》半月刊的主要讀者對像是農村基督教徒，劉齡九利用《田家》指責全國農業合作社沒有辦好，減了產；指責農業合作社社員經受痛苦的強迫勞動，“農民寧願餓死也不願累死”。他在雜誌上批評中共的宗教政策和種種弊端，使《田家》在廣大農村教徒中擁有廣泛的影響。

中華基督教廈門鼓浪嶼教會牧師周清澤也在會上劃為右派分子。他曾經在不久前廈門市政府宗教事務處召開的座談會上說，今天人民內部的主要矛盾是人民要生活下去而卻活不下去，人民要求自由一些而得不到自由；全國人民的生活已困難到“沙當米吃”的程度，全國80%的農民都在埋怨；全國共產黨幹部上自中央下至鄉級的領導，都是以不老實和謊言作為一種手段在欺騙人民，今天政府是“衙門八字開，無事莫進來。”周清澤指責三自愛國運動搞得一團糟，“極有損於教會的宗教生活”，他對當前基督教界受中共嚴格操縱的狀況表示不滿。

中國佈道會上海教會基督教會堂牧師董鴻恩，仍然與美國的佈道會總部有聯繫，和香港的佈道會也有關係。大會指責他在上海散佈“謠言”說：“美國總統有一千萬美元留在香港專供從中國大陸撤出來的傳道人員用。”說他企圖唆使教會人員“投入美國帝國主義懷抱”。董鴻恩在鳴放期間為教會中被中共戴上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的人員鳴怨叫屈，批評中共的宗教政策，鼓吹“香港自由”。他善於利用講道的機會，發表自己的見解。如他曾經說過：“山西有冰雹之災、伊朗地震、埃及有蝗蟲。這些都是世界末日的預兆。”由中共操縱的大會定董鴻恩為右派分子。

中華基督教循道公會寧波教區主教范愛侍，1916年出生，畢業于金陵神學院。他在自己管

轄的教區的講道中，經常批評中共和蘇俄。慣於用隱諱的口吻放冷箭。鳴放期間呼籲“共產黨讓賢”說：“如果有其他政黨比共產黨更成熟，共產黨就應當要讓它。”“從馬克思的剩餘價值來說，國家和工人之間還有剝削關係”，“無產階級必須奪取政權，難怪資產階級要起來反對。”。對於三自愛國運動，他批評道：“傳道人是愛國的事情做多了，愛教的事情就少做了。”他在講道中還議論過匈牙利事件，表示對蘇俄出兵干涉他國內政的不滿。

上海是基督教會的主要基地，身為上海市政協委員的上海靈糧堂長老周福慶亦被大會指定為右派分子。在批判大會上他直言不諱地說，政協和其他機構的反右座談會都是中共事先“佈置的一套”，“簡直像美國的表決機器”。在1957年8月上海市政協宗教組舉辦的座談會上，他公開批評肅反運動是“借肅反來消滅宗教”。他利用靈糧堂佈道，合法地宣講教義，說“共產黨是大狐狸，積極分子是小狐狸”。批判者指他一貫破壞三自愛國運動。當運動尚未開始，他糾集教會中的反動分子和落後分子密謀暗中破壞；待三自愛國運動開展起來後，便在表面上偽裝積極，鑽進三自愛國運動內部，同暗藏在基督教內的反革命分子勾結起來，裏應外合地進行破壞活動。

中共安插在基督教內部的打手們當然不會放棄揭老底的機會，刨根究底地挖出歷史上的“陳年宿古董”作為攻擊的武器，把劉齡九等在基督教界享有一定威信和地位的神職人員批倒搞臭。說他們一貫效忠“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匪幫”，不願割斷同帝國主義的聯繫。

範愛侍在1936年便同帝國主義有聯繫。1948年和1949年幫助帝國主義分子畢范宇二次到寧波，宣講“共產黨十大罪狀”，商談教會的“應變事宜”，發動寧波全市教徒舉行“祝禱大會”。國民政府公佈憲法時，他特地寫了《耶誕節與行憲》一文，吹捧憲法猶如“天國的憲法”。1949年1月蔣介石引退浙江溪口鎮，範三次去溪口鎮講道，第一篇就是《往前走》，勸喻蔣氏繼續往前走。他利用教堂窩藏反革命分子、逃亡地主和破壞國家金融的刑事犯罪分子多名。

周清澤收藏過一名國民政府國防部系統的特務分子，並介紹他去廈門大學當工友；包庇潛逃的女惡霸周美錦，隱藏在自己家中，極力為她辯護。董鴻恩牧師在上海易幟前準備去美國，他一直有此打算，準備投奔海外。

在中共的鼓動下，站起來批判基督教內部右派分子的居然有一百多人。中華聖公會主席陳見真主教、當時任江蘇省副省長的中華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副主任吳貽芳女士和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塗羽卿言不由衷地批判了他們，以示劃清界限。

基督教是除佛教之外中國人信仰最多的一支宗教，地上地下或明或暗的基督教徒在1957年反右時期已近一億人。基督教同天主教一樣是同海外聯繫最密切、受西方文化影響最深的二種宗教。早在明朝，義大利人利馬竇已將天主教基督教帶來中國。鴉片戰爭前後，這二種宗教隨同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大舉進入中國內地。各國來華的傳教士遍佈中國各個角落。中共試圖通過反右鬥爭來徹底切斷中國基督教同外國反華勢力的聯繫，雖然反右以前歷經鎮反、肅反、肅清反動道會門等政治運動，已經在做這種切割工作，然而效果不彰。

## 蘇潤生等八人 至高無上的梵蒂岡

天主教和基督教信奉同一個上帝。歐洲在中世紀經過馬丁路德的宗教革命，一部分思想比較開放的教徒成立了新教，即基督教，信仰耶穌基督。擁戴梵蒂岡教皇的那一部分稱為天主教，人們習慣稱為舊教，信奉聖母瑪利亞。天主教嚴謹，基督教相對比較寬鬆。全球的天主教徒只服從一個教皇的領導，而基督教分屬各個教派。瞭解了這個背景，就不難理解這二支西方傳來的宗教在反右運動中的遭遇了。

中共在天主教中反右的目標是令中國的天主教走“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服從和接受中共一元化的領導，同梵蒂岡脫離關係。為此，像基督教一樣，在1957年的7、8月間中共統戰部和宗教事務局策劃了一個“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代表會議”。經過一個多月的社會主義思想教育，效果不如預期的那樣理想，參加會議的神職人員大多數都有抵觸情緒。

河北省唐山、保定和滄州地區參加會議共十位代表。經過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的洗腦教育，擁護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只有二人。他們是獻縣教區副主教和景縣教區代主教。其他八位（範學淹、蘇潤生、張竹淡、李振榮、王樹楷、劉定漢、韓木然）對中共御用的愛國會由抗拒反對進而公開煽動教徒，積極串聯神職人員抵抗中共的反右運動。獻縣教區的大會代表劉定漢、陳義、韓木然向神甫、修道士和修女說，獻縣教區的主教趙振亞已經“裂教”了（事實並非如此），他回來了不要再承認他，聲言要用教會法典同他作鬥爭，另選主教。

保定教區神甫蘇潤生在給教徒講道時指出，代表大會的親共分子都是“天主教的叛教分子”，要“堅持信德”不上共產黨的當。這些堅定的天主教徒還決定分頭下鄉，向教友進行“堅持信德的教育”，不畏中共要給他們戴右派分子甚至壞分子和現行反革命分子帽子的威脅。

另一個教區的八個代表，有五個人表示擁護中共，與梵蒂岡劃清界線，走愛國愛教的道路，向教區內的主教、神甫、修女宣揚中共的政策，鼓動他們也同梵蒂岡脫離關係。年老的主教聽了他們的宣傳提出疑問：“天主教愛國會為什麼不經教宗批准，反而抗議教宗呢？”中共積極分子對他們說：“你是不是中國人哪？如果你是中國人，就應愛中國，不應盲目聽從梵蒂岡，不然中國就把你清除出去。”這是典型的把愛國愛黨和愛國愛教混為一談的中共歪理。類似這種爭論在天主教區內經常發生。

大多數天主教徒表現為疑惑不解，徘徊彷徨，懷疑中國天主教會是“裂教”組織。修女們說：“我們的主教真是好樣的，敢向中央人物作鬥爭。他在播道時前前後後的發言我們都同意。”虔誠的教徒對愛國會表示公開懷疑，教徒每天到教堂上早課的反而與日俱增。據向保定、唐山、張家口、邯鄲五市和滄州地區的四十四位神職人員調查，擁護共產黨愛國會的僅九人；抗拒抵觸者二十四人，占大多數。顧慮懷疑者占十一人。所以反右運動在天主教裏的實際情況是右派分子占大多數。中共只能抓住幾個頭面人物和出頭露面者劃為右派，以示敬儆。最後還是不得不服從法不罰眾這個顛撲不破的真理。

在這裏中共犯了一個策略性的錯誤，把歷屆梵蒂岡教皇都視作帝國主義的走狗，反而引起

教徒的強烈反彈。在虔誠的天主教徒心目中，臭名昭著的共產黨永遠不會取代神聖的上帝，共產黨的階級鬥爭，與人為敵的教義無法取代上帝偉大的博愛精神。

### 趙振亞 上帝高於一切的主教

1847年，天主教開始傳入天津，1862年底，天津建成第一座天主教堂。天津是義和團運動的中心地區，天主教會受到沉重打擊。事變平息後，天津天主教徒猛增至三萬人。1946年羅馬教廷宣佈在中國正式建立聖統制，天津代牧區升格為天津教區。1951年前，主教均為法籍神父。韓戰後驅逐外藉神職人員，天津教區主教一職十分重要，中共極力爭取由自己人控制教區。

外藉人員被驅逐後，暫時由副主教趙振亞代理主教一職，1953年2月，羅馬教皇正式任命趙振亞為天津教區署理主教。這時天津教區已擁有教徒近十萬人。

趙振亞（1902-1976），又名趙錦華，教名亞爾風穌，天津人。1917年畢業于天津南開學校。1925年入天津小修道院，後入北平文聲學院（即大修道院）。1929年至1931年去浙江嘉興遣使會修道院修道後，升為神父。1932年返回天津，任天津教區小修道院教員。1933年在滄縣教堂任副本堂神父。1934年任慶雲縣何家莊教堂本堂神父。1941年任天津望海樓教區神父兼誠正小學校長。1945年任靜海教區宗教總理人。

1957年8、9月間在北京舉行的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代表大會，趙振亞也代表天津教區參加。中共積極拉攏這位由羅馬教廷正式任命的教區主教，向他做了許多思想工作，要他表態同羅馬教廷劃清關係，脫離梵帝岡爪牙的魔掌。趙振亞主教在會上幾次發言，表示要擺脫梵帝岡的控制，受到中共熱烈歡迎。

可是回到天津，趙振亞馬上公開變卦。他在9月底一個有一千多人參加的瞻禮（聖母升天儀式）時說：“人有了罪就應該承認罪，有了錯就應該改錯。大家都看了報紙，我在北京說了不該說的話。我回來以後，心裏很不安。現在，在上帝面前，在教友面前，我承認錯誤。”關於服從梵帝岡教宗的問題，趙振亞說：“我不服從教宗是不對的，我如不服從教宗，神甫和教眾就都不服從我了。”對於會議通過的抗議梵帝岡無理剝奪上海教區權利的抗議書，趙振亞說：“通過抗議書，我沒有表示反對是不對的。”他最後要求：“請教友們原諒我寬恕我，為我念經祈禱。”

趙振亞對中共的反抗，實出中共的意料之外，這位已經五十五歲的天主教長者德高望重，平時恪守本份，祥和謙讓，深受教徒愛戴，享有崇高威望。中共只要拉攏了他，就可以控制天津教區的十萬教徒。天津教區在全國舉足輕重，天津教區一旦帶個頭，聽從中共，全國的天主教徒不愁不“愛國愛黨”，與梵帝岡一刀兩斷。

趙振亞回憶道，在北京參加會議的初期，表示“思想接受不了”，並想逃會。後來又怕反右派反到自己頭上，才違心地勉強表示“中國天主教要擺脫梵帝岡的控制。”他是天津人大代表，回到天津後，天津人大秘書長找他談話，鼓勵他堅持下去。趙當場還表示，“在北京受到很大教育”、“過去不敢碰梵帝岡，現在問題解決了。”他還向天津人大表態說：“教徒不見

得都聽我的，估計到有些人會罵我，但是我不在乎，我有信心。”

趙振亞在瞻禮儀式上的舉動早有準備。在瞻禮進行過程中，趙曾經私下講，但沒有公開談論梵帝岡的問題。等到做完彌撒，講臺上突然擺上麥克風，他就開門見山地講起來。主教這麼公開在教徒面前承認錯誤，在天主教內叫“明補贖”，是一種處罰。實行這種處罰，需要由別的主教辦“神功”，否則是自我“降罰”。因此中共懷疑他的變卦可能是同其他教區的主教串聯引起的。

中共惱羞成怒，給趙振亞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撤銷人大代表資格。他那天津教區主教是由梵帝岡教廷任命的，中共沒有資格撤銷，只好眼睜睜地看著趙振亞繼續給教徒做彌撒，奈何不得。中共的權力一時還無法超越上帝。

1963年天津教區的信徒在中共干擾下自行選舉主教。自選聖李德培為正主教。廣大教徒不顧中共的蠻橫無理的干涉，依舊選舉深孚眾望的趙振亞為副主教。羅馬教廷並未撤銷對他的委任。

1972年趙振亞在教徒的愛戴中逝去，享年七十四歲。

## 聶國屏 天主教大右派

聶國屏先生（1915-1998）是河北省撫寧縣人。1939年畢業於燕京大學西語系，後任天津智德中學英語教師。1946年曾任天津工商學院講師，並加入民盟地下組織，在中共領導下，組建民盟小組。跟隨中共地下黨員吳景略三次去邯鄲會見起義將領高樹勳，為解放區運送文具和機械設備。

1947年他兼任教會報紙《蓋世報》協理。1950年，建立民盟天津市臨時工作委員會，任委員。發起組織天津天主教三自革新運動促進會，任秘書長、副主任。1951年，任天津津沽大學、天津師範學院副教授兼總務長、津沽大學民盟小組組長，參加校政改革，受到民盟表彰，周恩來接見了他後，擔任了天主教全國委員會委員。1954年被選為天津市第一屆人大代表。他在教育界和宗教界享有較高名望和代表性，經常代表這些功能界別發表意見。

1957年初，聶國屏以天津市人大代表身份視察肅反工作時說，天主教的案子都不是政治問題，是信仰唯物論還是唯心論的問題。還提出教徒判處十年、二十年徒刑的都應該宣判無罪。在天津人大批判他的時候指責他煽動教徒為聖母軍翻案，攻擊共產黨的宗教政策，共產黨讓教徒鬥教徒。教會內部親共的教徒揭發他利用幫助黨整風的機會，公開為披著宗教外衣進行反革命活動的犯罪分子辯護。污蔑土地改革、三反五反、鎮反肅反等政治運動搞錯了。聶國屏說：“過去的運動傷害了許多虔誠教徒的感情和自尊心。”

根據天主教內部的親共分子揭發，他在天津師範學院指揮他的小嘍囉貼出許多造謠誣衊、攻擊共產黨的大字報，公開在天主教、基督教青年聯誼會上煽動青年教徒對黨的不滿。在天津到處搜尋反對共產黨的意見，企圖為天主教組織聖母軍辯護，呼籲釋放被中共判刑的天主教神父龔品梅。

在宗教界內部為他舉辦了許多次大小批鬥會。最後在天津市人大會議對他舉辦的批鬥會上，他被戴上右派帽子，與畢鳴歧等二十九名右派分子一起取消了人大代表資格。

為了徹底搞臭聶國屏，中共採用清算歷史老賬的方法，翻出他的另一本歷史賬，以清除聶在天主教徒中的崇高威望。中共指責他出身買辦資產階級家庭。抗戰期間巴結漢奸做投機生意。日本投降後投身地方武裝杜福祥門下，在雜牌軍中擔任中校秘書。後來結識天主教領袖于斌，在天津主持“天主教文化協進會”，發展了幾百名會員，成為梵帝岡在中國的一個重要據點。

1946年前他在太原市工業學校兼職任教時，擔任過國民黨區分部書記，在學校裏發展國民黨員，領導學校裏的國民黨宣傳隊員，在公共場所進行反共宣傳。1947年在輔仁大學曾監視親中共學生。到進步學生楊光烈家搜查。天津易幟後，聶國屏隱瞞了身份，多方阻撓街道成人夜校學生參軍和入團。他公開批評毛澤東。韓戰開始後，聶國屏在農村傳教時發表不同看法。由此可見，中共對於某個人的歷史也是可以隨意捏造的。要你當人大代表，便將歷史塑造為進步親共；要打倒你時便將你的歷史改為反動反共。

1955年8月在河北省龍關縣幹部業餘學校任教員時，因上述原因以反革命罪被捕。1955年11月，龍關縣人民法院曾判處他八年有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三年。但這一判決不久即被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撤銷了，改判教育釋放。在全國政協第三次會議上，黃紹竑發言讚揚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這一個做法時說，如果沒有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的認真監督，聶國屏勢必“冤沉海底”，現在也當不成人大代表，繼續在牢中服刑。

河北省最高人民法院根據河北省最高人民檢察院在聶國屏劃為右派後進行覆議，重新審理了這個案件。認定當時認為聶國屏的歷史反革命行為“已大部分作了交代”、“解放後並無繼續攻擊中國政府的落後和反動言行”這一結論是錯誤的，因此重新恢復1955年11月的原判。

文革中聶國屏重新投入監獄服刑，受到批鬥衝擊。1978年改正後歷任天津師範大學、河北大學外文系副教授、教授，業務特長英語、法語、俄語，自編教學講義多種。翻譯《英國文學選讀》和《一、二、三卷英國戲劇選》。

1981年成為研究生導師、河北大學外文系副主任兼河北大學外事辦公室顧問。1986年離職休養，1998年病逝。

### 李景沆 夾邊溝虔誠的的基督教徒

虔誠的基督教徒、原天水一中的數學教師李景沆老師（1922--）以八十一歲高齡寫了記敘自己一生的自傳《蒙恩歷程》。他在序言的開頭寫道：“我是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的，遣送甘肅國營夾邊溝農場，九死一生，是從死亡坑裏爬出來的一個倖存者。”他把他在夾邊溝的經歷當作他一生中“蒙神帶領”的一段重要插曲。他說：“唯願把這本小冊子放在神的手中，求主使用它，賜福它，使讀者能感到我主耶穌基督正在呼喚著你，深願與你同行。”



李景沆於1922年出生於甘肅天水一個小官吏的家庭。他母親一連生了幾個女兒，憂鬱成疾，終日神經兮兮。基督教在清末就已傳到天水。他們家有一個親戚是教徒，勸告他母親入教。入教後也許是精神受到寄託，居然生下了李景沆，而且病也慢慢好起來了。他母親逢人便說，李景沆是上帝賜給她的兒子。李景沆在繖襖中就開始進入教堂。直到上學還經常陪母親上教堂，他的幼年和童年是在教堂裏度過的。

李景沆的父親管糧庫，上司向他勒索錢財，他父親李文甫為人正直，拒絕了上司的無理索求，竟被誣陷，二度投入監獄。等到二年後出獄，家中已一貧如洗。1945年秋，李景沆考進了西北師範學院數學系，隨身帶的只有一本聖經。

畢業後分配在天水一中教數學。他在一個無神論者執政的國家裏信仰上帝是一件十分艱難的事。他公開地亮出了自己的信仰，教學之餘努力學做木工、泥工和瓦工。萬一逐出學校，還可以混口飯吃。在反右以前的七年多的日子裏，他不斷地挨批作檢討，信仰活動由公開轉入地下，只有在晚上睡覺時用被子蒙頭做祈禱。幸虧他數學功底紮實，他的教學受到學生歡迎。

光陰荏苒，轉眼到了1957年。一天，中共地委組織部領導找到李景沆等三位教師，動員他們幫助黨整風。李景沆按上帝關於“要服從在上面掌權的人”的旨意，發言歌頌了共產黨。但組織部領導不滿意，說讓你們提意見，幫助黨整風，為什麼不提不幫？如此反復好幾次，李景沆不變初衷依舊歌功頌德，誇獎共產黨偉大。學校領導產生了懷疑：“李景沆說的是真心話嗎？他這個基督教徒能擁護共產黨嗎？唯物主義和有神論者是勢不兩立，水火不相容的呀！”

黨支部把李景沆劃入右派名單，向上級解釋道：“李景沆的右派言論不是在運動之中，而是在運動之前。他說過‘我害怕共產黨，因為共產黨要消滅宗教。’‘肅反把我嚇得跟貓娃一樣。’”

1958年5月的某天，李景沆接到通知，說領導要找他。他戰戰兢兢走進校長辦公室。領導告訴他，根據上級指示，他已經劃為右派分子。右派分子有二條出路，你算是罪行較輕的一類右派，可以自己選擇。一條是去國營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一條是離開學校自謀出路。領導解釋說，去國營農場勞動教養，表現好的二年後回學校繼續教書，不開除公職；而自謀出路等於開除公職。領導給他一個月時間考慮。最後，黨支部書記向他十分認真、十分嚴肅地提出希望：“你信仰上帝，說人是上帝創造出來的。而我們共產黨人說勞動創造人類，相信人是由猴子變來時。你下去勞動，好好改造思想，體驗一下人是由上帝創造出來的，還是由猴子變來的。”

這個虔誠的基督教徒犯了難，二者相較，各有優缺點。於是他決定讓上帝幫他拿主意。如果在這一個月裏無病無災，他便去夾邊溝勞教；如果有病有災，哪怕傷風咳嗽，便開除公職自謀出路。在這一個月裏他居然連小毛小病都壓根兒沒有，便遵從上帝旨意，去了夾邊溝勞教農



虔誠的基督教教徒李景沆  
手持聖經

場。

在反右運動中，天水一中高中部四十二名教職員工中，有六名被打成右派分子，內中有校長任紀文，早年參加中共，是中共隴南地下組織的成員。押送去夾邊溝農場勞教的除了任紀文校長和李景沆以外，還有歷史教師李振籬以及語文教師王錦、李紹桐、盧劍英一共六人。這六個人都是天水地區有名的才子。可惜除了李景沆奄奄一息地回到天水外，其他五人都餓死在夾邊溝，屍骨無存。



甘肅省蘭州市

夾邊溝是右派勞教農場，共有三千多人，二年後活著的不到六百人。一路上李景沆等人被武警押著，農場管理人員對他們吆五喝六。李景沆心想不對頭，勞動教養不應該是這個陣勢。他在被子裏縫了一本聖經。可惜百十來個人擠在一起，被窩裏黑漆墨東的，無法偷看聖經，聆聽上帝的教誨。每天干十多小時重體力活，晚上還要批判檢查。

一個月下來李景沆的體力逐漸不支。最令他恐懼的是晚上遺精。幾乎每天早晨，都會發現下身濕漉漉地一大片，天天頭昏腦漲，疲乏得爬不起來。晚上躺到鋪上，他暗自祈禱：萬能的主啊，你是宇宙的主宰。我今天已無力勞動，明天我可能就躺到工地上起不來了。同類們肯定會踩我，踢我，他們還要罵我：“李死狗，為什麼躺著不起來？”我一定會毫無尊嚴地永遠躺下去，永遠，永遠不再起來。主啊！我再沒有別的辦法，只能這樣，饒恕我的罪過吧！

他早先在水天一中學的木工手藝，現在起了作用，農場領導把他調到木工組，那裏的活輕鬆一些。可是口糧越來越少，周圍的夥伴一個個離他而去，就這樣掙扎到1960年末。夾邊溝農場右派大量死亡的消息傳到了北京，中央派出了檢查組到甘肅省檢查，同時中共中央西北局也責令甘肅省委處理善後。甘肅省勞改局關閉了夾邊溝農場，李景沆隨大批倖存者乘火車回到蘭州。掙扎到蘭州他已筋疲力盡，好心人把他送到天水。待板子車把他拖到家裏，已經只剩下一口氣了。回到家來不及同老婆打招呼，頭一件事便是趕緊做祈禱，感謝上帝救命之恩。

在文革中他又遭到一次浩劫。他被送進牛棚，受到紅衛兵、造反派的批鬥和奚落，同時還要勞動改造。這個基督教徒的信仰特別虔誠，在批鬥會上隨你紅衛兵、造反派把口號喊得震天響，他照樣能閉上雙眼默頌《聖經》呢。

## 澍培法師 佛門先賢

自唐朝起，佛教由唐僧傳入中國後，一直是中國的第一大宗教。然而中國有多少佛教徒，卻難以統計。同樣道理，反右運動中，中共在法師、主持、高僧、和尚、信徒中打了多少右派分子，似乎也較難以查考。

德高望重的澍培法師就是其中幾乎被人遺忘的佛教右派之一。澍培法師（1897-1986），法名釋權培。俗家姓包，名鴻運，生於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3月24日，家庭貧寒，蒙古族

人，出家後號念根。落藉於遼寧省朝陽縣，他的父親名憲儒，母親敖氏。

幼讀私塾，勤苦好學，十六歲在錦州毗盧寺依洪寬老和尚剃度出家，在毗盧寺撞鐘擊磬，禮佛誦經。民國九年（1902），年方24，在瀋陽萬壽寺受具足戒。萬壽寺住持省緣和尚有心辦佛學院，苦無授課的法師，勉強開學。澍培進了佛學院，成為第一屆學有所成弟子。受學三年，學了十部經書。他天資聰穎，敏而好學，獲益良多，學力大進。

民國十二年（1923）底，澍培在佛學院畢業後，又去北平彌勒院進修，並在北平普濟寺佛學院任教育主任，在普濟寺任教三年，他那誨人不倦的精神深受學生愛戴。民國二十年（1931）他成為天臺寺第45代法嗣。他的老師炎虛法師為他說的傳法偈為：“念念觀實相，根根脫六塵。澍滋甘露雨，培養未來因。” 這句偈語實為他一生的寫照。

民國二十一年（1932），澍培法師負責建設長春般若寺，同時建起青島湛山寺。般若寺建成後，澍培法師出任般若寺首任住持。在他苦心經營下，寺宇宏偉壯觀，佛像莊嚴殊勝，成為東北一大名剎。民國二十五年（1936），般若寺首度傳戒，戒子達一千六、七百名，每天用三十多袋麵粉，二十多個青壯年專管和麵。可見其規模之盛大。

澍培在傳戒後，在新戒弟子中選出六十多名優秀青年，興辦佛學院。前後辦了六期，為東北佛教界培養出三百多名僧才。從中選出十多名作研究生，學有所成者，送到美國、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地去弘法。香港有多名著名法師均出身於長春般若寺。

民國三十七年（1948）夏，應香港名士葉恭綽之約，遠赴香港籌建華南佛學院。未幾中共執掌大陸政權，澍培回到東北，在吉林觀音堂、哈爾濱極樂寺等處掛單。此後他二度朝禮五臺山，參加大同南善寺孟蘭盛會，應甘肅天水佛教協會之邀到甘肅講經，又在西安臥龍寺講了一段時間的經。他雲遊四方，足跡遍及大江南北。

1956年10月，澍培法師重回長春般若寺出任方丈。在1957年席捲全國的反右風暴中，與世無爭、潛心修佛的澍培法師也被卷了進去，戴上右派分子帽子，遷居在長春南湖的大佛寺，在大佛寺隱居了二十多年，逆來順受，足不出寺。

關於澍培法師劃為右派的原因頗多蹊蹺，眾說紛紜，澍培法師本人聽聞，一笑了之，不置可否。直到圓寂，未向他人吐露片語只言。據知情人稱，澍培法師之戴帽原因不外為二種說法。一說長春市中共的統戰部門和政府的宗教事務處召開“宗教界助黨整風鳴放會”，誠邀再三，澍培法師情面難卻，只得赴會應付應付。會上閉目養神，一語不發。官方主持者敦促再三，澍培法師不得不讚揚幾句共產黨，以“今天天氣哈哈”應付推卻。不料惹惱官家，以“消極對抗整風運動，表面平和，骨子反共”之莫須有罪名劃為右派；另一種說法是官方迫他在長春市找出若干名佛教界右派分子來。澍培法師以佛門慈悲，寬大為懷之理由推擋於寺門之外。由此引起上峰震怒，澍培法師以“包庇右派與右派同罪”之罪名，自己頂替了一個佛門右派的名額。

東北地區佛教興旺，佛學發達，高僧雪庵、澍培、妙湛三大法師名聞天下。中共抓出三大法師之一、禪宗最後一代受過皇封的禪師和吉林太極、坐功之先驅澍培法師，才總算出了一口惡氣，略解心頭之恨。

澍培法師在文革中又受到衝擊，紅衛兵和造反派掃四舊、砸寺廟，他這位“地富反壞右”和尚更加不能倖免。澍培法師任憑打罵污辱，合掌盤腿閉目靜對，運氣養神，六根清淨。

1978年右派改正，已屆耄耋之年，他依舊日誦佛經，潛心修持。作詩一首以釋心諗：“八十餘年夢幻身，飽嘗苦辣與艱辛。幸蒙黨政為昭雪，復做佛門愛國人。” 他做回般若寺方丈，任吉林省佛教協會會長、吉林省政協、長春市政協委員。

澍培法師桃李滿天下，一生興辦教育、小學和幼稚園。他能詩善畫，擅長畫蘭花和墨竹，生平積詩三百首，均毀于文革浩劫。1985年以九十高齡在般若寺傳了最後一戒。於1986年12月8日圓寂，世壽九十一年，法臘七十五年、戒臘六十六年。

他圓寂前的最後一句話是：“我要去西方極樂世界了。” 剎那間停止呼吸，含笑往生。

在長春的般若寺有三座佛塔。一座在般若寺前，那是般若寺始建者炎虛法師的紀念幢。寺後二座佛塔，分別供奉炎虛法師和第二代主持澍培法師的舍利。後來者仰慕而來，香火不絕。佛門弟子永遠懷念澍培法師這位佛門先賢。

## 馬震武（回） 受騙上當的世襲教主

馬震武（1895-1961），回族，雲南他朗（今墨江）人。原伊斯蘭教哲赫林耶沙溝門宦第八代世襲教主，曾任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委員和甘肅省政府委員、顧問等職，是回族和伊斯蘭教的著名教派領袖。

日偽時期，日本人曾打算成立“中國回教聯合總會”，最終捧出像滿州國皇帝溥儀或蒙古自治政府德穆楚克棟魯普那樣的傀儡和建立傀儡政權。日本人打算請出馬震武牽頭，組建回民政府，給馬震武嚴詞拒絕。蔣介石聞知，慌忙把他送往香港。

1947年5月，國民政府召開第一次國民代表大會，制定憲法。各民族各政黨均派代表參加。但國民政府只承認回教，不承認回族。寧夏馬鴻逵、甘肅馬震武、吳九如、古希賢均以回教代表身份邀請參加。馬震武強硬地加以拒絕。當甘肅省民政廳派員前去說服馬震武趕往南京參加會議時，馬震武回應道：“我是回回，不去當生活習慣特殊的漢人代表。這是對回回的歧視，也是回回的恥辱，我不能出席。” 又說：“我老了，抬不動老蔣的轎子了。”

毛澤東十分乖巧，他鑽了蔣介石的這個空子。1935年秋，毛澤東率領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經過六盤山時，率先在寧夏西吉縣西吉灘貼出標語《回族人民團結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討好攏絡強悍的回民。1936年在陝甘寧邊區又成立了豫海縣回民自治政府。

經過日、蔣、毛三方爭奪，馬震武在寧夏“和平解放”時歸順了中共和毛澤東。中共安排他擔任西北軍政委員會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固原回族自治州州長、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副主任等職務，把他列為宗教界和少數民族上層統戰對象。

1958年8月、9月間，反右鬥爭已經基本結束。在中共寧夏黨委統戰部和自治區政府宗教事務局的指揮下，銀川市連續召開幾次回民座談會，聲討伊斯蘭教界的右派分子馬震武。當時馬震武已年逾六十，很少出來活動，鳴放時沒有說過什麼話。可是《人民日報》配合銀川市的

“回民座談會”，發表了揭露他的文章，歷數他“解放前殘害群眾，無惡不作，血債累累。”、“解放後收買反革命分子，組織四次叛亂，利用宗教特權，殘酷剝削回民群眾。”向他清算起歷史老賬。可是橫揭豎揭，實在揭不出他有什麼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言行。為什麼在全國反右運動結束後，要在寧夏的回民中補這個課，揭發馬震武為右派分子呢？

原來1958年4月間，正在醞釀成立寧夏回族自治區時，回民和回族幹部試圖推舉在回民中享有崇高威望、德高望重的馬震武出來擔任寧夏回族自治區的領導，引起了中共的震怒。反右剛結束，中共好不容易奪回了中央和各省市原先為拉攏黨外人士而放出去的官位，現在回民又要出來鬧事。中共怪罪于馬震武，責問他已經給你當固原自治州的州長了，還不滿足，又想覬覦寧夏自治區政府的副主席，“沒門兒”。

中共將這種回族中的民間呼聲遷怒于馬震武，就勢借著反右運動的餘威，端掉這塊桀驁不羈的絆腳石。

剛烈成性的馬震武當然不服氣。過去我不買日本人和老蔣的賬，今天我行將就木，還怕你共產黨毛澤東嗎？中共見他如此，乾脆給他一個頂級極品一升格為極右分子。馬震武的極右帽子就是如此這般戴上的。

極右分子馬震武取消了上層統戰對象的一切待遇，削職為民。回族有句話：“回族有錢蓋房，漢族有錢存糧”。原來馬震武擁有的金積堡洪樂府、西吉灘住宅，規模都十分宏大，具有伊斯蘭風格。洪樂府住宅有十五個院落，有馬震武居住的“爺爺院”、他老婆住的“奶奶院”、有放經典和供熱依斯居住的“熱依斯院”、有接待賓客的“客房院”、有禮拜和幹“爾麥爾”的“亭子院”、有洗大小淨的“水房院”、有宰牲的“宰牲院”等等，悉數充公，掃地出門。

馬震武氣憤難平，自忍晦氣，上了共產黨毛澤東的當，沒有識破他們的權宜之計。鬱悶之中過了二年，1962年便去見真主了。

### 陳崇桂 愛國牧師 父子右派

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副主席陳崇桂牧師（1883-1963），原籍湖北省孝感縣，出生于武昌市。父親是一個無固定收入、走街穿巷的箍桶工匠，母親給人幫傭，做零活雜務，家境貧寒。

他是中國著名的基督教牧師和神學家。他的兒子陳仁炳教授是民盟上海分部的副主任。曾被鄧小平欽定為中央級五位不予改正的右派頭目之一。陳崇桂和陳仁炳是又一對父子右派。

陳崇桂六歲入基督教小學，十六歲便加入基



陳崇桂夫婦

督教，1899年在武昌瑞典行道會受洗。1902年畢業於英國循道會武昌博文學院。1908年後開始在湖北主持教務，曾到中國許多省份傳教和佈道，他為人慈祥溫和，在中國教會和教徒中享有崇高的威望。1919年在荊州參加五四愛國學生運動。1921年去美國惠靈頓大學留學，攻讀神學，回國後在行道會荊州神學院任教。

1925年在基督將軍馮玉祥部隊任隨軍牧師兩年，與馮玉祥建立了友誼。馮玉祥和李德全長期照顧其全家。甚至在陳仁炳劃為右派後，李德全還去探望過他。1929年，在長沙主持湖南聖經學院長達九年。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時被困新加坡達二年之久。1943年，在重慶與內地教會合作開辦重慶神學院逾十年。在重慶期間積極參加抗戰活動。

1949年與其他基督教會領導人吳耀宗牧師(中共特別黨員)等一起發動了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反對“三自運動”的中國基督教神學代表人物王明道認為：在神學思想上，一方面主張傳統的基督教教義；另一方面認為基督教徒應該積極參與社會活動，中國教徒應該為建設國家而努力，“清除教會內的帝國主義因素”。“三自運動”便屬於後一種情況。1954年，在中國基督教第一屆全國大會上陳崇桂當選為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副主席，全國政協委員。

陳崇桂牧師愛國愛教，在政治運動中曾寫出《我反對美帝國主義的理由》，配合打入基督教內部的中共特別黨員吳耀宗牧師，積極與外國教會劃清界限，他是基督教會內的親共左派。1957年他響應中共的號召，參加助黨整風運動。3月19日在全國政協二屆三次會議上發言，題目為《保護宗教信仰，尊重宗教信仰》。根據他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在全國各地巡視的情況，對某些地區的中共幹部違反宗教政策的現象作了批評。他的發言雖然比較尖銳，但是態度溫和，本意善良。

令他意想不到的，全國政協憑他的一番諍言，居然把他劃為右派分子。當時他已七十四歲高齡，是年歲最長的右派分子之一。更加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貫親共的兒子、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陳仁炳，在上海被毛澤東指名道姓地批評，欽定為上海右派頭子。陳老牧師從此閉門謝客，深居簡出。因心中鬱悶，健康狀況日漸惡化，於1963年3月8日在武漢蒙主恩召回歸天國。享年八十。

他的主要神學著作有《聖經總論》、《神的應許》、《實踐的基督教》等。

### 劉良模 他充當中共控制基督教的工具

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是中共控制基督教的主要工具。周恩來派遣已成為中共特別黨員的吳耀宗牧師擔任該委員會主席，劉良模和陳榮桂牧師任副主席，這二位副主席都是親中共的人士，對中共言聽計從。可是中共對這二個馴服工具仍不稱心滿意，在反右運動中把他們打成右派分



劉良模（左一）和周恩來（左二）

子，剝奪職務。這也是親共宗教人士的共同下場，中共把他們利用一陣後，眼見失去利用價值，便棄之如敝屣。

愛國宗教家劉良模（1909-1988）浙江省鎮海人士，1909年11月出生於上海的一個基督教家庭。他受家庭的薰陶從小篤信基督教。1932年畢業于滬江大學社會系。1934年便到基督教青年會當學生幹事。

抗戰期間，上海愛國青年很少有人不知道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有個劉良模。他積極鼓吹抗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他率領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組織軍人服務部和合唱團赴浙江省金華、寧波一帶宣傳抗日和慰問抗日部隊。

1940年夏，被基督教青年會派赴美國留學。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對日宣戰，美國支援中國抗戰聯合援華機構邀請他擔任該機構宣講員，到美國許多大、中、小城鎮，宣傳中國人民英勇抗日的事蹟。



牛次封居士駐蹕的成都昭覺寺

劉良模在美國用中文教黑人男低音名歌

手保羅·羅伯遜演唱《義勇軍進行曲》的軼事被傳為佳話，劉良模說服羅伯遜支援中國抗戰。羅伯遜努力學習，一句一句地用中文學唱。中文的咬字很難，羅伯遜在學唱時，劉良模在一邊指正。在美國舉辦的許多群眾大會上，羅伯遜用中文高歌《義勇軍進行曲》，並錄製唱片《前進》。羅伯遜用低沉的男低音歌唱的《義勇軍進行曲》迅速傳遍全世界，有力地推動了世界人民支持中國抗戰的運動。

馮玉祥和蔣介石有矛盾，避去美國。劉良模為不懂英語的馮玉祥做翻譯，幫助馮玉祥宣傳抗日救國的主張。抗戰中劉良模始終活躍在抗日救亡第一線，他到長沙教傷病員和老百姓唱救亡歌曲，在抗戰前線鼓舞士氣。

1949年，應邀回國參加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以唱《義勇軍進行曲》起家的劉良模竭力推薦《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他說：“國歌要代表一個民族，《義勇軍進行曲》經過非常長的鬥爭考驗，在群眾中是完全通得過的。所以用它做國歌，比臨時再寫一個國歌要好。”

中共建國後，他歷任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事工部主任，全國青聯副主席，上海市僑聯副主席，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副主席，第三至六屆上海市政協委員、常委。

1957年在人大會議上，與另外六位基督教人大代表作了一個聯合發言，批評政府對宗教信仰有成見。他們指出某些部門的表格中把基督教歸入會道門和迷信團體一欄。呼籲讓基督徒在國家建設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這一席肺腑之言就此一筆勾銷了他親共的功勳，把他劃為右派分子。

親國民黨的《香港時報》文章說，根據大陸一百五十六種報紙、五十七種雜誌作出的一個

確切的、但是不完全的統計，1950年至1953年的三自運動期間，被監禁的基督教徒達六萬人。其中被處決的共二千六百九十人。在1957年至1958年由中共操縱的“基督教三自愛國會運動委員會”領導的反右鬥爭期間，被劃為右派的新教徒不計其數，其中被處決的有一千二百三十餘人。

1978年劉良模的右派改正後，復出擔任中國福利會執行委員會委員，並做過一屆上海市政協副主席。1988年病故。

### 牛次封 牛次封居士的右派改造計劃

成都著名作家冉雲飛先生在成都市舊貨市場用三百五十元，偶然購得四十斤重的中共內部人事檔案材料。對於一個現代史研究學者來說，如獲至寶。各地現有不少研究歷史的專家學者，經常留意各地的舊貨市場，每每有所收穫。中共那些人事幹部不學無術，他們隨意把階級鬥爭年代的檔案材料當作廢紙賣掉，為單位裏的小金庫增加財源。此一舉措當然是不符合中共的保密條例和人事工作守則的。唯物辯證法告訴我們，世界上任何事物均有其兩面性。把檔案材料當廢紙賣錢，固然違反中共的保密制度，不值得提倡。可是卻也為專家學者大開方便之門，為有心的專家學者提供了寶貴的研究資料，壞事變成好事。

冉雲飛先生買的四十斤人事檔案中，有1957年成都市佛教協會反右運動的原始記錄。1957年1月8日成立的成都市佛教協會，秉承成都市宗教事務管理處和中共成都市委統戰部的旨意，在成都市佛教界大抓右派。冉雲飛買下的人事檔案資料中，存有寬霖、隆蓮、清定、澄濟、貫通、解空、悟能、隆光、牛次封等人劃為右派和改造情況的原始筆錄。除了成都市佛教協會副會長牛次封是居士外，其他人均是削髮為僧的出家和尚、尼姑、道士。和尚右派、尼姑右派、道士右派也稱得上是陽謀中的一絕。

牛次封居士（1894-1967）出生於清朝末年，四川成都人士。自幼家貧。對佛學深有研究。成都市佛教協會駐紮在全國十大名剎之一的昭通寺內。牛次封也在此地辦公。

1957年初，中共成都市委統戰部和成都市宗教事務管理處動員宗教界大鳴大放，召開了多次座談會。宗教界人士受騙上當，紛紛中槍落馬。佛教主張直樸歸真，襟懷坦誠。牛次封居士按照中共要求提了一些意見和建議，卻不料大禍臨頭。中共在佛教界也訂有劃右指標。牛次封居士頂了個居士中的右派名額。

1958年3月20日，成都市佛教協會發文稱，牛次封“一貫站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動立場，敵視黨和人民政府，利用宗教四處挑撥離間，嚴重地破壞黨的宗教政策。在我會開展社會主義教育學習中，揭露出了許多十分嚴重的反黨罪行。除受到嚴厲的駁斥而不得不低頭認罪外，根據其罪行確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右派分子。反右之後，又再公開翻案，不服罪，不接受改造。我會認為罪行嚴重，而態度又屬惡劣，應從嚴處理。決定給予撤銷市佛協代表、理事、常務理事、副會長、學習組長等職務處分。取消其一切政治待遇，並給予停職降薪處理。”

牛次封居士戴上右派帽子後，認真接受改造。一改過去的態度，對共產黨唯唯諾諾，惟命



是從。例如他在1959年9月29日上午，在市佛協與各宗教右派分子座談《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確實表現好了的右派分子的處理問題的決定》及宗教處王處長的講話時說：“崔亞漢（第一批摘帽右派）是我們的典型，我們向她學習。我想過去戴右派分子的帽子和現在摘右派分子的帽子，都是有規律的。我今後只有在工作中努力地做，好好地爭取。我雖然是六十幾歲的人，但我總要說到做到，拿我的實際行動來表現。如佛經上說的，船上有烏鴉，在大海中任它如何飛，飛累了，還是要落在船上。船就是由黨掌的舵，因此離了黨是不行的。”這些違心的話馬屁拍到了家，至於共產黨是否領情，牛次封不得而知。他認為這樣說說可能還不足夠，必須進一步表明心跡。於是在1960年1月8日再寫出了一份牛次封居士右派改造規劃。他認真地列出十條措施：

一，絕對服從黨的領導，對黨的一切政策法令和號召，保證做到自覺遵守和主動響應。

二，堅決擁護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保證不被右傾機會主義者的任何謾言所迷惑。自己思想上若有絲毫動搖，便會妨礙自己的改造。

三，如果聽到或發現任何人有不利於黨的事業的任何言論和行動，做到無保留地向黨領導據實反映，如遇情況重大的反革命活動，並立即報告本管派出所。

四，自己如果發生思想上不能解決的問題，保證以忠誠老實的態度，向黨交心，求得解決，以促進自己的改造。

五，在改造過程中，繼續認罪服罪，保證決不口是心非，若有倒退，自掘墳墓。

六，繼續接受群眾監督，促使自己改造得更快更好。

七，在總路線光輝照耀的新形勢下，努力學習政治，提高政治思想認識，徹底轉變過去的反動政治立場，永遠跟著共產黨走，並為爭取將來參加城市人民公社創造條件。

八，在館、寺中努力爭取力所能及的勞動，使自己逐步樹立勞動光榮的新觀點，改造掉好逸惡勞的舊習氣。

九，在業務上，從原有工作基礎上，繼續向全組學習，爭取多做一份工作，多贖一分罪過。

十，在祖國繼續大躍進的新形勢下，決心鼓足幹勁，把國務院指示的三個方面，作為自己改造的目標，決不鬆勁、洩氣、甘居下游。

以上各條，保證以實際行動，說到做到，爭取早日回到人民隊伍中來，對社會主義事業能夠有點滴貢獻。

牛次封

1960年1月8日

牛次封居士終算在有生之年摘掉了右派帽子。可是在死後才獲得改正。只有含笑九泉，感謝黨和政府無微不至的關懷。

定持法師 偷渡和尚

中國之怪，無奇不有。本文講述一位右派法師偷渡的故事。

定持法師(1921-1999)俗姓陳，名金藏。出生于廣東省南澳島雲澳區澳前鄉鹽埕尾的漁民之家，從小貧苦。據說他是一位武進士的後代。1931年，怡深法師來中柱鄉天后宮“普渡”，夜間掛單於世德堂。他當年才十歲，央求怡深法師說：“請收我為徒吧，我要出家。”法師說：“聽說你父母不同意，我們先做個朋友來往吧。”

1936年母親病故，他步行四公里到疊石岩，再取道屏山，拜見怡深法師，懇求收留。他終於在十六歲時，在南澳島屏山岩落髮出家。取外字定持，法名心傳。1938年與潮陽縣北山岩釋道明師，同往南京寶華山隆昌寺受戒，妙柔大和尚為得戒師。次年移住鎮江金山的江天寺學禪，拜首座釋遐明為第一位善知識。

他在1940年去蘇州，住靈岩山寺，學淨土宗。第二年由了然首座保送，入青島湛山寺佛教學院學習，學天臺宗。1946年畢業後，被錄取到剛成立於上海圓明講堂的楞嚴專宗學院進修，深造佛學。在校期間，他既當學僧，又兼做中國一代高僧、講堂住持圓瑛大師的秘書。圓瑛大師為中國佛教協會首任會長。1949年畢業考試，他的成績在全班四十人中獨佔鰲頭。應請到潮州開元寺當法師，與慧原法師輪流講經。

1950年中共掌權之初，他和汕頭市竹林精舍鄭參廣同在南澳島，準備坐船回汕頭時，突遭中共軍警視有敵特嫌疑而拘捕，前來送行的釋長慶亦被捕。經親友出面證明他們是好人，才獲釋放。

汕頭市在1955年成立佛教協會時，他當選為首屆佛協的副會長，搬住到汕頭市國平路十一號市佛教協會。中共向來視宗教是毒害人們思想的精神鴉片。1957年整風反右期間，中國的宗教界也受到極大衝擊，在中共統戰部門和政府宗教事務局的領導下，基督教、天主教、佛教、伊斯蘭教等所有宗教團體都召開會議，分頭大抓右派。

他接到上級通知，集中到武漢市參加中南地區六省市佛教界領導人會議。中共中央統戰部派出一位副部長做報告，點名指責釋虛雲是右派分子。在會議討論時，他大膽地說：“虛雲法師已百餘歲了，說錯話是正常的。若劃他右派，在世界上影響不好。”

回到汕頭後，他在大鳴大放中提出了若干條善意的見解，遂與原嶺東佛教協會理事長釋又宗等潮僧十餘人，劃為右派分子。劃右後遭受一連串精神迫害，每天早晚要口頭彙報，三天寫一份檢討書，七天一份《改造彙報》。又與釋又宗一起遭送去修建普同塔，以後又到汕頭市針織三廠勞動。

香港大嶼山蓮池寺方丈釋玄行瞭解他的處境後，非常同情，擬邀請他來大嶼山接自己的班，密寄他八百元人民幣作偷渡費。

1964年他約同三位朋友，在汕頭海濱廣場沿岸登船，一起偷渡。

可能由於船主告密，上了船便被公安人員拘捕，扣押在汕頭市公安局看守所。審訊時逼迫他們交待叛國投敵罪。定持法師如實交代自己是個出家人，偷渡香港是去大嶼山當和尚，六根清淨，與世無爭。審查五十六天，實非反革命分子，便全部轉為監外管制。

他原本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分子，又犯了叛國投敵罪，1966年文革乍起，右派和尚晉級為牛鬼蛇神、階級敵人。頻遭遊街、家、批鬥、牛棚的凌辱。1967年在清理階級隊伍中，與七、八十名各色牛鬼蛇神，被造反派和紅衛兵囚禁達十五個月之久。

1978年改正後，他總算松了口氣，依舊做回他的和尚。自1987年起連續出訪新加坡、法國、泰國、緬甸。1999年世緣告盡，在廣東省南澳島古剎屏山岩圓寂。世壽七十八，僧臘六十二，戒臘六十。

他歷任廣東省佛教協會第二屆副會長、中國佛教協會第五屆常務理事、廣東省政協委員、汕頭市政協常委、中國佛協諮議委員、廣東省佛協名譽會長等職。他曾受聘為浙江省奉化雪竇寺方丈、潮州開元寺方丈、香港大嶼山蓮池寺方丈、首屆陸豐市清雲山定光寺方丈，還被聘為《廣東佛教》顧問、哈東佛學院顧問。

作品有《行足吟》等。

縱觀定持法師跌宕起伏、大悲大喜的一生，他曾經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犯有叛國投敵罪，淪為中共的階下囚；另一方面，他又當過高幹和尚、和尚高官和統戰和尚，享盡榮華富貴，奉為中共的座上客。後人作詩為證：

竹林弘法曆八旬，  
不覺屏山月已圓。

## 第二節第一屆全國人大中的少數民族三大右派

### 馬松亭(回) 伊斯蘭教領袖

馬松亭（1895-1992），北京人，誕生於伊斯蘭教家庭，回族。名壽令，字松亭，以字行。他是中國伊斯蘭教有名的經學家和教育家。自幼聰明好學，幼年曾隨達浦生大阿訇習經。自習了阿拉伯語、波斯語和《可蘭經》等伊斯蘭教經典和語言文字。後到河南新鄉、開封、孟縣等地求學。他是伊斯蘭教大阿訇，是中國伊斯蘭教近代四大阿訇之一。

自從他二十六歲畢業於北平花市清真寺起，歷任北平、河北、濟南、重慶、香港、臺北等地清真寺教長。曾參與創立和主持北平成達師範學校和北平回教經學院，培養伊斯蘭教師資，創辦《月華出版社》，出版《月華》雜誌和伊斯蘭教經籍。1930年代曾出訪埃及和沙烏地阿拉伯等國家。到麥加朝聖，受埃及國王接見。回國後，在北平發起成立“中國埃及文化協進會”、福德圖書館，並選派回族學生到埃及愛資哈爾大學深造。

抗戰期間，參加北平市各界人士的抗日宣言簽名活動；在桂林參加周恩來舉行的“第三方面人士招待會”，響應中共堅持抗戰的號召。中共建國後，曾參加赴朝慰問團慰問志願軍。歷任中國回民文化協會副主任、中國伊斯蘭教經學院副院長和名譽院長、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副主任

和副會長等。為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第二、五、六、七屆委員，著有《回教和人生》等書。

從以上的經歷中顯然可以看出，馬松亭是一位愛國愛教的大阿訇，一生緊隨中共，是中共在少數民族和宗教界的重要統戰對象。可是到了1957年反右運動中，卻把他打翻在地，成為少數民族的三大右派之一（還有二位是苗族歐百川和僮族黃現璠）和伊斯蘭教的大右派。1957年在中共中央統戰部的操控下舉行了一次“中國回民文化協進會第二屆代表會議”，集中火力揭批右派分子馬松亭。當時極盡污蔑造謠之能事，顛倒黑白、歪曲是非，把馬松亭批判得一無是處。試看揭批出來的馬松亭右派言行：

“據揭露，右派分子馬松亭是一個長期披著宗教外衣的反動的政治野心家。三十多年來他不但勾結北洋軍閥、國民黨和回族中的敗類白崇禧、馬鴻逵、馬步芳等反對共產黨，而且利用阿訇的身份出賣宗教，出賣回族利益。解放前他曾經借中國穆斯林領袖的名義，三次出國到中東各伊斯蘭教國家宣揚國民黨反動派的所謂德政，詆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全國將要解放時，他遺棄妻子兒女由北京逃往上海，借著李宗仁假意和談的機會等待中國出現南北朝局面。上海臨近解放前一個月，他逃往臺灣，蔣介石反攻大陸的妄想被全國人民打破以後，馬松亭才採取兩面派的手法回到北京。共產黨和人民政府以不究既往的寬大精神爭取他為回族人民立功贖罪，並且推舉他擔任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副主任、中國回民文化協進會副主任和北京伊斯蘭經學院副院長的重要職位。但是馬松亭回大陸以後，仍然對共產黨抱著敵視的態度。這次，馬松亭借共產黨整風的機會，向共產黨大肆進攻。他在伊斯蘭教界和回族人民群眾中到處煽風點火，企圖在宗教和民族問題上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妄想恢復他在國民黨時期的統治勢力。”

“右派分子馬松亭在社會主義學院學習時，借著共產黨整風的機會，在學院中散佈毒素，僅是大家記錄下來的反動言論就有五十六條之多。他說‘現在的回民都很苦惱’。他在學習中如此說，在親朋好友中也如此說，企圖挑撥共產黨和回民群眾的血肉關係。馬松亭散佈說，共產黨把他和達浦生當作二盆鮮花。一盆擺在伊斯蘭教協會，一盆擺在回民文化協進會，供人觀賞。馬松亭不是一盆鮮花，是盆毒草。”“他進一步誹謗回協是‘同化回民’的機構。說回協裏的共產黨幹部不懂回民的事，企圖剝奪共產黨對回協的領導權。身為回協副主任，他謾罵靠近共產黨的回族進步青年脫離了回民群眾，吃起了豬肉；回民姑娘都嫁了漢人。他瞧不起其他進步阿訇，諷刺穿制服的阿訇是紅色阿訇。”

“去年（1956）馬松亭召集北京回民牛羊業者開會。他在會上痛哭流涕地說，解放前回民牛羊業者只管賣牛羊肉，不管飼養工作，解放後為什麼要做這些事？馬松亭痛恨共產黨領導人，公然聲稱要在回民問題上首先向劉格平和馬玉槐（都是中共黨員）開刀。他和右派分子葛佩琦一樣，喊出了殺共產黨人的口號來。”

“馬松亭利用辦成達師範學院的機會進行反動的政治活動，主張像其他伊斯蘭教國家一樣政教合一。規定辦成達師範學院的三大目的是訓練教長、校長和保甲長，披著宗教外衣為國民黨反動派服務。他曾經與朱家驊、陳立夫、陳布雷勾結在一起，幹反對共產黨的勾當。當年白

崇禧在四平街打了敗仗，晚上坐飛機回到北京，當晚就用小汽車把馬松亭接到官邸去密謀決策。”

“有人進一步剝開馬松亭超政治阿訇的畫皮和老底，在成達師範學院把國民黨黨課列入主要課程。他把聽延安廣播的學生趕出學校，他最得意的學生都成為國民黨特務。他號召回民進行勘亂建國，把清真寺作為勘亂建國的基地。他利用阿訇的身份到處奔走，到上海、南京、甘肅、寧夏、青海等地為勘亂建國呼籲。馬鴻逵給他一萬塊白洋作反共活動經費。他在埃及吹噓自己是五千萬回民領袖。”

被共產黨操控的紅色阿訇一致指責馬松亭是個披著宗教外衣的反動政治野心家，他被逐出一切回民組織，剝奪了政治權利，憂鬱地度過一生，享年九十七歲。不論中共如何對他誣蔑，馬松亭仍然不愧為一個對回族和伊斯蘭教有貢獻的偉大的阿訇。

### 歐百川(苗) 八一名將

少數民族三大右派之二的歐百川（1894-1970），苗族，號學海，又名廷芳，貴州省松桃苗族自治縣盤信鎮柳埔寨人。1916年畢業於貴陽模範中學。1918年進入貴州警察傳習所學習，與朱德同學。1920年畢業後分配回松桃縣擔任保安糾察隊長。半年後加入黔軍第一混成旅，歷任排長、連長、營長、團長等職。曾就讀於中央軍校高教班第六期和陸軍大學特別班第七期。

1926年夏天，賀龍率川黔邊防軍第九混成旅駐防銅仁。歐百川率領黔軍一個團編入銅仁的賀龍部，在賀龍部任上校團長，副師長等職。隨賀龍參加北伐戰爭。賀龍升為二十軍軍長，歐百川也升任第一師副師長兼團長。1927年隨賀龍的部隊參加八一南昌起義，第一師在歐百川指揮下完成了圍殲駐南昌第九軍教導旅和第三軍留守部隊的任務。後隨賀龍、葉挺進軍廣東，歐百川任前敵司令，在廣昌擊潰錢大鈞部，立下了戰功。可惜後來在進攻揭陽、湯坑時，與賀龍失去聯繫，隻身投靠國民革命軍獨立師羅啟疆部，先委以中校參謀主任、後提升為參謀長。

1934年羅啟疆部參與追剿賀龍的紅軍第三軍團，歐百川極力主張與賀龍言和，羅採納他的意見，未傾全力追剿賀龍。

1937年抗戰爆發，歐百川辭去參謀長職務，擔任七〇二團團長，參加抗戰。1939年夏，歐百川升任八十二師副師長，參加二次長沙會戰，作戰勇猛，有力打擊了日寇的氣焰。他率領的貴州苗家子弟兵特別能打仗，俗話說：“八千子弟兵，八百貴州人。” 曾被委任南京國民政府國防部高參，但拒絕赴任。軍銜為國民革命軍中將。賀龍誇獎他是“身在曹營心在漢”。即指他身在國軍，心在共軍。

1950年中共軍隊進入貴州後，歐百川返回貴州。經賀龍推薦，任貴州省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和主任、貴州省政協副主席、貴州省副省長、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委員、民革貴州省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等職。

中共通過反右運動，要將各省市任職的非黨人士全部趕走。有右派言論的當然不在話下，即使沒有右派言論，可以用放大鏡在以往的歷史或言行中尋找，總有蛛絲馬跡可循。歐百川離

開賀龍的部隊後又回到國民革命軍，圍剿過工農紅軍。第二次國內戰爭期間與共軍對峙。這些無疑都是抓右派的根據。賀龍的誇獎和保舉、參加八一南昌起義並立下戰功以及後來長沙會戰抗擊倭寇的功績都救不了他的命。他被打成貴州省最大的右派，也是民革最大的右派之一。由於歐百川是貴州苗族人，所以他是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大會中三大少數民族右派之一。撤銷一切行政職務，監督勞動。

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又作為貴州省最大的牛鬼蛇神、國民黨的殘渣餘孽被造反派和紅衛兵揪出來批鬥。從自己的住房裏掃地出門。一代名將歐百川窮極潦倒，敗落不堪，於1970年含冤而死。

### 黃現璠(僮) 毋須揚鞭自奮蹄

1938年10月出版的《中國通史講稿》是黃現璠教授在廣西大學和中山大學擔任教授時的講話。它的珍貴之處，在於三十多萬字的巨著，全部用毛筆字恭正手書。世人稱他為“桂海學術泰斗”。可惜後來他被打成為中國少數民族三大右派之一。

黃現璠教授（1899-1982），僮族，原名甘錦英，出生在廣西省扶綏縣渠舊鎮三合村一個貧苦的壯族農民家庭。少年時聰穎好學，少時立志為改僮鄉的落後面貌而奮發學習。1922年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廣西省立第三師範學校。在艱辛的求學道路上，他先後考上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北師大研究所研究生、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研究院研究生。師從著名歷史學家陳垣、鄧之城、錢玄同和日本漢學權威和田清以及加藤繁等著名教授學者，在學九年。



壯族歷史學家黃現璠

1927年9月回國，先任南寧高中教員；後任廣西大學助教、講師、副教授；繼而出任中山大學、桂林師範學院和廣西大學教授。1953年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他出任廣西師範學院歷史系教授、訓導長、中文系主任、圖書館館長。他是出身僮族的第一位教授，他同時被推舉為廣西省政府委員、省人民委員會委員、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

黃現璠教授熱愛自己的民族，嚴謹治學的學術風範高尚，一生致力於歷史學、民族學、民俗學的研究，建立了豐碩的學術成果。他的民族思想觀念在他的史學研究中佔有重要地位。對僮族興衰命運的關懷，使他傾盡心血，不辭辛勞地投入到僮族史學研究中去。一生數十次帶隊深入少數民族地區，與他們同吃同住，關心他們的疾苦，為少數民族奔走呼號。

1956年他出席全國人大一屆三次會議後，就僮族的民族問題同周恩來探討。著手編著《廣西僮族簡史》，力陳廣西成立僮族自治區之必要性。少數民族保有語言，很少文字。少數民族歷史一般都用漢語記載，因此他集中力量收集民族聚居區和土司頭人手中殘留的歷史史料。糾正漢語資料中的歧視、歪曲和訛傳之處。

中國少數民族必定經歷奴隸社會，這幾乎已成為史學界的定論。黃現璠經過考察研究，大膽地推翻了這個結論，提出奴隸制和奴隸社會存在區別，奴隸制並不代表奴隸社會。他進一步提出中國古代根本不存在奴隸社會，漢族歷史必須重新分類。這一論點推翻了馬克思的人類社會發展史，突破中共的歷史禁區，引起軒然大波。以往中共的歷史學家向來把奴隸社會當作人類歷史的必由階段。這一來，黃現璠教授捅了個馬蜂窩。

他的這些研究成果和獨創性的學術主張在1957年那個黑白顛倒、是非不分的年代，莫名其妙地被扣上“狹隘地方民族主義”、“唯心主觀主義歷史學觀”、“否定馬克思主義歷史辯證法”等幾頂大帽子，劃為廣西文化教育界頭號大右派。由於他實事求是、嚴肅認真的態度，又被批為“負隅頑抗、拒不認罪”，升級為極右分子。因此他是全國上層九十六位極右分子之一。撤銷一切職務，下放勞動。

1961年他以六十二歲高齡摘掉右派帽子，重返史地系任教，講授《中國歷史文選》課。他不顧年老體衰，拄著拐杖深入少數民族地區調查研究。1979年他已八十高壽，右派才獲改正。

黃現璠教授是一位少數民族中罕見的歷史學家、民族學家和社會活動家。1999年在他誕生一百週年的紀念大會上評價他是僮學宗師、二十世紀中國學術事業的奠基人之一、中國現代民族學奠基人之一。廣西師大和桂林中學分設《黃現璠少數民族獎學金》和《黃現璠獎學金》，以紀念這位少數民族的傑出學者。

黃現璠生前出版一百多種學術著作，共有二、三百萬字，可謂著作等身。他的大部分著作都被學術界列為經典之作。

### 第三節 少數民族右派

#### 龍 雲(彝) 龍雲反蘇打入另冊

雲南王龍雲（1884-1962）一是雲南省彝族人，彝名納吉岬岬。1884年11月19日生於雲南省昭通縣炎山區松樂村下營盤，原名登山，字志丹。龍雲一生經歷了從士兵到上將的人生旅程。他自幼習武，練得一身好拳腳。憑著一股正氣和一身精湛的武功，隻身闖進綠林頭子順江王于海山的老巢，一舉殺掉于海山，為民除害，威振金沙江。

1911年龍雲與好友盧漢在四川加入反清部隊，年底與盧漢等人率部百餘人投奔滇軍謝汝翼梯團（旅）。自此龍雲加入滇軍，開始其不平凡的一生。1912年他和盧漢被送進雲南講武堂第四期學習，龍雲學騎兵科，盧漢學步兵科。1914年龍雲自講武堂畢業後，分回昭通獨立營任少尉排長。後被調回昆明，任



龍雲（左）和陳銘樞

都督唐繼堯的中尉副官，深得唐的歡心，當上了都督府警衛部隊大隊長。

1921年，唐繼堯曾被內訌部隊奪權避走香港。他策動駐在廣東廣西的滇軍返滇奪權，龍雲被委為前敵司令兼第一軍軍長。1923年初唐繼堯復辟成功，任命龍雲為第五軍軍長兼滇中鎮守使，駐守昆明。頓時成為滇軍和雲南的第二號人物。

此後，經過雲南軍閥的內鬥，反復爭奪政權軍權，龍雲憑藉實力和智慧，最終驅逐唐繼堯、胡若愚等軍閥，經過三年苦戰混戰，龍雲取得勝利，出任雲南省政府代理主席，統一了雲南全省。1928年底，南京國民政府發佈雲南省政府組織令，委任龍雲為主席。龍雲利用雲南特殊的地理環境，遠離中原戰亂和赤禍，自成一體地在政治、軍事、文化、教育、經濟等各方面整頓和改革，建設新雲南，收到相當成效。使雲南成為民國時期相對穩定和繁榮的一個省份。龍雲被人們稱為雲南王。

如果將龍雲褒獎為抗日將軍毫不為過。抗戰爆發後，他曾會晤周恩來、朱德、葉劍英等中共代表，擁護建立抗日統一戰線。龍雲的功績，一是組織二十多萬滇軍各民族戰士奔赴抗日前線。在台兒莊一線與日軍浴血奮戰，有的營五百名戰士只打剩下一人。他率領的彝兵，使日軍聞風喪膽。二是開闢滇緬公路，打通了抗日的國際通道。龍雲在抗日誓師大會上說：“我們彝族老祖宗治軍有個規矩，前面有刀劍傷者，獎；後面有刀劍傷者，刀砍其背；我們決不貪生怕死，做脊背挨子彈的逃兵，誰給老祖宗丟臉，軍法不容。”

台兒莊戰役打勝了，滇軍威鎮敵營。但滇軍參戰的四萬多官兵，只剩下二萬。龍雲共向抗日前線派兵二十萬，打了二十多次戰役，組織了滇西大抗戰，傷亡官兵十多萬。至於用“三根雞毛、一副手鐐下達築路飭令修築滇緬路”的故事使他譽滿全國。

抗戰時期的龍雲逐漸向中共靠近，成為中共忠實的盟友。他不滿蔣介石排擠地方勢力。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共雲南地下黨看准這個機會，積極爭取龍雲。1944年底，龍雲秘密加入中國民主同盟。

1945年10月初，按照蔣介石指令，杜聿明指揮中央軍包圍了昆明城，解除龍雲的警衛部隊和守城滇軍的武裝，史稱一〇三事件。大軍壓境，龍雲被迫離開雲南到重慶，就任軍事參議院院長，結束了統治雲南長達十八年的歷史。1948年12月，在陳納德等人的幫助下，龍雲化裝逃出南京來到香港。到了香港，他竭力策動雲南起義。1949年8月1日，龍雲、黃紹竑等四十四位上層民主人士在香港發表聲明，脫離國民政府。

中共執政後，毛澤東簽署命令，任命龍雲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國防委員會副主席、西南軍政委會副主席、一屆全國人大常委等職。他同時還擔任民革中央副主席。

1957年助黨整風期間，龍雲就蘇聯老大哥欺侮中共小兄弟，大膽揚言：

一·抗美援朝的經費，全部由中國負擔，不合理；

二·第一、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借款給盟國，又實施租借法案，他們有的賴了債，有的不要他們還了。蘇聯對我國借款，十幾年都還不清，還要付利息。中國為社會主義而戰，結果如此；



三·蘇軍解放我國東北時，拆走了工廠中的機器，有無代價？償還不償還？

四，我國援外預算太大，主張抓緊壓縮對外的援助；

打入民革內部、擔任民革中央副主席、在1933年秘密入黨的中共特別黨員王昆侖對龍雲的四條“謬論”逐條進行批駁。

一·沒有蘇聯援助，抗美援朝能打勝嗎？社會主義國家休戚相關，互相支援是應該的；

二·龍雲反蘇親美，難道我們要依靠美國，為資本主義而戰嗎？

三·蘇聯幫助我們解放東北，如不搬走這些機器，難道要讓給國民黨嗎？

四，龍雲要求緊縮援外，好像是愛國，但到底是愛社會主義之國，還是資本主義之國？

這種強詞奪理、牽強附會的批判叫人笑掉大牙。此外，龍雲針對漢字簡化和中文拼音化，同文字學家陳夢家一樣感慨地說：“文字改革犯了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錯誤。”

《人民日報》進而大揭龍雲的老底，清算龍雲統治雲南十八年，剝削奴役雲南各族人民的滔天罪行；龍雲幫助蔣介石圍剿紅軍；龍雲發國難財；龍雲安插親信，搞獨立王國；龍雲在法商東方匯理銀行有大筆存款。如此這般徹底否定了中共自己親口表揚龍雲是“抗日民族英雄”、“愛國將領”、“共產黨忠實的朋友”、“站在反蔣第一線”、“和平解放雲南的第一功臣”等等讚美之詞。這種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惡劣態度是中共對待自己過去的盟友和患難知己的一貫作風。

胡批亂鬥一通之後，給龍雲按上了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的帽子。龍雲自然極不服氣，義憤填膺。於1962年6月27日因急性心肌梗塞含恨而死。龍雲死後次日中共中央統戰部假惺惺地馬上替他摘掉帽子，組成以陳毅為首的“龍雲同志治喪委員會”。周恩來、彭真前往弔唁。在悼詞中又大唱起讚美詩，什麼“龍雲的一生為國為民、光明磊落”。重新給他戴上“愛國將領”、“抗戰英雄”、“我們黨的一位忠誠的朋友”之類的大帽子。

中共對龍雲的態度和評價前前後後、顛三倒四、反復無常，難道這是毛澤東所說的原則性和靈活性嗎？

## 蕭 乾(蒙) 郭沫若恨之入骨的文學大師

中國當代著名文學家和翻譯家蕭乾（1910-1999）是出生在北京的蒙古八旗人，曾用名蕭炳乾、蕭秉乾。蕭乾向人介紹自己的祖籍時說起過：“我這個蒙古人對蒙古族瞭解甚少。但我早就知道自己是蒙古族。最近有人考證出我的祖籍是錫林格勒草原察哈爾部林丹汗後裔漢化姓蕭的蕭德氏一族。”因此他曾用蒙文名“塔塔木林”。他回憶道：“小時候每年都要祭祖，祖宗牌位是用曲裏拐彎的蒙文寫的，很像一條條毛毛蟲。那大概就是家譜。——牌位上雕的祖宗都是牧民模樣。”

幼年時候蕭乾父母早亡，靠親戚撫養。他半工半讀，織過地毯、送過牛奶。念書時他不敢申張自己是蒙古族，怕別人罵他“小韃子”。以後他一直說自己是漢族。直到1956年中共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幹部要重新登記，出於對組織要忠誠老實，他才把籍貫改回蒙族。

1926年他在北平崇實中學讀書時，因參加中共領導的青年團而被捕，後被學校當局保釋。他的處女作短篇小說《蠶》於1933年發表在《大公報》上，引起了轟動。由此他與當年在北平主編《文學季刊》的巴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兩人一直交往到上個世紀1970年代。巴金對蕭乾的文學創作有深刻的影響。

1932年他曾有一段時間去福州擔任福州英華中學教員。1935年畢業於燕京大學新聞系。畢業後任職於《大公報》社，在上海、天津、香港當過記者。1942年他擔任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講師兼《大公報》駐英記者。1942至1944年進入劍橋大學專攻英國心理派小說。二戰時期，蕭乾採訪過歐陸戰場、聯合國成立大會、波茨坦會議和紐倫堡審判戰犯等重大事件。回國後，在復旦大學等幾所名校擔任教授。

1948年郭沫若慶祝五十大壽。蕭乾發表文章抨擊郭沫若《大張筵席》、《稱公稱老》。郭沫若見之，恨之入骨。立即回擊《大公報》和蕭乾是“黑色文人”和“黑色鴉片”。從此蕭乾和郭沫若結下怨仇，也種下了禍根。郭沫若是中共和毛澤東跟前的紅人，在毛澤東耳畔吹風稱蕭乾不怎麼樣，毛澤東受其影響始終不看好蕭乾。由此看來，蕭乾在1957年戴上右派帽子也是勢所必然的了。

中共建國後，蕭乾繼續在《大公報》任職。他先後擔任過中央文史館副館長和館長、民盟中央常務委員、民盟中央參議委員會副主任、全國政協委員和常務委員等要職。1954年蕭乾與文潔若結婚，文潔若是位有名的才女，夫妻倆在事業上相得益彰。

1956年起蕭乾出任《文藝報》副主編。任職不久，中共中央召開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毛澤東在會議上作了聞名的《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大肆宣揚“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政策，動員和鼓勵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要大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且保證不抓辮子，不打棍子，絕不報復。蕭乾也應邀出席會議，他像中國其他善良真誠的知識份子一樣，被毛澤東偽善的面目所迷惑，受到莫大的鼓舞，以為共產黨真的要把知識份子當作自己人了。

到了5月底，《文藝報》主編、黨組書記張光年把蕭乾請到張光年那間古雅典樸的書房裏，滿面春風地對他說：“我知道你參加那刊物是很勉強的。所以到任後，尊重你的意見，每週只占你二三個小時，開開會，旁的儘量不麻煩你。可現在，一個黨員副主編身體不適，要在家休養一段時日。另一個要到全國各地轉轉。而且連我本人也想暫時休息一下。請你這當口擔任一陣子執行副主編。”

作為執行副主編，蕭乾可以在所有稿件經他審閱後直接送印刷廠出版，連張光年都可以不看。蕭乾還是小心從事，發出的稿件事先都送給張光年去看，但是張光年的確從未過目蕭乾發來的稿子。倒是張光年未看過的稿件也轉給蕭乾處理了。

蕭乾不敢怠慢，以執行副主編的身份主編了在中國最敏感時期的幾期《文藝報》，大膽地貫徹雙百方針，把《文藝報》辦得有聲有色，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他全然不知自己已經掉進了張光年為他佈設的陽謀圈套。

直到文革，蕭乾才恍然大悟，他說道：“天哪！我再聰明也不會意識到個中的圈套。原來

從小報上我才曉得這是在他從黨內得知要發動反右鬥爭之後，他輕而易舉、順順當當地就把我這頭替罪羊的脖頸套上了。在批判我的大會上，他大言不慚地說：‘我是引蛇出洞！’於是，他自己成了反右英雄。”（《蕭乾回憶錄》）

1957年7月，周恩來在中南海紫光閣約見文藝界人士。蕭乾和吳祖光被周恩來叫起來，周恩來對他們二人說，你們不應算作右派分子，並且鼓勵二人“要認真檢討，積極參加戰鬥”。可是周恩來說了沒用，倆人全跑不掉，當了右派分子，押送北大荒勞動教養。

1960年，蕭乾獲准回京探親。文潔若勸他去看望領導張光年。他誠心誠意地去探望張光年，萬萬沒想到卻受張光年結結實實的一頓奚落和侮辱。張光年最後惡狠狠地對他說：“你就是文藝界的王耀武！”

1966年，文革浩劫開始，蕭乾夫婦慘遭批鬥、抄家，受盡凌辱。蕭乾更被戴高帽子遊街，蹲牛棚，最後送去五七幹校。他的老岳母不堪忍受侮辱，憤而自盡。蕭乾也想隨她而去。他取來一張白紙，用紅鉛筆給妻子寫下遺囑：“潔若：新社會固然美好，只是我擠不進去。我先走一步，孩子們只好都托給你了。乾。9月4日” 然後吞服了三十粒安眠藥。

幸虧發現得早，搶救過來了。文潔若附在他耳畔輕輕地用英文說：“We must outlive them all!”（我們必須比他們所有人活得長！）蕭乾確實比他們這夥人活得長。1999年他在北京醫院因心肌梗塞和腎衰竭逝世，享年九十歲。

蕭乾生前著作等身，主要著譯有《籬下集》、《夢之谷》、《人生採訪》、《好兵帥克》、《八十自省》、《未帶地圖的旅人——蕭乾回憶錄》等四十三部。1995年他和文潔若夫妻二人翻譯出版的天書——愛爾蘭文學大師喬伊絲名著《尤利西斯》中文全譯本，引起了文壇的轟動。挪威王國政府曾授予他國家勳章。

蕭乾十分重視和珍惜自己的民族成份，以自己為蒙古族人而自豪，而且多次返回祖籍所在地錫林格勒大草原，尋祖問根。回到北京以後，撰寫了多篇有關故鄉的文章。

### 魏啟功(滿) 皇族貴胄

大書法家、國學大師啟功（1912-2005）是清朝皇族的後裔，滿族，屬正蘭旗。曾任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文史研究館館長。他在生前著有《啟功口述歷史》一書。他親自述說了當右派的經過，純系為他人受過，試看他口述中的部分摘要：

1957年北師大陳垣校長親自主持評議新增教授人選。那天散會後我在路上遇到了音樂系的鋼琴教授老志誠先生，他主動和我打招呼：“祝賀你，百分之百地通過，贊成你任教授。”我當然很高興。但好景不長，教授的位置還沒坐熱，就趕上了反右鬥爭，我被劃為右派，教授也被黜免，落了一個降級使用，繼續當我的副教授，工資也降了級。說起我當右派，還有一些特殊之處。我是



魏啟功 國學大師啟功

1958年被劃為右派的，而且劃我右派的單位也不是我關係所在的北京師範大學，而是中國畫院。別的右派都有言論罪行，即響應大鳴大放的號召，給黨提意見，說了些什麼。我是全沒有，事情的經歷和其中的原委是這樣的。

我對繪畫的愛好是始終癡心不改，在解放前後，我的繪畫水準達到了有生以來最高水準，在國畫界已經產生了相當的影響。後來繪畫界準備成立全國性的專業組織——中國畫院。要組織這樣一個有權威有影響的組織，必須由一個大家都認可的人物來出面。很多人想到了著名學者、書畫家葉恭綽先生。此事得到了周恩來總理的支持。當時葉恭綽先生住在香港，周總理親自給他寫信，邀請他來主持此事，葉先生慨然應允。回來後，自然成為畫院院長的最熱門人選。葉先生是陳校長的老朋友，我自然也和他很熟識，而且有些私交。如當我母親去世時，他看我很傷心，我和他說起了我的不幸身世以及我們孤兒寡母的艱辛，他安慰我說：“我也是孤兒。”邊說邊流下了熱淚，令我至今都很感動。又如他向人介紹我時曾誇獎說：“貴胄天皇之後常出一些聰明絕代人才。”

所以承蒙他的信任，有些事就交給我辦。比如到上海去考察上海畫院的有關情況和經驗，以便更好地籌辦中國畫院，為此我真到上海一帶作了詳細的調查研究，取得了很多經驗。這樣，在別人眼裏我自然成了葉先生的紅人。這種情況卻引起了一些人的嫉恨。

當時在美術界還有一位先生。他是黨內的，掌有一定的實權，他當然不希望葉先生回來主持畫院。深知葉先生在美術界享有崇高的聲望。他一回來，大家會都站在他那一邊，自己的權勢必然受到很大的傷害；而要想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須借這次反右運動把葉先生打倒。而在那位先生眼中，我屬於葉先生的死黨，所以要打倒葉先生必須一併打倒我，而通過葉先生周圍的人也能羅織罪名迂回曲折地最後達到打倒他的目的。於是我做了必然的犧牲品。

但把一個人打成右派，總要找點理由和藉口，舉凡瞭解一點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不會在所謂給黨提意見的會上提什麼意見的，不用說給黨提意見了，就是給朋友，我也不會提什麼意見。可是怎麼找藉口呢？正應了經過千錘百煉考驗的那條古訓：“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經過多方搜集挖掘，終於找到了這樣一條罪狀：我曾稱讚過畫家徐燕蓀的畫有個性風格，並引用了“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的詩句來形容稱讚他代表的這一派畫風在新時代中會有新希望。

於是，他們就根據這句話無限上綱，說我不滿當時的大好形勢，意欲脫離黨的領導，大搞個人主義。當時的批判會是在朝陽門內文化部禮堂舉行的，那次會後我被正式打成右派。葉恭綽先生，還有我稱讚過的徐燕蓀先生當然也按既定方針打成右派，可謂一網打盡。我也確定這件事是那位先生親自過問，親自操辦的。當然這場運動勝利過後，他在美術界的地位更加炙手可熱，呼風喚雨了。

我也記不清是哪年，大約過了一二年，我的右派帽子又摘掉了，我之所以記不清，是沒有一個很明確而鄭重的手續正式宣佈這件事。而且當時是在畫院戴的，卻在師大摘，師大也說不清是怎麼回事。總之，我稀裏糊塗地戴上帽子，又稀裏糊塗被摘掉帽子。當時的政策規定，對

那些摘帽的人不叫現行右派分子了，而叫摘帽右派——其實，這是另一種形式的右派，換湯不換藥。

當時對摘帽右派有這樣一句非常經典的話，叫“帽子拿在群眾手中一不老實可以隨時給你再戴上。”我十分清楚這一點，日久天長就成了口頭語。“帽子拿在群眾手中”、“帽子拿在自己手中”，不管帽子拿在誰的手上，反正隨時有被扣上的危險，能不如履薄冰、如臨深淵、戰戰兢兢嗎？

我和有些人不同，他們可能有過一段光榮的革命史，自認為是革命者，完全是本著良好願望，站在革命的或積極要求進步的立場上，回應黨的號召，向黨建言獻策的，很多人都是想“撫順麟”的，一旦被加上“批逆麟”的罪名，他們當然想不通。

而我深知我的情況不同於他們。當時我老伴也是常為這件事傷心哭泣，我就這樣勸慰她：“算了，咱們也談不上冤枉，咱們是封建餘孽，你想，資產階級也都要革咱們的命，更不要說要革資產階級命的無產階級了，現在革命需要抓一部分右派，不抓咱們抓誰？咱們能成為左派嗎？既然不是左派，可不就是右派嗎？”

摘帽之後，最令我奇怪的是那位給我戴帽子先生好像沒事人一樣，照樣和我寒暄周旋，真稱得上“翻手為雲覆手雨”、“宰相肚裏好撐船”了。

## 何 遲(滿) 相聲作家的悲劇

在毛澤東時代壓抑沉悶的單調生活中，只有相聲藝術還可以逗人發笑，讓人暫時忘記苦惱的現實。那個年代侯寶林、馬三立說的相聲《買猴兒》、《開會》、《新局長到來以後》、《今晚七點鐘開始》、《高人一頭的人》曾經風靡一時。它們的作者何遲在他讓人開懷暢笑的時刻，自己卻因“用相聲頌古諷今，諷刺美好的現實生活”，而被打成右派，落得終生殘廢。笑料作家演出了一齣人間悲劇。

何遲（1920-1991）滿族，生於北京，原名赫裕坤。1938年中學未畢業即赴延安，參加革命。在陝甘寧和晉察冀邊區的《抗敵劇社》當演員，後任職華北聯合大學文工團演員。1942年在日寇的掃蕩中火線加入共產黨。他早年以演出逗人發笑的相聲參加抗敵鬥爭。

中共掌政後，他被調往天津，先後擔任天津市文化局處長和秘書長、天津戲曲學校校長、中國戲劇家協會天津分會副主席等職。他之所以被打成右派，除了寫作了許多受普羅大眾歡迎的“諷刺相聲”以外，還同長春電影製片廠導演呂班和中宣部文藝處副處長鐘惦棐有密切的關係。他們二人也先後被劃為右派。因此何遲的另一樁罪名是“勾結呂班、鐘惦棐，妄圖獨霸戲劇界”。

呂班在長春電影製片廠不滿自己的工作 and 地位，何遲便把他邀請來天津，秘密籌組《春天劇團》，並打算在天津設立長影分廠，他們被指責為有分裂長影、擺脫黨的領導的反黨行為；指責他們自組班底，呂班任團長和分廠廠長，何遲任總編導。黨支部書記則由呂班的妻子擔任；進一步指責呂班想當天津劇協副主席，篡奪天津文藝界的領導權。他們的活動遭到天津黨政領

導非議後，何遲十分不滿，想調離天津，呂班安排他在長影任導演兼編劇。答應他做長春文聯委員、行政升一級、給小樓一座。何遲的妻子擔任長春評劇團副團長。

在批判何遲的時候還說他一貫反對戲曲改革，對黨的文藝方針陽奉陰違。將天津評劇團演出的《劉胡蘭》予以全盤否定。在《戲劇報》1956年第十期著文攻擊雙百方針，誣衊戲劇界的領導幹部如同一個人進了博物館，把“翡翠都摔碎了，還讓別人尊重他摔碎翡翠的功勞”。稱他是打擊別人抬高自己的“戲霸”。在鳴放中他向中共天津市委開炮，稱文化局為“大婆婆”，文藝工會是“小婆婆”，曲藝演員是“草民”。他的作品一味揭露新社會的黑暗面，充滿資產階級低級庸俗的一套。歪曲攻擊現實生活和黨的領導。

他與鐘惦棐的關係更加微妙。《人民畫報》7月號發表了何遲一篇四百字短文。鐘惦棐看到後十分婉惜地說，短短四百字的文章，讓人家抓了一大把辮子，太不值得了。反右開始，何遲專門去北京看望鐘惦棐，二人策劃於密室，鐘勸何遲今後要謹言慎行，少說為妙。中宣部指責他們二人搞反黨活動。

何遲具有滿族的烈性子脾性，剛直好強，疾惡如仇。他是個能編、能導、能演的全才作家。反右批判他時卻把他說成是自吹自編，都是抄別人的作品。揭出他的老底在三反五反時同貪污分子拉扯不清，自己也貪污腐化受到處分；批判“胡風反黨集團”和肅反時，他有“小集團反黨活動”。

何遲被劃為右派後，開除黨籍和公職，下放監督勞動。1961年摘帽歸來，仍是摘帽右派，分配在群眾藝術館戲曲研究室工作，不准亂說亂動，更不准發表作品。

1966年文革浩劫中，何遲又被打成文藝界的牛鬼蛇神，先受文藝界的造反派嚴刑拷打。造反派向他的太陽穴足足重擊三十六拳，用棍棒皮鞭撬嘴巴、壓杠子、坐老虎凳墊三塊磚。繼而造反派強迫已經傷殘的何遲去農村作強體力勞動。直到他癱瘓在田地，用抬架抬回來。何遲經此獸性糟蹋，原來十分魁梧的身材，而今癱在床上只剩下半截身子，似十歲小童，瘦成麻杆兒，眼塌腮癟，皮包骨頭。唯有雙眼依舊炯炯有神，仿佛代替他的嘴和筆，在控訴吃人的暴政和專制的魔頭。

何遲病逝於1991年，身後留下《何遲相聲創作集》和其他戲曲理論著作，今天被用作戲劇院校的教材。

### 馬三立(回) 相聲泰斗

中國人很少沒有聽過馬三立說的相聲《買猴兒》的，他在《買猴兒》中創作的“馬大哈”的形象，栩栩如生地活在人們的心目中。一旦提起某人為人處世“馬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立即冠以“馬大哈”之美名。馬三立為平民百姓製造了笑料，可是他自己卻自1957年以後永遠笑不出聲



了。

馬三立（1914-2003）生於北京，祖籍甘肅永昌縣，回族。1921年隨父馬德祿學藝。1929年拜

馬立三（右）和趙忠祥（左）倪萍

“相聲八德”之一的周德三為師，1930年十六歲登臺演出，至2001年12月8日在天津舉行從藝八十週年告別演出，是從藝時間最長的相聲演員。

經長期藝術實踐，馬三立形成內緊外松、有條不紊、表演細膩、含蓄雋永的風格，擅長演出“貫口”和文哏段子。成為中國第五代相聲大師。

中共政權成立前後，馬三立先後同侯寶林、劉奎珍、候一塵、張慶森等搭檔，創作了許多相聲新段子。1952年主動申請參加赴朝鮮慰問團，回國後參加天津曲藝廣播團，後來轉到天津市曲藝團。1956年毛澤東視察天津，曾觀看他的演出並接見過他，誇他的相聲具有“人民性”。

相聲作為一種諷刺藝術，不能不同政治沾上邊。在階級鬥爭的年代，日常生活中每一件小事都會涉及政治。1957年整風鳴放時期，馬三立演出了何遲寫的相聲段子《開會迷》，諷刺了以開會為職業的中共領導幹部。這一下惹下了殺身大禍，用毛澤東的區分“香花毒草”的六條標準一套，《開會迷》諷刺挖苦黨的領導幹部，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馬三立套進了右派的雞蛋框框。同《開會迷》的作者何遲在一起，雙雙掉進右派分子的泥坑。

馬三立從此封口二十年。在文革期間又作為“封、資、修”的代表人物受到衝擊。改正後重新登臺，然而永遠失去了相聲泰斗哏趣逗樂的風采，在舞臺上他變得十分小心翼翼，生怕再有一頂什麼樣的帽子平白無故地掉在自己頭上。

## 文徵赫恩 滿族勇士

文徵赫恩（1931- ）是古滿族鄂河國人，出生於北京市。他的祖先屬於上三旗中的鑲黃旗。所以他的血液裏有著滿洲貴族的血統。始祖伯爾濟是多爾袞麾下的大將，跟隨順治帝入關進京。與多爾袞一起南征北戰，打遍了大半個中國，鮮血染紅了戰袍，為開創大清帝國立下了汗馬功勞。

曾祖父依典阿為將門之後，擁有廣袤的土地和眾多的屋宇，事業輝煌；祖父景祺，曾與別人比試穿褲子，一天換一條，居然三年半不重樣；父親文烈是著名的書法家，熱心公益事業，與周恩來秘書閻寶航在奉天共創貧兒學校。



文徵赫恩在右派改正後返校時的留影

有著顯赫門弟的文徵赫恩在瀋陽國立東北中山中學讀書時，積極參加1947年中共地下黨領導的反饑餓反內戰和六二學生運動。1948年1月被國民政府逮捕後送青訓大隊，當年僅十七歲。獲釋後他的母親攜帶兄弟姐妹去臺灣。唯獨他嚮往共產革命，留在大陸，於1949年3月參軍，加入林彪的第四野戰軍南下工作團。

在軍隊裏，他親眼目睹了中共軍隊內部的黑暗腐敗。各級軍官在中共取得政權後的“換老

婆熱”尤其令他反感。因此他於**1952**年憤而退出軍隊，考入上海戲劇學院的表演藝術系。在反胡風反革命集團和肅反運動中，文徹赫恩被誣為“胡風分子”和“胡風反革命集團在上戲的代言人”，並稱他為皇帝的孝子賢孫。他反駁道：“我是皇帝的孝子賢孫，你們難道是從石頭裏蹦出來的嗎？”

原來他愛好音樂戲劇，加入了上海戲劇學院學生演出隊和一〇五樂團，並擔任樂團團長。參加演出隊和樂團的學生平日喜歡聚在一起，議論國家大事。集中起來，不外乎：一，攻擊蘇聯和蘇聯紅軍，在東北拆機器運回蘇聯，紅軍燒殺姦淫；二，批評一邊倒，倒向蘇聯，在上戲的蘇聯專家只識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不曉得關漢卿；三，污蔑黨團員，醜化黨員幹部。

在肅反運動中，學生演出隊被打為“反革命小集團”，演出隊隊長自然成為反革命分子，文徹赫恩是演出隊的骨幹和樂團團長，與演出隊長一起隔離審查。折騰了一陣子，查不到什麼確切證據，把他放了出來。**1957**年初，動員助黨整風時，黨委副書記在會上隆重宣佈：“我現在代表院黨委宣佈為文徹赫恩同學平反並向他道歉。”

**1957**年初平反不久，開展了鳴放和反右運動。在運動中，文徹赫恩有自知之明，吸取反胡風和肅反運動中的經驗教訓，不說一句話，不寫一張大字報。他自以為這樣總可以明哲保身了，可是並沒有逃脫厄運。

中共上海戲劇學院黨委書記在反右運動的動員報告中，最後點他的名說：“別看有的人在大鳴大放中一言不發，一張大字報也不寫。但是他內心是仇恨共產黨的，在肅反的時候我們已經把他揪出來了。他還對我個人進行人身攻擊，說我小學程度，數理化一點兒不懂，還領導大學生呢！簡直是誤人子弟。這不是和儲安平所說的‘外行不能領導內行’一樣的反動言論嗎？跟章乃器所說的‘黨天下’一模一樣嗎？文徹赫恩不但是右派分子，而且還是極右分子；不但是反革命分子，而且還是雙料反革命分子。”

這位自稱為小學程度的大學黨委書記把儲安平和章乃器的右派言論張冠李戴，搞顛倒了。文徹赫恩頓時遭到比肅反時更猛烈的火力批判，容不得他有絲毫的申辯。上海電影製片廠江南廠廠長應衛雲指名要調他去當演員。上戲黨委回絕他說：“文徹赫恩有嚴重的政治問題，他是反革命集團的頭子，組織了一〇五反革命樂團。”

文徹赫恩於**1958**年被捕，關進上海市第一看守所，代號“一〇二〇”。接著又遞送到上海市提蘭橋監獄。未經審訊，便下達了判決書。判決書寫道：

“罪犯文徹赫恩，解放前參加特務組織，解放後混入我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上海戲劇學院後，組織一〇五反革命樂團，攻擊蘇聯，污蔑蘇聯紅軍，破壞國際統一戰線，醜化我黨團員——為此判處五年徒刑，剝奪政治權利三年。如不服從以上判決，可以在十天內上訴高級人民法院。**1958年8月1日**”判刑以後，他與犯人都送往外地勞動改造。六批犯人分別押送黑龍江、蘇北大豐、安徽白茅嶺、甘肅、新疆和青海。文徹赫恩去青海，三個大隊二千多人，到達青海後分送幾百個勞改農場、工廠和礦山。

他先去查查香卡大煉鋼鐵，後又去都蘭縣香日德農場。中共公安部長謝富治透露，當年中



國在押的勞改犯共有六千萬之眾，僅香日蘭農場就有四萬個犯人。自1960年至1962年三年大饑荒時期，他眼見每天有二、三車死人埋在河灘上。他自己就被人埋過一次。他病得昏昏沉沉，別人以為他死了。他回憶道，有人睡著了，也被當作死人活埋。在香日蘭農場，他經歷過二次死亡。

1962年元旦，《人民日報》發表元旦社論，吹噓工農業獲得空前大豐收，文徹赫恩嗤之以鼻。這件事給彙報上去，場部立即召開萬人批判大會，四周架起機槍，狂呼“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文徹赫恩！”的口號。管教說他態度極壞，氣焰囂張，不可救藥。1963年3月，刑滿留場，好不容易找到個老婆。老婆是反革命家屬，因為不肯嫁給老幹部而被判刑一年，也在這個農場勞改。二個人在文藝隊裏產生感情，相識相愛。

結婚後不久，隊長派他到一百里以外的水磨去勞動三個月。他的隊長是個色鬼壞料，把他支開後，便去強姦他老婆。老婆正巧來月經，抵死不從。無奈拗不過身強力壯的大漢，第一回得逞後又去過幾次。文徹回來，老婆向他哭訴。他勃然大怒，便去告那隊長。殊不料管教反誣他夫妻串通拖幹部落水。文徹氣憤地說：“我在部隊好歹是個排級幹部，我難道要拖個小班長落水？”

禍不單行。他的兒子又闖了禍。學校裏唱歌的時候心不在焉，把“打倒劉少奇”唱成“打倒毛主席”，老師說：“這是反革命老子教的。”1968年春節，他又按反革命罪被捕，嚴刑拷打交代罪行。鼻樑打斷，左耳打聾；牙齒打掉四顆、落掉十二顆，總共掉了十六顆；腰被打殘，落下終身殘廢。自1958至1978年，他坐了二十年九個月十一天牢，群眾專政三年，共計二十三年零八個月。

1979年他在美國當博士的哥哥回國向中共當局打招呼，提出要為他平反。美國博士說話中共買賬。當他離開香日蘭農場時，犯人們紛紛議論：“文徹赫恩是我們之中最反動、最頑固、最死不認罪的反革命分子，想不到他卻第一個平反離開農場。”

### 馬少參 回族科長中陽謀

馬少參（1916-1995）原名馬昌綸，曾用名馬正平，商陵，用孟晉作筆名，享年79歲。回族人，生長在重慶市，父親是武勝沿口鄉人，近代祖先墳墓都在沿口，那是回族聚居地。據族譜的可考記載：明末時的祖先從金陵到湖南邵陽（寶慶）居住下來，到“湖廣填四川”時後代才遷到沿口。為了紀念可考的始祖，族譜上稱“金陵馬氏”。馬少參父親馬師參（1886-1968）。從小讀書，總想從科舉中找出路。

馬少參在家是長子，有姐姐、弟弟和四個妹妹。弟妹們對大哥很是尊敬，有事都找大哥商量，義不容辭擔負起大哥的責任。



馬少參晚年

馬少參十歲高小畢業，考入重慶聯合縣立中學，是同級中最年幼的。家庭環境使馬少參早熟，從小喜歡讀書，但很少做家務，所以不大會料理自己的生活。

十四歲初中畢業，因家境欠佳，他投考了有錢人不願讀的萬縣亢家灣四川省立第四師範學校。叔父在萬縣做生意，他十四歲離家去萬縣依靠叔父照顧念書。

同學多半很貧苦，但都埋頭苦讀，每晚在慘澹的燭光下自習，馬少參的眼睛近視了。那時學校暗地有政治活動，有一次正上課，軍閥王陵基的軍隊把學校圍上抓了二十多人，一個教員和一個同學被槍斃，其餘的有的被關，有的放了。

十七歲馬少參師範畢業。留在叔父店裏做了半年學徒。但他年輕氣盛受不得氣，看不慣商場的風氣。半年後同學介紹他到萬縣第七小學教書，待遇是每月銀元30元。馬少參在這裏遇到了他後來的妻子，遇到家裏粗暴的反對，他帶著她回重慶尋找出路。

馬少參當過一段時間教員。1935年考取聚興誠銀行練習生。從此，在銀行工作了相當長的時間。1946年5月抗戰勝利後，隨行遷至上海，1949年調中央銀行蘭州分行。

1950年3月馬少參在西南革命大學學習四個月後，分配到西南民族事務委員會工作，1954年提拔為行政科副科長。當年12月西南大區撤銷，馬少參奉調重慶市民政局任總務科副科長。

馬少參先後擔任重慶市回民協進會委員、副主任委員、秘書組副組長、組長、重慶市清真寺工作組組長、重慶市政協通訊員、民族宗教組組長，為民族工作和統戰工作作出貢獻。

1957年6月馬少參才開始參加整風鳴放，經領導再三動員，他寫了兩張大字報。一曰領導，一曰工作。

他批評共事三年的總務科原代理副科長劉順安（黨員），對工作不負責任，瞎指揮。肅反外調搞逼供，遺棄家鄉妻子。結果馬少參的這個意見被無限上綱為攻擊黨了。

馬少參提出對肅反不能搞錯。結果被批判為否認肅反運動；

馬少參說：“黨天下是不對的”，被曲解為“向黨攻擊”。

馬少參談了“有職無權”的問題。被批判為有意向黨進攻，向黨要權；

馬少參說，民政局黨委有點“宗派主義情緒。”這也是馬少參反黨的罪狀。

反右鬥爭開始，原重慶市民政局副局長、民革支部書記郭造勳（起義將領）受到批判，因為郭曾分管總務科，馬少參有工作聯繫。列為民主黨派發展對象。被說成是非法串聯，聯合反黨。

隨著運動的深入，重慶市民政局八十多人已劃了十幾個右派分子。1957年9月組織通知叫他準備會上作檢查。他想，比較起來，自己已夠右派標準了，所以一開口就承認自己



馬少參上世紀1950年代全家

是右派，表示認錯。但只承認自己鳴放的原話。黨組織不滿，決定在大會上交代，大會認為不行，是態度不端正，先打態度，採用疲勞戰術，粗暴語言，帽子、棍子齊下。批判中，一些污蔑不實之詞隨之而來。而馬少參只有勇於承擔和反覆檢討的義務，沒有申訴的權利。他被劃為了極右，**1958年3月14日**經中共重慶市市委組織部批准，降職降薪，從行政**18級**降為**23級**。

**1958年3月**馬少參與其他右派一起下放到重慶市民政局下屬的九鍋箐農場勞動。離開那天，妻子和**12歲**的兒子去送他，他對妻子說：“我的事我一人負責，我一人承擔”。到了農場，開始安排他去養豬，他堅決不幹，“我是回族，怎麼會去養豬？”場長吳俊樂是個農民出身的老紅軍，把馬少參安排作庫房保管員。**1959年**反右傾運動把他打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罪狀是重用右派。後把馬少參調到公平農場勞動，正遇大饑荒，兒女千方百計節約糧票寄給他中途又被人截走。馬少參得了浮腫物。生活自理能力本來極差，挑糞弄到身上到處都是糞便。等到春節才挑一大挑髒衣褲、被子回家，兒女洗到深夜也沒洗完。

由於他有一技之長，**1962年**民政局把他調到重慶市民政局屬“市中區盲聾啞殘福利工廠”擔任會計。狀況才有所改善。**1962年**當時的重慶市民政局黨組成員徐效之來找馬少參談話，說：“其他的啥都不寫，只把**1957年**的事再認識一下，就摘帽。”馬少參見到他，如見親人，就直言衷心：“你來正好，鳴放時我們在一個組，你是組長，我是副組長。你更清楚。我還有幾點想不通呢！”最後說：“如說得不對，殷切希望黨組織幫助。”這樣一來，摘帽的事就此石沉大海了。

在**1969年**的清隊學習班中，馬少參從嚴否定自己，再次檢查了**1957年**的錯誤，**1969年11月**經重慶市民政局才宣佈馬少參摘帽。

**1977年3月**，馬少參在重慶市民政局屬紅岩電器開關廠退休以後又由其他國營或民營企業聘用馬少參擔任會計顧問。**1979年**中共中央第**55號**文件下達，為錯劃右派定了性。馬少參於**1979年3月19日**向中共重慶市委組織部遞交了申訴材料-《終於發出的信》，強烈要求為自己平反。他在信中寫了兩點要求，除了對**1957年**劃為右派大呼冤枉外，還表示了對黨的忠心。三個月，中共重慶市委組織部才正式下文為馬少參錯劃右派予以改正。

在重慶市民政局的上報的《於馬少參同志錯劃為右派的改正結論意見》中寫道“根據中共中央<**1978**>**55號**文件精神，我們對馬少參同志被劃為右派的問題進行了復查研究。認為：**1957年**整風鳴放期間，馬少參同志對本單位肅反工作和幹部提拔、提級等問題提出了一些意見，對個別黨員幹部的作風問題進行了批評，雖然有些話談的不夠確切，但不是右派言論，按照中央<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馬少參同志被劃為右派問題屬於錯劃，應予改正，原處分就予撤銷，恢復其政治名譽，其退休金按恢復原工資待遇（行政**18級**）從**1978年10月**起計發。對其家屬子女檔案中凡涉及此問題的材料一律抽出銷毀。”

其中一句“雖然有些話談的不夠確切”，所以他說了一句“其中兩點不盡切合，無關大局，我就不去計較了”。

組織上問馬少參還有什麼意見和要求，為了表示對黨忠心耿耿，只說了句“不給組織添麻煩”，沒有向組織提任何要求。能夠在他有生之年把他的問題澄清，還他一個公道，他已是感恩戴德了，還能給組織提什麼要求喲！

馬少參為人老實，一介書生，清高迂腐。於1995年5月突發心臟病去世，享年79歲。

## 博繩武 一個蒙族小右派渣兒的自述

博繩武（1939-）男，蒙古族，北京人。成吉思汗的後代，祖先隨滿清入關來到北京，聽老人說，在清朝代代為官。我祖父在清朝是個好官、清官、有正義感的官。在清朝末期，開義和團的年代，起初清政府支持義和團打洋人，後來清政府失敗，又與洋人訂了不平等條約，反手又捉拿殺害義和團。當時我祖父在山西大同府做知府，就是因為抗拒朝廷，沒有捉拿義和團而被罷官為民的。罷官後回到北京買了所小宅院閒居下來，後來也因禍得福，在辛亥革命時沒有受到衝擊。辛亥革命後家庭更加沒落。

我就生在這樣一個前清遺老遺少的沒落家庭裏。我的兩個伯父沒有上過新學，民國以後沒有幹過什麼工作，吃老本，是地道的前清遺老遺少。我的一個姑姑工詩詞、喜國畫，當時小有名氣。我的父親最小，民國後上的新學，後考入北京大學文學系，因參加五四運動而被北洋政府通緝，無奈和幾個同學流亡日本，在日本工作多年，抗戰時在日東京帝國大學任客座教授。

我生在北京，三歲時父母因長期異地生活而離婚，我被送往日本東京。幼稚園和小學低年級是在日本東京華人學校上的。當國人正如火如荼抗日的時候，我看到的卻是日本人民良好的道德風尚、日本女人的善良、日本大學生在大街上的反戰遊行、被美國飛機炸成片片焦土的東京和日本人民的苦難。直到二戰後1947年才又回到北京。

回國後就讀于育英小學，這是一所當時號稱貴族學校的小學，是一所教會學校，屬於基督教公理會，每週有四節聖經課。我又是個住校生，管理我們生活的老師都是修女，她們善良溫柔的形象，至今也還是揮之不去的回憶。我們課餘經常到公理會教堂去玩。我有兩個比我大近三十歲的叔伯姐姐，她們都是協和醫院的大夫。我的初中也是在育英中學（後來改為北京二十五中）上的。雖然已經是解放以後，可師資還是老育英的班底；老育英的教會學校、貴族學校遺風，一時還是不好清除；思想活躍，課外活動豐富多彩。

後來得知，在反右中該校教師被劃右者居多，尤其是歷史和語文教研室，基本上是全軍覆沒，劃右率超過百分之九十。有人說這也創造了一個全國之最。我初中校友劃右的比例也遠遠高於一般。如果說育英是右派的搖籃也未尚不可。

高中是北京一中讀的，這所學校前身是京師大學堂，是北京校史最長的學校之一。解放前與河北北京中學相同，學生中以北方各省地主子弟、老式家庭子弟居多，校風和育英中學迥異。解放後舊北京一中那種封建古板的思想，容易被共產主義說教所取代。在同學們正沉浸在被解放的喜悅中，風風火火爭當馴服工具的時候，我已經感到精神的壓抑了。我沒有爭取入過團和

黨，其實當時也沒有過多的想法，只是不願再給自己多找些束縛而已。

我在中學時代學習上沒有什麼好成績，不讀死書，也不死讀書，瀟瀟灑灑總也混個八九十分。讀了不少課外書，但好讀書不求甚解，也說不上得到什麼收益，倒是因為好玩、好鬧，得了個“淘氣包”的雅號。

1956年夏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那時我只有十七歲。歲數不大，思想的發育更滯後於年齡，還是一個玩不夠的大男孩。脫離了家的束縛，住進了美麗的燕園，步入了大學的生活，未名湖的塔影山色美，朗潤園的野趣更美。我把同學們泡圖書館的時間，當然還包括他們聽黨課搞社會活動的時間，全部交給了美麗的燕園。我的身心，我的學習就溶入在神奇的大自然裏。閑雲野鶴，與世無爭，我滿心打算這樣讀完大學，安分守己作一個科學工作者，了卻一生。

1957年5月19日大飯廳牆上開始貼出大字報，第二天大字報已經鋪天蓋地，貼滿大飯廳的東牆和南牆。“行家看門道，外行看熱鬧”。像我這不問政治的大男孩當然也圍著看，開始看不懂什麼，倒是張元勳、沈澤宜傳單式的長詩《是時候了》攪動了我平靜的思緒。又過了幾天貼出了成立《百花學社》的告示，它號稱是純學術組織，是自由的論壇。我抱著學習的目的在《百花學社》的成立大會上簽下自己的名字，接著又參加了幾次《百花學社》的活動，直到《百花學社》被取締。6月中旬社會上開始了反右派運動，在北京大學，號稱五一九的民主運動也同時被鎮壓下去。

1957年9月16日在物理系的大會上宣佈了一批右派分子名單，其中就有我，還是極右分子。後來被定為學生三類處理。留校察看，繼續學習。我沒有什麼言論，更沒寫什麼大字報，系裏、班級裏也沒批判過我什麼，怎麼突然間就被劃成右派了呢？百思不得其解。於是找系裏去問。他們的答復是：你參加了右派組織《百花學社》，理所當然就應該是右派。就這樣還不滿十八歲就糊裏糊塗地成了反動派，一個不為人知的小右派渣兒。

開始戴著右派帽子繼續學習，感覺壓力很大，漸漸我發現只要是離開了公開場合，大多數同學對我還是一樣的親熱，有些還表示為我憤憤不平。這些人雖然不敢公開，但把真誠的一面給了我。我不孤獨了，或許還有點欣然，只要我好好學習，堂堂正正做人，爭取更多人的同情和信任，就是最好的抗議。後來我看到凡戴著右派帽子的畢業生都給轟到大西北去勞動，他們的境況比勞動考查和勞教教養的都更慘，我逃離了學校。

回家後為了糊口當了臨時工，什麼苦活、累活都幹過。那個年代幹臨時工的幾乎都是夠不上判刑或勞教的，流落在社會上的黑五類。“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碰到一起談天說地，苦中倒也有點樂趣。在幹臨時工的日子我結識了一位範老師，他一邊幹活一邊像教學生一樣給我講政治：什麼是無產階級專政，什麼叫人權，什麼是民主和自由，要如何面對逆境……他愛唱歌，尤其是那一曲黑人歌曲《老人河》，渾厚的聲音如泣如訴，可又在悲傷中顯出剛毅。在後來的幾十年時，每逢遇到難以逾越的逆境時，我耳邊就響起他那渾厚剛毅的歌聲“……老人河，老人河，你總是自由的流過”，我就堅強了，困難就過去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我們失去了聯繫，直到1979年我才得知他已慘死在文革中。

我懷念他，他是我一生中永遠的老師。在那個時候我真是一個不夠格的右派。我痛苦，我彷徨，我對當前的一切滿頭霧水，什麼資產階級民主，什麼無產階級革命……一大堆又冠冕堂皇又似懂非懂的辭彙，鬧得我頭昏腦漲。可我怎麼也想不通，既沒說三道四，也沒寫這寫那，就在《百花學社》簽了個名，一個還不滿十八歲的學生就成了右派，還有人成天惡狠狠叫喊著要“再踏上一隻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難道我真的錯了？就是再錯也不至於“永世不得翻身”吧。

在範老師的點撥下我開始思考了，好像他喚醒了我埋在心底的朦朧意識。原來我在幼年童年少年時代，就受到潛移默化而不知不覺的接受了博愛、平等、自由、民主的思想，這不就是百年來千百萬熱血青年前赴後繼的追求嗎？這不就是作為一個北大人的五四傳統嗎？我的頭腦裏有著先進的思想，有著坦蕩追求，我何罪之有？想著想著我糊裏糊塗覺得1957年我在《百花學社》成立大會簽名簿上寫上“博繩武”的時候，是我一生中莊嚴的一刻，因為往往糊裏糊塗辦的事比清清楚楚辦的事更天真無邪，更真實。

毛澤東說過：“自由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這倒是一語道破天機，取得政權前他大肆宣揚民主自由、反對專制獨裁、建立憲政，騙取了廣大民眾的支持；取得了政權，這時“民主和自由”是他取得政權的手段，當然不是目的。他的目的是變本加厲的專制獨裁，登峰造極的個人崇拜，圓他自己的一個皇帝夢。

他是以鼓吹“自由民主”起的家，他最清楚“自由民主”有多大號召力，對有“自由民主”思想的知識份子“恨得要死，怕得要命”是理所當然的了，耍個“陽謀”把這些人鎮壓下去更是順理成章的事了。其實反右派耍個陽謀算什麼，他取得政權就是個大陽謀，他做的哪一件事不是陽謀呢？他打在我身上的每一拳都很痛，踏在我身上的每一腳都很重，但是我同時也感覺到他的恐懼和顫慄。

紅色恐怖的極致——文化大革命，全國人民的災難，我這個黑五類自然是在劫難逃。1966年6月28日，在小腳偵緝隊的指引下，北京二十二中的紅衛兵抄了我的家，我被打得遍體鱗傷，穿著短褲背心赤著腳就被掃地出門了。在廠子扣了兩天，8月30日送到東城公安分局拘留所，次年3月送至清河農場二分場。1969年春解除了勞教，這時我已“上無片瓦遮身，下無立錐之地”。在那樣的革命形勢下就是親朋好友也不敢投靠，只好在清河農場就業了，明知道就業就是無期徒刑。1969年9月末被戰備疏散到山西霍州王莊煤礦，直到1979年落實政策。

我在勞改隊裏生活了二十年。也許人們都知道興凱湖，都知道夾邊溝，其實哪個勞改隊都是興凱湖，都是夾邊溝，地方不同，名字不同，苦難都是相同的。在勞改隊時難友們都知道不論在什麼逆境中我都是精神飽滿，談笑風生。他們總是追問我為什麼，我總是一笑地回答：我是個臭賴皮。其實我沒做虧心事，我為什麼不高高興興地做著。再看看那個陽謀家，他每一個陽謀得逞，看似勝利，他的路就窄了一塊，到他快死的時候就已經是孤家寡人了，沒有一個知己，沒有一個人可信任。他痛苦地閉上了眼睛才一個月，他扶持的人，包括他老婆就成了反革命。這一串串故事，哪個看了不得偷偷的樂呢，你還有煩惱嗎？

自1957年到1979年領導一直認為我不認罪，表現不好，沒有摘掉右派帽子。1979年在北京大學對我劃的右派給予改正，同時勞動教養也得到平反。

政治問題解決了，我又回到原勞動過的小廠子，做個小技術幹部，直到退休。上個世紀1980年代的時候，黨也曾向我敞開過大門。唉，當我還清白的時候他們說我是反動派，他們說我不是反動派的時候，我已經跳出三界處，不在五行中了，人生多少事就讓它盡付笑談中吧。

日